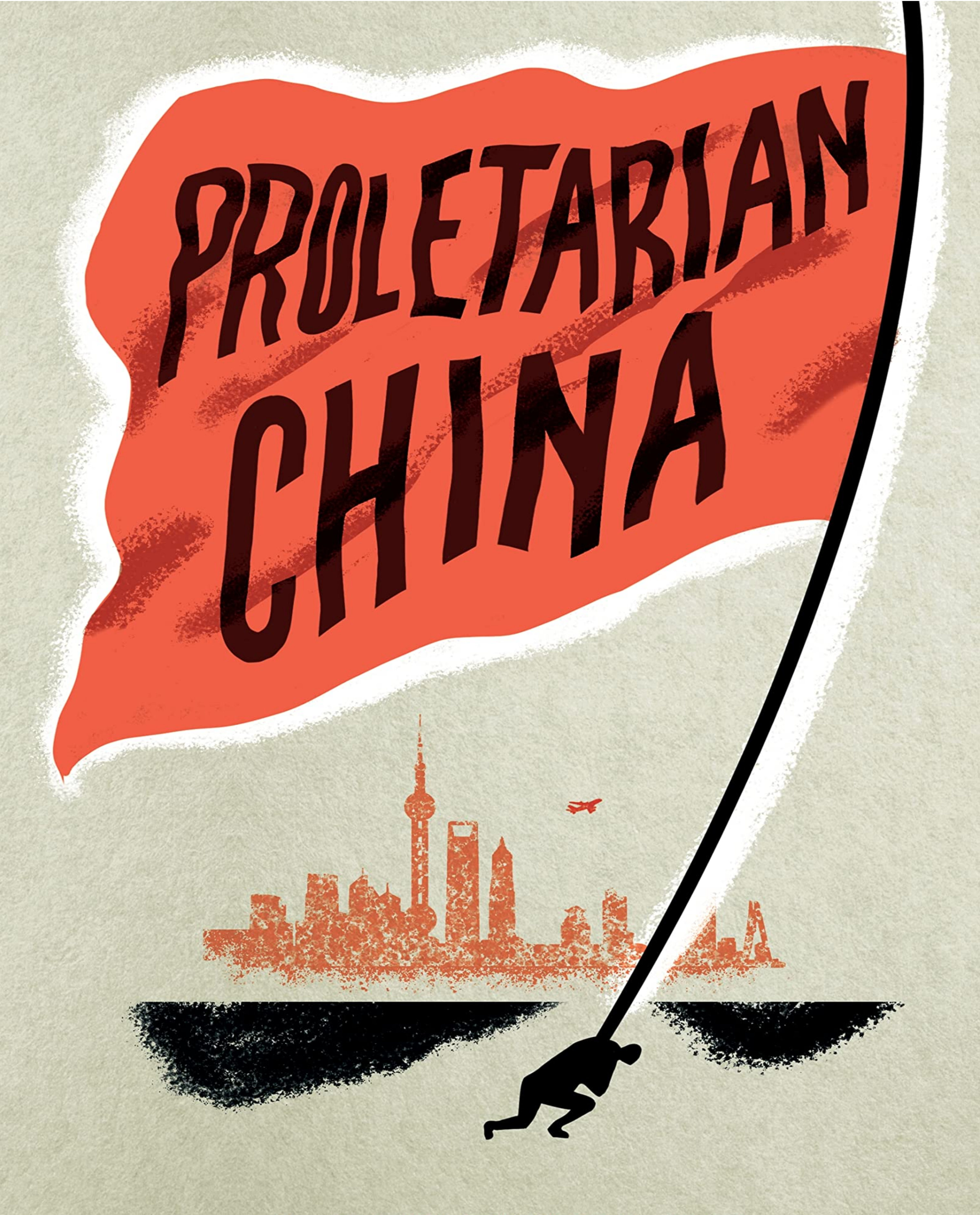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

EDITED BY

IVAN FRANCESCHINI & CHRISTIAN SORACE

爱罗中国

目录

序言 1

无产阶级已死，无产阶级万岁！

伊万・弗兰切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

克里斯蒂安・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

1898 13

“廉价的工作机器”

科里・伯恩斯（Corey BYRNES）

1902 23

旧中国未来幻想中的技术乌托邦与机器人

史峻（Craig A. SMITH）

1915 31

非凡的旅程：一战西线的华工

徐国琦

1920 38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

邓中夏

1921 43

扬帆起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林春

1922 53

1922 年安源大罢工：领导的经验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1923 61

二七惨案

罗章龙

1925 76

从五卅运动到省港大罢工

梁宝霖（Apo LEONG）

1925 85

天津工厂的日常政治

贺萧（Gail HERSHATTER）

1925 93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王侃

1927 100

第三次武装起义与上海大屠杀

S · A · 史密斯（S.A. SMITH）

1927 109

组织乡村社会：乡村治理的瓦解、农会与海陆丰苏维埃

亚历山大 · F·戴（Alexander F. DAY）

1928 118

中国工厂中的女权主义运动

董一格

1929 126

为大米而战：民国时期的“米贴”之争

李承俊（Seung-Joon LEE）

1938 133

战前香港劳工行动的复苏
陆延

1941 143

《新华日报》与战时重庆的阶级道德话语
何稼书（Joshua H. HOWARD）

1942 155

中国头号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兴衰起伏
博·埃伦伦·瑟伦森（Bo Ærenlund SØRENSEN）

1946 164

革命中的生产：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与政治劳动
江旷（Brian DEMARE）

1948 172

女工与 1948 年棉纺厂罢工
韩起澜（Emily HONIG）

1949 179

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
毛泽东

1949 181

连续与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女工
罗伯特·克利弗（Robert CLIVER）

1949 189

熄灭的火花：二战后台湾的工人激进主义（1945—1950）
陈柏谦（Po-chien CHEN）
刘羿宏（Yi-hung LIU）

1951 197

论行政与工会的关系

李立三

1951 204

通过群众运动进行的工厂革命

文哲凯（Jake WERNER）

1952 212

安置新社会主义工人：上海的“工人新村”

马克 · W · 弗雷泽（Mark W. FRAZIER）

1952 221

第一次爱国灭蝗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农村劳动力动员与害虫防治

约翰 · 威廉（John WILLIAMS）

1955 232

永久友谊的短暂：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蒙古（1955—1964）

克里斯蒂安 · 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

Ruiyi ZHU

1957 248

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赖若愚

对抗国家：1957 年的罢工潮

陈峰

1958 264

超越工资制：张春桥、资产阶级法权与作为理论的毛主义

本杰明 · 金德勒（Benjamin KINDLER）

1958 272

中国劳动力重组：户口制度的建立

简 · 海沃德（Jane HAYWARD）

1960 282

工人国家中的工人灾难：老白洞煤矿灾难

韦立德（Tim WRIGHT）

1960 292

鞍钢宪法：大跃进时期的劳工、工业与官僚

艾约博（Jacob EYFERTH）

1960 300

先生产、后生活：1960 年对棉花土纺土织的禁令

艾约博（Jacob EYFERTH）

1961 307

剖析女工：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化与劳动

阿米达 · 史密斯（Aminda SMITH）

蓝泽意（Fabio LANZA）

1962 317

农业生产队的共同劳动：毛泽东时代多数中国人的劳动生活

安戈（Jonathan UNGER）

1963 325

鬼神与工人："封建迷信"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6

S · A · 史密斯（S.A. SMITH）

1964 334

学习大庆油田

玛吉 · 克林顿（Maggie CLINTON）

1964 345

三线建设运动

柯尚哲（Covell F. MEYSKENS）

1967 356

1967 年一月风暴：从代表到行动再回返

蓝梦琳（Patricia M. THORNTON）

1967 366

1967 年香港暴动

叶健民（Ray YEP）

1968 373

第一所工人大学的建立

安德烈娅 · 皮亚扎罗利 · 隆戈巴尔迪（Andrea PIAZZAROLI LONGOBARDI）

1969 383

“反复旧!”：文革期间武汉造反派工人运动的高潮

安舟（Joel ANDREAS）

1970 392

建设自由（Uhuru）：坦赞铁路上的中国工人与劳工外交

马修 · 高尔韦（Matthew GALWAY）

1972 405

知青当农民：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

潘鸣啸（Michel BONNIN）

1976 414

白卷：文革后期电影《决裂》中学生劳动与行动主义的危机

A · C · 贝克尔（A.C. BAECKER）

1980 427

波兰团结工会崛起的回声

珍妮·L·威尔逊（Jeanne L. WILSON）

1981 435

放弃集体耕作及其对劳动力的影响

安戈（Jonathan UNGER）

1983 443

打工妹：梦之城中的性别麻烦

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

1986 453

中国的性工作者：从定罪、虐待到行动主义

郑田田

1988 463

解严与台湾自主劳工运动的崛起

何明修（Ming-sho HO）

1989 471

天安门广场上的工人

张跃然

1993 481

致丽火灾中的声音：玩具厂内的悲剧及其所揭露的状况

陈佩华（Anita CHAN）

1994 488

一法御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劳动法

萨拉·比达尔夫（Sarah BIDDULPH）

1995 501

从绿芽到被压碎的花瓣：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

郝秋笛（Jude HOWELL）

1995 510

窒碍难行：天安门镇压后的政治性劳工组织

林凯文（Kevin LIN）

1997 519

下岗：党的十五大与国企大规模裁员

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

2001 527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工人的意义

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

2002 535

辽阳罢工与中国锈带的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解体

李静君（Ching Kwan LEE）

2003 542

孙志刚事件

柯蕾（Chloé FROISSART）

2007 551

奴工：2007 年“黑砖窑事件”

伊万·弗兰切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

2008 560

《劳动合同法》及其不满

高敏（Mary E. GALLAGHER）

2008 573

“为明日的梦想奉献青春”：深圳劳务工博物馆的成立

埃里克 · 弗洛朗斯（Eric FLORENCE）

钱俊希

2009 582

张海超：“开胸验肺”

李瑞福（Ralph LITZINGER）

倪燕萍

2010 591

南海本田罢工

陈敬慈（Chris King-Chi CHAN）

许少英（Elaine Sio-Ieng HUI）

2010 600

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

陈慧玲（Jenny CHAN）

2011 611

中心处的断裂：北京驱逐农民工子弟学校

伊莱 · 弗里德曼（Eli FRIEDMAN）

2013 619

一带一路中的中国工人

何宜伦（Aaron HALEGUA）

2014 633

历史的见证者：80 年代至今的打工诗歌

孙万宁（Wanning SUN）

2014 642

裕元罢工

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

2015 653

机器换人

黄瑜

2015 663

受打压的劳工非政府组织

柯蕾（Chloé FROISSART）

伊万・弗兰切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

2018 672

佳士抗争

曼弗雷德・埃尔夫斯特伦（Manfred ELFSTROM）

2018 683

突厥语族穆斯林的拘留工厂

达伦・拜勒（Darren BYLER）

2019 695

香港新工会运动的诞生

陈佩华（Anita CHAN）

未来 703

折叠时间：对当代中国阶级分化的未来主义思考

罗鹏（Carlos Rojas）

情感谬误

陈楸帆 711

致谢 723

贡献者 724

译后记 742

为什么要翻译?

无产阶级已死，无产阶级万岁！

伊万·弗兰切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

克里斯蒂安·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

> "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
>
> ——邓中夏，1920 年 [1]

邓中夏写下这段文字时，时年二十六岁，在五四运动的烈火中，他是最早一批发现马克思主义，并关注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被社会与政治深深分裂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具有带来革命性变革潜力的学生活动家之一。[2]他和其他青年学生一起，在京汉铁路北段的车间里拜访长辛店的工人。他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一所夜校，为工人提供识字课程以及进一步的政治培训。随着工人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理，学生活动家也得知了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潜力及局限性的一手知识。这种交流是如此成功，以至于 1921 年夏天，当来自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聚集在一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时，党的成立决议强调了教育在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快进到一个世纪之后，2018 年 8 月 6 日的下午，在深圳一所警察局外，一群围观者看着工人、大学生、退休的国企员工，甚至是共产党的老干部，在发表演讲，抗议警察在前几天逮捕了几名参与佳士公司（一家焊割设备生产商）

---

[1] 本书收录了邓中夏的长辛店之行，见本书中 1920 年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

[2] 有关邓中夏的早年经历以及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贡献，参见 Daniel Y.K. Kwan. 1997.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工会活动的工人。[3]人群中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像，参与者穿着的 T 恤上印有被拘留同志的黑白素描，还有鲜红的六个字“团结就是力量”，演讲中赞扬了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重要性。正如一位演讲者所述：“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工人。”旁观者不知道的是，佳士的工会运动和随后的动员都是马克思主义学生故意策划的结果，他们在 2016 年就进入工厂，以地下劳工组织者的身份活动了五年，以策划对抗性的集体行动。[4]中国共产党的反应迅速且残酷，全国许多大学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学生，如果有谁参加了佳士运动，或只是对运动表示支持，就会受到监视、惩戒与恐吓。[5]

当我们在 2021 年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于堪培拉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写作时，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两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及其成立一百年后的现状的事例。这个世纪见证了现在地球上庞大的政党之一，从一个以解放工人阶级与追求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为承诺的革命组织，变成了一个装饰着社会主义标志，暴力打压任何劳工组织与工人阶级团结表达的资本主义机器。该如何解释这种转变，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这种转变对中国工人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

任何关于历史的描述，或描述的集合，都面临着瑞贝卡 · 卡尔（Rebecca Karl）所说的“叙事问题”：“我们用哪些事实来讲述我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组织的？又该用谁的声音来讲述？”[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工史案例中，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的政治开启了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发声的渠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放大作用，这些声音就可能听不到了？或者说，党是一个腹语者，用剧本支配着什么可以被说出，什么则必须保持沉默？1949 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梦想、憧憬和诉求激励着工人？在 1949 年工人被“解放”之后，这些理想是如何被实现，或是令人失望？而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角色又如何发生转变并调节党与中国工人之间的关系？

---

[3] 有关佳士运动，见本书中 2018 年曼弗雷德 · 埃尔夫斯特伦的文章。

[4] Yueran Zhang. 2020. ‘Leninists in a Chinese Fa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Jasic Labour Organising Strategy.’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2: 82–88.

[5] ‘Orwell in the Chinese Classroom.’ *Made in China Journal*, 27 May 2019, available online at: 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05/27/orwell-in-the-chinese-classroom.

[6] Rebecca Karl. 2020. *China’s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A Brief Interpretive History*. London: Verso Books, 3.

本书并不试图通过提供另一种宏大叙事来协调中国工人与其对话者复调的声音、方言与沉默。我们并不是要用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来取代共产党洪亮的“官方”声音，更不是要提供我们自己置身事外的非叙事旁白。相反，在编辑本书时，我们希望将中国过去和现在各式各样的有关工人阶级的核心作用，以及各种角度的工人在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观点纳入对话。但再现和叙述的问题引出了一个更棘手、更深刻、更基本的概念问题：**谁是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之痛

分属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人有什么共同之处？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纺织厂的织工与今天建设中国光辉大都会的农民工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二十世纪初被国民党迫害的共产主义战士与二十一世纪被共产党镇压的劳工组织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无产阶级这个符号下，可以找到这些分属不同情境中的共同点。

本书的标题 *Proletariat China* 代表着我们有意识地试图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找回“无产阶级”的概念。虽然工人的概念一直存在，但无产阶级是一个相对晚近发明的政治与概念，指向与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其历史使命是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汉语中，Proletariat 被翻译为“无产阶级”，如其字义般忠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定义——“除了他们的锁链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阶级。[7]因而，无产阶级是一个等待诞生的主体的名称。正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哲学家与他的穷人们》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被铭刻在《科学之书》（即马克思的《资本论》）中”。[8]在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同利益和背景的熟练工人成为一个阶级，并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走向“自为”。无产阶级无法自我诞生，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在旁协助，正如霍布斯对利维坦的描述，

---

[7]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Manifesto.pdf.

中文版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译者注。

[8] Jacques Rancière. 2004.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13.

一个由“混杂的劳动者”组成的人造身体，一个不断受到“分解成简单个体、替身、流浪者和诈骗者”威胁的无机身体。[9]无产阶级的诞生需要数十年的酝酿，诞生的日期也不明确。但自从它诞生以来，它就像一具强大的能动的身体，一具笨重的假体，一具奄奄一息的身体，也是一具可能在某日会成为凤凰般的身体。[10]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成立，距本书出版之日已有 100 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出现。[11]尽管工会、运动、工厂斗争以及与其竞争的政治愿景在共产党成立之前业已存在，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和政治行动者的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出现是党的规划。[12]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广阔农业海洋中的一条海岸线，其中充斥着与性别、乡土、庇护网络、甚至秘密结社联系等有关的分歧，仅仅存在着现实经验里分散的工人团体。[13]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无产阶级仍然是一个概念性的假设，一个政治愿景与一份诞生的宣言。

1949 年的分水岭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认同都充斥着矛盾，共产党在 1949 年实现了对政治合法性的垄断后，这种矛盾成了一种持续紧张的领域，而在 1956 年工业国有化之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中国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依据官方叙事，1949 年意味着将工人从新兴资本主义与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政权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一些学者则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乐观，共产党上台后，民国时期持续的工人运动消失了，在解放工

---

[9] Ibid., 107, 114.

[10] Wang Hui. 2020. ‘How Does the Phoenix Achieve Nirvana?’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1: 94–103.

即汪晖的一篇文章，“凤凰如何涅槃？——关于徐冰的《凤凰》”。——译者注。

[11] 见本书中 1921 年林春的文章。

[12] 关于晚清民初的中国工人竞争的政治愿景的详细描述，见 S.A. Smith.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3] 见本书中 1925 年贺萧的文章；Rancière,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137.

人的象征性承诺下，工人被束缚了。[14]另一些人则认为，共产党的胜利使工人在工作场所接受了一种新的依附性制度，极大削弱了他们的组织力量。[15]然而工人在毛泽东时代安于现状的神话早已被揭穿，正如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所显示的那样，新的社会学研究也指出共产党接管前后劳动条件的连续性，但 1949 年对中国工人来说仍是一个象征性的和话语上的分水岭。[16]如果工人已经通过中国共产党掌握权力，他们还有什么理由高声控诉、抗议？然而，正如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所示，他们确实在控诉、抗议。

事实上，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国家中，工人会感到不满、积攒怨气？正如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所示，尽管共产党和工人有着亲密的关系，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并不总是意见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不同时期会容忍工人在工人国家中拥有似乎并不正当的罢工权利。[17]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社会主义英雄主义”与“奉献精神”的神话，或是他们的“被动”与“静默”——都取决于观察者的政治观点，这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使得他们忽略了这些政治辩论与毛时代工作场所抗议运动的强度。虽然共产党声称代表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和党从没有达成过毫无保留的完全一致，这些“保留”成了国家规训机构和党的思想改造的持续目标。

中国从苏联继承的列宁主义悖论是，工人解放的逻辑依赖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赋予其政治形式。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共产党的调解

[14] 有关中国工人阶级“制造”与“非制造”的争论，见 Pun Ngai and Chris King-Chi Chan. 2008. ‘The Subsumption of Class Discourse in China.’ *Boundary 2* 35, no. 2: 75–91; William Hurst. 2016.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Made, Unmade, in Itself, for Itself, or None of the Above?’ *Made in China Journal* 1, no. 2: 11–14.

[15] 例如见 Andrew G. Walder.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 有关毛时代的劳动行动，例如见 Jackie Sheehan.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Joel Andreas.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连续性，见 Robert Cliver. 2020. *Red Silk: Class, Gender, and Revolution in China’s Yangzi Delta Silk Indus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 有关中国的罢工权，见 Fang Lee Cooke and Chang Kai. 2015. ‘Legislating the Right to Strike in Chi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7, no. 3: 440–55.

来实现自我认同和自我赋权，而共产党则在代表权的核心位置上留下了一道恒久的裂口。无产阶级这个无定形的范畴就像圣灵一样，将党（圣父）和工人阶级（圣子）融合在一起，形成圣三一。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既解释了工人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民主的形式发起叛乱，也解释了共产党对后来如何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脱去无产阶级的外衣。

由于无产阶级不是经验性的给定，因此无产阶级是在审美的表征被赋予了肉体，他们手握工具，沉浸在建设未来的艰辛劳动中。文化生产和审美教育是工人将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因此，工人又一次在无产阶级的审美光辉中被加倍，这既放大同时也缩小了她的力量。尽管这种无产阶级的梦想世界现已成为废弃的工厂墙壁上褪色的标语，作为资本主义的符号出售，或者被学术界冷静的目光所研究，但它们幽灵般的存在继续萦绕着现时代的想象中。

这些构成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双重因素与根本悖论，它们偶尔会在危机时期的政治辩论中爆发（如 1951 年、1956 年和 1966 年）。[18]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着谁能被接纳成为无产阶级、谁又会被视为敌人。解放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在新社会中化为一种身份认同，被铭刻在个人资料或档案里，进而得到了赋形。[19]尽管档案和户籍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组织和工作中起着分层的作用，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对将政治还原为社会学的做法感到不安和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可以弥补他的阶级背景。[20]

正如安舟（Joel Andreas）所指出的，中国的试验在几个方面与 20 世纪共产主义的所有变种中脱颖而出。[21]首先，在工作单位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设

[18] 见本书中 1957 年陈锋的文章，1967 年蓝梦琳（Patricia M. THORNTON）的文章，1951 年李立三谈《行政与工会的关系》，1957 年赖若愚谈《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19] 关于档案，见 Michael Dutton. 2004. 'Mango Mao: Infections of the Sacred.' *Public Culture* 16, no. 2: 161–88; Jie Yang. 2011. 'The Politics of the Dang'an: Spectralization, Spatialization, and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4, no. 2: 507–33; Jie Li. 2020. *Utopian Ruins: A Memorial Museum of the Mao Er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 1.

[20] Timothy Cheek. 2016. 'Attitudes in Action: Maoism as Emotional Political Theory.' In *Chinese Thought as Global Theory: Diversify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dited by Leigh Jenco. Albany: SUNY Press, 75–100.

[21]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8–9.

法将就业变得相对永久（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承诺给工人“铁饭碗”的终身就业岗位。[22]其次，由于工作单位制度的中心地位，工作场所成为工人参与的场所，尽管工人缺乏自主权，却培养了工业公民权与主动参与的有力规范。最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项激进的社会平准计划，毛泽东甚至不时地将这些平等的理想扩大到包括党干部的政治权力和特权上。[23]

值得称道的是，在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的某些时刻，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政治项目，也在试图打破将工人限制在工厂职能中的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与壁垒。工人们被鼓励阅读、演讲、哲学思考、参与政治、写诗、绘画，并发展他们作为人的能力，这也是毛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如此鼓舞人心的原因之一。[24]虽然这些试验中多是偶发且短暂的，但它们应当被认为是中国有意义的尝试，即在事物的秩序中“创造一种断裂……毕竟，在传统的划分中，一些人占有思想的特权，而将生产的任务分配给另一些人”。[25]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劳工的核心悖论之一，就是国家在发展主义与政治诉求之间左右为难，共产党既要将工人绑在自己的位置上，却又要让他们自由。

中国无产阶级的死亡

尽管毛泽东时代的工作场所绝不是天堂，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的言辞与工人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终身就业铁饭碗的破灭，国有与集体产业中数以百万的工人被下岗，一波又一波来自农村的移民来到了城市，他们除了在恶劣的血汗工厂工作之外别无选择。虽然共产党也试图通过颁布详细的劳动法规来控制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但新形式的不稳定劳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带来多种多样刺激剥削的动力。

从话语上来看，毛泽东思想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计划被耗尽之后，社会学（与去政治化的）对阶级的理解被定义为“阶层性的”阶级，这种理解已经成

---

[22] Kevin Lin. 2019. ‘Work Unit.’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Canberra and London: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331–34.

[23] Christian Sorace. 2020. ‘Metrics of Exceptionality, Simulated Intimacy.’ *Critical Inquiry* 46: 555–77.

[24] 见本书中 1968 年安德烈娅 · 皮亚扎罗利 · 隆戈巴尔迪的文章。

[25] Rancière,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219.

为分析中国内外的霸权性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学范畴层出不穷，如“弱势群体、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蚁族”，以及其他众多的分类。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阶级对立”是通过分裂来构建社会，但这一概念在“小康社会”中已成为一种失真的模糊。[26]同样地，工人阶级作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这一话语，也被植根于一套系统性破坏集体权利的劳动法中不痛不痒的个人权利语言所取代。[27]学者将这种对法律的重新强调解释为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其对劳工政治的霸权，并重新定义工作意义的一种手段。[28]正如开头佳士运动的事例以及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所示的那般，中国的工人与知识分子试图将无产阶级的肉身作为一个政治主体重新唤起，这一行为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打压。[29]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坚称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合法主张，这仍在党章总纲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如亚历山德罗 · 鲁索（Alessandro Russo）所述，这是“一段具有明确组织性的断言——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因而不能容忍薪资奴隶的独立政治组织。‘无产阶级’这一范畴是政府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政治价值已被剔除。”[30]然而，这种霸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工人不惧国家镇压的风险，继续举行罢工和抗议，而有争议的公民社会敢于帮助工人提出诉求，超越改革开放时期党-国（Party-State）的法律框架所允许的狭窄界限，至少这是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习近平镇压劳工非政府组织之前的情况。[31]

---

[26] 有关失真图像（anamorphosis），见 Slavoj Žižek. 1992.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7] Feng Chen. 2007.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Labor’s Predicament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0, no. 1: 59–79.

[28] Elaine Sio-Ieng Hui. 2017. *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The State, Laws,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On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the law by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see also Mary Gallagher. 2017. *Authoritarian Legality in China: Law, Worker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关于这个问题，另见 Ivan Franceschini and Christian Sorace. 2019. ‘In the Name of the Working Class: Narratives of Labour Activ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Affairs* 92, no. 4: 643–64.

[30] Alessandro Russo. 2019. ‘Class Struggle.’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29–35, at p. 34.

[31] 见本书中 1995 年郝秋笛的文章，2015 年柯蕾与伊万·弗兰切斯基尼的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赋予其生命的党已将其摒弃，那么在今日谈论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有意义吗？我们认为，至少作为一种政治愿景而言仍有意义。后社会主义的常识便是将“无产阶级”视作政治的弗兰肯斯坦，以畸形扭曲的身躯遮蔽实际的工人的生活。在如今这个实证主义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后意识形态与去政治化的时代，人们急于摆脱“无身体的文字那致命的重量，摆脱那些被称为人民、无产阶级、平等或阶级斗争的幻影”，[32]急于在空想中寻找那“如期所是的现实”（*reality*），追寻剪断革命幻想的普通工人。这种言论的问题在于，“普通工人”如“无产阶级”般，无法脱离规定其概念与再现的认识论框架而存在。朗西埃是一位有助于我们理解再现之危险与悖论的向导。他并不是批判社会主义者在宣传的扭曲镜像中以“真正的”工人阶级现实的名义来赞美劳工，而是为了彻底解构表征和现实的二元对立：“我们不打算刮破图像以使真理浮出水面；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推到一边，以便其他形象可以聚集和分解。”[33]继朗西埃之后，本书的目标之一便是展现多样性的劳动形象，它们的“样态”仍是开放的、可争议的、持续性的。因而今日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我们，仍然需要讨论无产阶级。

中国与处于晚期资本主义之下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无产阶级化的无情过程——大量的人的生存依赖于日益枯竭的资本，而无产者被应许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并未作为政治主体到来。[34]即使没有无产阶级，这个世界也是无产阶级的。我们决定将本书命名为 *Proletariat China*，首先是因为我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核心见解之一，资本主义的一处主要矛盾——工人被剥夺了他们所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世界。我们特别选用了“无产者”（Proletarian）一词，这个词占据了形容词、名词和主语之间的模糊位置，而政治世界的构成与分解就发生在此。

在接受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政治愿景在今日仍有价值这一事实的同时，必须承认，在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无产阶级已经死亡。与党分离后，无产阶级再次变得无形，回归其幽灵般的地位。它在中国或全球是否还会再现，这是一

---

[32] Rancière,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224.

[33] Jacques Rancière (translated by John Drury). 2012. *Proletarian Nights: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Verso Books, 10.

译文引用自非 0 的译文，在线链接：zhuanlan.zhihu.com/p/582971358。——译者注。

[34]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个政治构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新躯身装饰着五千年文明进步的服装，并在过往数十年间的资本主义积累中金光闪闪。今日，中国共产党赋形无产阶级之实践的遗物，只剩下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黧黑的防腐尸体，但那也可能只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一座蜡像。[35]正如亚历山德罗·鲁索所述："如果反对工人政治存在的主要障碍源自官方口径中被奉为圭臬的已僵化的工人阶级，那么除非有意识的明确努力来阻止这种幻想，否则任何政治上的新事物都不可能诞生。"[36]即使在政治上被废黜并使其僵化后，无产阶级的幽灵仍困扰着工人阶级。

种下乌托邦之梦

经历了如此多的失望之后，似乎很难避免虚无主义的目光——任何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尝试似乎注定都将失败。正如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述："历史的世界不过是热情的坟墓"。[37]在今日回望过去乌托邦的残余，便会产生一种怪异之感，那个理想世界的废墟似乎在被我们注视，也注视着我们。正如已故的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所指出的那般，凝视废墟开启了一系列关于能动性的问题：今日已成为废墟的东西，是谁建造的？又是谁曾居住其中？发生了什么才导致遗迹存在？[38]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不相称的世界相互叠加。大跃进时期，人们为付出牺牲，艰辛劳动，只为一个"物质丰富的乌托邦，结果却被证明是致命的幻觉"；[39]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的劳动被"无产阶级政权的乌托邦"赋予意义；[40]放弃毛泽东的乌托邦以后，劳动者开始追逐财富与现代化的实用主义乌托邦。而在习近平时代，在追求私人天堂的同时，中国人的劳动被纳入民族复兴与世界舞台之荣耀的乌托邦中——人们的个体利益被卷入

---

[35] 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尸体的保存分析，见 Alexei Yurchak. 2015. 'Bodies of Lenin: The Hidden Science of Communist Sovereignty.' *Representations* 129, no. 1: 116–57.

[36] Russo, 'Class Struggle', 35.

[37] Peter Sloterdijk (translated by Sandra Berjan). 2020. *Infinite Mobiliz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60.

[38] Mark Fisher. 2016. *The Weird and the Eerie*. London: Repeater Books, 11.

[39] Li, *Utopian Ruins*, 156.

[40] Ibid.

其间，却又不能完全还原为他们时代的意识形态。[41]这甚至没有触及到工人在私人幻想中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所附加的乌托邦幻想。从过去的大众乌托邦中，中国的乌托邦已被去集体化、逐渐个体化，然后重新纳入国家政治体的荣耀之中。正如作家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ville）所述："我们生活在乌托邦中：只是它不属于我们。"[42]

关于本书

在试图找回乌托邦破碎承诺的碎片的过程中，本书建立在我们先前的编辑工作之上，即 2019 年由 Verso 和 ANU Press 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的余生》（*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试图通过多篇关注中国共产党政治词汇中的关键词与概念的文章，重新审视中国共产主义复杂与有争议的遗产，而本书则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在这里，每一篇都与一件特定事件相联系，因此从整体上看，本书的结构是 20 世纪初到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时间线，这并不意味着构建，而是要打破历史发展的目的论概念。

被选入这条时间线的一些事件可以被视作现代中国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例如，1922 年的安源罢工、1927 年的上海起义与紧随的屠杀、1967 年的一月风暴、1989 年的工人抗议等等，但大多数事件都是史书上少有笔墨的事件与状况。这包括 1898 年扬子江上的一次乘船旅行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被遗忘的米贴罢工；从 1941 年战时重庆的一份共产主义宣传报纸的关停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批工人大学的建立；从 70 年代末在法律上将性工作定为犯罪到 1993 年一场导致数十名工人死亡的火灾悲剧；从 21 世纪初的黑砖窑奴工到未来的无工人自动化前景。地理的多样性为本书加上了一层复杂性，因为这些文章涉及到大中华区的不同地点，包括香港与台湾，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一战的欧洲战壕，

[41] 有关新兴的私人乌托邦，见 Zhang Li. 2010.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iwei Ci. 1994.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2] 'A Strategy for Ruinatio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 Miéville.' *Boston Review*, 8 January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conversations.e-flux.com/t/china-mieville-we-live-in-a-utopia-it-just-isn-t-ours/7537.

乃至蒙古和坦桑尼亚。[43]最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书中，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年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远不是这个拥挤舞台上唯一的演员。

这种风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片段性，我们试图在每一篇文章前提供简短的背景介绍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种片段性实则也是有意为之。如前所述，本书并不试图构建另一个关于中国劳工史的宏大叙事，追踪中国工人阶级的所谓兴衰，并预测未来发展。本书并不声称要对中国劳工史提供一个全面的概述，而是由关于“什么构成了上世纪中国劳动经验”的不同声音、观点与解释组成。本书的每一篇都是对无产阶级存在的一种记录。

与本书与先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的余生》一样，植根于我们开放获取（OA）的期刊《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工作。《中国制造》的精神根植于开放性。我们相信有必要超越学术界的封闭，接触普通读者，这便需要开放存取与知识的民主化。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普通读者，因而在 Verso Books 销售的同时，也可在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正如我们在《余生》的导言中指出的那样，这也是我们跳出传统学术出版局限的思考方式，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想象出超越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政治可能性。

最后，或许有人会问，我们作为本书的编辑，追求的是怎样的乌托邦？我们的愿景便是重新点燃对克服劳动异化、民主地掌控关乎我们生活的经济决策的民主控制这一计划的热情。通过研究在中国史上的不同时期，是什么促使工人通过政治行动、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团结，拒绝既定的东西、以及为了那些未实现的目标而发起反抗，从而改变他们境遇的狭窄可能，我们希望重振那些促使他们前进的理想。

于堪培拉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2021 年 2 月 13 日

[43]本书将台湾纳入其中，并不应当解读为编者对两岸政治的表态。

1898

我们的旅程始于长江之畔，19 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主义想象中的他者通过江上纤夫的形象与中国相遇，他们的所谓“无怨无悔、吃苦耐劳”被解释为中国停滞现状与辉煌未来的标志。基于种族化的类型学，西方观察家将江上纤夫描述为“不似人”——既是动物又是机械的生物。即使是纤夫的歌声也被识别为“巨大的噪音”，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对人与动物的区分，“这种言说被理解为话语，而另一种则是噪音”。朗西埃将其视为治安的逻辑，它将殖民的、种族化的并以阶级为基的人性概念包裹其中。[1]异国的眼睛和耳朵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纤夫，就像其他“苦力”一样，他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使“牛马”在身体与经济上的脆弱性。他们被当作“牛马”对待时的抱怨，以及呼吁将工人当作人对待的诉求，将在中国未来岁月的抗争中相互共鸣。[2]这种语言最终会成为共产党早期关于劳工论述的主要内容。正如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共产党组织者李立三在安源为矿工和铁路工人发出的振奋人心的号召一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见本书中裴宜理的文章）。

---

[1] Jacques Rancière (translated by Julie Rose). 1998.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9.

[2] S.A. Smith.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廉价的工作机器”

科里·伯恩斯（Corey BYRNES）[1]

> “所有的劳动，例如在中国河流的湍急水流中为船只拉纤……都是通过超负荷的人工劳动完成的，因此，大多数人比牲畜好不了多少，他们温顺到了一定程度，与牲畜相比，他们只是多了几个需求，而他们的特点就是能够成为更廉价的工作机器。”
>
> ——阿奇博尔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1910 年[2]

1898 年 3 月 9 日上午，阿奇博尔德·立德（后以“立德乐”称呼）乘 50 英尺长、柚木船身、双螺旋桨、由上海建造的蒸汽船“利川”号溯流而上，“凯旋式地”驶入重庆港。险峻的长江峡谷将湖北的水乡平原与富饶的天府之国四川分割开来，这是第一艘穿越它的蒸汽船。[3]通过“证明长江上游通航的可能性，并引起人们对其必要性的关注”，立德乐和他的利川号帮助解开了将旅行与贸易的广泛季节性波动以及数千年来界定河上生活的劳动与技术形式的联系。[4]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驻上海的商人立德乐就在积极游说推动长江上蒸汽船的试航，对他来说，定期的蒸汽航行不仅为像他这样的商人带来了财富，而且还解放了“目前可怜的纤夫，（他们）将逐渐获得从事更高报酬工作的自由”。[5]

---

[1] 本章选自作者的著作 *Fixing Landscape: A Techno-Poetic History of China’s Three Gorge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Archibald Little. 1910. *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42.

[3] Ibid., 139.

[4] Archibald Little. 1898.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Or,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3rd edn.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299.

[5] Ibid., 300.

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西方作家开始将长江三峡重新定义为经验上与科学上可知的景观，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江面上拉船的纤夫是令人着迷的形象。[6]纤夫的工作无比艰辛，他们在外国人眼中既是“亚人”又像是“超人”。虽然中国水手早已掌握在长江上航行的方法，但是面对峡谷的许多地方，船只必须被拉过去，大型激流、漩涡与暗礁造成了艰巨障碍。通常每艘船都有自己的纤夫队伍，但他们通常使用包括大量男女的季节性劳工来补充，他们在冬季难以通行的地方建立临时据点，例如新滩。[7]货物通常会在那里或其他激流处转运，大船有时需要 300 名以上的纤夫（一位旅行者称他们为“激流中的苦力”）来拉过险峻的障碍。[8]在最好的情况下，纤夫能够沿着河边修建的牵道前进，其中一些牵道只不过是嵌在峭壁边上狭窄、低矮的凹槽。更多的时候，他们要爬过巨大的石块与险峻的岸边，涉过冰冷的水域（冬季水位最低的时候，逆流而上是最容易的），或者跳入河中，解开把他们拴在船上的粗大的竹制吊索。在拉纤过程中摔倒的人往往被水流拖走，直到他们能够设法脱身，在中途落水几乎意味着必死无疑。纤夫赤身裸体或者只穿一件薄外套工作，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无法抵御外界环境或工作中的危险：他们劳动的艰辛已经刻在了他们的身体之上。

古老的方法

19 世纪末，纤夫赤裸的身体和“古老的方法”，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既代表了中国人所谓吃苦耐劳的特征，也代表了民族被锁在永恒过去的“想象力的缺乏”。[9]由于未能引进机械设备使得拉纤工作理性化，使其摆脱一种在疯狂中无尽重复的悲喜剧仪式。对于第二代泽特兰侯爵劳伦斯 · 约翰 · 拉姆利 · 邓达斯（Lawrence John Lumley Dundas）来说，拉纤不过是地缘政治的一段荒谬的寓言：

---

[6] 中国有许多词汇来描述“trackers”，包括水手、曳手、船夫和纤夫．后两者在对三峡的描述中尤为常见。

[7] Igor Iwo Chabrowski. 2015. *Singing on the River: Sichuan Boatmen and Their Work Songs, 1880s–1930s*. Boston: Brill, 92.

[8] Edward Parker. 1891. *Up the Yang-tse*.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9.

[9] Lawrence John Lumley Dundas. 1908. *A Wandering Student in the Far East*.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70, 71.

> “我很自然地想到，在中国人与长江航运纠缠的两三千年中，他们竟然没有发展出像绞盘这样简单的机械装置，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用最原始的手摇绞盘，几个人就可以在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工作，而且能比十几个荒诞的疯子（指纤夫）还要做得更好，花费的人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很难找到一个更突出的例子，说明中国人完全缺乏想象力，在目前这个人类进步的高级阶段，中国注定要在大国竞争中永远处于次要地位。[10]

如果没有超越人体生理极限所需的想象力的火花，或者没有采用外国新事物的意愿，中国人就注定要进行一场没有进步的重复挣扎。邓达斯将进步等同于节省劳力的设备，而将中国人身体的“荒诞”运动视作停滞，这表明在峡谷航行中，劳动、技术和种族的互动如何通过流行的民族差异概念的滤镜进行过滤。许多西方人对纤夫的描述中，艰苦的劳动和极低收益的观念，不仅唤起了中国历史上“并非不自然的”停滞的观念，而且还唤起了一种被称为“中国”式的复杂劳动概念。

19 世纪末，“苦力”这一形象被认为具有一种“生物性”特征，能够忍受“低水平的持续痛苦”，只依靠少量大米饮食（和鸦片）进行长时间的艰苦工作。[11]这种特质使苦力比吃肉的白人（在经济与生理上）更适合成为一台被工业化运作与劳动蹂躏的“机器”，白人的地位受到威胁。[12]在这种“黄祸”言论的表面下，潜藏着更大的威胁——熟悉的劳动形式将（或已）被跨国的和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所取代，这种形式以及将其带来之人的出现破坏了韩瑞（Eric Hayot）所描述的“‘人性’本身的尺度”（‘the measure of “humanity” itself’）。[13]

19 世纪末，“‘人性’的尺度”被置于怀疑之中，这似乎显得非常可怕。世界被测量、绘制，以科学的方式重新定义，人体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测量与分类。十九世纪中期热力学第一定律（封闭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的提出，法国与德国的科学家开始将“自然视为一台巨大的机器，能够产生机械动力……

---

[10] Ibid., 71.

[11] Eric Hayot. 2009. *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Sympathy, Modernity, and Chinese Pai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1.

[12] Ibid.

[13] Ibid., 168.

或者说‘劳动力’”。[14]效法他们的生理学家将身体视为“人类的马达”，根据在自然中发现的相同原理运作。如果自然所包含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人体也可能如此，只需要进行适当的管理。摆脱了早期的宗教与道德框架，人体进入了科学测量、理性化与系统化的领域，有望释放其自然的运作力，进而打开社会进步（即提高生产）的大门。[15]

正如本文的引语中所描述的那样，“比牲畜更廉价的机器”——作为中国人忍耐力的典范，纤夫似乎向欧洲生产主义理论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他们的“劳动力”与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脱节。外国访客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自然力量的传递未能推动社会的进步。长江沿岸的人力机器和自然机器在许多方面都优于西方的机器，但它们的社会表现形式却严重失调。因此，“能量”被浪费在维护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上，被中国历史的真空所吸收。其次，虽然纤夫只靠微薄的饮食就能从事艰苦的工作，似乎实现了无疲惫劳动的梦想，但他们并不是通过科学理性化实现这个理想，而是通过某种特定且具有威胁的种族特征。正是纤夫的中国性，使其能够以不同于欧美人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而且还具有非人性、动物性与潜在的超人特质。

“神经麻木”

人们试图明确界定种族和民族品质的想法，是在十九世纪通过主流科学思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伪科学——颅相学、面相学、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起来的。在广泛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中，非欧洲人的身体被置于生理学与人种学的测量方法之下，这种方法通常将他人定义为有缺陷的、退化的或原始的，从而使种族差异自然化。[16]流行的种族理论甚至被用来区分不同“类型”

---

[14] Anson Rabinbach. 1990. *The Human Motor: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46.

[15] Ibid., 2.

[16] 更多关于种族、生理、伪进化论思想在中国，见 Yuehtsen Juliette Chung. 2002.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 New York, NY: Routledge; Frank Dikötter. 2015.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2nd edn. London: Hurst; Andrew Jones. 2011.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见下页）

的中国人。立德乐提到他船上的领头和他的弟兄——属于是他“见过的四川（四条大川）省的第一流标本”，他们都是“高大、皮肤白皙，长颅骨（dolicocephalic）的”，这是个测颅学、颅相学与优生学中用来描述和北欧人有关的瘦长头型的术语。[17]在欧洲对中国人的描述中，这类种族类型学主要是基于轶事（旅行者和传教士的口头相传、传播的图片以及新闻与学术作品），而不是直接的“科学”测量。到了二十世纪初，这种类型学已经发展成为关于身体种族化与民族“类型”话语的一部分，与人类生产力的普遍科学理论不同。[18]理想的身体仍可能是人类的马达，但马达的品牌和型号与国家和种族的数量一样多。

有关中国人差异性的著名阐述是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国人的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该书于 1890 年出版，提供了中国民族性格的分类法，此后多次重印，共 27 章。刘禾将明恩溥的风格称之为“真理的语法”（grammar of truth）——依赖于“语言所包含的权力……作者透过修辞和比喻将他人矮化成非人的动物”。[19]他在“神经麻木”（Absence of Nerves）一章的开头，将神经紧张描述为“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影响，这种状况“包括我们所有的读者”。[20]中国“神经麻木”正是相对于“现代”国家中无处不在的神经衰弱而提出的。然而，正如他所指出的，这种差异不太可能是生理性的：

> “很少有人剖开死掉的中国人，尽管无疑会有人这么做，可我们并未听说过有任何理由表明‘黑发人种’的神经解剖学在与高加索人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但是，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的神经相比，可能像几何学家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James Pusey. 1983.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7] Little,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78.

立德乐将“四川”理解为“四条大川”系误解。——译者注。

[18] Hayot, *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145.

[19] Lydia Liu.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7.

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第 70 页。——译者注。

[20] Arthur H. Smith. 2002.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walk, UK: EastBridge, 90.

国内虽有译版，但删减颇多，文中引用段落多由译者自译。——译者注。

> 所说的那样，处于‘相似且相近的位置’，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神经是一种与我们相似却完全不同的类型。”[21]

通过在想象中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令人感到残忍的解剖，明恩溥重复了构成他整部作品的辩证法：尽管属于（在这里被现代医学的几何学定义为）同种的人类，但中国人仍然有着显著的差异。皮肤下的神经无法寻找到差异的明证，于是明恩溥通过界定中国人特征的目录，明确了它的存在：能够长时间“待在同一处”，不需要（体育）运动，能够“睡在任何地方”，能在没有通风的情况下呼吸，忍受拥挤与“身体疼痛”。在每个案例中，“摆脱神经的束缚”都是中国性的经验证据，也是对中国人有朝一日可能对“白种人”构成威胁的提醒。[22]明恩溥的差异目录将中国人视为他者与威胁，特别是在想象一个现代化中国的未来时：“我们已经开始相信，至少在通常情况下，最适者生存。在二十世纪的斗争中，是‘神经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无孔不入、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更适合生存？”[23]

明恩溥只在“知足常乐”（Content and Cheerfulness）一章中提到了“纤夫”，该章讲述了中国人“能够最大限度地让自己保持快乐……他们十分‘乐观’”，以及一种使得中国人完全满足于“他们所生活的制度”的“保守主义”形式。[24]他将纤夫描述为“进行着最艰辛的劳动的一群人……不仅不会抱怨世界的商品分配不均，而且当他们有机会休息时，都以精神饱满的状态休息”。[25]作为最极端也是最典型的劳动者，他们证明了明恩溥等人不遗余力地建构有关中国人在工业与耐力上的普遍规律，而知足常乐只是其附属特征。但是，这种对严酷条件的适应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威胁，明恩溥提醒他的读者：“我们重申，如果 ‘适者生存’的历史教导是可信的，那么中国民族一定有着宏伟的未来。”[26]因此纤夫这种以苦难作欢乐，将生物性视为命定的人，必将进入未来。

---

[21] Ibid., 92.

[22] Ibid., 94.

[23] Ibid., 97. See also Hayot, *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ch. 1.

[24]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62–63.

[25] Ibid., 168.

[26] Ibid., 170.

“身如牛马”

事实上，纤夫与其他船工十分清楚自己在身体与经济上的脆弱性。在西方作家眼中的“知足常乐”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了一种悲惨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正是通过船工口头的“号子”去表达，而大多数西方旅行者都无法理解他们的语言。正如许多旅行者所指出的，这些或被称作歌曲的歌唱属于长江声音景观的一部分，尽管它们通常被描述为“巨大的噪音”，足以淹没“急流的咆哮”，或是损伤人们的听力。[27]最为常见的号子包括着呼喊和回应的结构，为拉纤工作的节奏提供了清晰而灵活的系统，还有些号子则构成了对应地区的“思维地图”，或表达了一种浪漫的憧憬。[28]也有着抱怨工资微薄，老板、掮客苛待以及艰辛劳动的歌曲。与那些被他们的劳动所震撼的西方人不同，船工常将自己比作动物：

> 日子不如牛和马
> 船工终年如马牛
> 我们船工的生活真悲惨
> 风里来雨里去牛马一般 [29]

与西方作家（他们的动物比喻建立在对中国原始性的种族主义概念之上）不同的是，船夫如此形容自己，不仅是为了强调拉纤的艰辛，也是通过他们的贫困建立并维持他们适当的社交关系，特别是婚姻。[30]正如左翼文学将人力车夫作为城市工人的象征，长江船夫的号子突出了拉纤工作的兽性，从而重新确证纤夫的人性。[31]

---

[27] Little,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158; Chabrowski, *Singing on the River*, 106–7.

[28] Chabrowski, *Singing on the River*, 137.

[29] 这些歌词出自三首号子：《老板打来老板骂》《一年四季滩上爬》《我们船工的生活真悲惨》——均载于聶雲嵐主编：《中国歌谣集成・重庆市卷》，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 年，第 24 页；引用自 Chabrowski, *Singing on the River*, 176, 182, 183。

[30] Chabrowski, *Singing on the River*, 180–84.

[31] David Strand. 1993.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Chabrowski, *Singing on the River*, 264. 号子在民国时期成为劳动阶级民间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号子被认（见下页）

崩坏的秩序

“无处不在……的中国人”中，纤夫便是其中一个极端案例，既被排除在现代性之外，又被认为具有经受现代性冲击的超人/亚人才能，因而，他们为西方的优越感与对现代性的紧张焦虑提供了一个将分裂结合的场域。如果说热力学第一定律使得劳动力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可能，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认为，封闭系统的熵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衰退、分解和耗竭的必然性”。[32]根据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的说法：

> “19 世纪现代性革命的核心便是能量与熵之间的悖论关系：一侧是稳定的生产主义宇宙，具有原初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另一侧是不可抗拒的衰退、变质的系统……工作、生产、性能的强大而又多变的世界，与疲劳、耗竭、衰退的递减的秩序相对立。[33]

在工业化的欧美，现代性带来的疲劳、神经紧张与身体疾病威胁着削弱白人在与中国人的竞争中抢先获得的优势，而中国人的“神经麻木”则唤起了一种（持久的）角色翻转的幽灵。在西方现代性的悖论中，《中国人的德行》里的纤夫便是不可或缺的共谋，即证明了西方的进步，也预示着西方的衰落。

在明恩溥的叙述中，作为苦力的纤夫既预示着中国的未来，也象征着中国的过去，纤夫体现了永恒的种族本质——进步的目的（Telos）可以被停滞的东方轻易供满能量，或是挫败。这并非讽刺。经过几十年剖析东方主义话语的学术研究，我们很容易就能意识到这种背反是推动殖民主义权力结构并维持其当代表现的差异引擎。正如“中国景观”可以指向一个永恒的奇迹之地，也可以是一个经过科学测绘的区域，纤夫体现了这种矛盾的中国性概念。在明恩溥书中修辞模板的塑造下，纤夫和苦力保持原始性的同时，也正准备着统治未来。然而，明恩溥关于纤夫的二手描述却缺少了大多数一手描述中，对于纤夫艰辛劳动的恐惧以及对他们苦难的同情。如果说不断发展的“劳动力”概念使得观察者将纤夫与苦力同其他民族和种族的劳动者相提并论，那么一种更古老、更

为可以通过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内容重新编码为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时期，号子则被重新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Chabrowski, *Singing on the River*, 19, 25–26.

[32] Rabinbach, *The Human Motor*, 4.

[33] Ibid., 63.

强大的同情话语则鼓励他们将纤夫视为共同人性的一部分，即使他们将纤夫描述为一种“不似人的动物”。

1902

清帝国晚期，中国新生的工人阶级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首要的便是上海。在 19 世纪末，上海的雇佣劳动者主要分为两类：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后者被视为“流动人口”，通常与乞丐、流氓联系在一起。[1]随着棉纺厂、丝织厂、烟草厂与其他制造厂的开办，在世纪之交中情况迅速改变，到 1911 年，上海的现代化产业雇用了近 10 万名工人。[2]妇女和儿童——多由工头在家乡招募到工厂工作——构成了蓬勃发展的工厂中劳动力的大多数，他们遭受着可怕的剥削。包身制带来了最极端的劳动条件，父母签订合同，同意在合同期内（通常是三年）将女儿的工资交给承包商，以换取一小笔钱，而承包商则向工人提供衣食起居，从而建立全面的人身控制。[3]三种的原始劳工组织主导了社会景观：行会、帮口与秘密结社。[4]行会是由从事特定手艺或贸易的人组织起来的等级团体；通常在内部分为工人和雇主，试图通过定价来调节市场，也承担着收税、组织公共工程与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帮口则是由工人组成的团体，通常来自同一地区，垄断了某个特定行业。这导致了工人阶级之间的明显分裂——雇主则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情况。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一些人开始幻想未来，机器将取代人力劳动，从而使得工人得到解放。

---

[1] S.A. Smith.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7.

[2] Ibid.

[3] S.A. Smith. 2008.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30.相关制度见 Emily Honig. 1983. ‘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Women Workers: Pre-Liberation Cotton Mills of Shanghai.’ *Modern China* 9, no. 4: 421–54.

[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收录于《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30）年，第 424 页。

旧中国未来幻想中的技术乌托邦与机器人

史峻（Craig A. SMITH）

早在刘慈欣的小说成为中国内外的科幻畅销书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幻想着一个机器人劳动力解放人类劳动需求的乌托邦。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中关于机器人解放人类劳动者的乌托邦式希望适应了世界各地的特殊情况。中国的文人精英总能够调整儒家思想以适应新的认识论问题，甚至机器人也在重新设计的儒家乌托邦中拥有一席之地。本文将探讨晚清有关机器人的话语，展现中国早期的技术乌托邦中关于劳动解放的重要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人们对乌托邦的恐惧与愿景，在今日仍有参考价值。康有为的巨著《大同书》（1902 年首次编订出完整的草稿）的书写与有限的传播为本文提供了时间上的标志。

世纪末的劳动技术

世纪之交是现代中国多波工业化浪潮中的一次高峰。1895 年，清政府正式对外开放国门，允许资本投资与外国工厂涌入通商口岸。此前，日本的工业化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日本工厂大规模生产的纺织品使得中国棉花的价格上涨，促使晚清时期的纺纱利润率下降。[1]随着传统劳动力市场与地区手工业被迫适应，这些变化也在人口中产生了连锁反应。机械的大规模进口与对这些新工具影响的广泛好奇，在蓬勃发展的印刷业中尤为明显——印刷业通过新兴印刷技术发生彻底的变革，这些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超出了传统精英阶层的范围。

19 世纪末，中国的报纸充斥着关于机器的文章。新闻上报道了从拖拉机到打字机的最新发明。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在鼓励这种对工业化的兴趣方面

---

[1] 尽管非法的外资工厂在 1895 年前并不少见，但合法的开放带来了广泛的变化。见 Albert Feuerwerker. 1980. ‘Economic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Empire, 1870–191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 at 21 and 29.

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894 年，著名的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中文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机器之益》的文章，其中他通过经济和生产力的提高来解释英国的经济成功。[2]这种论述，以及入侵中国的商人与军队在物质上明显的优势，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将政治变革、工业化与技术改进联系起来。

1897 年和 1898 年，正值中国政治改革“百日维新”的高潮期间，《集成报》《湘报》《农学报》等改革派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机器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多是翻译自外国报刊，但也有相当数量是由在地的作者撰写而来，重点关注与中国的劳动、市场有关的机器，特别是关于大米、茶叶的生产。

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时期。1894—1895 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改革派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学活动的迸发。然而，正如他们的政治理想主义伴随着对中国未来的忧虑一样，他们对工业化的兴趣也伴随着对机器潜在弊端的担忧。1897 年上海《新闻报》一篇题为《机器盛行》（与电影《终结者》的英语名同名）的文章中，作者激动地讨论了将在杭州武林门码头使用的新机器。[3]作者解释道，这一趋势是在效仿西方的现有做法，但他承认，劳动成本的降低将导致收入的减少，“有人担心将激怒工人”。

这种文章，包括有关工人、儿童被机器伤害的报道，都表现出了对机器的戒心，并且十分关注劳工问题。但精英阶层认识到，技术进步是救国的必要手段。民族主义者将一个科技昌盛的中国想象成他们的救赎——直接地反映在通俗小说中，而这些小说已成为越来越多识字人口前进的动力。在“机器人”（robot）一词发明出来的几十年前，机械人（mechanical humanoids）就已在想象中的技术乌托邦内扮演重要角色，这类文学体裁后来被称作“科幻小说”。

中国会梦见电子羊吗

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早已诞生了会动的或是机械的仆人和劳工的想法。公元前五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墨子甚至创造了机械的鸟兽，甚至有家科技公

---

[2] 艾约瑟：“论机器之益”，《万国公法》，1894 年，第 6—9 页。

[3] 《机器盛行》，新闻报，1897 年 4 月 12 日，第 2 页。

司便以他为名。然而，“机器人”（machine-man）的概念直到清朝末年才从精英文本中进入大众想象之中。

在世纪之交，全世界都对人形自动机（humanoid automatons）的想法和它们的劳动潜力充满兴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绿野仙踪》（1900年）中的铁皮人，一位渴望拥有心脏的忧郁赛博格。中国的小说紧随其后，引入了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劳动机器人。1905 年和 1906 年，《南方报》连载了吴趼人的长篇小说《新石头记》。虽然当时也有一些中国科幻作家写过自动机的故事，但吴趼人的小说却是一处仙境，情节随着十八世纪的小说《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展开，带领人们进入二十世纪的科技乌托邦。

通过一个叫作“文明镜”的技术装置，贾宝玉进入到这个乌托邦世界后，立即就被一个会说话的自动机“男仆”奉上茶。随后，旅程通过飞行器、潜水艇等各种先进技术展开。[4]吴趼人的小说引人入胜地探索了以技术保护中国传统与民族的愿望，当然这也被批评为技术民族中心主义，因为作者将技术作为确保中国占据现代世界优越地位的工具。[5]吴趼人把他的乌托邦放在了一个复兴的帝国政体中。这不是一个现代的技术官僚政体，而是一个由皇帝领导的名为“东方文明”的儒家帝国。这个技术乌托邦统治者的象征意义可能过于明显，它将中国的未来，置于它遥远的过去。而另一位更著名的知识分子决定深入中国的过去，在他的乌托邦中却找不到任何统治者，他就是康有为。

技术大同与儒家机器人

可能就是那段时间，康有为写下了《大同书》，这是在帝制中国与民国之交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乌托邦想象，也是理解现代中国劳工政治思想的关键文本。康有为描述的大同乌托邦最早出现于儒家经典《礼记》中，但由于康有为将这一概念与现代对劳动和资本的理解联系起来，“大同”随后成为中国革命和共产

---

[4] 吴趼人：《新石头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特别是第二十二回与第二十五回，线上链接：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新石頭記。

[5] Shaoling Ma. 2018. ‘Stone, Jade, Medium: A Neocybernetic New Story of the Stone (1905–1906).’ *Configurations* 26, no. 1: 1–26, at 8 and 11.

党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6]《大同书》在 1911 年革命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但在此之前，它并未出版，只有那些极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小圈子中流传。

尽管康有为在序言中说他在 1884 年写了这本书，他的弟子与有影响力的同道中很早就能接触到这本书，但前两卷直到 1913 年才出版。由于康有为不允许在他生前出版《大同书》，直到 1935 年，他死后的第八年，全书才正式出版，这也导致了对文本年代的争议与研究。[7]唐志军的大量研究表明，康有为很可能在 1902 年完成了他的手稿，这一发现得到了汪晖的证实，汪晖进一步认为，尽管康有为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分发了早期的草稿，但他在 1902 年就完成了与出版文本非常相似的草稿。[8]这表明，康有为和吴趼人之间没有彼此影响，而是在共同的语境中进行写作。

那个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新概念被同化到原有的概念和术语中，因而产生了一种调和的世界观。循着这一脉络，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与之同步的技术乌托邦。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康有为没有使用现代词汇“劳动”，这个词大约是在世纪之交中从日本的“労働”（ろうどう）传入汉语。[9]相反，他遵循长期以来的传统，根据职业将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商”在传统上被视为四民中最不重要的，但自宋朝以来，他们的地位已经显著提高。[10]虽然这些划分在康有为的乌托邦中找不到一席之地，但在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融合中，他坚持在通往大同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划分，直达最终，所有的等级和类别都将消弭，他所采用的“工”的范畴已经十分近似于劳动的概念。

为了解释大同对劳动者的好处，康有为转向了中国早期思想的基础文本，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未来愿景和到达未来所需的途径。在《礼记》几个简短章节

---

[6] Craig A. Smith. 2019. ‘*Datong* and *Xiaokang*.’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63–66.

[7]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二部》, 北京: 三联书店，第 753 页。

[8] 同上，第 755—760 页。

[9] 准确地说，汉语中已有“劳动”一词或词组，而现代汉语中作为政治经济学术语的词义“劳动=labor”源自日本的回流。《大同书》中的确出现了“劳动”一词或词组，在现代汉语的早期，“labor”也会用“劳力”指代（见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这一词在《大同书》中也有出现。——译者注。

[10] Timothy, Brook. 1998.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的基础上，康有为将这些思想放在民族国家和新式政治经济的现代背景中，设想了一个没有痛苦的未来世界。他认为机器人在他的儒家乌托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作为文人阶层一员的知识背景，也形塑了他对机器人将如何结束传统等级制度的理解:“大同之世无奴仆，一切以机器代之，以机器为鸟兽之形而为传递饮食之器”[11]

与威尔斯（H.G. Wells）1905 年的《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相同，康有为也是一位激进的动物保护者，并坚持认为未来将是严格的素食主义时代。然而，与威尔斯不同的是，他将猴子和鹦鹉等动物视为我们未来世界的仆人，但前提是限制驯兽、灵鸟之用，确保这些生物也能免受痛苦。[12]在他看来，“仁”的品质（通常被理解成“人道”）将延伸至所有的鸟兽。[13]而机械生物或自动机没有“仁”，因此他们不可能感到痛苦。

康有为根据古典的儒家循环史论定义了当前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工业化是当下“乱世”中工人苦难的根源。但通过工业化，他也看到了在人类实现大同的“太平之世”中将解放工人的机械。他认为，近年来，由于机器被用来生产，“工业之争”加剧，而确保机器的兴起不会加剧工人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资本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收回。[14]

康有为所设想的“太平之世无所苦，所为工者乐而已矣”，[15]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只需要将自己的技艺用于创造艺术品，繁重的工作全部交由机器人。与威尔斯一样，康有为认为技术进步将结束劳作，并为全民休闲打开大门:“私室则各有电话，传之公厨，即可飞递。或于食桌下为机，自厨输运至于桌中，穹窿忽上；安于桌面，则机复合；抚桌之机，即能开合运送去来。食堂四壁，皆置突画，人物如生，音乐交作则人物交舞，用以侑食。”[16]

---

[11] 康有为:《大同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译文见 K'ang Yu-wei (translated by Laurence G. Thompson). 1958. *Ta-T'ung Shu: 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 London: Allen & Unwin.所引段落的英语译文见 p.272。

根据原文提供的中文版本，见第 343 页。——译者注。

[12] K'ang, *Ta-T'ung Shu,* 41, 266, 267, 269.

[13]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二部》，第 749 页。

[14] K'ang, *Ta-T'ung Shu,* 213.

[15] 康有为:《大同书》，第 289 页。

[16] K'ang, *Ta-T'ung Shu,* 272–73.

这种对科学的解放潜力的高度信任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20 世纪的革命者，包括青年毛泽东，都从康有为的著作中得到启发。[17]然而，由于康有为对君主立宪制的推动，他现在被认为是保守的革命反对者。

回到原点：从技术乌托邦主义到科学乌托邦主义

尽管康有为痴迷于科学，详细地解释了科学发明与机器人技术如何减轻劳动者的痛苦，但他的社会主义通常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中文常称“空想社会主义”），但正如恩格斯 1880 年在其流行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那样，康有为的这种方式与科学乌托邦主义相比远远不足。[18]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基于历史辩证法的系统化的论证模型，而非中译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恩格斯的分类与中译术语中固有的轻视，限制了 1949 年后文本中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文学类型。然而，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机器人化，用工业机器人替代人类劳工（官方称“机器换人”），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文本。

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成为特斯拉和其他自动驾驶汽车的最大市场，以及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的投资领先于世界，必须要重新探讨关于机器人“大同”的讨论。在广东，省市两级的项目已为机器人化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省政府声称在 2017 年拥有 8 万个机器人单位。[19]黄瑜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媒体强调机器人化最终将创造就业机会，但许多劳工，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工，已因此而失去了工作。[20]同时，2016 年，中国的“十三五”规划要求，在 2021 年之前，大多数农业生产方式将基本实现机械化。[21]这表明对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农民的需求，可能会大规模减少。这些巨大的变化也许

---

[17] 毛泽东：《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5 页。

[18]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Edward Aveling). 1909.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Chicago, IL: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4–20.

[19] Hui Xu. 2020. ‘The End of Sweatshops? Robotisation and the Making of New Skilled Workers in China.’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1: 44–49.

[20] Yu Huang. 2018. ‘Robot Threat or Robot Dividend? A Struggle between Two Lines.’ *Made in China Journal* 3, no. 2: 50–55.

[21]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2016 年 3 月 17 日，在线链接：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6-03/17/content_38053101_2.htm。

在未来有很大的潜力，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对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新构想，它们将会导致中国工人遭受苦难与剥削。

当代解决劳动力市场危机的建议——例如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似乎与康有为的技术乌托邦社会主义中不谋而合，但这些概念尚未引起 21 世纪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只有结束劳动、农业、工业与商业的私有制，只有破除阶级、种族、性别、家庭和国家的界限，才能结束劳动者的苦难。鉴于这一点，这位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也许是中国的共产党人所追求未来的先驱。

191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生的中华民国仍在试图弄清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包括如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1915 年，即使中国正式参战的前景仍不明朗，但为了确保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袁世凯政府提出派遣华工前往欧洲援助协约国作战的想法。最终，14 万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民，前往西线协助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的作战。尽管在大战期间有许多其他国家派遣劳工前往法国，但中国派遣的劳工人数最多、也是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牺牲在历史的记载中常常被忽视。派遣劳工的做法也代表了中国政府首次尝试劳工外交，这种做法将在毛泽东时代变得更为普遍，今日，我们在中国的全球参与中仍可找到此种做法的痕迹。

非凡的旅程：一战西线的华工

徐国琦

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有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华工，也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华裔移民。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 万名成功奔赴西线的华工，却独一无二、令人称奇。他们的牺牲与贡献，不仅援助了协约国的作战，为颠覆西方文明的命运尽了一份力，而且还充当了中西之间的使者，为中国的复兴和伟大变革作出贡献。南非人、印度人、越南人等国的劳工也在大战期间前往法国，支援英法两国的作战。许多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国家的公民，必须响应帝国主子的号召，但中国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殖民地，却派出了最多的劳工，在欧洲工作的时间也是诸国中最长的。

“以工代兵”

一战恰逢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儒家文明的崩溃、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瓦解。如此国内外都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人民决心改造自己的国家，以平等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一战的爆发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14 年中国人为了收复山东省的德占领土——青岛，试图加入大战，但却被英国阻挠。然而，中国参战的决心在第二年得到加强，当时的日本提出了旨在将中国变成附属国的“二十一条”。

如何在最终的和平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确保中国的声音能被听到，国家的利益能得到尊重，是当时的一大挑战。1915 年，袁世凯总统的心腹顾问，也是一位有权势的政治家，梁士诒制定了“以工代兵”计划，旨在与协约国的事业携手合作，即使中国正式参战的可能性仍不确定。[1]1915 年和 1916 年，英

[1] 凤冈及门弟子:《民国梁燕荪先生士诒年谱》上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310 页。

法两国终于不情愿地意识到，中国的支持对于赢得战争来说必不可少。有鉴于所遭受的巨大伤亡和几乎破产的财政，更多的人力资源对他们至关重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志愿华工与中、英、法三国政府的合作，有 14 万中国人前往欧洲，其中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民。最初，这些华工是由英法政府招募，帮助他们对抗德国人；美国于 1917 年加入战争时，他们也利用了华工。这些政府都认为华工对于战争的命运至关重要。对于英法当局来说，华工是赢得战争的重要助力，而中国当局则将欧战华工与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联系起来。

中国向欧洲派遣华工的决定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明清两朝都严厉禁止中国人出洋，甚至处罚出国者。1712 年，已有大量中国人移居海外，清廷的一份诏书规定："凡长期滞留海外者，可处以极刑，由各省督抚从国外引渡，立即斩首。"[2]乾隆帝将海外华人称作"天朝弃民"，即使他们在其他国家遇到麻烦，中国也不会给予保护。[3]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中国人决定出国，包括那些前往美国并建设跨太平洋铁路的劳工。然而，禁止移民的规定仍是官方政策，直至 1893 年，清政府最终接受外交官薛福成的建议，废除了这项规定。薛福成认为，对海外移民采取友好政策将有利于缩小中西之间的差距。[4]

随着 19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官方移民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不再是邪恶之地，而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出国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因此，海外华人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同年，中华民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包括《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合法化海外华人在国内政治中的代表权。1916 年，随着华工前往法国，农商部与外交部共同审核制定了一项保护出国华工的新法令。[5]新法令不久后获得通过，随着大量华工被派到欧洲援战，北京政府国务院在

---

[2] 引述自 Ching-Hwang Yen. 1985.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22.

[3] Ibid.

[4] 引述自 Philip A. Kuhn.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43.

[5] 引用自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主编:《欧战华工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 12—14、16 页。

1917 年设立了侨工事务局。[6]应当从中国思想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理解 1915 年的“以工代兵”计划，除了是中国渴望加入战争，更是中国急于加入世界的表现。

非凡的经历

尽管前往一战西线的华工是国家精英制定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但绝大多数人出国只为了谋生。大多数人来自山东未受教育的贫困农民，他们自愿前去欧洲，以赚取许诺的报酬。这些华工从中国到法国的旅程充满挑战。一部分华工的赴欧路线是途经苏伊士运河或者好望角到达法国，但是大多数华工则是跨越太平洋，穿过加拿大，再横跨大西洋前往法国。[7]大约有 3000 名中国人在前往欧洲的途中或在欧洲丧生，包括 700 名因为遭遇德国潜艇的攻击而丧命的劳工。抵达欧洲后，他们将被骇人的恶劣生活条件所震惊。许多中国人认为法国是所谓西方文明的中心，但是文明的西方正陷于一场可怕的战争中，无法炫耀在文化、智识或政治上的优越，只暴露出最丑陋、最野蛮的一面。没有人让华工准备好迎接这种文化冲击，也没有人教导他们如何适应这种新生活。食物、语言、习俗和管理——所有一切都让他们大为震惊，没有时间或机会让他们思考、消化和提出问题，因为他们的劳动迫切需要用于战争。

在西线，华工从事的劳动含括战壕、工厂和港口等多个领域。他们维修坦克和道路，挖掘地基，在兵工厂工作，装卸火车和船只，管理造纸厂。法国人给华工分配了各种任务，英军指挥下的华工，大部分时间与劳动力都用在了挖战壕。堑壕战是一战的关键特征，虽然没有记录表明中国人参与了多少挖壕沟的工作，但可以说他们在堑壕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被招募到法国之前，很少有人走出农村的边界。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种族歧视、沟通障碍、疼痛、虐待等诸多困难。此外，在英军手下的华工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压力

[6] 关于北洋政府侨务政策的详细分析，见蒋顺兴、杜裕根：“论北洋政府的侨务政策”，《民国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68—72 页。

原文写第 3 期，但不符。——译者注。

[7]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with the Chinese Labor Corps in France.’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ox 204, folder: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4.

和更大的挑战，因为每天结束后，他们会被困在铁丝网的围栏中，在数个小时的艰苦工作后面临着无聊的生活。

华工来到欧洲是为了帮助英法赢得战争，战后，许多人将留下来帮助法国进行重建。许多在英国监管下的华工在法国一直呆到 1920 年，而大多数在法国监管下的中国人则一直呆到 1922 年。事实上，华工是最后一批离开法国的英国劳工。一战持续了约 1500 天，但许多中国劳工的战争经历更为漫长、也更为恐怖，因为他们要留下来清扫战场，埋葬尸体。没人可以平静地接受这项工作，但对中国人来说尤其艰难，他们认为触摸尸体不吉利。这些人遭受噩梦般的折磨，害怕被死者诅咒。而最危险的任务是清除未爆炸的弹药。没有人培训中国人如何处理这些东西，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虽然由于缺乏权威证据，无法得出一个具体数字，但据估计，大约有 3000 名中国人在欧洲或前往欧洲的途中因敌方炮火、疾病或受伤而丧生。时至今日，在法国和比利时等地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坟墓。

中国的牺牲在战后未得到相应的承认。巴黎和会上，英国外相阿瑟 · 贝尔福声称，中国“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完全无视中国劳工的牺牲，不承认中国在战争中的贡献。[8]华工的贡献不仅在欧洲很快被遗忘，甚至也被自己的国家所遗忘，以至于中国学者陈三井认为他们的经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9]多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对中国在欧洲大战中的重要性提出质疑。玛丽莲 · A · 列文（Marilyn A. Levine）声称，华工“没有完成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预期目标”，[10]朱迪思 · 布里克（Judith Blick）认为，以工代兵只是一个商业上的策略，中国人与实际的战争作用毫无关系。[11]然而，这忽略了华工在协约国战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正如当时《泰晤士报》的报道：

---

[8] Balfour to Curzon, 8 May 1919, in E.L. 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 (eds). 1949.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1, V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565–66.

[9]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第 1 页。

[10] Marilyn A. Levine 1993.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71.

[11] Judith Blick. 1955. 'The Chinese Labor Corps in World War I.'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s on China 9: 112.

"中国劳工团来到法国，使我们自己的人从战线后方大量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有助于解放出让更多的士兵从事战斗任务。"[12]

换句话说，14 万名华工至少解放了 14 万名协约国士兵。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不仅为战争的基础设施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充当了东西方之间的使者，从而参与了中国的复兴和变革。

弥合东西方的鸿沟

大多数赴欧华工都是普通的农民，他们被选中前，对中国和世界事务知之甚少。然而，这些人还是直接帮助中国改变了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形象。他们新的跨国角色重塑了中国的国家身份并使之国际化，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新兴全球体系的形成。从他们在战时欧洲的经历以及与英美法三国军队还有其他国家劳工的合作中，他们形成了对中国和世界事务的独特看法。

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所述，一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开始。[13]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中国，通过一战，中国开始了国际化和民族复兴的征程。正如一位笔名"以芬"的人在 1918 年底发表于《晨报》的一篇文章所述："大战即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而移入新时代。"[14]"以芬"鼓励他的读者理解这些变革的重要性，"顺应时势"。他警告说，如"吾人"未有"大觉悟"并为做好充分准备，那就将被"世界之新潮"淘汰。[15]在 1919 年春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会议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正廷对基督教青年会秘书（包括在欧洲与华工一起工作的中国秘书）的讲话中表示，中国

---

[12] 'The C.L.C.: With the Coolie from China to France.' *The Times*, [London], 23 April 1919, 14.

[13] James Joll.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1.

[14] "欧战杂感"，晨报 1918 年 12 月 23 日，第 2 页。

[15] Ibid.

目前的状况首先需要的是“战斗精神”，这包括“公正和正义的精神，一种无惧生死、放弃私利与野心的原则精神。[16]

赴欧华工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这种战斗精神。如果我们从中国寻求新的国族认同和民族复兴的角度来看待“以工代兵”，这些工人的旅程就具有历史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华工不仅为协约国的战争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还为战后和会与中国的后续发展作出了贡献。毕竟，正是由于他们在西线的存在，中国能够参加和平会议，并要求尊重与平等。华工的劳动、牺牲与生命为这些外交官在世界舞台上争取承认和包容的斗争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因此，这些工人的旅程并不是一个“悲剧”，而是成功地帮助中国积极参与到国家与国际的事务中。虽然没有人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但他们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代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在 20 世纪 10 年代 20 年代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代成年人。自“现代”伊始，中国的精英就将侨民与中国的国际化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一战期间华工的案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与中国内外的移民历史和当代问题产生共鸣。今日，中国人作为劳工、移民或者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正如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写道:“至少就 16 世纪以来的时期而言，移民与中国的现代史密不可分……我认为，无论是缺乏移民的中国史，还是缺乏中国史的移民史，都不会是一个自足的研究领域。”[17]通过研究在欧洲的华工与他们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重现中国史中被忽视的篇章，还能加深我们对这个看似晦涩的事件如何影响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理解，而现代的世界秩序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

---

[16] S.J. Chuan. 1919. ‘A Brief Report of the Versailles Conference for the Chinese Secretaries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YMCA in France.’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ox 204, folder: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17]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5.

1920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将组织劳工作为党的主要目标之前，历经五四运动烈火洗礼的学生活动家就已尝试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邓中夏便是其中之一。五四示威三个月后，时年 25 岁的邓中夏组织了一个学生公寓“曦园”，里面住了大约 30 名的北大学生，其中许多人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事业。[1]他们对劳工运动和互助组织有着共同的兴趣，认为对知识分子不应当以学识衡量，还要以参与劳动为标准。他们希望调查工人阶级的生活与劳动条件，这也是后来中国及全球毛主义的一项宗旨。为了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学生在长辛店开设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那里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中心，离北京很近，约有一千名工人。然而，他们很快就遭到了组织上的困难。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学生难以与工人建立联系。[2]带头的另一位学生领袖张国焘回忆起他第一次到长辛店的情景。工人热情地招待了这群积极的学生，他们财力微薄，却还是给了学生最好的款待，张国焘是唯一一个不在乎苍蝇飞舞与食物新鲜的人，正如他在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3]以下是邓中夏对长辛店之行的回忆，写于 1920 年 12 月 19 日，两天后以笔名发表在《晨报》上。

---

[1] 有关这一学生团体，见 Daniel Kwan. 1997.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 ff.

[2] Ibid., 122.

[3] Chang Kuo-t'ao. 1971.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1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10 页。——译者注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

邓中夏[1]

今天因为长辛店的工人，所组织的劳动补习学校，开筹办会议，请我们去帮忙，所以我一早起来就和太雷、仁机、郭淘三位同志跑出前门西车站，坐火车往长辛店去。长辛店距离北京四十二华里，约一点钟火车就到，是一个很大的乡村，有三个大工厂，共有工人二千五百多人。这些工厂，都是归京汉铁路局管辖的，按铁路的组织，共分三部，一是车务处，二是机器处，三是养路处。我们四个人坐在车上谈谈笑笑，觉得很快乐，严酷的冷气，都退避了三舍。车过永定河，我望芦沟桥在晨曦的底下，趁着一座破塌的古城，有两三杆布帘随风飘摇，刹是好看，真一幅绝好的天然图画。那时就引起了我的画兴，我的手就痒了，可惜当时没有带写生器具去，且不在芦沟桥停，所以不能画。车愈走愈远，我的心愈记着他。车到了长辛店，而芦沟桥的风景，还在我的心头。

在长辛店下车的时候，我见了许多灾民——男女老幼的麕聚在站边的地方。那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着不快，表出一种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车上的那一种谈笑快乐心，和画画的兴趣，飞跑往那里去了，光觉得心中难受，好比我也在饥饿困苦中。我想起他们灾民在这严冬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而那一班官吏政客资本家们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还拥着他们的第几姨太太正围着炉子取乐，比那班灾民露天席地的受冻饿而死，其苦乐真有天渊的分别，唉，那真是社会上最不公道的事。为什么他们穷到那个地步呢？他们的财产给谁抢了去呢，我们捐了几个钱就可以救得他们吗？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道的事，请各位设法子做去罢。

---

[1] 英译版由 ZHOU Ruixue 翻译。原文直接引用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dengzhongxia/marxist.org-chinese-gong-19201219.htm。——译者注。

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今天刚是长辛店的一位工长邓寿亭先生，因他热心办了一间女子国民学校，几年来成绩很好，长辛店的居民送了他一个“乐育英才”的匾子，所以今天他摆酒请客。男女老幼的来宾很多，大半是工人，我们躬逢其盛。一尝乡村社交聚宴的风味，觉得很有乐趣。见他们那种平民的生活，亲热熙攘的风习，非常羡慕。

我们食完了饭后，就开筹办会议，首由一位工长明科先生布告筹办这个劳动补习学校的经过情形，和现在进行的方法，今天会议的事项。大概是这个劳动补习学校是由长辛店工人自行组织的，款项是由捐款来的。（他的捐款启事和章程附录在下面）次由郭淘君说明创立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大概说，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温饱，而那班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等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他们的钱那里来的，他们的衣食住那里得的，都是由我们工人的血汗造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得享受，弄到困苦的情形。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先有智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而且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独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该享同等的教育和幸福。当他演说的时候，在座听的工人，个个都点头象有点感动的觉悟的意思，大概这个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开成立大会，于五日开课，那天想必有一番热闹。

会议后有几位工长带我们去参观各工厂，今天因是星期，所以各厂的工人多数停工休息，有少数工人，因特别的情形，如生计困难或不明白休息的意义，所以仍然作工，按工人每日冬天约作工十时，夏天约十一二时，工钱每天因工程或个人而不同，约自三毛至一元不等。晚工往前作一小时加一刻都计算，但现在却一小时了（闻唐山南厂的工人，因这个情形，已于十六号罢工了）。工人的生活费约每月三四元至十五六元（指有家庭者）不等。我们到一处，贮有许多砖头放在地面，我问他是预备建筑的吗？他笑笑地答我说：“这些砖已买来了六年的工夫，说是为我们工人起医院的，你看那座小房子不是盖好了吗？但是其余的房子，不知他们六年了也没盖呢，”我笑说，那不是很方便你们害病吗？他说，“你那里知道个中的黑暗？好在我们不害病，倘真个害病，他们也不医，

不说是没有病，就说没有药，除非有脸子才得到一点药呢！”我听了很气，敬告铁路总办，千万要关心下工人的幸福才好，不要开了一笔大公款，难为了贫苦的工人。

长辛店的工人智识很高，团结力很大，他们已组织成有很强固的团体，他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叫做“劳动音”，每期销售二千多本。

我可惜对于机器学没有研究，所以参观了工厂，也没有什么心得能写出来，光记得一个是专修整气锅的，一个专修理机关的，一个制铁条的，入了总发动机，只见无数皮带和电线而已。各位工人向我指点说明，我真感谢他们增长了我许多智识。五点五十分，我们再坐车回北京。经过芦沟桥时，那幅天然好画图已被黑沉沉的幕烟罩住了，我不能再见那样失望。

我再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单预算案抄在下面：

（一）募捐的启事。我们为什么办这个学校呢？看下简章第一条就可以知道，此处不再费辞了。有人要问长辛店不是已有“劳动高等小学”“工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几个校吗？何必添此一个，我们答：“高小”、“国民”、“女子”仅限于儿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尚那样多，长辛店为铁路工场所在地，劳动者亦复不少，请问这一大部分人到何处所觅何机会可以领受一点教育呢？现在的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差不多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意义，何独于长辛店地方两样呢？同人等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发起这个学校。不过我们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界加以经济上的援助。热心的先生们啊，务望你们解囊捐输。使此校得以成立。那么，不仅同人等之幸，而长辛店的劳动社会“获益”尤为不浅啊！

（二）简章及预算案，（甲）简章（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二）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

（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七）本校设驻定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八）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

担任之。（九）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乙）预算案：（一）开办费（1）制桌凳三十张，洋五十元，（2）修理校舍洋二十元，（3）杂费洋十元，共洋八十元正。（二）经常费（1）校舍房租每月约十三元，全年约一百五十六元。（2）驻校办事员（兼教员）和专任教员每月共支洋三十元，全年三百六十十元。（3）校役一人支七元，全年八十四元。（4）书籍文具等费全年四十元。（5）杂费每月支五元五角，全年共支六十六元，共七百〇六元。

1921

1921 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建党大会，这将对中国劳工运动产生重大影响。民初的劳工组织通常由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织。[1]孙中山与 1912 年 8 月成立的国民党主张组织工人的必要性，然而这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建设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2]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股新的力量将改变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将党的基本任务定为成立产业工会。这个决议吸取了一些成员办理工人学校的经验，其中强调了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无产阶级教育的强调不仅借鉴了俄国的先例与当时中国的试验，更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教育占据中心地位的结果。[3]本文将追溯中国共产党与劳工运动在早期的关联与影响，并认为中共及其特定的阶级性质诞生于中国国内的结构条件，即全球所谓资本主义"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时代下中国所处的被剥削压迫的地位。

---

[1] 关于这些运动，见 S.A. Smith.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68–75, 85–88.

[2] Ibid., 113 ff.; S.A. Smith. 2008.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4.

[3] Elizabeth J. Perry.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7.

扬帆起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林春

1921 年 7 月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共 13 名代表齐聚上海，举行他们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 月 23 日起，他们使用大会的一名代表李汉俊的堂兄李书城的住所，位于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现黄浦区兴业路 76 号）。30 日晚，一名陌生男子闯进屋内，然后匆匆退走。由于怀疑他是间谍，代表立即解散并在隔日重新召开会议，[1]此次会议的地点位于离上海约 100 公里的嘉兴南湖的一艘丝网船上，那里是大会代表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的家乡。而 30 日晚就在代表散去不久后，法国巡捕就围住并搜查房子长达四个小时，[2]但最终一无所获。此后，由于一些巧合，7 月 1 日被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

当时的正式党员有五十三名，每个主要的共产主义小组都要选出两个人参加大会。代表包括上海的李达与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与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与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与陈潭秋，山东的邓恩铭与王尽美，以及广东的陈公博与周佛海。陈独秀与李大钊这两位分别在上海与北京领导中国第一批正式共产主义组织的知识分子未能出席大会，但陈独秀派出包惠僧作为代表。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也没能出席，他们于 1920 年底在巴黎建立了分部。其他与会者包括代表共产国际（Comintern）的资深荷兰共产党人马林（Henk Sneevliet），以及代表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与赤色职工国际（Provintern）的年轻俄国人尼科尔斯基（Wladimir Abramowitsch Neumann）。马林在前几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演讲，由 19 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翻译。

代表们选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担任组织主任和宣传主任。大会通过的纲领确定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与

---

[1] 嘉兴会议的召开日期未有定论。根据现有考证而言，31 日似乎并不可能。——译者注。

[2] 陈公博在回忆中写的是 2 个小时（两个钟头），见《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译者注。

1920 年 11 月上海小组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述一致)。[3]更具体地说，纲领要求“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强调了在政治上动员产业工人的重要性。“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5]陈独秀的书面发言主要涉及组织问题，强调民主集中制、党员守则和纪律对于建立一个能够带领群众的强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会议得出结论，工会化的工人应该与追求“社会革命”的农民“自然而然”地形成统一的整体，党中央随后指派主要成员在城乡工人中发展地方支部、工会和教育班。

在此并不追溯代表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仍有必要进行简要的介绍。1927 年，国民党背叛并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与同情者之后（见本书中 S · A · 史密斯的文章），陈独秀和刘仁静选择了不同的“左翼反对派”立场，因此在 1929 年被开除出党。陈独秀仍坚信共产主义，他的两个儿子都是重要的共产党人，最终遭到国民党杀害。他始终如一，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但官方将其定调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没有翻案。1929 年，刘仁静从莫斯科返回中国的途中，于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但他后来与中国的托派保持了距离。他与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一起，在 1949 年后的新中国生活与工作。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和陈潭秋在 1925 年至 1943 年期间的革命斗争中英勇殉难。1923 年后，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不同程度地滑入反动阵营。张国焘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之一，但在长征后转投国民党。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李大钊于 1927 年被反共军阀绞死，陈独秀于 1942 年病逝。

---

[3]《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 年 11 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并在内部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1958 年 6 月 3 日）上发表。

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cp-1921-1949/01/124.htm。——译者注。

[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 年)，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3—5 页。

中文马库可以阅览此书，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cp-1921-1949/01/index.htm。——译者注。

[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 年)，同上，第 6—7 页。

航程的催化剂

自鸦片战争伊始，到 1917 年十月“一声炮响”为中国引入列宁主义的数十年间，中国一直被国内动乱和外国侵略所摧残。敌对的帝国主义列强凭着地方军阀、地主与买办的支持，暴力“瓜分”了这个国家，晚清改革派“效仿西方”的幻想就此破碎。1911 年的辛亥革命既无法击退外国的支配，也未能重塑社会的秩序。孙中山的政府被越来越多的障碍所困扰，无法实现他的三民主义原则，即民权、民主、民生。中华民国固然有着许多缺陷，但列宁还是以一系列类似“亚洲觉醒”的评论祝贺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承认民族解放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事件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想要与世界上的劳苦大众联合起来的一个突破口。[6]1919 年，共产国际成立，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革命，为尚且年轻、处于困境的苏维埃政权提供安全，团结和支持。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自诞生之处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中国的现代革命民族主义诞生于继承自 19 世纪、后来被理论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中。[7]在发展不平衡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创新的工人阶级组织从农业社会中脱颖而出。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两百万人，但在二十世纪初，作为对中国经济中的大量外国影响的回应，他们在政治上极具活力与战斗力。李大钊阐明了这种阶级民族主义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的“自决”并作

[6] Vladimir I. Lenin. 1975.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ive Publishers. See: ‘Democracy and Narodism in China’ ([1912], Vol. 18, 163–69); ‘The Awakening of Asia’ ([1913], Vol. 19, 85–86); ‘Backward Europe and Progressive Asia’ ([1913], Vol. 19, 99–100); and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Doctrine of Karl Marx’ ([1913], Vol. 19, 582–85).

以下均引用自中文马库，《中国的民族与民粹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1/056.htm。《亚洲的觉醒》：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3/046.htm。《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3/048.htm。——译者注。

[7] 有关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的讨论，见 Tani Barlow. 2019. ‘Semifeudal, Semicolonial.’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237–41.

为一个民族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对重建世界秩序而言不可或缺。[8]他认为，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阶级战争’”被围困的情况下，“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其中的民主意味着“民主主义劳工主义”。[9]李大钊批评了日本军事扩张主义的“泛亚主义”，强调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实现平等与和平的“新亚细亚主义”。对他来说，反帝和阶级斗争是相互依存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活力主义（活力论）、实用主义到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与思想由留日或留欧学生带回中国。自由主义最初以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因而在国内没有广泛受众。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有力地论证，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革命只能铺平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1915 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了《青年杂志》，不久后更名为《新青年》，试图重塑几千年来压抑的儒家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前夕，他谴责中国社会的黑暗，欢迎“德、赛两先生”，主张进行文化和道德的大扫除，“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0]五四运动因《凡尔赛条约》而爆发，条约将原德属山东租界转让给日本，北京的学生示威和工人罢工迅速扩散到其他城市，要求政府拒绝这项帝国主义条约。在此之后，中国的激进群众政治时代将成为战后全球反殖民主义和现代化变革的一部分。而 1919 年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将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创造历史的历史时刻。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运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干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在阶级政治中的地位：他们是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组

---

[8]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载于“甲寅”日刊（1919 年 2 月 19 日）；《Pan……ism 与 Democracy 之胜利》，载于“太平洋”第 1 卷第 10 号；《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载于“国民”杂志第 1 卷第 2 号（1919 年 1 月）；《再论新亚细亚主义》，载于“国民”杂志第 2 卷第 1 号（1919 年 1 月）。

中文马库之《李大钊全集》（二）（三）可查阅，或在线搜索，均有结果。——译者注。

[9]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载于“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1918 年 10 月）。

中文马库中均有收录，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lidazhao/marxist.org-chinese-lee-19181015A.htm。——译者注。

[10]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于“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1919 年 1 月）。

中文马库的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chenduxiu/marxist.org-chinese-chen-19190115.htm。——译者注。

成部分。1919 年 5 月，《新青年》成为一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刊物，由李大钊主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其他几篇文章中继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阶级竞争的金线”联络起来。[11]李汉俊也撰写了大量文章，他翻译并编辑了一本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解释了资本主义商品和剩余价值，以及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俄国道路”。[12]陈独秀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辩论中，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史观、劳动价值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1920 年 9 月，带着陈独秀名为《谈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宣言，《新青年》重新发刊，陈独秀仍是主编。[13]

此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许多与共产主义相关的刊物开始广泛流传，如李大钊编辑的《每周评论》、周恩来的《觉悟》、瞿秋白的《新社会》、邓中夏的《劳动音》以及李达的地下党刊《共产党》，后两者于 1920 年 11 月 7 日同时发行，以纪念俄国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 1920 年 8 月成立，由俞秀松担任书记，青年团的官方通讯《先驱》则由邓中夏与刘仁静共同编辑。

当布尔什维克来到中国时，当地的鼓动工作已经开始。1920 年春天，俄共（布）东亚局副局长格里戈里·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汉名吴廷康）前往北京、上海两地，担任成立于 1920 年 5 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理主席，他的随行人员是翻译兼助手杨明斋。杨明斋是一名俄国的中国工人，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张太雷是第一个领导共产国际中国分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办事处，出席了 1920 年 7 月举行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于 1921 年 6 月陪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Nikolsky）前往上海。维经斯基的队伍参加了一些会议与活动，帮助筹备五一节集会（由于警察突袭陈独秀的总部而落空），1921 年 7 月监督了一次社会

---

[11]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 6 卷第 5、6 号（九月、十一月）。

在线链接：zh.wikisource.org/zh-hans/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译者注。

[12] 此书译自日译版 M.E. Marcy. 1911. *Shop Talks on Economics*. Chicago, IL: Charles Kerr，中译版《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于 1920 年上海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13] 陈独秀：《谈政治》，载于“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1 月）；《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于“新青年”第 8 卷第 4 号（1920 年 12 月）；《独秀复东荪先生信》《社会主义批评》，载于“新青年”第 9 卷第 3 号（1921 年 6 月）；《马克思学说》，载于“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1922 年 7 月）。

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共同经营《上海生活报》(俄语)、《社会日报》与《新中国》等宣传机构。尽管陈独秀李汉俊都有所反对，但莫斯科及其派遣人员在创立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顾问角色。20 世纪 20 年代，数十名中国人被派往“红色麦加”，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修。尽管有着密切联系，但从一开始，中共在政治、组织和财政上都具有明显的独立性：来自国际捐赠的资金微不足道。如果没有当地已经稳固的发展，维经斯基和马林都不可能在中国取得任何成就。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中国的土壤，这使其能够培养出自己独特的革命战略与革命思想。

劳工神圣

中国共产党将解放劳工和赋予劳工权力视为其使命，党拥有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同，这也是影响了党的领导层与中国劳工运动接触的方式。1920 年 4 月，陈独秀在上海码头工人大会上谈到了“劳动者底觉悟”。[14]1920 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五一节集会上的讲话普及了劳动尊严——被五四知识分子称为“劳工神圣”的概念。[15]他在《新青年》五一节纪念专号上撰文讲述了国际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并引用卡尔·李卜克内西关于世界劳工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16]他感叹五一节还未在中国的工人中确立意义，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最后他呼吁：“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 8 月，陈独秀和李汉俊创办《劳动界》，这是一份由工人自己撰写的流行周刊。在短短的 24 期中，工人们以评论、诗歌、故事和信件的形式，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他们的经历和观点。例如，在《一个工人的宣言》中，作者李中是一名造船工人，他设想“将来的社会，要使它变成工人的社会；将

---

[14]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载于“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1920 年 5 月 1 日）。

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chenduxiu/mia-chinese-chen-19200501.htm。——译者注。

[15] “（他）号召大家把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 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16] 李大钊:《五一 May Day 运动史》，载于“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1920 五月 1 日）。这号五一特刊的封面题字，是由蔡元培提笔的“劳工神圣”。

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lidazhao/marxist.org-chinese-lee-19200501.htm。——译者注。

来的中国，要使它变成工人的中国”。[17]越来越多的刊物问世，包括《济南劳动周刊》,诞生于 1921 年 5 月，旨在“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以及随后的上海《劳动周刊》与湖南《劳工周刊》等。

尽管党在 1922 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明确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到社会主义的分阶段革命，但共产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党和劳工运动实际上是一起成长的，1921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中旬，8000 名工人在党的成立大会附近的英美烟草公司浦东厂区因受到虐待而举行的罢工便是一例。曾与烟草、机械、纺织和印刷工人一起工作的李启汉被派去领导这次胜利的罢工。大会召开之前，就已成立一些重要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会。例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立的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见本书中邓中夏的文章），而山东小组则发起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王尽美在山海关和秦皇岛地区组织铁路、煤矿与铁厂工人。在香港，海员总工会的正式名称源自孙中山，由苏兆征领导，他在病逝前是中共的一名重要成员。

1921 年 8 月 11 日，南湖会议结束后，党组织立即着手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就任书记，《劳动周刊》是其官方刊物。在《共产党》刊物上发表的成立宣言中宣称“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18]书记部设有五个分部，分别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在湖南的《工人周刊》上，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于 1921 年 11 月写了一篇短文，庆祝省工会成立一周年:“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他呼吁“罢工的权利”和承认劳动的“神圣”，并以响亮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和“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作为结语。[19]

中央书记部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并与国际无产阶级保持联络。在其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军阀混乱和资本主义状况的三重斗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带来了中国劳工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最具传奇色彩的便是香港海员、安源（湖南）与开滦（河北）矿工、陇海铁路、京奉铁路与京汉铁路等交

---

[17] 李中:《一个工人的宣言》，载于“劳动界”第 7 号（1920 年 9 月 26 日）。

[18]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载于“共产党”第 6 号（1921 年 8 月）。

[19] 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载于“劳工周刊”，1921 年 11 月 21 日。

通干线上的铁路工人，以及山东、长江三角洲的纺织、服务业工人的罢工。罗章龙领导了其中的几次罢工，也是党在北方地区的报刊《工人周刊》的编辑，他在“红色工会”被外国资本和反动势力破坏的情况下，明确了无产阶级工会与“黄色工会”（由公司组织的假工会）之间的基本区别。[20]邓中夏在担任书记之前领导了书记部的华北分部，他主张将经济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强调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彻底的解放”，工人必须尽可能寻找同盟者，接受改良主义的要求，也得采取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21]王尽美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主张通过跨地区的贸易，实现民主结构的制度化。他将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打造为由常设工人纠察队支持的直接选举分层指导委员会的典范，其中的共产党核心必须处于地下状态。1922 年 5 月，随着工人的诉求日益政治化，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有 100 多个工会代表出席。随后的夏天，基于共产党在《劳动法大纲》中的建议，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高涨的劳动立法运动。[22]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重申了劳动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23]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把重点放在群众教育和劳动培训上。1920 年秋，李启汉和刘少奇在上海西部开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提供文学和数学课程，以及政治讨论和体育活动。1921 年元旦，北京共产党人在长辛店（京汉铁路的重要节点）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不久后就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党支部。1921 年夏，毛泽东与何叔衡在长沙为工人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李大钊的鼓励下，天津也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类似的学校和培训机构广泛涌现，通常使用中央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地方工人刊物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作为教科书。典型的案例是李立三在 1922 年 1 月创立的安源工人夜校，在为当年 9 月的大罢工做准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见本书中裴宜理的文章）。此外，党还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平民女

---

[20]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由北京工人周刊社于 1923 年 3 月印刷出版。英译版见‘Bloodshed of the Peking–Hankou Workers’,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Winter 1992–93).

[21]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九二六》，延安：解放社，第三章与“结论”。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dengzhongxia/1930book/marxist.org-chinese-gong-1930.htm。——译者注。

[2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大纲》，1922 年 8 月 16 日。见注释 4。

[23]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 年 7 月。见注释 4。

校，培训女干部。这些学校不仅丰富了工人的生活，还培养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并成为阶级意识的载体与招募有纪律党员的来源。

一个世纪之后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水手年轻时便已起航——1921 年一大的 13 名代表平均年龄为 28 岁。为事业牺牲的数百万人中的大多数，也都死在青年时期，其中包括第一代共产党的工人领袖：顾正红、肖楚女、夏明翰、彭湃、恽代英与阮啸仙，仅举几例文中未提及的人物。

这场革命非常理想化，大胆且代价高昂。中国共产党侥幸逃过种种劫难，不惧艰难险阻。一个世纪前站在那条小船上的小团体已经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发展为历史上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之一。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中，最重要的便是“党的建设”，此外还有“武装斗争”与 1927 年后的“统一战线”。我们可以从党的路线及其阶级基础的相同脉络中理解并追溯今日中国的弱点与挑战。终极问题便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恢复成立之初对劳工的承诺，或者说，中共与其“初心”之间的断裂是否已经无法弥合。

1922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人方面最为成功的地方当属江西省安源，一个煤矿中心和铁路终点站，20 世纪 10 年代曾雇用万余名矿工和千余名铁路工人。1921 年秋，煤矿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与军阀混战、强征矿工时，时任湖南省工人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亲自前往安源了解当地工人的状况。12 月，他第二次短暂访问安源，随后派遣同为湖南人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前往该地为设立了一所工人学校。刚从法国归来的李立三只有 22 岁，他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证明自己善于与主宰当地的秘密会社打交道，成功取得地方当局的支持。在地方政府的许可下，1922 年 5 月 1 日，共产党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公开庆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揭幕，数百名工人举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表演，坚信动员工作必须逐步进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俱乐部建立了消费合作社，挑战矿业公司对工人生活的垄断，并组织自己的民兵。1922 年夏天，毛泽东再次访问安源后，他认为举行大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派遣另一位初出茅庐的湖南共产党人刘少奇协助谈判 1922 年 9 月 14 日凌晨 2 点开始的罢工迅速蔓延到整个工人队伍。罢工的诉求包括支付拖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改革用工制度，以及保证承认他们新成立的工人俱乐部并提供财政支持，这场罢工大获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源不仅将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中心，还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革命的圣地。

1922 年安源大罢工：领导的经验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1922 年 9 月 14 日，由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CCP）的干部动员并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业罢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爆发。[1]以中国共产党资助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一万三千多名矿工与铁路工人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大罢工，成功赢得了重大让步：公司同意支付拖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改革用工制度，以及保证承认工人俱乐部并提供财政支持。[2]

1922 年的安源大罢工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具有标志性地位，是早期无产阶级力量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劳工组织者邓中夏，在他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强调了安源罢工的重要意义："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增加工资，完全胜利。"[3]即使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友善的一位劳工历史学家也承认这次罢工具有的重要性，将安源大罢工描述为"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中最著名的罢工"。[4]

罢工的规模与取得之成功都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场罢工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直接归功于党的组织工作，足以使其在史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比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安源罢工为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在群众动员

---

[1] 尽管中共也支持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但根据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说法，党对那次罢工的参与仅限于街头演讲与散发传单。Daniel Y.K. Kwan 1997.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86.

[2] 关于 1922 年安源罢工的详细内容，见 Elizabeth J. Perry.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1948 年），第 158—59 页。

[4] T.Y. Chang. 1926. 'Five Years of Significant Strike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21, no. 8: 19.

方面的经验。这里的雏形是一种源于俄国经验、又有别于俄国经验的模式，它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为中共劳工运动提供指导。

秘密会社的角色

安源在中共成立前就存在劳工纷争。在 1922 年大罢工之前的数十年间，安源煤矿一直是抗议频发的场所。如果考虑到安源的工业环境，这并不令人惊讶：安源的矿业公司还拥有毗邻的铁路（株萍铁路），将煤炭运输出省界，供整个长江三角洲的企业（如汉阳铁厂）使用。社会学家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与亚伯拉罕·西格尔（Abraham Siegel）在他们关于跨国劳资纷争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且相互关联，煤矿和铁路是两个最容易发生罢工的产业部门。[5]而安源，正是这两者的结合。

然而，仅是结构性的条件并不足以引发反抗。要想超越野猫式罢工，需要预谋和组织。社会运动理论家指出，动员网络在引导民众抗议方面起着关键作用。[6]在安源的案例中，自 1892 年开矿以来，一个被称为“红帮”（即洪帮）的秘密会社长期充当中介角色。红帮的头目被称为“龙头”，不仅控制着当地的烟馆、赌馆、当铺和妓院，他的手下还充当着矿业和铁路公司的包工头，将乡亲介绍到这里工作，以换取高额的工资分成。类似宗教仪式的入会典礼、神奇的符咒与护身符、武术动作、效忠誓言、秘密守则等等，提高了成员对红帮大哥的敬畏之心，加强了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助。这些黑帮大哥兼包工头，虽然与公司管理层关系密切，但也能从工人工资的增涨中获得经济利益。因此，他们有动力利用秘密会社对工人的象征性与强制性的权力，组织罢工以争取更高的工资。

当毛泽东与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共干部，将安源视作新生的共产主义劳工运动的希望之地时，他们意识到红帮对工人的控制将对他们的计划构成最大的障碍。按照列宁的革命教义，也就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操作规程，

---

[5] Clark Kerr and Abraham Siegel. 1954.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Labour and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edited by Clark Ker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05–47.

[6] Doug McAdam.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他们为工人开办夜校，希望灌输激进的意识形态，以取代秘密会社的“封建迷信”。尽管这种教育工作非常重要，但现实很快表明，中共在安源的行动并非照搬自苏联。相反，他们的行动展现出一种独特性和原创性，这两个特征将使得中国共产主义区别于俄国共产主义。

共产党的组织者：李立三与刘少奇

让中共要员取代红帮头目成为安源工人领袖的战术创新，首先要归功于李立三，他来自临近的湖南省醴陵（安源就在醴陵的右侧），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湖南同乡毛泽东介绍，李立三来到安源，利用他对当地习俗的了解与他见识广博的品格，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极大吸引了工人的注意。他活泼的教学风格，引人注目的服装，以及对工人民俗的了解——从灯笼节、舞狮到宗教游行——都有助于李立三在路矿工人中招募大量忠诚的追随者。李立三的个性和工作风格都不受约束，他的浮夸行为对于普通工人来说具有一种吸引力，而对党的上级领导而言则是一件麻烦事。李立三大摇大摆地走在尘土飞扬的煤矿小镇，或是身着长衫，或是西装革履，刻意以时髦的打扮引人注目。他把在法国得到的一枚闪亮的金属徽章佩戴在胸前，由此众人传言他“刀枪不入”，这种传闻久久不散，而他却并不辟谣。相反，由于红帮“龙头”的威信建立在拥有超自然神力的名声上，他从中受到启发，积极鼓励散播有关他在外游历时获得“五国洋人”保佑的传言。

李立三的个人魅力与创新的劳工组织方式，迅速使得运动从工人夜校到工会（委婉地称作“工人俱乐部”）再到全员罢工。在计划停工的前夕，毛泽东派遣另一位湖南的年轻劳工组织者刘少奇到安源，为即将到来的罢工提供总指导。刘少奇刚从苏联受训归国，以其沉稳的举止和秉持纪律严格的列宁主义工作方式而著称，是故毛泽东认为他可以牵制李立三的冲动性格。李立三加刘少奇形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式，将热情和精力与从大局出发的克制相结合。其结果是，除了普通工人外，他们还能够获得秘密会社的知名人物和其他地方精英的支持，为罢工者的要求赢得广泛的公众同情。这种方法不仅在 1922 年的安源罢工中为党所用，而且在三年后上海的“五卅运动”中也成为党的法宝。

李立三提出了一段激动人心的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重要的是，这一口号并非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而是对"人的尊严"的呼唤。李立三在罢工宣言中阐述了这段心声，强调了罢工背后绝望与自卫的动机：

> 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资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
>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
>
>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7]

正如宣言所提及的，也正如刘少奇所强调的，公众对罢工支持与否，取决于罢工工人能否维持良好的秩序。当时，大约有五千名无业人员在安源镇上游荡，特别使人担忧有可能会出现罢工工人与破坏罢工的捣乱者之间发生暴力对抗。刘少奇意识到，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和红帮建立合作，他指示李立三去拜访当地的龙头，指望他从中协助。李立三带着一瓶老酒和一只公鸡，这是三合会入会仪式的基本物件，和几个陪同者（工人俱乐部的成员，也是红帮成员）于某天晚上前去分堂所在地。李立三毫无畏惧地大踏步迈进大堂，重重地将他的礼品搁在祭坛上，然后用预先学的红帮行话道明他欲与之结交。看到龙头欢迎他加入红帮（哥老会），李立三透露了即将发生的罢工，并提出三点请求：在罢工期间暂停赌博活动，关闭鸦片烟馆，以及不发生抢劫案件。洪帮老大连拍三下胸脯作保证，答应了这三项请求。罢工便只待开始。

罢工于凌晨二时正式启动，先从共产党最可靠的群众基础铁路工人群体开始。就在两个小时之内，按照事前的精心安排，罢工扩展到其余的工人部分。在四十余个厂房的每一处，飘扬着上有"罢工"两个字的黄色三角旗帜，并且有纠察队员驻守以确保无人能够进入。工人要么被劝回家，要么在宿舍里呆着，减少了引发混乱的可能。罢工期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秩序使得当地官员与商业精英感到放心，他们在谈判达成慷慨的协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罢工五日

---

[7]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41 页。

后，在没有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况下，罢工者争取到了诉求，工资得以大幅增长，同时公司保证承认中共扶持的工人俱乐部并给予财政支持。

从安源到上海

历史学家和活动家们将安源的胜利归功于工人群体在罢工中团结一致、富有战斗性的表现。但是领导者的作用也是关键。正如毛泽东的预计，李立三富有创造性的脾性和刘少奇从控制大局出发而施加约束的操作，是成功的组合。关于政治抗议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关注，但更多侧重于结构条件与网络动员在产生和维持民众抗议方面的重要性，很少谈论抗议领袖的催化作用。[8]然而，对于中国劳工运动史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娴熟的领导能力是区分中共参与的行动和野猫式罢工或秘密结社引发的罢工的关键因素。

自建党伊始，中共就注意到领导技巧的重要性。从 1923 年在广州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到今天在中国各地开办的近 3000 所党校，系统指导领导技巧在干部培训中占据了重要地位。[9]最早的教学基于苏联的宣传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安源大罢工就是有关领导能力的典范之一。

中国共产党将 1922 年的安源大罢工视为领导劳工运动的典范，这一点在三年后已经十分明显，当时党命令李立三和刘少奇共同负责指导另一起关键的劳工抗议活动。[10]1925 年春，上海的日资棉厂爆发了一场罢工潮。5 月 15 日，一名日本工头在一次工厂对峙中强杀了一名积极参与罢工的棉工（顾正红）。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主动宣传了这名工人的死亡，引起了人们对这场动员的广泛同情。5 月 30 日，以工人、大学生为首的大批支持者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街道

---

[8] Ronald Aminzade 是一个例外，见 Jack A. Goldstone, and Elizabeth J. Perry. 2001.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ited by Ronald R. Aminzade, Jack A. Goldstone, Elizabeth J. Perry, William H. Sewell,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6–54.

[9] Gerald W. Berkley. 1975. 'The Canton Peasant Movement Training Institute.' *Modern China* 1, no. 2: 161–79; and David Shambaugh. 2008.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827–44.

[10]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编：《上海工人运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51—258 页。

上游行，表达对罢工者的声援。英国警察突然向示威者开枪，造成 10 人死亡，另有 50 人重伤，历史上的“五卅运动”就此诞生。[11]

五卅惨案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政治契机，他们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次日，由中共支持的上海总工会（GLU），在李立三的主持与刘少奇的管理下正式成立。与安源的情况类似，秘密会社（上海的话是著名的青帮 [12]）控制着劳动力，对共产主义的发展构成阻碍。刘少奇在幕后默默地遏制暴力的发生，并在当地商界中培养支持，而李立三则表现得更加张扬。在一个青帮澡堂老板的邀请下，经党组织批准，他正式加入这个秘密结社。当时一份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红青帮与工运鼓动者联合起来……效忠于李立三。”[13]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了与黑帮的关系，上海总工会才能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一场规模空前的罢工浪潮。仅在上海一地，就有 200 多家企业、20 多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工厂工头（拿摩温）和包工头中的许多人都与帮派有联系，在维持罢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协助总工会从上海市商会捐赠的基金中向停工的工人发放罢工津贴。

然而，事实证明，在上海这个工业大都市中维持秩序，要比安源复杂得多。不同黑帮网络控制的对立工会，对上海总工会构成了持续的挑战。不守规矩的工人坚持多拿罢工津贴。由此产生的公共秩序的破坏引起商业精英的关注，在罢工的第三个月，他们对总工会不断要求提供罢工基金的要求越来越厌倦。8 月下旬，总工会意识到不得不宣布结束停工。尽管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只为罢工者提供了有限的收益，但它仍达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即确立了上海总工会是上海有组织劳工公认的代表。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直到蒋介石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的血腥屠杀中背叛共产党人（见本书中 S · A · 史密斯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业资本中的劳工代言人，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

[11] 有关五卅运动的详细内容，见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1–84; and Emily Honig. 1986.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3–9.

[12] Brian G. Martin. 1996.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1-1147, *Police Daily Report*, 3 August 1925.

官僚与自由派

1922 年的安源罢工和 1925 年的上海五卅运动，是中共早期劳工运动发展中的里程碑。这两起事件中，许多参加的工人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参与过劳工抗议活动的老手。但共产党干部的出现给这些正在进行的斗争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纪律。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遵循苏联的章程，在罢工前创立夜校和工会，但他们适应当地情况，进行创新与调整。在民国时期，工人在黑帮包工头的指使下劳作，革命者要想接触工人阶级，首先需要渗透，然后抑制秘密会社的活动。若想成功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对当地风俗具有深入了解，还得有胆识、勇气与坚定的纪律。然而，每位干部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尽相同，而领导技巧培训固然有用，却也不一定能改变天生的气质。中国共产党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特点——首先在安源运用，并在上海得到发展——便是，通过部署具有个性与倾向上相反却能互补的领袖，明智而自觉地平衡动员风格，以谨慎的态度控制事态的影响。

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二元对立，即坚持中央集权和正统思想的官僚与拥护削弱中央集权和摆脱正统思想的自由派。[14] 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贯穿了儒教中国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有助于解释当一种类型的领导人被替换成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时，政策上发生的剧烈变化。但是，截然不同的领导风格既可能连续出现，也可能同时出现，这两种类型的领导可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协同行动。中国劳工运动史表明，这种互补性在促进罢工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因此，它支持了社会运动研究提出的一个论点："当风格相反的领导人能够制定一个有效的方式，让他们的互补性格得到适当的发挥时，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15]

---

[14] Lucian Pye. 1988.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38–39.

[15] Aminzade et al.,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Dynamics of Contention', 133.

1923

1922 年虽是中国劳工运动的一次高峰，但大多数罢工提出的都是简单的经济诉求。由于担心工人缺乏政治目的，共产党领导层将工作重点放在将劳工斗争转向更为政治化的领域，动员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同时呼吁结社自由。最引人注目的在政治上组织工人的尝试发生在京汉铁路，中共在当地的影响力特别强大。除了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外，至 1922 年底，沿线其他车站也成立了 16 个类似的团体。经过一系列预备会议之后，1923 年 1 月，由大多数俱乐部的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宣布，将在 2 月 1 日于郑州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即使面对当时统治华北的军阀（吴佩孚和曹锟）的明显不满，大会还是如期举行，可当代表散去时，有几人被逮捕了。作为回应，约 3 万名工人在 2 月 4 日举行罢工，但最终被血腥镇压。据托尼·赛奇（Tony Saich）所述，正是二七惨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意识到，在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斗争中不能仅依靠工人的力量。[1]下文就是由罢工的重要组织者罗章龙，在此事几周后的记述，提供了罢工与随后的屠杀的详细描述。

[1] 见 Tony Saich. 1992–93. ‘Background to the 7 February Peking–Hankou Railway Workers’ Strike.’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 25, no. 2: 1–18.

二七惨案

罗章龙[1]

总同盟罢工案既决，四号早各分会先于各车站张贴敬告旅客的传单，略谓工人因生计及上司之压迫起而组织工会，原属正当之事，今路局及军阀，竟横加干涉，是不啻禁止工会之发展。工会乃工人第二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令其稍受妨害，虽牺牲生命亦必拥护之。深盼旅客诸君谅解吾人争自由之本旨云云；继复持公函致厂长，交代工作器具，然后依序出场，宜告罢郑，肃然无哗。郑州九时起，江岸十时起，长辛店十一时起，不数小时，全路一致停工。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工人一切行动，完全听总工会命令，不得单独接洽，妥协或调和。每个工人在罢工期内，不得自由行动；凡有要事，证明必得他出时，须向工会领取“放行”执照，纠察团始能准其通行，不然则必扣留。此外尚有纠察团及调查队之组织：纠察团在罢工期间，专负一切维持治安秩序之责；调查队用以刺探消息，间有向四周放哨及彻夜巡逻的责任。全体会众则用十人组成一组，推组长一人，负该组十人的责任，如此，可于数分钟内，召集数千人的大会。

部署既定，前后与路局相持经过三日之久，秩序极其严整，直到二月七日军阀的大惨杀就发生了。今为记载便利起见，将长辛店、郑州、江岸，诸大站经过情形分志于后：

---

[1] 本文是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一书第三章的英译版，译者为托尼·赛奇，见 Zhanglong Luo. 1992–93. ‘Bloodshed of the Peking–Hankou Workers.’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 25, no. 2。罗原书第三章标题为“如火如荼的京汉铁路各路鏖战情形”，为统一译文起见，采用译者题名，内容仍按罗原文录入（本书录入英译文隐去了电报等引文），感谢中文马库。若想查看原书，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luozhanglong/192303/03.htm。——译者注。

长辛店

辛店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手续，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洪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扁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扁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扁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扁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扁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洪沄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甘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

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按此电未直讦吴曹，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不知文电具在，岂是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客，极有敬礼：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五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置，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胁的话，并限工人十二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一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传单录下：

“兵士们！警察们！我等都是苦同胞们呵！你们为的是家里要饭吃要衣服穿，才出来当兵或当警察，我们也是为着家里的人要饭吃要衣穿才出来卖力气，寻工做。你们是月中关饷，我们是月中开支，唉！讲起你们的饷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没有关的，岂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苦吗？我们罢工是跟你们告老或解甲归田一样，因为我们不愿干了，是不犯国法的；你们这次来此，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感谢你们！但是外面的风传，实在是不好听，都说你们是来压迫我们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俗语说得好：‘强不欺弱，众不暴寡’。你们手里有枪有刀，有子弹，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若来残害我们，恐怕于心不忍吧？亲爱的军警们呵！我们愿和你们结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们不

> 愿意，定要来残害我们，我们只拚着一条穷命，将来历史上留个好纪念。就是有强力，有枪刀的军警，残害手无寸铁的苦工人，好听么？我们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军警，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疑心并且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残害我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启。”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的最狠毒的阴谋。

六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六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相，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的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
>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洪沄，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示。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神，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

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 · 二月六日

是日赵继贤已下一道命令，严拿工会委员及其他职员，约五十余人。十二时五十分由塘沽船厂运来新工百二十六名，由十四混成旅副官韩振青，京汉局代表印刷所长孟彬湘带同军队保护，运往辛店、保定、郑州等站。一方面将从前被工会除名的工贼充当工头，另挑选兵士五百名随同练习。并宣称罢工工人如不早日上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回籍，并追缴从前所有薪饷或拘留家属云云。工人置之不理。嗣又有京兆尹委员，宛平县汤知事等人到工会声称愿做调人，语多胁诱，工人答以此次条件均由总工会作主，分会无权谈判，如愿谈判请转达路局向总工会交涉，总会如有开工命令，分会自当遵办。汤见事不偕遂去，其实汤此番出头另有用意，盖欲窥探工会实情而为一网打尽之计。下午复由涿州开来兵二营，掌车及转运手等均由沿路各小站站长充任。此项军队系时全盛所部，全副武装抵辛，严阵以待。是晚十一时许该队即下紧急命令分途严拿工会要人。此时工会职员及领袖均在工人家属中住，故大队抵工会时一无所获，惟将工会存款什物全数抢去，并欲放火烧屋，幸经某甲哀求得免。随后即按户搜索工人家属，计捕去史文彬、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及工会学校教员吴汝铭等十一人。时值严冬天气，又在深夜，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全市经此一番骚动，悽惨已极，工人妇孺，哭声震天。此十一人复被剥去全身衣履，赤身送往旅部。该旅长一见，不容分说，喝令痛打一顿，加上镣铐，捆缚地上，只待天明，即解保定请赏。此时工人愤极，哀呼痛号之声，漫彻天地。是时天已黎明，该旅部门前已簇有三四千人，中有“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大旗一面，并有小旗若干，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该旅长见群众声势浩大，即下令冲锋，于是全副武装大队兵士，自内冲出，向工人猛烈攻击，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队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结果死者四名，重伤三十余人（越日死去不少），拿获者三十余名，轻伤及逃亡者无数。兵士更乘机大肆抢掠，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荡然无存。辛店工会于是遂不得不谋他徙，所捕十一人亦于是日解送保定去了。

今将辛店工会及书记部报告此次情形两电录下：

> 汉口京汉铁路总工会、各商会、各教育会、各学生会、各报馆公鉴：本路工人因军警强迫制止在郑州开全路成立大会，一律罢工抵制，要求回复自由。官厅方面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派来大批军队，如临大敌。突于六号深夜捕去工会职员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队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工人及居民受伤者无数，工会封闭，已迁北京办事。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工人悲愤难堪，谅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特此电陈，敬候明教。
>
> 京汉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阳

>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均鉴：顷据长辛店工会报告，昨日深夜，京汉局长赵继贤，率同曹锟所派军队，捕去辛店分会职员十一人，解送保定。又于今日上午十时，派同大队兵士，压迫工人上工不遂，继以惨杀，当场击毙工人及市民十数名，伤创及失踪者无数，军阀肆虐，至此已极！我工界诸友如不及早奋起，以与此残民之军阀作最后之奋斗，恐死亡无日矣！贵会接电后，祈即起示威，以实力援助，时机已迫，万勿自弃责任。
>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叩阳

赵见工人死伤甚众，自以为得计，一面要求保定将十一人枪毙，一面捏造电报说工人以手枪与兵士冲突，致遭伤亡。其伎俩与萧耀南、冯沄如出一辙，此时辛店工人，则由兵士强迫拉入工厂作工，否则就地正法，因此丧命的，竟至不可胜数，被伤的工人，赵复不准出境，不准就医，故大半死亡，工人入厂后，不准两人谈话，不准请假，否则亦处重刑，此外则乘机安插私党，将列名工会办事者全体除名。并向其家属追缴薪资。骚扰万状。彼复自编卫队，其私人亦人人佩带手枪，寻仇报怨，了无虚日。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军阀既霸占铁路为私产，赵亦便以军阀家奴走狗自任，所以竟有此豪奴悍仆的行径了。但赵此种手段，究不能征服工人的心，一连数日，工人纷纷亡命，还是不能恢复交通，工厂秩序，极形紊乱，只苦了长辛店市民日日在重围之下，兵马往来不绝，沿户捕人受不堪的骚扰罢了。

郑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办，将总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县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意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六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含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七日，姜王二人放出，姜被逼执一白布旗沿门劝告工人上工，工人均不理，王被押至北段劝告上工，后闻王自顺德站脱身至京，向国会请愿去了。是日上午高刘钱三人均押在工会内，十四师以二十五元买许多点心款待之，又命副官林宝第（曾作工，其父其子均作工，彼以此资格时与工人接洽）。劝三人发命令上工，三人不为动。八日黄殿辰要挟县商会会长，召集无赖三四十人在普乐戏园开国民大会，会场内外，以重兵把守，一切事由黄一人独自主持，有传单一千张，旗帜四百面，开会后，雇一班乡下乞丐，执旗游街，发散传单，其传单大意如下：首谓此次京汉罢工是无理取闹，次列促工人反省六条：（一）限工人十二时内上工，否则断绝其供给，如有私自供给工人及其家属者，以通乱党论；（二）工人如不上工，房东勒令退租，如有私留工人

及其家属居住者，房屋充公；（三）愿上工者至车站领护照；（四）驱逐工人出境，由军警帮助执行；（五）工人如被土匪强劫，军警不予保护；（六）陇海工人未罢工，军警特加保护。十二时之勒限已过，商人仍不断绝工人之供给，房东亦不勒令工人退租，如是这一场假造国民大会之活剧，遂完全证实，工人只有一笑置之。九日，前为赵继贤所收买组织传习所破坏工会被工会攻击降级之司机唐廷玺夤缘复职，其子亦由升火升司机，彼复召集其党羽，投降军阀，破坏罢工，威吓利诱一班不大明白之工人，如是领护照上工者有一百余人，其余工人，得汉口七日惨杀之讯，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忍气吞声的上工，以释放高刘钱三人为条件，是日尚有两事足记者：（一）副厂首万玉林见工人上工，遂问工人说："你们不是说听总会的命令才上工吗？现在为什么上工呢？"话为传习所中人所闻，报告于十四师，万遂被十四师捕去。（二）司机彭占元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十四师捕去打二百军棍，工匠马定清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京汉巡警段长胡剥皮掌责，鼻破流血，并被捕去。后高刘钱三人幸经放出，万彭马三人之事，还不知如何发落？

郑州此次虽无死亡工人，但因此次罢工失业者前后凡三百余人，军阀派兵作工，日益增加，现已增至八百余人，所有前在工会职员无一能在郑居住，大半亡命各处，力图恢复去了。

江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飞龙、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的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合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濡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呵！一时听众中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者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此种情形实为仅见。又哪知当时即有督军代表与洋资本家在租界正大开会议，准备做从未经见之大屠杀呵！

二月七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惟萧耀南方面屡次使其参谋长张厚生用网罗主要人物计，作种种诱骗，均被工会防绝，并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率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同时又闻冯沄渡江哀求萧以武力压迫罢工。萧吴间的电报日必数起。至七号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刻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非诚意的破绽，始终未以真姓名见告。后彼方又改方法应付，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当日五时半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亲自来会，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中途忽闻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期已到，重要人物定皆在此，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全副武装兵士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还击，计放枪在五排以外。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卫，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

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在工会前枪杀之后，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倾，军队又大肆抢劫，计福建街一夜连劫三次，工人家所有细小都被一扫净光，当时情形之惨暴，恐江水汉河亦当为之呜咽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杀掠的时候，有工友六十人悉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在内，被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问答者三次，张厚生即喝令兵士在数十被捕工友面前，将其"枭首示众"，悬首车站。如是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纲纪谨严，非真为劳动者利益而奋斗者，怎能如此！萧耀南通电，谓林取出手枪格斗而死的，这全然是军阀造谣欺骗国人的话，劳动者若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又何以军队方面亦无一人死伤？这是不待智者而辩的。兹将汉口某外报一段纪实的记载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布"二七"经过情形的急电汇录如次，该报说：

> 林君（按即林祥谦）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一起，此时张厚生召集警察分所长、车站站长、段长于车站内，并亲自提灯于七八十人中找出林君，回顾吴段长曰："此人是否工会长？"吴答言："是"。张乃立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林君不允，张乃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 张等听了大怒，未待林君话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君就此慷慨成仁了！
> 林君死后，他的父亲妻室同至车站收殓，张厚生不许，且加威吓，彼乃归家拿斧一把，再至车站，对张说道："如不许收尸，定以老命拚了！"张始不敢阻拦，天已夜半，工人家属始敢渐将受伤工人抬至车站医院，

该院又不尽为医治，厂长且宣言医药费不为工人负责，故伤重者多即时殒命，轻者亦成残废，统计先后被害的：斩首者一人，当场枪毙者三十二人，重伤抬至医院毙命者四人，残废者三人，轻伤者无数，小贩二人，拾粪乡人某甲并遭殃及，皆中弹而亡。（下略）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紧急电说：

各报馆转各工团、各商会、各农会、各省省议会、各学生联合会、各团体暨各界同胞公鉴：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乃民贼吴佩孚派遣军警任意将我工人之集会、行路、言论、居住、饮食种种自由，摧残殆尽。我京汉路工友三万余人为争生存，争人格，争约法上之自由，出于万不得已，乃有罢工之举。万恶军阀，不自省悟，不知忏悔，犹复电令萧耀南以武力压迫工人，萧狗竟于七日下午五时开拔全副武装之兵士千余名至江岸登陆，假约代表谈判，乃代表尚未出席，兵士立即包围工会开枪轰击，工人手无寸铁，任其屠杀，计刀杀四人，枪杀三十四人，中弹受伤命至垂危者，更不计数。事后反诬工人欲毁铁道，抢夺兵士枪枝，并以手枪射击军官种种罪名；又捏造事实谓有匪徒从中扰乱；又谓开枪格斗，当场互有伤亡；并谓夺获手枪多枝。此种骗赖诬妄之文告，不过淆乱人民之听闻，掩饰自己之罪过耳。殊不知当日之事，有目共睹，此种加罪之辞，其将谁欺？此万恶之吴贼、萧狗对于京汉铁路江岸工友残杀之实情也。昨今两日，迭接电告，谓京汉路长辛店之工友，亦被枪杀数百人；郑州百余人；其余如驻马店、广水等处，均各数十人。似此横蛮残酷，其肉尚足食乎？（下略）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

江岸惨杀发生后，武汉劳动群众莫不义愤填膺，常用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发出总罢工命令，为京汉工人的后援。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但不久即被军士挟制，强迫恢复工作；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后亦为军警围迫上工；有丹水池工人，宣布停工一日，以追悼江岸遇难工友；有扬子机器厂工人，后该工会被军警封闭，延至最后亦不得已而恢复工作。他如武汉电话工人，不许外出，遂不得逞。至此，潜在势力遂暂告蜷伏，但不稳状态，仍迭起不止。工团联合会一方面仍檄告该会所属各工人秘密组织以与军

阀对抗，檄文哀感沉痛，大足显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因此，人人知道湖北全省工友是要始终与军阀共命的了。檄云：

> 亲爱的工友们！连日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怎样对付我们，想必大家都已知道了。大队军警枪杀三十四个江岸工友，在长辛店、郑州、广水、驻马店、信阳州等处亦遭同样的惨劫。(死伤人数，尚待确实调查)。将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四工友枭首示众！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京汉江岸分会，香烟厂工会等八处会所。用军队捆绑江岸工友、粤汉工友及汉阳钢铁厂工友上工。通电诬陷我们工人为匪徒。封闭真报及检查各报馆、各印刷局，无端逮捕本会法律顾问施洋先生，我们工友被杀者二百余人，被捕去一百余人，中外官厅同时戒严，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如临大敌。这都是他们最近的德政呵！
>
>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明白了，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如果他们还存在，我们是永远被他们残杀的。我们从此更明白了，我们只向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要求或请愿是等于与虎谋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们的力量打倒他们呀！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受这样的摧残，京汉工人起而罢工要求，是不得已的举动，是必要采取的手段，我们湖北全省工友本阶级休戚相关之谊起而罢工援助，也是必要采取的手段，只可惜我们的实力还不够，我们的组织还不严密，所以使我们全体工友受偌大痛苦。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本联合会深知日昨各业工友因受敌人袭击痛哭流涕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联合会极希望我亲爱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知其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入厂工作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我们的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属各工会虽多被封禁，但是我们的心还没有死，本联合会的领袖及我各工会的领袖依然无恙，现在正在计划进行一切，我们已经派出代表到各处运动，要求全国各工团援助我们，而且这次运动是争集会结社自由之运动，不独是劳动阶级应该做的，也是各界应该都出死力做的，所以我们也要求各界援助我们，我们应立即鼓起勇气，继续大奋斗呀！我们亲爱的工友，从此还更应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拥护本联合会，因为

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残杀我们工友，本联合会便是出死力拥护我工友的。所有没有封禁的各分会仍然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如果军阀官僚再来封闭我们的工会，资本家再来破坏我们的工会，或开除各工友的领袖，各工会会员还要一样的和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奋斗呀！所有已被封的各工会仍然要秘密组织起来，团结一致，选派代表到本联合会来，是为至要。然有已被封而不能秘密组织的，应该由有勇气的工友不管多少人（即使三四个人）暗中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团体，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

亲爱的工友们！军阀官僚资本家杀死我们这么多的弟兄，我们能够忘记么？封闭我们这么多的工会，我们能够忘记么？我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我们工友有一个人存在，我们这次不共戴天之仇是必报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仇人是必要打倒的！我们仍然团结便是报仇争得自由打倒敌人的不二法门！亲爱的工友，如果我们纪念我们的死者，如果我们纪念这次耻辱，我们如何能够灰心呢？我们如何能够不团结呢？我们如何能够不服从工团联合会的命令呢？

我们只要自己能够振作不因以灰心；仍然结在一体，准有一天万恶的敌人，是会被我们打倒的。因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终归占极少数，如果我们百折不回团结起来，我们便能操得最后的胜利了！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互相誓约，我们宁可死，但是仇人是必要打倒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团结是更要拥护的呀！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二月十日

此时萧耀南坐卧不安，张惶万状，武汉空气，非常恐怖，萧遂开一特别会议，决议宣布特别戒严，戒严令凡九条：

（一）武汉三镇，应派军队全荷武装，执大令，轮流梭巡，如遇有碍治安之事，得随时干与；（二）凡通街要道，每晚应派武装军警，联络梭巡；（三）在此特别戒严期中，禁止人民自由开会；（四）关于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得随时收禁；（五）关于拍发邮电，凡有关治安者，得随时扣留；（六）在此特别戒严期中，晚十二点钟，无点灯者，不准通行；（七）武汉夜渡，以十一点钟为限；（八）各旅馆不准收居无妥保者；（九）在此特别戒严期中，各工厂之工人，不准集合会议。

此令一下，武汉市面，异常萧条，形势益趋严重，各租界召集义勇队防守，一时人心惶惶，若大祸之将至，但是这也不过是他们故意玩的把戏，萧耀南的

意思，便是要借这个特别戒严的机会，屠戮他心目中的仇敌。后来通令缉捕工团领袖及有关系者如杨德甫、陈天等共十七人。

先是律师施洋因曾为工联会法律顾问，萧耀南恨之入骨，于七日即将其逮捕，押之督军署。施为武汉劳动界领袖，年来尽力于劳动运动，毁家瘁身，毫无所惜。至使萧遂以运动罢工名义，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戕之于武昌。萧既害施，复驱逐其夫人及幼子出境，其残暴无复人理，真禽兽之不若了。

其他各站

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其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几遭枪毙，现已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否则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犹不屈，至今生死未卜。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往保定严刑拷打。偃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惜尚未详细调查，不能备说。

1925

1923 年的二七惨案迫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估能否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夺取权力。鉴于这场失败，共产党领导层不仅开始考虑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共同开展斗争，而在苏联顾问的推动下，他们更加重视孙中山的国民党，作为在民族革命阶段可能的伙伴。1924 年 1 月，这种和解推动了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中共的领导成员能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中担任要职，同时保留中共党籍。因此，共产党人能从之前的挫折中恢复过来，并在工农之中建立自己的力量。这场合作至始至终都非牢不可破，基本上是依靠孙中山的个人威望与苏联的压力维持的，苏联认为国民党是最有可能在中国成功发动民族革命的政党。然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下，为中国劳工运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首要案例便是 1925 年广州与香港的大罢工，这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从五卅运动到省港大罢工

梁宝霖（Apo LEONG）

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 年）[1]

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省港罢工委员会（1925 年）[2]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五卅运动与随后 1925—1926 年的省港大罢工在国共双方史书中都广受推崇。[3]这次罢工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广州的工会力量迅速膨胀，而广州则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进行管理。[4]可惜，短暂的蜜月期在 1927 年结束，国民党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清洗，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上海、武汉和广州，监禁残杀了数千名工人活动家，导致了中

---

[1] Frederick Engels. 184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available online at: 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condition-working-class.

[2] 邓中夏：《中国工人运动简史》，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 年，第 194 页。

[3] 例如，李伯元、任公坦：《廣東機器工人奋斗史》，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5 年。

[4] Wai-chor So. 1991.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国新兴的激进劳工运动的消亡（见本书中 1927 年 S·A·史密斯的文章）。一个世纪之后，本文将回顾中国革命工人阶级早年的贡献与磨难。

五卅运动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上海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也是外资的宠儿。由英、法、日等国控制的外国租界组成了上海公共租界，由自己的市政委员会（工部局）管理。出于战略考虑，新生的共产党于 1921 年 8 月在上海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协调劳工组织活动，包括夜校、刊物与对抗性的集体行动。

1925 年 5 月 15 日，由于劳资纷争，日资内外棉第七厂的资方人员关闭工厂，并停付工资。[5]在随后的冲突中，日籍主管殴打中国工人，年仅 20 岁的共产党人顾正红与他们发生冲突，被射中四枪，伤重不治身亡。这场事件激怒了上海的市民。中共立即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声援纺织工人，抵制日货，为顾正红举行公开葬礼。作为回应，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逮捕了许多工人、学生。为了反抗镇压，中共宣布在 1925 年 5 月 30 日举行公开游行。约有百名示威者被捕，近一万名抗议者沿南京路游行，抵达巡捕房门前示威。下午 2 点，一名英国捕头下令开枪，致使 13 人死亡，40 多人受重伤。[6]这场暴力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后被冠以“五卅运动”之名写入史册。

中共迅速召集当地所有工会进行紧急会议，并成立上海总工会。党与学生、商会一起，发起“三罢”——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抗议外国列强的暴行。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包括取消旨在控制民众骚乱的紧急措施，惩处捕头，赔偿受害人员，尊重中国工人出版、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中国公民在公共租界的平等权利。对此，列强增派了武装部队，通过更多的暴力手段扼杀大罢工。在一个月内，商团单方面决定恢复营业，总罢工被破坏，上海总工会不得不与外国雇主逐一谈判达成和解。

尽管历程短暂，但上海总罢工却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各省纷纷爆发了共计 135 次声援罢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省港大罢工。[7]

---

[5] 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下卷），北京：工人出版社，2016 年，第 100 页。

[6] 同上，第 101 页。

[7] 同上，第 110 页。

省港大罢工

自 1840 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便不能避免劳资纷争与阶级矛盾。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奋起反抗，要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例如发生在 1920 年的机器工人罢工与 1922 年的海员罢工。[8]香港早期的工会主要是同业行会、宗族或地方团体，以及黑帮组织。他们与中国大陆的工人，特别是广州的同行有着密切的联系。[9]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在流亡时期将香港视作革命基地，计划推翻清朝，并与码头工人、海员与机器工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帮助他走私武器，偶尔作为战斗人员被动员到大陆发动起义。孙中山鼓励按照组建现代化的产业工会——最显著的成就便是海员工会和机器工人工会。[10]

辛亥革命为华南的工会开辟了政治空间，而华北、华中地区则由不同的军阀统治，军阀是劳工运动的天然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华南劳工运动变得越来越激进并带上反帝国主义色彩。1925 年 5 月 1 日，代表 166 个工会的第二届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并立即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见本书中王侃的文章）。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播到华南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其他团体呼吁在 6 月 2 日于广州举行示威，并着手计划一次声援罢工。一个由香港和大陆的关键工会领袖组成的工作小组成立，准备举行一次类似于上海的大罢工——同时也吸取了先前香港机器工人和海员罢工的经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邓中夏、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等人被派往香港，以获得当地不同派别

---

[8] 关于这些事件，见李宝龙（由 Promise Li、Edward Wong 翻译）. 2019. ‘Hong Kong Political Strikes: A Brief History.’ *Lausan,* 3 August, available online at: lausancollective.com/2019/hong-kong-political-strikes-brief-history；梁寶霖、梁寶龍、陳明銶、高彥頤编：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1982 年；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讯出版社，2009 年；Joe England and John Rear. 1975. *Chinese Labour Under British Ru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Ng Sek-hong. 2015. *Labour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Alphen aan den Rijn, Netherlands: Wolters Kluwer; Jean Chesneaux (translated by Gillian Nettle). 1971.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0] 香港的机器工人工会名为香港华人机器总工会，而广东的姐妹工会名为广东机器总会。

的工会支持。[11]这一呼吁很容易就赢得了当地爱国华人社群，乃至黑帮的支持，最终的规模之大甚至让组织者都感到惊讶。

6 月 19 日，海员、电车工人与印刷工人打响了罢工的第一枪。同时，香港学生也开始动员起来。很快，西式企业的雇员、码头工人、煤炭工人、邮政工人、清洁工人、建筑工人、洗衣工人、食品工人、煤气工人和电力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队列——25 万名罢工者几乎占香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约占香港的半数劳动力。整座城市陷入瘫痪，连进出城的交通都被迫停止。

罢工委员会通过了一份由全港工团联合会发表的罢工宣言，分两大纲。[12]第一大纲表明罢工者支持上海的抗争及其诉求。第二大纲则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言论、出版、结社等政治自由与居住自由；罢工权与集体谈判权；法律平等，暂停驱逐处境或鞭笞处罚当地华人；普遍选举；涵盖 8 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事项的劳动立法。

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全力支持与保障食宿的承诺下，罢工者开始陆续返回广州或附近的农村。国民党左派也承诺每月向罢工委员会提供 1 万元的补贴。[13]废弃的房屋、赌场、妓院和船只被征用，改造为罢工者的宿舍、饭厅和办公室。6 月 21 日，随着对外国列强的全面封锁，3000 名中国工人集体离开沙面（广州中部一座小岛上的英法公共租界）加入总罢工。由于外国军舰停泊在附近，香港和沙面政府当局宣布实行紧急宵禁。

两日后，即 6 月 23 日，广州组织了一场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游行，参与者包括 10 万名士兵、工人、农民、学生与商贩。队伍沿着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游行时，外国水兵巡捕突然开火，造成五十二人死亡与一百多人受伤。

为了巩固罢工期间工人的权力，组织者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设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简称罢工委员会）。这个新机构被外国观察员称为“第二个广东政府”，因为它被赋予司法、法律与警察权力，拥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学校、医

[11] Kam-po Chan. 2011. ‘The Strik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20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aniel Y.K. Kwan. 1997.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2] 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下卷)：第 104 页。

[13] Kwa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25.

院、法庭、拘留所和刊物。[14]两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接受黄埔军校军官的训练，甚至控制着一支由 12 艘巡逻艇组成的“海军”，以防范走私贩运。在几次行动中，虽然装备薄弱，但这些战斗部队与驻港英军、海盗发生交火，有 120 名纠察员在执行任务时丧生。

罢工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共计 800 余名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15]每隔一日开会一次，会议过程对所有罢工工人开放。到 1926 年底，会议已经召开了 178 次。大会选出了一个由十三名成员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其中全总两人、香港工会七人、沙面及广州工会四人。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会审处、监狱、保管拍卖处、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另有纠察队、水陆侦缉队、罢工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

在罢工期间，组织者强调了培训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发行了一份名为《工人之路》的周报，发行量最高可达一万份。罢工委员会还为罢工工人的子女开办了八所小学，为工人开办了八所夜校，并开办了一所劳动学院，以培训激进的劳工活动家，类似于毛泽东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还为妇女和青年开办了专门的学校。[16]

维持罢工

罢工严重摧毁了香港的经济，导致了一波破产、银行挤兑、房地产市场与转口贸易崩溃以及船只滞港的风潮。香港在当时由于卫生工、清洁工等加入罢工造成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香港被讽刺为“臭港”。罢工导致香港每日损失七百万元，使得政府账户由盈转亏。[17]尽管殖民地统治阶级试图游说英国议会派遣军队击败广东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就像过去鸦片战争的美好时代所做的

---

[14]周奕：“香港大罷工對工會組織的影響”（2017 年），收录于《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回顧論文集》，周奕、伍錫康、梁寶霖、梁寶龍等人编，香港：香港社会保障学会香港工运史研究小组，第 85 页。

[15] Kwa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21.

[16] Robert James Harrocks. 1994. ‘The Guangzhou–Hong Kong Strike, 1925–1926: Hong Kong Workers in an Anti-Imperialistic Movemen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eeds, available online at: core.ac.uk/download/pdf/1145945.pdf.

[17] 邓中夏:《中国工人运动简史》，第 199 页。

那般，但英国政府此时正忙于处理日益严重的国内劳工问题。[18]伦敦当局仅向香港政府贷款 300 万英镑以弥补赤字。香港殖民政府只好继续观望，希望中国军阀能够打败革命政府，他们还试图资助并武装中国的反动势力以推翻革命政府，但这些势力很快就被新式的革命军队镇压。

为了维持罢工，罢工委员会决定将禁运限制于涉及英国利益的范围。不挂英国国旗、不运英国货物、不在香港停靠的船允许与广州贸易。这项措施促进了广东的贸易，因为商品不再经过香港。

1926 年 5 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有 699 个劳工组织参加，声称代表了 124 万成员。大会总结了上一年的劳工斗争，并公开呼吁发起北伐，打倒仍然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军阀势力，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随着 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爆发，所有的人力、财力、政治与外交资源都聚集起来支持这项事业。除了那些报名参军的士兵之外，还有三千名罢工者作为搬运工、医疗辅助人员加入北伐。许多著名的劳工领袖担任了新的政府职位，或帮助在新近占领的城市建立工会。到了 10 月，革命军占领武汉，并在那里成立国民政府，由苏兆征担任劳动部长。[19]1927 年 1 月，武装纠察队打破了英国人的路障，占领九江与汉口的租界。经过谈判，英国人宣告屈服。这项大胆而又自信的举动，为 1927 年春上海的武装起义铺平了道路。

罢工委员会和革命政府达成共识，认为统一中国是首要任务，因此，他们宣布暂停罢工。虽然许多罢工者返回香港寻找工作，但仍有约 3 万名罢工者留在广州；为缓解他们的困难，政府征收了 2.5%的特别进口税。罢工委员会又继续运作了几个月，在 1927 年 4 月国民党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统治后，被迫转入地下。1927 年 12 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导致许多罢工者因国民党的镇压而不幸丧生（见本书中亚历山大 · F · 戴的文章）。直到 1927 年 11 月，罢工委员会的招牌才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取缔——这一行为拉下了省港大罢工最后的帷幕。

---

[18] ‘Kotewall Report on the Strike of 1925’, available online at: grs.gov.hk/ws/rhk/eg/192-0.html; Tony Cliff and Donny Gluckstein. 1986. *Marxism and Trade Union Struggle: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 London: Bookmarks.

[19] Nym Wales. 1945.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NY: John Day Company, 211.

罢工后的景象

香港政府在镇压受挫的劳工运动方面并不比国民党慢多少。1927 年，政府匆忙通过了著名的《非法罢工与闭厂条例》，该条例与现有的《防止抵制条例》《紧急规例条例》并行。在此期间，至少有 15 个工会或劳工组织被取缔。根据 1926 年英国大罢工后实行的新模式，新法律旨在压制工会的非法活动，而不是鼓励合法的运作。[20]如果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劳资纠纷，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或社区的实质部分造成困难，从而胁迫政府，那么这些罢工就将能被宣布非法。该法还禁止公务员与基本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任何罢工行动。为了切断内地与香港工会的联系，法律规定任何境外的工会联合会或组织对香港工会的控制，以及将工会资金用于任何政治目的，都是非法行径。[21]另一方面，殖民政府试图将本地工会驯化为“面包和黄油”（指生计）或“可渗透”的工会，使其将重点转向纯粹的经济与生计利益，而不涉及政治问题，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政府成立了由工会和管理层代表组成的劳工咨询委员会，讨论劳工立法和相关劳工问题，但议程由官僚主导。殖民政府还试图利用文化攻势化解激进情绪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例如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补贴反共报纸，并授予中国精英阶层的成员政府职位。[22]

在香港警方与国民党同行合作的严密监视下，许多回港的罢工者与共产党员仍继续在香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随着白色恐怖在中国的展开，香港成为共产党人的避难和协调中心。时常有小股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militants）被动员起来，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或是高喊口号，最终都会被警察驱散或逮捕。警

[20] H.R. Butters. 1939. ‘Report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Noranha & Co. Ltd.

[21] Ng, *Labour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England and Rear, *Chinese Labour Under British Rule*; Petra Mahy and Ng Sek-Hong. 2015. ‘The Labour Law of Hong Kong: An Historical Account Arranged by Variables’, available online at: ssrn.com/abstract=2632119.

[22] Justin Chun-yin Cheng. 2016. *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ies: Chinese Mercantile Elite and the Canton–Hong Kong General Strike 1925–2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方的反共小组一次又一次在突击检查中国捕共产主义活动家，将他们驱逐回大陆，接受国民党的进一步迫害，甚至包括死刑。[23]

[23] Lau Kit-ching Chan. 1999.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Joe England. 1989.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虽然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劳工组织工作，但基层的劳工斗争仍有增无减。谢诺（Jean Chesneaux）的开创性著作《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于 1962 年以法语出版，该书将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27 年国共分裂的期间视为中国劳工运动的黄金时代——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成熟的阶级，追求更广泛且更有效的组织化罢工，这个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这段时期劳工运动的理解可能会因为过度关注这些工人动员的事例而走向偏狭。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新一代的学者开始挑战这种叙事。通过关注车间关系与工人的文化表现，他们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工人如何被因性别、籍贯、行业、客户网络、甚至秘密社团归属而产生的深刻分歧所割裂。正是基于这种思路，下文将带我们回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天津工厂之中。

天津工厂的日常政治

贺萧（Gail HERSHATTER）

1925 年 8 月 11 日，天津日资裕大纱厂新成立的工会向厂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提高工薪、缩短工时和为工会提供办公室等。管理层的回应并无详细记述，但是工人下白班后走出厂门准备去附近的院子开会时，发现当地军阀李景林派遣了百余名军警封锁了前路。工人立即举行罢工，并从附近的工厂调来了援军。他们把一些警察和厂保安队员追到纱厂院内，用镐头与警察搏斗，切断了电话线，捣毁了工厂办公室，砸碎了窗玻璃。《北华捷报》如此报道："棉纺机器在他们面前捣毁了，就像飓风中的木屋，几分钟之内就变成了一堆破烂不堪的被砸碎的机器、纱锭和碎片……"[1]据估计，裕大纱厂的损失超过 50 万两。第二天，军警在工人开会时伏击了他们，至少杀死了 10 人，打伤了数十人，许多人跳入海河中躲避子弹，超过 400 人被捕。李景林关闭了天津市华界的工会，并派警察监视外国租界的工会，乃至关闭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为征召和组织工人而建立的几所工人学校。这就是"砸裕大"事件的结局。[2]

对劳工史学家来说，"砸裕大"是一个颇有诱惑的事件。新兴的激进工人联合起来，反对一个由腐败的军阀国家机器支持的充满压迫的外国管理层。工人的愤怒是可以被听见、被看见，并留下了一堆书面记录。年轻的共产党人参与

---

[1] *North-China Herald*, 22 August 1925, 202.

[2] 除非另有注释，否则本文的信息均源自 Gail Hershatter. 1986.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砸裕大"事件及其后果，见 pp. 215–20 和所引用条目；另见董振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天津早期工人运动"，《天津社会科学》（1983 年）：第 89—93 页。

译者已在 Zlib 与 Libgen 上传了贺萧《天津工人》的中译版，有兴趣者可以下载阅读。——译者注。

了工厂内外的活动，将工人的骚动编织进更大规模的抗议、党建与工人阶级意识萌芽的叙事中。[3]

然而，尽管这种方式极具吸引力，但追溯激进的劳工骚乱并不是理解天津工人史的最佳方式，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起义的实例较少，且只涉及城市分散的劳动力中的一小部分。

无常易变的工业

天津，这个民国时期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罢工及与罢工有关的骚乱却十分罕见且短暂。由于政治长期不稳，天津的经济增长一波三折；工厂由无常易变的厂家管理，经常面临财务困境。1918 年到 1926 年，沿海主要城市发生动乱且进行工会组织的动荡时期，上海记录了 638 次罢工，而天津只有 14 次。直到 1928 年，历届军阀政权经常调用军队防止或镇压工人的抗议，工人领袖经常遭受殴打、拘留，有时甚至酷刑相加。

在南京政府成立的最初十年（1928—1937 年），国民党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建立强调政治培训的官方工会，确保劳工保持稳定并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市政府通过社会局试图调解劳资纠纷、防止罢工，并取得了一定成功：1928 年，天津有一次罢工；1929 年和 1930 年，每年只有三次罢工。1932 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纱厂开始倒闭，天津内所有中国人开办的纱厂工人都选择停工，为了防止减薪和裁员，工人们有时将自己锁在厂房内以避免被赶走。1935 年，由于工厂濒临倒闭，工人被迫采取越来越防卫性的姿态，向市政府呼吁恢复他们的工作，但未获成功。[4]大多数工厂后来被卖给了日本人。

---

[3] 有关中共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参与天津工人组织的最新中国研究，见王勇则：“天津造币厂工人运动点滴”，《党史文汇》第二期（2018 年）：第 53—55 页；缪志明：“老一代革命家与天津早期工人运动”，《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41—43 页；缪志明：“天津工运第一代主要负责人安幸生事迹集述”，《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第 31—36 页；缪志明、李耕：“普及劳工教育的先声：‘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第 50—53 页。

[4] 补充信息见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第八章“南京政府十年：改革、解雇和关厂”；另见丁丽：“民国时期天津产业工人劳动保障问题探析”，兰州学刊（2014 年）第 7 期：第 29—35 页；丁丽：“民国时期天津纺织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58—65 页；孟玲洲：“生存的抗争：劳资纠纷视阈下民国前期天津手工工人的集体行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第 117—126 页。

日占天津期间（1937—1945 年），工厂的劳动力规模开始扩大，但劳工组织被禁止，许多工厂由日本驻军监管，日本当局认为罢工是政治叛乱。20 世纪 40 年代初，太平洋战争耗尽了日本的军事资源，机器被熔化以制造战争物资，工厂再次关闭，工人们被迫苟且求生。

1945 年国民党重返天津后，恢复了由工头、熟练工人控制的官方工会，强调劳资合作，由政府调解劳资纷争，并限制工人的罢工能力。政府扶持的工会并不关注工资和劳动条件，但 40 年代末是天津劳资纷争的短暂高潮。与前几十年相比，工人的年龄更大，不太愿意在工厂和原籍地之间来回流动。而此时的国家机器已经疲软，对劳工活动的约束力较弱。共产党组织者——首次包括妇女干部，她们在动员女磨工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在棉纺厂和毛纺厂，建立了稳定的根基。在通货膨胀、间歇性戒严、政治镇压与内战的紧急状态下，工人为提高工薪、停止裁员并支付遣散费而发起斗争，取得的成果却比较有限。最终，工人阶级的抗议，面对中共的解放军 1949 年 1 月攻克天津而言，意义十分有限。

工人阶级的分化

第二个原因前文已经提过，天津的劳动力比较分散，劳工运动只能部分解释天津工人历史，更多工人从未经历过任何形式的公开骚乱。1929 年，超过 40%的天津工人从事铁器加工、地毯织造等手工行业。其中许多人是十几岁的无薪学徒，通过亲属或家乡关系与店主进行联系。在仓库和工人的家里，临时工与散处工糊火柴盒、剥核桃、纺毛线、编席子，经常更换工作。大多数在天津工作的人来自农村，每年或每当工厂因经济困难而解雇他们时，他们就回到村里。在整个民国时期，他们都是城市里的临时居民，很少参与工厂的组织运动。搬运工和人力车夫比其他工人更有可能是天津本地人，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并没有导致基于阶级的行动。他们的世界被划分为由脚行控制的区域，并由工人和脚行把头之间的垂直联盟所维持。

即使是天津最具组织、最激进的纱厂，劳动力同样不稳定，而且源头繁多，限制了劳工的斗争性。例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儿童占纺织工人的四分之一以上，尽管童工的比例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所下降，但在日占期间又上升到

纱厂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5]天津与上海不同，上海的妇女在 20 年代中期成为纱厂劳动力的大多数，而在天津，女工在 1929 年的占比不到 10%，直到在日占期间才上升到 39%，在 40 年代后期仅一半不到。[6]当然，儿童与妇女不一定就很安分，但厂方雇用他们就是为了寻找廉价且容易控制的劳动力，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纱厂内动员他们必须要有不同于以成年男子为中心的网络和战略。

在这种由无常易变的工业家与零散的工人阶级组成的、充斥着暴力的政治环境中，工人的组织与罢工是零散的，难以成功且充满危险。过度关注劳工行动或中共领导的片段，必然会忽略工人在天津工业中经历的大部分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应对那些对他们来说不同寻常的情况。一个更全面的劳工史研究必须抵制“劳工行动时间表”的诱惑，而是关注在极端不稳定的环境下那些寻求生存、试图发展的日常政治。正如本 · 克尔弗列特（Ben Kerkvliet）写道：“日常政治，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并挑战那些关乎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与规则，并以克制、平凡且微妙的表达与行为来实现这一切，这些表达与行为很少是有组织或直接的。”[7]

日常政治的模式

在日常政治领域，与斗争的劳工运动不同，小规模作坊和机械化工厂的工人之间有着相似的共性。在三条石铁厂和机器制造厂，男孩和青年通过家庭或家乡的关系得到雇用，通常是为亲戚工作。在纱厂，工人同样作为亲属关系或籍贯网络的一员进入其中。这种网络涵盖工人，也包括工头，他们可能会把工人带到特定的车间，并为他们提供保护。一旦进入工厂，有些工人会结成额外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通常是按性别分开，并且常常是秘密的：男的结拜兄弟

---

[5]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53.

[6] Ibid., 55.

[7] Benedict J. Tria Kerkvliet. 2009. ‘Everyday Politics in Peasant Societies (and Our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 no. 1: 227–43, at p. 232. On everyday politics, see Michael Szonyi. 2017.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9. Important to both of their conceptualisations is the classic work of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或加入青帮，女的结拜姐妹或形成宗教团体。[8]拜盟兄弟在工厂里会相互照应，有时也会一起喝酒、看戏，参加婚礼和葬礼。盟兄弟有时会与自己工厂内外的帮派发生冲突，使得男工与其他工人发生暴力纠纷。结拜姐妹并没有规范或显眼的组织形式，包括教派成员的身份，都很少被历史记录所记载。

日常政治中，工人往往会利用这些关系网络采取克制或隐蔽的策略，与传统认知中劳工运动公开对抗的鲜明历史形成对比。无论工厂规模大小，疲惫的工人都会采取一种在当地俚语中称为“泡蘑菇”的策略，就是怠工的俗称，在日占之前与日占期间都很常见。工头没有在场盯着的时候，三条石的铁工与纱厂的工人会在机器旁打盹，甚至完全关闭机器。有时，“泡蘑菇”是公开的政治行为，例如 1947 年，铁工为了回敬管理层阻止他们组织工会，而采取怠工。“泡蘑菇”通常是一种自发的车间策略，但需要工人之间高度的协调。常见的做法有很多，例如在机器皮带上抹油让机器转得更慢，用刀割断机器皮带以便在厂方修复机器时休息，溜去厕所抽烟，派人警戒，工头靠近门的时候挥舞一块布，或将纱轴丢进车间。

天津工厂里的日常政治还包括从工厂里拿走一些自己生产的东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看，就是偷窃。在日占期间的末期，纱厂工人常把纱线塞进他们的衣服和饭盒里，倒卖给厂外的人，以填补越来越低的薪水。个人的偷窃行为也很普遍，工厂主则加设层层检查，甚至在工人离厂时进行搜身。然而，就像“泡蘑菇”一样，最有效的偷窃需要组织：放哨，协作将纱线取下来，男工将纱线给女工，让她们藏在贴身衣物里，用报酬许诺买通保安，让他们在搜查时轻松放行。管理方很快就竖起割板，挡住工人的脸，但工人会在袜子或鞋上做记号，厂外面的人收购了这些盗出的纱线，然后卖到乡下。每个参与者都得分利润，工人并没有因为偷窃而富裕，但他们至少将收入提高至勉强维持生计的边缘，冒着被殴打、被解雇、被监禁甚至被性侵的风险。

---

[8] Green Gang membership was common among the foremen in large factories, and Hong Bang members were also active. Swearing allegiance to a foreman as one’s elder in the gang could provide a worker with a powerful alliance; in the 1940s, it was estimated that 80 to 90 percent of the male workers in Tianjin cotton mills were gang members.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172.

政治议程

这些社会网络与活动即使最初与劳工组织没有关联，也会被用以推进政治议程。例如，在日占期间，华北的共产党根据地急需日本人封锁的物资，包括纸张、油墨、盐、糖、金属、医疗用品、火柴、卷烟、煤油、煤炭、机器及机器零件，以及通讯所需的电子管、电容和电阻等。晋察冀根据地（包括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的部分地区）派人到天津购买这些物资时，他们与机器工人、职工和各工厂的工人合作，伪造文件并采购物资，藏在双层底船、粪肥车下或运煤车里，然后将这些物资偷运到根据地。[9]日本人在天津附近建造中国北方最大的发电所时，低薪的工人把里面的东西都给偷运走，从成批的紫铜到透平油的瓶子。有两名锅炉工人剥掉了备用电缆的铅皮，偷偷带出工厂。两顿的四楞铁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到中午日本监工回家吃饭，工人们纷纷聚集在工厂的维修车间，将铁棍、铜板还有其他可以带出工厂卖掉的东西裁割。在这些行动中，服务于生存的日常政治与刻意的政治破坏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10]

车间网络的日常政治也使劳工组织成为可能。1925 年夏天被“砸”的裕大纱厂，是在共产党在春夏季密集组织活动的高峰过后，最后一个成立工会的天津纱厂，基于家庭和籍贯网络突破了阻碍。裕大纱厂被日本管理方与总工头兼青帮成员赵魁高紧紧控制。其他厂的工人提议，共产党活动人士李培良可以利用裕大厂内的家族网络：厂内一个名叫项瑞芝的工人与他的三个兄弟，以及他在工厂一个食堂里做饭的父亲。他们被称为“项家五虎”，与许多裕大里工作的宝坻县老乡有密切联系。李培良跟项瑞芝讲，“裕大纱厂的工会组织不起来听说是害怕赵魁高”。项瑞芝满脸通红，发誓他可以把厂里组织起来，几周之后，他得到了他的父亲和多数兄弟的支持，他将他父亲的食堂作为公开谈论工会和工人报名的场所。家族网络激发了工人组织，通过籍贯，成为建立工会的前奏，最终导致了“砸裕大”事件。

二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的女性组织者在天津的纱厂与毛纺厂找到工作，开展地下组织活动时，她们让自己融入女孩和妇女的午饭时间的休闲活动中，

---

[9] 天津市总工会研究室编辑整理：“抗战时期天津工人群众冲破封锁为根据地输送物资”，《工会信息》（2015 年）第 29 期：第 31—35 页。这篇有趣且详细的文章并未给出来源。

[10] 天津市总工会研究室编辑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天津电业工人的反抗斗争”，《工会信息》（2015 年）第 35 期：第 36—37 页。这篇文章与上条注释一样，未给出来源。

教她们认字，给她们讲故事、唱京剧。慢慢地，通过这些看似与劳动条件无关的活动，他们逐渐建立起一张网络，用以表达工人对工资与官方工会的不满。尽管女性被排除于一些可以用来动员男工的网络之外，但她们可能比男工更少受到强大工头的约束，因此更容易被组织起来。

当工人在工厂中形成了多种“克制、平凡且微妙”的表达与行为时，并不一定是被共产主义甚至工会组织所吸引，也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形成了新兴工人阶级觉悟的认同。诸如“泡蘑菇”、偷窃或有组织的走私等活动，以及被我们认为是工运史上标志事件的示威、暴动与罢工，并非整齐排列于线性的连续上。正如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述，天津工人有时会“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11]但他们建立的网络可以被用来确保跨阶层的保护，也可以被用来建立变革的联盟。劳工运动以偶然且不可测的形式发展，因而工人创造了一种工厂的日常政治，为改善天津工人的困难生活条件提供了可能。

[11] E.P. Thompson.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NY: Vintage, 9.

这句话的后半句是“阶级就产生了。”——译者注。

1925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劳工组织方面的成效达到了顶峰，他们组织了多次全国劳动大会，试图汇聚各种政治色彩的工会，寻求斗争的共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 1922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举行，来自 12 座城市 200 个工会的 160 名代表参会，据称代表了约 30 万名工人。[1]大会上，隶属于中共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委任为中国劳工运动的协调机构，直至建立真正的全国性工会——有些人认为这项决定是中国开始领导中国劳工运动的分水岭。[2]又过了三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 1925 年 5 月召开，代表 50 多万工人共 230 名代表出席，旨在建立中国劳工运动的全国性伞形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3]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历史漫长而曲折，但至今仍然存在。本文将从中共当年的战略出发，反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的意义。

---

[1] 这些数字，见 Fang Fu-an. 1931. *Chinese Labour: An Economic and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 Labour Conditions and Labour Movements in China*. Shanghai: Kelly & Walsh. 邓中夏提供的数字有些不同，“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百余工会，二十七万会员”，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 年)，载于《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 Daniel Y.K. Kwan 1997.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 1894–1933*.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32; Chang Kuo-t'ao. 1971.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36.

[3] Fang, *Chinese Labour*, 68–70. Even in this case, Deng's figure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He mentions 281 delegates for 540,000 workers. See De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王侃

1925 年 5 月 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在广州成立，下属有 166 个附属工会，包括 54 万名会员 [1]，旨在组织中国工人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斗争。全总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涵盖所有“真正的”工会的伞形组织，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标志。[2]

全总的成立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苏联推动全球共产主义的国际机构，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提供军事顾问、武器和资金。这一政策的动机便是，苏联领导层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的工人运动才能加速中国革命，才能更好地满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远东的利益。

共产国际影响下的联盟，使得全总并非完全隶属于中共。相反，全总是作为一个平台协调工人中包括非党派人士的不同力量。[3]“党团制度”被引入了这个可以被视为“非宗派”的组织中。在这种制度下，全总中的中共是作为一个社团主义式的机构，在不同派别中以民主的方式代表自身的利益，而非通过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导全总的决策过程。[4]然而，这种分享权力的安排有先例可循，苏联的布党已在工会与其他群众组织中实施了党团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牺牲了自身在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主导地位，以换取建立更广泛的劳工运动的机会。

---

[1] 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 年：第 94 页。

[2]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 5 册）》，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第 305 页。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381 页。

[4] 马学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渊源与演变再考察”，. 2016.‘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渊源与演变再考察，《学术交流》（2016 年）第 2 期：第 144—151 页。

变化的工人动员策略

地方风俗、宗族文化以及地区经济差异对早期中国工人的组织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于大型工厂很少，大多数工人都在中小型工厂工作；他们缺乏阶级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关心眼前的物质利益，而不关心劳工权益或工会组织。[5]为了克服这种分裂，中共必须建立一个持久而广泛的组织结构，并发展复杂的动员技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21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人组织部门（见本书中林春的文章）。

中共决定在某一地区或公司成立工会时，会任命一位特派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特派员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个决定拥有最终决策权。尽管这种组织模式是为在压抑的环境中秘密动员工人，但最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派员的才干。[6]一系列失败的组织尝试，包括 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发起的二七大罢工受挫，以及安源工运取得初步成功后的挫折（见本书中罗章龙、裴宜理的文章），使得共产国际和中共意识到这种动员策略的缺陷。[7]因此，必须进行制度上的调整和改进。

首先，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领导层承认，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他们需要形成一个工人、农民、妇女与青年运动的联盟，以建立一支革命的力量。[8]中华全国总工会则反映了这一新战略。与中国主流学者的观点，即全总的成立代表中共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全面领导相反，全总的成立意味着中共承认了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派别政治，并为所有行动者提供了一个渠道，以提出与劳工斗争相关的诉求或关注。[9]换句话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战略举措，表明中共愿意与中国工人运动

---

[5] 彭南生：“权重还是利重：1922 年上海银楼业罢工风潮的取向”,《浙江学刊》（2002 年）第 2 期：第 53—60 页。

[6] 马学军：“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社会》（2017 年）第 2 期：第 193—215 页，见第 212 页。

[7] 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卷）》：第 88—92 页。

[8] 袁士祥：“中共四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实现群众路线思想的新飞跃”,《炎黄春秋》（2016 年）第 12 期：第 20—24 页。

[9] 见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袁士祥，“中共四大”；张曼：“历史的召唤：中华全国总工会诞生的前前后后”,《工会信息》（2015 年）第 5 期：第 40—43 页。

中的所有派别合作，而非宣布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合作者包括国民党与进步的黑帮头目，他们可以将传统的共产党指挥链框架转变为不同的派别制度，从而民主地参与决策，而中共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国共合作的直接结果，我们也能看到全总执行委员会的中共成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的劳动部门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共产党的劳工组织者开始尝试与黑帮头目接触。中共组织者在安源时已经意识到黑帮头目在工人组织中不可避免的重要性。黑帮是中国下层社会对贫穷和剥削的一种社会性回应。二十世纪初，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整个中国。在上海，尽管工人表面上的最低工资是农民的三到七倍，80%的上海居民生活仍然贫困，几乎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10]黑帮为入帮工人提供了集体保护与福利的网络。由于这些原因，当时 80%以上的中国矿工都属于各种黑帮。[11]此外，黑帮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结构嵌入工厂中。[12]公司通常会将劳动力外包出去，而黑帮的头目往往既是包工头，也是车间的工头。

为了将工人联合起来，中共需要了解黑帮的运作以及招募的方式。[13]为此，邓中夏和李立三等高级领导人，与青帮、洪门等黑帮进行接触，甚至加入了黑帮。中共利用这种方式骑劫黑帮结构，并在工作场所中建立党组织，从而将黑帮改造成现代的工会。[14]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使用类似的动员方法来操纵黑帮的影响力。[15]

---

[10]熊月之："近代上海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史林》（2018 年）第 6 期：第 99—103 页，见第 100、102 页。

[11]马学军："把头包工制：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雇佣和生产方式"，《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102—122 页，见第 112 页。

[12] 同上；傅春晖："包买制：历史沿革及其理论意义"，《社会学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89—217 页；周建超：《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3] 周建超：《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

[14] 同上；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组织结构

共产国际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设计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最高权力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一名委员长和三名副委员长领导。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由执行委员会决定，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二十五名委员组成。

1925 年 5 月，由中共下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选出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国共双方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也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揭开了序幕。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都是男性。著名的中共劳工领袖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但不到一年就因病离职（后于 1927 年 9 月去世）。三位副委员长是刘少奇、邓培和郑绎民（别名郑泽生）。林伟民患病不能工作后，曾在 1922 年安源罢工中脱颖而出的刘少奇（见本书中裴宜理的文章）一跃成为中总代理委员长。此后数十年间，刘少奇一直活跃于中国工人运动中，也在中共的官僚机构中步步高升，最终在 1949 年后成为中共副主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被拖入与毛泽东的权力斗争中，并在 1969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暴毙。

刘少奇在全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中的另外两位同事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当选为副委员长后，邓培成为工人武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他还担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的职务。作为一名中共党员，邓培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入了国民党，以加深两党之间的联合。1927 年的分裂后，国民党的军队突袭了全总在广州的设施：邓培被捕并于同年被处决。郑绎民担任全总副委员长仅一年，他的名字就从执行委员会中消失了，关于他的去向知之甚少。

尽管领导层有所波动，但全总有着明确的组织结构。一个由执行委员会直接监督的干事局，人员由执行委员会直接任命。干事局下设四个部门：组织部负责工人的工会工作；秘书部负责行政事务；宣传部负责公共关系和工人教育；经济部负责会计和财务。此外，根据 1925 年通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执行委员会可以设立特设办事处与特别委员会（及特设机关），以便展开工作。[16]这些特别机关是为了应对劳工组织所需的保密性。在实践中，这些机关为执行委员会开辟了可以绕过全总的合法渠道并进行秘密行动的空间。

[16] 见 192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第二章组织的第 12、13 条。

中共对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使其在全总的民主决策过程中具有优势。全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当选的二十五名委员都是中共党员。尽管全总执委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是国民党员，但与国民党相比，中共党员更有纪律性，能够更好地在全总与国民党内部施加影响力。事实上，共产国际秘密地要求中共监控国民党的活动，并阻扰任何国民党人与反苏力量勾结的企图。[17]

不信任与冲突的加剧

成立全总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他们试图促成国共合作，对抗军阀政府，以此扩大苏联在华利益。[18]通过在全总内部引入党团制度，中共与共产国际表明他们愿意与劳工运动的不同派别分享权力。然而，还有着其他目标在推动。中共领导层公开采用这种制度，希望能够暗中降低国民党与黑帮的怀疑，从而确保中共能够在主要的工会与工人组织中建立党组织。

中共内部的高层工人领袖，热衷于将全总作为一个平台从而加强中共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他们认为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是一种战术手段，可以将国民党领导的工会转变为中共的附属机构。

将国民党领导的工会转变为中共附属机构的战术举措。用 192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第一任总书记邓中夏的话说，党团制度是一种在工会中扩大共产党影响的方法。因此，全总始终把动员工人反对政治与经济现状放在首位。[19]

随着劳工运动的激进化，黑帮头目很快就对全总领导的运动感到不满。由于全总加快了工人斗争的步伐，国民党领导层开始将共产国际与中共视作对手，逐渐对如同被胁迫着与中共开展的合作感到不满。一场激烈的冲突一触即发，最终在 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势力在黑帮的协助下屠杀了上海的工人与中共的劳工组织者（见本书中 1927 年 S · A · 史密斯的文章）。在 1925 年

---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577—578 页。

[18] “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载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60—62 页；以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第 65—75 页。

[19] 邓仲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511—513 页。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四名委员长中，只有刘少奇活着见证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27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分裂愈发严重。国民党高层担心，中国共产党利用两者的合作趁机扩大队伍，此外，国民党基层对中共在农村地区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所引发的暴力行为越来越感到不安。尽管存在这些紧张关系，但 1926 年 7 月，国民党在新合作者的支持下，发起北伐战争，希望击败控制全国大片地区的军阀势力。城市与农村群众积极动员，这场军事行动十分成功，11 月下旬，国民党已在武汉建立了由党内左派主导的国民政府。上海将是下个目标，而当地工人正遭受物价快速上涨的困扰，1927 年的前几个月，这座沿海城市的工会惊人地开始复苏。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曾于 1925 年被关闭、却仍在地下存在，如今会员人数激增，并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势，于 2 月 22 日至 23 日和 3 月 21 日至 22 日在上海发动了两次起义。随着国军逐步逼近，3 月 21 日，上海总工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以摆脱控制军阀控制。虽然起义迅速胜利，上海总工会立即成立了临时市政府，宣布支持武汉国民政府，但国党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随后发生了一场屠杀，第一次统一战线也随之瓦解。

第三次武装起义与上海大屠杀

S·A·史密斯（S.A. SMITH）

1927 年 3 月 22 日，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列强殖民的物质象征中心——上海，工人通过三罢（罢工、罢课、罢市）与学生、商人在一次起义中短暂地掌握了权力，击败了控制上海的军阀势力。“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史上一个英勇篇章，彰显着上海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雄心。然而，工人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包括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的中共组织、国民党内部权力倾轧的中心、控制上海大片街区的英法当局，工人、学生、资本家以及商贩之间不安的互动，以及共产党主导的工会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后者可以通过宗族与籍贯关系实现跨越阶级团结的联系，从而施加影响。[1]然而，必须要在军事与政治权力迅速变换的背景下，才能解释工人起义的历史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残酷镇压。

动荡的上海

第三次武装起义发生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背景下，北伐的目的则是击败地方军阀以及北方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从而统一中国，并希望削弱外国势力的影响。北伐始于 1926 年 7 月的广东，到了 1926 年 12 月，党内左派在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击败或收编军阀后，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得以动员农民、工人、妇女，推动社会经济改革的纲领。这加强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

---

[1] 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见 Alexander Pantsov. 2000.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Richmond, UK: Curzon. On Shanghai workers, see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基于作者 2000 年著作的第八、九章，*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 Curzon, UK: Richmond. 更多细节与论证可以见此书。

力，以及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都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对统一战线的反感。蒋介石拒绝承认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分裂似乎迫在眉睫——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避免。

随着国民革命军向上海挺进，共产党人开始准备起义，希望击败控制上海地区的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他们希望在国民革命军到来之前实现这一目标，从而加强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左翼力量，并确保将来的国民党政府能在上海实行广泛的民主与社会经济改革。这就是 1926 年 11 月第一次武装起义与 1927 年 2 月 19 日至 22 日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目标，尽管这两场起义“名不副实”，但却极大提高劳工组织的影响力以及国共两党在上海的声望。根据共产国际主张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共试图让国民党左派参与起义。然而，对于被派去与中共联络的国民党老人钮永建而言，劝说孙传芳加入国民革命军比对规划起义细节更符合他的胃口。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之后（见本书中梁宝霖的文章），上海总工会被关闭。然而，许多工人将到来的蒋介石视作国民革命的化身，再加上左翼活动家的积极努力，第二次起义期间，工人的斗争情绪高涨。在为期四天的罢工中，近 6000 家企业（包括许多小企业）的 420970 名工商界雇员停工——比五卅运动的罢工人数还要多。[2]许多罢工者在中国企业工作，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家对罢工的财政支持比 1925 年要少得多。[3]总工会未能取得合法地位，但设法建立了一支纪律涣散、武装不足的工人民兵的雏形，与罢工和示威期间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存在一定区别。

策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随着劳工组织的激增以及国共两党成员的快速增长，中共中执委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彼时国民革命军正位于上海以南约 100 公里的嘉兴，但人们

---

[2] 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上海：中华书局：第 52 页。这意味着 70%左右的正规就业工人，1928 年为 60 万，其中约一半在现代行业中工作。见 Alain Roux. 1970. ‘Le mouvement ouvrier à Shanghai de 1928 à 1930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Shanghai from 1928 to 1930].’ Postgraduate thesis. Sorbonne, Paris, 11, 45.

[3] S.A. Smith.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预计它很快就会进军沪上。此外，在 3 月初，孙传芳的驻军被北方的军阀部队替代，这支部队深受上海市民之厌恶，尤其是上海商界，他们知道这支部队的山东军阀张宗昌治下，发行了大量没有担保的纸币。这为工人、学生和商人之间的重新结盟创造了一丝可能，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希望上海建立自治政府。

2 月 23 日，中执委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以加速起义进程，他出席了 31 次会议中的 30 次。[4]特别委员会注重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工人民兵组织。12 月下旬到达上海的周恩来领导了一个新的军事委员会，苏联军事顾问 A. P. Appen 负责训练民兵。据周恩来所说，到了三月的第二周，共有 1200 名志愿者参加“工人突击队”，尽管他们只有 250 支手枪与 200 枚手榴弹，仅一半人接受过军事训练。[5]特别委员会还强调解释起义目的的必要性，结果是成立了 1270 名学生组成共 154 个宣传队以及 205 个直接向国民党上海局负责的宣传队。[6]

中共内部的权力界限模糊不清。总部设在法租界的中执委接到了迁至武汉的命令，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主要成员更想留在上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上海的代表是远东局，其成员大多年轻，缺乏经验，对中国了解甚少。就像中执委一样，随着事件的迅速发展，莫斯科的代理人无所适从，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信任远东局局长格里戈里 · 维经斯基（Grigorii Voitinskii）。维经斯基本人是鲍罗廷的批评者，他指责鲍罗廷将过于集中且专断的结构强加给国民党。中执委与中共上海区委、上海总工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使得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就统一战线而言，上海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国民党左派在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中相当强大，但 2 月 27 日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由反对统一战线的右派主导。中共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避免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因而要避免对蒋介石进行任何的公开批评。导致两党冲突激化的关键问题就是打倒北方军阀后在上海组建的政府性质。中共希望看到一个市民代表大会，由民选市政府向其负责。上海区委认为，这样的政府应该尽可能像苏维埃那样，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点。被派去与中共联络的国民党老人

---

[4]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5] A.A. [Appen]. 1930. ‘Три шанхайских восстания [Three Shanghai Uprisings].’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Problems of China*], 79.

[6] “学生运动与三次武装起义”，载于《上海工运史料》1987 年第 2 期：第 44 页。

钮永建认为市民代表大会中给予工人多数票并让市政府对其负责的提议“莫名其妙”。国民党坚持要求新成立的市政府必须要接受国民党的“委任”。[7]

起义

3 月 18 日，国民革命军将领白崇禧的部队抵达上海以南约 30 公里的松江。于是中执委特别委员会决定，在 3 月 21 日（星期一）开始罢工暴动。3 月 16 日，上海总工会重新提出了第二次起义时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并在上海建立人民民主政府，保护人民权利与罢工权，建立工人保卫武装，制定安全法规以及提高工资、改良劳动条件等。[8]3 月 20 日（星期日）晚，上海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有 300 名代表参加，其中约一半为共产党员。[9]会议批准了特别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并同意在第二天举行罢工。[10]

3 月 21 日正午，三罢准时开始。几小时内，上海就陷入停滞。工会派人到全市各区宣布国民革命军即将到来——上海报纸在军阀的控制下被禁止报道这些消息。国民党的旗帜和口号随处可见。商店关门，约 20 所大学的学生罢课，学生宣传队忙着呼吁商人和工人支持罢工。[11]上海总工会估计约有 20 万名工人参与罢工。[12]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从停泊在河中的三四十艘外国军舰上陆续派出军队登陆。《申报》称，有 80 万人停工，休业或罢课，以示支持国民革命军。[13]事后的估计称，约有 30 万工人罢工，4000 家企业停业。[14]北方军阀被打倒后，3 月 23 日，总工会呼吁复工，但坚持反对解散武装。

---

[7] 许玉芳、卞杏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年：第 58—59 页。

[8]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 1921—1927》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 年：第 378—389 页；《中国工人运动史料》1981 年第 4 期：第 42—43 页。

[9] 许玉芳、卞杏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221 页。

[10]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京：社会调查部，1928 年，第二章：第 460—461 页。

[11] 许玉芳、卞杏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66 页。商人只支持“休业”，而非“罢市”。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54 页。

[12] 《申报》1927 年 3 月 22 日，第 9 页。

[13] *North China Herald*, 23 April 1927, 174;《申报》1927 年 3 月 22 日，第 11 版。

[14]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第 29 页；也有称共 6000 家、420970 名工人参与了 1927 年 2 月的大罢工。

3 月 21 日下午 1 点，工人纠察队在各自的阵地上开始行动。许多人在工会的授权下行动，而非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下。虹口区没有军阀部队，所以是第一个落入纠察队手中的地区。杨浦区，纠察队的组织薄弱，严重依赖秘密结社，但遇到的抵抗也最小，驻扎当地的 15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拒绝干涉起义。[15]南市的战斗比较激烈，因为当地是上海兵工厂、江南造船所和吴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所在地，驻扎了 2000 名市警中的三分之一。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聚集了 139 位护卫，但他们只有 5 支手枪和 40 把斧头。然而，随着兵工厂解放，掌握大量武器后，警察与军阀部队很快就放弃抵抗。最激烈的挑战在闸北，那里驻扎着张宗昌的 3000 名主力部队。他们装备精良，拥有机枪、重炮和装甲车等装备，集中在北站周围。而那里的纠察队，主要由印刷工人、邮政工人、电工和铁路工人组成。

各地的工人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而复旦、上海以及暨南大学的学生、商人民兵也参加了战斗。[16]值得注意的是青红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对不久的将来起到重要意义——他们向白崇禧和国民党右派表示效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红帮“峪云山”堂堂主、青帮“大”字辈的徐朗西领导的一支部队，徐朗西曾参与辛亥革命。[17]在战斗过程中，起义方三次派使者到白崇禧那里，请求他立即进城。[18]白崇禧一再推脱，然而，第三次派使者请求后，第 26 军第一师的广东籍师长薛岳拒绝继续袖手旁观，白崇禧不得不下令三点钟进城。[19]薛岳率军经英国士兵占领的杰斯菲尔德车站，自铁路环线抵达闸北。下午 5 点左右，他们与约 800 名纠察队（许多人仍未配备武器）终于占领北站。在解放城市的过程中，至少有 200 名起义纠察队被杀，1000 人受伤，这还不算军阀部队的伤亡。[20]

---

[15] 许玉芳、卞杏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221—222 页；《上海工运史料》1987 年第 2 期：第 34 页。

[16] 周尚文、贺世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56、183 页。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61、82 页。

[18] A.A. [Appen], ‘Three Shanghai Uprisings’, 84; Brian G. Martin. 1996. *The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6.

[19] 许玉芳、卞杏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71—72 页。

[20] 这是上海总工会于 1927 年 4 月 15 日提交给武汉中共中执委与国民党的数据。《民国日报》 1927 年 4 月 21 日。

3 月 22 日上午，兴高采烈的市民代表大会为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欢呼，并通过了一份由国民党拟定共 19 名成员的临时市政府名单。下午，50 万人涌入南市的公共场所，欢迎途经城市的两万名国民革命军部队。3 月 26 日，又举行了一次大型机会欢迎蒋介石到来。虽然市政府于 3 月 29 日就职，但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政治压力意导致商业和行业代表拒绝就任，因为市政府中存在着大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不过，3 月 27 日，上海总工会被合法化，并宣布隶属于它的工会数量从 1927 年初的 187 个增加到 502 个，同期隶属会员从 76245 人增加到 821280 人。[21]然而，左派和右派发生激烈冲突的关键问题是工人民兵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白崇禧决心镇压这支不受约束的力量，有消息称中共与上海总工会正在考虑将罢工暴动扩大到公共租界时，国民党高层中出现了愤怒的声音。

大屠杀

蒋介石抵达上海后第一个会面的人物便是黄金荣，他是法租界的巡捕头目，也是青帮“三大亨”之一。他们商定，由青帮在秘密结社中组建一支部队，取名“公进会”，用以清算工人纠察队。中共一直试图与青帮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后者在上海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就连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都是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弟子。然而，中共和总工会主席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和杜月笙的密谋所带来的威胁。4 月 1 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抵达上海，使得政治局势更加混乱，因为汪精卫说服陈独秀发表声明，确认联合阵线的不可侵犯性。然而，中共内部的情绪却是，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决定无视执行委员会的命令，隐藏所有武器。似乎正是这一抗拒命令的行为导致他在 4 月 10 日被武汉的中执委撤职。

4 月 11 日（星期一）晚，汪寿华应邀与杜月笙共进晚餐，后被人打晕，用麻袋捆绑起来，被残忍地活埋。这是当晚行动的第一幕。在公共租界巡捕的配合下，500 名戴着印有“劳工”白袖章的共进会成员进入上海华人区域，与纠

[21] 《上海总工会报告》：第 12、13 页。后一个数据让人难以置信，但毫无疑问出现了急切的工会组织运动。

察队发生争执。白崇禧以此为借口“镇压工人内乱”。工人殊死抵抗后，于 4 月 12 日上午被彻底击溃。

当天爆发了多场大规模抗议活动，上海总工会宣布发起总罢工。第二天，多达 24 万名工人罢工。[22]下午 1 点，在军乐队和工会旗帜的带领下，游行队伍从闸北出发。抗议者在瓢泼大雨中沿着宝山路行进时，机枪手开火了，袭击者从巷子里蜂拥而出，冲杀向惊慌失措的人群。100 多人被杀，200 多人受伤，大约 50 人失踪。上海总工会公开谴责蒋介石为“新军阀”，与外国列强沆瀣一气——许多工人感到不安，但第二天的罢工仍十分坚定地进行下去。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展开。4 月 15 日，上海总工会约有 300 多名工会活动家被杀，500 多人被捕，5000 多人失踪或逃离上海。[23]恐怖活动逐渐减弱，但即使是年底也会偶尔发生。据估计，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仅上海一地，有多达 2000 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militants）丧生，还有数千人被逮捕或遭到解雇。[24]

转变战略

蒋介石掀起的清党加剧了苏联共产党内部斯大林和左翼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尽管双方的分析判断截然不同，但都将这场灾难归咎于领导不力与政治错误。毫无疑问，由于形式的快速转变，错误在所难免。然而，如果认为优秀的领导就能带领武装起义走向成功，那就会严重低估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客观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在 1927 年 8 月意识到的那样，在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社会严重分裂的国家中，只有“枪杆子里出政权”。[25]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时，才有可能走出这个僵局。这个观点更积极的影响是，巩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将国家定义为“人民百姓”，民族解放不仅意味着军阀与列强殖民

---

[22] 《中国工人运动史料》1958 年第 2 期：第 126 页。

[23] 《中国工人运动史料》1981 年第 4 期：第 104 页。

[24] 《布尔塞维克》1927 年 12 月 12 日第 8 期。也有根据 *North China Herald* (10 September 1927) 的报道，认为受害者高达五千人。

[25] Kwok Sing Li (translated by Mary Lok). 1995.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325.

下的解放，更意味着为将人民从贫困、剥削和愚昧中自我解放。[26]这将在未来塑造新中国的民族认同。

[26]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1927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大肆屠杀、清洗左派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重大失败，党的领导层再次怀疑，依靠提高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进行组织的战略是否可行。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农村，试图将乡村作为潜在革命变革的场域。本文将重点论述 1927 年海陆丰苏维埃的形成以及农民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出现。二十世纪初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造就了这样一种情况——诸如彭湃这样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可以将农民的行动与动乱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民运动”。彭湃认为，正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掠夺，使得海陆丰的农民无敌可耕，从而成为无产者。1927 年海丰创立农会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形成了苏维埃。国民党于 1928 年镇压这个激进的政权，彭湃于一年后被杀。

组织乡村社会：乡村治理的瓦解、农会与海陆丰苏维埃

亚历山大·F·戴（Alexander F. DAY）

很难确定海陆丰苏维埃的创立时间。1927 年之前，地方起义、农会成立、地主被杀即土地转移等事件接连不断。中共虽未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控制，但反共势力越来越难以进入广东省海丰、陆丰两县的农村地区。[1]1927 年 5 月 1 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纠察队短暂地占领了海丰县城，九日后失守又退回农村。时年秋，共产党和农民活动家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推动抗租运动。9 月，海丰县北部的一座乡镇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叛变，导致共产党接管当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其定为“苏维埃”。尽管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对那座乡镇的控制，但还是成功地在海陆丰两县 14 个地区的农村组建苏维埃。农民纠察队与当地共产党员再次进军海丰，于 11 月 1 日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这一日通常被认为是海陆丰苏维埃的成立，尽管这一正式名称要等到几周后才确定。[2]

1927 年春，这段混乱时期始于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见本书中 1927 年 S·A·史密斯的文章）。遵循共产国际的建议，共产党人转向武装叛乱的策略。8 月的南昌起义与 9 月的秋收起义很快就被具有优势的国民党人镇压，中共军队被迫分散到不同方向。毛泽东在湘赣两省交界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而南昌起义的其他共产党部队在粤东短暂停留，随后被远比他们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四散。在其中有一个人叫彭湃。彭湃是当地的活动家，海丰一个地主的儿子。起义失败后，他逃往香港，11 月中旬回到海丰新成立的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若想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存活，就必须

---

[1] 海丰是斗争的主要场所，但相邻的陆丰也属于共产党的控制范围。

[2] Roy Hofheinz Jr. 1977.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 10; Robert B. Marks. 1984.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h. 9; Fernando Galbiati. 1985.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s. 9, 10.*

要有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与当地民众建立联系的新方式。因此，中共被赶出城市后，将重点重新放在农民身上。海陆丰苏维埃是中国革命中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为起义行动的传播以及将农民积极性转变为革命力量提供了一个范式。很快，苏维埃就在彭湃的领导下，成为“当时对农村秩序最激进的攻击”。[3]

农民作为政治范畴

海陆丰苏维埃的成立并不标志着农民运动的开始，甚至也不是当地激进行动的开始，早在苏维埃成立之前，海陆丰就已被视作农村革命的模范。事实上，苏维埃是一系列漫长的事件不断变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共产党的政治与力量和农民的行动相结合，“农民”在此过程中成为政治范畴。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农村快速变化、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当时农村劳动网络普遍瓦解或是重组，导致这一政治范畴的产生。清末民初的特殊社会经济状况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诸如彭湃这样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积极组织当地农民的活动家，可以将农民的行动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民运动”。同时，海丰的农民也开始将新兴的农民政治组织视为对晚清以来日益退化的农村权力结构的有力干预。

根据历史学家罗伯特 · 马克斯（Robert Marks）的说法，由于中国正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从而引发动荡，使得紧张的农民很容易就接受了彭湃有关不公正和压迫的激进言论。马克斯写道，“彭湃通过在农民中建立新兴社会组织的方式阐明问题，为沿着阶级路线的集体行动铺平道路。”[4]然而，马克斯认为，尽管彭湃使用了“农民运动”一词，但我们不应当遵循。在马克斯看来，自明末以来，农民一直在塑造海丰的乡村社会，而将彭湃视为当时“农民运动”的缔造者，则是抹杀了这段历史。用他的话说，在所谓的“农民运动”开始之前，“农民就已经有自己的历史、组织形式、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经验。”[5]

---

[3]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154.

[4] Ibid., 175.

[5] Ibid., 191. 马克斯针对霍夫海因茨（Hofheinz）的论点(*The Broken Wave*)进行反驳，后者认为农民运动完全是政治活动家操纵的结果。马克斯认为，应当将农民的能动性以及社会结构纳入农民行动的问题当中。关于“农民运动”，见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87–88.

本文的目标有所不同，彭湃将农民的行动视作“农民运动”，这是中国农民政治想象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也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刻，[6]而这是受到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以及历史与社会变革的激进思想的跨国流通所决定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彭湃仅仅只是为农民的行动冠以“运动”之名，或是否认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强调，海陆丰苏维埃的革命事件是海丰地区本地与外来的激进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实践发生在中国遭遇资本主义殖民以及晚清以来乡村治理机构解体的经济背景。

全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以及乡村治理的转变

马克斯清晰地描述出清末民初中国农民劳动力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所产生的复杂经济效应，他指出， 19 世纪末海丰农民有一段时期是受益的，因为他们的商品进入了更广袤的市场。[7]当地的农村手工业——特别是炼糖、棉纺与织布，最初随着市场的扩大而增涨。然而，随着市场扩大，国内外的商人逐渐掌控劳动过程，导致手工业工业化以及包销制度、雇佣劳动的出现。也就是说，农村家庭正在失去对自己劳动力的控制，逐渐依赖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而市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对当地的中国农民造成损害。特别是 1907 年，由于纽约的金融交易以及日本人在台湾、荷兰人在爪哇、美国在古巴与菲律宾的竞争导致糖业市场崩溃，为外资加工厂生产原糖的晚清农民受到了更深的损害。许多贫农的借款才推动了原糖生产，这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崩溃的影响，导致地主轻而易举地兼并土地——正如彭湃所指出的那样，一种不安全的租赁形式占主导地位。[8]此外，女性纺织的副业也因 19 世纪末机制纱线的引入而受到影响，破坏了在家庭中的劳动过程，并加深了家庭对市场扩张的依赖性。一战结束时，纺织基本上在雇佣劳动中完成生产。因此，纺织业的重组以及工业化导致了海丰农民这项重要手工业的终结。[9]加之日常必需品的成本膨胀，随着农村社会与经济关系的永久改变，日益加剧的农村紧张局势变得更加突出。正如

[6] Alessandro Russo. 1998. ‘The Probable Defea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itions* 6, no. 1: 179–202.

[7]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99–120.

[8] Ibid., 99–111.

[9] Ibid., 113–18.

马克斯所总结道："帝国主义创造出条件，使得沿着宗族、国家的纵向集体行动将被基于社会阶级的横向集体行动所取代。"[10]

其他学者也详细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类似轨迹。凯茜·沃克（Kathy Walker）将长江三角洲北部的纺织业转型描述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以牺牲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使城市资本受益。[11]嘉玛希（Kamal Sheel）认为，江西农村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使农民越来越容易受到"隐晦的市场力量"与"农业危机"，以及农民道德经济崩溃的影响，进而导致农村革命。[12]嘉玛希与沃克一样，都认为这一殖民进程导致了农民丧失了自明末以来获得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权利的保障。嘉玛希指出，江西新江地区的纺织业发展轨迹与马克斯在海丰中揭示的相似：当地织工首先转向机制纱线，但随后就被纺织业的廉价布匹淘汰，进而导致家庭纺织的"全面崩溃"以及"农村家庭工作的大量流失"。[13]

上述文本并未清晰描述出伴随着的乡村治理的退化。后义和团时期的清末新政试图将乡村治理现代化，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但在许多地区，由于国家要求农民上缴更多的赋税以资助现代化项目，这导致了传统农村治理的崩溃。[14]使得"掠夺性国家经纪人"（predatory state brokers）的出现，他们利用自己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地位剥削农民从而谋取私利。[15]正如蒲乐安（Roxann Prazniak）所言，新政改革最终加强了农村精英的权力，加剧了农村复杂的紧

---

[10] Ibid., ch. 5 (citation is from p. 119).

[11] Kathy Le Mons Walker. 1999.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 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Kamal Sheel. 1989.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2–65 (citation is from p. 45).

[13] Ibid., 58.

[14] Huaiyin Li. 2005.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Huailu County, 1875–193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Liu. 2007.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i Delta, 1850–1949*. New York, NY: Routledge; Prasenjit Duara.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iscussed in Alexander F. Day. 2013. 'A Century of Rural Self-Governance Reforms: Reimagining Rural Chinese Society in the Post-Taxation Er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0, no. 6: 929–54.

[15]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张局势，进而导致了清末的一系列农民起义。[16]就海丰的情况而言，高原同样发现了类似的过程，他认为自晚清以来在农村不断形成的“半正式治理”从农村人口中榨取了更多的资源，进而导致当地不断增长的暴力事件以及革命政治的崛起。[17]

将革命实践带往农村

清朝的最后十年中，语言学家、革命活动家刘师培将反对农村现代化以及中国被殖民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地方性反抗，解释为能够改造中国的“革命农民”的出现。[18]1917 年至 1921 年的日本留学期间，彭湃加入了一个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团体“建设者同盟”，并在参与日本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19]“建设者”认为，农民是自然的人类合作精神的承载者，需要动员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入侵与竞争文化——这一立场类似于刘师培激进的农业人道主义。

1921 年，彭湃将日本农民运动的政治实践与思想带回海丰，很快就投入到当地的政治与教育改革中。[20]彭湃愈发坚信，海丰的农民因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而变得愈发贫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推翻私有制。[21]而革命的力量将是无产阶级——对彭湃，这指向了所有没有资产的人，其中就包含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而人民——这股革命的力量必须被激进的知识分子“唤醒”。[22]1922 年，彭湃回

---

[16] Roxann Prazniak. 1999. *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 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32; see also Day, ‘A Century of Rural Self-Governance Reforms’, 931.

[17] Yuan Gao. 2015. ‘Revolutionary Rural Politics: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Guangdong and Its Social-Historical Background, 1922–1926.’ *Modern China* 42, no. 2: 162–87.

[18] 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载于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第 205—212 页；另见 Alexander F. Day. 2019. ‘Peasant.’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169–73.

[19] Yong-Pil Pang. 1975. ‘Peng Pai from Landlord to Revolutionary.’ *Modern China* 1, no. 3: 297–322.

[20]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161.

[21] Ibid., 109.

[22] Ibid., 167–68.

国并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的一年后，他开始组织农会，在海丰县赤山镇推动减租。

尽管彭湃有意试图组织一场“实际运动”，但建立农会的想法源自农民自己。[23]虽然最初规模很小，但农会能够阻止一起当地豪强干涉童养媳死亡的小纠纷，并自行解决，从而使得“掠夺性半正式权力结构”的权威边缘化。这种新兴的纠纷调解机制，正如袁高所述：

> 这既体现了中国农村调解传统的延续，即寻求在社区内部解决纠纷而不是诉诸县级衙门，也体现了通过农村政治革命所引入的现代概念和创新，即农民组织与阶级立场在农村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24]

这些早期“实际斗争”的成功，加上当地紧张局势的加剧，促进了农会的扩大，到 1922 年底，彭湃估计全县有两万户人家加入农会，1923 年元旦海丰县总农民协会宣告成立。组织工作的成功使得彭湃相信海丰县分成了两个明确的阶级：农民与地主。[25]

最初的组织工作以镇压告终，但在 1924 年，随着国共合作、北伐开展，氛围变得更加开放，彭湃也顺利回到当地继续开展工作。彭湃现在是中共党员，也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广东党部农民部长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后由毛泽东主办），培训了数百名农民干部。国民党自 1925 年以来开始在华南、华东地区扩大控制，彭湃在海丰领导了农民的反抗，并重组农会，至 1926 年，农会已有近 20 万名成员。[26]随着农会与豪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农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并开展减租运动。[27]随着豪强逃离，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大幅下降。农会有效地接管了乡村治理，逐渐边缘化晚清以来下沉的掠夺性地方经纪人与精英权力结构。

随着农民诉求的激进化，农会开始超越中共的温和建议，[28]伴随国民党进一步右转，更明确地谴责阶级斗争，中共在是否应该代表农民利益并在农民组

---

[23] Hofheinz, *The Broken Wave*, 146–49.

[24] Gao, ‘Revolutionary Rural Politics’, 167–68.

[25] Hofheinz, *The Broken Wave*, 164.

[26]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208.

[27] Gao, ‘Revolutionary Rural Politics’, 179.

[28]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194–212.

织中发挥更正式的领导作用上摇摆不定。国民党于 1926 年控制广东，当地的农民运动受到更大的镇压力度，他们不再被视作国民革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广东农运的边缘化使得彭湃失去了中共内部的支持，无法要求党在广东农民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与之相反的是湖南农民运动得到了支持，因为湖南正位于北伐的计划路线，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新的农民部门负责人，不久后写下了著名的 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彭湃反驳了中央委员会，他的结论正如马克斯指出的那般，“大城市已经成为反动中心，而农村是唯一能保持革命活力的地方。”[29]实际上，彭湃与有组织的农民力量的联系和党的历史目标相冲突，后者认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是民族与反封建革命，土地革命得往后靠。[30]

苏维埃及其失败

尽管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利用了群众组织，特别是农民运动，但在 1927 年 4 月的上海，蒋介石放弃了群众运动，从此主要依靠军事手段统一中国。中共的战略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农民运动与改造农村社会关系的尝试重新浮出水面。自 1927 年 11 月 1 日起，农民和共产党人控制了海丰，新成立的海丰临时革命政府开始通过消灭地主势力来改造海丰。许多地主逃亡，更多地主被抓捕并处决。租金与债务被迅速废除，当地举行选举，海陆丰苏维埃在彭湃领导的一次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当时的中共认为苏维埃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式，通过它可以将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31]

革命政府成立后，在彭湃的非正式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这项任务比党的领导层最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如何定义地主、如何确定谁该获得土地、如何重新分配土地，这都并非易事，最后，县级领导层只颁布了总指导方针，将具体细节留给各地农会。到 1928 年 1 月底，土改被认为已经完成，尽管各地的情况并不平衡。[32]这种不平衡是农村权力结构对土地改革影响深刻的体现，农民活动家试图改变当地的阶级力量平衡，但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结果。尽管

---

[29] Ibid., 215–22 (citation from p. 221).

[30] Ibid., 235.

[31] Ibid., 250–52;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267–69.

[32]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249–58.

如此，海陆丰为党提供了一个干预乡村治理结构退化以及经济环境衰弱的范式——这种范式源自特定的地方情况，但影响当地的力量却是全球性的。自上而下地去理解这场革命无法解释当地农民活动家的力量，然而，这场革命能够维系只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正集中在其他地区，直至 1928 年初之前尚且能够喘息。

革命的进程就此被截断。共产党人试图将苏维埃的控制扩大至相邻的县后，国民党与 2 月底入侵。由于征兵工作的失败，县城最先被放弃，共产党人试图在乡村中维持控制。但这一次，他们在农村也失败了，国民党及其地方支持者重新夺回农村的控制权。回归的地主得到了新的地契，苏维埃与农会被击溃。在当地坚持作战数月后，彭湃被调往上海的地下工作，但 1929 年 8 月底他被出卖，身亡。[33]

[33] Ibid., 272–81.

1928

时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的女工已超过 20 万人，她们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纺织厂与烟草厂。这些女工在政治上绝非消极，她们曾多次举行罢工与抗议，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以及改善劳动条件。这给新兴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难题：女工是否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组织？还是将她们归入不考虑性别差异的阶级工会中？经过最初的犹豫，党在 1923 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明确指出女工运动不应与整个劳工运动分离。为了建立妇女运动的基础，诸如向警予、杨之华等杰出女党员亲身走进车间工作，建立工人学校并领导罢工。尽管她们的努力在 1927 年国共第一次统一阵线破裂后不幸中断，但这些早期的努力为中共在 40 年代掌权后返回城市重新动员女工奠定了基础。本文自 1928 年 5 月 1 日向警予被处决的悲剧开始，回顾重要的年份内中共与女工的接触。

中国工厂中的女权主义运动

董一格

1928 年 5 月 1 日黎明，33 岁的向警予在汉口被国民政府的警察公开处决。根据目击者的回忆，押赴刑场的途中，向警予朝着沿途的广大群众高呼革命口号。向警予身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兼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她的殉职标志着党内最早的女权主义行动的结束。

在对革命时期中共性别政治的最新评估中，人们达成的共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将性别问题纳入男性阶级政治之下。[1]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中共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和独立妇女组织的普遍敌视，以及女性领导人在党内的边缘化。尽管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者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并策略性地调整，但至今，中共仍是男性主导的，在整体上表现出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与厌女文化。然而，通过重新审视有关劳工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之间最早的互动关系的文献，本文将揭示革命时期性别与阶级政治之间模糊且有争议的关系。本文遵循迪莉娅 · 达文（Delia Davin），将"妇女工作"译为"women-work"而非"women's work"，"妇女工作"涵盖了中共参与的妇女赋权活动，包括革命斗争、生产、法律改革、扫盲以及卫生运动等等。[2]本文试图阐明一种政治进程，特别是那些涉及妇女革命者的政治进程，是如何与个体能动性与偶然性

---

[1] 关于党对性别问题的边缘化与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者在内部的行动，见 Christina K. Gilmartin. 1995.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heng Wang. 2016.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关于向警予的英语传记，见 Andrea McElderry. 1986. 'Woman Revolutionary: Xiang Jingyu.' *China Quarterly* 105: 95–122.

[2] See Delia Davin. 1979. *Wome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深深地交织——这将很难与党的官方叙事或是近期流行的讨论所呈现的目的论叙事相吻合。

党内的包容性女权主义议程

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推动下，1919 年共产国际成立后要求每个国家的分支机构设立妇女局，并招募无产阶级妇女加入共产主义工会。虽说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与代表只有男性，对妇女工作的一般性原则只能发表一些简单的评论，但在这个萌芽阶段，但对独立的女权运动抱有比后来更包容的态度。[3]

在北京，缪伯英自 1919 年以来就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于 1921 年 7 月成为第一名入党的女性。后来，在 1922 年，缪伯英与她的同伴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她们试图与倾向自由主义的女子参政协进会竞争，通过在各个领域改变性别关系，包括法律上实现婚姻平等、同工同酬、带薪产假、女性教育权等，从而扩大女子参政的议程。[4]

在上海，尽管在一大上未被计入正式党员，但创始党员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仍负责了大会的后勤工作，并与 1921 年至 1927 年期间担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一起负责制定中共的妇女计划。同时，1922 年秋，王会悟还与一位女权主义者王益之一起，致力于建立和党外知名妇女活动家的非正式联系，包括国民党与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活动家，她们特别研究劳动条件，并在中共赞助的上海平民女校任教。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与不同政治背景的妇女权利团体接触的策略并未得到党内的普遍认可。虽然这些妇女的主张以及王会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遇到了党内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例如茅盾、陈望道等人的强烈抵制和攻击，但还有其他人给予更多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时任中共北京分部书记的李大钊，他认为“中国现当军阀专横之时代，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哪种团体，都

---

[3] 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8 页。

[4]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81.

须联络一致……方能打倒军阀，澄清政治，恢复民权。”[5]他主张在中国各省建立妇女公益组织，“无论是女子参政同盟会，抑属女权运动同盟会”。

工厂内非共产主义的妇女动员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历史上第一波职工运动达到高潮，女工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彼时中共刚在上海成立，当地的共产党人认为与女工建立联系是一个稳固基础、壮大力量的绝佳机会。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 19 世纪末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女工开始参加抗议或举行罢工。她们集中在丝绸、棉花和烟草等行业，成为劳动力的主体，经常参与劳资纠纷事件。例如，上海第一次有记录的妇女罢工发生在 1894 年，当时杨浦区的纺织工人抗议减薪，最终以 8 人被捕而告终。[6]1911 年 8 月，四个丝绸厂共 2000 名妇女举行了罢工，要求加薪，最终取得成功。1912 年 5 月，上海缫丝女工同仁会成立，这是上海纺工的第一个原始工会，重点关注于提高女工技能，从而保护她们的工作。1917 年夏，英美烟草公司（BAT）的一千多名女工举行了持续数周的罢工抵制减薪，随后，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的 1000 名女工也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两场罢工均以厂方部分妥协而告终。[7]总体而言，1895 年至 1919 年 5 月 4 日，女工为主体的罢工次数不少于 57 次。[8]

在这一时期，工人的行动多是自卫性的，而非源于阶级意识的进攻性策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员是由当地的同乡会与帮派促成的，他们的诉求围绕着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良劳动条件以及更多就业机会。这也是为了，当国共双方都试图动员女工加入工会时，她们会将“工会化”视作问题的根源而非解决方案，因为“工会”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生产，不一定会给她们带来利益，往往还会引起反弹。[9]

---

[5] 李大钊在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演讲会上的演讲。见 Ibid., 83.

[6]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 ‘历史大事记’”，在线链接：shzgh.org/renda/node5902/node5907/node6572/userobject1ai1164972.html。

[7]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71.

[8] S.A. Smith.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54.

[9]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178.

女工的斗争在 1922 年达到顶峰。据现有数据显示，当年上海、湖北、广东约 60 家工厂中有超过三万名女工发动了 18 场罢工。[10]其中最显著的罢工发生在 8 月，当时上海闸北丝厂的一万多名女工发起了长达十日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并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妇女工会，即“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11]然而，这个工会并不是丝厂女工自发创立的，而是由来自苏北盐城的穆志英组织的，她得到了帮派以及苏北籍议员的支持，他们本身也是丝厂厂主。

一个月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共产党领导层将 1922 年 8 月的罢工视为上海劳工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邵力子等男性女权主义者也开始大量撰写关于这场事件的文章。[12]然而，有趣的是，在罢工发生时，中共内部没有人能够与当地的女工建立真正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共妇女部正经历从王会悟到向警予的一次重大的领导层过渡，没有多余的能力与工厂内部建立联系。

向警予的统一战线方针

向警予是 1918 年毛泽东于湖南省共同创立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向氏于 1919 年 12 月随湖南同乡蔡和森、蔡畅，二人的母亲葛剑豪一同乘船前往法国。在法国，向警予与蔡和森组成“向蔡同盟”，一种基于革命爱情的新型婚姻。这对夫妇与他们的同学——包括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著名中国劳工领袖的李立三（见本书中裴宜理的文章）一起学习法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参与当时为勤工俭学生争取权利的斗争。他们的政治活动激怒了法国当局，导致他们在 1921 年 9 月被驱逐出境。同年 12 月回国后，这对夫妇在上海定居，加入了中共的上海支部。

王会悟在当时刚出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刊物《妇女声》。起初，向警予对党内的妇女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她与王会悟的工作保持着距离。在这一

---

[10] 向警予：“中国最近妇女运动”（1923 年），载于《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9—66 页。

[11] 穆志英尝试组建一个由帮派支持、试图平息劳工不满的女工工会失败了，但她在 1924 年 1 月重新尝试，并成立了上海丝纱女工协会。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173.

[12] 肖琳琳、王佩军、虞洪：“1921 年至 1937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虹口丝厂女工运动”，在线链接：dswxyjy.org.cn/n1/2020/1125/c219021-31944448.html。

时期，向氏的写作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上。然而，在 1922 年中共二大上，王氏的丈夫李达未能继续担任宣传部部长，由蔡和森接任。大部分人认为，向警予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蔡和森的配偶。然而，即使掌管妇女部之后，向氏仍对参与妇女工作持矛盾态度。[13]

向警予突然担任领导职位，并面对着女工内部已有的各种组织，包括同乡会、帮派和基督教青年会等，向氏很难渗透进工厂车间。在这个阶段，向氏与女工运动之间最明显的联系就是他在 1923 年秋写的几篇文章，赞颂前一年的闸北罢工，支持女子工业进德会的一名被拘留的丝工，并呼吁上海的女权主义协会支持女工。

她参与妇女工作的转折点发生在 1923 年中共三大上。童年发生的“二七惨案”打击了共产党人发动工人革命的雄心壮志（见本书中罗亦农的文章）。在绝望中，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与国民党结成同盟，这被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或第一次统一战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向警予转变了对妇女部的态度。向氏长于昏暗，在法国留学期间养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她很高兴党终于在致力于推动民族革命。现在，她可以专心开展妇女工作，特别是加强与独立女权主义团体的联系。[14]

正是通过统一战线，向警予展现了她在推动妇女权利方面的政治远见与才能。中共三大至 1925 年年中，她利用国民党的资源巩固自己的计划，并为一个广泛的妇女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虽然向警予曾批评过妇女选举权运动，但她仍然承认这些斗争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对她来说，若想建立一个真正服务于妇女的群众运动，就必须将女权主义团体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共产党人在女工中取得进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1927），共产党组织者能够在女工中取得重大进展，并培养了一些共产党的女工干部，这主要得归功于杨之华，当时她是中共资助的上海大学的社会学学生，1949 年后，她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内妇女

[13]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81.

[14] Ibid., 86.

工作方针的设计者。[15]自 1924 年被向警予招募以来，杨之华一直在努力与英美烟草工厂的女工建立联系，她全身心地融入女工的日常生活，花时间与她们交朋友，甚至采用她们的服装风格。[16]在此期间，杨和她的同事还在工人阶级的社区中教授识字课程。

杨之华取得这些烟草女工的信任和尊重后，动员了大量女工参与 1925 年“五卅运动”的大罢工（见本书中梁宝霖的文章），并担任宣传员。到 1925 年 9 月，入党的妇女人数迅速上升到约一千人，是五卅前的十倍。第二年，这种组织工作最终促成了穆志英在女丝工中权力基础的消亡，标志着中共终于进入了以前由黑帮结社主导的社会空间。[17]

向警予的最后岁月及其遗产

1925 年 10 月，在第一次领导层交接的三年后，中共妇女部再次发生动荡，向警予与蔡和森被派往莫斯科进修，杨之华成为副部长。向氏的突然离开是由于个人原因，还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1925 年底，她开始与彭述之交往，彭述之当时是党内重要的理论家，后来成为托派第四国际的流亡者与领导人。党内为了挽救这段岌岌可危的关系，出面将向氏和蔡氏送出上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于 1926 年在莫斯科离婚。

1927 年初，向警予回国时，杨之华已经成为妇女部的实际负责人，而向警予则被派往武汉的湖北省党委工作。在上海，杨之华继续动员女工，直到“四一二”事变发生，国民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残酷地清洗共产党员（见本书中 S · A · 史密斯的文章）。[18]同年 7 月，在武汉，对共产党人的逮捕达到了高峰，当地党支部被迫迁走，向氏则坚持留下。1928 年 3 月，向警予与另一名共产党员被警察逮捕，于 5 月 1 日被公开处决，标志着中国城市地区妇女群众运动的鼎盛时期落幕。

---

[15]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149.

[16]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43.

[17] Ibid., 138–39.

[18] 杨之华和瞿秋白于 1928 年底前往莫斯科，1930 年回国后，杨之华继续领导妇女部，直至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后担任上海地委组织部书记。1935 年瞿秋白被处决后，杨之华再次前往莫斯科。回国途中，于新疆被盛世才囚禁四年。最终于 1945 年抵达长安。若想了解杨之华在 30 年代 40 年代的详细情况，见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共产党才回到城市，并在 1949 年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妇联来恢复妇女工作的开展。这个群众组织最初作为统一战线式的组织，负责联络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这与向警予对妇女工作的看法十分相似。同样，在 1949 年，经历了 20 年的个人和政治生活的动荡之后，杨之华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妇女部的首任部长。由于早先在上海工厂的工作经验，杨之华与当地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根据第一手观察制定了对工人非常有利的政策，如 1953 年的《女工保护条例》，其中包括 56 天的带薪产假、雇主资助的托儿服务以及其他福利。

吸取教训

通过重现中共内部女权主义党员的能动性，并揭示结构性限制以及约束她们的历史偶然性，本文对目前关于这段时期中性别与劳工政治的讨论做出两项介入。首先，我认为中共最初是有认真对待女工问题，不仅因为这一问题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之中，还因为女工在职工阶级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因此对于中共的基层建设工作至关重要。尽管早期的组织工作不免令人失望，但早期的动员以及以此为目的的组织基础，共同塑造了中共的妇女工作。直至 1957 年，女权主义群众路线的伞形组织全国妇联才完全服从于党的绝对权威。[19]

其次，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共是在男性阶级政治的诉求下将性别问题纳入其中，但我想强调，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女权主义事业并不总是服从于阶级路线。向警予和她的同事领导的妇女工作意识到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建立同盟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与她们保持联系——这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的，但不幸的是，国共脆弱的同盟最终以国民党的背叛而告终。

---

[19] 有关中华全国民主妇联的命运，见 Wa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1929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权兴起白色恐怖，几乎消灭了所有下辖城市中的劳工活动。共产党人逃亡农村与游击根据地，不再可能成为劳工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帮派控制的工会几乎接管了所有的劳工组织。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推出一系列相对进步的劳动与工业立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未满十四岁者不得雇用，以及关于工厂安全与福利机构的指导方针，从而期望工人会在这些安抚与让步下，在政治上忠于国民政府。然而，中国的劳工从未失去对于行动的热情。虽然在政治上不再具有以往的激进性，但工厂的劳工抗议从没有停止，特别是围绕着粮价与补贴的问题。尤其是在 1929 年，上海因米价上涨而引起的一系列纠纷。

为大米而战：民国时期的“米贴”之争

李承俊（Seung-Joon LEE）

1927 年 4 月蒋介石的军事政变是中国劳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见本书中 1927 年 S · A · 史密斯的文章）。接下来的十年中，国民党政权将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掌控中国大部分的工业中心，并在此过程中扫除了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劳工行动。在上海，共产党在劳工政治领域已不再是政府可能的政治对手，他们转移到了农村与游击根据地中，黑帮控制的黄色工会主导了城市的劳工政治。[1]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职工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存在，附属于政府扶持的黑帮。中国经济长期困于粮价波动，尽管劳工骚乱不再激进，但也从未停止，这使得粮食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职工政治的中心。通货膨胀与紧随的生活成本上涨在消费上团结了工人，而非生产上的冲突。尽管工作场所的工人因技能、性别与机关而分化，但作为消费者，他们都遭受了市场上米价高度波动的影响。

食物相关的劳资纠纷似乎是非政治的，仅限于“经济斗争”的领域，没能发展出阶级意识与政治行动。然而，也正是因此，粮价问题才能为历史上的行动者提供更多的空间，开辟新的运动。对于国民党当局与“黄色工会”领导人来说，提供粮食方面的福利是缓解工人不满的一项相对简单的措施。然而，全球粮食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阻止了国民党式的劳资管理无法凭孙中山“民生”思想为工人提供最低福利，从而消除共产主义影响的可能性。相反，工人日益加深的苦难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机会，即使晚了一步，但他们还是意识到了粮食问题的政治潜力。[2]就这样，职工迎来了工业粮食政治的新阶段。

---

[1]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ter E. Gourlay. 1953. '"Yellow Unionism" in Shanghai: A Study of Kuomintang Technique in Labor Control, 1927–1937.' *Papers on China*, no. 7: 104–35.

[2] Seung-Joon Lee. 2020. 'Canteens and the Politics of Working-Class Diets in Industrial China, 1920–37.' *Modern Asian Studies* 54, no. 1: 25.

米贴的起源

国民党推出的劳工政策远非仅仅镇压劳工行动那么简单。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包含进步元素的劳工与工业立法，试图推进国家主导的劳工改革。例如，1929 年的《工厂法》规定，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原则，未满十四岁者不得雇用，为工厂安全与工人福利（宿舍卫生、工厂食堂、诊所等）提供指导方针。[3]凭借这些物质福利，国民党要求工人在政治上的忠诚。其中的核心便是向买不起最低份额主食的工人提供的“米贴”。

国民政府倾向于发放米贴而非加薪，原因如下：他们将米贴问题归入“待遇”的范畴，与最容易引起劳资纠纷的“工资”区分。米贴是作为米价上涨超过一定额度后的临时开支，米价回归正常水平时就应当停止发放米贴。遵循“国父”孙中山所推崇的家长式统治，米贴解决了工人临时的粮食保障问题，却不会对雇主造成永久的财务重担。在目睹了 20 世纪 20 年代多次“米乱”后，国民党领导层得出结论，发放米贴有助于中止因米价膨胀而引起的劳资纠纷。然而，若是无法达成协议，工人通常会举行更广泛的动员。[4]

对工人而言，政府发放米贴通常都是一个成功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在 1930 年，上海市社会局介入的 87 起劳资纷争中，约 10%属于米贴“待遇”范畴。与其他纷争不同，这一类的 9 起纷争均以工人诉求得到部分或完全满足而告终。[5]历史学家彭贵珍研究了南京十年（1927—1937）期间上海棉纺织业 16 起米贴相关的劳资纷争，只有 2 起被管理层拒绝，而在 10 起纷争中，管理层完全或部分接受了工人的米贴要求。[6]相比于加薪，雇主也更喜欢米贴。支付特定时期的米贴比加装新的食堂设施要便宜得多，因为在上海，由于人口密集和地价高昂，长期存在着空间不足的问题，新建食堂往往意味着极大的成本。此外，工人因米价飙升而愤怒时，雇主提供米贴可以即时地遏制他们的情绪。

---

[3] Gourlay, '"Yellow Unionism" in Shanghai', 110; Mark W. Frazier. 1992.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

[4]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劳资纠纷统计》，上海：中华书局，1932 年：第 44 页。

[5]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特别市罷工停業統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1930 年：第 6 页。

[6] 彭贵珍还指出，有 3 起纷争结果不明，而在 1 起纷争中，最初关于米贴的诉求被雇主拒绝，但雇主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补偿。彭贵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劳资争议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48 页。

这并非意味着“米贴”作为一种微薄的福利是雇主大发善心施舍给工人的。米贴是迅速政治化的工人与管理层之间激烈争斗中产生的一种让步。也就是说，米贴实际上是 20 年代工人积极分子（militants）罢工后的显著结果。这种让步有多种形式，例如，有些公司会提供现金，通常不会超过几分钱。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工人下班时提供一张小票，上面写着“米贴”，他们可以在附近的商铺兑换。米的数量与质量取决于工人的政治影响力，但许多公司都在试图规定标准与额度，发放当天“半升米”的钱。[7]

1920 年，英美烟草公司是第一家引入一套米贴制度的企业。[8]管理层绝非处于纯粹的利他动机，而是精心地将这套补贴用以改善工作场所的劳动纪律——例如，向工人发放米贴的条件便是工人当月旷工不得超过两日。[9]如果说英美烟草公司的管理层是将米贴作为管理技术引入工作空间，那么商务印书馆的工会则通过斗争将米贴演变为一种劳动福利。商务印书馆的工会主要由熟练的男工，例如排字员、印刷工、技术工等组织而来，不断上涨的米价为辛勤劳动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他们首次将米贴作为一个问题提出。[10]尽管在中共对五卅运动的官方叙事中，他们由于纯粹的“经济”性质而被边缘化。但商务印书馆工会在 1925 年发起的第一次“米贴”罢工，对随后几年的劳工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5 年夏，商务印书馆的职工抱怨米贴管理不善，理论上讲，工资不超过 15 元的工人每月能有 2 元的补贴。然而，米贴却不能按时发放：例如，工人因病缺勤时，管理层可以肆意克扣；工厂主管经常会挪用米贴的预算；工人声称，管理层会性别歧视女工，减少米贴的数额。[11]1925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举行罢工时，管理层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妥协。警察逮捕了 16 名工会领袖，其

---

[7] 1 升约等于 1．87 品脱或 1.031 公升。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 年：第 66 页。

[8] *North China Herald,* 31 July 1920．英国烟草公司凭其相对慷慨的员工福利而著称。1980．*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7.

[9] *North China Herald,* 18 November 1922.

[10] 商务印书馆雇佣了共 4500 名职工，其中 1000 人是白领（职员），3500 人是蓝领（工人）。大约 80%是机器工，20%是手工工人。《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 15—16 页。

[11] 申报，1925 年 8 月 25 日。

中三人被起诉。作为回应，300 名工人罢工，要求释放他们。这一次，管理层采取了更为妥协的立场，谈判开展后迅速达成和解方案。包括改善米贴、加薪、缩短工时等。[12]此后，商务印书馆工会达成的米贴协议成了上海工业界的某种规范性先例。

和解性福利的命运

1927，上海的工业家成功抑制劳工的斗争性后，他们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削减米贴的承诺。他们的策略包括操纵价格、降低大米质量的标准，并限制米贴的领取资格。在国民政府劳资仲裁制度的自吹自擂之下，一些工人抱怨说，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只会“避重就轻”，不去处理关键问题，例如“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13]国民党式的黄色工会能否成功，取决于市场上米价的波动。国民政府早期的成功很快就遭到了反弹。

1929 年，上海米价异常上涨。上海的粮食消费者，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认为应该为五月初的种植期至九月的收获期备足米粮。[14]然而，即使在秋季市场价格也没有下降的迹象，这在民众之中掀起了恐慌。米价继续上涨，直至年底，竟已达到平常还要高出 75%。[15]这种压力使得国民党在劳工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出现了裂隙。甚至就连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也向地方当局请愿，要求平衡粮价，许多会员在抱怨国民党通过仲裁给予的常规水准的米价已经过不了日子了。[16]10 月，新闻记者工会公开要求增补米贴，其他工会纷纷效仿。[17]米贴的诉求在各行业之间激增，成了公司管理层与国民政府严重的经济与政治负担。这便是后来共产党人在事后称之为“米贴斗争”的开始。[18]

---

[12] 王清彬、陶孟和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京：社会调查部，1928 年，第二章：第 287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第 39—46 页。

[13] 姜沛南：“徐阿梅”，载于《中国工人运动先驱》第 3 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年：第 200 页。

[14] Rhoads Murphey. 1953.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9–46.

[15] 《米价飞涨与救济方策》，银行周报第 13 卷第 39 期，1929 年：第 1—4 页。

[16] 申报，1929 年 9 月 15 日。

[17] 同上，1929 年 10 月 15 日。

[18]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争取米贴门争”，载于《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74 页。

危机中的黄色工会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黄色工会已经成为共产党人颠覆的温床，事态进一步恶化。许多黄色工会领导人并不一定就是国民党的忠实拥趸，但正如历史学家布赖恩 · 马丁（Brian Martin）所言，他们更倾向于改革主义的策略，从而确保“有组织的劳工在国民政府的体制内拥有合法地位”。[19]共产党的地下干部抓住了群众对米贴不满的机会，渗透进由国民党主导的工会运动中。一位名叫任弼时的地下干部认为，革命事业不应放弃黄色工会，因为“这类工会，带着劳资妥协的精神，站在工人地位求工人生活的改善并防止资本的进攻。”[20]最终，在一系列关于米贴斗争的罢工中，国民党的黄色工会陷入严重的危机。

这一切始于 1930 年夏季法电工会一起关于米贴的罢工，历时 54 天，成为上海法租界以及其他地区劳工政治的焦点。[21]这场动员同样动摇了青帮在法租界的统治地位——青帮曾在 1927 年蒋介石打击上海红色工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代的人将青帮老大杜月笙称为“法租界的阿尔 · 卡彭”（Al Capone），将他操纵劳工的能力描述为“阿尔 · 卡彭和洛克菲勒的结合”。[22]这次罢工的领袖徐阿梅，是少数坚持宣传工人经济利益从而扩大中国工人阶级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主义劳工活动家，无论参与的工人是共产党同情者还是工贼。徐阿梅选择了怠工策略而非立即举行罢工——这种策略吸引了更多的工人参与动员，同时让管理层没了调动警察的借口。[23]为了结束长时间的僵局，杜月笙别无选择，只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支付 30 万元和解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尽管没人知道他的钱被用在了哪里。[24]

法电工会的斗争点燃了一系列关于米贴的罢工，跨越了行业、性别、技能水平的差异。几周后，永安纺织二厂的工人（由女工与无技能工人组成）要求

---

[19] Brian G. Martin. 1985. ‘Tu Yűeh-sheng and Labor Control in Shanghai: The Case of the French Tramways Union, 1928–1932.’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5: 101.

[20] 任弼时:《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6 页。

[21] Brian G. Martin. 1996.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4.

[22] Ibid., 221;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97.

[23] 姜沛南：“徐阿梅”：第 206 页。《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发电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 81—82 页。

[24]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126.

公司发放米贴。管理层以中国纺织企业未有先例为由拒绝，但在紧张局势即将彻底引爆之前，上海市社会局介入并进行仲裁，管理层同意以每石 13 元的价格购买大米（比当时的市场价要低 5 元），为工人提供米贴。[25]根据规定，在工厂工作四日以上的可以领取相当于 1 元的米贴票，工作九日以上可以领取两张，工作一个月以上可以领取四张。这份协议并未规定大米的品级质量，工人无从选择，只能遵循管理层的安排购买大米。此外，这次补贴的是实物，对那些不会做饭的人来说帮助不大。[26]

米贴斗争以管理层的部分胜利而告终，但这不意味着故事到此为止。就像连锁反应般，不久后，浦东（以青帮为主的著名工业区）的日资纺织公司的工人也开始了一系列关于米贴的纷争。[27]尽管这些罢工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为国民政府强制施行的脆弱劳工体制蒙上了一层不祥之兆，因为这一体制依赖于黄色工会与黑帮之间非正式的同盟。

---

[25] 1 石约等于 133.33 磅或 60.47 千克。

[26] 申报，1930 年 9 月 3 日；彭贵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劳资争议研究》：第 149 页。

[27] 申报，1930 年 9 月 15 日；Martin, ‘Tu Yűeh-sheng and Labor Control in Shanghai’, 103.

1938

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高潮之后，香港的劳工运动陷入低谷。1925 年与 1926 年的大罢工与抵制（杯葛）运动后,，英国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不满情绪的打压。由于工会被迅速取缔，1927 年香港当局推出的《非法罢工与闭厂条例》成功铲除了集体劳工行动。不过，香港的 30 年代见证了两场交织的运动的兴起：一是城市动员的救国运动，二是同时期复苏的劳工行动。本文将探讨这两场运动的合流最终如何重新点燃香港的劳工运动。

战前香港劳工行动的复苏

陆延

1938 年 10 月初的一天，三个年轻人在香港岛维多利亚港对面的红磡一栋小公寓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三人中最年长的廖承志（1908—1983）自 38 年 1 月被任命领导半公开的八路军联络处以来，他在香港只呆了十个月。另外两人，曾生（1910—1995）与吴有恒（1913—1994），年仅二十多岁，但已在香港生活多年，期间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党的指示通过廖的无线电发送器传来，敦促他们在日占华南地区发展游击势力。在会议上，他们得出的结论，廖承志应该留在香港，为殖民地的六百多名党员负责，曾生的籍贯在东江流域，更适合领导当地的抵抗活动。[1]

同月晚些时候，超过 120 名工人与学生青年离开了当时仍算安稳的香港，独自或分批前往曾生的老家坪山，距离英国殖民地以北约三十英里（四十八公里）的地方。大多数人将在村民中担任“民运员”，让新的游击队在乡村开展民运工作。[2]其中约 30 人拿起武器，走上战场。最初的游击队员来自香港的工厂与学校，他们构成了核心，这支游击队将在 1943 年后被称为东江纵队。

这场会议发生在殖民地劳工行动复苏的关键时刻。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香港见证了两场交织的运动的兴起：一是城市动员的救国运动，二是同时期复苏的劳工行动，曾生与吴有恒成为这两场运动的领袖人物。随着两场运动的合流，他们重新点燃了十年之前香港一度成为中国劳工运动先锋的传统。如果三人的会议是将香港的劳工运动带入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他们对未来斗争的计划就是十年来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

[1] 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93—94 页；贺朗:《吴有恒传》，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 年：第 9—10 页。

[2] 曾生:《曾生回忆录》：第 97—98 页。

从贸易港口到工业中心

1931 年，香港进入了英国统治的第九十个年头。殖民体系建立在伦敦任命的总督几乎绝对的权力基础之上，通过不断发展的法律得以维持，看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稳固。1925—1926 年的大罢工和抵制运动之后，对劳工行动与社会不满的镇压达到了新近乎全面控制的高度（见本书中梁宝霖的文章）。1927 年的《非法罢工与闭厂条例》取缔了工会，有效地终止了所有的集体劳工行动。传统上与英政府合作的中国商业精英在当地报纸上炒作“红色恐慌”，制造了一种社会与政治抗议被污名化的政治氛围。[3]尽管 1927 年后的共产党人在香港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港，但白色恐怖席卷大陆时，他们很快就被港警逮捕，遣返回广东，接受国民党的审判与处决。30 年代初，香港几乎镇压了所有的共产主义组织。[4]

香港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实则处于深刻变革的边缘。1931 年第六次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首次指出，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已超过从事贸易、商业、保险和银行业的人数。[5]位于香港岛东北部的筲箕湾成为了新的工业区；维多利亚港以北，九龙半岛上正在建设更多的工厂与车间。推动这一工业扩张的主要动力是为国外市场生产产品的华资轻工业。这十年间，随着大陆上战争的蹂躏，越来越多的工厂，特别是上海的工厂，选择南迁至香港，希望在英国的旗帜下获得庇护。从数量上看，华资工厂的数量更多，但规模往往比继续主导经济的欧洲公司要小。

随着香港从贸易港口向工业中心转型，越来越多的人从临近的广东，以及福建、广西或更北部的省份涌入香港。上海的工厂在香港开设分厂，吸引了更多的上海工人搬往香港。工人的工资各异，熟练的工匠每月最高可达 150 港元，男工可能最低有 13 港元。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在 30～45 港元之间，轻工业中

---

[3] Chan Lau Kit-ching. 2000.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4: 1044–61.

[4] Chan Lau Kit-ching. 1999.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921–1936*.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第十章描述了那个年代遭受港警多次突袭的共产主义组织如何迅速瓦解。

[5] Hong Kong Government. n.d.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931*, 101–2, 152.

占主导地位的女工按件计酬，每月仅有 6～15 港元。由于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得花在食物上，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只能住在㓥房式公寓里。通常，有家庭的人租的是“隔间”，而单身工人挤在“床位”上，甚至与母亲或姐妹共享一个床位。[6]

无论他们籍贯何处，或是在香港生活了多久，这些工人始终没有建立对殖民地的归属认同。他们是所谓的“内部移民”，遵循着中国一贯的生存策略做事。[7]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是寄居者。这种心态可以从他们的同乡会或其他互助组织的命名中窥见，“侨港”一词经常出现。[8]在港华工无论生死，都认为故乡才是自己的根。[9]

爱国主义的复苏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港华人对于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感到震惊与愤怒。1928 年，日军在山东济南屠杀了两千余名中国平民，在香港引起轰动。由商界控制的报纸，特别是《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对此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报道。一些勇敢的华人违反殖民地法律，在街头公开发表演说，呼吁大规模抗议日本侵略。他们很快就被逮捕、罚款并被判处劳役。这些闪现的抗议将成为持续性运动的前奏。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几天后，香港数万名华人在集会所与街头举行大规模集会。在湾仔市中心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中，这些和平抗议演变为暴力事件，当时有日本侨商嘲讽他们是“亡国人”。抗议的华人与赶来制止混乱的警察发生了冲突。随着殖民地内抗议活动的蔓延，警察已经无法平息

---

[6] H.R. Butters. 1939. *Report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Noranha & Co. Ltd, 142–49.

[7] 关于“内部移民”作为家庭生存策略的讨论，见 Philip Kuhn.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4, 25–28. 关于内部移民，见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侨港”一词的使用并不局限于 30 年代。我在 90 年代初访问香港时，就在街道上看到许多带有“侨港”字眼的标志。

[9] Elizabeth Sinn. 2007. ‘Moving Bones: Hong Kong’s Role As an ‘In-Between Plac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Cities in Motion*, edited by Sherman Cochran and David Strand, 247–71.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骚乱，于是动员正规军维持秩序。[10]最后，总督的官方报告称共 14 人死亡，其中有 6 名日本人、8 名中国人，但殖民当局内部流传的信息表明，英军至少杀害了 400 名中国示威者，200 人被逮捕并关入监狱。正如第二警察庭裁判官（Second Police Magistrate）指出的那般，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十分苦涩”。[11]

仅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懑还不足以引起广泛和持续的抗议。当局认为热门的高升戏院是促进抗日活动的场所，在 10 月初暂停其演出三日。理发师行会被指控为“积极煽动与抗日运动有关的不满情绪”而遭到取缔。[12]然而，实际的组织节点太多，殖民地当局根本无法识别。事实上，每个居民区都拥有自己的非正式网络，其联系远远超出社区边界，并依靠这些网络动员华人同胞。愤懑之情得以广泛传播，以至于商铺的抵制活动总能引来大量路人，他们的叫好声与砸毁、焚烧日货的声响相互交织。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报纸经常会有“空版面”，因为其中带有反日情绪的文中已被移除。尽管如此，但华人有着规避审查的办法，例如在当年的新年贺卡上印有与侵略日军作战的大陆英雄，而并常见的“祝你好运”等祝福语。通过这些明确的图像，在港华人发出了他们支持祖国英勇抵抗的呐喊。[13]

新一代的劳工领袖

在民间自发的救国行动中涌现了新一代的青年领袖。他们或是没有党派关系的共产主义者，或是为救国存亡而聚集的地方活动人士。香港抗日救国会可能是最早以工人为基础、由独立的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救国组织。其中一位主要

---

[10] Lu Yan. 2014. ‘Together with the Homeland: Civic Activism for National Salvation in British Hong Kong.’ *Modern China* 40, no. 6: 639–74.

[11] ‘The Governor’s Statement in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st October 1931, in Regard to the Anti-Japanese Agitation’, in Colonial Office, CO 129/536/6, 62; D.J. Crozier. 1968. ‘Grantham Interview’, 21 August. Manuscripts Archive, Rhodes House, Oxford University, 8.

[12] ‘Order b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No. 617, 1st October 1931’, ‘Order b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No. 686, 9th October 1931’, and ‘William Peel to J.H. Thomas, 16 October 1931’, in CO 129/536/6, 51, 52, 23–25.

[13] 梁柯平：《抗日战争时期的香港学运》，香港：香港各界纪念抗战活动筹委会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2 页。

领袖周楠（1907—1980）来自广东一户贫农家庭，只完成了小学教育。1927 年，他在香港的一家电池厂工作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后，他的联络人被逮捕，他与组织失去联系。[14]周楠靠打零工为生，他热衷于阅读马克思、列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家艾思奇（1910—1966）的作品。他还向《大众日报》投稿，该报由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办，是一支由政治与军事领袖组成的异见组织，1933 年他们在南京发起叛乱失败后在香港设立基地。周楠为《大众日报》撰写的文章吸引了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他们在 1935 年秋成立了一个地下学习小组，很快就转变为香港抗日救国会。没有与党联系或收到指导的情况下，香港抗日救国会的成员数估计有 400 至 500 人，其中多为工人，少量是学生、教师与店员。1936 年 9 月，香港抗日救国会举行“九・一八事变”纪念会时遭到港警突袭，自此一蹶不振。彼时周楠正在上海参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会议，因而逃过一劫。[15]

尽管香港抗日救国会不复存在，但年轻的活动家很快就聚集在另一个组织周围——由独立的共产主义者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共同组成的华南救国会。[16]本文开头提到的吴有恒在 1936 年春，从广州抵达香港，希望登船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武装。不久后，他加入了华南救国会，留在了香港。9 月，二十三岁的吴有恒入党，当地党员与北方的中共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后，他被任命为中共香港市委的书记。作为华南救国会的代表，他与已解散的香港抗日救国会的剩

---

[14] 这是中共在华南地区的大事：周楠的联络人莫叔波叛变，出卖了多名同志。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大盛给中央的报告：广东省委等机关被破”，载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19 卷，1982 年：第 1—2 页。关于香港抗日救国会与周楠的描述，见何锦洲：“民主革命时期周楠同志在香港、广（见下页）州的革命斗争”，在线链接：gzzxws.gov.cn/gzws/cg/cgml/cg1/200808/t20080825_3742_7.htm。何锦洲回忆中的关键信息可以与 30 年代两个同时期来源进行交叉验证：1931 年大盛（李富春）给中央的报告，以及 1941 年 1 月 25 日“香港青年工作报告”，载于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44 卷。

若想在线阅读此书：marxists.org/chinese/pdf/history_of_international.htm。——译者注。

[15] 根据中共内部报告称，港警突袭香港抗日救国会的日期是 1937 年，见“香港青年工作报告”，第 130 页。报告中，周楠被称作“洪標”，这是他在香港作为地下党员时的名字。何锦洲的回忆录则使用“洪飙”。根据相关事件的资料交叉对比，何锦洲提供的日期更为准确。

[16]何思敬：“回忆李章达先生”，载于《广东文史资料》1963 年第 10 期：第 19 页；方少逸：“忆学生运动片段”，载于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青年运动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00—109 页。1933 年方少逸是中山大学的学生。

余成员取得了联系。[17]吴有恒在 1940 年作为香港代表前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大之前，他就已经成为香港群众运动的一名敏锐的观察者。[18]

20 世纪 30 年代末，香港的政治气候并不那么压抑的情况下，工人在殖民地内的救国存亡运动迅速重组。复苏的劳工组织中，曾领导海员大罢工却在事后被取缔的香港海员工会，再次成为最突出与积极的组织。从反共镇压中幸存下来的前工会活动家在组织海员同胞参与殖民当局所能容忍的“俱乐部”方面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余闲乐社就是这种伪装成文娱社团的工人团体。余闲乐社成立于 1929 年的“日本皇后”号，组织中国海员在海上表演粤剧，在他们生病或失业时提供接济。本文开头提到的曾生，曾因救国活动而在广州躲避追捕，在“日本皇后”号当走钟仔（一种服务生），后来成为工会的领袖。1937 年，众海员曾两次向殖民政府申请将他们的组织注册为工会。第一次被断然拒绝，但第二次有了一千余名海员的签名，于是申请通过，此后，余闲乐社便登记为香港海员工会。[19]

罢工、抵制与筹款

重组后的香港华人劳工再次成为援助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先锋。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3500 名在日本船只上工作的华人海员离职。加拿大—太平洋航线上的四艘“皇后”号远洋邮轮——“日本皇后”号、“加拿大皇后”号、“俄国皇后”号、“亚洲皇后”号上工作的海员中，有 845 人离船，抵制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岸上的劳动行动进一步蔓延，1937 年下半年，海员与码头工人的 17 次抵制得到了 8399 人的支持。[20]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2 月间，香港的船坞爆发了四次罢工，有 3000 人参与。香港九龙码头及货仓公司爆发了

---

[17] 大部分关于吴有恒的信息，见“香港青年工作报告”，以及 1941 年 2 月 16 日“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均载于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44 卷：第 127—517 页。另见吴有恒：. 1993. “把握风光唱晚晴”，载于《吴有恒文选》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 年：第 243—247 页。

[18] 见 1939 年“中共香港市委致中央电：香港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载于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44 卷：第 41 页。除了吴有恒，还有四名代表，三名是工人，一名是九龙区委书记。

[19] 周奕：《香港工运史》，香港：利讯出版社，2009 年：89–92；曾生：《曾生回忆录》：第 59—63 页。

[20] 吴有恒：“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第 399 页。

长达 9 天的罢工，有 2000 名码头工人拒绝卸下日货并阻止它们上岸。在标准石油公司，500 名工人拒绝为日本的物资装货，迫使公司取消合同。共产党员在其中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工人也会自发抵制日本。香港最大的华资粮食行宏记办馆，400 名码头工人拒绝为运往日本的粮食装货。还有码头工人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钨矿丢进海里。太古船坞 5000 名工人全体拒绝修理日本船只，甚至说服公司雇佣的替代工人也进行抵制。[21]在审查制度和日本驻港总领事的监视下，有关华工、抗日罢工与抵制的消息无法出现在当地报纸上。然而，参与或密切关注这些集体行动的共产党人在内部报告中记录了数百页的详细描述，描述了 1936 年至 1939 年间香港工人抗日抵制行动的迅速发展。

香港的中国工人除了针对日本的破坏行动，还通过筹款支持中国的抗战。1938 年，一场由摊贩发起的一场行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场行动始于九龙半岛的新兴工业区深水埗。彼时的殖民地正在纪念抗战爆发，三位瓜菜贩决定举行为期三天的义卖。这些商贩是穷人中的穷人，每日出售着容易腐烂的蔬菜，赚取着微薄的利润，但他们为国捐献的举动感染的周遭的人群。消息传到纺织工人后，他们立即想出了个巧妙的计划：他们去找厂主，要求厂主也得作出相应的举动。在舆论压力下，厂主统一了，整个殖民地都在效仿这一策略。结果，每个市场都举行了慈善义卖。[22]工人想出了个可以让公众深受感动的方式，数百人聚集在一起，穿行在香港的街道上，用着震耳欲聋的声音高喊：“救国呀!”[23]短短三周，便筹集了 70 万港元。1938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一周年，仅商贩就筹集了 1180 港元。[24]他们的义卖持续了一整年，共筹得 30 万港元。[25]

在中国工人带头参与香港民间运动的同时，殖民地的商业精英也不甘其后。1935 年，中国政府宣布开展“募捐购机”运动时，欧亚混血的百万富翁何东（Robert Ho Tung）是主要的捐赠者。商界的其他人士也都有所贡献，他们

---

[21] 1939 年 11 月“香港职运工作报告: 1936 年 6 月至 1939 年 11 月香港工人的生活概况、职工组织和反日斗争等情况”，载于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44 卷: 第 11—40 页，具体页数是第 16—18 页；吴有恒:“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第 387—390 页。另见曾生:《曾生回忆录》: 第 83 页。

[22] 吴有恒:“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第 345—346 页。

[23] 同上。

[24] “瓜菜贩义卖赈款昨交华商会”,《星岛日报》1938 年 8 月 13 日: 第 10 页。

[25] “今年‘八一三’义卖小贩主张自办”,《华侨日报》1939 年 6 月 7 日。

遵守着殖民当局划定的法律界限，谨慎地为运动募集捐款。1937 年战争爆发后，中华总商会成为向中国政府转交捐赠资金的官方中介机构。彼时，救国运动已经成为一场全香港的运动，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都参与其中。电影演员、歌女、工厂工人、街头小贩、店员、教师以及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成立了自己的救国会。[26]一位观察家统计，在 1937 年下半年殖民地出现了 150 个这样的组织。[27]

殖民当局涉足劳工事务

20 世纪 30 年代末，救国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兴起反映了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殖民主义的压迫出于需求而必须有所缓和。1936 年，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时，英属亚细亚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欧战迫在眉睫，英国希望避免两线作战，于是采取了一种“仁慈中立”（benevolent neutrality）的态度，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与有限的物资援助，同时避免与日本的对抗”。[28]英国当局允许三十多个官方与半官方的中国机构在香港运作，从海外购买战略物资。[29]同时，在国共统一战线抗日的背景下，香港殖民政府也稍微放宽些反共主义的立场。1938 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被允许在香港设立联络处，由廖承志担任书记。

殖民地在帝国中央的敦促下，以及香港工业发展的现实，当局在 1938 年任命了首位劳工事物主任。然而，在一起处理重大劳资纠纷的记录中，人们不得不怀疑殖民当局是否调整了传统上的亲商立场。1937 年至 1939 年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曾被正式制定为中国的货币印刷厂）爆发了三波劳工抗议浪潮。工人集体行动，反对公司在 1937 年决定延长工时的决议，1938 年对印刷过程中破损的三张钞票征收高额罚款，以及 1939 年底的大规模解雇。劳工事物主

---

[26] 香港救国运动的英语资料很少，但中文回忆录比比皆是。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学生参与援救中国的最新出版物，见 Peter Cunich. 2012.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ume 1, 1911–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87–93.

[27] “香港青年工作报告”：第 211 页。

[28] B.A. Lee. 1973.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Chan Lau Kit-ching. 1990. *Britain, China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 6.

[29] CO 129/580/3, 36–38.

任毕打士（Henry Butters）是一位公正的进步派，他意识到工人的经济诉求，并成功调节了第一次纠纷，工人感到满意，但他却被排除在后续的纠纷之外。殖民当局直接让警察协助厂方将工人赶出工厂。尽管 1200 名被解雇的工人受捐助而持续抗议数月之久，但最终还是在华民政务司的命令下被迫接受遣散费并离开香港。

随着中华书局的劳工抗议被平息，仍处于殖民之下的香港已不再是十年前的香港。香港正在崛起成为中国沿海的新一个工业中心，职工的数量不断激增。殖民当局通过设立劳工处，摆脱了间接统治当地华人的传统。曾受国民党影响的劳工行动，见证了救国运动中新一代活动家的崛起，他们很快就选择成为共产主义者。廖承志、吴有恒和曾生在红磡举行会议的不久后，复兴的劳工行动进入了新的领域。正如更多的活动家很快就会认识到的那般，和平回归香港后，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场训练出了新一波的劳工运动。

1941

中共自长征（1935 年）结束后盘踞在陕西省延安地区，1937 年，面临日本侵华的共同威胁，国共两党再次结成脆弱的同盟，通常被称作第二次国共合作。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后，这段紧张的关系陷入危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伏击并杀害了数千名共产党士兵。在两党关系破裂的期间，中共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唯一合法的报刊《新华日报》成为了牺牲品——但很快就被允许恢复出版。《新华日报》除了传播共产党的路线并报道国内外新闻，还为识字工人提供了表达不满的论坛。通过分析《新华日报》刊登的工人新建，本文将探讨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在中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新华日报》与战时重庆的阶级道德话语

何稼书（Joshua H. HOWARD）[1]

禁止重庆五万余名兵工厂工人阅读《新华日报》的同时，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谴责了这份共产党报纸的颠覆性信息：

> 新华日报思想偏颇，文字激烈。对抗建前途危害实大，现正积极从事防范，以免猖獗。兹以国防工厂工人众多，如受其影响势难弥遏。[2]

一个月后的 1941 年 4 月，《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记录了这次镇压：

> 警察、特务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到处禁止阅读报纸，毁坏报纸，逮捕小贩，甚至阻止中央通讯社的发稿和新闻检查局的稿件传送。工厂保安任意逮捕送报人员；读者被逮捕；各省市县都禁止销售。[3]

针对新华日报——共产党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唯一的合法实体——的反共浪潮，部分源自皖南事变的影响。为报复共产党新四军拒绝服从蒋介石从安徽、江苏撤军的命令，国民党军队于 1941 年 1 月伏击并杀害了数千名新四军士兵。这场冲突破坏了国共之间的政治同盟，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甚至威

---

[1] 本文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展研究。作者十分感激能在 2019—2020 年被选为史带基金会东亚研究捐赠基金成员。他感谢 Michael Strange 的编辑帮助，Giancarlo Falco 与 Michael Hoffheimer 的思路与建议。

[2] 俞大维：1941 年 3 月 11 日“兵工署严禁各厂工人订阅新华日报代电”，载于《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卷，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第 1100 页。

[3] 潘梓年：941 年 4 月 12 日“潘梓年关于皖南事变后报纸遭受迫害日益加厉呈”，载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400—401 页。

胁要重新发动内战。而在统一战线的支持下成立的《新华日报》，成了这场政治冲突中的受害者。[4]

仅仅数周，报刊的销量锐减，版面被迫削减至两页，持续一年之久。后来蒋介石认为必须维持“统一战线”的形象，才允许《新华日报》继续出版，直至 1947 年 2 月——他对这项决定深感后悔，认为这是他对共产党犯下的最大错误。[5]1943 年，报纸销量回升，并在重庆的劳动人民中广为流传。正如一位激进的工人所说：“《新华日报》站在工人一边，为我们说话。”[6]工人对报纸交口称赞，原因与它被定期打压的原因相同：它报道了日军轰炸所带来的苦难；描述了战时经济的繁荣与衰退；说出了大量难民、移民的涌入，使得城市人口翻了一番，超过百万大关；讲述了被迫的快速工业化，使得城市从商业集中地转变为国民政府的工业基地。

《新华日报》反映并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形成。除了传播共产党的路线并报道国内外新闻，还为识字工人提供了一个论坛，让他们表达不满并评估阶级关系。社会学家查尔斯 · 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讲故事（storytelling）有助于塑造身份认同，并维持社会运动。[7]本文将探讨参与式新闻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推动群众工作

《新华日报》的创刊号上，编辑吴敏介绍了“我们的信箱”栏目，任何读者都能成为报刊的作者。吴敏认为，消除与专业知识相关的光环和等级制度，对于新闻业代表劳动人民的声音是必要的。例如，“一个工人把他们工厂里的生活情形，救亡活动，以及他们自己心里积压得很久的苦闷和希望具体写出来，

---

[4] 《新华日报》创刊于 1938 年 1 月 11 日的汉口印刷，潘梓年为主编，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陈绍禹（王明）为董事长。1938 年 10 月迁往重庆，直到 1947 年 2 月 28 日，国名政府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取缔了共产主义的通讯渠道。报纸转移至重庆后，董事长一职转交给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5] Kui-Kwong Shum. 1988. *The Communists' Road to Power: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1935–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2.

[6] 重庆市档案馆 10 厂 8 目 158 卷 170 页。

[7] Charles Tilly. 2002.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这是任何一个名作家所不能办到的。”[8]吴敏提出大众化的概念：“只有工人，农民，店员，兵士，学生，各样的人都把他们的生产，他们的工作，他们所想的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写出来，然后我们的报纸才能真正反映出全国在抗战中的动态。”[9]

在实践上，《新华日报》通过向群众征求来信，现身说法（testimonials），抵消对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的依赖，从而推动“群众工作”。尽管大多数中共党员在 1939 年之前都已转入地下，但《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上发行的事实，加强了它作为反对派报纸的功能。与共产党根据地上用以“解释政策或教导干部如何做事”的《解放日报》不同 [10]，《新华日报》试图营造新闻的“活跃领域”。[11]党的领导层意识到，共产党的日报版面上的公众参与将吸引国统区的读者。

1942—1943 年的整风运动以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名义，促使《新华日报》深化了对群众工作的承诺。整风运动在共产党根据地内通过群众批斗施加心理压力，压制知识分子的异议，贯彻党的纪律；而在国统区，整风运动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没有针对知识分子异见者的公开运动，由于需要维持地下党的纪律，在 1942 年，地下党员的人数从六万锐减至五千名核心党员，整风运动被迫秘密进行。[12]整风之后，《新华日报》加倍推进“普及化”，采取汉语口语，并鼓励印刷各行各业的人写的信。在九年多的历程中（1938 年

---

[8] 吴敏：“我们的信箱”，《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 11 日第四版。

[9] 同上。

[10] Patricia Stranahan. 1990. *Molding the Mediu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Liberation Daily*. Armonk, NY: M.E. Sharpe, 82.

[11] 杰弗里 · 布鲁克斯（Jeffrey Brooks）在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大众报纸如何传播新的政治语言时，区分了三种信息领域：“活动领域（active sphere），旨在吸引苏联机构的参与者、党员以及政府中的其他踊跃支持者；信息领域（informational sphere），旨在为普通读者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最后，鼓舞领域（inspirational sphere），为所有人阐述抽象的道德价值观。活动领域包含领导层与报道记者给活动人士的信息，也包括活动人士通过书信等形式的回应，通常会经过编辑。报纸的这部分，后来成为工农致信的领域，也是来自人民的知识分子的领域。”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来信中，三种信息领域有着较大的重叠，但活动领域强调了当地参与（local participation）的重要性，这是苏联新闻与中共报纸最具创新性的特点。Jeffrey Brooks. 1989. ‘Competing Modes of Popular Discourse: Individualism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 Russian Print Media, 1880–1928.’ In *Culture et revolution*, edited by Marc Ferro and Sheila Fitzpatrick.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79.

[12] 四川省《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重庆市《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编：《〈新华日报史〉新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年：第 149—150 页。

1 月 11 日至 1947 年 2 月 28 日)，《新华日报》刊登了 500 多封（该栏目共发表了 700 封）自称是工人的信件，其中约 86%是在整风运动后的 1943—1946 年间发表的。

下表强调了在这些年与劳工相关的报道的急剧增长：

《新华日报》与劳工相关的报道数量，1938—1946 年[13]

文章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劳动条件	17	46	70	27	4	99	153	51	21
劳工运动(国内)	78	24	32	14	28	19	21	338	414
劳工运动(国际)	71	40	47	31	34	120	56	150	232
五一纪念活动	28	36	32	20	21	19	14	7	18
中国劳工组织	N/A	2	3	1	13	14	8	7	126
失业	29	0	0	0	0	17	30	17	11
共计	223	148	184	93	100	288	282	570	822
工人来信	10	19	37	0	5	47	147	171	69

除了大量关于战时社会生活的报道，信中还有着有关不公、苦难、对更好生活的渴望——这些都在帮助工人构建一个阶级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并推动了 1945—1946 年的战后劳工运动。[14]

新的阶级共同体

劳工史学者常常回避阶级形成的叙述，强调地域主义[15]或争取地位的目的，[16]但我对工人现身说法的分析突显出他们对“正当反抗”这一概念的使用，[17]，

[13] 新华日报索引编辑部编:《新华日报索引》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 年。

[14] Benedict Anderson. 199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5] 例如，见 Elizabeth J. Perry (ed.). 1996.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他们会运用强权的言辞，以及权利或阶级的语言，从而限制权力的行使。到了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许多来信构成了一种呼声，工人在信中讲述他们的苦难，并请求帮助他们为维持生计以及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这些对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关注是典型的阶级排他性概念（exclusive notions of class）。对于“人的尊严”与各种自由的诉求，通过基于普世人权的方式而具有阶级包容性。[18]有些来信会公开批评资本家及其对工人的剥削，但较少会直接地谈论阶级问题。然而，通过将自己标识为“我们工人”，这些写作者假定了一个集体的政治身份，掩盖了个性、地狱、手艺与教育的差异。此外，这些来信通过高度道德化的语言，突显出工人对抗腐败当权者的形象，从而创造出一个“阶级共同体”。道德与伦理规范启发了写作者对阶级关系的理解。工人的道德关怀以及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稳是由于社会关系不公正的认识，共同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形成。

《新华日报》通过表达工人群体的关注内容，因此吸引了识字工人，根据刊物的内部调查，他们可能占读者总数的 70%。[19]工人成为报纸的重要读者群体，因为报纸关注他们的需求。就连国民政府的英语宣传杂志 *China at War* 也不得不承认：“《新华日报》对学生、工人生活的报道比其他报纸都要充分。”[20]中共意识到，他们可以在重庆的劳动人民中吸引到大量读者。工厂扫盲运动的开展，工人对教育的需求，反映出他们正在努力抵制与体力劳动相关的污名，以及对尊严与地位的追求，使得提升的识字率比预期要高。兵工厂工人的识字率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俞大维会担心报纸影响工人的原因之一。对大约 6760 名兵工厂工人的调查表明，82%的工人识字。[21]由于受教育的机会有

---

[16] 例如，见 Thomas C. Smith. 1988. ‘The Right to Benevolence: Dignity and Japanese Workers, 1890–1920.’ In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 1920*, edited by Thomas C. Smith, 236–7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 Kevin J. O’Brien.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 no. 1: 31–55.

[18] 关于排他性与包容性的阶级概念，见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 1999.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4.

[19] 黄淑君：《重庆工人运动史：1919—1949》，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97 页。

[20] Hung-tseng Chang. 1945. ‘The Chungking Press: I.’ *China at War* 14, no. 5: 74.

[21] Joshua H. Howard. 2004.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40–41.

限，女工的识字率较低。但在重庆的纺织厂工作的工厂救济队组织了扫盲班，有三万人参加。教员们标识，1939 年刚来时，文盲率高达 90%，但到了 1943 年春，已降至 42%。[22]

共产党的报刊在重庆的工厂内大量涌现的读书会中找到了现成的读者。警方报告称，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读书会与其他文化团体已经倾向于共产党："他们的行动方式是组织救国团体，如读书会、墙报会、戏剧团、合唱团，从而吸引左倾工人阅读他们的纲要，熟悉共产主义思想。"[23]

正如读书会被赋予的政治色彩，向《新华日报》写信的行为也变成了政治行为。工人希望通过来信获得尊重，并影响公众舆论，以及政府对工人诉求的认可。信的原件在出版时就会被销毁，以免作者遭到报复，所以很难鉴定来信的真伪。但是，尽管《新华日报》会进行一些编辑校对，避免某些过于冗余、简单且直接的语言，引用的对话中所使用的四川方言，或是某些语法错误，但这也表明来信确实是来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写作者。甚至有几封信充当的教学文本，编辑会将错字保留，将正确的字放在括号里。[24]即使内容的特殊性有时会被夸大，但工人在信中提出的问题，与他们的请愿书、罢工诉求之间确实有着相似之处，足以表明这些来信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员编造的。

性别牺牲的修辞学

鉴于战时背景与中共将一切利益（包括阶级利益）服务于民族利益的战略，[25]工人经常使用"为国献身"的修辞：

---

[22]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生活指导组撰述：《战时纺织女工》，重庆：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1944 年：第 7 页。

[23] 重庆市档案馆 20 厂 1441 卷 86b 页，1939 年 2 月 14 日。

由于无法查询档案，此处为译者自译。——译者注。

[24] 例如，见"现在有没有民主？一群小工们说：没有！"，《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12 日，第三版。

[25] 周恩来："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新华日报》1941 年 6 月 15 日与 22 日。周恩来试图反驳国民党对中共滥用、错用此口号的指控。周恩来认为："''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

> 我们是一群年青的女工，我们为了生存，为了民族解放，正对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标来参加生产工作，离开可爱的家庭，放弃幼小的儿女，绝不因家事而停生产。虽得到微薄的工资，只要能维持下去不会嫌少。但是物价高涨，每天六角多钱能过得下去吗？有一次ＸＸＸ，因物价高涨，每工人每小时增加工资两分，然而我们女工例外，使我们忿忿不平，因为我们工作效力，工作时间，与男工相同无异。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还有男女之分，抗战是属于男人吗？我们选举几个代表向厂里要求，厂长的答复：“女工是临时的，要做就做，不做就滚。”[26]

这封信既有大胆地、对性别平等的坚定要求，又有巧妙地、对民族主义的精心呼吁。作为一种合法的抗议，信中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口号，强调年轻女工如何“舍小我成大我”，离开家庭、离开子女，前往工厂工作。写作者控诉了厂长的冷酷无情，尽管工厂的名字被掩去——这是一种自我审查，可以避免与工厂发生直接冲突，并与国共统一战线建立跨阶级同盟的策略保持步调。女工要求承认她们的战争贡献，并要求性别平等。

男工、女工都以“救国”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但特定性别的经历使得女性会强调她们作为女性而遭到的压迫，并谴责工厂对她们身体的控制。惠英讲述了在一次空袭失去丈夫后，为了“喂养我肚子里的小宝贝”，如何在一家棉纺厂里工作。她讲了一个为了可能夺走她生命的工作而牺牲的残酷讽刺：

> 进厂不久，我肚中的小孩一天天的大起来了，起初还是做着工作，还是不让工头知道，怕的是他们知道了便要开除我，一直到小孩快要临盆的时候，我请了五天病假，把他生了下来。那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啊！我一见到他，便想起他的父亲，禁不住流下泪来。
>
> 五天的假期很快过去了，产后的第四天，我一边抱孩子，一边想着工作。厂里的女工因为生孩子被开除的已经有好几个了，我能丢掉我的孩子么？我能不做工作养活孩子么？千丝万相的结果，不知从哪里来的硬心肠，我当时竟决定了还是丢掉了孩子，当天晚上，我咽着自己的眼泪，把他丢进了毛坑里，我像发疯了似的头也不回的跑开了。
>
> 今天，已经有五年了。五年里面，几乎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着。让鸟羽似的飞满满了工房里的棉花纤维，盖满了我的发和

[26] 凡尔：“我们要求同工同酬”，《新华日报》1940 年 4 月 13 日第四版。

> 眉毛。在热天，棉屑还跟着头上的汗，滴进入嘴角和眼睛里。有时随着呼吸还钻进了鼻腔和肺部。五年来我几乎付出了我整个的生命，得到的结果是害了肺病。[27]

惠英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纺织业的典型现状，在纺织业中，很大比例的工人都患上了结核病。在《一个女工的自述》中，作者冰冰讲出了她在看到招聘农村妇女加入棉纺厂的广告时的兴奋心情。广告承诺“做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可当她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工厂的钟比外面慢，实际上是十三个小时）时，她的希望破灭了。她讲述了夜班的虐待与工人所遭受的羞辱，她用“地狱的生活”来形容自己所处的环境，在道德上创造了善与恶的对立。这封信发表于 1940 年，当时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仍强调各阶级的联合，值得注意的是，她直接批评了资本家：

> 晚上也要做几个钟头的工作，夜深了常常会头晕眼花，每当在支持不住时，去向工房管理人请假，他会说你“装病”。有些工友常常第一次请不准假，再去请第二次，便会吃一顿脚头和耳光，因为这样，我有时虽病的连呼吸的力量都没有，可是我不敢去请假，宁愿拖着病，含着心酸的眼泪，强度这无情地连牛马都不如的生活。
>
> 身上的月经来了，仍然不让你有一刻的休息。厂方的医药设备简直没有，肚子痛的发慌的时候，弯腰休息一会，都不可能，这确实地狱里才有的黑暗。在这里，所谓的人类的同情，简直没有。
>
> 地狱的生活，我已受这么久了，社会人士却没有想到在人间还有我们这一群可怜的生物。他们被资本家的所谓“八小时制”的口号所蒙蔽了。因此我真实地描绘出我们的生活希望求得社会人士和妇女界的援助，希望工厂老板们能给我们生活上以起码的改善。[28]

不平等、割裂与腐败

冰冰在信中使用了“牛马”的比喻，唤起工人对“人的尊严”的追求——这是来信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对尊严的追求，生产工人和技术、行政人员之

---

[27] 惠英：“我怎样失去了健康：一个女工的遭遇”，《新华日报》1944 年 3 月 12 日第四版。

[28] 冰冰：“一个女工的自述”，《新华日报》1940 年 4 月 27 日第四版。

间不平等且割裂的描述相吻合，也与长期以来对体力劳动的文化偏见相呼应。战时，这种对立加剧，因为工业界试图使生产系统合理化，并监督数以千计的工厂社区，职员和工人之间的比例迅速上升。此外，来自华中与沿海地区的“下江人”垄断了行政与管理职位，职员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族裔的对立所覆盖。这种割裂在下文中对腐败的工厂官员、职员的谴责中显而易见，他们背叛国家的信任，漠视工人的困境：

> 编者先生：
>
> 我是一个国防工厂的小工人，自从到了本厂以后，发觉本厂当上官的先生及职员先生们常常互相争斗，彼此为着私人的名利，不惜延误国家的工作，更随意压迫着工人。职员们当上官发了几万元的钱进了一所新的西洋式的房子住着，而我们工人住了一所茅草屋，还不肯设法安排安全。他们拿了国家钱百元几十元的薪水，烧饭烧水还要用国家公费买的煤炭，而我们工人生活的痛苦，竟视若无睹。长此以往，关系整个抗战甚为巨大，我们曾劝谏他们，但无效果，请你们帮同呼吁为何。[29]

到了 40 年代中期，工人的来信中提到了工厂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影响整个城市的国家政策；工人用相较于职员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例如食物配给方面，他们认为厂方偏向职员。

管理层所用的“待遇”一词是指工资之外的福利，而工人这将这个词与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尊严的追求联系起来。例如，一位机工请朋友到工厂食堂吃饭的时候，被经理的妻子喊过去接受批评，因为只有职员才能在食堂“请客饭”：“为什么工人的地位比职员低？这种思想我们绝不赞成！没有工人，你们又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坚决要求平等看待，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思想！”[30]工人将身份认同、阶级以及权利的话语混合。另一封信中，匿名的写作者被告知只有职员才能买一斤糖后，对每月的食品配给发出质疑：

> 我想同样是人，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连食物的享受都要分阶级？难道说工人与职员的体质有什么区别不成？职员是人，工人也是人，干嘛要

[29] “一个工人的呼吁”，《新华日报》1938 年 12 月 13 日第四版。

[30] 克之：“不许客饭”，《新华日报》1944 年 5 月 25 日第三版。

把人的阶级分的如此悬殊呢？工人无权利购买白糖，这只是“员”“工”待遇不平等的现象之一。[31]

推动劳工运动

《新华日报》的参与式新闻在短期与长期内都产生了影响。除了通过阅读、写作与分享报纸来塑造阶级意识，共产党的报刊还推动了劳工运动的发展。关于国统区与国际劳工运动的报道，有助于培养工人的共同意识。时至 1945 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导下，报纸从战时“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转向动员学生、工人参与社会运动的战略。通过同情感的报道宣传工人的诉求，争取公众对劳工事业的支持，《新华日报》为工人的政治化作出了贡献。

工人信中对尊严、经济正义与人权的要求在劳工运动中重新浮现。1945 年 2 月的胡世合事件（电工胡世合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是最早的劳工抗议事件之一，八万居民他的灵柩所处的偏远佛寺中吊唁。[32]一家工厂的全体工人送去的挽联与《新华日报》刊登的来信中权利与阶级的道德语言相同。特务被称作“九妖十八怪”，支撑着特权阶级的统治。工人高呼正义与法律：“偷电杀人，国法何在？为公义在，虽死犹荣”。[33]

许多工人在信中提出的问题都对 50 年代初共产党政权的社会政策与政治运动产生了影响。毛泽东主义的政策与工厂运动不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从始至终都受到中共的指导，并为中共的利益服务”。[34]相反，这些运动与社

[31] “吃糖的问题”，《新华日报》1944 年 2 月 28 日第三版。

[32] 胡世合之死与重庆邹容路中韩文化协会餐厅的腐败行径有关——中韩餐厅是军统特务伙同警察局开的。饭店老板把电源线装在了督邮街的变压器上，导致其过载。1945 年 2 月 19 日，一组电工前去剪断非法电源线时，特务江德懋带头殴打电工，还把他们关进当地大阳沟派出所。重庆电力公司介入后，他们才被释放，次日清晨，胡世合在内的一组电工再次前往餐厅，彼时，江德懋率领二十多个保安在马路前把他们毒打一顿后，还要扭送至派出所，经过民国路口的时，军统特务田凯握着手枪跑来，朝着胡世合的腹部开了一枪。胡世合先是被架着拖到警察总局拘留近两个小时后，才将他送往宽仁医院。他在抵达医院前，就因失血过多身亡。“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电还枪杀工人，特务统治一天不取消，人权就一天没有保障”，《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2 日第三版。

[33] “掉胡世合君”，《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7 日第四版。

[34] Kenneth G. Lieberthal. 1980.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会政策致力于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并赋予工人“人的尊严”，这是对工人在前十年中表达出来的不满与期望的回应。

最后，我们应该考虑《新华日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界的遗产。1949 年后的初期阶段，参与式新闻蓬勃发展。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50 年代通过宣传与新闻媒体推广的政治语言直接建立在《新华日报》中工人所开创的丰富的阶级语言之上。

1942

在中国，“英雄主义”故事一直以来都是儒家教育的重要支柱。帝王、将军、清官、诗人或是贤惠的寡妇，都被推崇为值得效仿的榜样，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推行自己的革命烈士与英雄的崇拜。“劳动模范”开始成为值得效仿的对象。1939 年，中共借鉴了苏联不久前出现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始评定劳动英雄与劳动模范。随后几年间，特别是 1942 年之后，党媒经常刊登有关被授予称号的农民、工人、干部与兵士的文章，且常常会给他们颁发奖项。本文将追溯吴满有令人感慨的兴衰起伏，他是最早的劳动英雄之一，毛泽东甚至亲自表彰他的成就。

中国头号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兴衰起伏

博·埃伦伦·瑟伦森（Bo Ærenlund SØRENSEN）

1944 年 5 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部延安根据地，五年来首次允许外国记者访问。[1]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和根瑟·斯坦因（Günther Stein）这两位记者都注意到中国头号劳动英雄吴满有所获得的庞大声望。福尔曼记载道：

> 他（吴满有）的画像与毛泽东、朱德等高级军政人物的画像一起挂在画廊、家庭和公共场所的显著位置……作为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其他劳动英雄一起，不仅受到人民极高的尊敬，还被邀请出席所有群众和政府的集会，与最高军政领导人一起坐在荣誉席上。[2]

福尔曼所见证的是一场通过宣传勤奋个体的行动与态度从而改善治理的运动，这些人会被授予“劳动英雄”与“劳动模范”的称号。[3]这将是一项延续至今的传统，在数十年间通过新闻报道、纪录片动作片、歌曲、舞蹈、徽章、邮票、博物馆与小学课本等方式让全中国人民所知。本文通过讲述吴满有如何一举成名，却在不久后从公众记忆中被移除的故事，总结出一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治理的一般性教训。

---

[1] Warren W. Tozer. 1972.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Visit to Yenan in 1944: A Reassessme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1, no. 2: 207–24.

[2] Harrison Forman. 1945.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NY: H. Holt & Company, 63.

[3] “劳动英雄”与“劳动模范”只是那个时期赋予的几个称号中最常见的两个。为了方便本文的论述，我将只使用这两个称号。

创造模范

传播值得效仿的英雄故事并不是中共的发明，而是长期以来，“就以帝王、将军、诗人、地方官与孝子等故事形式成为儒家教育的重要支柱”。[4]史学家孟旦（Donald Munro）指出，党-国对劳动模范叙事的传播借鉴了悠久的教育传统：“中国人许多著名的历史研究，大都是为了挖掘出过去的模范从而教育民众。”[5]然而，中国共产党将为这一过程带来新层次的有目的的控制与设计。

挑选劳动模范供民众效仿的直接灵感似乎源自 30 年代中期的苏联，当时一名顿巴斯地区的年轻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在 1935 年因超额完成配额而在全国范围内广受赞扬。1936 年，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刊物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有效刺激生产力。[6]自 1939 年起，中共在延安开始评定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从 1942 年 4 月起，《解放日报》开始发表关于授予农民、工人、干部与兵士这些称号与奖项的文章。

我们若想理解普遍出现在中共的宣传中，尤其是吴满有为何如此备受关注，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毛泽东对于将模范作为大众教育手段的支持。接受斯坦因记者的采访时，吴满有曾解释道：“1941 年，毛泽东同志呼吁民众发现农民中的模范农民，可以去当首批劳动英雄的候选。”[7]很快，在 1942 年 12 月提交给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上，毛泽东提议宣传那些在红区中有过杰出贡献者的事迹，以便其他人可以效仿他们的成就。[8]毛泽东特别提及农民吴满有的成就，大幅引用了《解放日报》关于吴满有的记载。

毛泽东的建议很快就成为现实。除了新闻记者外，中共的文化机构也参与了庆祝。1943 年 2 月初，《解放日报》开始刊登以吴满有为主题的木刻画复印

---

[4] Mary Sheridan. 1968. ‘The Emulation of Heroes.’ *The China Quarterly* 33: 47.

[5] Donald J. Munro. 1977.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36.

[6] Miin-ling Yu. 2010. ‘“Labor Is Glorious”: Model Laborers in the PRC.’ In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edited by 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34.

[7] Günther Stein. 1945.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24.

[8] Andrew Watson. 1980. *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 A Translation of Mao’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7 ff.

品。图 1 是由年轻有为的艺术家古元（后来被任命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制作的几幅木刻之一，图中的吴满有被家畜和农作物包围，写着“向吴满有看齐”的口号。



图 1：古元：《向吴满有看齐》，载于《解放日报》1943 年 2 月 10 日第四版

同一时期，著名诗人艾青（也是后来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的父亲）受邀为吴满有的成就而写一首长诗，他前往吴家访问数日，收集灵感与经历。[9]正如古元及其视觉艺术的同时所做的那般，艾青遵循毛泽东将群众置于作品中心的号召，他将他的诗歌《吴满有》标志着他创作上的转折点：此前他的农民书写是忧郁的抒情，而《吴满有》中农民成了有声音、有行动的主体。[10]艾青在后记中记载了吴满有对一行诗的反应，他说服艾青把“老来红”（人到晚年交上好运的意思）改成别的。[11]完成后的诗歌发表在 1943 年 3 月 9 日的《解放日报》上，几

[9] 崔莉莉：“‘吴满有运动’与长诗《吴满有》的诞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3 卷第 2 期：第 48—53 页。

[10] 路杨：“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以艾青长诗《吴满有》为中心”，《文学评论》2018 年第 4 期：第 110—118 页。

[11] 同上。

乎占据了第四版的整个版面。也在同一时期，吴满有的生平故事被改编为秧歌舞、短篇小说与歌曲。[12]

赞颂吴满的文化作品表明，当年参与劳动模范运动的艺术家们，是第一批响应毛泽东号召，为群众创作群众艺术的杰出艺术家。[13]这些艺术作品还表明，在试图通过宣传创造“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沿用“旧词汇”，这反映在来到延安的受过城市教育的艺术家对中国传统年画图案的使用。[14]然而，利用既有的形式，也有可能破坏中共对群众所接受信息的控制能力。正如田晓菲所言，即使是流传最广的劳动模范——雷锋的事迹，人们在理解他时也会带上佛教与道教的动机，这很可能是他能流传如此之广的原因。[15]

吴满有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用途

吴满有的故事似乎有两种作用。首先，通过关注对这类劳动英雄，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生产运动”的同义词——例如，在《解放日报》中经常使用的“吴满有方向”——中共试图传达当地农民与工人正处于政策制定的前沿。其次，与前者相关，中共试图利用劳动英雄称号的分配来在当地社会站稳脚跟。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一时期被选为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人很少是干

---

[12] 王建华：“革命的理想人格：延安时期劳动英雄的生产逻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3 卷第 5 期：第 124—136 页、第 160 页；周海燕：“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第 236—240 页。

[13]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内容，见 Christian Sorace. 2019. ‘Aesthetics.’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11–16.

[14] Chang-Tai Hung. 1997. ‘Two Images of Socialism: Woodcuts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9, no. 1: 34–60.

[15] Xiaofei Tian. 2011. ‘The Making of a Hero: Lei Feng and Some Issues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ited by William C. Kirb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93–305. 同样，贺萧也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被评选为劳模的女性的故事中，话语更多是在强调女性的品德而非如何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说，党-国对值得表彰的现代女性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旧有的、地方性的贤惠妇女观念的影响。Gail Hershatter.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0.

部或党员；相反，中共在从当地拥有名望、生平符合社会主义推翻封建秩序叙事的居民中挑选模范。毛泽东本人在 1945 年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这是劳模的主要目的之一，他说："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16]因此，劳模的传统意味着中共成功地将社会行动者纳入治理机构。

经济政策方面，中共利用吴满有传达出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解放日报》一遍又一遍地表扬吴满有的勤奋与纳税态度，这些文章试图强调的内容是当时普通民众与中共精英所面临的紧迫的实际需求。面对 1941 年国民党加紧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边区政府试图通过让工农延长工作时间，通过纳税或支援工作，提高他们为当地经济作贡献的意愿。

中共对劳模的虔诚依赖还体现在奖项的丰厚上，无论是物质奖励还是社会声望。1943 年底，中共召开了首届劳模大会，授予 185 名劳模由党领导层亲笔签名的荣誉证书。[17]劳模还能获得物质奖励，例如金钱、耕畜和农具。[18]大会结束后，《解放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二十五名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的木刻画像。[19]中共试图依靠物质奖励来激励人民群众加大生产的态度表现得一览无余。

然而，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种对物质奖励的依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相符。这种矛盾十分明显，因为许多被评为劳模的人都是当地社群中最出色的人。吴满有明确地表示，他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甚至可以雇佣别人帮活。[20]吴满有靠压榨他人的剩余价值为生，这一事实导致《解放日报》的一些读者对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表示异议。对此，报社编辑反复解释，尽管这种做法与资本主义有着共同的剥削，但肯定比以前的封建压迫强。[21]在一份内部刊物

[16] Cited in Stuart R. Schram, Timothy Cheek, and Nancy Jane Hodes (eds). 2015.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Volume 8*. London: Routledge, 683.

[17] Yu, '"Labor Is Glorious"', 235.

[18] Govind S. Kelkar. 1977. 'The Role of Labour Heroes in the Yenan Period.' *China Report* 13, no. 4: 54 ff.

[19] 《解放日报》1943 年 12 月 19 日第一版。

[20]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130.

[21] 苏少之："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141 页背面。

中，编辑辩称，在农民中发展的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元素是“自然且可取的”，他们的辩护基于毛泽东在 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论点。[22]

政府对劳动英雄崇拜的推动也可能引发争议，这也是为何毛泽东会前文中提到的 1945 年大会的讲话上警告劳模的部分原因：

> 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23

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如要求劳模与周围社群保持良好关系的禁令都表明，尽管劳模可能有助于加强中共的社会治理与控制，但也可能引起当地社会的敌视。[24]

急转直下

就《解放日报》持续宣传吴满有香港的新闻报道来看，中共一定认为这场运动具有成效。1946 年 7 月，报纸宣布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吴满有的电影，8 月，一家电影制片厂成立，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拍摄这部电影。[25]知名电影制片人陈波儿（她也被评为劳动模范）负责编写《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剧本。[26]

---

[22] Tetsuya Kataoka. 1974.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59.

[23] Cited in 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683.

[24] 关于这一点，对劳模的暴力行动比苏联 30 年代的情况要少得多，且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见 Mary E.A. Buckley. 2006. *Mobilizing Soviet Peasants: Heroines and Heroes of Stalin's Field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49–56. 然而，在文革期间，中国各地的劳模都受到严重的精神与身体虐待，见 Yu, '"Labor Is Glorious"', 248.

[25] 《解放日报》1946 年 7 月 25 日第二版；Yingjin Zhang. 2012. *A Companion to Chinese Cinema. Volume 8*. Hoboken, NJ: Wiley, 321.

[26] Matthew David Johnson. 2008. 'International and Wartime Origins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The Motion Picture in China, 1897–195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30 ff.

这部电影通过追溯吴满有的成年生活，描述 1935 年陕北土改、共产党军队改组、抗击日本侵略、大生产运动以及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和运动。[27]换句话说，这部电影将吴满有的个人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历史与政治历史建立联系，是中共用来合法化自身政策的常用手段。[28]

随着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重新爆发，陈波儿离开了该地，从事其他任务。编剧委员会（包括先前嫁给毛泽东的江青）接手了修改剧本的任务，并在 1946 年 9 月开始拍摄。然而，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情况急转直下。吴满有遭国民党俘虏，并在广播中公开谴责中共。西北局的一封电报终止了电影拍摄，“吴满有已被俘虏，似乎不再可信……停止拍摄相关电影。”[29]

在这场公关灾难之后，中共必须决定如何处理吴满有的公众记忆。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诋毁吴满有，而是将他从历史中抹去。吴满有的木刻画被排除在出版的选集之外，艾青关于他的诗歌也没能收入诗选集，关于他的电影也没能出现在中共早期电影的出版目录中。[30]丁玲获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早出版于 1948 年的小说）的 1950 年版本中，提到吴满有的两处内容被替换为另一位著名劳动英雄刘玉厚。[31]

然而，记忆也是顽固的，吴满有被释放后，声称当时广播中的不是他，而是一个配音演员。然而，吴满有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支撑他的说法，因此，他永远无法洗清自己的罪名。时至今日，他的后人在通过发表反驳文章并向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呼吁来为自己的家族正名。有时，他们取得了成功，例如在 1995 年，有影响力的中共党员李锐（毛泽东的前秘书，曾认识吴满友）在有著名历史杂志《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吴满有是无辜的。[32]

---

[27] 周海燕：“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第 239 页。

[28] 关于这一点，如果感兴趣的话，见 Aminda M. Smith. 2013. *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 Reeduc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Peopl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Lifton, Robert Jay Lifton. 1989.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Y: Norton.

[29] Johnson, 'International and Wartime Origins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234.

[30] 周海燕：“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第 239 页。

[31] 龚明德：“改‘吴满有’为‘刘玉厚’”，《出版史料》2006 年第 4 期：第 44—45 页。

[32] 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 年第 4 期：第 66—70 页。

今日之劳模

此后，中国共产党仍在挑选劳模并宣传他们的故事，每年都在地方、省与国家各级选出数千人。近年来最著名的劳模是鞍山一家钢铁厂的工人郭明义，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媒体通过书籍、戏剧、传记以及数百篇文章与新闻报道的形式广泛宣传他的事迹。在 21 世纪 00 年代较为开放的十年间，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批评了这种授予劳模的做法。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建议撤销劳模制度，把这项制度比喻成政府办公室门上没人愿意撕下的老旧的节日贴纸。[33]近年来，党-国试图加大对此类批评的打压力度，例如 2015 年民权律师浦志强被指控辱骂劳动模范申纪兰等罪名。[34]

中共继续授予并宣传劳模的故事可能有很多原因。数十年来，赞颂劳模已经成为中共附加明星光环的方式，例如 2005 年，著名运动员刘翔和姚明在北京第十三届全国劳模大会上接受表彰。授予劳模是褒奖勤恳与抚顺个体的低成本方式。或许最重要的是，延续这一传统能让中共表明，在许多工人有着充分理由怀疑它的时期，中共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保护者。

[33] 孙立平：“劳模评选的尴尬”，《中国改革》2005 年第 6 期：第 52—53 页。

[34] Patrick Boehler. 2015. ‘China’s Case Against a Civil Rights Lawyer, in Seven Social Media Posts.’ *The New York Times*, 15 Dec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nytimes.com/2015/12/15/world/asia/pu-zhiqiang-china-trial-weibo-posts.html.

1946

土地所有权一直是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之一。尽管国共两党都意识到有必要改革农业土地所有制，但在民国时期，很少有人愿意采取实际行动。孙中山时期，国民党“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广受民众欢迎，但蒋介石崛起后，国民党越来越依赖对土改缺乏兴趣的乡村地主与农村实权者。至于共产党，起初效仿苏联模式，试图通过组织城市无产阶级进行一场适当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直至20 世纪 20 年代末共产党被清洗出城市后，一些党员，特别是毛泽东，才开始将农村革命视为共产党生存和胜利的关键。自 30 年代初的江西苏维埃，共产党人开始试验他们能将土改推进到什么程度。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这种意义上的试验再次谨慎地开始，共产党掌权后，开始推进这种试验，直至 1952 年。本文将探讨这些运动如何对农民、土地、劳动之间的关系造成短暂而又影响深刻的变化。

革命中的生产：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与政治劳动

江旷（Brian DEMARE）

1946 年夏末，土地改革正式启动仅几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全力宣传各分局工作组的成功经验。在华中局的组织下，工作组的领导者具有无可挑剔的革命资历——他们通常具有数十年的农村革命经验，奉命在各地开展将富农土地重新分配给临近贫农的试验。其中有一位老资历的广东农村妇女，曾在 20 年代参与彭湃的农民运动（见本书中亚历山大 · 戴的文章），并在中共的长征（1934—1935）中幸存。在江苏省鹅钱村进行土改后，该工作组关于农村革命的方法被誉为未来运动的典范。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在介绍鹅钱村工作组工作成绩的报告中，称赞了工作组充分发动群众，不仅敢于与地主（通常不从事生产）作斗争，而且敢于与富农面对面的斗争。[1]

工作组将这些农民归类为定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富农”，就定义上来讲，他们算是勤劳的劳动者。他们相对富裕，能将多余的土地出租或雇佣农业工人。因此，即使这些富农是鹅钱村最高产的农民，但分局工作组仍然认为他们是寄生虫，“投机取巧”“企图独吞斗争果实”。通过发动村里最穷苦、最“不怕损失”的“雇贫农”去对付富农，没收他们的财产，华中局宣布工作组的做法是农村革命的关键。[2]鹅钱村只是一个小村，但这个模范工作组所传达的信息，将在中共农村回响六年之久：革命行动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之前，往往是暴力且分裂的。

[1] 邓子恢：“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土地改革运动”（1946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92—294 页。

[2] 同上。

重新定义农村劳动

土地改革时期是毛泽东主义农村革命最成熟的时期，对农民、土地、劳动之间的关系造成短暂而又影响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始于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之际，随着 1946 年《五四指示》的发出而进入高潮。[3]这份指示开启了党的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活各个方面（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大型事件。直至 1952 年结束以前，这场运动一直处在不断变化的政治背景当中，在成千上万又迥然不同的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伊始，国共两党正在殊死搏斗；改革接近尾声时，共产党已经进入巩固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统治的最后阶段。由于随后的农业集体化措施，土地改革对农村劳动产生的变化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土地改革理论上基于家庭与土地、劳动之间关系的阶级划分，即使在集体化之后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主义的阶级制度是中国的核心特征之一。

毛泽东主义的农村阶级理论基于对农村劳动剥削关系的分析之上，在工作组进入农村之前，农民对这一理论闻所未闻：以往对农村劳动的理解是实际的，而非抽象或理论化的。尽管不能排除天灾人祸所导致的复杂情况，但在中国农村存在着劳动与家庭经济之间的明显关系。通过农业生产，农户有机会赚取利润，通过再投资购买更多、更好的土地。因此，农民幻想着劳动致富并非毫无缘故，他们的目标通常是不必亲自下地，能将田地租给佃户或是雇佣劳工。

党的报告从不平等和剥削的角度阐述了农村的租赁和雇佣制度，强调少数的地主长期控制大片土地的情况。[4]在广袤的中国农村，确实有许多富裕的地主过着奢侈的生活。中共利用这些例子宣传地主如何寄生在佃户和工人的劳动之上，是不道德的，即使不能在口头或身体上直接攻击他们，也应当谴责。同时，代表党的知识分子访问农村时，会不遗余力地提供理论上的正义，试图证明在

[3] 关于《五四指示》的分析，见 Suzanne Pepper. 1999.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2nd ed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46–48.

[4] 例如，一份关于四川土地所有权的报告指出土地所有的极不平衡。川东地区，贫困与中等农民占人口的 88%，却仅控制 25%的土地。川西的情况更为极端，4%的人口控制了高达 75%的土地。见“川西农村的封建统治”，载于张培田、张华、陈翠玉：《中国西南档案：土地改革资料，1949—1953 年》，Kingsford, NSW: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2007)：第 100 页。

旧制度下，贫农永远无法富裕。他们认为，乡村的封建性质确保了地主永远富裕，而贫农则被牺牲。然而，农民有充分理由怀疑这种理论的主张，

正如侯晓佳（Xiaojia Hou）所指出的那般，土地所有权和财富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租户甚至可能比土地所有者更富裕。[5]此外，由于兄弟分家的传统，使得多代人维持大型土地遗产变得困难。结果造成了一种流动的农村社会秩序，在其中劳动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并且存在劳动致富的可能性。

结构性转变

共产党派往农村的土改工作组颠覆了这种农村秩序及其对劳动的假设。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模式，只是这场运动的众多目标中最根本的目标之一。财富的积累，包括拥有多余的土地长期以来就是经济保障的基石，如今却被贴上剥削的标签。缺乏足够的土地曾是中国农民的生存危机，但如今通过革命行动，反而是一条通往富裕的道路。劳动，尤其是个体与土地、农业生产的关系，成为正常结构新转变的核心。

土改工作组的精心指导下，农民开始从剥削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自己以及邻舍的劳动。党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方针与政策文件，帮助工作组与当地干部确定阶级地位，强调计算某些村民如何剥削他人劳动的重要性。出租土地或是雇佣农民的人被贴上地主或富农的恶名；没有参与任何严重的劳动剥削的人被划分为中农；最后，那些佃农或出售劳动力的农民则成了“雇贫农”。在阶级划分的过程中，富裕的家庭会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的劳动，以期获得更有利的阶级标签。[6]农村社会，从地主到无地者，都会强调自己的贫困，以期抱住自己的财产，并从更富裕的邻舍中获得更多的分配。[7]在阶级划分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关键的应力点，都涉及到劳动。第一，中农剥削多少劳动力而不被划分为富农？第二，如果富农既耕作，又出租额外土地或雇佣工人该怎么办？面对这两种情况，为了将更多的财富分配个贫农，这些问题背后的理论假设被暂且搁置。

[5] Xiaojia Hou. 2016. *Negotiating Socialism in Rural China: Mao, Peasants, and Local Cadres in Shanxi 1949–1953*. Ithaca, NY: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33.

[6] “永安乡划阶级总结报告”（1952 年），载于张培田、张华、陈翠玉：《中国西南档案：土地改革资料，1949—1953 年》：第 105 页。

[7] “划阶级中的几个问题”（1952 年），载于同上。

党的工作组与当地干部合作，在理论上确定阶级地位的方式是计算家庭通过剥削邻舍劳动所得的收入。然而，在实践中，其他问题也悄然融入阶级划分的过程。最值得注意的是，贫农积极分子力争从较富有的农民自己耕种的土地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早期的土地改革指示十分矛盾，一方面指导干部不应触及富农个人耕种的土地，包括他们在雇工帮助下耕种的土地。[8]然而，早在 1946 年，华中局就允许干部在满足贫农需求的需求下，可以拿走富农个人耕种的田地，但不能超过家庭应失去数额的 10%。[9]

这项指示预示着，可以侵占农民非剥削行劳动所产生财富的不安趋势。例如，1947 年华东局开始警告“富农路线”的存在。根据这份土改一年后的报告，地主仍占据着剩余的良好土地。[10]干部没动富农的土地，因此许多雇贫农没有足够的土地。对于华东局的党员干部来说，过去的土改政策是错误地照顾地主、富农，没有考虑贫农的诉求。因此，工作组与地方干部被指示要与地主算账，照顾好雇贫农后，才会给地主一部分财富。对于勤劳的农民来说，这是一项沉重的打击，因为中共现在批准可以没收富农自己耕种的土地以补偿过往的剥削。[11]同时，推动土地所有权的平均化，中农的财富成了行动者另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

农村的政治劳动

1947 年土地改革中平均主义的激进转变，牢固地确立了一种新的农村劳动形式：政治劳动。农民如今可以通过革命行动获得物质回报，而不再是重复农业生产的无尽苦役——最重要的是，农民可以争夺邻舍的财富与隐形资产，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之间的选择昭示着毛泽东时代农村革命的一项重要矛盾。正如历史学家李放春在他关于华北土地改革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般，尽管党在

---

[8] “晋冀鲁豫局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1946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312 页。

[9] “华中分局关于团结中农的指示”（1946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305—306 页。

[10] “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1947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381—384 页。

[11] 同上。

“生产”与“翻身”视作兼容、甚至是完美和谐的，但实际上，农村内的“翻身”将不可避免地损坏农业生产。[12]

1946 年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党曾反对贫农积极分子攻击较富裕的邻舍从而损坏农业生产。例如，早期土改指示中通常强调限制斗争，维持生产。对于大多数地主而言，“斗争”只在口头上的公开讨论中出现，从而方便土地的转让；只有顽固的地主才会被斗争。[13]但在 1946 年秋，就有贫农行动者开始反对富农，甚至反对中农。正如华中局警告的那般，这会威胁中农的农业生产，他们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14]正如太行根据地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般，尽管富农剥削了雇工的劳动，但剥削的结果带来了更高的农业生产。[15]过于针对富农，只会损害当地经济。

然而，土地改革的指示仍在暗示，农业劳动和政治劳动可以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共存。例如在 1947 年夏，东北的一份报告指示工作组与地方干部将斗争与生产结合。报告中提出的结束贫困的“挖财宝运动”，其斗争性质恰恰是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的政治劳动。[16]在这种类似的运动中，农民行动者会折磨并杀害阶级敌人从而找到被掩埋的财富。由于这些阶级敌人不可避免地包含富农与中农，农业生产因此遭受极大损害。在后来的土改运动，特别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运动，中共试图限制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暴力斗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然而，在多年的土地改革中，农民往往倾向于将农村革命是作为谋取个人经济利益的手段。[17]

---

[12] 李放春认为，这种矛盾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体系”提供了基础，成为中国农村持续性革命的重要特征。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 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2006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231—292 页。

[13] “晋察冀局关于传达与进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决定（节录）”（1946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298 页。

[14] “华中分局关于团结中农的指示”（1946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305 页。

[15] “太行区党委关于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与具体划分规定（草案）”（1946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322 页。

[16] “一年来东北土地改革略述”，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376 页。

[17] 尽管农民会避免与阶级敌人发生暴力冲突，但这仍是事实。刘诗古对鄱阳县“不法地主案”的研究表明，工作组更关注政治问题，而农民更关注经济问题。工作组倾向于指控地主的政治罪行，而农民则会提出关于租金、利息等经济方面的指控。正如鄱阳县委在 1950 年宣布的那般，“经济利益超过政治利益”。见刘诗古：“‘失序’下的‘秩序’：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中的司法实践——对鄱阳县‘不法地主案’的解读与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102 页。

遗产

党的一系列土改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十分多样化，但有一项普遍的趋势就是，由于对未来再分配的担忧，农民最初并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西北局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如今以习近平之父而闻名于世），在土改运动初期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注意到土改后辛勤农民的困境：很多农民因为辛勤劳作而被授予劳动英雄的称号，但他们的富裕粮食可能会导致邻舍村民的嫉妒，从而遭受攻击。[18]同时，许多在土改后仍然贫困的人群大多都是懒汉或赌徒，不值得信任并授予领导职务。习仲勋认为，未来再分配的可能性让农村陷入到对富裕的恐惧。然而，一旦农民感到土改真正完成后，传统的劳动价值观就将回归。因而，许多党的报告都强调土地改革如何推动农业生产。其中一份，由未来的农业部长（文革中遇难）廖鲁言撰写的报告强调，拥有土地与农具的农民渴望进行生产。[19]这种价值观的另一面也回归了：那些被认为懒惰或不善于耕作的人，包括许多刚刚接触残酷农村劳动的人，会遭到农民强烈的鄙视。[20]

土地改革之后，新的劳动行为提供了重新定义中国农村阶级的可能性。例如，参与劳动是阶级敌人与农民群众联合的一条途径。这始于对犯罪地主的劳役惩罚：出售或藏匿财产等轻罪会被判处一年左右的劳役；散布谣言、行贿等重罪会被判处五年左右的劳役。然而，这样的刑罚却很少施行。最后几次土地改革的特点就是，富农、甚至地主都得到了更好的待遇，他们被保证有一定的土地可以耕种。如此看来，土地改革似乎提供了一条路径，通向完全摆脱剥削、阶级冲突、由自耕农组成的农村形式。下地耕作的地主在经过五年的劳役后，会重新评估他们的阶级地位。

然而这个常被承诺的目标从未实现。首先，土改后建立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很短暂。土改伊始，党内的农业事务专家邓子恢曾写信给刘少奇，主张建立由

---

[18] 习仲勋：“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节录）”（1948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451 页。

[19] 廖鲁言：“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843 页。

[20]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新情况”（日期不详，似 1951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152 页。

自耕农组成的“中农经济”，而非苏联式的集体化。[21]然而，土改仅仅几年后，党的政策就转变为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这对农村的劳动行为造成了深远影响。地主等阶级敌人即使参与农业生产，也不足以消除他们身上的阶级标签。他们以及后代将永远成为革命时期的阶级敌人与被抛弃者。从事了数十年劳动的富农、地主仍对党有一定用处，他们是剥削的象征。因此，工作组通过剥削的角度片面地概述劳动行为，并以此划分农民阶级的做法，仍是土地改革的真正遗产。

[21] 邓子恢：“给少奇同志转中央的一封信”（1947 年），载于《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379—380 页。

1948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劳工骚乱再次浮现。然而，在这段时期，中共与工人行动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党内有些激进的声音坚称，通过一系列工人起义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党的领导层不愿冒险疏远那些在战后重建中必不可少的资本家与企业家。早在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承诺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精神为指导，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同样，在 1948 年 8 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国民党“劳资合作”的口号，并重塑为“劳资两利”。其中传达的主要信息便是，应该劝阻工人与雇主的对抗，转而集中精力组建“护厂队”，防止共产党接管上海等大城市时有人破坏机器与原材料。本文将探讨女性在这一时期劳工骚乱中的作用。

女工与 1948 年棉纺厂罢工

韩起澜（Emily HONIG）

1948 年初，上海申新棉纺织九厂（通称申新九厂）六千名女工罢工。她们要求分发大米、煤炭等配给品，并通过带薪产假的规定。女工占领了工厂四天，他们从每个车间选出代表，要求与厂方谈判。同时，在纺纱车间，女工坐在纱锭箱上；在织布车间，她们坐在布匹上；在粗纱车间，他们收集成捆的粗纱制成枕头。罢工开始的时候，每个车间的女工小组都坐在一起，嗑着干炒瓜子闲聊。

由于厂方与警察向她们施压，要求停止罢工，工人开始收集砖头、机器零件、金属碗以及装满石块的油桶作为投掷物，由纱锭与纱线运输车运到工厂屋顶。最终，配备三辆装甲车的百余名军警出动，使用催泪弹，强迫她们离开工厂，最终造成三名女工死亡，五百人受伤。这场冲突激烈的罢工，后来被称作“申九二二惨案”。

20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劳工运动中，因为女工大胆、果断地团结起来要求改善条件的行动，几乎可以称作一场前所未有的事件。然而，若想理解这场罢工的意义，就必须理解上海的工业发展、劳动力的构成，以及青帮、中国共产党、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内塑造劳工行动的组织。

社会与经济分化

申新棉纺厂是 20 世纪初荣氏家族在上海开设的一批纺织厂之一，此外还有英日等国的资本家在上海开厂，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棉纺织业约占

上海工业劳动力的一般，其中女性占劳动力的 75%。[1]大多数工厂会雇佣男工负责机器维修以及棉纱的运输，而织布、粗纱以及织布车间中女工占绝大多数。

上海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力中，劳动行动都受限于工人之间的分化。与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棉纺厂的女工也并非是统一或均质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与经济上按籍贯被划分。大多数技术工人来自相对富裕的江南，长江南岸的江苏、浙江地区，如无锡、常州和宁波；大多数非技术工人来自贫困的苏北地区，例如扬州、泰州和盐城。[2]根据她们的所属地区，女工说着互相无法理解的方言，穿着不同的服装，有着独特的饮食习惯。

棉纺厂内部，江南与苏北的女工在不同车间工作。通常而言，厂方会觉得苏北女工强壮、能干脏活，因此她们被集中在最累、最脏的车间，例如摇纱与粗纱车间。而江南的女工可以在高薪酬的织布车间工作。因此，即使他们理论上在同一家工厂，但不同地区的工人并不一定会有太多接触。

“隔离”只是江南和苏北女工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她们经常以蔑视与敌视的态度对待彼此。他们有着自己的互助与社会组织，“姐妹会”，通常由相同地区的女性组成。在某些情况下，姐妹会的成员还会包括同乡的主管与帮派成员。因此，家乡关系优先于职工身份。女工确定了同乡的联系，同时强调与异乡人之间的“隔离”。

罢工中的女性

尽管不同出身的工人之间存在着这些分歧，但历史记录中却有着大量涉及数以千计妇女的罢工。从上海第一家棉纺厂开业到 20 世纪 40 年代，女工曾多次关闭机器并离开工厂。劳工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是 1925 年的“五卅运动”（见本书中梁宝霖的文章），这场运动引发了棉纺厂的多次罢工，有数据表明，罢工者往往存在着大量女性。然而，女性罢工并不一定代表着激进或革命的议程。例如，1925 年的一次罢工就是一群被解雇后将由女性取代的粗纱男工发起的。在抗议期间，罢工者阻止女性进入工厂。因此，即使女性没有工作，

---

[1] 除非特别标注，否则本文的数据均基于 Emily Honig．1986．*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 关于苏北的详细分析，见 Emily Honig．1992．*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看起来像是在“罢工”，但她们并非自愿地主张自己的诉求。在另外一次罢工中，数百名男工闯进棉纺厂砸机器的时候，女工逃到了外面。同样，在统计中，这些离开的工厂的女工似乎正在罢工。

不过，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罢工中，有一些确实是女工自己发起并组织的。尽管有些罢工要求加薪、反对工头与主管的殴打，但更多的女工罢工是在捍卫传统。例如有一次，警方被喊来控制一场涉及三千名女工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厂方拒绝她们的主管介绍来的女工。裴宜理指出的那般，棉纺厂男工有时也会因为不那么激进的原因而罢工。例如，她引用一位工人的回忆，中共的学生党员会指示工人罢工，他们的罢工原因是因为共产党承诺在停工期间支付他们的工资。[3]

在这一时期，上海劳工运动中最激进的参与者似乎不是无技术的棉纺厂工人，而是受过教育的工匠——印刷工人、邮政工人以及技工等，他们大多来自江南，最是同情中共的事业。20 年代中期，棉纺厂内的中共党员主要由熟练的男工组成：铜管维修工、木工以及技工。[4]中共不能有效阻止工厂女工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党只有几个女性组织者，而且都来自湖南，不会讲棉纺厂女工能听懂的方言。此外，中共将姐妹会视作“封建”并阻止，没有将其作为组织基础的意愿。或许正因如此，S · A · 史密斯才会在他对上海劳工的研究中指出，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共领导层并不赞成为女工建立单独的组织，而是希望在工厂工人中传达不分阶级的团结。[5]

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共产党的关系

若想理解 1948 年“申九罢工”期间女工的斗争行动，就得考虑到 30 年代与 40 年代发生的几项转变。其中一项重要的变化就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角色，这是女工加入的第一个外国组织。尽管加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项目人数仅占女

---

[3]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3, 213.

[4] Ibid., 85–86.

[5] S.A. Smith.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32.

性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但在劳工运动与中共中积极活跃的绝大多数女工，都将自己最初的“政治觉醒”归功于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女工开办的夜校。

自19世纪末以来，最初由外籍人员组成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就在中国多个城市提供项目，通常是为女性提供一般性社会福利。讽刺的是，将女工教育成劳工运动领袖的项目，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之后才出现的，当时大多数中共活动家以及逃出上海等城市（见本书中1927年S·A·史密斯的文章）。自此十年之间，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劳工组织与罢工行动的法律。这使得基督教女青年会成了上海为数不多可以安稳且谨慎地向女性灌输她们作为女性与工人立场的激进认识的组织。除了写作、地理与历史课程以外，夜校还提供关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劳动法的课程，并训练学生的公开演讲。同时，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大部分职员，包括大部分部门负责人，都是中国人，而非欧美女性。

第二项转变涉及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角色和组织策略。战争期间，中共20年代所使用的演说、传单等策略行不通，因为日本人会逮捕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家。因此，遵循中共马纯古等劳工领袖的指示，中共开始借鉴女工中已经存在的组织形式，例如姐妹会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中共的活动家不再将姐妹会视之为“落后”，而是开始鼓励女工与其他工人结成姐妹会；她们会陪女工到寺庙里一起烧香发誓。与传统姐妹会一样，中共鼓励的姐妹会有时也会包括主管与嫁给帮派成员的女性。事实上，有些中共活动家甚至成了主管的干女儿。战争期间，中共并没有动员新人参与革命运动，而是试图以尽可能隐蔽的形式组织女工破坏日占工厂的生产，无论是从车间偷窃纱布，还是降低机器速度，从而降低产量，减少日本人的利润。

其中的许多做法一直延续到战后。例如，中共继续利用结拜姐妹的传统方式组织在同一家工厂里工作的女性。中共引导的姐妹会逐渐远离传统姐妹会的相对自发性，变得更加刻意且谨慎。某些情况下，中共会在特定工厂的每个车间都组织姐妹会的结拜仪式，从而建立积极的政治团体，而非过去的自卫式互助组织。此外，她们还经常拿姐妹会聚会当幌子举行会议。

20世纪40年代末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也与20年代有外国传教士主导的组织大不相同。它可能没那么提倡革命，但却为女性提供了她们所需的教育、社会分析技能与组织能力，让她们可以称为革命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与领导者。此外，中共也意识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以此制定战略，让党

员在夜校中担任教师——甚至数十年后还有人声称，中共实际上管理着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夜校。这一切都意味着，在纺织女工的视角中，中共不再是一个陌生的组织，由外来者以及说着听不懂方言的知识分子组成。如今负责组织工人的党员大多是她们的同事、邻居、朋友、夜校的同班同学，或是结拜的姐妹。

团结一致为明天

这便是 1948 年申新九厂罢工的背景。后来的研究表明，女工在罢工中的角色远比“数千名非熟练女工联合起来发动准革命运动”的形象复杂得多。裴宜理指出，罢工的中共领导人是一名男性机器操作员，罢工总部设在机器车间，由熟练的男工主导。[6]男女罢工者并不总是团结一致，裴宜理曾提到，厂中的男性中共党员曾与一名女工领袖发生肢体冲突（扼住她的喉咙），并指责她接受国民党的优厚待遇。

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低估女工的作用。即使中共在战后继续专注于熟练的工人，但女工仍在劳工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据报道，申九厂的女工站在车间的桌子上发表演讲；一些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上过课的女工则在各个车间表演罢工相关的小品，教导工人唱些鼓舞人心的歌曲。从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了解到罢工后，其他工厂的女工成立了支援委员会，并组织起来为罢工工人送些面包、蔬菜。支援罢工的人种，还有上海舞女组织的代表，她们自己也在抗议。罢工被平息时，三名女工活动家死亡，五百人受伤，一百多人被捕。

尽管罢工者的部分诉求得到厂方的同意，但罢工的后续事件却被更大规模的政治事件所掩盖。1949 年年中，中共的胜利已经无法阻挡，尽管 1948 年 8 月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劳动大会，对罢工的成功表示欢呼，但会议的主要内容确实劝阻工人不要与厂方发生冲突或对抗，而是应该组成“护厂队”，防止共产党进军并接管上海等大城市时有人破坏机器与原材料。

然而，“申九斗争”并未被遗忘。解放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首批专题片之一《团结就是力量》中，参与罢工的女性就被赞颂为革命女英雄。然而，这部电影却没有意识到，即使这场罢工强调了上海劳工运动中女性角色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巨大转变，但团结的表现形式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籍贯的

[6]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213–14.

影响，无论是团结还是分裂。正如史谦德（David Strand）对北京工人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般，罢工与其他大规模运动一样，“并不是能够消除身份、籍贯或分工的障碍的溶剂，而是公开这些分化的机会。”[7]

[7] David Strand. 1989.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

1949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二十八年，中共从一支革命者同志结成的地下组织，经历数次生死存亡，成长为一个掌管中国未来的强大政党。下文摘选自毛泽东于 49 年 6 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文章，我们可以从中窥见那个时期对革命与工人解放远景的设想——尽管随着时间推移，那遥不可及的终究是渐渐消退，变得模糊。

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1]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1] 本文发表于 1949 年 6 月 30 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90630.htm。

1949

共产党胜利后，关于解放的承诺并未立即转变为中国工人的实际变化。尽管 1949 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无疑代表了中国劳工政治在符号-话语（symbolic-discursive）层面的革命性突破，但许多工厂仍按照以往的方式继续运作。中共执政早期，工人经历的连续与变化（continuity and change）的要素，因地区、行业与社会群体而异。以无锡丝绸厂的女工为例，本文认为女性更难在中国崭新的秩序所带来的新机会中获益。

连续与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女工

罗伯特 · 克利弗（Robert CLIVER）

沈根娣是一位年轻女性，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中蚕五厂工作，这是由国营丝绸公司——中国丝绸公司经营的一家丝织厂。这家工厂在丝厂中比较特殊，因为它是 1949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的少数几家工厂——大多数工厂仍是私人持有。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的不同工人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中国革命。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无锡丝厂的年轻女工，在共产党掌权后的最初几年，他们的工作场所与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即使是在共产党的管理下，丝厂的"封建管理制度"（年长的男性主管殴打年轻女工）仍然存在。1951 年 8 月，沈根娣被总管打得遍体鳞伤，最终死在了医院。[1]

过去，这可能会引起女工的罢工浪潮，包括停工、抗议甚至暴力行动（见本书中韩起澜的文章）。但在 1951 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牢牢控制了无锡等城市地区，而 1949 年之后所有中国工人都要加入的工会往往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1951 年 9 月，党的领导层在无锡丝绸厂开展民主改革运动，专门针对封建管理制度，以及丝厂主管中的反动派与国党特务。这场运动激起了大量投诉和指控，指责男主管残酷虐待女工，以及 1949 年以来工厂制度中未能改变的更多不平等现象。[2]

1949 年共产党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共产党的叙事中被称为"解放"——那是黎明的破晓时分，一个改变一切、"旧社会"被"新中国"取代的决定性时刻。但中国劳工史中一个的关键问题是,革命为中国工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新统治者的目标包括解放并赋权工人阶级，特别是女性，这些目标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答案很复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研究的是哪一类工人群体。总体而言，诸如钢铁、机械制造等高优先级行业的工人获得了实质性的

---

[1] 钱耀兴总编：《无锡市丝绸工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37—338 页。

[2] 无锡市档案馆中藏有几篇关于民主改革运动的报告，文件 D2-1-11。

好处，甚至对他们的劳动条件拥有一定的控制权，而在建筑与纺织行业的工人，特别是在小城市与私营及集体经济部门的工人，变化来得更慢。虽然并不是完整按照性别划分，但男性工人通常比女性工人更能利用 1949 年之后的新机遇。1949 年解放至 1951 年民主改革运动期间，中国工人经历的革命变化在不同地区、行业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发展得并不平衡。

新民主主义下的中国工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解放工人的努力，是在毛泽东主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这一理论旨在促进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同时保护工人的利益与就业，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复苏，最终达成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3]当初的承诺是，在革命初期与资本家妥协并合作将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让人民群众、特别是产业工人受益，他们能以医保、住房、教育以及消费品等形式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随后的事件表明，这些目标在实践中想要实施的困难，特别是让工人成为“工厂与国家的主人翁”这一承诺。

与 1917 年俄国革命在理论上开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新民主主义并不包括没收大多数私营企业（除了钢铁、航运、煤炭与电力等“经济命脉”行业，其中大部分在国民政府时期就已国有化）。[4]相反，私营工业与商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都有所发展，直至 1955—1956 年冬整个中国经济迅速“社会化”。

1949 年，面对内战造成的破坏、恶性通货膨胀与贸易崩溃的背景下，对私营企业的保护是完全有必要的，中共鼓励工人在工资、劳动条件、解雇等问题上与雇主妥协，正如 1950 年共产党领导人叶剑英对广州工人的讲话：

---

[3] 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001.htm；Jonathan J. Howlett. 2021. '*The Shanghai News* (1950–1952): New Democracy and External Propaganda in Early 1950s Shanghai.' 中國歷史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5, no. 1: 107–30.

[4] William C. Kirby. 1992. 'The Chinese War Economy.' In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edited by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New York, NY: M.E. Sharpe, 185–213.

> “（工人阶级）要善于团结本阶级，提高政治觉悟，分别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要把眼前利益去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去服从整体利益……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有时对其他阶级作某些让步是必须的。”[5]

同时，新政权也为工人建立了保护措施，以防止大规模失业与社会动荡。毕竟，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不能冒险疏远它在城市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之下，工人新获得的权力的两个最重要的象征，就是企业的“民主管理”与工人加入的在每个工厂、城市、行业建立的工会组织。人们希望通过民主管理机构，实现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的控制，从而避免工人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如罢工、停工与任何“阻碍生产的斗争方式”。[6]

“解放”妇女

女工是一个有望从共产主义革命中受益的群体，共产主义革命承诺不仅要解放中国的工人阶级，还要实现性别平等并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正如迪莉娅·达文（Delia Davin）所说的那样：

> “（中共）对工厂女工的动员比其他群体都要重视，部分原因在于她们是党所教导的如今中国主导阶级的一员，同时也因为她们在经济复苏中有着紧迫的作用。”[7]

工会在动员女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共在全国各个城市迅速建立或重组产业工会，至 1952 年，约有 90%的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组织。然而，这些工会并非都由中共领导，也不总能有效地保护或代表工人权益。许多工会仍由帮派与旧政权残余势力所控制，以及国民党所建立组织的

[5] Jackie Sheehan.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18.

叶剑英在广州市第一届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于《广州工运》1950 年第 1 期：第 79 页。——译者注。

[6] Ibid.

[7] Delia Davin. 1976. *Woman 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74.

残留影响。许多工会仍由厂方控制，还有些工会支持并忠于共产党的政策，但却希望保留自主性。[8]

许多女工没有现成的工会组织，与其说因为工会被禁止，倒不如说工会太容易被利用或打压，所以很多女性无产者，例如丝工，更愿意通过非正式的网络与直接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建立工会组织。[9]当中国共产党坚持要求所有工人加入新的工会时，这往往会导致劳工组织无法有效地代表他们的成员，甚至是出现由厂方主导的工会，例如 50 年代初无锡丝工所面临的情况那样。[10]

即使是忠于中共并能有效代表成员利益的工会中，女性在实现有效代表并推动作为工人与女性的权益的道路上仍面临着重重困难。事实上，尽管党的领导层强调妇女解放，但许多乡村与工厂中的中共干部仍对女性抱有性别歧视的态度，忽视或淡化女工的特定需求和问题。即使是高级女工领导人也会贬低女工在劳工运动和生产中的作用，无视女性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的罢工行动和抗议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例如，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蔡畅在 1950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动员中国妇女参加工会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她们必须服从父母或丈夫，不能自己做主。[11]她指出，有必要在工业女性中开展教育工作，培养她们的意识，并消除“靠男人来开展工会工作”的心态。这种消极也被认为是女性在旧社会遭受双重压迫的产物。年长的工人，虽然被称赞为“一线生产上的老手”，但却因为在“封建”社会中长大，思想上存在“混乱”。另一方面，年轻工人被描绘为对政治与工会活动更加积极、热情，但工会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年轻女性爱虚荣、喜欢“打扮自己”，缺乏“个性”，害怕吃苦，不重视劳动，具有一定的“小资产阶

---

[8] William Brugger. 1976. *Democracy and Organis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48–195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9–85.

[9] 关于中国女工在 50 年代以前的罢工行动，见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Emily Honig. 1986.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无锡市档案馆 D2-1-11。

[11] 上海市档案馆 C1-2-854、C1-2-333。

级特征”。这只是共产党将任何腐败、颓废或女性化的事物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案例，这种偏见对中国工会“妇女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为解决女工的特殊需要，1949 年的新政权提出了一项措施（在象征意义与实际意义中都具有重要性），那就是在工会组织中设立“妇女部”。1950 年实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要求雇佣超过 50 名女性的企业工会设立妇女委员会，雇佣超过 300 名女性的企业需要聘用一名负责“妇女工作”的全职工会官员。[12]虽然时常面临资金不足、被男性工会领导排挤或忽视等问题，但妇女部仍在解决 50 年代初中国工厂中妇女所面临的一些特殊困难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卫生保健和产假只是妇女部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婚姻改革、家庭暴力、工资不平等、儿童保育以及劳动条件都是妇女部努力解决的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遭到党和工会的干部反对，他们更关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求，而非工人阶级妇女的解放。[13]

与工会相同，女工想要参与工厂中的民主管理机构，也不如男性来得方便。国营与私营工厂的情况都是如此。尽管大型企业都有法律规定，但在主要雇用女性的私营工厂，如无锡的丝绸厂，民主管理机构（称为“劳资协商会议”）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只是一个空壳。[14]即使在由政府管理的、女工占多数的工厂，例如天津中纺三厂，由于普遍的偏见，妇女几乎无法参加民主管理机构。[15]

如果要说与以往有何不同的话，私营雇主似乎对女工的诉求，例如要求实施法定的改善措施（健康保险与医疗保健等），都会响应，特别是在 1951 年秋至 1952 年夏的改革运动之后。以无锡丝绸厂为例，其他行业的工人在 1950 年就能享受到的种种变化，直到 1952 年才在丝工中得到体现。这些变化包括识字教育、提供医疗保健与托儿服务、保护女工以及改善城市工厂的劳动条件，特别是改善通风、温度与湿度控制等等。[16]

---

[12] Davin, *Woman Work,* 174.

[13] Robert Cliver. 2020. *Red Silk: Class, Gender, and Revolution in China's Yangzi Delta Silk Indus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80–89.

[14] Ibid., 294–95.

[15] 张立之：“天津中纺三厂实行管理民主化的经验”（1950 年），载于李涛、林庚合编：《学会管理企业中的几个问题》，天津：读者书店：第 1—8 页。

[16] 钱耀兴总编：《无锡市丝绸工业志》：第 248—255 页。

爱国增产运动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工业出现了一个普遍的变化，即朝鲜战争（1950—1953）期间的爱国增产运动。在 30 年代，各种类型的生产竞赛已经零星出现在私营与国营工厂中，但在 50 年代，这种做法在中国工业中蔓延开来（见本书中瑟伦森的文章）。中国的生产运动主要是仿照苏联的做法，如“突击作业”（shock work）与斯达汉诺夫主义。最初仅限于国营工厂，但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中国工业中普遍存在的特征。生产运动是中共在私营企业中为数不多且资本主义雇主热衷于实施的举措之一。即使厂主对高额税收与强制性的战争捐献感到不满，但有着共产党宣传的支持，鼓励工人提高生产率与质量仍然具有潜在的好处。

以无锡丝厂为例，战时生产运动是少数几个由反对女工解放的厂方主导的工会实施的革命行动之一。丝厂工会大多由厂方控制，许多工厂设法逃避设立医保或民主管理机构的法定义务，但他们仍然发起爱国增产运动。无锡丝厂的女工被告知她们的生产之于战争事业的重要性，因为中国会使用丝线与布料，和苏联交换钢铁与汽油；工人被告知“在后方多流一滴汗，人民志愿军就会在前方少流一滴血”。[17]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影响女工的所有举措中，爱国增产运动是最广泛且最成功的，因为产量和产品质量在 1951 年取得了令人瞩目但又短暂的提高。

到了 1951 年秋，上述工会的缺点——无效的代表，有些工会的管理层甚至是敌视革命的帮派分子——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迫使党-国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工会改革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将调查工会领导层，必要时会用更可靠的活动家替换。[18]

---

[17] 《人民日报》1951 年 2 月 23 日。

[18] 关于 1951 年民主改革运动，见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37–41; Brugger, *Democracy and Organis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00–11; 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 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67—86 页。

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受控的阶级斗争

尽管中共接管后的工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 1951 年 8 月沈根娣在一家国营丝厂被总管殴打致死的事实表明，女工在解放两年多后，实际处境的变化微乎其微。无锡的党支部与工会干部的对策是将民主改革运动的重点放在清除工会领导层中的反革命分子，并改革无锡丝厂现有的“封建”管理制度。党干部仔细地把控整个过程，首先是与工人进行小组会议，确定最严重的违法分子，然后组织大型批斗大会，鼓励女性在会上控诉，从而惩罚他们。过程的最后部分明显差强人意，其中很少有人会受到处罚，甚至还有人保留了在工厂里的职位。但对无锡的党领导层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能够趁机侵袭工会组织的阶级队伍，选出更能代表工人、更加忠于党和国家的新领导人。

这种受控的阶级斗争形式，在民主改革运动中禁止批评资本主义工厂主或政府政策，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党的目标，实际上也未能清除或取代工厂中的“封建”管理制度，关于工人待遇的投诉至少在 1953 年之前都还存在。[19]尽管如此，直到 1952 年的民主改革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分别针对腐败的官员和违法的资本家）之后，无锡市才开始实施着手改善福利待遇与劳动条件。党-国可能对许多工人面临的困难视而不见，但它一旦受到影响并采取行动，就可以为工人带来诸多好处。

自 1953 年 10 月“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再到 1956 年 1 月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国家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中国女工继续见证着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快速变化。即使许多事物仍未改变——不平等的工资与代表权、男性霸权、对女性权益的蔑视；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在其范围与野心上都具有革命性，尽管解放与民主和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总方针之间存在矛盾，为女工争取自身权益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大跃进”（1958—1962）的生产与破坏的浪潮，女性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辛勤劳作，却失去了她们在此期间争取而来的诸多保护，同时，获得解放并赋权的希望正在逐渐黯淡。[20]

---

[19] 无锡市档案馆 D2-1-10.

[20] Gail Hershatter. 2019. *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1949

随着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退往台湾岛。彼时的美国正在东亚建立反共网络，以对抗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凭借其战略位置与声称代表“自由”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政府，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这一联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得到巩固。两个中国从此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激烈外交竞争。国民党在岛内以铁腕统治，1949 年 5 月，面对日益剧增的民众骚乱，为了维持秩序，国民党当局宣布实施戒严令。直至 1987 年 7 月才接触戒严，共持续三十八年。本文将探讨二战后，国民政府设法清除任何胆敢反对其威权统治的社会力量之前，台湾劳工的动荡时期。

熄灭的火花：二战后台湾的工人激进主义（1945—1950）

陈柏谦（Po-chien CHEN）

刘羿宏（Yi-hung LIU）

> “罢工发动的当天，大家坐船到造船厂后，并没进入工作现场，而是直接拿着自己的工作箱直接集合并封锁了造船厂的办公室，然后由当过日本兵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去制服有武器的工矿警察，把他们都关进造船厂私设的铁笼里。由于造船厂四周都是海岸，为了怕造船厂的管理、监视人员逃跑去通风报信，也是由那些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负责看守周围的海岸线。当时稍早前，陈仪已经下达禁止罢工的命令，造船厂罢工的信息绝不能泄漏出去，所以要封锁社寮岛周围的海岸。罢工一直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大约 12 个小时之后，造船厂的厂方妥协，接收工人们提出的以三个月为一期，参考物价来调整薪水的诉求。当晚，罢工胜利结束。
>
> ——基隆船厂工人阮红婴，20 世纪 40 年代末基隆铁器职业工会领袖。[1]

1949 年末，国民党政权败退至台湾省。尽管输掉了内战，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国民党再次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冷战的需求导致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续，以及随后延续至今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夺“中国”代表权的外交竞争。尽管国民党在接下来的三十八年内对台湾实施军事独裁统治，但中华民国政权，却被国民党及其盟友，尤其是美国，称作“自由中国”——与“共产中国”相对立。

[1] 作者于 2018 年 3 月的采访。

此次采访载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 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案》，英译文细节处有所删减，此处直接引用原文：在线链接：ebook.culture.tw/publication/2020-05-12/73067bcb-eb4a-469d-985f-15d55ded8c02/170/。——译者注。

没有罢工的“自由中国”

1976 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宣言 200 周年之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纽约时报》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内容如下：

> “如果考虑效率和成本，（台湾的劳动力）将是亚洲、甚至是世界上最划算的选择。岛上的工人纪律良好：几乎没有昂贵的劳资纠纷，这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工业所不具备的。这里没有罢工。”[2]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自由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现有的研究将这种经济增长归因于台湾的低成本劳动力与温顺的工人，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台湾不存在工人运动。[3]这造成了普遍的观念，即台湾工人一直都是温顺且容易驯服的。

然而，二战后的台湾，工人是斗争的，经常发动激进的罢工与工业行动，[4]勇敢地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战。台湾并非与生俱来便是“没有罢工之岛”，这是戒严令与国党残酷镇压左派的结果。在戒严期间，中华民国政府系统性地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原住民与中共地下党员，以清除任何胆敢反抗其威权统治的社会力量。

遗产

1895 年，战败的清国与日本帝国签署《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岛给日本。自 1684 年以来，台湾就处于清政府的管辖之下，1885 年，甚至明确成为清朝治下的中国省份。几个世纪以来，来自大陆沿海地区的汉族移民构成了当地居民的大多数。由于《马关条约》，日本帝国接管了台湾，并开始长达五十年的殖民化进程。

---

[2] ‘Free China Salutes America’s Bicentennial’, *The New York Times*, 4 July 1976, p. 20.

[3] Frederic C. Deyo.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ur Subordination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Industrial action，是指工人组织的集体行动，旨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薪资待遇或对雇主、政府的不满。行动的形式包括罢工、抗议等等；是比“罢工”更广泛的词汇。——译者注

日本殖民化的早期，台湾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为了治理与剥削的目的，日本帝国在台湾发展殖民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现代化。例如，为了扩大台湾对日本的蔗糖出口，日本政府引入了半自动和全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机械操作逐渐取代手工劳动，机械化与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促进殖民地资源的出口，日本政府还致力于建设港口设施。因此，水泥厂得到建设，港口工人的需求也在增加。由于这一工业化进程，台湾的雇佣工人数量开始增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台湾史上首次出现农民和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5]例如，1927 年，台南的机械工人发起了一场劳资纠纷，全岛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罢工。这些运动是由反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干部组织和领导的。[6]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一个拥有两万多名成员的全国性农民联盟接受了台湾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渴望推翻日本政权的新兴政党。同时，一个左翼改良主义政党，台湾民众党，领导着一个超过一万名成员的总联盟，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人组织。

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了这些蓬勃发展的运动。台共党被打为非法组织，近 50 名干部成员被捕并遭到起诉。更高层的领导被判处十年以上的监禁，尽管其中有些人设法逃往中国大陆。民众党于 1931 年被殖民政府解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那一年。随着日本军部的崛起，日本帝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扩张主义战争。日本选择台湾作为入侵东南亚与太平洋岛屿的基地，因而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以满足帝国的军事需求。这意味着农民和劳工运动必须被镇压。

快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4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根据 1943 年《开罗宣言》，台湾归还中华民国，1945 年 10 月，中华民国政府派出一些国民党官员前往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同时接管这个前殖民地的行政管理。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那些曾被日本殖民政府监禁或监视的人，以及台共党、民众党的成员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组织工作。目睹日本帝国即将崩溃，农民

---

[5] Tsai Shih-shan. 2015.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Land Reform in Taiwan, 1924– 1951*. Portland, ME: Merwin Asia.

[6] Anna Belogurova. 2012. 'The Civic Wor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Taiwanese Communists and the Comintern (1921–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46, no. 6: 1602–32.

与劳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开始重建联系和网络，秘密地召集过去的运动成员，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崛起。

台湾回归中华民国，标志着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结束。日治时期备受歧视的大多数台湾人都热切地欢迎回归中国。然而，由于语言障碍（日本殖民时期后期禁止学习中文）以及国民党官员居高临下的态度，起初欢迎新统治者的人们很快又开始感到受歧视。此外，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过于无能，腐败而又滥用权力，与他们在大陆的做法如出一辙。

回归不到是八个月的 1947 年 2 月底，台湾各地爆发了起义，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被称为“二二八事件”。国民党从大陆调集军队残酷镇压了这场运动，超过一万名平民丧生。[7]

左翼的组织工作

1946 年至 1949 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工人至少发起了二十五次大型工业行动，其中包括野猫罢工、罢工抗议、集会、呼吁和请愿。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出，组织与发起激进工业行动的人来自各行各业。这些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台湾工人与活动家，有铁路工人、码头工人、船厂工人、印刷工人、巴士司机、糖厂工人、政府机构的低级职员、教师和医生。

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在日本殖民时期遭到逮捕与监禁的台共党干部、成员在组织并协助这些持续的工业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后，国民党情报部门获得了大量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的信息，并对他们进行监视。二二八事件之后，已经很严格的管控进一步收紧。大多数有经验的干部与成员被迫逃往香港或大陆。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使他们无法在台湾继续开展组织工作，更不用说在岛上支持工人和农民运动。

然而，国民党接管台湾的行政机构后，一些在大陆生活了数年的台湾人被派回台湾，代表中共从事地下活动。这些台共党员为了避免日本殖民政府的追捕而逃往大陆，并加入中共。他们与国民党情报部门仍不了解的少数台共党员合作，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社会运动并招募新的地下党员。

---

[7] ‘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 *The New York Times*, 29 March 1947, p. 6.

尽管中华民国政府通过派遣军队成功镇压了起义与民众的反抗，但二二八事件加剧了当地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加入了地下党，而地下党也得以在台湾的重要工厂和工作场所建立据点。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商店和行业，地下党成功地组织了干部，并在一些工会中获得了领导职位。1949 年国民政府实施戒严之前，地下党甚至在全岛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与精心策划的罢工行动。

集体反抗

1946 年，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年，台湾最重要的两座港口城市，北部的基隆与南部的高雄，爆发了两次类似的罢工。面对极端的通货膨胀，两座港口的船厂工人分别在 6 月和 9 月举行罢工，争取合理的加薪。

六月，基隆造船厂（日本殖民时期开设，后由国民党接收）的工人发起罢工。他们不仅封锁了工厂，而且还制服了被派来阻止他们的武装警察。他们甚至扣留了厂长和一些由国民党任命的高级监管人员，要求面对面的谈判。一天之内，资方就同意了工人的加薪要求。这次罢工促成了基隆铁器职业工会的成立，这是一个由船厂工人和紧邻两家工厂的技工共同组织的工会。

几个月后，台南高雄船厂的工人开始罢工，这场罢工与基隆的罢工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两家船厂属于同一家公司，并在二战结束后由国民党接收。1946 年 9 月，高雄船厂，一千多名工人封锁了工厂，制服了武装警察，并扣留了厂长与其他高级监管人员。工人们还要求立即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与六月在基隆船厂发生的情况类似，高雄的罢工工人在一天之内就赢得了合理的加薪。

高雄的罢工得益于左翼组织者的帮助，他们在 20 年代末的日本殖民时期就已十分活跃。六月基隆船厂的罢工与高雄的罢工有着共同的特点，背后很可能也有着同样的支持。在台共党与民众党组织者的支持下，这两次罢工可以说是战后台湾最连贯、最激进的工业行动。正因如此，在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权掀起了血腥的反共运动，这两家船厂的许多干部、党员都被逮捕并被判处重刑。

二二八事件之后，大多数有组织的劳工运动都是由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地下组织与成员发展而来。1949 年，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当年五月，国民党政

权在大陆失势，准备全面撤往台湾之时，台湾省工委已在台北的两个主要工会中取得全面或部分领导权：台北司机工会与台湾省邮务工会。经过三年的组织工作，工委已经准备好为工人权益而发起集体行动。

1949 年 3 月，为了谈判加薪，司机工会发起了一场罢工行动，城市所有公交车司机以每小时 20 公里的速度行驶。这给乘客带来了不便，但台北市民认同工会的诉求，因而支持工人。结果，在一天的按章工作（work-to-rule）后，市政府同意按照工会的加薪要求。

动员邮电部门的工人较为艰难。尽管邮政部门约有六千人，但却分散在台湾各地，地下党在台北组织了工人，并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他们还努力联系并汇聚各地的工人。许多邮电部门的员工加入了地下党，突破了国民党对工会的控制。一些地下党员被选为工会的领导职位。

国民党官员从不掩饰他们对台藉邮电工人的傲慢态度。台湾回归民国之后，国民党政权将日本殖民政府雇佣的六千名邮电工人视为“留用员工”，而非“正职员工”。因此，台藉邮电工的工资只有大陆调台正职员工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与怨恨。

1947 年，一位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前情报人员被国民党任命为台湾省邮务工会主席。邮电工要求被承认为正职员工的请愿得不到回应。同时，至 1946 年底，中共台湾省工委已经成功动员了台北邮电部门的低级员工。通过劳工教育、出版刊物等活动，工委建立了地下工作小组，与邮电工人进行联系和沟通。工人们要求废除留用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1949 年 3 月底，四百多名邮电工人在台北集会。国民党任命的主管无视他们的诉求后，工人迅速发起了一场街头示威，从邮电局总部游行到台湾省政府大楼——两年前的 1947 年 2 月，国军曾在这里开响了第一枪。在整场游行过程中，越来越多支持工人诉求的民众加入示威队伍，到达目的地时，人群已增长至约两千人，足以包围省政府大楼。这场游行震惊到了正准备完全撤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这场游行使得六千名台湾邮电工人被承认为正职员工。事实上，台北的这次动员是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却也标志着未来几十年中台湾工人运动最后的一次行动。

湮没

1949 年 5 月 19 日，就在司机工会的按章工作与邮电工人罢工示威的行动后不久，国民党政权宣布在台湾实施戒严，禁止一切工业行动与罢工。按照戒严令，鼓励或煽动工人运动之人可以被判处死刑。

1949 年 12 月，内战中败北的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自 1950 年开始， 包括邮电工人分局与司机工会等地下组织与团体，反复遭到突袭与摧毁。大量干部遭到逮捕并被判处严厉的惩罚。一些人甚至被判为叛国罪并遭到处决。在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大约有一千人[8]，包括农民、工人、左翼知识分子和学生、工会干部以及非政治化的平民被处决。

自 1950 年起，国民党政权开始管控台湾所有的工会组织与工厂。国民党要求重组工会，并为每个工会安插理事，并派出情报人员到工厂现场监视。还鼓励工人监视并报告可疑人物。

戒严令之下，台湾工人的任何集体行动都可能被视为“叛国”，从而遭到逮捕甚至是处决。同时，工会组织也沦为国民党操控的“黄色工会”。由于民国政府力图彻底消除一切反抗的痕迹，台湾工人从日本殖民时期的反殖民传统中继承而来的斗争精神，被消灭殆尽。

[8] 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台湾的独立政治机构）。

1951

1922 年的安源，我们见到了李立三，当时他正在建立一所工人学校，并组织矿工和铁路工人进行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次罢工。随后的几年中，他经历了几次政治挫折，最终在苏联度过了十五年的耻辱时光。如今，我们见到他是在 1951 年的北京，担任劳动部长并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事务。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于 1925 年，作为全国左翼工会的协调机构，在 20 世纪 30 年代暂停运作，直至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准备掌权执政时才重新建立。在早期，新兴的党-国体制正在不断调整时，工会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尚不明确；因为在党-国的秩序中，实质握有权力的，是一个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先锋队”、承诺改善工人条件又要保障企业家的利益并维持适当盈利水平的政党。

解放初的几个月十分混乱；据马克 · 弗雷泽（Mark Frazier）所述：

> 由于内战期间工业生产活动的崩溃使得无数的私营行业员工雇员，他们返回工厂并要求恢复他们的职务。他们要求提高公司、改善福利与工作条件，以及全职制的保障。在国有工厂中，常常有被派驻在某些关键工厂“监督”厂长的共产党军事干部夺取了他们的权力，导致工厂的基本运作出现了意料之中的动荡。[1]

[1] Mark W. Frazier. 2002.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2–14.

这导致了一种“工人随意罢工，吓得资本家纷纷关闭工厂”的局面。[2]在1949 年 11 月的一次国际工会会议上，即使是李立三也不得不承认，前几个月的局面是无法维持的：

> 在私营企业中，每个城市解放之后，工人斗争的浪潮，即随之而起，资本家由于失掉反动政权的支撑，对于群众的要求只好让步……但工人的要求常有过高的情形，工人的行动和斗争方式也有过火的地方，因此影响到有些企业停闭，生产停顿，资本家消极逃跑的现象发生，这是对于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最大利益有妨碍的。[3]

为了恢复生产并重新掌控经济，党强化了全总的政治作用——此举在工人中引起了广泛的不信任乃至敌意，他们认为工会是厂方手中的工具。作为回应，1950 年 8 月，当局在全总内部发起了一场打击“官僚主义”的运动，鼓励对工人的需求更加开放并及时回应，减少形式主义与僵化。[4]

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1950 年 8 月，《人民日报》与《工人日报》刊登了党干部邓子恢关全总在中南区之工作的讲话。[5]邓子恢认为，工会已经脱离了群众。他甚至进一步指出，尽管在公共部门，党和工会都致力于工人与国家的福祉，但两者的职能之间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差异。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工会可能会采取与党不同的“立场”。

李立三出面支持了邓子恢的论点。在 1951 年 3 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肯定地讲到，在新政府下，“公私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工人与厂方之间不免有

---

[2] Paul Harper. 1969.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37: 84–119, at p. 91.

[3] Li Lisan. 1950. ‘The Experiences, Lessons and Present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In *Trade Union Conference of Asian and Australasian Countries*. Beijing: Workers’ Press, 22–31.

即《李立三同志在亚澳工会会议上之报告：“中国工运经验教训及概况”》，中文马库有收录。——译者注。

[4] William Brugger. 1973. *Democrac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48–1953)*.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1.

[5] 邓子恢：《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工人日报》1950 年 8 月 4 日第四版。

“些小的矛盾”。例如，即使是国有行业，在工资上仍会存在“公私”分歧。[6]然而，就邓子恢关于工会与之间存在不同立场的论点上，李立三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因为

> 在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公私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行政和工会的基本立场自然也是相同的。假如还有区别的话，那只能说是基本立场与具体立场之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党决定了基本立场，而具体立场可以调整以适应特殊情况。

在 1951 年 9 月为全总起草的一份官方决议草案中，李立三进一步区分了可能影响工会工作的两组潜在矛盾。一是“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二是“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7]在他看来，虽然

> 在国营企业中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没有阶级对抗，没有剥削关系的存在，所以发展生产的结果，无论对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或个人利益、长远利益或日常利益都是有好处的……但在另一方面，在关于工人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在劳动条件问题上，公私利益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矛盾。

基于此，他主张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应该存在一个足以代表工人并保护其利益的工会。几个月后，1951 年 10 月，李立三在一份直接递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中重复了他的观点，希望毛泽东能在这场辩论中表态，但他没有得到回应。[8]

冲突在 1951 年底迅速达到顶峰。12 月 20 日，在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上，李立三受到了猛烈的批评。[9]按照严格的“党话”，李立三犯了三个最主要的错误：第一，他“对于我们的国营企业的性质有着完全错误的了解”，将“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的关系和对于国民党时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关系混同起来”；

---

[6] 李立三：《行政与工会的关系》（1951 年），载于《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年：第 146—149 页。

[7] 李立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1951 年），载于同上：第 150—155 页。

[8] 李立三：《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1951 年）载于同上：第 156—158 页。

[9] 李富春：《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1953 年），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 年：第 96—116 页。

第二个主要的错误，他“不了解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而把工会做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第三个主要的错误，在于他的领导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事务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家长制的作风”。

全总党组以鼓动工人自治、损害党的控制为由，解除了李立三的工会职务；三年后，他被免去劳动部长的职务。

下文是李立三于 1953 年 3 月在第二次全国电业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在中国史上一次关键时刻中就行政与工会之矛盾上他自己的看法。[10]

[10] 即上文所引用之李立三讲话《行政与工会的关系》的译文。

论行政与工会的关系

李立三[1]

昨天，我找到几位做工会工作的代表谈了一次话。由这次谈话中，我了解到我们许多厂子中行政与工会的关系搞得不够好，所以，愿借这个机会同诸位谈一谈“行政与工会之间的关系”。

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不够好，首先应由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们负责，至少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不善于主动地去说服行政。毛主席说过：“工会要主动地说服行政，使行政依靠群众，要主动地说服资本家，使资本家团结群众”。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体会这个指示。

有人说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不好，是由于立场不同，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行政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家是四个阶级的专政，所以行政的立场是四个阶级的立场。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在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公私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行政和工会的基本立场自然也是相同的。假如还有区别的话，那只能说是基本立场与具体立场之间的问题。

现在我们中国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工人群众做工只能按劳取酬，还谈不到各取所需。[2]所以在实行工资制的今天，公私之间自不免有些小的矛盾，例如行政方面为了实行经济核算以减低成本，就不免想把工资定的低一点，相反地，工会方面为了照顾工人生活，也不免想把工资提得高一些。这是因为行政多代表些公的利益，工会多代表些私的利益，并不是行政只代表公的利益，工会只

[1] 英译版由 Malcolm THOMPSON 翻译，原文直接引用自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年：第 146—149 页。——译者注。

[2] 新民主主义 "是一种理论，一种总体的革命战略，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时期，从 20 世纪 30 年代持续到 50 年代上半期。见 Marc Blecher。2019．'New Democracy'。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由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编辑。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155–59

代表私的利益。在这样公私之间所为生的矛盾，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矛盾，而是基本立场与具体立场间的矛盾，是可以用毛主席所指示的“公私兼顾”的方法来解决的，要解决这个矛盾， 首先就要把工会与行政的关系搞好。

有人说：如果这样，就由行政上实施公私兼顾吧，何必还要工会呢？我们说，不要工会是不行的，因为厂长的责任是提高生产、减低成本，谁能做到提高生产和减低成本，谁就是好厂长， 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会，行政上就很容易只顾这一方面，而丢掉另一方面。工会是有喊叫作用的。工会用喊叫的方法，时刻使行政上注意，使行政上的措施不至崎重崎轻发生偏差。实在说来，这就是工会对于行政上的帮助。否则，行政上就很容易忘掉公私兼顾，而要先公后私或者大公无私了。先公后私还有些道理，如果要大公无私那简直就行不通了。但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们在进行说服行政的工作中，千万不要忘记公私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要把生产搞好，若忘记这一条，就会犯片面的工会主义错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们必须知道，基本立场高于具体立场，具体立场应该服从基本立场，这样一来，矛盾便可得到统一。

工会工作在形式上往往给行政上增加些麻烦，但在本质上却是行政上唯一的依靠。因为行政上要想把生产搞好，必须依靠群众。行政上依靠群众的组织形式就是依靠工会。没有工会，行政上就无所依靠，就不可能把生产搞好。行政上既须依靠工会，则工会必须经得起依靠，不能一靠就垮。因此行政上有责任来帮助工会强大，要培养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怎样培养呢？第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解决工会替工人提出来的要求，譬如工人提出在车间喝水的要求，行政上如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予以满意地解决：一则工人就会感到工会为他们办了事，也就相信工会，一旦行政上如要依靠工会发动生产竞赛，则工会说话就有力量，工人就容易被号召，生产工作也就容易搞好。由于解决了工人在车间喝水的小问题，就培养了工会的威信。工会有了威信，便可解决生产上的大问题。否则工人群众就会说工会成了行政的尾巴，不但对于工会的威信有损，对于搞好生产尤其有损。第二，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使工会多做些讨好的事，行政上自己多做些得罪人的事。但事实上却往往相反，记得某一工厂，因运输关系，对每个工人所应领用的一吨煤不能如期发给，行政上即请工会向工人解释，工会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事情搞通。及至运输问题解决了，煤运到了，行政上却未通知工会，自行出了布告让工人领煤。工人看到布告后来找工会主任，还说现在可以领煤了，而工会主任由于事先不知道，仍旧进行说服工作，以至

工人拖着工会主任去看布告。这样就是行政在讨好，而让工会得罪人，大大地损害了工会的威信，今后类似事件必须注意纠正。

但是工会对于工人提出的各项要求，也不能只是简单地起一种留声机的作用。工人的要求，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既合理而又能做到的。工会对这一类要求，就要说服行政，与行政力争，如不得解决，就要向上级报告。第二类是虽属合理但是做不到的。工会对这类要求，就要先向工人解释，解释不通，再向行政商议是否可以部分做到。如行政上考虑的结果，部分的也做不到，那么还须向工人耐心地解释。这样反复地解释与商议，问题终有解决之道。第三类是既不合理而又不能做到的。工会对这类问题只有按照实际情况主动地说服工人，要是说服不了，则可召集群众来讨论，用群众的力量来制裁个别的工人。这就是工会在代表群众利益上所应有的三种态度。

工会法是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不但是工会会员的法，也是有关行政人员的法。所以有关行政人员也有责任来遵守或自觉地来执行。工会法如要很好地贯彻，必须要工会和行政双方共同遵守和执行。一年来各厂对于工会法的执行，有的固然很好，但大多数是不好的。譬如工会的干部问题，依据工会法的规定，行政上是可以调动的，但必须于事先征得工会的同意。可是在事实上则有许多厂子调动工会干部并未在事先征得工会的同意，以致成了问题。工会方面抱怨干部的不稳定，行政方面又感到有工会方面的牵制和麻烦。其实工会有给行政培养干部的责任，行政上当然可由工会调动干部，但在调动之前必须充分考虑到工会工作，如果不充分考虑又不征求同意即行调动，因而影响了工会工作，那就不对了。所以，今年有些地方调出来的工会干部还得调回去。

我们要晓得，行政和工会是一体的，要认清工会是帮助行政完成任务的，因此行政也必须设法帮助工会解决干部问题，适当地考虑哪些干部适合于做工会工作。若用技术人员做工会工作，当然是生产上的损失。若把生产上不必需的干部由工会调出来，也是工会工作上的损失。行政和工会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假设有了矛盾，就是闹意气的结果。工会和行政团结一致，才能把生产搞好。一般地说，工会干部比较行政干部差一些，所以行政上有帮助工会和安定工会干部的责任。如果没有厂长之帮助，工会工作就不容易搞好。工会工作搞不好，生产工作也就搞不好。我们检查这一年来各厂中行政与工会的关系， 以石景山、南京和西安等厂搞得较好，我们应该把他们的典型事迹推广到其他各厂去。

1951

1949 年掌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推行了雄心勃勃的变革。党通过一系列群众政治运动（自 1951 年打击厂方腐败或虐待工人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始），将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使他们成为工厂与其他工作场所革命的支点。乍看之下，这似乎完全符合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先锋党夺取国家政权，引导工人觉醒阶级意识，克服资本主义。然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结构体系与党“让工人成为工厂和社会的主人翁”的承诺相去甚远。相反，运动的动员使得党的高级干部成为工厂的权力中心，并将国家计划强加给这些干部以及他们监督的人。新制度否定了国民党时期的自由市场与暴力剥削，将工人阶级纳入进一种明面上更平等，但却深入到各个方面的剥削形式。

通过群众运动进行的工厂革命

文哲凯（Jake WERNER）[1]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政治运动是一种兼具政治、文化与技术的社会形式，它实现了工厂的民主化改革，又加强了劳动纪律。这种手段推动了劳动过程的快速重组，使得生产率和产量显著提升，即便在上海这样的老工业中心也是如此——而上海并没有得到与过往缺少投资的地区等同的大量新资本承诺。

中共接管后的最初几个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关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党的重点在于建立行政机构，解决潜在的政治威胁并恢复经济增长。尽管工人与工头、经理的对抗被暂且搁置，但新的制度迅速建立起来，使得工人在工作场所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党在私营企业中设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在国有企业中设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在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中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并将劳动力组织成每“小组”约十人的形式。这些小组成了党重塑工作场所与工人意识的基础，以及日常政治学习的基本单位，也是党将群众运动推广到组织最低层的途径。[2]

这项重要的工厂运动始于 1951 年的民主改革运动（简称“民改”）。民改运动的目标不是消灭敌人，而是挽救那些因旧社会影响而犯下“错误”的工人阶级成员。受害者与加害者将被组织并引导着走向和解。若有人对此不满，他们便会解释，加害者也是被剥削的工人，只不过是受到了旧统治阶级的影响。民改运动的对象（包括工头，以及因工作风格、地域认同或是帮派身份而与其他工人“疏远”的普通工人）被教导要在其他工人面前自我检讨并寻求原谅。

---

[1] 文本浓缩自 Jake Werner. 2015. ‘The Making of Mass Society in Shanghai: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1949–1958.’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22–76.

[2] Martin King Whyte. 1974.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6–57.

他们被告知，他们过去的错误主要由于他们身处的反动体制，但他们也必须承担一些责任，这给了他们赢得其他工人尊重的机会[3]。民改运动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让新的权力机构（先前往往只是工厂组织结构图上的几个字）得以运作。工厂党委将成为工厂统一领导的中心，工头制将由选举出的生产小组长取代。

民改之后，还有针对贪污腐败，在国有工厂开展的三反运动，以及私营工厂开展的五反运动。这些运动旨在根除接管以来在工厂干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并阻止私人资本家用“糖衣炮弹”腐蚀干部的行为[4]。这些运动主要针对厂长、厂党委书记等领导层，以及会计等行政人员，但其范围也延伸至工人中的小偷小摸行为。

党在早期运动中的最终目标并非针对其“竞争者”，而是产生这些社会群体的条件。党对待群众的方式也不仅仅是自私的操控（cynical manipulation），而是试图让群众符合自身从党的理论中所理解的概念，从而让群众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正如一本小册子所解释的那样：“工人阶级本来是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但是过去在旧社会里企业统治压迫下，受到反动势力的种种损害与限制。”[5]党的领导层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强迫服从，而是积极地重塑他们的主体性，让这些被“旧社会”扭曲的人转变为真正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人。他们认为，工人中存在着被压制的潜能，可以通过参与群众运动从而释放出来。

运动的过程

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各个工厂的党委内部闭门进行，通过召开密集的会议来“统一思想”。党委将进行自我批评，如果他们的表现并认为不够好，就得进行多次自我批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被揭露，从嫖娼到公产私拿，还有一家工厂庆祝厂内首台镗床的生产而举办庆功宴却区别对待厂主与工人，给后者提供次

[3] 邹荣庚：“建国初期上海的企业民主改革运动”，载于邹荣庚主编：《历史巨变：1949—1956》第一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221 页。

[4] Benjamin Kindler. 2019. ‘Sugarcoated Bullets.’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and London: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263–68.

[5] 秦韦：“必须进行民主团结”，载于《工人生活》第二辑，汉口：武汉通俗出版社，1951 年：第 1 页。

一等的食物。[6]党的领导层被告知要把他们的自我批评作为其他党员的榜样，遵循运动指示中规定的路线，深刻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进行彻底的批评。

第二个阶段，已经统一的党组织将运动带往工厂的非党员“群众”中。第一步是收集投诉与指控，并为工人开展运动教育。收集这些信息的关键目的是在更广泛的工厂大会上表达他们的不满时能足够“活跃”，这表明运动中表演性要素的核心重要性。一些“积极分子”（非党员却愿意积极参与运动的个人）被吸纳，提供信息并在大会上发挥作用。[7]

准备工作完成后，工厂将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高层领导再次进行自我批评，从而确定基调，为所有观察者提供示范。与党内会议相同，在自我批评的会议结束后，还会召开小组会议，对领导的表现进行批评。同时，这些会议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职工代表与小组长可以对自己的腐败、铺张以及官僚主义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将反省内容呈现给车间工人。一家工厂的代表指出，他最初以为这场运动只针对领导层，但他现在明白，未能在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划清界限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8]

代表大会的会议在最后公布了涉嫌贪污腐败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在筹备阶段就已确定。这样一来，运动直接转向了基层。工人之中已有流言传开：那些目睹过早期运动的人越来越担心自己会成为目标，许多人开始要求自我坦白，寻求宽恕。[9]

上海的三反期间，市级管理人员认为这一阶段在总体上进展顺利，但还有少数工厂的领导层在“压制民主”——这些工厂里的党员不多，或是被恐吓要求闭口。在这种情况下，更高级别的区委或行业委员会很可能介入，团结工厂工人反对专横的管理人员。例如，沪东区委组织了两家不同工厂的工人，让他们与厂长当面对质，举报工厂党员所发现的腐败现象。这场冲突鼓舞了一些工人，并提高了党委在工厂内的地位。一名工人事后拥抱了一名党员，承认自己错怪他，因为他的合理建议在先前没有得到落实。[10]

---

[6]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1。

由于无法查阅相关档案，用词或直接引用之段落是二次转译，下同。——译者注。

[7]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11。

[8] 同上。

[9] 同上。

[10]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57。

随着三反运动进入工厂基层，群众被号召进行自我交代。无论是 1949 年之前还是之后，工人偷窃材料的现象十分普遍。上钢一厂，509 名工人中有 476 人承认自己曾经偷过工厂的东西。偷钱不如偷材料普遍，但也并非罕见。上钢一厂有 69 名工人涉嫌贪污。职工代表大会结束后，这些工人很快就站出来自首。只有少数人完全拒绝合作，他们主要牵涉到与专业职员相关的大型腐败案件 [11]。随着这些小案件的进展，群众被告诫要与过去一刀两断，并且要积极参与揪出工厂内的犯罪头目。通过这种方式，工人明白自己已经得到赦免，可以放松的加入党对运动的真正目标的斗争。随着重点从工人转向管理人员，运动逐渐进入高潮。

在最后阶段，运动的主要目标会被孤立，巨大的社会压力施加在他们身上，迫使他们承认罪行。这种压力通过工厂组织的“打虎队”发挥杠杆作用，打虎队被要求为讯问精心准备，从工厂中的其他人处收集指控、整理罪证，以便对付任何不合作的目标。为了减轻目标的恐惧，他们不断重申运动的政策——那些承认错误且愿意合作的人会得到宽大处理，甚至不受处罚。自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还在于打虎队能凭此孤立其他拒绝认罪的人。

然而，打虎队经常存在着各种滥权或出错。尽管党中央始终坚持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身体暴力，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些打虎队采取实质的殴打手段。[12]就算没有身体暴力，但运动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也可能导致蒙冤案件或不合理的招供。开展运动的负责人若无法立即核实所获得的信息，针对目标的指控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13]运动的目标有时会难以承受这种压力。至 1952 年 2 月底，上海的运动中有 11 人自杀，另有 19 人试图自杀。[14]

还有些打虎队员在讯问目标时没有充分准备。有一名嫌疑人在回答打虎队的讯问时喋喋不休，找不出任何可以算作罪证的事情。于是他们态度强硬地禁止他“啰嗦”。于是嫌疑人闭上嘴，什么都不肯说。由于缺乏独立的证据，这支打虎队陷入了困境；最终，他们妥协了：“行吧，你咋就不肯啰嗦了呢？”[15]

---

[11]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66。

[12]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89；沈逸静：“‘三反’、‘五反’ 运动在上海” 载于邹荣庚主编：《历史巨变：1949—1956》第一卷：第 189 页。

[13]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102。

[14]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84。

[15]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89.

在上海，这场运动以在全市各地举行的五次群众大会达到高潮，大会上公布了一些精选的要案。每次大会上，都会安排十几名被告站在一千多名群众面前，鼓励他们坦白罪状并检举同伙。群众大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具体个人的处理，来明确体现党的政策”。[16]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个体被称作“活的典型事例”。那些认罪者将被释放而非受到处罚，而反抗者则会被逮捕 [17]。在这些人身上的生动示范，是为了恐吓被安排在群众里的顽固派。大会结束后，这些人将被立即带回他们的工厂并接受讯问——若有必要，甚至会在深夜进行。有一人说道:“我这辈子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我怕哭了。我发誓会坦白所有的问题。”在参加了其中一次群众大会后，上海国棉十五厂的厂长被要求写下他的自白书，但他的手抖得连字都写不出来。[18]

群众大会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克服（工厂）领导层中的官僚主义和犹豫”。有些工厂因为运动力度不足而遭到批评，他们担心针对管理层会使得公司失去领导，并且举行过多的大会将影响生产。[19]这种想法被打成“右倾”主义，使得领导层的思想落后于群众。在国棉五厂，由于缺乏党的领导，非党员群众只能自发行动。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他们向厂长提出投诉，并给厂长规定了自我批评的最后期限。他们还张贴了自己针对个别行政人员的模糊指控。一群“积极分子”甚至闯入一名嫌疑人的家中，搜寻他的非法财物。回到工厂后，他们在工会门口展示了一件大衣和其他物品作为证据。[20]

运动形式的转变成果

上述案例表明，运动的形式不仅仅是献给消极旁观者（passive onlookers）的表演。相反，它为那些处于工厂权力结构底层的人开辟了新的参与机会——从担任工人代表、自愿成为“积极分子”，再到加入人群要求厂长进行更严格的自我批评。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运动揭露了工人对工厂领导、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工头所积攒的普遍不满。通过释放这些不满，党给了工厂领导一个明

[16] 同上。

[17]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101。

[18]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89。

[19]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78。

[20]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67。

确的选择：要么与群众合作，将基层参与引导向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向，要么冒着承受无定向（undirected）的愤怒的风险。因此，这种运动形式将工作人员与管理层（包括党、工会与青年团的领导）置于下方动员起来的工人与上级的市委、中央党部的压力之间。通过将工人的参与制度化与合法化，党中央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从而约束那些可能不太服从中央指导的基层干部。

与此同时，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运动巩固了工厂党委作为厂内权力中心的地位；运动的目标则是党委在厂内的主要竞争者——工头、帮派、专业职员与工厂管理层，打击、甚至要摧毁他们。运动还开创了收集行动情报的新模式。为了开展运动，党委将进行系统地调查，包括查阅工厂记录，与众多工人、职员交谈，并由此收集了关于工作行为与个人关系的详细信息。作为在运动中与管理层敌对的第三方，党委可以利用工人对管理层自上而下的不满，树立自身在工人中的信誉，从而获得了对工人前所未有的了解。这使得党掌握了管理层过往难以掌握的职能细节（functional details）。

通过确立党委作为运动中遭受围攻的目标唯一能求助的力量，最终正是这场运动本身的动力为工厂内的新权力结构注入了活力。尝试这种权力结构的过程往往是非常直接且个人化的，正如一份关于三反的报告所言：

> “大多数高级技术人员，一开始都很傲慢自大，瞧不起党委。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适当地摇醒他们，抹掉他们脸上自以为是的神情……促使他们低头谦卑地寻求党委的帮助，进行自我批评。此后，他们就会认真旅行自己的工作职责。”[21]

并非是党制造了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对峙，在 1949 年之前，这种敌对关系长期存在于上海的工厂，但却由许多其他的分歧所淡化，并受到意识形态、恐惧与镇压的影响。1951—1952 年的运动将工人与管理层的分歧具体化为特权的冲突，压制了其他形式的敌意表达，并鼓励工人通过新授权的无产阶级身份与集体利益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个过程的目标是为了转变——将工人洗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成员，以胜任他们的历史使命，并通过领导斗争中的群众加强新设立的工厂党委。这种斗争的形式，意在实现党和群众之间的有机统

---

[21] 上海市档案馆 A38-1-160-67。

一。工厂党委的领导站在群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缺点并承诺改革。犯过错的工人被宽恕，并被欢迎加入党组织。然后，党和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工头与腐败的管理层。

然而，党和群众的团结在性质上仍是模糊的。党委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对立立场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局势性的（situational）。党委同工人对抗上级的团结也是过渡性质的。即使在运动期间，这种不整齐的一致也明显地体现在党委对职工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工人主权机构）的主导上。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展开，这种紧张关系将会加剧。

然而，早期的运动也建立了一种持久的身份与权威结构，将不满情绪从党的统治中引导出来，让个别管理人员与工人中的顽固派承受群众愤怒的冲击。党委是工厂新形成的权力机构中独立的第三方，位于工人与管理层直接的紧张关系之外，有时站一方，有时站另一方。党委代表了外在的权威，不是一个专制的共产党，而是某种更为基本的东西。其作用在于贯彻五年计划中所呈现的非人称强制力（impersonal compulsions）。随着 1951—1952 年运动的结束，能够满足计划指标的泰勒制经济组织理论开始采取新的方向，越来越多地通过“运动”加强劳动纪律并提高劳动强度。

1952

随着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劳工骚乱并处理其与工会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它还得满足自己在工人阶级内引发的期望。鉴于中国工业基地集中的最大城市——上海，普遍缺乏工人负担得起的住房，公共住房的建设成了头等大事。正如本文将展示的那样，上海在解决住房危机方面尤为创新。二十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接受了“意识形态根植于物质基础设施”的思想，这一点并不神秘。然而，上海社会主义生活的展示区——曹杨新村，可能源自于日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新村运动以及美国的邻里单位规划。曹杨新村虽未解决上海的住房短缺问题，但在形式上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试验，并在如今成为一个历史性地标，农民工（二十一世纪的无产阶级）在城市中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之间租用这些狭窄的住所。

安置新社会主义工人：上海的“工人新村”

马克 · W · 弗雷泽（Mark W. FRAZIER）

1949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成为将社会主义带入中国这个最具资本主义的城市的巨大障碍。约有一百万个工人家庭（四百至五百万居民）住在旧式里弄（上海大部分人口居住的街区）中的“危房”，以及属于农村外来人口的简陋棚户区。新的社会主义政府承诺将使用一种在功能与设计上代表新时代的新型住房，取代这些资本主义上海的遗产与其他问题。实现这项承诺的核心便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住房模式：工人新村。

1951 年 9 月，根据上海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主任、副市长潘汉年的命令下，位于上海郊区规划共九个工人新村中的第一个开始建设。次年 5 月，第一个工人新村完工，因临近曹杨路，故称“曹杨新村”，也可称“曹杨一村”。曹杨新村位于沪西普陀区，靠近主要工业区，占用了真如镇东庙前村的土地。[1]曹杨新村的二层楼房采用立帖式砖木结构，四十八个单元错落有致，为附近工厂的劳动模范与“先进生产者”提供新的住房。随着更多单元的完工，1953 年，曹杨新村共容纳 1002 户居民，因此也被称作“1002 户工程”。不久后，上海市政府得到北京批准，准备开展“二万户工程”，在杨浦、闸北以及普陀区其他地方建设工人新村。

工人新村最终只为上海百万工人家庭中的一小部分提供住处，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上海的住房短缺问题不比在 1949 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要好。[2]但这些工程的意义不在于住房政策，而在于符号与政治领域。本文将分析曹杨新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在“后资本主义”上海的物质表现。劳工史长期以来密

---

[11] 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9 卷第 6 期：第 93 页。

[2] 有关社会主义中国上海里弄住房的生活经验，见 Jie Li. 2015. *Shanghai Homes: 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切关注着工人的物质文化与生活经验，而住房是两者的核心。尽管在大多数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劳工的描述中以“工作单位”（包括工厂住房）的生活经验为中心，但“工人新村”（不仅在上海，还有北京等其他一线城市）却很少有人关注。

工人“新村”

学者已经追溯了“新村”的思潮来源及其对曹杨新村设计与布局的影响，来源可分为两条：20 世纪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与 20 世纪 20 年代英美设计师提出的“邻里单位”城市规划概念。

根据中国城市学家近期关于曹杨新村的研究，“新村”这一概念源自二十世纪初日本反传统的“白桦派”“新村主义”，这场艺术运动摒弃了日本哲学思想中的旧有信条，转而支持受列夫 · 托尔斯泰影响的个人主义与人文主义。[3]武者小路实笃等文学家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可以追求艺术的同时劳动并互帮互助的社会。武者小路实笃将“新村”作为一项社会实验，农民与艺术家可以共同劳动，分享集体的产出。“新村”通过周作人传入中国，周作人是一位文学家、日本通，如今以鲁迅之弟而闻名。1919 年 10 月，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刊物《新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的新村访问之旅，并对艰苦的体力劳动与互帮互助的深层意义及社会联系大加赞赏。周作人以类似于后来外国游客谈到曹杨新村时的热情语气宣称：“这精神的愉快，实非经验者不能知道的。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愿世人也能够分享这幸福！”[4]

周作人从未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村”，但在 20 世纪 10 年代与 20 年代，互助、勤工俭学与集体生活的实践深受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后来被称作“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引起了青年群体的广泛关注，

---

[3] 杨辰：“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上海工人新村（1949—1978）”，《人文地理》2011 年第 26 卷第 3 期：第 37 页；何丹、朱小平：“石库门里弄和工人新 村的日常生活空间比较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2 年第 21 卷第 2 期：第 155 页。

[4] Quoted in Gotelind Müller. 2013. ‘Atarashiki Mura Versus Xincun: On the Chinese Reception of a Japanese Model of Alternative Lifestyle as a Case Study on Standard and Deviation’ 5.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vailable online at: archiv.ub.uni-heidelberg.de/volltextserver/1539-3/1/Atarashiki%20mura%20english.pdf.

其中就包括毛泽东。[5]新村思潮与毛泽东主义后来宣传的“手脑并用”“城乡一体化”等思想相互共鸣——“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乡村的城市化，而是（工业）城市的“乡村化”。正如杨辰所述，“工人新村的建造就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上海城市最重要的空间实践。”[6]

社会主义新村的资本主义起源

如果说工人新村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空间表征，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上海的本质（essence），那么“新村”也是源自一条“截然不同之西方”的社会主义实践路线。曹杨新村的主要设计工作由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建筑师、副局长汪定曾完成，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取得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汪定曾明确借鉴了“邻里单位”的城市规划概念，这是纽约市城市规划师科拉伦斯 · 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的在建筑与规划领域的流行思想。[7]

佩里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极大影响了纽约的区域规划，他认为住宅群应当围绕公共机构的中心区（学校、教堂、图书馆与邮局等）来布置，住宅群周围半英里内应设有绿地与小商店。这种邻里单位可以设计在主干道附近，但不会受到主干道的交通干扰，在汽车与城市公路破坏传统的邻里社区时，这种邻里单位将促进社区的形成。佩里的思想在汪定曾于大学期间参与的城市规划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他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许多欧美归国的规划师、建筑师，都受到了“邻里单位”思想的影响：

> 当然，这在当时（50 年代），可不敢明说是欧美的风格，“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么。后来（曹杨新村）的续建中，我们又加入了前苏联的街坊式的建筑格局，造出了一条条的长块型农庄式住宅。[8]

[5] 杨辰：“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上海工人新村（1949—1978）”：第 37 页。

[6] 同上。

[7] 杨辰：“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人新村的空间分析框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0 卷第 6 期：第 40 页；朱晓明：“上海曹杨一村规划设计与历史”，《住宅科技》2011 年第 11 期：第 48 页。

[8] 《诉说城市那割不断的历史》，《解放日报》2004 年 11 月 22 日。

曹杨新村奇异的知识来源，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住房供应模式的替代方案，在 1952 年曹杨一村完工后没几年就引起了争议。20 世纪 50 年代初，随着城市规划以及更广泛的经济规划受到苏联的影响之后，曹阳新村的空间规划和宽敞的开放空间显然违反了斯大林主义的高密度住房原则。[9]

1953 年，一位苏联专家在访问上海时，曾如此评价曹杨新村：

> 这几年有许多“左倾”的建筑师，修盖了一些枯燥的兵营式的方盒子的房屋，制造了一种所谓理论，说街道只是交通工具，是运输血管而已，因此无需注意街道建筑艺术形式了，经常可以看见，有些住宅侧面对着大街，使街道变得死板枯燥。[10]

这段批评被 1956 年《建筑学报》的一篇文章引用，文章作者正是曹杨新村的主要设计师汪定曾。至少在文中，汪定曾承认，设计团队过于仓促，没有考虑街道的美感，就将住房单元无窗的山墙朝向道路。更严重的是，正如汪定曾还提到，曹杨新村住房的二层至三层密度过高，每人居住面积仅为平均 4 平方米，2 而邻里社区本身占据了宝贵的土地，有着成排的柳树，蜿蜒的街道与河道（曾是一条污染严重、蚊虫滋生的小河）。汪定曾还承认另一个重大的疏忽，那就是住房之间的距离太近，挡住了大多数底层房间的阳光。[11]汪定曾总结道，这些缺点主要是他们没有学习好苏联的先进经验，但也认为，没有制定全面的城市规划方案之前，进行大规模建设是一件危险的事情。[12]

曹杨新村是在城市规划师完成工作之前建造的，结果显而易见。正如汪定曾（精准）推测的那样，若是上海向西发展，那么曹杨新村的低矮结构将被夹在一个与其明显不同的市区当中。[13]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期间，后续的住房单元，即曹杨二至九村，将采用六层而不是两层的结构，并在建筑物之间

---

[9] 中国学者将斯大林主义的住宅制度称作“大街坊”，杨辰：“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第 41 页，注释①。

[10] 汪定曾：“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建筑学报》1956 年第 2 期：第 13 页。

[11] 同上，第 13 页。

[12] 同上，第 15 页。

[13] 同上，第 4 页。

留出更多的空间。当然，到了 20 世纪末，上海的摩天大楼与高耸的公寓楼将吞噬曹杨新村。

作为社会主义空间的曹杨新村

尽管曹杨新村的源头并非社会主义，而且设计团队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遭到批评，但曹杨新村很快就被誉为上海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光辉象征，也是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物质表现。正如大多数媒体的描述，在六十年间，共有 155 个国家约 7200 个外国代表团参观过曹杨新村，其中美国前总统吉米 · 卡特是常被提及的人物（他在 1981 年春卸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参观了曹杨新村，1987 年再次参观）。

邻里单位尽管起源于纽约的区域规划师，并在 50 年代初被汪定曾与其他在美国进修的建筑师所引进，但邻里单位这一概念与中共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城市管理愿景十分契合。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般，邻里单位的概念作为一种细胞形式的社区服务与治理，同 50 年代中共在上海等其他城市中已有的邻里社区上设立的街道委员会与下属的居委会没有根本上的差别。[14]佩里以及这一理念的传播者从未想过要将邻里单位聚合成街道委员会之类的大型行政单位，也不想动员居民参与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工作，但这种细胞式的空间形塑显然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愿景。

遗憾的是，关于 50 年代曹杨一村以及后续曹杨新村扩建工程中的生活情况，当时的研究材料非常有限。数十年后，在媒体报道与期刊文章中，工人的回忆通常传达了一种解放的个人经验（翻身），从 40 年代贫困的生活条件到曹杨新村简朴但令人满意的住宅。这些文章还指出，第一批搬进曹阳新村的劳模与进步生产者被分配到了相同楼层或同一栋楼里的住房单元，这样同一家工厂的工人可以居住在一起。[15]上海首条全天候公交，就是将两班工人从曹阳新村送往工厂。[16]在这些回顾式的叙述中，曹杨新村最显著的影响在于通过共同的物质

[14] 杨辰："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第 42 页。

[15] 朱晓明："上海曹杨一村规划设计与历史"：第 48 页。

[16] Luo Gang 罗岗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Connery). 2012. 'Socialist Shanghai,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 Reading of the Urban Text and the Media Text.' *Postcolonial Studies* 15, no. 4: 481.

一生活经验塑造集体意识。正如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罗岗所述:“工人新村的意义不仅在与其实际的居住功用，更重要的是表征了一种工人阶级空间性的登临，生产了产生新的社会想象的空间。”[17]

罗岗等人从亨利·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意识形态与权力的理论分析了曹杨新村。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8]如果说曹杨新村通过布局、公共空间的安置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成为新中国的物质表现，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那么讽刺的是，曹杨新村看起来更像是美国的郊区住房单元（尽管是多户而非单户），有着蜿蜒的街道与人行道，被绿地环绕，甚至还有一条小河。中国社会主义的空间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奇异的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理想而生产的。小说家周而复在他的经典作品《上海的早晨》中如此描述曹杨一村:

> 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大家走出了学校，暮色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房屋，柳树和草地什么的都仿佛要溶解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只有路边的河流微微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幢幢的人影在路上闪来闪去。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19]

《上海的早晨》（1958 年至 1960 年分四卷出版）赞颂了新工人阶级的能动性，以及他们为保护社会主义中国免受上海旧资本势力的欺诈而作出的努力。然而，曹杨一村及其后续建设工程成为了例外，上海其他住房最终采用了苏式的混凝土外墙公寓楼——在列斐伏尔的框架中，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力量和生产主义的必要性。

---

[17] Ibid., 479.

此处译文引用自《城市的记忆:》第 260 页。——译者注。

[18] Henry Lefebvre (translated by Michael Enders). 1976.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tipode* 8, no. 2: 31.

[19] Quoted in Luo, ‘Socialist Shanghai,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475–76.

曹杨新村的衰落

曹杨新村的独特特征部分源自西方的影响，部分源自集体主义精神，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亚洲新村运动的自给自足。社区内拥有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学校、图书馆、公共浴室、热水炉、菜园、消费合作社、医疗诊所、礼堂，以及住房管理与公共安全的行政部门。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还为将来的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后来十分著名的文化宫（1953 年建成）以及电影院（1960 年建成）预留了土地。[20]按照科拉伦斯 · 佩里在其邻里单位设计中的初衷，曹杨新村的所有设施都在居民的步行范围之内。

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曹杨新村从四十八橦两层楼发展到七百一十八栋两至六层楼，拥挤成了一个严重问题。1958 年上海市委的一份报告指出，曹杨新村设计之初的低密度原则已不复存在。尽管公共空间和设施十分丰富，但住房单元之内，工人的居住空间越来越狭小。[21]根据作者提供的具体数据，以 1952 年的 929 户（4247 名居民）为基数，1958 年已经扩大至 8584 户（47563 名居民）。当时共有 680 幢，本应能够容纳扩大的规模，但典型的两层楼仅有 10 个房间。两个家庭共用一个房间的案例有 50 个，其中最大的房间面积仅为 32.9 平方米,。拥挤导致了居民之间不可避免的争吵和纠纷。最初的安排是一楼的共用厨房由五户使用，厕所由楼里的十户共用。[22]1954 年之后，上海的其他工人新村在后续建设时采用了更高的建筑标准，楼层扩高至三层或以上。他们还采用了房间朝南的布局，厨房与厕所放置在建筑的北侧。

然而，正如 1959 年另一份党委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工人家庭的住房等待名单长达八至十年。[23]与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情况不同，约有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即二十万户家庭、一百一十万居民，居住在简室或棚户中。直至市场改革在上海生产了一批大部分人无法负担的私人或“商品房”之前，上海的住房仍将长期匮乏。但工人新村工程从来不是为了解决上海的住房问题而启动的——正如本文所述，工人新村的力量体现在象征层面，而非实际层面。

[20] Lu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Space of Transition’, 94.

[21] 上海市档案馆 A20-1-94-37。

[22] Lu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Space of Transition’, 94.

[23] 上海市档案馆 A60-1-25。

遗产

2005 年，上海市政府将曹杨新村列为首批 20 世纪建筑遗产，从法律上保护它免遭拆除。正如曹杨新村是上海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与其他地区的工人修建的单调混凝土公寓楼的“逆向模板”，上海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的住房风格使得这个地方再次成为一处怪异的存在。航拍照片显示，曹杨新村被夹在高耸的豪华公寓楼之中，成为一片低矮的红瓦顶与茂密的树丛交织的景观——一个如今常被提起却令人怀疑的说法声称，新村的布局类似中国共产党的五角星标志。但如今，这个从上方看来像是古色古香、枝繁叶茂的社区，很少上海的“现代人”很少会选择居住其中。这些曾被誉为“工人翻身做主”的空间，放在如今上海的标准之下，被认为太过狭小，以至于唯一会利用这段地理位置与低租金的居民是农民工（外来人口），而他们的房东则是留下来的老住户，也就是昔日的劳模。[24]21 世纪上海的无产阶级生活在曾将工人奉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住房中。

[24] 朱晓明：“上海曹杨一村规划设计与历史”：第 52 页。

1952

几个世纪以来，蝗灾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生存威胁，各个朝代的防治蝗灾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动员。尽管后帝国时代的国家政府得益于杀虫剂与蝗虫生物学的发展，但直到 20 世纪末，防治蝗灾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合了新旧方法来防治蝗灾，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动员和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转变。本文将探讨 1952 年及随后的“第一次爱国灭蝗运动”中劳动力的角色。

第一次爱国灭蝗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农村劳动力动员与害虫防治

约翰·威廉（John WILLIAMS）

直到 20 世纪末，蝗灾长期以来对中国农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破坏。[1]1950 年至 1952 年期间，国家动员了大约 1.2 亿的劳动力，在 3600 万公顷的土地上防治害虫。[2]河北省，九次“灭蝗大战役”动用了 40 架飞机与数百万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实践基础上，以新的方式在物质与话语层面上动员农村劳动力，从而防治害虫。[3]尽管这些努力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特征，但在最终消除蝗灾威胁的重要性上，远远低于农药与土地开垦。事实上，出于意识形态与经济原因，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一直是治蝗计划的核心目标。[4]对于国家的昆虫学家来说，大规模动员并非最佳选择，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地方干部组织村民“打蝗队”的做法，继承了自古以来国家征召农民对抗直翅目侵略者的传统。商朝（约公元前 1250—1045 年）的甲骨文和西周（公元前 1045—771 年）的文献都提到了蝗虫，汉代官方史书中对蝗灾有过详细描

---

[1] 作者特别感谢 Zhuang Xu 对本项目的宝贵研究帮助。主要的历史研究参考包括章义和：《中国蝗灾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年；赵艳萍：《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 年；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北京：科技出版社，1982 年。另见 Harry N. Rothchild. 2012. ‘Sovereignty, Virtue,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Chief Minister Yao Chong’s Proactive Handling of the Locust Plague of 715–16.’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 no. 4: 783–812; and David A. Bello. 2016. ‘How Do Humans and Locusts Make Space in an Early Modern Chinese Grain Field?’ *RCC Perspectives: Molding the Planet: Human Niche Construction at Work*, no. 5: 25–32.

[2] Chengxiang Pan.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Pest Control in China.’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no. 1: 4.

[3] 1952 年，仅德州一地，就动员了两百多万日工防治蝗虫。见邱式邦、郭守桂、李光博：“为什么提倡毒饵治蝗”，《农业科学通讯》1952 年第 8 期：第 18 页；陈绍元：“漫话治蝗”（1991 年），《宁河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180 页。

[4] 曹骥：“有关治蝗的几个技术问题”，《农业科学通讯》1950 年第 3 期：第 15 页。

述。[5]中华帝国依靠大量动员农村劳动力对抗蝗虫。二十世纪的昆虫学家揭示了蝗群出现的机制后，现代国家开始通过改造繁殖地环境来永久消除这一威胁。在中国，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基本上清除了蝗灾的威胁。[6]本文所探讨的灭蝗运动就发生在蝗灾防治最后篇章的开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时期。尽管这些运动在蝗虫防治的方法上与晚清、民国时期表现出很大的操作连续性，但人民共和国在这场古已有之的斗争中引用了新的方法。化学杀虫剂取代了前线防御工事的战壕和铁丝网，而喷洒技术的发展减少了施药所需的劳动力。在组织上，这些运动显示了国家动员劳动力的能力，取得的效果远远超过了以往，并大量借鉴了共产党根据地的战时经验。在规模和技术上，这些动员预示着 50 年代与 60 年代的大规模运动。

帝国时代的蝗灾

至 1949 年，中国已有几千年的蝗灾记录。在地方史的“灾”中，蝗灾通常排在洪灾和旱灾后的第三位，且在政治话语上具有特殊意义。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的政治精英将此解释为上天对失德治理的回应，尽管有些著名的批评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但这种解释框架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7]农村社会还将蝗灾与天意联系在一起。最早与农神相关的仪式是祈求防治蝗灾，在大部分帝国朝代的流行信仰，认为蝗灾是“虫王”或类似神灵引起的。[8]在明朝（1368—1644 年）与清朝（1644—1912 年），供奉灭蝗神灵的寺庙激增，因为

---

[5] 例如，见陈永林：“中国的飞蝗研究及其治理的主要成就”，《昆虫知识》2000 年第 37 卷第 1 期：第 50 页；刘继刚：“甲骨文所见殷商时期的蝗灾及防治方法”，《中国农史》2017 年第 4 期：第 55—61 页、第 136 页；官德祥：“两汉时期蝗灾述论”，《中国农史》2001 年第 20 卷第 3 期：第 8—15 页；崔彦华、贾碧真：“东汉蝗灾概述”，《社科纵横》2016 年第 31 卷第 9 期：第 122—125 页。

[6] 《人民日报》1977 年 10 月 24 日；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82. *Biological Control of Pests in China*.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潘承湘：“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 年第 4 卷第 1 期：第 88 页。

[7]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知识分子王充（公元 27—约 97 年），他在《论衡》中用了一章反驳这种观点。见王充：《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937—948 页。

[8] 马书田：《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第 388—392 页。

人们相信，如果是神灵引发蝗灾，那也能控制蝗灾。[9]这些信仰通常禁止人类干预蝗群，被地方官员、现代昆虫学家与二十世纪的革命者视为农民自暴自弃的典型迷信。[10]尽管许多文化将蝗灾与天罚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这类事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即使现代革命者消除了蝗灾的超自然光环之后，这种意义也一直存在。[11]这是因为衡量帝国国家合法性的基本标准之一，就是救灾的能力。摒弃神圣的含义后，这一前提仍是现代国家的核心原则，因此国家必须承担蝗灾防治的责任。

东亚飞蝗是华北地区的常见物种，在孵化与飞行之间经历五个发育阶段，或称龄期，种群在发育阶段将极大影响防治措施。根据卵、若虫、成虫的生长速度，一年可能会有四代，这取决于几个气候和生态变量。华北地区通常有两袋，称“夏蝗”与“秋蝗”。一只夏蝗可以产下一千多个卵，而一只秋蝗可以产下近六百个卵；秋卵可以在冬季存活，并在第二年孵化。[12] 不同的发育阶段需要不同的防治手段：地下的卵可以通过犁地或耙地摧毁，这会将卵块埋得更深，

---

[9] See Hsin-Yi Hsu. 1969.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Locust Cult in Traditional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9, no. 4: 731–52;《嘉庆朝大清会典》29.6b, 362.8b, 1823 年。

[10] 尽管在现代以前，人类面对大规模蝗灾所能的事情十分有限，但蝗群最终会因为一些非人为原因而消散。正如 May Berenbaum 指出的那样，就农村社会的角度来看，祈祷是“有效”的。May Berenbaum. 1995. *Bugs in the System: Insects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14.

[11] 将蝗虫爆发解释为天罚在欧亚世界的早期文化中十分常见。例如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蝗虫便是天主向埃及释放的十灾中的第八灾（出谷纪 10:1—20）。

[12] See Yonglin Chen. 1999. *The Locust and Grasshopper Pests of China*.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36–38. 蝗虫通常是独居的蚂蚱，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大，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开始聚集，引发行为变化与生理变化。昆虫学家鲍里斯 · 乌瓦罗夫将这一过程称作“密度依赖性相位多态性”（density-dependent phase polyphenism），他的研究结果颠覆了对蝗虫的认识。尽管乌瓦罗夫当时无法解释相位的原因，但后来证明这是由于若虫的密集接触所导致的。在一万两千多种蝗虫中，只有不到二十种携带有从“独居”到蝗虫“群居”的特征。见 Boris Uvarov. 1921. ‘A Revision of the Genus Locusta, L. (=Pchytylus, Fieb.), With a New Theory as to the Periodicity and Migrations of Locusts.’ *Bulletin of Entomological Research* 12, no. 2: 135–63; Stephen J. Simpson and Gregory A. Sword. 2009. ‘Phase Polyphenism in Locusts: Mechanisms,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Adaptive Significance and Evolution.’ In *Phenotypic Plasticity of Insects: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edited by Douglas Whitman and T.N. Ananthakrishnan, 147–89. Enfield, NH: Science Publishers; and Stephen J. Simpson and Gregory A. Sword. 2008. ‘Locusts.’ *Current Biology* 18, no. 9: 364–66.

或是将其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然而，产卵通常发生芦苇滋长、未经开垦的土地上，这些地方缺乏劳动力，通常无人注意。新孵化的若虫最容易消灭，它们比后期阶段的若虫体型更小，移动力更差。若虫会聚集成更大的虫群寻找食物供应，传统的防治方法是挖掘壕沟，把蝗虫赶进坑里掩埋或水淹。[13]但是，壕沟需要挖得够宽够深，防止蝗群逃脱。能够快速移动的成年蝗群是最难对付的，为了保护庄稼，必须在它们吃掉作物之前将它们刮下来。[14]可以使用火攻，但这是留给未开垦土地的最后手段。这些方法都需要国家进行动员大量劳动力。

通常情况下，国家会将这一重任交给地方官员。[15]据宋史记载，1034 年，朝廷招募平民在梓州挖出了数千石的卵。[16]1075 年，朝廷让县令及以下官员负责灭蝗，允许他们以粮食或现金作为酬劳，换取被捕杀的蝗虫。[17]十八、十九世纪，清朝的法规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8]民国政府延续了这些制度。1934 年，国民政府颁布《防治蝗虫实施纲要》，为县级官员提供了详细的蝗虫防治责任，包括任命治蝗检查员，向农民宣传害虫的威胁。[19]

大量官方与非官方的资料都提供了这类规定的记载，但规定的执行力度很难确定。治蝗工作会使得农民从其他农业任务中抽身，除非他们自己的田地受到直接威胁，否则很少会有动力从事艰苦的防治工作，尤其是，他们可能会担心招致神灵惩罚。因此，酬劳是必须的，这在实质上起到了计件工资的作用。然而，国家也面临着另一个困境：酬劳为腐败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地方官员会从专门为救济饥荒而设立的国家粮仓中支付酬劳，但他们却得承担其他的防治成本。资金与对劳动力的征用反而提供了剥削的机会。因此，一方面，忽视基本的治蝗工作的地方官员会危急农民的生计；另一方面，被派往动员农民的官

---

[13] 汉朝就提到了类似做法。见王充:《论衡注释》: 第 341—342 页。

[14] 一只成年蝗虫每天可以吃下自己体重的食物，而一平方英里（约合 2.6 平方公里）的蝗虫（大约 1 亿到 2 亿只）可以消耗 220 至 270 吨的食物，足够供应 20 万人的食物需求，引述自 Berenbaum, *Bugs in the System*, 113。

[15] 例如，可见上文，王充:《论衡注释》: 第 341—342 页。

[16] 章义和:《中国蝗灾史》: 第 164 页。

[17] 董煟:《救荒活民书》，载于李文海、夏明方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02 页。根据提交之蝗虫重量与发育阶段（若虫、蝗虫、卵块）决定赏金。。

[18] 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1899 年，110: 8b–15a。

[19] 蔡鸿源总编:《民国法规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9 年：第 55 页、第 132—136 页。

员、衙役可能和蝗虫一样贪婪。清朝的法律、诏书明确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20]

向民国时期学习

民国时期（1912—1949 年），尽管科学昆虫学的兴起与现代统治精英对蝗灾超自然含义的否定，但国家管控蝗灾的能力仍是政治合法性的一项指标。尽管设立了防治害虫的昆虫局，但国民政府仍缺乏有效动员农村民众预防或对抗蝗灾的能力。民国的治蝗工作常常面临着农村出于多种原因的抵制：畏惧神灵、边境的土匪活动以及对地方腐败官员的排斥。[21]日本对华北、华东地区的占领终止了国民党的治蝗计划，并阻止了各方争夺农村控制权时对防治蝗灾的协调反应。(当然，蝗虫不会在意领土边界)。

1943 年，人为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蝗灾，席卷了黄河漫滩（Yellow River floodplain）各省。[22]目击者报告称，成群的蝗虫在农村与院墙中肆意飞翔，甚至将天空染成黄色。[23]蝗灾期间，太行根据地豫北地区的共产党干部创新了组织技术，并影响了后来人民共和国的治蝗运动。由于必须依赖上述劳动密集型的捕杀方法，他们建立了一条延伸至村级的治蝗组织行政机构。他们还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以抗衡那些反对人为干涉蝗灾的宗教信仰，并鼓励一种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最后，他们有意识地采用军事隐喻和组织模式，将抗蝗斗争与战时抗争明确地联系在一起。[24]这些努力为后来的治蝗运动提供了基本的蓝图，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此

---

[20]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110: 10b–12a。

[21] 例如，见吴福桢："十七年治蝗经过情形"，载于《江苏省昆虫局十七十八年年刊》，南京：江苏省昆虫局，1930 年：第 63—65 页。

[22] 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进犯而破坏黄河堤坝，从而引发了一场生态危机，1940 年初的洪水与干旱交替，加剧了这种危机，是的华北平原成为一片巨大的蝗虫繁殖地。见 Micah Muscolino．2015．*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31, 34–36.

[23] 谷景生："灭蝗记"（1986 年),《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 165—166 页；杨瑞新："灭蝗记述"（1987 年),《安阳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111—114 页。

[24] 关于这些运动的详细介绍，见马维强、邓宏琴："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蝗灾与社会应对"（2010 年),《中共党史研究》第 7 期：第 101—109 页。

过程中，农村民众认同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还磨练了共产党对农村民众的能力。

河北治蝗军

河北蓟县发生的事件表明，上述经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面临一系列重大蝗灾的五十年代而言十分宝贵。在五十年代，每年都有蝗群侵袭河北，1951 年与 1952 年的蝗群尤为可怖。[25]蓟县位于黄河漫滩蝗虫繁殖区的北部边缘，包含青甸、太河两洼，每片洼地的面积均超过 1 万英亩（4000 公顷），洪水常常会留下大片积水，然后慢慢蒸发。残留的软土是产卵的理想地，而快速生长的植被为新孵化的若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当地有句俗语，“青甸洼、青甸洼，十年九捞不打啥，一年炸于洼（干旱），还得闹蚂蚱。”[26]元、明、请三朝，均发生过多起蝗灾。民国时期最严重的蝗灾发生在 1929 年秋，村民连续数日在黎明之前到地里，从玉米和高粱上取下迟缓的蝗虫。尽管如此，仍损失了 40%的作物。[27]

1951 年无雨的春夏两季，1.3 万英亩（5300 公顷）的盆地积水蒸发而暴露出地表。正如当地另一句谚语所述：“先涝后旱蚂蚱成片”。[28]到了六月底，一片宽约 1.5 英里（2.4 公里）、长约 1/3 英里（0.5 公里）的蝗群覆盖了青甸洼，每平方英尺（929 平方厘米）约有 30 只蝗虫，当地干部为此迅速成立了剿蝗联防委员会。6 月 25 日的紧急公告要求受影响的农村需要立即提供不少于可用劳动力的 30%参与灭蝗行动。[29]月底，蓟县九个区有八个报告称蝗虫覆盖了 10 万亩（约 6600 公顷）的土地。正如青甸村党支部书记吴存宠的回忆：“屋里、院里全是虫子，家家户户的窗户纸全被吃光，地上密密麻麻象水一样流动，一脚可踩着二、三十头”。[30]

---

[25] 王武代、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自然灾害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 年：第 366—368 页。

[26] 田广元：“蓟县治蝗纪实”（1988 年），《蓟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185 页。

[27] 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第 59、63、 68—69、81、84、87—89、96 页；王武代、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自然灾害志》：第 332、334 页；田广元：“蓟县治蝗纪实”：第 186—187 页。

[28] 田广元：“蓟县治蝗纪实”：第 187 页。

[29] 同上，第 188 页。

[30] 同上，第 189 页。

8 月 1 日，当地领导下令动员 1.7 万至 2 万名村民。他们停止了七个区的小学课程，以便为教师与年长的学生提供时间，并要求所有健全的公民参与其中，宣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关乎千家万户的生计。在两天内，超过一万四千人组成了一支“治蝗大军”，正如名称所示，它采取了军事组织形式。每个区成立了 500 人的捕蝗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以下设小队。每个区设立总指挥部，由区长或区党委书记负责，还配有交通员、卫生员与宣传员。[31]

整个 8 月，这支军队采用了传统战术和新方法相结合的方法，面对着蝗虫大军的猛攻。挖沟部队每 100 米挖一个 60 厘米宽的沟，然后把捕捉小队赶进去的虫子埋起来。在其他情况下，成群结队的蝗虫包围着它们，迫使它们埋在巨大的坑里。在未开垦地区的团队砍伐杂草和灌木丛，包围蝗虫，然后点燃它。一些队伍牵着驴子拉着滚轮碾压蝗虫。8 月 7 日，蝗虫防治军得到了 750 公斤“666”杀虫剂和 60 台喷雾器的增援，这大大提高了灭虫率，北京在月底前又送去了 5000 公斤杀虫剂。[32]收到杀虫剂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当地干部还采取了传统的策略激励群众，每三斤蝗虫尸体就有一斤玉米的奖励。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动员了超过两万人，月底之前，还有更多人加入了队列。[33]地方文史强调群众的热情与地方干部的积极领导。关于打死的蝗虫总数或挽救的作物数量没有提供明确的数据，但很明显，蝗群的繁殖没能被组织，在第二年又大量出现。

第一次爱国灭蝗战役

1952 年在全国各地动员了更多的人力与宣传资源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蝗灾。农业部于 6 月 3 日发布了一份紧急通知，其中指出，早期

---

[31] 同上，第 190 页。

[32] 同上，第 190—191 页。西方常称γ-BHC（六氯环已烷）或灵丹，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被研发出来对付东非与中东地区的沙漠蝗虫，并迅速成为防止蝗虫的首选武器。“六六六”于 1947 年首次在中国使用，很快就成为条件允许的地方用于对抗蝗虫（“六六六”指的是它的分子结构）。见 G.T. Brooks. 1977. ‘Chlorinated Insecticid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Pesticide Chemistry in the 20th Century,* edited by Jack Plimmer, 1–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György Matolcsy, Miklós Nádasy, and Viktor Andriska. 1988. *Pesticide Chemistry*. Amsterdam: Elsevier, 61–66; and Stanley Richard Baron. 1972. *The Desert Locust*. London: Eyre Methuen Ltd., 20, 160–61.

[33] 田广元：“蓟县治蝗纪实”：第 191 页。

的蝗虫已经危害到河北、山东、皖北数十万亩土地，公告指出，必须在数周内消灭夏蝗，否则秋蝗的遭害会更大。“各地必须切实掌握蝗情，组织农民力量，用尽各种方法予以彻底消灭。”[34]

青甸洼的蝗灾问题愈发严重。5 月 15 日，县领导急忙发动附近的农民。一周后，他们召集更远的农民组成“远征队”，确认捕蝗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他们还组织了一千多名青壮青年组建机械化喷粉队，喷洒“六六六”药粉。[35]月底，北京中央派遣了更多人力、物资，支援这场“第一次爱国灭蝗战役”。可能由于缺乏经验的干部与农民在准备及使用农药时出现了问题，因此增援队伍由蝗虫专家陈家祥带领，还携带了近 35000 千克的喷雾与 437 台喷雾器。[36]

第一次战役开始时，蝗虫密度高达每平方英尺 120 只，总共侵袭了超过 12.8 万亩（8500 公顷）的土地，其中五分之三处于四龄或五龄。6 月 3 日，“灭蝗远征大军”共一万名男女开始挖沟与围剿，同时让卡车拖着压路机碾蝗虫。经过三天辛勤，在“为了爱国增产，坚决要把蝗虫消灭，不使成灾”的口号下，战役结束，大多数参与者回家。不幸的是，蝗灾的总面积实际上增加了，因此，灭蝗指挥部下令开展第二次战役，动员了五个区共四万三千人。

正如对第一次战役的描述那般，地方文史强调了群众的热情：一名 56 岁的妇女积极要求参加喷粉队，某村村民给外区群众腾出房间，自己到学校桌子上睡觉。到了 6 月 13 日，受灾面积稍微下降至 124530 亩（8200 公顷），干部决定发动第三次战役，一万多名参与者中有一半是妇女或学生。为了强调这场战役的成功是中央、省、专区、县领导干部亲临调度、指挥有方，以及对群众的教育和鼓舞，文史引用了一名村民的感慨：“还是人民政府有办法，以前都说是‘神虫’，越打越多，敢情是越打越少，过去哪个朝代给咱们办过这样的好事请呢。”[37]

---

[34] “中央农业部关于防治蝗虫、棉蚜的紧急通知”，《人民周报》第 42 期（1952 年）：第 15 页。

[35] 田广元：“蓟县治蝗纪实”：第 192 页。

[36] 同上，第 192 页。1950 年的农业局实验表明，林丹的效力因昆虫的性别和龄期而异，需要精心准备的溶液才能达到最大效果——这在实地条件下很难保证。陈家祥曾参与 20 世纪 30 年代江苏、浙江省昆虫局的早期蝗虫研究和防治工作，以及使用杀虫熏蒸剂的培训计划。1933 年，他在南京为国民政府进行了关于蝗虫防治的广播。见陈家祥：“飞蝗生活史及防治法”，《昆虫与植病》1933 年；曹骥、李光博：“六六六对于飞蝗蝻期的熏蒸作用”。，《中国昆虫学报》1950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128—135 页。

[37] 田广元：“蓟县治蝗纪实”：第 193—194 页。

尽管早期的抗蝗斗争基本上以僵局告终，但这些行动仍然阻止了广泛的破坏。然而，虽然激烈的战斗可以降低蝗灾的严重程度，但作物的热量与经济价值与拯救它们所耗费的能量与资源进行衡量。但早期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国家对政府的有效动员程度——几乎所有叙述都在强调这一点。正如二十世纪的治蝗权威鲍里斯·乌瓦罗夫（Boris Uvarov）所述："一场抗蝗运动的成功是可以保证的，唯一的条件便是适当的组织……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次一等的技术方法也能因良好的组织而取得更好的效果。"[38]此外，这些战役还为早期蝗虫的检测制度（detection regimens）提供了指导，从而极大提高了国家在 1952 年底之前预防或治理蝗灾的能力。[39]

毛泽东激进主义与技术专家之间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农业政策并不是在毛泽东激进主义与技术专家之间摇摆，而是将二者结合，通过科学农业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年代与 60 年代的治蝗政策支持了这一观点。尽管毛主义将乡村群众的传统智慧置于外国培训的科学精英表面上的殖民主义观点之上，但在最激进的时期，也是辩证地将两种体系关于新社会理想的可感物统一（unified sensibility），而非抹杀后者从而建立前者的霸权地位。[40]至少在蝗虫防治方面，这种二元化的方式并非前所未有。毕竟，明朝文人徐光启（1562—1633 年）就将其开创性的《除蝗疏》归功于从老迈农民那里收集的资料。[41]另一方面，灭绝某物的言论一直是现代应用昆虫学话语的特点。[42]而且，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普遍将抗蝗比作战争，但共产党将蝗灾防治塑造为军事战役，是直接源自战时经验，也反映出群众运动在组织与话语上的军事化。

---

[38] Boris Uvarov. 1928. *Locusts and Grasshoppers: A Handbook for Their Study and Control*. London: Imperial Bureau of Entomology, 203.

[39] "一九五二年华北区的农业工作",《中国农报》1952 年第 21 期：第 11—13 页。

[40] See Sigrid Schmalzer. 2016.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 徐光启:《徐文定公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年：第 244 页。

[42] See Ruth Rogaski. 2002. 'Nature, Annihilation, and Modernity: China's Korean War Germ-Warfare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2: 381–415.

从农村劳动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久远还是最近的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治蝗运动均展现出了重要的连贯性。运动中使用的许多操作和组织技术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中有着悠久的先例，包括动员劳动力防治、救灾的国家基本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发性群众运动作为毛主义政策标志的早期，国家也依靠着传统的物质激励来鼓励农民灭蝗。蓟县的党政官员动员农民在春、秋两季挖蝗虫卵块的努力，以及为蝗虫卵提供现金或粮食奖励的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封建时期的农业手册与朝廷规定。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运动还可能源于过去的某些先例：无论是组织方式还是话语，都源自抗日战争期间太行根据地的灭蝗经验。当然，这些都成为了毛时代群众运动的象征，也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新的影响力与领导权。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将直翅目比喻为外国侵略者，从而将旧有的纳税义务转变为爱国责任。[43]衙役与村长的勾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党派遣村干部以前所未有的组织效率调集农民，这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地方社会前所未有的渗透能力。考虑到治蝗运动在发展国家动员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有些讽刺的是，从一开始，减少并消除大规模劳动力动员就是治蝗计划的核心目标，也是 50 年代扩大杀虫剂使用的主要推动力。[44]

[43] 1943 年的动员将蝗虫比作日本侵略者，而 50 年代初则明确将其与“抗美援朝”战役联系在一起。马维强、邓宏琴：“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蝗灾与社会应对”：第 108 页；尹善、傅桂川：“黄骅县扑灭蝗虫情形介绍”，《农业科学通讯》1951 年第 8 期：第 23—24 页。

[44] 见邱式邦等：“为什么提倡毒饵治蝗”：第 18—19 页；邱式邦、李光博：“安次县毒饵治蝗的经验介绍”，《中国农报》1952 年第 16 期：第 17—18 页。

1955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北京开始尝试“无产阶级外交”，作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形式。通过派遣中国工人出国，中国不仅在务实的目标，也是在回应更广泛的植根于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需求，这也导致了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本文将追溯中国的劳工外交在蒙古的实践，这是一场始于 1955 年，在 60 年代初因中苏分裂而被过早中止的试验。

永久友谊的短暂：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蒙古（1955—1964）

克里斯蒂安·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

Ruiyi ZHU



1956 年 1 月中蒙俄铁路开通仪式。火车头上悬挂着布尔加宁、泽登巴尔与毛泽东的画像。[1]

蒙中人民的永久友谊万岁！

1955 年 5 月初，中国工人根据三年期可延长的合同，前往友邦蒙古人民共和国（1924—1992），为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支援”。1956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接见蒙古代表团时解释道：“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

[1] Ch. Dashdavaa and Ch. Bold. 2015. *Jou En'lai ba Mongol oron* [周恩来与蒙古]. Ulaanbaatar: Selenge Press, 52.

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2]然而，就在同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将中国对蒙古的援助视作当前政府对中国少数民族态度的义务，不禁令人疑虑他是如何概念化蒙古的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关系。[3]尽管这些疑虑长期困扰着中蒙关系，但劳工援助仍被视作“国际主义精神”[4]与“永久友谊”[5]的象征。

然而，这种“永久”却如昙花一现，在 1962 年席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苏分裂中，蒙古站在了苏联一边。[6]尽管中苏分裂是中蒙关系在国家层面上破裂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但本文中，我们将目光投向国际外交表象之下的工人生活经历与现实。中国工人被赋予期望的不仅仅是劳动，他们还得超越国族认同，克服“大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友谊的典范；同时，他们需要将蒙古视作自己的国家，却得保留自己作为中国工人的身份——这种形构（configuration）后来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相反，中蒙工人之间的友谊存在着世俗的隔阂，例如语言障碍、文化误解以及不理想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外交争端激化并利用了这些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外交争端本身并非紧张关系的根源。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确立了“大国主义”的框架，这是中蒙友谊所要克服之物。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工人的生活现实，这些现实阻碍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实现，并最终导致了 1961 年至 1963 年间一系列的罢工。1964 年，

[2] Sergey Radchenko. 2007–08. ‘New Documents on Mongolia and the Cold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6: 342, 350.

1956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接见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文马库有收录，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ia-chinese-mao-19560924.htm。——译者注。

[3] Ibid. For an extended discussion, also see Xiaoyuan Liu. 2006. *Reig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工人之路》1957 年 2 月 14 日。蒙古国家档案馆。《工人之路》是一份中文报纸，由蒙古工会中央委员会于 1929 年至 1964 年间发行。阅读对象是在蒙华人，尤其是工人。

[5] 同上，1957 年 10 月 12 日。

[6] Jian Chen. 2001.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中蒙协议被中止，大多数中国工人被遣返时，[7]这项社会主义友谊的工程已是一个失败的试验。

国际主义与大国主义之间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要求废除国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述，现代的资本压迫之下，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因此，共产党人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将“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8]这种乐观的看法问题在于，工人更愿意将自己认同为国家的主体而非国际的无产者。由于十月革命的地理局限性，国际主义原则不得不与复杂的国族认同外交共同运作。列宁的晚年意识到，斯大林的政策会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些政策可能加强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大国主义”情结，进一步疏远历史上受沙俄压迫的不同民族，与反帝国主义的承诺背道而驰。因此，列宁宣布“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裂”，[9]并拥护民族自决政策，这一政策，正如历史学家摩西・莱温（Moshe Lewin）所述：“大国为了弥补对小国犯下的错误，必须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不平等。”[10]根据这种辩证逻辑，只有抵制大国主义，尊重小国的自治和独立，才能实现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辩证张力在边界的矛盾状态中得到了体现。1963 年中蒙划界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总书记尤睦佳·泽登巴尔（Yumjaagiin Tsedenbal）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张灿明进行了如下交流：

> 泽登巴尔：现在他们竖起这些边界的标志。但未来，共产主义时期没有地方需要边界。它们将成为青年学习的历史纪念物。
> 张灿明：这就是辩证法的规律。比方说，现在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它

[7] Jikun Gu. 2019. ‘The Intertwining of High-Level Interactions and Low-Level Exchanges: Chinese Workers in Mongolia, 1950–1964.’ *China Review* 19, no. 3: 115. 中蒙两国就中国工人从蒙古遣返一事相互指责。

[8]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 Modern Edition*. London: Verso Books, 48, 51.

[9] Vladimir I. Lenin and Slavoj Žižek. 2017. *Lenin 2017: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 London: Verso Books, 111.

[10] Moshé Lewin. 2005. *Lenin's Last Struggl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87.

> 的目的是消灭阶级。现在我们正在竖立边界标志，它们的目的是在未来消灭边界。
>
> 泽登巴尔：是的，必须如此。边界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这个阶段，民族国家相互分离。现在也需要这样的边界。在未来，共产主义时期，将不再需要它们。未来不会有把自己封闭在盒子里的民族国家。[11]

而在几年后，双方都将边界军事化，准备可能发生的冲突。

在中蒙关系上，由于历史原因，国际团结与大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自蒙古于 1911 年宣布从大清帝国独立，并在 1921 年获得列宁对国家独立的祝福以来，[12]蒙古的领导人一直对中国收复故土的野心保持警惕——民国政府直截了当地宣称，而共产党则含糊其辞地暗示。[13]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4 年毛泽东接见了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期间表露了反常的激烈态度：苏联人侵占了太多属于中国的领土，其中就包括外蒙古。[14]这反而激起了蒙古的恐惧。根据历史学家刘晓原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难以接受蒙古的社会主义资格，也不相信蒙古会自愿回归中国。因此，中蒙友谊在内部被“民族主义实践与国际主义宣言之间的矛盾”割裂。[15]正如冷战历史学家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所述，“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宣称并不能加强双方之间的无产阶级团结。”[16]

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角度来看，将中国工人派往蒙古是为了表示善意和友谊（尽管历史学家谷继坤指出，这种行为最初是为了安排战后滞留蒙古的华

---

[11] 文件 No. 5:“尤睦佳·泽登巴尔与张灿明的谈话记录”，1963 年 9 月 24 日，Radchenko, ‘New Documents on Mongolia and the Cold War’, 361.

[12] Vladimir I. Lenin. 1971[1921]. ‘Talk with a Delegation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2nd ed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42: 360–61, available online at 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1/nov/05b.htm.

中文马库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64.htm。——译者注。

[13] See Liu, *Reigns of Liberation*.

[14] Mao Zedong. 1964. ‘Interview with the Japanese Socialists on the Theory of the Intermediate Zone’, Sekat Shuho, 11 August 1964, available online at 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9/mswv9_26.htm.

原文将日本人士称作 communists 有误，他们是社会党人而非共产党人。中文马库链接：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097.htm。——译者注。

[15] Liu, *Reigns of Liberation*, 111.

[16] Radchenko, ‘New Documents on Mongolia and the Cold War’, 343.

侨归国而进行的谈判的一部分)。[17]然而，若从大国主义的角度推测，这可能被视为中国复仇主义野心的特洛伊木马，正如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Asastas Mikoyan）1956 年 3 月对泽登巴尔的秘密警告所示:“为了防止你们最终出现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工人阶级，你们应该发展自己的工人阶级。”[18]也难怪蒙古最初要求中国派遣蒙古族工人，而中方则拒绝了这个要求。

然而，有理由相信，中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信无产阶级友谊的工程。1956 年毛泽东提出历史债务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克服中国工人中沙文主义态度的必要性:

> “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让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让他们称王称霸。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19]

中方将大国主义视作一个需要通过政治教育来纠正的意识形态问题。蒙古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1957 年 4 月的某一期中，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国主义，为什么必须反对它？”[20]文中将大国主义定义为一种国际关系形式，大国“卑视”人口较少、面积较小、文化经验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盲目优越感”“缺乏平等的精神”，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21]中国工人被期望与蒙古工人“同工同酬”[22]“互助团结，互敬互爱”“批评某些员工大国主义的思想情绪”，[23]同时要遵守蒙古法律、工厂规章、工作纪律和当地习俗。通过这种方式概念化的无产阶级外交，是在工人的生活、思想、情感、习惯和交往的层面进行的。

---

[17] 谷继坤:“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 第 50 页。

[18] Radchenko, ‘New Documents on Mongolia and the Cold War’, 344.

[19] Ibid., 352.

见注释 2。——译者注。

[20] 《工人之路》1957 年 4 月 3 日。

[21] 同上。

[22] 谷继坤:“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 第 51 页。

[23] 《工人之路》1957 年 2 月 22 日。

建设与交恶

1955—1964 年，这九年期间中国向蒙古派遣了大约两万六千名中国工人及其家属，从事建筑、工业生产、采矿、农业以及其他行业。中国工人填补了蒙古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并提供从牧业生产模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工业生产基础。[24]蒙古接受劳动力交换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工人的迫切需求。

中国工人对蒙古的建设贡献至今仍显而易见。在首都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修建了和平桥、乌兰巴托酒店、国家百货商店、许多市区公寓楼、几家工厂与一家发电厂。然而，鉴于蒙古目前对华人不友好的气氛，首都的核心区是由中国人修建的这一事实，总是会令人感到不适，也很少被人谈起。[25]农村地区的中国工人除了在农场和各种工厂工作外，还参与了文化设施、学校和医院的建设。[26]

外交关系发生裂痕时，中国工人的地位不出所料地成为外交争议的焦点。1962 年 12 月底，周恩来和泽登巴尔就中苏关系、中印边界争端及阿尔巴尼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流，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周恩来意识到蒙古对中国劳动力的依赖，试图利用中国工人的问题来争取外交上的让步。泽登巴尔拒绝了，并表示：“我们不会在意识形态方面退缩，不会因为 8000 名工人而改变我们党的正确政策路线。”[27]由于谈判破裂，中国工人在合同终止前被遣返回国。事实上，他们的离开阻碍了蒙古的发展，在建筑行业尤为明显，蒙古甚至为此发起招募和培训蒙古人从事建筑工作的运动，将之作为一项公民义务，同时利用苏联士兵的劳动力。[28]

---

[24] 1964 年“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中国合同工九年工作报告”（*Gadaad khergiin töv arkhiv: Gereegeer ajillaj baisan khyatad ajilchdyn 9 jiliin ajlyn tailan*），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Central Archive of Foreign Affairs）5.2.328。

[25] Franck Billé. 2015.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6] 《工人之路》1961 年 4 月 13 日。

[27] 谷继坤：“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第 61 页。

[28] Christian Sorace. 2021. ‘Ideological Conversion: Mongoli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Post-Socialism.’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9, no. 2.

蒙方将友谊的破裂归咎于中国大国主义的复兴以及中国因中苏矛盾而“摧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愿。[29]但正如谢尔盖·拉琴科指出的那般，蒙方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比苏联“更强硬的立场”，[30]这表明双方可能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历史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即蒙古对中国侵略的恐惧。例如，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蒙古国家报纸《真理报》（Ünen Sonin）指责“中国领导人否认（蒙古）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本质上忽视了蒙古人民的历史斗争经验。”[31]这种轻视的态度是因为“中国领导人陷入大国主义”。[32]

中国工人在蒙古的模糊地位的最好例证，就是对 89 名在蒙古境内因劳工事故或自然原因去世的中国工人遗体的处理上的分歧。蒙方不愿接受中方将遗体运往北京的提议，而是提议在蒙古境内为中国工人修建一座公共墓地。[33]关于土地、埋葬和国族认同的问题破坏了普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认同。[34]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名论点，与民族主义、死亡、记忆、认同之间充满激情的联系相比，对“无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墓”的想象是荒谬的。[35]因此，中国工人在蒙古的死亡被含糊地解释为是代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牺牲。1962 年召开的第七次中国干部大会上，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官员刘润申（音译）纪念“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流血牺牲、献出生命的许多同志”，将他们称作“劳动战士”（khodolmoriin baildagch）。[36]1963 年，一家中文报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国家关系历史编年（1949—2019）》，2014 年：第 86 页。

[30] Radchenko, ‘New Documents on Mongolia and the Cold War’, 344.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第 87 页。

[32] 《工人之路》1964 年 6 月 11 日。

[33] 1963 年“两国就中国工人问题进行外交磋商及相关事实/文件”（*Gadaad khergiin töv arkhiv: Khyatad ajilchdyn talaar diplomat shugamaar bolson khoyor ulsyn kheleltsee tüünd kholbogdokh barimt bichig*）。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 5.2.305。

[34] 关于重新安葬的政治讨论，见 Osman Balkan. 2015. ‘Burial and Belonging.’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5, no. 1: 120–34; Katherine Verdery. 2000.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Reburial and Postsocialist Chang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5] Benedict Anderson. 201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n. London: Verso Books.

[36] 196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刘润申同志在第七次中国干部代表大会的讲话”（*Khyatadyn kadruudyn 7 dugaar zövlölgöön deer Bügd Nairamdakh Khyatad Ard Ulsaas Bügd Nairamdakh Mongol Ard Ulsad suugaa Elchin Saidyn Yaamny Zövlökh nökhör Lyu Run Shen-ii khelekh üg*），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

纸建议蒙古为死去的工人修建一座纪念碑，并将他们的牺牲比作朝鲜战争的烈士。[37]这使得蒙古的同志感到不满，认为这是掩盖并贬低他们的参与。[38]直到最近几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代表才开始每年正式访问埋葬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工人之墓，将慰问死者当作一种爱国仪式。

艰苦的条件

尽管中国工人被期望将蒙古当作自己的家，但他们难以适应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1955 年 5 月，两国签署协议的一个月后，第一批中国工人抵达时，面临着严重的物质设施短缺，来自长春的木匠之子周常春（音译）和他的父母就在其中。他回忆起他们的第一个夜晚。[39]他们从乌兰巴托直接被派往首都以东约 40 公里处的纳来哈（Nalaikh），他们发现（蒙方）既未给他们准备房屋，也没有蒙古包。他们只好睡在月下，盖着从家里带来的羽绒被，行李围成临时围栏，听着蒙古警卫驱赶狼群的枪声。

第二天，他们受到了一位蒙古干部的欢迎，这位干部为他们勾画了一座新城市的蓝图，并邀请他为脚下的这片土地建设。按照工人老家长春的习俗，他们将这块地方命名为“新街工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 1964 年。周父是一位娴熟的木匠，他与他的同事很快就造出了临时使用的木屋，并希望能在冬天来临前造出砖房。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地得知，蒙古缺乏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他们的规划几乎不可能实现。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他们决定在一个斜坡上挖掘半地下式的住宅。周常春回忆道：

> “一户人家的洞穴宽三米、长四米。单身的宿舍要宽敞得多。里面有一个炕和一个灶台。洞前用木门和窗框盖着。顶部用原木固定，毛毡可以防水。从远处看就像是个馒头。”

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在洞穴里住了三年，然后才搬进砖房，其中一些人由于地下水在春天渗入洞穴而患上风湿病。不久，一个蒙古商业合作社在建筑工地

[37] 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 5.2.328。

[38] 同上。

[39] 周常春（音译）与本文其中一名作者的书面交流，2019 年 11 月 7 日。

上开业，提供稳定的面粉、油、盐、牛肉、羊肉和乳制品供应。再加上官方定期从中国运送的主食和非主食，中国工人和家庭的生计得到了保证。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建筑工地上的社会生活也在扩大：新开办的一所小学供工人子女上学，为工人开办了一所夜校，因为其中许多人是文盲。在中文识字班里，工人被教导阅读；如果学不会，会被视作表现不佳而扣减工资。周常春愉快地回忆道：

> “我的母亲积极地自愿参加班级，几年后就拿到了小学文凭。但我爹白天是个劳动模范，晚上上课时却经常打瞌睡，结果损失了相当多的工资。”

此外，工人们还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京剧俱乐部和一个舞蹈团。尽管中国工人地域不同，但他们通过在蒙古的集体工作和生活，培养了强烈的团结和友谊。

居住在公寓的中国工人的物质条件也很简陋与艰苦。根据蒙古 1962 年 2 月 1 日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检查了乌兰巴托市尊艾勒（Zuun Ail）区的公寓，那里有 800 多名中国工人及其家属居住。报告称，这栋楼的墙体出现了严重裂缝，以至于“在春天地面解冻时可能会坍塌”。[40]此外，“蒸汽加热系统十分破败。在几栋楼中，根本没有任何热量，室内开始出现结冰”，而“在一些公寓中，天花板上有漏水，使情况更加恶化。”报告的结论是，“这样的建筑蒙古人都不愿意住，更别提中国人了” (ene bairand khyatad baitugai mongol khün ch tesej suumaargüi baina)，他们可不习惯生活在冬日随时可能降温至零下四十度的环境中。更糟糕的是，本应陪同检查小组的蒙古国建设部副部长迟到了几个小时——中方称这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这并非对待中国的特例，据巴拉兹 · 萨隆泰（Balázs Szalontai）所述，蒙古外交人员经常会对比他们更强大的邻国进行“微妙的抵抗”。例如，1960 年就有

[40] 1962 年“有关陪同中国大使参观职工宿舍的报告”（*Khyatadyn elchin saidyg dagaj, ajilchdyn bairaar yavsan tukhai*）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 5.2.291。

苏联外交官“正式投诉虐待他们的蒙古各级干部”，而北越外交官则抱怨“经常停电缺水”。[41]



苏赫巴托尔广场上的三名中国工人，约 1960 年。王广盛（音译）友情提供。

然而，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外交上的紧张关系并不能打消人际关系上的友谊。李志安（音译）在童年时期与家人从长春到尊艾勒，他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友好的蒙古邻居。[42]1955 年他们刚到尊艾勒时没有自来水，靠专门的苏联 GAZ 汽车给中国工人运水。有些蒙古邻居还会请他们帮忙运水，他们自然同意了。他们会把自来水转移到其他容器，而蒙古邻居总是给中国家庭送去转满食物与点心的盆子，表示感谢。

---

[41] Balázs Szalontai. 2004. ‘Tsedenbal’s Mongolia and Communist Aid Donors: A Reappraisal.’ *IIAS Newsletter*, no. 35: 18.

[42] 于中国长春的采访，2019 年 12 月。

汇寄

根据劳务协议，中国工人只允许汇寄月薪的 30%，永久回国时不能携带超过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工资汇寄之外，限制中国工人可以带回中国的物品的海关规定上也存在着争议。由于蒙古的物资匮乏，他们希望中国工人可以将大部分工作花在蒙古，将消费品用掉或者留下。[43]他们在蒙古的工资比在国内要高得多，即使允许汇寄的金额只是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也足够供养他们在中国的家庭。大多数工人毫无怨言地遵守规定，但在中国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纠纷。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使得汇寄和海关的问题将对国内的家庭产生致命的影响。根据历史学家桑晔的说法，在大跃进期间，中国人纷纷把肉送回中国，这让蒙古官员对粮食的安全到担忧。[44]边境上，

> 人们会把行李箱塞满当时在中国买不到的东西。这对海关官员来说是一场噩梦，最终要求他们下车，当着他们的面打开行李。行李箱鼓得很大，很难合上。[45]

从蒙古外交部的档案资料中可以发现，中国工人对国内发生的惨剧心知肚明。一份文件内可以包含数十份因“家庭丧事”或“严重疾病”而请求回国的申请；蒙古官员惊愕地发现，此类申请的数量“急剧增加”。一份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工人在合同期满前因紧急情况而离开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情况的发生频率在 1961 年末至 1962 年初达到了顶峰。[46]

那些利用每三年一次的四十五天假期回家探亲的工人，尽管家人事先已经告知，但他们仍对饥荒的恶劣状况感到震惊。一位在蒙古从事电工的受访者回忆道：“如果早我知道人们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一定会从蒙古多带些食物回去。”[47]虽然饥荒在国内造成了饥饿和死亡，但蒙古的食品供应可靠，还有国内被视

[43] 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 5.2.305。

[44]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采访，2016 年 6 月。

[45] 同上。

[46] 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 5.2.328。

[47] 于蒙古乌兰巴托的采访，2019 年 7 月。

为奢侈品的物品。他羞于向家人描述他在乌兰巴托遇到的各种国际产品：蒙古香肠、苏联面粉、朝鲜大米、越南花生等等。国内与蒙古的食物供应的鲜明对比让他感到痛苦，但他也感到高兴，因为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可以汇寄给他们——尽管只是他收入的一小部分，也能够帮助他的家人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紧张的局势

尽管最初物质匮乏，条件艰苦，但本文采访的大多数中国工人及其家人都怀念他们在蒙古的生活。工人外交的成果开始浮现。然而，双方的工人都无法幸免于周遭政治环境的影响。蒙古领导层指责中国人将普通的紧张关系政治化为外交争端，暗示中共是中国工人在蒙古引起骚乱的幕后推手。1963 年 12 月底一份蒙古的报告总结道：

> “但在过去几年，中方总是利用各种方式将冲突小题大做，人为地将小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他们试图证明蒙古政府是故意组织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针对中国工人。此外，极其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中国官员和组织，支持中国工人单独或集体不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非法活动，侵犯并诽谤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警察、海关、工厂和经济的内部事务。”[48]

从 1961 年底至 1963 年第一季度，共有 26 起涉及中国工人的罢工，参与人数从 7 人到 180 人不等，最短的罢工持续几小时，最长的罢工持续 14 天。在 1964 年的总结报告中，蒙古官员对他们在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期间补偿他们的缺勤工时感到懊悔，因为他们误以为那只是一场个例事件。

尽管中国官员试图在外交谈判中利用罢工，但罢工的原因各不相同，大多数是与工作有关的纠纷，如工资不足、设备操作安全不足导致的工业事故、缺乏前往工地的交通工具以及对基本必需品的抱怨，例如没有棉花或“加热馒头的木柴”，以及鞋子不合脚等。[49]中国工人还对他们所认定的，蒙古老板或工人对他们的虐待和欺凌感到不满：有一次，一名中国工人被蒙古人打伤后，有四

---

[48] 蒙古外交事务中央档案馆 5.2.305。

[49] 同上，5.2.328。

十三名工人举行罢工并要求回国。在陶勒圭特（Tolgoit）砖厂，九名工人因担心蒙古警卫向他们“开枪”而罢工一整天。[50]

中国工人也会使用罢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抗议对汇寄与海关条例的限制，我们在上一节中讨论了这方面的重要性。1962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的一次罢工，甚至占领了政府办公室，成功向蒙古当局请愿允许工人“不受限制地将棉花、牛奶和肉类运过海关”。[51]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尽管蒙方指责中国工人“抓住任何微小借口”（neg ül yalikh shaltgaanyug dalimduuldag）而组织罢工，但并非所有的动员都出于政治动机。[52]

另一方面，有几次罢工直接关乎政治与国族认同的敏感问题。库苏古尔省的中国工人举行了一次罢工，要求毛泽东的肖像与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的肖像高度并列。1961 年 12 月 6 日的后杭爱省，一阵风将中国的官方旗帜吹倒，致使 24 名工人的大队罢工两天。工人向省长抱怨称：“这是蒙古人蓄意破坏中国政府的行动。因此，中国工人没有兴趣继续工作。”[53]蒙方认为这些行动具有“不友好的性质”（nairamdalt bish）。[54]

随着中蒙友谊的破裂，周恩来与泽登巴尔的激烈对话中，双方无法就中国工人罢工的性质达成一致。周恩来解释道，中国的政治文化允许工人即使是在社会主义下也能罢工。这可以从毛泽东 1956 年的建议中找到证据：“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将来可以考虑……允许工人罢工。”[55]尽管罢工权直至 1975 年才被列入中国宪法，且在 1982 年被删除，但在某些条件下，中共提倡对罢工采取容忍态度，依据的是中共中央 1957 年颁布的《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56]由于担心动乱可能蔓延，泽登巴尔的回应坚持“蒙古有自

---

[50]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80。

[53] 同上，84。

[54] 同上，89。

[55]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中文马库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3-090.htm。

[56] Kai Chang and Fang Lee Cooke. 2015. ‘Legislating the Right to Strike in Chi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7, no. 3: 443–44.

己的法律。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工人可以破坏和无视既定秩序。这种情况最终会对蒙古工人产生负面影响。”[57]

泽登巴尔认为罢工会有政治影响，而周恩来则将罢工归因于蒙古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损害了中国工人的情感：

> “由于他们与蒙古人接触，熟悉蒙古人的报刊，这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八千名中国工人生活在蒙古人民之间。周恩来强调，人不是无生命的商品（俄语：mertvy tovar），而是活生生的、有政治思想的个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培养我们的人民，如果他们不喜欢什么，那他们可以放弃工作。因此，我们允许这样的秩序（存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工人在蒙古的情况。你们在蒙古发表的东西使中国工人会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引起了麻烦。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工人呢？把他们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是人，不是商品。”[58]

但双方都不愿意承认，中国工人可能有着自己的罢工理由。

失去的选择

在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与工人交换作为社会主义友谊的表达相比，跨国移民劳工的境况是不稳定的，遭到贬低与遮蔽，似乎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象形文字。如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际主义精神显得更为遥远，如同外太空的一团炽热的模糊光团。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思考这些试验性质的劳工形式，寻找曾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其中的缺陷与未来可能的方向。

虽然官方档案与外交史记录了一个黯淡的失败故事，但其上所呈现的画面并不完整。本文其中一名作者采访几位中国工人及其后代时，他们描述了与蒙古邻居、同事以及劳工学徒的深厚友谊，即使工作与生活条件艰苦，共产主义世界发生政治动荡。如果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他们会留在蒙古，不仅

---

[57] 文件 No．3：“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S · V · 契尔沃年科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D · 策伯格米德的谈话记录”，1963 年 1 月 1 日，Radchenko, ‘New Documents on Mongolia and the Cold War’, 356.

[58] Ibid., 357.

是作为工人，还是作为文化大使。相互生活、工作、学习的潜在愿望是未来任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键。

话虽如此，社会主义友谊仍是模糊且不稳定的，因为对国际主义的追求会被作为一种爱国责任表达并感受。超越国族认同框架的乌托邦式目标从未实现或被真诚追求过。所造成的损害之一就是两国的友谊无法承受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裂痕。即使是中蒙两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气氛达到高峰时，工人在作为国际无产者之前仍是国家的主体。未来的革命政治需要颠覆这些术语的秩序。

1957

1956 年，党和国家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尽管官方宣传将此视为朝着结束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剥削迈出的历史性一步，但许多工人意识到他们的条件恶化了。过往他们还觉得自己可以在道义上有资格与雇主斗争，甚至希望得到工会和党的些许支持，但在国家接管企业后，他们便失去了任何提出诉求的道义与政治基础。

在这一时期，管理层对工人阶级的专制权力，以及 1956 年下半年笨拙执行的工资改革，严重损害了工人的物质利益，引发了一波罢工潮。[1]在政治上，劳工骚乱的后果之一就是关于罢工权的辩论，这在 1949 年的《共同纲领》和 1954 年的《宪法》中均未提及。毛泽东在 1956 年 3 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2]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其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3]，必须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在讲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前一年发生的工人骚乱事件，将其称为"少数人闹事"，并给予三个解释的原因：党未能满足工人的物质要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以及工人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他指责这些群众不

---

[1] Cristopher Howe. 1973. *Wage Patterns and Wage Policy in Modern China, 1919–197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9–95.

[2] 引用自常凯："罢工权立法问题的若干思考"，《学海》2005 年第 4 期：第 43—55 页。

[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0227.htm。

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但也意识到此类事件今后可能再次发生，并建议将这种问题作为实例来改进党的工作。

不到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采纳毛泽东的观点，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的正式文件。[4]这份文件至今仍是共产党领导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的唯一官方公开声明，文中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劳工骚乱原因的观点。文中声称，如果群众被剥夺了民主权利，只能采取罢工、抗议等非常方式，那么这些行动“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文中指出，这些行动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但同时建议党委深入罢工群众的队伍中，发挥带头作用，防止群众“被坏分子引向错误道路”。在指示中，只提到了三次工会——其中两次是顺带一提，一次则是为了强调党委必须“应该领导工会、青年团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毛泽东二月的讲话标志着百花齐放运动的开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党的领导层邀请人民自由表达意见与批评。这场运动花了一些时间积蓄势头，而最终越来越多的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成员，开始发表批评意见。五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中央领导层也通过工会喉舌《工人日报》参与辩论。1957 年 5 月 8 日，时任《工人日报》总编辑陈用文对赖若愚进行了长篇采访，赖若愚是在 1951 年李立三倒台后接替他担任全总主席的工会官员。[5]在这次采访中，赖若愚谈及工会与党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危险的领域，他的前任李立三正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路线而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采访。

第二日，《工人日报》发表了另一篇批评文章，报道了全总办公厅副主任李修仁在几个月前进行的长途调查之旅。[6]这次“八千里”之行，李修仁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中央委员沿着京汉和汉广铁路线途径十几座城市。每座停留的城市中，李修仁和他的同行都发现了明显的工会“危机”迹象：失望的工人指责全总只不过是“行政的尾巴”“工人管理科”“官僚主义的舌头”。他们发现，工人正试图建立自己的自治组织。许多工会干部抱怨他们的困境：他们想支持

[4]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 年 3 月 25 日），在线链接：ce.cn/xwzx/gnsz/szyw/200706/04/t20070604_11595959.shtml。

[5] 赖若愚：“工会组织主在什么样的地位？”，《工人日报》1957 年 5 月 8 日第一版。

[6] 李峰：“工会工作走马观花记”，《工人日报》1957 年 5 月 9 日第十二版。

群众的正当要求，但却不能这样做，他们在代表群众的义务与尊重党纪的必要之间纠结。他们特别担心被指责为“工团主义”“尾巴主义”“对党闹独立”，甚至因此失去党籍。广东的一些工会干部抱怨自己是“四等干部”，受制于党干部、管理层，甚至是技术人员。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工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作用与职能的激烈辩论。1957 年 5 月和 6 月，中国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论述工会无力代表工人权益方面的问题。[7]其中一些文章甚至提出了激进的建议，如当时的全总中央办公厅档案部主任高远就认为，必要时工会应该拿起武器反对党。[8]不出所料，面对此类批评，党再次介入。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二月的讲话，但印刷版与原版略有不同，前者更加调辩论中不可逾越的底线——党的政治合法性。

全总的中央领导层被卷入了随后的镇压浪潮中。正如 1951 年李立三倒台时的情境，1957 年 9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审议两个基本问题：1951 年 11 月通过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决议是否有效，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的职能与作用。[9]9 月 5 日，赖若愚发表长篇讲话，实质上确认了 1951 年报告的有效性，抨击李立三路线，放弃了工会的任何独立性。[10]随后在 1957 年底，全总第八次代表大会为工会的权力下放奠定了基础，以迎接将来的大跃进。随后数月内，至少有 22 名全总高级干部被清洗，其中包括《工人日报》主编陈用文。1958 年 5 月，赖若愚因病去世。这场危机使得工会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弱势，最直言不讳的个性已被剥去。[11]从那时起，全总在中国的工作场所中不再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解散（见本卷中蓝梦琳的文章）。

---

[7] 陈用文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也对辩论提供了卓越贡献，见陈用文：“西行记要”，《工人日报》1957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2 日期间连载。

[8] 引用自 François Gipouloux. 1986. *Les Cent Fleurs a l'Usine* [*The Hundred Flowers at the Factory*]. Paris: Éditions de l'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57–61.

[9]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转全总党组关于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的请示”（1957 年 7 月 22 日），载于《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年：第 545—546 页。

[10] 赖若愚：“关于当前工会工作的若干问题”（1957 年 9 月 5 日），载于《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第 556—603 页。

[11] 被清洗的干部名单，见 Gipouloux, *The Hundred Flowers at the Factory*, 327–32.

以下的两篇文章，我们提供了赖若愚 1957 年的采访内容与对当年工人骚乱的分析。

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赖若愚 [1]

> 各级工会组织最近在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有关认识上的问题。工人日报记者于五月七日访问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他就记者提出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间有没有矛盾？

记者：在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有人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既然主要是群众与领导之间的矛盾，工会是群众组织，因此只存在工会与企业领导之间的矛盾，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间不存在矛盾，你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赖若愚：工会组织是群众自己的组织，这是不错的。但是工会是处在这样的地位，一方面它是群众组织，应该代表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人，它有全国统一的组织，作为这样一个组织，它又应该了解全局，了解国家当前的状况，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对群众某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耐心的说服。

工会的这种地位是有些不好处的。处在这样的地位，工会应该了解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情况，发挥工会组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调节作用。但是，工会组织所处的这个位置，对领导和对群众两方面都可能发生矛盾。工会反映群众意见，遇到企业领导上有官僚主义，要发生矛盾，遇到群众有某些不正确意见，工会进行说服工作，也可能发生矛盾。

问题并不在于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间会不会发生矛盾，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可能产生的矛盾。工会应该首先站在群众方面，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群众

---

[1] 英译版由 Malcolm THOMPSON 翻译，原文直接引用自中国工运学院编：《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年：第 445—449 页。——译者注。

有不正确的意见，也应站在群众当中来说服群众。只有这样，群众才愿意听工会的意见。

工会怎样对待群众闹事?

记者：在工矿企业中，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有时发展成群众的闹事，有的甚至引起罢工，碰到这种情形，工会应该如何对待？有人认为，工会既然是代表群众的，就应该替群众说话，即令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工会也应代表群众利益；有人则持相反的见解，他们认为，工会不应参加群众闹事，对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工会只有进行说服。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

赖若愚：群众的意见当然并不一定经常正确，或者全部正确。对于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工会应该说服。但是，问题的中心，是工会不能脱离群众。如果工会脱离了群众，就是碰到群众有不正确的意见，工会要说服时，群众也不会听；如果不脱离群众，群众才愿意听工会的话，说服也才能起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工会如果脱离群众，群众闹事时，就会把工会撇开，自己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其结果是工会反而不起作用。所以，工会首要的任务是在于支持群众的合理意见，只有当工会首先尽到这一方面的责任以后，才有可能说服群众的不正确意见。

当我们说群众中可能有不正确的意见的时候，绝不能认为，群众意见全部都不正确，或者经常都不正确。相反，必须看到，群众的很多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根据过去许多厂矿的统计，群众意见中，往往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关于工作方面的，如对劳动组织、原材料使用，供应、生产设备以及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应该受到尊重和支持的。在政治方面，群众也常常有一些意见和要求。这些意见和要求，往往涉及群众的民主权利。如群众批评官僚主义遭到打击报复，这是侵犯群众的民主权利：群众要求避免打击报复，工会也应该支持。在工资、福利、文娱、体育方面，群众的要求往往也不是过高的，这方面的许多意见甚至并不牵涉到增加工资福利的问题，如对食堂不卫生，托儿所、医务所办的不好，工资不合理等意见，也需要工会的支持。在文化、技术学习方面的要求也一样。这些意见大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工会应该支持，这是主要之点。只有支持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工会才算是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在工人群众中才有信仰，遇到事情，群众才会听你的。

至于群众的不正确意见，是不是也要工会无条件地替群众说话呢？当然不是的。碰到这种情形，工会应该说服。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说服，重要的是如何说服。工会应该站在群众之中来说服群众。应该看到，即令是不正确的意见和过高的要求，也有它的原因，也就是说，也有合理的因素。这种合理的因素即令是只有一点点，工会也应该首先肯定它，并且要满怀同情。然后，工会对不正确部分的说服才可能为群众接受。

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如何说服呢？要耐心说服，不是压服，方式应该是启发群众自己讨论，自己解决。如果经过讨论，仍然不能解决，群众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怎么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也不应该离开群众。工会有责任，一方面把群众意见向有关方面提出，另一方面，如果工会还认为群众意见是不正确的，就应该继续向群众表明自己的态度，继续向群众进行说服。从工会组织方面来说，群众中的多数意见当然有时也不一定都正确，但是工会有民主的原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工会干部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工作过程中慢慢说服。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既坚持正确意见 又不致脱离群众。当然，要作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并不是做不到的。这方面的经验虽然少，也还是有的。

工会工作也可以“争鸣”？

记者：工会工作中能不能提“百家争鸣”？

赖若愚：无论哪一个组织，都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一是执行性的工作，一是研究性的工作。执行性的工作，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研究性的工作提倡自由思想，提倡自由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叫“争鸣”。但是，这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有区别，因为这不能自成一个学派。

工会组织内部也有矛盾？

记者：工会组织内部有无矛盾？应该如何认识这些矛盾？

赖若愚：工会组织当前的问题主要是要弄清工会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至于工会组织内部，和其他任何组织一样，当然也是有矛盾的。工会内部也有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条条块块的问题等等，

但这是工会组织内部的问题，是日常工作上的问题，可以不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纠缠在一起来研究。

工会要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应有作用，最重要的是工会的民主问题。

当前根本问题是发扬民主

对工会来说，当前的根本问题之一是民主。有了民主，才能体现出工会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工会要适应当前的形势，应该很好地解决两大问题：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以及和党的关系问题。

在和行政的关系方面，过去强调了一致的一面，看不见差别的一面，因此，遇事总是和领导站在一头，不能代表群众意见。对人民内部的问题的这种简单化看法，常常使工会工作方法生硬和僵化，不能在群众和领导之间起充分的调节作用。这是应该改变的。

在和党的关系方面，过去解决了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充分注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工会在党的政策思想领导下还必须开展它自己的独立活动。只有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才能显出它自己的作用。

过去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好，工会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因此，便发生了所谓“工会可有可无”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工会组织就应该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对抗国家：1957 年的罢工潮

陈峰 [1]

1957 年 1 月，重庆国营 296 厂（一家兵工厂）的工人包围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与经理办公室，要求立刻加薪。[2]随着人群愈发聚集，紧张的气氛升级，配有机枪的士兵赶来驱散人群。工厂实施戒严后，数百名工人游行到重庆市委大楼进行投诉。这只是 1957 年中国工厂爆发的诸多工人抗议之一。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常发生零星的劳工抗议活动，但在 1957 年，工人的骚乱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工人为什么抗议，他们有什么诉求？

中共自 1949 年掌权后，就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飞涨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采取会导致破产与失业的政策。同时，新政权的政策旨在重组国家的政治经济，例如 1953—1956 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工人的实际收入减少。[3]全国范围内虽有零星的抗议活动，但是 1956 年匈牙利起义与 1957 年毛泽东的双百运动鼓励了工人将内心积压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他们开始走上街头，大声疾呼（见本书中吉浦罗的文章）。[4]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本文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劳工骚乱源于国家在重构与劳工的关系方面的内在张力。随着国家不断加强对工业的控制，以及家长式机构的出现，工人开始将国家视为他们利益的守护者，并期望从国家获得经济保护。因此，国家的社会主义承诺同它在某些政策和实践之间的脱节往往令工人感到失望，并成为不满情绪的源泉。

---

[1] 本文所用之数据皆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内部参考》。《内参》是由新华社编辑的一份每周两次出版的报告，每份报告有四十至六十页，涵盖国内发展的新闻，包括腐败、社会动荡等不宜公开发表的主题。《内参》只在党内各级官员中流传，也包括区级、局级官员。

[2] 相关内容见《内部参考》1957 年 1 月 7 日。

[3] Mark W. Frazier. 2002.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Elizabeth J. Perry. 1994.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1–27.

困境

中共作为自诩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必须确保城市工人的支持，这是其合法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前提。早在 1949 年 3 月，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毛泽东就指出，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5]然而，在与工人阶级建立关系的努力中，新政权不得不面对一个深刻的困境，这种困境源自国家作为工人国家的高大形象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涉及政策制定以及深入基层的国家行为者（state actors）和官员的日常表现。本文将特别指出三个，反映国家形象与实践之间内在张力的困境。

首先，中共在建国初期重建经济的政策限制了政权提供并满足工人经济期望的能力。接管后的初期，为了应对恶性通货膨胀，中共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政策，导致了极端的通货紧缩，进而引发大量的破产和失业。同一时期，中共发起了针对党内官僚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针对私人雇主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一步打击了工厂和商店的生意，引发大规模的裁员。1953 年国有化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造成了更多的困难。新政府无力阻止工资削减或停涨，加剧了工人的怨气。

其次，新政权开始经营现代工业后，面临着矛盾的目标。为了推动工业化，政府不得不适应某些同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新型管理方法。政府推动实现生产目标并提高工业效率时，会有工人感到自己仍然遭受压迫。为了解释劳工骚乱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其他社会抗议，毛泽东与中共将此归咎于国家官员的“官僚主义”——这个术语指向被认为是与平等及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等社会主义原则相悖的管理风格与方法。

最后，接管城市工业后，国家开始建立以“单位”为组织形式的社会主义工厂体系。相当比例的产业工人受益于新制度，他们得到了住房、教育、医保以及终身就业的机会。[6]然而，新模式并没有为所有劳动者提供普遍的契约。它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正式工。在劳动力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过程中，大部分留用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24—1439 页。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译者注。

[6] Andrew G. Walder.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或临时工人被解雇，他们对正式就业的要求也被拒绝。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迫回到农村的家乡，更多人陷入了困境。50 年代的许多抗议活动就是由于工人被排斥在外的不满而引发的。

这三个困境导致了新政权的社会主义言辞与工人不得不面对之严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失望与幻灭。因此，工人的抱怨是明确针对党和国家的未实现之承诺而表达的。

工资

工资和福利待遇引发这一时期大量劳工骚乱的重要因素。例如，1953 年 2 月，由于华东工业局强制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标准，上钢二厂的工资改革打破了工人对加薪的期望。[7]愤怒的工人包围了工厂办公室，要求党委书记和厂长作出解释。党委书记给他们看了文件，证明这些标准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制定的。然而，工人拒绝相信，并声称要写信给毛主席澄清此事。由于工人发现他们的抱怨无法得到满足，抗议愈演愈烈。同样，1956 年末，天津的工人要求加薪，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罢工、停工与请愿。在其中一场事件中，港口的装卸工不仅包围了港口办事处，与行政和工会干部对峙，还两次派代表到劳动部与全国总工会抱怨他们的低工资和经济困难。[8]

1957 年，劳工骚乱的数量急剧上升，尤其是在上海。五、六月，全市 548 家企业爆发了涉及两万七千名工人的抗议活动：其中有 94%（548 家中的 518 家）发生在合资企业，42%（548 家中的 230 家）因工资纠纷而起，而几乎相同数量的抗议（41%，548 家中的 229 家）是因为福利待遇。[9]《内部参考》描述了一些案例。例如，1957 年 5 月 19 日，新丰纺织厂的六百多名职工举行集会，要求恢复他们的工资标准，此前他们的工资在经济困难时期被降低过。[10]同一天，天翔毛纺厂一百多名职工集会，要求恢复他们的工资水平。[11]这些事

[7]《内部参考》1953 年 2 月 12 日。

[8] 同上，1957 年 1 月 17 日。

[9] 同上，1957 年 9 月 30 日。

[10] 同上，1957 年 5 月 27 日。

[11] 同上。

件表明，抗议的动机是工人要求将工资恢复到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水平。他们对工资的减少感到愤怒，并质疑为何他们在新社会工资还要比解放前低。

工作条件与管理方法

松懈的规章与劳动保护是工人对新政权感到失望的另一个原因，并因管理不善而恶化。据《内参》称，许多企业因管理疏忽和松懈导致工业事故频发（见本书中韦立德的文章）。例如，相比前一年，1954 年湖南省的死亡率增长了 225%，其中大部分死亡是由矿难造成的。[12]数据还显示，1953 年的前 7 个月，上海发生的致使死亡或受伤的工业事故是去年同期的两倍。[13]仅在上钢一厂，1952—1953 年间就发生了 858 起工伤事故。《内参》记录了 1955—1956 年的 722 起工业事故，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人。[14]

上述报告表明，企业管理对这些工业事故负有责任。尽管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不追求利润，也不参与市场竞争，但仍然面临着官僚设定的产量指标的压力。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接近尾声时，企业必须加紧完成生产任务。强制加班与过重的工作负担普遍存在。管理层忽视安全和劳动保护，这是导致工业事故与工伤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山东省一家年利润为 120 万元的工厂仅花费 3000 元购买劳动保护设备。[15]山东省 42%的工业事故是由缺乏劳动保护措施造成的。[16]云南省的许多企业和矿山也未能改善劳动条件或提供劳动保护，这造成了许多工伤和职业病。[17]工人们被迫加班加点，疲劳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沈阳省，工人被迫加班的情况十分普遍：就连孕妇和产后不到四个月的年轻母亲也无法幸免。江苏省因工业事故与过度劳动导致的死亡率居高不下。[18]北京的工人除了要承担额外的工作时间，甚至星期天还得参与“义务劳动”。[19]辽宁省鞍山钢铁钢厂的一名经理强迫 53 名工人连续工作

---

[12] 同上，1953 年 7 月 30 日。

[13] 同上。

[14] 基于 1955 年与 1956 年《内部参考》所报告的工伤事故数字。

[15] 《内部参考》1956 年 11 月 12 日。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1956 年 4 月 11 日。

[19] 同上。

24 个小时，告诉他们“做完活之前不准回家，否则就把你们解雇、降薪。”[20]上海光华机械厂的工人抱怨道，“企业和工会只想让我们生产、生产、生产，不关心其他事情。”[21]管理层通常采用“命令主义”和“惩罚主义”对待工人。[22]

排斥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工业重建期间，出现了将工人分为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就业制度。这两类工人不仅在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如医保、养老金等）上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正式工享有终生就业的权益，而临时工没有。经济复苏期间，包括农民、复员军人在内的大量非技术工人被雇佣在需要重体力劳动的建筑项目，以及需要额外人手赶上产量指标的企业。然而，他们在工资与福利方面同正式工相比大不相同。因此，他们要求获得正式工的编制。

例如，1957 年 3 月，武汉长江大桥局决定在完成几个指定项目后解雇一百多名临时工，并将他们送回农村老家。[23]宣布这项决定的会议上，愤怒的工人高喊口号，走出会场，会议立即终止，陷入混乱。工人期望成为正式工，因为他们曾被承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入编。他们迅速召开自己的大会，并提出成为正式工人、“长期留在大桥工作”的诉求。省工业局派出一位副局长处理这场危机，虽然没有承诺让他们成为正式工，但这些工人被调往另一个建筑工地，避免了被立即解雇。

同年，无锡的 190 名码头临时工发起绝食罢工，要求入编成为正式工。[24]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被解雇。在这场运动中，无锡的许多临时工遭到解雇。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其他城区的工人模仿，最终影响到了整座城市。工人们明确表示，如果他们“不狠踹（干部）的屁股”，问题就无法解决。

[20] 同上，1956 年 12 月 27 日。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1957 年 3 月 16 日。

[24] 同上，1957 年 1 月 27 日。

工人在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带来了“解放”，还承诺要为工人阶级带来更好的生活。政权的社会主义承诺成为工人表达不满的标杆。重庆的抗议工人公开抱怨新政府“不比旧政府好”“总路线一来，我们就失业了”。[25]据报道，苏州的工人抱怨道，“共产党来了，我们还得像牛马般工作，从早到晚，从年初到年末”，并质问“这就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得的？”[26]河北省峰峰煤区，管理层肆意克扣工人工资，一位年长的工人抱怨道:“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皇帝还在的时候我就在这儿干活了。我们现在的制度比那时候更糟糕。”[27]社会主义改造减少私营部门，进而导致裁员后，天津的工人讽刺地表示，这项政策不是为了改造资本家，是想改造工人。[28]1956 年 7 月，《内参》报告了一位建筑工人（党员兼劳模）在青岛一次党会上的讲话。[29]他描述了他的工友糟糕的生活，并抱怨他们被迫压榨身体到极限。在讲话中，他希望毛泽东与上级领导可以派人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显然，心怀不满的工人将他们的怨气归咎于新政权，并指责其未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承诺。官方言辞不仅是工人阶级失望的来源，他们甚至还利用这些言辞批评政权。工人的抗议往往会用“反官僚主义”甚至是“民主”框定。

1957 年 3 月，河南 116 厂爆发了一场抗议，原因是三百多名新招收学徒的工作分配不当。[30]当地政府官员支持工厂干部，于是工人批评这种“官官相护”的行为。还有些上海工厂的抗议工人发放传单，呼吁“民主与平等”。他们被警察拘留时，声称警察的行为违反宪法。

行动的规模与方式各不相同。例如，1953 年 5 月，西北建筑公司有四千名工人骚乱；又如，1956 年 6 月，重庆有三千名工人集体请愿。[31]《内参》中报

---

[25] 同上，1954 年 5 月 29 日。

[26] 同上，1954 年 8 月 27 日。

[27] 同上，1956 年 6 月 16 日。

[28] 同上，1956 年 6 月 17 日。

[29] 同上，1956 年 7 月 12 日。

[30] 同上，1957 年 4 月 14 日。

[31] 同上，1957 年 1 月 7 日。

告的大多数案例都是数百人规模的抗议。上海，1957 年五月至六月期间，约有两万七千名工人参与抗议，这表明了工人行动的规模。[32]

工人还会通过集体请愿表达不满。1957 年 9 月 28 日的《内参》报告，上海 61 起事件中，有 23 起涉及集体请愿。此外，《内参》还指出，1955 年底，上海已经出现了 19 个由失业和流动建筑工人成立的“非法组织”，成员 20 至 200 人不等。[33]这些组织是一些行动的幕后推手。例如，上海黄浦区的商店工人成立了“反官僚主义小组”，声称要“保卫工人利益”。[34]如上所述，在某些报告中的事件，工人团体纠察队和司令部，并派遣代表与管理层进行工资谈判。抗议工人故意采取“大吵大闹”或“小事化大”的策略，因为他们认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不满就无法得到重视和解决。

模式的反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劳工的关系对新政权构成了挑战。尽管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对中共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被奉为最先进的社会阶级，也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承诺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工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工业体系。然而，党-国作为“保护人”和工人阶级化身的形象，与工人在工作场所中日常经历的诸多做法相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劳工抗议可以说为后来的国家-劳工冲突奠定了模式，这种模式将在往后的岁月中反复出现，特别是 90 年代中期的工业重组期间（见本书中李静君、威廉 · 赫斯特的文章）。[35]正如本文所述，50 年代初建立的工业体系已经显示出某种“道义经济”的特征，即国家通过经济利益交换工人对其合法性的认可，而工人则根据国家对其利益的维护程度来构建公平与公正的观念。[36]这种关系开始形塑工人对国家的看法，将国家视作具有道义责任确

[32] 同上，1957 年 9 月 28 日。

[33] 同上，1955 年 6 月 6 日。

[34] 同上，1957 年 6 月 7 日。

[35] Feng Chen. 2003.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 Resistance in China.’ *Modern China* 29, no. 3: 237–62.

[36] Feng Chen. 2000. ‘Subsistence Crisi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r Protests in China.’ *China Journal*, no. 44: 41–63.

保他们利益的保护人。往后三十年间，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家长式企业体制的建立，只会让工人更加确信国家要对他们的福祉负责。如此，国家若是未能维持工人所期望的某些规范和标准，就会成为工人不满的主要源头，进而引发广泛的劳工抗议活动，这种影响将远远超过 20 世纪 50 年代。

1958

1958 年 9 月，当时只是一个有抱负的评论家的张春桥。在上海的一份共产党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粉碎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文中，他认为工资标志着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劳动逻辑，并建议优先发展新的意识形态或道德激励，从而取代工资，成为刺激生产的新基础。得到毛泽东的个人许可后，这篇文章引发了一系列理论激辩，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超越工资制：张春桥、资产阶级法权与作为理论的毛主义

本杰明 · 金德勒（Benjamin KINDLER）

1958 年 9 月 15 日，上海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作者是一位有抱负的评论家，张春桥。文中引用了马克思晚期关于过渡时期的概念词汇“资产阶级法权”，他试图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再生产，以此挑战先前在应用中的苏联模式霸权。1958 年，作为国家级刊物《红旗》的地方性刊物，《解放》的每一期都会送交毛泽东本人阅读。这篇文章引发了一系列理论激辩，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完张春桥的文章后，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此文，10 月 13 日迅速发表后，还附上了毛泽东的编者按，毛泽东宣称：“这个问题”——即资产阶级法权——“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春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1]毛泽东的兴奋与赞许确立了张春桥作为理论家的领导地位，他当时的言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关键问题。张春桥认为，社会主义下继续使用工资制，无法像苏联理论家所假设的那样，与资本主义的工资制有根本区别。张春桥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依靠物质激励刺激生产力，忽视了新思想的形成，那么不仅不能确保过渡到共产主义，工资还会为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以及革命进程的失败创造物质与意识形态条件。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生产中，张春桥的文章具有重要地位。我们不仅要研究张春桥的思想，还要意识到 1949 年之后的时期中毛泽东思想最原创的贡献，包括对社会主义下劳动社会组织的一系列思考，以及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工资）在历史与理论上可以多大程度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划清界限。

---

[1] 陈晋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战略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08—310 页。

张春桥认为工资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劳动逻辑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应当优先发展新的意识形态或道德激励，从而取代工资作为刺激生产的基础，张春桥与毛泽东一同寻求开创一种与苏联模式在根本特征上存在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张春桥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包行了某些从资本主义引入的社会关系与形式，例如“工资”，这些需要通过不断转变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从而彻底取代。因此，张春桥的发言意味着理论层面上的断裂，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激进的洞察，由此引发一系列新的辩论，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主义的衰落。

“马克思”在北戴河

大跃进的动荡中，中国出现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的广泛过程的一部分。1958 年初的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开始根据不同社会关系组合之间持续存在的矛盾与不平衡的模式，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这同时是一个寻找新的理论范畴的项目，这些理论范畴不依赖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大厦，特别是基于斯大林 1952 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2]8 月下旬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引入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3]他继续指出：“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4]毛泽东强调，所有制形式地位的变化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仍然带有源自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关系和意识模式的特征，因此，这些特征使得社会主义本身成为矛盾的场所，而不是稳定或均质的生产模式。这是回归马克思并作为新起点的机会，不受限于苏联经验，也不拘泥于马克思严格范畴的字面意义。

---

[2] 这些早期社会主义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被奉为经典的理论文本与政治历史等文本，作为中苏关系史新研究的一部分，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例如，见 Hua-yu Li. 2006. *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3]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14—417 页。这些言论在文革时期还被未尽授权的引用，作为毛泽东选集的《毛泽东万岁》中部分流传。

[4] 同上。

中国理论家回归的马克思不是早期人文主义的马克思，而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晚期马克思。

资产阶级法权（bourgeois right，德语中 bürgerliche Recht 是特定的单数形式，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定权利”〔bourgeois legal rights〕）这一概念，马克思主要在 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进行了讨论，这是唯一一次他对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延伸讨论。[5]马克思设想了一种社会，产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通过直接的社会基础之上的生产重组而被废除。然而，他也假定了这种社会的早期发展无法完全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它从资本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后，“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6]因此， 这种社会中适当的分配模式是“平等的权利”，或者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即一种仍以等价交换为前提的分配模式，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正如马克思承认的那样，这段引得后世理论家惊愕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领域中的等价交换就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普遍可交换性的抽象规范，或者说是不考虑个体殊异的前提下根据劳动量获得报酬。根据劳动贡献的普遍规范进行报酬，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需求与能力，“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超越这种再生产不平等作为抽象规范的狭隘“法权”视野，正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运动。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一个——

> “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

[5] 《哥达纲领批判》的中译本由熊得山于 1922 年译成，整个二十年代不断由新译本出现。而最接近 1949 年后围绕资产主义法权的辩论的译本，是 1939 年在延安新哲学会的协助下由同属会员的何思敬完成的。见于良华：“关于延安‘新哲学会’”，《哲学研究》1981 年第 3 其：第 75—80 页。

[6] 引用自中文马库，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5-4.htm#4。——译者注。

> 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的运用扩展了马克思讨论的范畴。首先，不能说中国已经废除了马克思所述的产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然而，正因如此，在中国，资产阶级法权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包含社会主义社会下不平等的再生产。因此，毛泽东在此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用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密切相关，而这也是大跃进的核心问题，“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指代了“工资”这一核心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内涵密切相关，还指代了官僚的特权，预示了六十年代的激进反官僚主义运动。[8]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谈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意识形态，揭示了社会形式和意识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动态张力，以及意识的转变如何带来社会关系的转变。

这些早期的发言为系统性探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创造了空间。从北戴河回来后，上海市长柯庆施（1902—1965）向张春桥介绍了进行过的讨论，预示张春桥开始着手撰写文章。

“列宁”在上海

张春桥的文章基于并重新审视了毛泽东早期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用中所体现的“回归马克思”的遗产。张的论点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的解读，不如说是革命战争期间供给制恢复后，可以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一部分重新理论化并发展。“供给制”是指战时向干部与士兵提供产品的非货币化方式。张春桥认为，三十年代红军的平等关系不仅包括人民军队内部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也包括军民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一种替代物质激励（如工资）的方式。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相比之下，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工资制度”，[9]物质激励通过这一制度再生产并自

---

[7] 同上。

[8] 关于大跃进中日常生活概念的核心作用，相关探讨见 Fabio Lanza. 2020. ‘The Search for a Socialist Everyday: The Urban Communes.’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volutionary China*, edited by Alan Baumler, 74–88. London: Routledge.

[9] 英文写的是“the wage system”，但张的原文是“等级制度”。——译者注。

然化了资产阶级关于“通过劳动获取薪酬”的期望，从而阻止了关于共产主义分配形式的意识。这段发言直接质疑了资本主义下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买卖与社会主义工资制之间的绝对差异——苏联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核心内容——根据“按劳分配”的公式，社会主义的工资应该严格按照工作量比例激励劳动者。

张春桥的文本表明，社会主义的工资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工资没有本质区别，因为两者都参与了一种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不相容的原子化劳动的共同逻辑。相比于毛泽东，对于张春桥而言，“资产阶级法权”在更大的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建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连贯性的方式，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作一种矛盾的社会形式的集合，与工资的关系本身就是一处根本矛盾的场所。[10]在文中，张春桥将那些推崇物质激励的人称作“经济学家”，这使得他的发言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张的文章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战略性分离，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政治挂帅”的强调中得到确认，政治被理解为转变意识的推力，与工资等过渡性社会形式决裂。

张春桥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即 1958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上海举行了六次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会议。与会者主要来自宣传工作领域，不是张所贬低的 “经济学家”。他们与张春桥一样关注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工资制的结构和意识的转变能力之间的关系。《解放》总结了这些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辩论，指出：“不可否认，明确的经济关系总是会产生相应的意识形式，由于分配同样是一种经济关系，其中的不平等残余同样会产生资产阶级意识。”[11]

相比之下，共产主义的劳动意识则被描述为“无偿”劳动。这些不同的意识模式的特征被描述为欲望与意识即“私”与“公”之间的调配。在勾勒这种意识的轮廓时，支持张春桥的激进派诉诸于苏联早期的乌托邦时代。他们指出，“列宁在苏联早期就花大力气支持‘共产主义星期六’〔Subbotniks〕，因为他从中看出了‘共产主义的东西’，他能看到共产主义的萌芽。”[12]列宁在 1920 年

---

[10]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3 日。

中文马库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01-30/04.htm。

[11] 周林知：《评上海出版物中有关劳动和分配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解放》1958 年第 9 期： 第 9 页。无法查阅引用原文，由英语转译，下同。——译者注。

[12] 同上：第 11 页。

的文章《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中，将星期六义务劳动描述为“为公共利益”进行的劳动。取代资产阶级法权需要全面重建意识和社会关系，以便所有的劳动都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不再通过工资与相应的意识模式作为中介。对马克思、列宁以及中国革命早期阶段的层次引用，使得资产阶级法权的语言能够从具体的毛泽东主义视角批判斯大林主义。

大跃进的乌托邦阶段很快就陷入了灾难，迫使人们重新审视 1958 年期间积累起来的炽热期望，包括通过超越工资制迅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想法。因此，11 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强调：

>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3]

他用更惊人的措辞继续说道：“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14]如何使资产阶级法权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加深了工资制问题的复杂性，例如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如何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最终取代它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述）的物质与意识形态条件。

走向共产主义劳动

培养能够取代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的共产主义劳动主体，从 1958 年起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长期面临的问题，但也是最终导致中国革命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词汇僵化的斗争焦点。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本人负责编写一本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战略性分离进入了一个新格局。在教材中，他和其他作者试图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阐述，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矛盾性，从而取代苏联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稳定生产方式的理解。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失败，为对苏联的回顾性批判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明确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工资关系与社会主义下按劳分配之间的连续性：

---

[13]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 527 页。

[14] 同上。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所反映的生产关系虽然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反映的生产关系不同，但是工资范畴及其具体形式，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15]

这段摘自 1976 年教材草稿的讨论稿的话语，其意义不仅在与重申社会主义工资与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工资基本上保持一致，而且还指出工资关系将为未来的资本主义复辟提供基础，即工资作为助力可以随时将劳动力重新纳入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张春桥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为八十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提供了“现成的”可能性。教材的定稿于 1976 年 9 月出版，早于毛泽东逝世后的政变。[16]

然而，张春桥及其对话对象只能通过英勇的意志行动构想对工资的超越，而这种行动在特定时期的疲惫动员之外无法持续。尽管他们无法创造新的共产主义劳动形式，但他们强调的问题——资本主义工资与社会主义工资之间的连续性，通过系统性重塑欲望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是真实且仍然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在我们的时代——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试验的废墟中，迎接这些挑战。

---

[15] 同上：第 385 页。

[16]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该稿是几个独立草稿中的第五个版本。编写译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项目始于 1972 年，由上海市写作组直接主持，张春桥与姚文元都是其中的成员。

见第 383 页（413）。https://www.bannedthought.net/China/MaoEra/PoliticalEconomy/PoliticalEconomyOfSocialism-Shanghai-1976-9-Chinese-OCR-sm.pdf。——译者注。

1958

1958 年，中国共产党宣布开展“大跃进”运动，一场应该贯穿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3）的运动。运动宣称的目标是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工业产值，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随着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极大加速了集体化进程，国家对重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尽管努力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但工会在双百运动后的打压中被大大削弱，此前工人争取到的许多成果都被撤销了。最重要的是，这场运动为生产设定了雄心勃勃但不切实际的指标，为产业工人带来了压力。尽管要在十年后才会严格实施，但户口制度在此时就已经建立，至今仍然存在。本文将探讨户口制度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及其遗留问题。

中国劳动力重组：户口制度的建立

简·海沃德（Jane HAYWARD）

1958 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户口制度正式建立，这成为支撑中国发展模式中劳动与生产组织的核心机制。当时无法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全面接轨的情况下，户口制利用中国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支撑城市的生活与工业发展。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的社会关系发生转变后，户口制度仍然存在。继续通过剥削农村劳动力推动城市工业发展的同时，矛盾的是，户口从最初保护中国经济免受全球资本影响的机制，演变为一种向国际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机制。

国际环境

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欧的民族国家通过殖民扩张以及利用海外领土的廉价劳动力与资源，推动发展与工业化。1949 年后的中国没有这个选择。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至少在理论上）背道而驰——而且有着充分的理由。一个世纪以前的鸦片战争中，虚弱的清政府被英军击败后，不得不以在中国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放市场。战后对英国的让步不仅限于不利的贸易条件，还包括割让部分中国领土。不久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很快涌向中国，英、法、德、俄、美，最后还有日本，最终都在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设立了租界，外国侵略者在其中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外商的商业活动并未超出通商口岸的范围，也没给中国经济带来仍然实质性的利益。[1]相反，中国内陆与农村地区的大量人口本已陷入贫困，而在政府无力抵抗外国侵略而选择屈服之下，他们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2]二战期间，其他列强离开后，中国的部分

[1] Chris Bramall. 2009.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51.

[2] Ibid., 50.

领土被军国主义日本占领，后者当时意图在亚洲建立霸权。[3]毫不奇怪，共产党在 1949 年的最终胜利建立在激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上。然而，我们当然应该认识到这种立场的不一致性。正如克里斯 · 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声称要在中国境内消除任何帝国主义的存在，却要保持在西藏、青海、新疆与内蒙古的内部凝聚力，这是中共'计划'的众多讽刺之一。"[4]即便如此，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掌控的"半殖民地"经历对共产党未来发展战略的塑造至关重要。

此外，中国也没有可能参与外国市场。当时的世界，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经济专家往往认为外贸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理所应当的联系。然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则根据他们的经验与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对中国国情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关系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因此，如果虚弱的中国向外国市场开放只会带来更多以往发生过的情况：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屈从于掠夺性的外国资本家，他们会竭力榨取国家资源，国家无法以惠及大多数民众的方式发展。[5]无论如何，在五十年代敌对的冷战环境下，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当时正处于反共主义麦卡锡主义阵痛的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新近加冕的霸主，对中国采取积极遏制政策，包括贸易禁运、在日、韩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七舰队。[6]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新中国通过接触全球资本主义从而发展经济的前景受到了严格限制。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内的人口资源。[7]户口制度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

---

[3] Rana Mitter. 2014.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Penguin.

[4]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79.

[5] Rebecca E. Karl. 2010. *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A Concise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5–26.

[6] James Peck. 2006. *Washington's China: The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ism*.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7] 关于此事在党内的紧张局势，见 Lawrence C. Reardon. 2002. 'Chinese Elite Conflict over Globalization.' In *Transforming East Asia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Impact of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bert W. Compton. Burlington, VT: Ashgate, 36–67.

共产主义对阶级的理解

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会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阶级的剥削关系，这是所有社会不公正的根源。问题正是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迫使那些无财产者为了工资而将他们的劳动出售给私人所有者——资本家。在这一体系下，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因此，通过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不属于生产它们的人，而属于私人资本家，他们只会支付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作为工资，并将其出售牟取利润，在此中积累私人财富。在这种交换中，劳动者永远处于吃亏的一方，他们获得的回报少于他们所生产产品的价值。因此，私有制下劳动的商品化是一种剥削形式，私人资本家为了牟取更多的利润而将工资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因此，对于中共来说，以私有财产或商品化劳动的原则组织国民经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中国的阶级不平等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或社会正义的道德问题：这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毕竟，全球资本主义始终具有侵略性，总是在寻找新的领土和市场。国内能够从商业活动中受益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前帝国主义殖民者统治下表现出色的人，或是那些私人财富或财产可能随着新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过程中以某种方式蓬勃发展的人，总是容易受到外贸的诱惑。此外，共产党最近击败的对手——美国支持的亲资本主义的国民党——也令人担忧。在上世纪 30 年代与 40 年代，他们与国民党发生了一场残酷的内战。1949 年之后，国民党逃往台湾，正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他们计划再次入侵，并与他们在大陆的资本主义盟友联合起来。因此，任何积累个人财富或财产的人都会被视作潜在的帝国主义通敌者，有可能把中国拖回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历史。

中国的户口制度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这个初创的共产主义国家振兴大国与经济的艰巨任务的背景，同时，既要控制社会不平等，又要把包围他们的外国列强挡在门外。面对这种困境，户籍制度成为了解决方案。在这种制度下，农业劳动力以大型集体农场或公社为基础进行组织，城市工人则被组织进集体劳动单位。每个人都

在各自的公社或工作单位登记，并在登记时被归类为农业户口或非农户口（城市居民）。

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的公共产品、设施以及基础设施是由这些分类所决定的。对于城市居民，国家提供住房、食品、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教育等其他设施服务，根据工作单位的登记进行分配。然而，对于农业户口来说，国家并不提供这些设施，而是由农村集体自行或由农村工人组成的生产队提供。[8]此外，在这种制度下，全国各地的人口流动也受到了限制。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基础设施和供应带来压力。户口制度的目的则是将大部分国家资源保留给城市劳动力，从而推动工业发展。同时，在农村的大型集体农场中，大量农业劳动力可以被有效组织并管理，粮食更容易以低廉的成本获取并运送到城市。

户口制度在设想中，不会存在劳动商品化，也不会存在阶级剥削，农村与城市居民至少在名义上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从农村提取的产品被用于国家建设的集体项目，而不是因为私人利益而市场化。这种“非剥削性”的社会结构——国家话语中称为“工农联盟”——在意识形态上支撑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组织的总体形式。然而，讽刺的是，鉴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农村作为城市的结构性从属的基础之上。这是全国性的大型剥削机制，以农民群众为代价，维持城市的生活水平。根据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温铁军的观点，毛泽东时期的户口制度构成了一种国家自我剥削的形式，相当于一种内部殖民。[9]根据许慧文（Vivienne Shue）的说法，户口制度将人口划分为不同身份、受不同法规管理的民族，因此，最好将其视作帝国统治的体现，而非一种民族国家的治理形式。[10]

---

[8]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644–68, at pp. 644–45.

[9] Jane Hayward. 2019.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and London: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204.

[10] Vivienne Shue. 2018. ‘Party-State, Nation, Empire: Rethinking the Grammar of Chinese 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3, no. 3: 268–91.

历史背景下的户口制度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户口制度，实际上有着悠久的制度历史。长期以来，中国历朝历代为了征税、征兵以及社会控制等目的，都会施行某种形式的户籍管理。[11]例如战国时期（公元前三至五世纪）发展起来的保甲制度，涉及到将家庭组织成互相管理的团体，对国家具有共同责任，这实际上是一种监督机制，邻居要相互举报可疑的活动，从而避免集体惩罚。这种制度在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20 世纪，1927—1949 年的国民政府也采用了类似制度用来铲除敌人——特别是共产党人。20 世纪 30 年代末，共产党在其控制的农村地区也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防止反革命活动与国民党或日本人的渗透。[12]1949 年赢得内战的共产党人进入城市后，他们接管了国民党保存的城市户口记录，利用这些记录清除城市中潜伏的残余敌人或可疑人员。[13]在这一阶段，限制人口流动并非重点。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事实上的宪法，即 1949 年 9 月颁布的《共同纲领》，保证了居住与流动的自由。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城乡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促进了几十年战争后的经济复苏。[14]

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户籍管理的重点从识别敌人转向国家对人民与资源的控制。随着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反映出斯大林主义对重工业的优先考虑，以及城市劳动力在意识形态上相对于“落后”农民的优先性。苏联的“居住证”（propiska）是一种城市居住许可，用于调控城市规模，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是限制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早期模式。[15]通过一系列的规定，中国逐渐控制住房与人口迁移，通过配给制控制粮食的购买、销售与分配，保证城市居民能以低价获得粮食。1955 年出现了全国性的

[11] Fei-ling Wang. 2005. *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 China's Hukou Syste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2–40.

[12] Ibid., 41–43.

[13] Ibid., 44.

[14] Cheng and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646.

[15] Dorothy J. Solinger.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4.

登记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进行管控。[16]然而，早期的户口制度仍然存在漏洞。随着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化，城市就业机会激增，吸引了大量农村工人涌入，他们通常带着自己的家人，而规划官员对此则持有保留意见。政府颁布了各种法规，如保证返乡的假期，以试图控制这种流动。[17]

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户口制度以最完整的形式确立。登记范围扩大至解放军将士，涵盖了中国的所有公民。[18]然而，这些规定恰逢大跃进的工业化热潮，大跃进作为全国性的运动，自然也导致了城市就业机会的进一步激增。尽管随着经济管理的下放激发了基层活力，但中央政府试图紧握劳动力流动的同时却失去了控制。[19]因此，矛盾的是，户口制度以最完整的形式出现时，“1958—1960 年期间……有着数百万人涌入城市，这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间城市化进程最迅速的蓬发，也许在人类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20]直到 1960 年，中国的领导层才承认大跃进给农村带来的灾难和饥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获季节时将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建设项目的后果。有鉴于此，户口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减员”计划出台，将农民工从城市转移回农村。[21]

改革时期的户口制度

1978 年后实行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经济与城乡关系的性质。农村的公社被解散，农业生产重组为家庭单位。东南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将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联系起来。农村地区，地方干部建立了村镇企业，生产用以出口的产品。由于农村家庭可以管理自己的土地，多余的劳动

---

[16] Cheng and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655–56.

[17] Ibid., 661.

[18] Ibid., 662.

[19] Roderick MacFarquhar.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Volume 2*.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9–63; Cheng and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664–65.

[20] Ibid., 665.

[21] Jeremy Brown. 2014.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7–86.

力都被鼓励寻找非农工作，只要他们留在自己的地方。农村劳动力市场开始在农村形成，一些人开始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在经济特区寻找就业机会，农村向城市的缓慢流动开始出现。[22]

80 年代后半叶，城市的工作单位开始将工人转为临时合同工。国家保障终生就业与养老的数十年后，许多人失业了，这是一种创伤性的社会与文化冲击（见本书中李静君、赫斯特、苏黛瑞的文章）。劳动力正在全国范围内商品化。1992 年，邓小平进行了历史性的南巡——刺激经济特区活动的宣传行动。随着更多的投资涌入，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加速，不久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加入进新“解放”的城市劳动力。林春指出：“从 1991 年到 2013 年，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大幅增加了 2.69 亿，其中 85%来自农村。”[23]

尽管如此，户口制度仍然存在。地方官员对农村人口在城市的非法地位视而不见，因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涌入推动了中国的新兴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但国家仍然没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住房、社保、医保、子女教育或养老金。他们所拥有的福利留在农村，与他们的当地户口挂钩。因此，很大一部分城市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是在农村进行的，费用由村民承当。农村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安全网，人们期望着农民工可以在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返回农村。由于市政府与外来企业都不必承担工作相关的福利之初，工资被压得很低。因此，户口制度构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大规模剥削——为中国城市与全球资本的利益而剥削农村外来劳动力。[24]户口制度促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生产，有使其在全球资本面前被肆意掠夺。多么讽刺。

今日的户口制度

过去二十年，大城市无力吸纳农村流动人员，这体现在城中村的出现——被城市扩张所吞噬的前农村。它们没有被夷平并重新建设，而是由于农村户口

---

[22] 非农户口从 1978 年的 2800 万增长至 2003 年的 1.76 亿，大部分在乡镇企业工作。见 Giovanni Arrighi. 2007.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Books, 362–63.

[23] Lin Chun. 2015.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China.’ *Socialist Register* 51: 24–53, at p. 38.

[24]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46–48.

地区的身份而受到保护，格格不入的矗立在城市中。由于这些地区的村民失去耕地，因此通过增建房间出租来取代农业收入，城市无法为涌入的数百万农村外来人口提供合适的住房，这确保了城中村房东稳定的出租客源。严重的过度拥挤导致了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人数比例高达十比一甚至更多。由于基础设施有限，且建筑质量低劣，城中村越来越像拉丁美洲的贫民窟——城市底层阶级的庇护所。

尽管户口制度存在已久，但中国的决策者长期以来都在尝试改革，有时导致评论家认为它处于被废除的边缘。例如，自 21 世纪初开始，有些城市推出措施，将分裂的农业与非农户口统合为单一的“居民户口”，自 2010 年以来，广东的某些城市开始尝试基于积分的制度，符合特定标准的外来人员可以拿到当地户口。[25]转折点出现在 2014 年 3 月，中央政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之一的国务院紧随其后，发出通知宣布取消居住证的城乡差别，并放宽允许向中小城市流动的限制，目的是让一亿农村外来人口在城镇落户。[26]表面上看，这些措施似乎最终认可了农村劳动力在中国国家建设与快速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奖励他们完全融入他们帮助创造的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文明。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在大多数中国城市已经正式消除了城乡差别，但户口仍决定着一大批中国人的地位层级，即本地居民与非本地居民的区别。[27]

户口改革的背后，是限制大城市规模的计划——那些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也是中国资本和现代化的中心。许多这样的城市中，低薪的农民工最不受待见。因此，中国正在采取各种措施，通过户口改革等手段阻止最贫穷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包括限制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机会（见本书中弗里德曼的文章），将制造业迁出城市，以及前述的积分落户制度。[28]城中

---

[25] Kam Wing Chan and Will Buckingham. 2008. ‘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582–606; Guo Zhonghua and Tuo Liang. 2017. ‘Differentia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City.’ *Citizenship Studies* 21, no. 7: 773–91.

[26] 在线链接：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

[27] Charlotte Goodburn. 2014. *The End of the Hukou? Not Yet*. Policy Paper No. 2. Nottingham: China Poli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vailable online at: nottingh-am.ac.uk/iaps/documents/cpi/policy-papers/cpi-policy-paper-2014-no-2-goodburn.pdf.

[28] Eli Friedman. 2018. ‘Just-in-Time Urbanization? Managing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Schooling in the Chinese City.’ *Critical Sociology* 44, no. 3: 503–18; Guo and Tuo, ‘Differentiat-

村也成为目标，近期北京的政府官员开展了一次“清理低端人口”运动，没有任何警告就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赶出他们的住所。[29]对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系统性偏见并没有消失。户口问题同样没有消失，只是在不断地改变形态。

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Chenchen Zhang. 2018. 'Governing Neoliberal Authoritarian Citizenship: Theorizing *Hukou* and the Changing Mobility Regime in China.' *Citizenship Studies* 22, no. 8: 855–81.

[29] Eli Friedman. 2017. 'Evicting the Underclass.' *Jacobin*, 6 Dec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jacobinmag.com/2017/12/beijing-fire-migrant-labor-urbanization.

1960

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受到了雄心勃勃但不切实际的工农业高生产指标的影响。关于农民土法炼钢而忽视农业生产进而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饥荒，已经有许多文章探讨过，但大跃进对其他行业工人的影响却不为人知。本文将探讨大跃进运动对煤矿工人的安全与健康造成的损害。

工人国家中的工人灾难：老白洞煤矿灾难

韦立德（Tim WRIGHT）

1960 年，山西省北部大同市的老白洞煤矿发生大规模爆炸事故，650 多名矿工丧生。[1]这是中国史上第二严重的矿难，也是全球史上第四严重的矿难。[2]这场事故从前因到事后处理都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中对工人福利有限的重视。

剖析事故

1960 年 5 月 9 日下午 1 点 45 分，矿井下停放煤车的车场中，一次电火花点燃了空气中漂浮的大量煤尘，引起了一次剧烈爆炸。地表上的人看到的第一个迹象是，一道烟火墙冲出 15 号矿井，以十二级台风的威力摧毁了矿井入口及其两千米范围内的设施。正在 16 号矿井准备下井开工的工人被强大的气流掀飞，造成死伤。井下，有许多工人因爆炸或矿顶塌陷而丧生。爆炸还关闭了通风系统，使得有毒气体循环，与大多数类似的矿难一样，导致许多矿工窒息而死。

---

[1] 矿难的细节没有单独的引用，主要来自两个来源。首先是煤炭工业部安全司编：《中国煤矿伤亡事故统计分析资料汇编（1949—1995 年）》，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8 年：第 92—98 页，这似乎主要基于官方报告。其中的内容同样可以线上查阅，见《最新全国 270 例典型矿难剖析》第 152—160 页，在线链接：zmddag.cn/pdf/ebook/022 最新全国 270 例典型矿难剖析-2004 年.pdf。第二个来源是何于清：“问苍茫大地 中外采矿史最大掺案揭秘”（1998 年），主要基于事件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后进行的采访。此文完成于 1998 年，尽管我没有找到具体的出版地点，其中的证据也有些模糊。大多数后来的文章都是基于此文进行大幅度修改。PDF 版本见在线链接：bannedbook.org/resources/file/471。

[2] 1942 年日占下辽宁本溪湖煤矿爆炸，至少导致一千五百人死亡；见薛毅. 2018. ‘:“1942 年本溪煤矿爆炸案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8 年第 1 期：第 152—163 页；法国的库里耶尔（1906 年，1099 人死亡）；见 Robert G. Neville. 1978. ‘The Courrières Colliery Disaster, 19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no. 1: 33–52；以及日本方城町（1914 年，687 人死亡）；见 Brett L. Walker. 2010. *Toxic Archipelago: A History of Industrial Disease in Japa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87–94, 199–206.

当局迅速组织救援行动，当地最有经验的救援队正在参与外地的另一起矿难救援（包头），其余两支救援队迅速赶到，在爆炸发生后半小时内下到矿井，但由于岩石坍塌、火灾与浓烟，他们难以取得进展。下午 5 点 15 分，当局出于好心，修复了通风系统，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地下的明火越烧越旺，有毒的黑烟在整个矿井中蔓延。尽管救援队在 14 号与 15 号矿井的底部建立了基地，但到了晚上 11 点 15 分，他们被迫撤离矿井。晚上 11 点 50 分，一股浓烟与 15 米高的火焰从 16 号井口喷出，切断了被困矿工的逃生通道。次日凌晨 12 时 30 分，通风设备被关闭，救援队于清晨展开新的救援尝试。

爆炸发生时，共有 912 名工人被困在地下。5 月 9 日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3 人，半夜时又救出 104 人。最后的 36 名幸存者于 5 月 13 日获救。5 月 16 日，当局判断，矿井中已经无人能够生还，于次日晚些时候封闭了矿井入口。共有 228 名工人获救，其中 5 人后来不幸身亡。共有 669 名工人在地下遇难，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 684 人，但煤炭部副部长在后来表示，可能有 800 多人丧生。[3]

爆炸后不到一小时，负责管理老白洞的大同市煤炭局的领导就赶到了事发地，一天之内，中央与省级的政府高官也相继赶到。北京的领导人也收到通知，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通报了情况。煤炭部和劳动部部长从海南的会议上被召来进行监督。罗瑞卿副总理向煤矿管理部门保证，中央将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1000 多名的士兵被派往大同，其中有些人配备了化学战防护设备（应对矿井中的有毒气体）；同时赶往大同的，还有来自华北主要矿区的一些救援队。

第一声爆炸响起时，矿工的家属就开始往矿区聚集。尽管情况十分惨烈，当局还是派遣警卫阻止人群靠近，以免妨碍救援工作。遗体被运出的时候，伤心欲绝的亲属不得不上前辨认他们的亲人——有时只是依靠尸体的衣服。由于天气变暖，一些农村家庭需要更长时间，有时只能在亲属下葬之后才能抵达矿区。当局找到了一个适合当乱葬岗的地方，将许多遗体埋在那里，其他人则被带回他们的祖籍地埋葬。然而，包括矿长在内的其他人直到十多年后才被人们发现，他们的家人无处悼念，也无法在清明节时为他们扫墓。

---

[3] 徐达本：“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炎黄春秋》2010 年第 8 期：第 25 页。官方数据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但对矿难的规模没有影响。

并非偶然

这场灾难并非偶然事故。正如本·哈维（Ben Harvey）所写："矿难展示了揭露社会并迫使其行动的快照。"[4]矿难的原因深藏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反映了党和国家采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通过扩大投入的数量来增加生产）的弊端——特别是大跃进（1958—1960）高峰期所实行的极端版本。

1949 年新成立的党和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工人福利，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工人阶级被"重塑"为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特权群体。[5]作为工人福利的一部分，国家至少在口头上承诺了生产安全。正如中国国有煤矿的总工程师在 1990 年的一篇行业回顾中所写的那样："1949 年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煤炭安全成为高度重视的问题。"[6]从 1953 年开始，政府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建立了苏联模式的生产安全机构；1955 年，全国有 10 个主要煤区与 27 个矿区建立了安全检查机构。[7]事实上，五十年代初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煤矿死亡率大幅下降，与 1949—1950 年的极高数字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国家尚未从内战的混乱与破坏中恢复过来，新的安全措施并没能落实到位。[8]

然而，当必须在基层做出具体决定时，粗放式发展模式限制了工人所能获得的特权，即使是对工会官员来说，安全也往往不比其他紧迫需求更具优先地位。[9]一般来说，贫困国家为了快速发展与工业化，在分配资源时不得不做出艰

[4] Ben Harvey. 2016. 'The Oaks Colliery Disaster of 1866: A Case Study in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History* 58, no. 4: 502.

[5] Joyce Kallgren. 1969. 'Social Welfare and China's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ited by A. Doak Barnett.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540–73; Andrew G. Walder. 1984.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no. 1: 11–12, 37–38.

[6] 赵全富："采取科学治理措施努力实现煤矿安全生产"，载于彭世济、冯为民编：《中国煤炭工业四十年》，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 年：第 96—97 页。

[7] 郭朝先. 2008.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发展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年：第 217 页。

[8]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编著：《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概要》，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0 年：第 18—20 页、第 87—88 页。

[9] Charles Hoffmann. 1974. *The Chinese Worke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42; Jackie Sheehan. 2002.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7, 55, 64.

难选择，在实践中往往对工作安全的保障给予较低的优先级。[10]即使在英国，正如 W·G·卡森（W. G. Carson）所描述的“速度的政治经济学”中，70年代对北海油田的开发也迫使安全问题被边缘化，以工人的生命作为高昂的代价。[11]因此，在老白洞，内战结束后于 1954 年重新开放时，财政限制与国家对发展煤炭生产的紧迫需求意味着矿井未能配备符合要求的关键安全措施，例如，第 15 号矿井就兼具提升井与通风井两种功能。[12]

大跃进时期，问题被激化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被推向极端，普遍的政治热情与言论压制阻止了对政策的任何质疑。运动的核心是雄心勃勃而又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在“以钢为纲，以煤保钢”的口号下，煤炭开采占据关键地位。1959 年的煤炭生产指标是 3.8 亿吨，接近 1957 年产量的三倍。[13]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在内部出现了矛盾，因为经济上任何闲置的空间都被耗尽了，1960 年 5 月，老白洞矿难发生时，工业上用于发展生产的粗放方法已经达到了极限，煤炭产量开始下降。[14]

大跃进导致了全国采煤等行业的工作安全危机。[15]矿井为了完成越来越高的指标，被迫偷工减料。口头上承诺了工作安全，但实际操作中，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生产，工作安全并不是首要考虑对象，“安全第一”的口号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的表现。[16]外交部长陈毅将大跃进运动比作战场，使用常见的军事术语，并认为死亡不可避免：“工人中确实出现了伤亡，但不足以使我们停下脚步，

---

[10] Kallgren, ‘Social Welfare and China’s Industrial Workers’, 541, 562; for Singapore, see Stephen Dobbs and Kah Seng Loh. 2020. ‘Unsafety and Unions in Singapore’s 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 1965–1994.’ *Labor History* 61, no. 2: 107–21.

[11] Wesley George Carson. 1981. *The Other Price of Britain’s Oil*. Oxford, UK: Martin Robertson, 84–138.

[12] 煤炭工业部安全司编：《中国煤矿伤亡事故统计分析资料汇编（1949—1995 年）》：第 96 页。

[13] Elspeth Thomson. 2003.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 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40–41.

[14] Andrew G. Walder. 2015.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5–76；煤炭工业史稿编研组编：《中国煤炭工业二十八年史稿》，2001 年内部印刷：第 194—195 页；Frank Dikötter. 2010.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London: Bloomsbury, 153.

[15] Walder, *China Under Mao*, 174–75;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ch. 31.

[16] 徐达本：“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第 21 页；朱义长：《中国安全生产史（1949—2015）》，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 90 页。

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没什么好怕的。”[17]官方的统计数据清楚显示出矿工的生命代价。中国煤矿工人的死亡人数从 50 年代中期的约 600 人增加到 1960 年的 6000 多人，而大型国有矿井（老白洞就是其中之一）的死亡率从每百万吨约 4 人增加到 1960 年的近 14 人，到了 1961 年仍为 11 人。[18]在其他行业，1958 年至 1961 年，国有与集体企业每年死亡的工人几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期间的四倍，而在建筑业，1958 年的死亡率是 1957 年的三倍多，435 例死亡中的 117 例是由于建筑施工中的缺陷导致建筑物倒塌。铁路部门在大跃进期间同样经历了死亡人数的增加，并在 1960 年急剧上升。[19]

老白洞矿井中，追求产量的优先级体现在盲目推动产量数字增长上。矿井的装机容量为 9 万吨，但到 1958 年，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1959 年与 1960 年的指标将计划产量提升至近 15 万吨。产能过剩是煤矿开采的一个主要风险来源，这预示着煤矿的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每个班次的高生产指标不切实际，这意味着工人经常要过度轮班工作，以完成配额。[20]就像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一样，干部用粮票的供应威逼工人超负荷工作。事故当天的 5 月 9 日，就被安排为一个所谓的“高产日”。[21]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显然是次要的。大同煤矿党委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以生产为目的，以安全为手段。当生产与安全之间出现矛盾时，我们首先要服从生产的需要。”[22]与此同时，负责矿区安全的部门也被降级。[23]老白洞存在着许多为了扩大生产而采取的不安全做法。大量的煤尘，有时可达 30 厘米深，堆积在通道中。即使喷水灭火系统一直在运转，也无法处理这么多的灰尘。此外，禁止在地下进行焊接的规定也被解除，疯狂的氛围甚至允许在矿井内进行焊接比赛。[24]

---

[17]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70.

[18]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编著:《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概要》: 第 18—20 页、第 87—88 页。

[19] 朱义长:《中国安全生产史（1949—2015）》: 第 21、22 页；Elisabeth Köll. 2019.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62–63.

[20] 何于清:“问苍茫大地”: 第 8 页；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302–4.

[21] 何于清:“问苍茫大地”: 第 6 页。

[22] 煤炭工业部安全司编:《中国煤矿伤亡事故统计分析资料汇编》: 第 96 页。

[23] 《中国煤炭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煤炭志：山西》，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 年：第 264 页。

[24] 何于清:“问苍茫大地”: 第 29—32 页。

提高产量的迫需导致劳动力被“稀释”，大量未经培训的新工人往往没有在矿区管理部门正确登记。这些工人对安全需求的了解不如有经验的矿工。1955 猫猫老白洞的工人为 1978 人，1960 年增加到 6994 人，其中 1126 人未经正规程序聘用。管理部门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劳动力的管理能力，甚至于，那些家里没有适当照顾安排的工人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井下，他们可以在那里照看孩子，或是带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亲戚到地下观光。[25]

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待遇也显示出工人福利受到的限制。国家不像十九世纪的英国或美国的煤矿主那样试图推卸所有责任。[26]幸存的工人尽管受伤，也被分配到他们能够胜任的合适岗位，丧偶者在相关职位招聘过程中有优先权。但是，就像在英国一样，支付的抚恤金少得可怜。死者家属按照每月 12.50 元（农村居民 8.50 元）的标准领取补助。[27]虽然后来的报道说，鉴于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这些数额是合理的，但考虑到矿工的平均工资约为每月 60 元，这些金额显然不太能让逝者家属维持生计。[28]

责任归属

大跃进运动即党和国家的政治因素促成了这场灾难，也阻碍了后人可以借鉴的严肃分析的出现。灾难发生之前，那些质疑不安全工作方法的人被打为右派。一位老工人意识到了风险，他曾在满洲里的矿场工作时经历过爆炸，但他还是不敢拒绝下井。[29]他下井后，仔细记下了逃生路径，并在爆炸发生后，引导身边工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灾难发生后，由中央政府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展调查，由公安部长、劳工部长、煤炭部长与总工会主席组成，本意是调查事故原因，后来却演变为搜查引发爆炸的破坏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矿井领导层因为没能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而

---

[25] 同上：第 28—29 页。

[26] Jamie L.Bronstein. 2008. *Caught in the Machinery: Workplace Accidents and Injured Work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27] 何于清：“问苍茫大地”：第 41 页。

[28]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编：《中国煤炭工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9）》，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 556 页。

[29] 思平：“中国火事演义”，《云南消防》2003 年第 9 期：第 43 页。

被指责为缺乏“政治挂帅”的精神。[30]本应上班却由于各种原因没去的工人，或是在矿难后吓得逃回故乡的人，以及负责安全、电力以及运输的技术人员都受到了怀疑。尽管一年后的官方报告称没有发现反革命分子与爆炸事件之间的联系，但大量工人和干部遭到降级甚至更严重的待遇。709 人被批斗，398 名干部被撤换， 462 人“不纯分子”被调离。[31]

与大跃进的其他方面一样，党的回应是将责任归咎于地方官员。在灾难发生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煤炭部部长拍着桌子对煤矿官员喊道：“你们要向人民请罪，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交待？你们有没有党性，有没有良心！”[32]最终的官方报告也只关注灾难的直接原因，如安全措施和管理方面的失误，称管理层“混乱”，并指出矿长应对此负责。[33]1963 年的另一份报告同样只讨论了直接原因，并将责任归咎于煤炭局官员；上级党 “正确领导”导致了煤矿的快速发展，但煤矿领导犯了关键错误。[34]当地官员甚至会指责自己的过度热情，而不是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搞生产，脑子热，管理跟不上，安全落实不了。”[35]毫无疑问，知情者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事情的真相，但这并不是对矿难原因的公开客观分析。

事实上，这种混乱并非局部现象。正如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徐大本在访问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矿区时发现的那样，这是一种普遍现象。[36]然而，关键的是，没有人敢于提及造成混乱的政策或意识形态环境。在老白洞，一位寡妇激动地说道：“他妈的！大跃进、大跃进，迟一会儿下井都不行，把人跃进死了也就高兴啦！”[37]20 世纪 50 年代末，劳动部长马文瑞回忆，他在一次工人会议上说过，

---

[30] 何于清：“问苍茫大地”：第 43 页。

[31] 朱义长：《中国安全生产史（1949—2015）》：第 23 页；徐达本：“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第 25 页；思平：“中国火事演义”：第 44 页。

[32] 何于清：“问苍茫大地”：第 38 页。

[33] 徐达本：“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第 25 页。

[34] Safety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Coal,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Chinese Coal Mine Accidents*, 97.

[35] Ibid., 96.

[36] 徐达本：“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第 25 页。

[37] 何于清：“问苍茫大地”：第 30 页。

“这不是大跃进，是大跃退”，尽管这种回忆应当带着质疑去审视。[38]总的来说，批评更广泛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农村地区更严重的饥荒一样，责任被归咎于地方官员，而非毛泽东与中央领导。[39]

最后，除了在 1960 年末一份省政府文件中可能提过一次以外，[40]有关这起矿难的信息被领导层定为“绝密”，没有媒体报道。相比之下，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 00 年代，调查记者在提高对工作安全与生活被灾难摧毁的人的需求的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1]同样，在欧洲，19 世纪英国的新闻报道与议会调查对改善安全条件以及更好地补偿死伤工人家属施加了压力，而在法国，关于 1906 年库里耶尔矿难的一系列报道使得矿工能够为要求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发声。[42]在英、法，这些新闻报道与公共调查而来的文件通过提供矿难的丰富细节刺激了公众讨论（尽管验尸官听证会和调查有时未能揭示真实情况）；而在中国，国家对新闻的控制使公众无法了解老白洞矿难的细节，在细小的层面上使得公众无从了解更近的矿难。[43]

发掘老白洞

改革开放后，新闻报道的限制逐渐放宽，自 1982 年开始，在关于安全生产的文章中，在《劳动统计年鉴》中，在省煤炭工业的官方地方志中，以及在

---

[38] 张中宁：“如歌岁月——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劳动部长马文瑞”，《中国社会保障》1999 年第 10 期：第 15 页。

[39] Yang Jisheng. 2012.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 Giroux, 445–47.

[40]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批转劳动厅、公安厅、省总工会等单位：“关于加强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企业劳动保护工作的报告”，《山西政报》1960 年 11 月 11 日第 22 期：第 625 页。如果这份刊物可以不受限制地流通，那么这份文件就显得十分坦率了。

[41] Maria Repnikova. 2017. *Media Politics in China: 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 6; Tim Wright.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 Black Gold and Blood-Stained Coal*. London: Routledge, 194.

[42] Bronstein, *Caught in the Machinery,* 61–62 et passim; Neville, ‘Courrières Colliery Disaster’.

[43] Harvey, ‘The Oaks Colliery Disaster of 1866’; Jamie L. Bronstein. 2014. ‘The Hartley Colliery Disaster.’ *Victorian Review* 40, no. 2: 9–13.

劳动部长的讲话中，偶尔会简短提及老白洞矿难。[44]从 1992 年开始，作家何玉清开始调查这场灾难，并于 1998 年完成这项研究。爆炸发生四十年后，这篇第一次详细报道的节选发表在一些期刊，包括《中国煤炭报》，一份由煤炭部及其后继机构出版的日报，最终引起了公众的注意。[45]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任何从发生的事件中学习的尝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事件的理解；在短期内，大同市的管理层仍然专注于提升产量。[46]然而，这场矿难是 60 年代初在“安全第一”的口号下恢复安全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47]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再次干扰，这些机构再次被废除。结果，大型国有煤矿的死亡率稳步上升，从 1960 年代中期的每百万吨 4 人左右上升到 1970 年的 7 人以上，尽管上升幅度没有大跃进时期那么明显，而且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48]事实上，直到 21 世纪初，中国的煤矿工作仍然非常危险，尽管自 2003 年左右开始，中国开始大幅改善情况，到了 2019 年，记录的死亡率降低到 21 世纪初的 2%。[49]

[44] 我找到的最早资料是大同市矿务局白洞：“通风系统改造的经验和教训”，《煤矿安全》1982 年第 12 期：第 41 页；《中国劳动人事年鉴》编辑部：《中国劳动人事年鉴（1919.10—1987)》，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 年：第 801、817 页；《山西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山西煤炭工业志》，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1 年：第 212—213 页；李伯勇：“安全生产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劳动保护》1993 年第 7 期：第 7 页。

[45] “1960 年大同矿难死亡 682 人被列为绝密——38 年才公开”，《快乐老人报》，在线链接：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10/28/30714214_0.shtml。

[46] 朱义长：《中国安全生产史（1949—2015)》：第 23 页。

[47] 李新娟：“中国煤矿安全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安全与环境学报》2012 年第 12 卷第 4 期：第 199 页；“同煤与共和国一同走来”，《中国煤炭工业》2009 年第 8 期：第 21 页；Kallgren, ‘Social Welfare and China’s Industrial Workers’, 562.

[48]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编著：《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概要》：第 18—20 页、第 87—88 页。

[49] Tim Wright. Forthco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Dramatically Improved Coal Safety Record.’ *China Quarterly.*

1960

随着大跃进以灾难告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面对造成惨烈饥荒的政策，决定向后退一步，这场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并使得国家经济濒临崩溃。1961 年底，一份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工业七十条》，1961 年 9 月 15 日通过）的新文件开始调节劳资关系。新政策意味着放弃“群众路线”，回到以厂长权力为主、行政与技术人员为辅的管理模式，这在 1956 年与 1957 年的罢工潮中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同时，大跃进时期被蔑视抛弃的物质激励也被恢复了——尽管只是针对国有企业中有组织工会的一部分员工。然而，尽管这些政策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直在执行，但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并非所有人都准备放弃推动大跃进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本人从不掩饰他对这种劳资关系重组的反对-——他在 1960 年公开赞同所谓的《鞍钢宪法》时充分表明了这一立场。《鞍钢宪法》规定将政治置于企业之上的指导地位，赋予党在管理中更重要的角色，在企业内部进行群众动员，模糊工人、技术人员与领导人员之间的界限，以及推动技术革命。《工业七十条》与《鞍钢宪法》成为工业界“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文件，这种斗争将持续到改革年代。本文将探讨毛泽东采纳《鞍钢宪法》背后所涉及的地方，以及国家政治动态。

鞍钢宪法：大跃进时期的劳工、工业与官僚

平田康治（Koji HIRATA）

1960 年 3 月 22 日，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宣读了一份由中国共产党鞍山市委员会撰写的关于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的报告。在大跃进的精神指导下，报告认为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肯定了毛泽东的极端政策，与更温和路线相对立："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鞍山的报告让毛主席十分满意，他批示道："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2]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鞍钢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炼钢）中最大的企业。毛泽东阅读这份报告时，兴奋地看到它通过释放群众的力量实现工业化的愿景得到了全国最重要的国企的证实。

更重要的是，鞍山的报告也象征着中国社会主义一个时代的结束——模仿斯大林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最好的代表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在苏联工程师的帮助下，鞍钢所建设的新工厂。意识到这种变化，毛泽东批示道：

> 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

[1] 《鞍山市关于工业战线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载于《鞍山市志：附录卷》，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380—385 页。

[2] 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0 年 3 月 22 日，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161.htm。

> 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3]

毛泽东给这份报告起了一个迷人的新标题——“鞍钢宪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份报告以这个名称被广泛传播。

毛泽东对《鞍钢宪法》中概述的技术革新的赞许，使得鞍钢工人感到兴奋。尽管当时《鞍钢宪法》很可能没有在报纸或其他媒体上发表，但根据鞍山的地方志，相关内容是通过会议口头传达的。1960 年 3 月底，鞍钢大约 90%职工都听说了毛泽东的批语。[4]根据中共的一份内部报告，鞍钢的工人将《鞍钢宪法》中描述的现状与过去由经理层控制工厂的状况进行比较。一些工人宣称，在革命前，“一切都是‘厂长说啥干啥’”，但现在“我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右派已经被消灭了。”[5]

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反映了党的官方路线，认为《鞍钢宪法》是基层真正努力创造社会主义工厂管理新形式的证据，而且至少其中一些努力取得了成功。[6]批评这种解释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声称《鞍钢宪法》仅仅是中共自上而下政策制造的宣传品。[7]虽然我同意后一种观点——《鞍钢宪法》是一部宣传作品，但在本文中也将表明，《鞍钢宪法》的制定涉及复杂的地方政治动态。鞍钢宪法的形成不仅由于中央自上而下的指令，同样涉及到地方官员的政治野心，他们试图利用国家的运动和话语谋取自己的利益。

地方政治

尽管报告被称为《鞍钢宪法》，但实际上并非由鞍钢内部制定：这份报告由鞍钢的地方政治对手——鞍山市委起草的。当时的市委由第一书记杨士杰领导，

---

[3] 同上。

[4] 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大事记卷（1915—1985）》，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 年：第 225 页。

[5] 《内部参考》1960 年 4 月 8 日。

[6] 关于鞍钢宪法的中文历史研究，见于之伟：“‘鞍钢宪法’问题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106—114 页。

[7] 高华：“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二十一世纪》2000 第 58 期：第 62—69 页。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却对工业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的党员干部。建国初期，杨士杰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表现积极。[8]

鞍钢宪法的制定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与鞍钢等国有企业的关系中获得了更强的权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工业部门与机构手中。然而，在 1958 年，毛泽东将规划权力从首都官僚的手中夺走，交给省级党委书记。[9]毛泽东的地方主义也与反技术专家主义，平等主义的理想有关。1959 年和 1960 年，毛泽东在批评苏联的经济学著作时，通过平等化干部、技术专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国企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 （国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10]

获得权力的地方干部动员工人，鼓励他们掌握工厂领导权。工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动性受到高度赞扬，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与工程师被要求向工人学习。地方干部甚至试图给工人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人员和工程师平等的地位。

杨士杰这样的地方官员利用大跃进对国企领导人员和工程师进行政治攻击，从而加强对鞍钢这类企业的控制。在鞍山，大跃进的实施是将大型现代化企业的生产力量与小型大众化设施相结合。1959 年 3 月的一次党会上，第一书记杨士杰强调了同时发展小炉和鞍钢的重要性，他分别称作“小土群”与“大洋群”。根据他的说法，1958 年鞍山在钢铁生产方面取得的大跃进成就不仅来自鞍钢，还有小土群与本地企业在鞍钢新建的设施所生产的 27 万吨“土钢”。[11]

在大跃进期间，鞍山市委向鞍钢施压，要求鞍钢指定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1958 年 4 月 27 日，市委制定“五年跃进计划”，为鞍钢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指

---

[8] 陈正斌编：《鞍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沈阳：白山出版社，1999 年：第 26 页。

[9] Andrew G. Walder. 2015.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6.

[10]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载于《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 年：第 135 页。

[11] 1959 年 3 月 9 日，杨士杰的讲话。私人收藏，作者有存档。

标。[12]当天，市委还决定，鞍山的目标是“贯彻总路线，努力干五年，思想大解放，干部红又专，投资省一半，钢铁翻一番，全民办工业，建个小鞍钢”。[13]1960 年 10 月 18 日的鞍山市委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表示：“现在全国看东北，东北看鞍钢，简单说就是全国看鞍钢。”[14]

正如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反技术专家主义，要求权力下放的愿景加强了地方中共组织对国企的影响，鞍山等工业基地的地方中共组织的报告也帮助毛巩固了他在最高领导层的地位。1959 年 7 月 25 日，辽宁省委向党中央转发了鞍山市委关于鞍山生产与群众动员的报告。鞍山的报告让毛泽东很高兴，他将报告连同他的批语在中共领导层之间传阅。[15]

毛泽东对鞍钢的提及，使得鞍山市委获得了合法性与权力，以便完成雄心勃勃的钢铁生产指标。1959 年 8 月的一次讲话中，第一书记杨士杰引毛泽东的讲话来为市委的权威撑腰：“我们认为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它给了我们强大的力量与锐利的武器，我们将用这些反对右倾主义，全力以赴。”[16]有了毛泽东的背书，杨士杰将大跃进定义为“与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在他看来，鞍钢运营中的问题与“一些干部的右倾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些干部指出鞍钢的缺点并要求降低产量，是质疑大跃进的行为。相反，只有“先进思想智慧，群众斗志高昂”，鞍钢的工业生产才能增产。他强调了毛主席如何高度评价市委对鞍钢的领导：

> 主席对我们鞍山市委的报告作了评论，因为我们是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我们必须要以出色的方式完成生产计划，回应主席的指示，证明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通过钢铁生产大跃进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总路线。

通过这种方式，鞍钢成为市委领导的集体“我们”的一部分。

---

[12] 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志（1916—1985）》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94 年：第 118—119 页。

[13] 中共鞍山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鞍山地方党史大事记（1927—1990）》，鞍山，1991 年：第 62 页。

[14] 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志（1916—1985）》上卷：第 74 页。

[15] 中共鞍山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鞍山地方党史大事记（1927—1990）》：第 70 页。

[16] 1959 年 8 月 11 日，杨士杰的报告。私人收藏，作者有存档。

群众动员

除了毛泽东的认可，市委的另一个重要权力来源是其作为地方机构参与主席发起的群众动员运动中扮演的组织角色。1958 年 8 月 23 日，鞍山市委和市政府召开了共两万五千人参与的会议，启动了鞍山钢产的“跃进”。1958 年 9 月 1 日，市委在全市党干部会议上传阅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起一场全民节电、挖掘废钢铁的运动。[17]

地方党委干部还会动员工人反对国企领导人员与工程师。市委与鞍钢党委一起将鞍钢的领导人员和工程师批为“主要障碍”。[18]1958 年 10 月，市委在鞍钢发起“拔白旗”运动。在钢厂的一次会议上，厂长与一名工程师因“右派保守思想”而遭到批判。这场运动随后蔓延到鞍钢的其他部分。[19]1958 年底，39 名厂、处长以及 109 名下级领导人员受到惩罚，其中一些人被开除。1960 年 2 月，鞍钢副经理马宾也因“右倾思想”受到批判。[20]

地方党委干部还谴责了国企以前领导人员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制度，即源自苏联的“一长制”。这种制度使得厂长等国企领导人员，几乎完全掌控工作场所内的所有员工，而党委书记等地方干部只起辅助作用。尽管中共在 1956 年放弃了一长制，但地方干部抨击当地国企干部的现有权力仍有苏式管理制度的“残余影响”。1959 年 3 月，杨士杰表示，工业企业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大跃进成功的基础。自 1956 年以来，随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一长制”，党加强了对企业的一元化领导。然而，对“一长制”的批判还不够彻底，他声称，“一长制的残余影响在许多工厂和矿场仍然存在”。[21]通过批判加强国企领导人员与工程师地位的工作场所心态，地方政府试图教育国企，证明地方党委在新的工作秩序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合理性。

据鞍钢第二炼钢厂党委称：“有些干部顽固坚持一长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群众运动的升级。”[22]他们进一步批评，这些国企干部认为“党委不懂技术”，

---

[17] 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大事记卷（1915—1985)》：第 202 页。

[18] 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鞍钢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 年：第 202—203 页。

[19] 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志（1916—1985)》上卷：第 70 页。

[20] 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鞍钢卷》：第 202—203 页。

[21] 1959 年 3 月 9 日，杨士杰的讲话。私人收藏，作者有存档。

[22] 1960 年 1 月 5 日，鞍钢第二炼钢厂中共厂委的报告。私人收藏，作者有存档。

“党不能指导企业”。因此，厂党委决定在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批斗厂长。1959年 11 月 9 日，厂党委的金书记解释了运动的目标。他们将参与者分成几个讨论组。大会首先批斗了一位姓金的班组长（不是党委书记）。批斗过程中，另一位刘姓组长为金组长辩护，质疑了整风运动，结果导致了刘组长也遭到了“重点批判和斗争”。对金、刘两名组长的批判和斗争持续了约一个月。总体而言，这些运动构成了针对广大领导人员与工程师的严肃且活跃的“总路线教育和党性教育”。[23]

大跃进期间，动员工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同一车间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在 50 年代初期与中期的一长制下，工作被分解成多个小部分，工人只对分配给他们的那部分工作负有个人责任。然而，在大跃进期间，至少在鞍钢的一些工厂中，有提倡工人对整个工作场所的工作负有集体责任的观念。例如，在鞍钢第一炼钢厂第一平炉车间的韩姓钢铁工人就提议，废除工人分组的做法，克服“本位主义”，主张建立基于平炉车间的“小公社”，在其中，所有工具共享，工资均分给所有工人。他宣称，这种制度还能更好保护炼钢炉。[24]

毛主席与鞍山市委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孕育了《鞍钢宪法》的诞生。毛泽东的政策得到了包括杨士杰在内的地方官僚机构的支持。不出预料，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了市委在鞍山的权力。毛泽东称赞市委报告后，市委召开了三次常委会议，并开展阅读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运动。1960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市委召开代表会议，杨士杰在会上强调，必须批判一长制，废除《马钢宪法》，确立《鞍钢宪法》，实现产钢 655 万吨的目标。[25]

一种反驳

尽管题为《鞍钢宪法》，但实际上是对鞍钢最初所代表之物的反驳：一个由北京工业部门垂直控制线拴住的苏式技术官僚管理系统。毛泽东与先前时期的中央集中化决策的决裂，赋予了地方但组织和干部更大的权力。大跃进运动通

---

[23] 同上。

[24] 《内部参考》1958 年 10 月 20 日。

[25] 中共鞍山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鞍山地方党史大事记（1927—1990）》：第 74—75 页。

过各工厂党委为基础的地方干部网络，加强了城市对鞍钢的横向领导。各省、市及城镇的党委利用毛主席的新议程，从北京工业部门手中夺回了所辖范围内国企的控制权。地方干部还通过动员厂内工人并提倡人民对技术问题影响的崇拜来加强他们的领导。

中国从苏联模式中获得的发展在《鞍钢宪法》中得到了清晰体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鞍钢是中国与“苏联老大哥”友谊的象征，新的工厂是按照苏联的设计建造的，使用苏联的机器，得到了苏联工程师的帮助。然而，在 1960 年，毛主席为鞍钢提供了一个新的对立角色，作为中国脱离苏联社会主义的象征。尽管《鞍钢宪法》在大跃进之后被搁置了几年，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快就重新发扬光大，被大量分发传播，作为中国独立的社会主义愿景的象征。

即使大跃进作为经济政策被撤销后，大跃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及赋予地方干部与工人在与国企干部与工程师的关系中获得更强的权力。群众动员变得更加频繁、更有规律。国企的控制权被下放，与大跃进前的时期相比，地方党委对这些企业拥有更多的权力。反技术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合法性。地方干部与国企领导人员之间的矛盾也持续存在。一些干部对技术人员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可能存在政治问题，使得技术人员的士气更加低落。据报道，一位鞍钢工程师在 1964 年说道：“上小学时，我是祖国的花朵。上中学时，我是祖国的未来。大学毕业后，我成了改造的对象”。[26]

[26]《内部参考》1964 年 6 月 3 日。

1960

1960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布《关于立即停止棉花的土纺土织的指示》，这不是政府首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试图禁止农村的纺织生产：实际上，禁令频发的现象表面它们几乎没有效果。手工纺织的存活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造或替代家庭再生产方面的失败。农村妇女被动员到公共部门从事全职工作，同时却还要在家中承担“第二轮班”（second shift），为家庭提供衣食，养育孩子，伺候丈夫。因此，农村妇女对社会主义积累做出了双重贡献：作为低薪的集体劳动者，以及作为家庭劳动力的生产者。

先生产、后生活：1960 年对棉花土纺土织的禁令

艾约博（Jacob EYFERTH）

1960 年 2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布《关于立即停止棉花的土纺土织的指示》。这既不是政府第一次禁止手工纺织生产，也不是最后一次。从 1951 年到 1965 年，中央政府共颁布了七项指令，旨在废除“浪费”“落后”的家庭布匹生产。禁令的频发说明取得的效果有限：数百万农村人口在集体化时期的最后阶段仍然穿着手织衣物，数百万农村妇女仍将大部分工作时间用于纺织布匹和衣物。

农村手纺织工在任何明显意义上都不属于工人阶级。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将家庭纺织生产视作生产工作，而是对生产的威胁，因为它分流了国有工厂稀缺的棉花。我采访的农村妇女也同意：在她们看来，手纺织不能算是劳动、生产或工作（稳定的岗位），而是类似于清洁、烹饪、照顾孩子等再生产的家务。然而，纺织无疑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就像收集薪柴、挑水、脱粒和碾磨谷物、加工并保存食物、饲养农场动物、堆肥粪便当作肥料，以及农村妇女无数的日常工作。仅是纺织工作就可能占用妇女一半的工作时间：1954 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估计，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纺织品的妇女，每年要花六个月的时间纺纱、织布并制作床上用品与衣物。[1]

任何一个工人阶级史，包括中国的工人阶级史，都要探求工人阶级的建构。并非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社会都会认为某些工作的价值高于其他类型的工作，并将某些工作排除在其他活动的范畴之外。中国革命沿着城市—乡村、男性—女性、生产—再生产三个维度重新分配并评估工作。城市工厂工人站在工作层级的顶端：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只有他们才能完全享受工业公民的

[1] “马廷海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民日报》1954 年 2 月 2 日，第二版。

福利。[2]虽然工人阶级包括男女，但工人的典型形象仍是工厂的男性工人。合同工、临时工、学徒、手工业合作社的成员等等归类为“劳动人民”，这不是一个有声誉的范畴，只能享受少许福利。农村人口也是劳动人民，但他们的生计不受国家支持；相反，他们的“饭碗”依赖于他们自己在田里的劳作以及变化无常的天气。

社会再生产——生养子女，把他们拉扯大，成为有社会能力的成年人；为现在与将来的劳动者提供衣食以及情感抚慰；照顾老者、病人以及垂危者——这些都不被视为“工作”。社会主义国家将“工作”理解为田野或工厂中的有偿劳动，家中的无偿劳动只不过是一种私人杂事。最初，城市的家庭主妇被描述为“寄生虫”。她们唯一的解放途径就是正式就业；只有经济低迷与男性失业的时候，当才会称赞家庭主妇是社会的有益成员，并鼓励女性留在家中。[3]五四宪法规定，劳动是所有健全公民的荣誉和义务，1962 年后，几乎所有的城市妇女都在从事有偿工作，尽管她们的收入与地位不如男性。

生产与再生产

党不将农村妇女视作家庭主妇。她们与男性一样，是农业集体合作社的社员，被要求参与农活。妇联与国家其他机构意识到，家务劳动与田野劳动之间存在冲突，但是承担大量育儿与家务劳动的母亲，每月也得参加至少 15 天的集体劳动，在繁忙的季节，所有健康的妇女都得全天候工作。[4]大跃进时期（1958—1962），集体托儿所与其他社会化服务得到扩充，但这些服务多是季节性的，

[2] 我借用了安舟“工业公民”的概念；见 Joel Andreas.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关于劳动的权利与义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六条：“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有这种权利。”

[3] Shaopeng Song. 2007. ‘The State Discourse on Housework and Housewives in the 1950s in China.’ In *Rethinking China in the 1950s*, edited by Mechthild Leutner, 49–63. Berlin: Lit Verlag.

[4] Marina Thorborg. 1978. ‘Chinese Employment Policy in 1949–78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Women in Rural Production.’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Joint Economy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95.

即使在高峰期也不过只覆盖了不到一半的农村儿童。大跃进之后，农村集体托儿所基本上被放弃了。[5]

同样重要的是，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与供应网络的不足，阻碍了农村缺乏现代消费品。手纺织生产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农村的纺织品配额远低于农民的替换需求：长期配给的平均 5.5 米长的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基本的纺织需求。同样，农村地区的煤炭短缺意味着农村妇女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手机薪柴或是割碎谷物秸秆作为燃料；粮食短缺意味着妇女不得不采集野生植物，丰富单调的谷物饮食。由于化肥供应不足，各家各户都在堆肥——这是一项主要由妇女承担的繁重任务。由于缺乏现代建筑材料，如玻璃、水泥、烧制的砖、瓦片，难以保持房屋干燥和清洁。农村的物质生活基本上没有变化，也没有充分商品化：人们的吃穿用度，几乎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由自己或邻居的劳动生产。

这里的问题在于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界限。一方面，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的基础上，他们所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由自己消费。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寻求扩大公共生产的范围，缩小家庭再生产的范围。国家试图通过公共托儿所与其他社会服务，将妇女从乏味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并通过提供消费品来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在此过程中，这种做法缩小了家庭父权制统治的领域，扩大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范围。国家工业与家庭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资本，为社会与政治野心筹资的方式之一。从列宁到斯大林，苏联领导层认为，工农联盟（Smychka）的根基就是农村与城市的交换，尤其是工厂的棉布与粮食的交换。[6]

中共产领导层通常遵循苏联的积累模式，即“剪刀差”，通过国家规定的低价购买农业原料，并以确保以高额利润的价格将工业品卖回农村。然而，中国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谴责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形式。在理论上，社会主义中国致力于国家工业与城市人口之间的循环交换——在理想情况下，这种交换将填补国家财政，使得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双赢”。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资料指责农民更喜欢“自给自足思

---

[5] Ibid., 601.

[6] Leon Trotsky, quoted in Chris Ward. 1990. *Russia's Cotton Workers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想”，农村手工业与副业的“不正常”增长阻碍了工业发展的道路。[7]早在 1949 年，新政府就宣布，国内的纺织品生产会与国营工业竞争原材料和市场，并将在未来三年内被逐步淘汰。[8]

然而，尽管国家设法从农村提取越来越多的原材料，但因为资源匮乏，很少向农村回流。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中国比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苏联要穷得多；粮食、煤炭和棉布的人均产量还不到苏联的一半，钢铁产量不到十分之一。[9]面对资源有限所导致的需求矛盾，政府将重心放在城市市场与关键的出口部门。农村零售商处于消费品供应的末尾，国家资本投资主要为城市工业保留，而化肥、杀虫剂等农业投入品十分昂贵且供应不足。

棉花的案例

让我们以棉花为例简要回顾下其中的机制，棉花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粮食。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设的现代化纺织厂是资本积累的关键动力，为国家创造了高额利润。手工织布则干扰了积累过程，因为用于机械加工的棉花数量被减少了。国家最初控制农村副业纺织的努力收效甚微，但到 1954 年，棉花、棉纱与棉布都受到“统购统销”政策的约束。从那时起，农民必须将他们收获的全部棉花卖给国家，只有少量的“自留棉”可以于填充棉被与冬衣。

同时，国家对棉布和衣物进行配给。50 年代，农村的配给量在人均 6～7 米，1960—1962 年的危机时期为 2.3 米，长期平均值为 5.5 米。考虑到儿童的需求较少，普通人每年的实际消费需求至少为 9 米。这个数量能够制作一套有内衬与填充的冬装，一套无内衬的夏装，两双布鞋，以及一些最基本的被褥——这些都得不断打补丁、缝补，直到彻底用不了。因此，配给的棉布远远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如果只依靠配给棉布，一个人很快就会没衣服穿，在恶劣的天气中只能呆在家里。人们只能通过消耗现有的衣物应对匮乏，尤其是年轻新娘嫁进来的时候带来的嫁妆。存货耗尽后，人们会去田地偷棉，纺成

[7] 芦蘖：《论城乡合作》，北京：三联，1950 年：第 47—52 页。

[8] 张冲：“纺织与棉花”，《人民日报》1949 年 4 月 14 日，第一版。

[9] Nai-Ruenn Chen and Walter Galenson. 2011.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Mao: The Early Years, 1949–1967*. New Brunswick, NJ: Aldine, 35.

纱线。农村集体合作社的领导人会对社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摘者会私藏一些棉絮，领导则会向国家瞒报部分收成。

农村自给自足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也是其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将稀缺材料从国家工业中分流出来。1965 年的高峰期，农民家庭和地下作坊估摸生产了约 5.66 亿米棉布，占当年中国棉纺织品总产量的 12%。[10]将棉花定为低价，布料定为高价，国家似乎确保了人们会使用国家的棉花，并在家中将它们加工成布料。由于纺织品的短缺，黑市织工的利润非常高：一个妇女，如果愿意冒着被罚款以及被公开批斗的风险，将一公斤棉花纺成纱线并织成布料，可以赚取 11 元，1961—1962 年，甚至上升至 24 元。按每公斤棉花需要 7—10 个劳动日计算，相当于每日收入为 1.1—3.4 元，比田野劳动的收入多得多。[11]

20 世纪 60 年代的资料描述了一个自由放任的黑市经济，在所有的产棉省份，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事商业纺织，而且往往得到当地政府的明确鼓励。手织工的原料有几个渠道：农民从集体田地里偷，集体挪用棉花并分给他们的成员，饥荒与灾难中的大队请求供应低于收购品质标准的棉花或破布，他们把这些破布拆开并重新制成纱线。[12]这些都加剧了国家与集体机构囤积挪用稀缺原材料的趋势，并促成了国家纺织厂严重的“棉荒”。

同时，手工织布减轻了国家向农村人口提供衣物的义务，使其能将稀缺的纺织品提供给城市消费者以及用于出口贸易。如果我们保守地假设，农村的人均配给量比需求量少一米，那么农村整体的短缺达 6—7 亿米。部分缺口由黑市作坊填补，但大部分缺口来自农村妇女，她们使用能够凑集的任何棉花来纺纱织布，以供家用。这对国家来说，几乎没有成本：他们的劳动是无偿的，使用的棉花往往是发霉、短纤维的，不适合机械加工。如果手纺织禁令卓有成效，国家将不得不提供缺少的纺织品，否则农业很可能崩溃，因为人们没有衣物就无法在户外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将这 6—7 亿米看作是农村妇女对计划经济的一种补贴或贡品。顺带一提，这种补贴量相当于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量，在那些

---

[10] 徐建青：“制度变革与手工棉纺职业：1954—196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73—75 页。

[11] 徐建青：“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家庭棉纺织成本收益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79—85 页。

[12] 徐建青：“制度变革与手工棉纺职业：1954—1965”：第 73—75 页。

年里，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量介于 5—7 亿米之间。简而言之，妇女的无偿纺织劳动使得国家能将织物与服装卖到国外，赚取外汇，用于支付从苏联进口的技术与 1960 年饥荒期间紧急进口的粮食。

被忽略的贡献

官方并没有承认这些贡献。相反，更敦促农村人口增产节约——少吃一口粮，少用一寸布，都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13]农村的消费需求通常在“生活”的范畴下进行讨论，且与“生产”相对立。官方的言辞毫不含糊地表明两者的优先次序:“先生产，后生活”是一个常见的口号。

早在 1949 年，新政府就宣布，国内纺织品生产会与国营工业竞争原材料和市场，计划将在未来三年内逐步淘汰。[14]1954 年实行的棉花棉布“统购统销”本应终结家庭纺织，但仍存在漏洞。在私人土地或新开辟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的农民被允许加工棉花，只要他们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农村供销合作社出售布料。传统纺织区的专业织工得到了机器纱线的供应，并按计划生产布匹，但他们的大部分产出却流入了农村黑市。遭受水灾、旱灾或其他自然灾害的地区往往被允许应急织造，即通过销售布料来维持生计，直到条件改善到足以恢复耕作。

这些漏洞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逐渐被堵住。1956 年，纺织工业部首次提出全面禁止手纺织；据报道，毛泽东主席表示同意，称赞纺织工业部为国家创收，并鼓励积累更多的收入。[15]1957 年，政府禁止手工织布的长途交易以及配给票的交易（农村地区的小贩收集并出售配给票给城市消费者）。大跃进时期，公社与生产大队以“两条腿走路”的口号为借口，恢复手工织布，织布作坊呈爆炸式增长。1960 年的禁令正是针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而制定的，要求彻底停止所有手工纺织生产。1963 年颁布修订与扩大的禁令，随后在 1964 年颁布更详细的地方法规。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直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耐磨的合成纤维制品在农村地区广泛普及时，手工织布才开始衰退。

---

[13] 兴平县档案馆 4-1-45（1957 年无具体日期）。

[14] 张冲:“纺织与棉花”。

[15] 徐建青:“棉花统购、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与手工棉纺职业”,《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27—34 页。

1961

大跃进时期作为农村集体化的对应措施，城市公社运动于 1958 年启动，动员城市居民（主要是妇女）参与小型作坊与工厂的生产。新就业的“家庭主妇”留下的家务劳动，通过食堂、幼儿园与服务中心的发展，实现社会化。尽管农村集体化由于大饥荒而放缓，但城市公社在 1960—1961 年进行了改造，虽然社会福利服务有所削减，但许多工厂在整个十年中仍然存在。文本将带领我们了解北京一个女性工作人员组成的小型作坊。

剖析女工：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化与劳动

阿米达 · 史密斯（Aminda SMITH）

蓝泽意（Fabio LANZA）

1961 年 3 月，北京天桥城市公社的一家粉末冶金厂中有 184 名妇女工作。这家位于宣武区的工厂成立于 1958 年，作为一家街坊企业几乎只雇佣妇女，他们全是“非熟练”的劳动者，由 31 名男性经理与技术人员监管。这在城市公社中的工厂并不罕见，它们的目标就是动员劳动“后备军”——即未能有偿就业的，无偿劳动的“家庭妇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者声称，部署女性劳动力可以大规模扩张生产，同时推动“妇女彻底的解放”的目标。[1]因此，公社领导者的目标是将“家庭妇女”转变为“工人”，从繁重但“非生产性”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但在 1961 年 3 月 15 日，北京党委街道办事处在报告天桥的工厂情况时，没有提及妇女解放或工业生产力，而写下了工人的身体状况。委员会声称，调查的 113 名妇女中，有 58 人患有妇科疾病。24 人患有外阴炎、阴道炎或慢性盆腔感染；19 人月经不调（其中两人闭经）；6 人患有子宫脱垂；9 人患有子宫颈糜烂。[2]

很遗憾，我们只找到了一份关于这家工厂的简短且没有详细信息的文件，尽管存在着一些关于天桥公社的总览性资料。[3]尽管关于工厂和调查的信息有限，但这一份报告仍然提供了关于中共观察员在大跃进（1958—1962）期间如何构建并理解有生产力与无生产力的女性身体的重要见解。这一时期，作为改变社会环境与性别关系的激进努力的一部分，前所未有的大量妇女成为工业劳动力。

---

[1] 李端祥:《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2 页。

[2] 一些公社管理着诊所，某些情况下接管了私人诊所。见西城区档案馆 1-1-295，“椿树人民公社调查报告（草稿）”（1958 年 10 月）；西城区档案馆 46-1-1，“中共西城区德外党委关于申请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1960 年 4 月 10 日。

[3] 西城区档案馆 21-1-11，“关于粉末冶金厂‘调查研究工作组’”。这份文件提供了调查方法的概述，但没有关于工厂的具体内容。

[4]调查员在这些女工身上看到了什么，他们如何解释物质与身体现象，这都暗示了性别化的假设，这些假设框定了中共对劳动的理解和运用，并塑造了大跃进期间及之后妇女的经历以及她们潜在的解放性质。

工厂和报告

很难确定在天桥工厂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粉末冶金”这一术语很模糊，涵盖了从相对粗糙到高度复杂的各种技术。这份文件除了提到“氧化铁”和“轴承”的车间外，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工厂产品的任何信息。早期关于天桥公社的资料提到，氧化铁是公社的主要产品之一，还有电开关、云母电容器以及从废弃灯泡中回收的钨丝。[5]报告中的细节表明，该工厂与大多数公社工厂一样，通常技术水平较低，有些甚至是临时搭建的，依赖于居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通常是工人自己通过几个月的无偿劳动提供初始资本。较大的国有工厂可能会提供工具、设备和基本的技术指导，但机械化程度十分有限，而公社则从工业废料中收集生产材料。这些企业雇佣的大多是女工，她们从事低技能、重复性的工作，生产日常用品（服装、鞋类等）或为较大的国有工厂（男性劳动力较多）提供半成品。[6]报告中关于工作场所安全的评论表明，天桥工厂与其他许多工厂类似，既缺乏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意愿妥善照顾工人。

报告的作者描述天桥工厂的妇女时，谈及她们身体虚弱，被疾病侵袭，达到了他们认为令人担忧的程度。为了查明他们见到的健康危机的原因，调查人员指出三个因素：卫生条件差；“不适合妇女的劳动”；以及寒冷潮湿的环境对女性身体的特殊负面影响。第一个问题是工厂只有一个配备四个喷头的小淋浴间。妇女在工作结束后必须排长队等候，因此，“许多生产人员长时间没有洗澡；有些人甚至几个月没有洗澡”。因此，混有工厂金属粉末的污垢“覆盖她们的皮

---

[4] 北京市档案馆 1-28-29/1，“天桥公社粉末冶金工厂生产人员患妇女病的情况调查”，1961 年 3 月 15 日。

相关引用均由英语转译。下同。——译者注。

[5] 西城区档案馆 1-23-202，“中共宣武区委关于天桥街道办事处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请示”，1960 年 4 月 8 日。当时，天桥公社共有 13 家工厂、5 个生产小队、26 座食堂以及 35 座托儿所。

[6] Fabio Lanza. 2019. ‘The Search for a Socialist Everyday: The Urban Commune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volutionary China*, edited by Alan Baumler. London: Routledge, 77; Li, *A Study of the Urban Commune Movement*, 89–90.

肤，渗入她们的身体里，引发外阴炎，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发展为阴道炎和盆腔感染”。[7]

调查人员还认为，即使按照大跃进的标准来看，妇女的工作也十分辛苦。报告认为，妇女不应从事需要搬运重物的任务，但显然，天桥工厂的“重体力劳动全部是由妇女完成的”。“她们的劳动热情很高，”报告继续说道，“特别是在许多积极分子中，她们想通过从事重体力劳动树立榜样。”不幸的是，这种劳累活动被认为“会导致月经失调或子宫脱垂”。[8]氧化铁车间的负责人——24 岁的“全市三八红旗手和全区劳动模范”，在装载卡车时扭伤了腰。事故后的三个月里，她没有来过月经，“双腿无力”，并不时“咳血”。[9]最后，调查组指出，寒冷潮湿的环境对月经期的妇女极为不利。制造过程中需要工作人员穿着高筒胶鞋在寒冷的房间里长时间站立，并将双手浸泡在冷水中。调查组指出，月经期间靠近冷水的妇女“更容易出现妇科疾病”，这可能是借鉴了中医，认为有毒的“气”会进入体内。[10]

报告最后指出，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工厂领导层并未给予工作安全问题足够的重视”，同样也因为领导和干部的经验不足，可能不知道“例如妇女不适合从事重体力劳动”。[11]调查组随后提出了一些基础建议：增设额外的淋浴器，设立妇女委员会，确保工人在经期时避免接触冷水，并完全停止重体力劳动。调查组坚称，“妇女不合适的重体力劳动都应该由男工完成”，若有需要可以从其他地方调来男工。[12]

---

[7] 北京市档案馆 1-28-29/1：第 1 页。

[8] 同上。

[9] 关于大跃进的过劳以及妇女生育健康，见 Gail Hershatter.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46–47; Kay Ann Johnson. 1983.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1.

[10] 北京市档案馆 1-28-29/1：第 2 页。关于中医的相关认识，见 Charlotte Furth. 1999.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2.

[11] 北京市档案馆 1-28-29/1：第 2 页。

[12] 同上。

性别失语

鉴于工厂的性质与历史背景，天桥公社的报告竟然没有提及或是充分讨论调查人员本应注意到的，其他可能引发妇科疾病的原因：饮食、性生活以及金属中毒。前两种潜在病因根本没有被提及；金属中毒提到了，但仅限于妇科的生殖器疾病，尽管调查组提及了金属粉末附着在妇女的皮肤上。[13]这些因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关于健康的讨论中都会涉及，这些遗漏揭示了几个问题。

正如天桥的调查所指出的，工厂使用的金属粉末是易挥发物质，很容易通过被皮肤吸收。冶金中使用的镉等元素具有很强的毒性，接触这些物质可能引起妇科问题， 但也不止于此。调查组没有提及吸入粉末而引发的咳嗽，粉末残留而导致的皮疹。即使报告只想解决妇科问题，为什么却忽视了相同元素所引起的其他症状？中共是否因为过于关注性别特定的疾病，从而忽视了其他明显存在但并非女性独有的问题？

就像城市公社运动的许多资料一样，这份报告也对营养不良的潜在影响只字不提。1961 年，北京仍受到大跃进所带来的饥荒的破坏。首都居民享有比农村同胞更好的供应，但人们也想知道，一个破败且资源十分有限的城市公社工厂中，贫穷的女工能得到多少以及哪些种类的食物。拉迪（Nicholas Lardy）与沃克（Kenneth Walker）均指出，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整体平均食物消费（与热量摄入）停滞。[14]在城市地区，这一情况与 1957 年严格执行的配给制以及大跃进后农业产出的崩溃有关。为了供应城市与出口，饥荒年代的粮食采购量提升，使得农村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但在 1961 年放宽采购政策后，养活城市成了一项挑战，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城市人口增加了 30%。[15]

还有传闻表明，提供给城市的食物质量下降了，粗粮与土豆替代了短缺的营养粮食。报告称，北京的公社食堂提供的食物质量低于其他城市居民，没有

---

[13] 我们与亚利桑那大学临床毒理学家 Farshad ‘Mazda’ Shirazi 博士进行了交谈，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工业工作场所、不良饮食、性行为与健康之间关联的建议。

[14] Nicholas R. Lardy. 1983.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nneth R. Walker. 1984.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h. 5.

肉，油脂少，饥荒导致公社开支需保持在最低限度。1961 年一份关于全市公社服务的报告承认，谷物供应过低，食堂食品质量不佳，大多数居民更喜欢在家中烹饪饭菜。[16]因此，天桥工人的饮食质量很可能迅速下降。大跃进期间（以及其他时期），月经失调和闭经是营养不良的常见症状。此外，饥荒期间，疾病（包括金属中毒）的风险也急剧增加，因为营养不足或营养不良的身体会降低自我免疫能力。关于饥荒的缄口不言可能导致报告的作者隐瞒了饮食是天桥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者说，妇科疾病可能是一种暗语——政治上“可以说”的身体状况，向知情者暗示，无法提及的饥饿感仍然存在。[17]

最后，还有一种缄默：性。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消除性传播感染（STI）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但性行为往往会引起与 STI 无关的阴道炎、外阴炎与盆腔感染。[18]我们很难了解这些妇女的性生活，但她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已婚/有性生活，从她们的家庭主妇身份以及公社企业多由年轻但已成年的妇女组成的事实就能推断而出。报告承认，工厂的男性监管人员对女性以及她们的身体知之甚少。可能男性观察员发现了性行为活跃的妇女中常见的妇科问题（加之卫生设施的简陋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而错误地解释了它们的原因和意义，可能剥夺了妇女所需的护理。无论如何，报告中的许多缄默最揭示的并非妇女健康问题，而是男性与党，对妇女，或者说女性劳动者身体的特定焦虑。

劳动者身体的性别

关于天桥工厂的讨论中，政治禁忌使得饥饿问题无法被提及。但是，对于性与金属中毒的缄默似乎也与将妇女视作“后备”的无生产力家庭主妇密切相关。对国家而言，这些妇女不是工人（甚至不是女工）。她们是“潜在”的劳动者，但在她们于党的注释下参加家庭之外的劳动之前，她们被视作“闲散”，没

---

[16] 北京市档案馆 1-28-29/8，“城市公社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几年来的发展情况和问题”，1961 年 10 月。

[17] Kathryn Edgerton-Tarpley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水肿”为医生及其他人提供了一种政治上允许的方式谈论饥饿造成的医疗损害。见 Kathryn Edgerton-Tarpley. 2019. ‘The Medicalization of Starvation: The Fixation on “Swelling Diseas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amine of 1958–196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Denver, CO.

[18] Myron S. Cohen, Gail E. Henderson, Pat Aiello, and Heyi Zheng. 1996. ‘Successful Eradication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74, Issue Supplement 2: S223–29.

有产出，“不参加生产”。中共关于“后备军”的讨论进一步表明，这些妇女可以被动员进入工厂参与生产，但他们永远无法达到其他工人的生产水平或政治地位，因为中共的修辞倾向于将“工人”这一角色和男性画上等号。天桥的报告在言辞上与这种观点一致。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工业原因——金属中毒和过度劳动，忽略了性，尽管性与妇科问题可以在其他地方同时讨论，但属于家庭与生育领域的一部分。[19]观察人员只将金属中毒与妇科疾病联系起来，从而将问题局限在女工身上，而不广泛地关注对工人安全的忽视。如此，与女性的生殖联系被限制在家庭空间，借此用来辩解国家为劳动者服务的失败，将劳动者遭受的伤害归咎于女性身体的相对不足，而这种不足又被将假定为直接与女性生殖器官的脆弱相关。

报告在描述她们的“思想”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即劳动者是女性，而女性的身份阻碍了她们的生产力，进而影响了整座工厂的能力。尽管报告有一些与性别没有明显关联的态度，例如对工作场所安全的关注不足，但报告更关注的是工人被认为具有的女性特征：“一些员工仍有封建思想。她们来月经的时候，会感到难以启齿，只像往常那样继续在冷水中劳动。”[20]报告继续补充，由于大多数男性管理人员与干部，缺乏对待女性身体的经验。[21]即使在工作中，有时还会受伤，但天桥的女工不由她们的劳动，而是由女性身份定义。工业生产应该将“无生产的家庭主妇”转变为“工人”，但天桥的报告表明，至少在国家的眼中，这是不可能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妇女首先是女性，生育的身体，生产的需求损害了她们的身体，将使得她们再次变成“无生产力”，甚至可能“无生育力”。

社会主义范畴中的“工人”在社会主义的典型范式中被设想为男性，因而女性始终是，至少隐含地成为“女工”。工人前的性别修饰词使得行为者与劳动行为之间，以及女性与“劳动者”这一政治范畴之间产生了距离。这种距离提供了一种方式，可以回避与转移更大的关于社会经济试验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利益的问题。这种距离可能也是导致天桥的调查人员关注女性特质以及她们的身体与心理的原因，从而导致了柔弱、温顺的身体描述，她们习惯了家务劳

---

[19] Harriet Evans. 1997.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 北京市档案馆 1-28-29/1：第 2 页。

[21] 同上。

动，“不适合”繁重劳动，阻碍生产运作的“封建”思想。即使受大跃进的发展号召，这些家庭主妇仍是“培养教育不够”“根本没有技术”，因此只适合特定形式的劳动：乏味、重复、简单的劳动。

这种性别化的话语远远不止于单个工厂。王政将大跃进描述为中国女权主义史上的一个重要且短暂的事件，一个“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使得‘女性解放’的议程暂时取代了保守的‘双勤’的时刻”。[22]然而，王政也指出，即使在试验的高潮期间，女性劳动也很少被视作与男性劳动平等。城市集体化运动中的大多数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公社企业中的劳动被描述为廉价、低技能、多由妇女完成，女性被认为存在思想与身体上的缺点。这种话语产生了十分具体的影响，例如用于论证女性低薪的合理性。中共的官僚一再强调维持“后备军”街坊工人“低工资制”的重要性。向家庭主妇支付的工资只有许多男工从事同类工作的一半，这是公社企业盈利的关键，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也是国家评估这些企业的一个核心基准。[23]同时，与社会再生产领域藕断丝连的关系使得大多数女性劳动力最终很可能被抛弃。用公社当局与决策者的话来说，女工“有工作要做，她们就可以做，没工作的时候，她们可以回家做饭扫地。”[24]

失败的解放？

家庭主妇的后备军可以根据进行部署，并在工业和家庭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无缝切换，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社社会福利（当然也加强了社会福利）的衰落与最终的崩溃。1960 年，公社的社会服务似乎不再能将女性从无偿的家务劳动解放出来。食堂和托儿所常常经营不善，而且费用昂贵。人们期望这些服务在没有国家或公社的经济支持下运作，从而导致收费迅速上涨，参

[22] 双勤是指“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见 Zheng Wang. 2017.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1–75.

[23] 北京市档案馆 1-28-36/17，“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不能一风吹——关于北新桥人民公社工业的情况调查”，1962 年 9 月 6 日。

[24] 北京市档案馆 112-1-783/7，“二龙路公社调查组，‘关于二龙路公社工资、福利、奖励问题的报告’”，1961 年 8 月 17 日。

与人数减少，进而导致关门。[25]即使在大跃进试验最为成功的时刻，也很少有妇女真正摆脱家务劳动，但公社服务的完全解体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妇女的工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如果她们被需要，就得随时参与工厂劳动。公社领导没有忽视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对妇女的过劳表示担忧，但随着生产压力的增加与资源的减少，她们也无能为力。有报告引述女工对“解放”的嘲笑，她们说这不过是在已经相当繁重的负担上增加了低酬且单调的工业任务。[26]报告称，一些女性认为在公社工厂工作与做家务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是对我们才能的浪费。”[27]一句颠覆性的口号声称，女工遭受着“三低”（低工资、低服务和低配给）“两倒霉”（找不到伴或得养家）的困难。[28]

大跃进期间的集体化旨在产生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有时确实实现了强有力的变化，尽管只是短暂的。但是大规模参与工业劳动来解放妇女的设想，未能重新思考并重塑社会再生产。缺乏对社会再生产的劳动性质进行批判性分析，女性被假设为无生产力者，是一批未被开发的劳动力储备，这种假设反过来阻碍分析。家务劳动被设想为可以简单转移到非家务场所，不需要以新的形式重组，这种观念反映了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再生产如何转变（以及需要有意识地重塑）的关注不足。

北京市天桥区一家小型公社工厂内的一瞥，可以看出女性解放，与参与（通常有害的）劳动以及将妇女身体视为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核心也是最适合社会再生产的固有观点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共再也没有为促进性别平等做出过如此激进的尝试。20 世纪 70 年代末，90%适龄的城市妇女在家庭以外就业，占工业劳动力的近一半，但这种变化并没能改善劳动分工，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家庭外的工作场所。妇女仍在很大程度上负责家务劳动，并且

[25] 北京市档案馆 1-28-29/2，“椿树公社福利待遇情况”；北京市档案馆 101-1-782/5，“职工家属成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石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介绍”；北京市档案馆 1-28-36/12，“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公社工作小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1962 年 6 月 4 日。

[26] 北京市档案馆 1-28-36/8，“北新桥公社工业的劳动力情况分析（北新桥公社工业调查材料之四）”，1962 年 10 月 19 日；北京市档案馆 1-28-29/5，“市委城市公社工作小组，‘关于城市公社系统生产服务人员对发布票的反映’”，1961 年 10 月 28 日。

[27] 北京市档案馆 100-1-659/11，“共青团宣武区委员会，‘我区公社团干部在北京市团校学习中暴露出得几个问题’”，1960 年 9 月 16 日；北京市档案馆 100-1-659/6，“情况简报第 3 号”，1960 年 6 月 19 日。

[28] 北京市档案馆 100-1-659/11；北京市档案馆 1-28-36/18，“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公社工作小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2 年 10 月 28 日。

通常被分配到“适合”的岗位。“适合”的观念与大跃进时期的观念相似，因为妇女仍然被雇佣于低技能与附属的职位，如果妇女积极生育，甚至连这些机会都会减少。[29]

[29] Joel Andreas.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2.

1962

1962 年，北京的党和国家颁布法令，中国的农民应参与一种新型农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将持续二十年之久。这不仅是在农村邻里与农村中建立一个全新的集体财产所有制体系，还带来了新型的工作关系，在成千上万的农村中极大重塑了社会关系。这标志着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系列动荡中的农业重组的最后一步。

农业生产队的共同劳动：毛泽东时代多数中国人的劳动生活

安戈（Jonathan UNGER）

中国的农民经历了土地改革，紧接着是一系列不断升级的集体化进程，最终导向 1958—1960 年乌托邦式却最终是悲剧性的大跃进。大跃进期间，一个乡村集市及其周边的所有农村被宣布组成“公社”，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坐镇新公社的集镇指挥所，指导成千上万的农民劳动。人们想象，公社将为物质丰富提供组织基础。中国的大众媒体上流传着关于中国偏远地区的收成奇迹。为了争创此类奇迹，大批农民被指示将种子密密麻麻地种在一起，使得秧苗互相排挤；农忙时节，他们被派往匆忙规划的水坝工地工作；他们被要求去公共食堂吃免费的饭菜，在原始的后院炼钢炉熔化自己的金属炊具，生产无用的垃圾。大量的粮食被运往城市，作为出口产品运往国外，农村官员则竞相夸大当地的收成规模。这一切的后果就是 1959—1960 年农村生产的崩溃，以及各地农村的饥荒。[1]

本文重点探讨的特定集体制度正是从那场悲剧的废墟中诞生的。关于制度在基层实际运作方式的信息，来自陈佩华与我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初，在香港进行的一百多次采访，采访对象是来自约四十个中国农村的流亡人口。当时根本无法在中国境内开展研究，而从大陆不断涌入香港的人口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选择。[2]

---

[1] 例如，Dali L. Yang. 1996.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 Jonathan Unger. 1987. ‘The Hong Kong Connection: China Research from the Room Next Door.’ *China Information* 2, no. 1: 27–36. One of the best books written abou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based on extensive interviewing by William Parish and Martin K. Whyte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70s: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生产队作为土地所有权与劳动的基础

大跃进之后的 1962 年，集体被全面重组，各村的农业生产交由“生产队”负责。每个生产队由约 15—40 个相邻家庭组成，共同拥有一块农业用地，由队员家庭共同耕种，分享产出。大跃进失败后，其目的就是创建一个足够小的集体单位，使得队员之间能够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劳动贡献、队伍生产力以及家庭收益之间的关系。

为鼓励农民接受生产队长的领导，队长通常是队员选出的，或者是在达成共识后非正式获选，只有在少数情况下，队长由上级党组织选定。也有一些情况，通过选举产生的生产队长，可能属于一个大型宗族或小团体选出，会对其他宗族不利，据称存在任人唯亲、徇私舞弊以及滥用职权等情况。尽管如此，但生产队选择队长的方式在总体上仍然较为民主，中国政治制度的其他领域无法比拟。[3]

新制度具有多项吸引人的特点。通过为农民提供比单个家庭更多的耕种土地面积，使得每个家庭能在自然灾害或意外疾病发生时有一层保护。它还实现了相对公平的家庭收入分配，组织并支付了一系列公共服务。在许多农村，到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生产队的收入提供了几乎免费的医疗保健和小学教育，这是史上首次惠及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生产队负担了孤儿、寡妇和孤寡老人的生活。中国大部分农村的死亡率大幅下降，农民的寿命开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农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部分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机器能够强大且有效地渗透进社区。然而，国家改造农村的努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存在弊端。尽管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愿意容忍相对较小的生产队拥有所有权与生产方式，并允许农民选择自己的生产队长，但国家领导人并不愿意给予生产队员足够的自主权来决定种植的作物，也不愿意让他们拥有管理生产队与农村方面足够的发言权。这一制度最终是自上而下的。党的最高层认为，中国的村民，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就无法推动中国进入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农民自己的利益，农民需要受到控制与鞭策。

---

[3] 例如，见 John Burns. 198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还有第二个重要因素。国家领导层相信，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需要从农村榨取农业盈余。然而，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机制，农民不太愿意为中国的大局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提供廉价的农产品帮助发展中国工业。结果就是，大跃进失败后新建的治理体系中，生产队位于政治等级制度的最底层，由党自上而下的统治链主导，从北京延伸到每一座农村。农村现在被称为“大队”，由党委书记领导，党委书记由公社领导任命，公社领导又由县委领导任命，县委领导又由上一级党组织任命。

日常劳动和复杂的酬劳问题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农村之上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并不怎么显露踪迹。农民很快就习惯了新的工作方式，还有些人很喜欢这种方式。以前，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地里干活。现在，他们通常与邻居组成小分队一起劳动。男性从事的工作类型往往与女性不同，因此，根据每年的时间和任务，女性也有机会与其他女性组成小分队工作；年轻人在其中可以社交与劳动，年长的男性有时也会形成类似的小分队。尤其对于年轻女性，她们在中国的传统中通常是从外地嫁进来的，容易感到社会孤立，持续受制于公婆、丈夫。但现在，她们可以与自己的熟人网络度过一天，在小分队中赚取“工分”，能够独立地为家庭贡献收入；通过这种方式与新获得的社交网络，她们在家庭与社区中的地位肉眼可见地提升。年轻人也是这样，他们年轻力壮，往往比他们的父亲挣得更多。

男性任务的报酬通常高于女性。例如，在我研究过的广东省陈村社区[4]的旱季，在疏浚附近的河道时，男性负责从河底挖出淤泥，而女人负责将淤泥拖上河岸，装入堤坝。男性每装一桶就有报酬，女性每运一桶就有报酬。女性的工作需要更大的技巧和努力，因为堤坝在摇晃的疏浚泥浆下很难爬上去。但在一个小时内，男性挖泥的报酬几乎是女性搬运的两倍。然而，村里的女性并没有公开抱怨；她们默认了自己的低工资，也意味着默认自己的低地位。

在农忙时节里，人们找到了办法简化繁琐的按量计酬记录。例如，陈村的农民在收割的时候，十几名男女组成的小队共同劳动，就像他们在华南稻米产

[4]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2009.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区的传统时代一样。不打断工作节奏的情况下，一半的队员就能割取庄稼，其他人会将装甲捆起来运到田边的小型脱粒机，两个人操作手动脱粒机，两个最强壮的人则将谷物运到村里。队员之间的工作节奏紧密地相互关联，工分会根据收割的吨位分配给整个小分队。这种任务劳动中，小分队员会在收割后集体评议彼此的劳动贡献，决定如何分配工分。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国家激进政策的高峰期，这种支付方法被扩展到“大寨体系”的所有劳动。[5]这种体系中，生产队的所有队员要在定期的评议上互相评判。但一个关键的转折在于，他们根据队员的态度和努力评定工分，而非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起初，这种做法效果良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集体评议变得争吵不断，队员激烈地为自己的劳动辩护，并对被评为较低的分数感到不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70 年代初，最优秀的队员被评为每天值 10 个工作分，一般人得 9.5 分，最差的人得 9 分——一个非常狭窄的差距。最终，最优秀与最积极的工人对此表示不满，不愿意努力干活，导致生产队的产量下降。[6]最终，大寨的评议制度不得不被放弃。

私人活动

自 1962 年以来，农民从事私人副业生产的权利得到了国家的保障（激进运动期间有暂时的例外）。[7]中国的领导层通过大跃进的灾难性经验意识到，一些私人的空闲活动，特别是维持自留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8] 1962 年的规定允许生产队将 5—7%的耕地留给自留地。由于大多数中国农村的人均土地较少，自留地的规模相对较小。家庭只有临时使用权，菜地大小随

[5] 大寨是华北的一个小农村，毛泽东将其作为无私集体事件的典范推广到全国。见 Jonathan Unger. 1971. ‘“Learn from Tachai”: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l.’ *Current Scene* 9, no. 9: 1–11.

[6] Jonathan Unger. 1985. ‘Remuneration, Ideology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a Chinese Village, 1960–1980.’ In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William Parish, 117–40. Armonk, NY: M.E. Sharpe.

[7] ‘Regulations on the Work of th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Revised Draft), September 1962.’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September 1956 – April 1969*, vol. I, 719–22.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1.

[8] 《人民日报》，引用自 Kenneth Walker. 1965. *Plannin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Socialization and the Private Sector, 1956–1962*. London: Frank Cass & Co., 93.

着新生儿和儿女出嫁而不断调整。家庭也被允许私人饲养猪、鸡、鸭等动物，在院里和山顶的荒地种植少量果树，空闲时间可以钓鱼或生产家庭手工制品。

这些私人活动在两个方面对农民的生计至关重要。集体农田几乎提供了中国所有的粮食，而自留菜地则提供了农民的大部分蔬菜和肉类。这反映在一句俗语："碗底靠集体，碗里靠自己"。这些私人活动还是农民现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每次集体收割结束后，各个家庭的累计工分会被计算出来，以实物和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家庭。实物支付是第一位的，生产队要保证每个家庭所需要的主食谷物，即使他们赚的工分不够，也会以赊欠的形式给予。这样的家庭无法从集体那里获得现金，只能依靠他们的私人副业支撑消费。贫困的农村中，许多家庭发现他们正处于这种情况。但即使是富裕农村中最富裕的家庭也没有多少现金支付家中葬礼或儿子婚礼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会卖掉他们戏称为"小金库"的猪。所有的农民，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都适用第二句农村谚语："吃米靠集体。赚钱自留地"。

根据政府的定价机制，大部分集体粮食被廉价卖给国家，以满足销售配额，而蔬菜和猪肉的价格要高得多。因此，农民每小时从私人副业中获得的收入比集体劳动要多得多。总的来说，在我通过访谈获取相关信息的所有农村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年总收入（包括实物和现金）来自自留地与家庭副业。[9]在访谈中的最贫穷的两座农村，集体田地的收入非常低，家庭收入的一半来自这种私人生产。

这导致了队长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农民希望将重点放在宝贵的私人生产，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集体的生产力。队长始终提防着队员提早偷跑，防止他们为扩大私人生产而开垦过多的荒地，并督促队员们在休息时间休息，而不是争先恐后地去做私人事务。

---

[9] 其他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 John Burns 的研究，在广州市的教区，农户在 70 年代的现金总收入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来自私人经营。见 John Burns. 1977. 'The Radicals and the Campaign to Limit Bourgeois Rights in the Countryside.' *Contemporary China* 1, no. 4: 27. Deborah Davis 在 70 年代于广东省的农村进行了大量菜贩，并得出计算，通常来说农村家庭总收入的 20—40%来自私人副业。见 Deborah Davis. 1977. 'Strategies for Agi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Contemporary China* 1, no. 6: 36. In the model communes visited by S.J. urki in the 1960s, about 20 percent of total family income came from this. S.J. Burki. 1969. *A Study of Chinese Communes, 196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40–41.

正因上述问题，党和国家定期采取措施，限制私人生产的范围，并且严格管控。其中一种手段，在 70 年代开始使用，就是关闭集镇定期的农贸市场，农民会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私人产品。在激进时期，官方不仅严厉打击这种行为，有时还会发起运动，直接收紧对自留地的控制。这些运动通常得到党领导层中意识形态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高声警告，私人经营鼓励了自私的“小生产者心态”。最后一次类似的大规模运动，是 1974—1975 年的路线教育运动，由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小集团推动，手段及其严厉，以至于要绕开地方干部，避免村民对他们进行报复。上头前排的官员队伍接管了许多农村，仅在广东省，就有 12 万名官员被派往农村。[10]他们强行缩小了家庭自留地的规模，对农民饲养的鸡、鸭、猪的数量进行严格限制，并对任何白天请假处理私事的队员处以相当于几天工资的严厉罚款。

70 年代，激进的领导层还时常发布指令，对生产队的集体活动进行不利的干预。位于广东亚热带地区的陈村就是一个例子：有一年，北京的毛派领导者决定各个地区应该自给自足，所以陈村的生产队被命令种植小麦和棉花等完全不适应当地气候的作物。还有一次，上级命令生产队放弃集体种植有利可图的菜地，而是填平有用的鱼塘，用来种植更多粮食，而当国家的口号与政策翻转后，又被要求重新挖开鱼塘，使得生产队的作物多样化。[11]

集体耕作劳动的结束

农民对集体耕作的支持不可能年复一年地经受党的这些不正常的政策与沉重的粮食征收的考验。农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到了 70 年代末，农民的耐心也逐渐消失。幻灭与生产停滞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去世几年后，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放弃。80 年代初，党的官员几乎倒了过来，重新引入家庭耕作——有所不同的是：家庭可以独自耕种田地，就像这些田地属于他们，但土地所有权仍然在生产队手中（关于此事，见本书中 1981 年我的文章）。

70 年代一系列失败的激进计划不应该让我们相信，生产队运作的二十年中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不符合农民的利益。集体制度有很多好处：劳动密集型

---

[10]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5 October 1974, 15.

[11] Chan et al., *Chen Village*, ch. 9.

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经济保障、基本医疗保健和福利。70年代，来自农村的逃亡人员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如果给予生产队更多的自主权，它们可以合理有效地运作并生产。如果国家减少干预，允许生产队在经济运作上拥有更广泛的独立性，那么可以想象，生产队制度可以长期成功地存在。但是，在中国农业通过生产队运作的二十年中，党和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愿意袖手旁观。

1963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利用积极分子和群众运动，限制或根除地方宗教活动。大跃进导致的约三千万人死亡的饥荒之后，民间宗教经历了一场大规模复兴，严重挑战了大跃进所取得的任何进展。由于担忧毛泽东为弥补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施行的自由化改革的政治影响，1963 年 2 月，党的领导层发起四清运动，也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农村干部的腐败与贪污问题。城市中与此相呼应的是“五反”运动，针对官员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以及官僚主义。这两场运动很快扩大为根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铺张浪费这“三害”的运动。作为这些运动的一部分，党在 1963 年至 1966 年期间派遣的工作队发现了充足证据，能够表明城市的工人与农村的农民之中，民间宗教正在复兴。

鬼神与工人："封建迷信"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6

S·A·史密斯（S.A. SMITH）

1963 年 8 月，武昌的一名工人何廷福（音译）与他的兄弟一同看望生活在偏远山村的患病母亲。他得知一位年长的邻居请来了一个灵媒到他母亲的家中，驱赶所谓引发疾病的邪灵，何廷福十分愤怒。他拒绝了这个仪式，但他的兄弟，也是一位工人，却责备道："何必呢？咱们不信不就得了。"于是，何廷福写信给《北京工人日报》，询问为什么解放十四年后，"封建迷信"又死灰复燃。[1]编辑断然否认存在任何此类现象，并批评何廷福的兄弟的态度：

> 不迷信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带头摒弃……我们工人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运用各类机器，利用水、火、电等过去人们不熟悉的元素……如果我们再让灵媒来驱灵治病，或者请算命先生算未来祸福，那绝非是一句玩笑话。[2]

换句话说，工人具有更高的科学知识水平，他们背负着打击封建迷信的特殊责任。

否认封建迷信有增无减的说法，本应让党的领导层感到意外，尽管公开承认的情况并不多见。广州统战局在 1962 年末指出，"由于近年来的经济困难，宗教思想有所增长。"[3]事实上，在造成了三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饥荒中，民间宗教开始大规模复兴——这一事实将在 1963 年至 1966 年期间，（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被派往农村的工作队发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 1962 年 9 月，当时毛泽东告诫中央委员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

---

[1] 《北京工人日报》1963 年 8 月 10 日。

译者无法查阅相关档案，均由英语转译，下同。——译者注。

[2] 同上。

[3] 《统一战线工作》1963 年 4 月 16 日：第 15 页。

担心饥荒后的自由化改革会导致“修正主义”的出现。[4]1963 年 2 月，这种担忧以“四清”运动的形式得到巩固，运动针对农村干部的腐败贪污，但实际上是将饥荒的责任推给他们。城市中，相呼应的是“五反”运动，打击官员的贪污盗窃，以及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与官僚主义。[5]

两场运动各有不同，但都扩大为根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铺张浪费这“三害”的运动。最初，工作队由省级与县级党组织严格控制，成员主要由党和政府官员、大学毕业生、学生以及城镇白领工人组成。地方干部是四清运动的目标，工作队动员“贫下中农”批评他们，推进他们的“阶级教育”。[6]1964 年 9 月起，四清运动进入最密集的阶段，超过 100 万基层干部被开除党籍，从 1965 年 1 月起，“五反”并入“四清”。[7]四清工作队的报告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证明了封建迷信在干部，特别是在群众中的存在。[8]报告对饥荒过后，寺庙的重建、奢侈的庙会、奢靡的婚丧典礼等现象的恢复程度表示震惊。以河北省邯郸矿区为例，1949 年之前矿工向矿神祈求保佑的寺庙都得到了修复。在西柏坡煤

---

[4] Dali L. Yang. 1996.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献研究对农村给予了极大关注，因为它对农村的影响最为深远。对于城市针对国家机关、工商业、教育机构以及人民解放军的“五反”运动了解甚少。然而，即使是在农村，对于“资本主义”倾向的关注也比对“封建”倾向的关注要多，因为前者被视为“修正主义”的载体。例如，见 Frederick C. Teiwes. 1993.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Roderick MacFarquhar.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iaobo Lü. 2000. *Cadres and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 Baum. 1975.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66*.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6]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425.

[8]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被派往农村具体的“点”。大多数地方，在 1964 年 9 月之前，“四清”工作由当地党组织开展。城市中，“五反”运动最初由基层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推动。1964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批示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关于他领导的工作队在沈阳冶炼厂进行的为期两个半月的报告后才真正开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156—158 页；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ch. 11；郑惠、林蕴晖：《六十年国事纪要 · 政治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矿，人们花了 1370 元修缮庙宇，党委书记因组织三场庆祝竣工的宴会而遭受批评。[9]

剖析封建迷信

封建迷信涵盖了整个民间宗教领域，尽管它也可以扩展到某些非宗教活动，如奢侈的宴会或赌博。[10]在宪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宗教自由，但只适用于五个“世界”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它们符合“现代”宗教的标准，有着制度化的结构、正典经文、礼仪、受过训练的神职人员以及全国代表协会。[11]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不符合这些标准，因为它基本上是地方性的，以家庭为中心，植根于祖先崇拜、庙宇祭祀与节日网络、对众多神灵的崇敬，以及对灵魂附体、占卜与松散的因果报应、命运、轮回和邪魔威胁等宽泛概念的信仰。[12]

官方对封建迷信的谴责包括以下要点。第一，封建迷信被视作一种落后的思维方式，反映了对科学和理性的缺乏理解，鼓励人们求助于无形的存在来解释世界，并寻求庇佑应对外界的无常变化。第二，封建迷信被视为一个社会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灵媒、算命师、风水师等不择手段的从业者，出家道士、佛教僧侣等宗教专业人士会蒙骗并剥削民众；据称这些人会利用民众的无知、轻信和宿命论牟利。第三，灵媒在诊断与治疗疾病的核心作用，对民众的健康极为危险。第四，奢侈的婚葬习俗，用于崇拜鬼神、先祖的金钱，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困难。第五，封建迷信会对更广泛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庙会、朝圣或寻求奇特疗法的活动使人们远离集体，从而破坏生产。它还导致了腐败，因为官员试图掩盖非法开支。最后，迷信引起的谣言往往会破坏政治稳定，这个方

---

[9] 《内部参考》1963 年 7 月 19 日。

[10] John Williams. 2019. ‘Superstition.’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269–74. 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11]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2011.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 Stephan Feuchtwang. 2001.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 Richmond, UK: Curzon.

面与阶级敌人的联系被建立起来。这些批评的许多要点可以追溯到帝制时代的儒家精英，以及 1928 年至 1931 年国民党政府对封建迷信的大力打击。[13]

中国共产党将根除宗教迷信视为一项长期任务，关键在于“在群众中开展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帮助他们自觉地消除宗教迷信”。[14]早期的党内思想家谴责使用行政手段根除宗教迷信，他们虽然很少公开提及苏联的反宗教政策，但他们有意与之保持距离。[15]然而，饥荒过后，官方承认的宗教政策变得更为压抑。一个关键事件是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会议于 1963 年 12 月至 1 月召开，紧随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之后，这次全会支持了毛泽东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第七次会议发表了一份报告，主旨就是反动派正在利用宗教作为掩护，破坏社会主义进程。文件的前言，宗教事务局宣称：“反动派厚颜无耻地用宗教的外衣来攻击党；地主、富农等团体利用正在发生的宗教复兴企图实现旧政权的复辟。”[16]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应对这一危险的政策，包括建议在人民中开展“科学知识和无神论的定期教育”。[17]

无神论的提及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项创新。20 世纪 50 年代，尽管无神论是党员的入党要求，但中共并没花精力推广苏联式的“科学”无神论（更别提 20 世纪 20 年代与 30 年代的激进无神论）。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无神论宣传内容几乎不适合中国，因为它主要与基督教有关，集中于驳斥超验的造物主上帝的观念，诋毁《圣经》，抨击教会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历史联系。中国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汉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王充（公元 27 年—约公元 97 年）就是一个例子，但四清时期针对工农的“无神论”宣传内容与这一传统无关，仅仅停留在抨击宗教与迷信作为阶级敌人工具的例行指责。更重要的是，“宗教”与“迷信”之间的区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对“宗教迷信”的提法也越来越多。典型的新型强硬话语是 1965 年上海市科学技术

---

[13] Rebecca Nedostup. 2009.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 湖北省人民委员会：“转发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库存迷信品处理意见的报告’”，1963 年 5 月 25 日。湖北省档案馆 SZ 34-5-399。

[15] S.A. Smith. 2015. ‘On Not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Religious Policy in China, 1949–65.’ *Modern China Studies* 22, no. 1: 70–97.

[16] 《北京工作》1963 年 8 月 15 日：第 4 页。

[17] 《统一战线工作》1963 年 8 月 30 日：第 19 页。

传播协会的警告："近年来，复杂的阶级斗争条件下，上海的迷信思想重新抬头，黑五类利用它进行破坏运动。"[18]

僵尸鬼、算命先生与驱魔

开展四清运动之时，农业与工业经济正在从饥荒中迅速恢复，但公众的情绪仍然焦虑不安——这种焦虑在 1962 年被加剧，因为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人们预期蒋介石将对大陆发动全面反攻。基层的焦虑反映在 1963 年上海广泛流传的超自然现象的谣言。纺织女工夜晚不敢离开工厂，她们相信没有下巴的鬼，所谓的"僵尸鬼"会在她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抓住他们。"僵尸鬼"的灵魂没有通过正确的丧葬仪式，适当地和身体分离，似乎反映了饥荒受害者的命运。对饥荒的记忆仍然清晰，这些鬼故事证明了一种社会对死者的控制正在失效的感觉，人类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19]正如詹姆斯 · 沃森（James Watson）所言，"世界与胜者的社会结构只有通过对死者的操纵和保护才有意义"，未能妥善处理饥荒中的死者，似乎反映在日益盛行的混乱鬼魂之上。[2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工厂管理人员决定加强工作，打击迷信。上海纺织九厂，一个由九名女工组成的小组被问及为什么她们认为会发生饥荒时，39 岁的王金秀说："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先是洪水，接着干旱、冰雹，还有大风。这些啊都是因为信佛信得不够虔诚。"[21]这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六名女工认为这些灾难是佛祖降下的。第二种，由最年轻的工人陈慧聪（音译）提出，认为菩萨不存在，饥荒是自然灾害。第三种观点是由两位女工提出，认为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一位叫丁阿林（音译）的工人说道："我们不能不信菩萨，但也不能尽信菩萨。要是没有菩萨，那雷声、雨声、冰雹还

---

[18] 上海市科学技术传播协会党组织，1965 年 6 月 25 日。上海市档案馆 CO 42-01-00311。

[19] S.A. Smith. 2006. 'Talking Toads and Chinless Ghosts: The Politics of Rum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6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2: 405–27.

[20] J.L. Watson. 1982. 'Of Flesh and Bones: The Management of Death Pollution in Cantonese Society.' In *Death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Life*, edited by Maurice Bloch and Jonathan Parry, 155–8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7.

[21] 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部分中老年女工中迷信思想还很严重：记国棉九厂杨小妹小组关于'农业灾荒是否是不相信菩萨的缘故'问题的讨论"，1962 年 6 月 20 日。上海市档案馆 C1–2–3697。

有天上的大风都是哪儿来的呢？”针对这样的讨论，干部安排了讲座来解释这些现象。

四清工作队的一个具体目标是算命。对未来迷茫的时候，人们会寻求那些被认为可以解读预示他们未来迹象的人的指引与心灵慰藉。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家橡胶厂，工作队发现党员王新松（音译）回到了他的家乡，拜师学习卜卦。[22]他抄写了十二个卦（卜筮符号），弄了一些竹签（寺庙里用来卜卦），读了一本关于相面的书，然后回到工厂开设了算命摊子。就连副厂长都来算过命，王新松告诉他："你的鼻子是歪的，说明你从小就受苦，永远都不能指望别人。"他回答道："你说得太准了。"此后，127 名员工中超过 70%，28 名党员中的 10 名，都让王新松算过命。上海无线电十二厂，由十三名女工与一名男工组成的工作小组组织了一次关于算命的讨论。[23]所有人都说，他们经常向算命先生咨询诸如结婚、离婚，能不能生儿子，应不应该换工作等问题。工作队告诉他们，他们被算命先生骗了，一些人变得很愤怒："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迷信，为什么锡兰总理访问上海时要带他去玉佛寺？""中国共产党提倡宗教自由，为什么反对算命？"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医疗系统缓慢发展，但饥荒之后的财政紧缩，削减了提供的服务。普通民众仍在使用当地诊所提供的西医与草药疗法，但也没有放弃能够唤出神仙驱赶导致疾病的邪魔的灵媒。随着国家医保服务的减少，对灵媒的需求越来越大。重庆周边的南桐煤矿附近，有十个臭名昭著的观花婆，据说从 1962 年起变得"张扬"。其中一名女性在 1949 年之前就做过这类事情，50 年代受到"管制"，60 年代初经济自由化后重新开始驱魔，作为一种"副业"。她的名声迅速传开，每天有 120 人寻求她的服务，有人甚至乘坐公交和轿子从贵州等外省赶来。[24]广东省台山县，四清工作队在一个以捕鱼为生的大队开展了一场反迷信运动，据说那里 70%的人口相信鬼神。[25]人们重点关注一

---

[22] 见《内部参考》1963 年 7 月 19 日。

[23] 市工会妇女事务分会黄浦区办事处："一个小组十五个工人中，有十四人至今还相信卜卦算命"，1963 年 3 月 4 日。上海市档案馆 C1-2-3869。

[24] 四川省总工会工作队："南桐煤矿对职工家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步总结"，1963 年。吉林省档案馆 17-16-162。

[25] "在渔民中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场：台山县广海镇公社卫星大队的做法"，1963 年 7 月 3 日。广东省档案馆 217-1-130。

位颇具影响力的男性灵媒身上，在揭发大会上，一些当地人要求处决他。人们对灵媒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说，灵媒可能是文盲，但他们仍然有能力唤神、驱魔。还有人说，神仙存在，邪魔不存在了，因为灵媒都把它们抓住了。还有人认为，中共把邪魔都赶跑了，要是没了党，邪魔鬼祟都得回来。

自 1964 年秋开始，随着四清运动的激进化，工作队关于强调阶级敌人与保持信仰毛主席的言论不断加强。1965 年 6 月，在河北省蓟县丁庄村，工作队敦促村民把他们的神像烧掉或丢掉，换上毛主席的照片。[26]在 29 名女工中，据说有 20 人对这场运动持积极态度，5 人持中立态度，4 人持反对态度。1965 年农历新年期间，重庆开展了一场“移风易俗的春节”的运动。张秀英（音译）是市里水泥厂的一名女工，她接受了采访。“我的母亲过去信神，但我们过得很苦。现在不信了之后，党和毛主席帮助了我们，让我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27]她接着提到，向神仙献祭是阶级敌人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她家的另一位成员补充说，在旧社会，他曾被地主“愚弄”，相信“我活该过穷日子”，他曾经向神仙祈祷，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孩子可以不生病。但现在，他从中共那里了解到，“菩萨是资本家和地主捏造的胡言乱语。”强调欺骗与诡计可能是工作队最有说服力的武器。

克服迷信?

不难推断，工作队是在进行大规模的灌输教育。即使我们假设，张秀英说的是符合期望的言论，她也很难超越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建立自己的概念基础批评她所说的话语。然而，总体而言，上述的报告并不能表明灌输教育是最能描述工作队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术语。首先，工作组选择的形式是讨论小组，讨论报告显示，个人之间存在分歧，有些人毫不犹豫地反对工作队提倡的路线。一般的参与者的印象是，整体印象是，个体面临着对过往理所应当之知识的尖锐挑战，真正地与他们所面临的对超自然信仰的批判进行较量。其次，参与者对这些讨论的议程有着一定控制权，可以将关于超自然实体不存在的抽象宣传，转变为具体的个人、职业，以及健康、婚姻、工作和贫困等实际问题。顺带一

[26]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一）《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的档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第 43、332 页。

[27] 《重庆日报》1965 年 1 月 17 日。

提，尽管工作对认为女工比男工更容易受封建迷信的束缚，但他们的假设是，妇女有能力从落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工人一再相信更高的超自然实体的证据，是否使《北京工人日报》的编辑声称工人接触到现代技术与科学知识，而将注定要超越封建迷信的说法成为无稽之谈？某种程度上，是的。毕竟，在后来的改革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宗教信仰的巨大复兴。然而，我们不应低估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与强制世俗化项目的影响。无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浮夸的过度行为如何，但对超现实实体的信仰都遭受了强烈且持续的攻击。没有哪个工人会不知道，成为宗教信徒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官方认可的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的模范形象。然而，从长远来看，比起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更能腐蚀宗教信仰的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他将宗教信仰与实践从共同的地方知识体系中剥离出来。现代性当然不会使得宗教信仰发生必然的衰退，但现代化确实改变了信仰的性质，使其成为可以争论与选择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特别是那些与他们出生时的农村文化切断联系的工人来说，关于无形实体力量的假设不再是哲学家查尔斯 · 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关于世界的生活事实”。[28]如果说在这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接受或拒绝无形实体已成为工人的个人选择问题，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曾经没有审视与质疑的价值观和取向，现在暴露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以及其他工人同伴的怀疑之下，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而且，正如何廷福那封深思熟虑的信件所表明的那样，对于越来越多的工人来说，摆脱封建迷信，成为理性个体与具有阶级意识的模范工人，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象征。

---

[28] Charles Taylor. 2007.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47–48.

1964

1959 年 9 月，工人在中国东北哈齐铁路的一处停靠站附近发现了石油。中国当时正面临多重国际危机，石油供应被切断，因此新油田的发现值得庆祝，于是在 1960 年，当地被更名为“大庆”。大庆每年都能开采数百万吨石油，中国在石油方面实现自给自足。1964 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宣传工人在艰苦环境下开发油田的经历，将此作为全国效仿的榜样。

学习大庆油田

玛吉·克林顿（Maggie CLINTON）[1]

劳动模范王进喜在 1966 年 6 月的一首诗中写道："手扶刹把象刺刀，钻杆就象机枪和大炮，压力一加，钻头就向地球里头跑，钻完进尺，原油呼噜噜地就往地面冒。支援越南人民，淹死美国佬！"[2]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王进喜在当月随着官方石油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同一时间，文化大革命蔓延到大庆油田，造反派工人指责他与国家日益强大的石油集团（石油派或石油帮）犯下一连串错误，包括剥夺工人充足的休息时间。[3]王进喜，一个从贫苦农民变成终身石油工人的人，1959 年因其对油田开发的不懈努力而被表为"全国劳动模范"。[4]他的诗歌颂扬了他与工友超人般的工作道德，将他们的辛勤体力劳动与确保国家石油自给自足对抗帝国主义威胁的能力联系起来。

1964 年 4 月，第一次"学习大庆"的全国性运动在《人民日报》宣布开展之时，大庆似乎已经具备了被神话的条件。[5]1959 年 9 月，散布于东北中部平原的勘探活动之后，工人在哈齐铁路的一处停靠站附近发现了石油。[6]1960 年 6 月，第一批原油被运出，当地也被更名为"大庆"。[7]

---

[1] 作者感谢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对本文所引研究的支持。

[2] 王进喜："手扶刹把像刺刀"，载于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编：《铁人诗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 19 页。

[3] 同上：第 26—27 页；Li Hou. 2018. *Building for Oil: 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56.

[4] 王进喜：《铁人诗话》：序言 viii—ix 页。

[5] 袁木、范荣康："大庆精神，大庆人"，《人民日报》1964 年 4 月 20 日。

[6]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1986.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155.

[7] Tai Wei Lim. 2009. *Oil in China: From Self-Reliance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ess, 16.

大庆的油田靠近中国的重工业核心地带，有着足够的石油满足毛泽东时代的需求，确保中国的自给自足。[8]当时中苏交恶，苏联切断了中国主要的进口石油来源，美国也在加强对南越的援助。东北的日本占领者到 1945 年都没有发现这些石油——即使他们曾强制开发当地的采矿基础设施，并与美国开战，战争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取石油——这使得大庆油田的发现更加令人感慨。[9]这样的背景激励了大庆工人，1964 年之后“学习大庆”的倡议使得他们受到了全国的关注。

从某些方面来看，大庆的历史特殊性，以及石油生产的特定技术与劳动要求，限制了将其作为典范模式的效用性。在诸如王进喜等备受称颂的“铁人”石油工人以及像薛桂芳等农业工人“家属”的背后，站着约三万名解放军退伍军人，他们被重新部署到大庆油田从事生产。[10]而到了 1963 年底的会议以及 1964 年 4 月全国范围内的群众会议上，大庆成为全国各地学习借鉴的典范被广泛宣传。[11]其中包括成功实现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以及对毛泽东战时作品《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实际应用。[12]最重要的是，大庆因其工人无私的自我奉献精神而受到赞誉，他们展示了集体努力如何为国家能源自给自足作出实质贡献，从而推动国内外的革命。

---

[8] Hou, *Building for Oil,* 34. On ‘self-reliance’, see Long Yang. 2019. ‘Self-Reliance.’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 231–36.

[9] Hou, *Building for Oil,* 25; Richard T. Philipps. 2006. ‘The Search for Oil in the Chinese Northeast Before 1949: A Research Not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2, no. 1: 81–89; Bruce Elleman and Stephen Kotkin (eds). 2015. *Manchurian Railway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New York, NY: Routledge.

[10] Hou, *Building for Oil,* 40–42; Lim, *Oil in China,* 13–14.

[11] Mao Huahe (translated by Yiran Mao and Thomas Seay). 2019.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A Story Told by a Witness*. Leiden: Brill, 106–7.

[12] Hou, *Building for Oil,* 86–88.

定位大庆

1973 年，北京广播电台强调了大庆如何摆脱“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石油开采方式。”[13]广播电台指出，大庆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盲目开掘不同，在后者中，自私的企业家不考虑地区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为了私人利润而不计后果地进行钻探。尽管所有证据都表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部于 1956 年率先在东北寻找石油的努力就采取了国家组织的盲目开掘，但 1959 年发现石油后，国家确实制定了计划确保大庆的长期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方向。[14]并且，在当时，生态可持续性“并不是一种政治价值观”，因此，毛泽东时代，大庆的规划者与工人关注的重点仍是石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5]

石油工业部的领导人，包括长征老兵余秋里和地质学家转业的八路军战士康世恩，能够利用他们与解放军的关系，获得必要的劳动力和资源，将大庆打造成一个能够正常生产石油、运输并进行精炼的地方。[16]1960 年 2 月，石油工业部调集了三万名解放军老兵，加上 3000 名刚从朝鲜战争中复员的军官，在新发现的油井周围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17]这一行动被描述为战时动员——“石油大会战”。[18]经验丰富的解放军部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民用工程师、地质学家、规划师与工人聚集在一起。[19]即使士气高涨，但条件一直很苛刻。正如历史学家林泰威（音译，Tai Wei Lim）写道，“人员必须在寒冷的月份内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工作……物质上十分缺乏。现代设备不足，几乎没有机动车辆以及可通行的道路。工人们完全靠着自力更生的蛮力劳动（brute labor）克

---

[13] Lim, *Oil in China*, 69.

[14]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54; Lim, *Oil in China*, 12–13.

[15] Sigrid Schmalzer. 2016.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16]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66;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119.

[17] Hou, *Building for Oil*, 40–42.

[18] Ibid., 42–43; Lim, *Oil in China*, 13–14. Covell Meyskens 强调了 1964 年“三线建设”工业化的启动如何促进冷战时期中国的军事化。鉴于解放军与石油开发方面的密接关系，大庆也对这一趋势起到了促进作用。见 Covell F. Meyskens. 2020.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Hou, *Building for Oil*, 136, *passim*.

服技术上的缺陷。[20]工人不得不从零开始建设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自己的住所与粮食供应。解决食物匮乏的问题也采用有组织的运动形式。负责粮食战役的责任很快就落到女性家属身上，她们往往是为了逃离因大跃进而引起的饥荒，来到大庆与在油田工作的男性亲属团聚。[21]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叶，大庆的发展以专业知识、技术领导与艰苦奋斗为指导原则。在尊重工人贡献、尊重科学专家的等级管理结构中，余秋里和康世恩等油田领导人鼓励全民吃苦。[22]大庆早期有着一种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生活、地位差距极小的领导风格”。[23]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大庆的组织结构借鉴了 1960 年的《鞍钢宪法》(见本书中平田的文章)。[24]《鞍钢宪法》要求人们“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干部参与生产、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全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25]随着油田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石油工业部官员在中央政府中的权力增长的同时（根据与附属机构及能源行业的关系，他们被称为“石油帮”），大庆的领导人仍然期待着清苦的生活条件。有一则关于油田的传闻就是，余秋里责备“铁人”王进喜购买东德造摩托车的奢侈行为。直到王进喜说服余秋里，摩托车不是奢侈品，而是加快井场之间的行驶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的必需品之后，

---

[20] Lim, *Oil in China*, 41–42;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60.

[21] Hou, *Building for Oil*, 141; frontmatter of *Taching: Red Banner on China's Industrial Front*.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Yiyu Tian. 2019. 'Trapped in Time: Bodily Experiences of Family Dependant Workers (Jiashu) in Daqing, A Model Industrial City in High-Socialist China.'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3.

[22] Lim, *Oil in China*, 23;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97–100.

[23]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60–61. Sorace 将此描述为一种“亲密治理”的形式，“国家允许人民接触，并邀请群众参与革命中符号、物质与政治权利的持续重新分配的承诺”。见 Christian Sorace. 2020. 'Metrics of Exceptionality, Simulated Intimacy.' *Critical Inquiry* 46: 556.

[24] 鞍山钢铁厂由日本满铁公司于 1916 年在辽宁鞍山建立，位于大庆以南约七百公里处。William A. Byrd. 1992.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In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Under Reform*, edited by William A. Byrd. Oxford, UK: The World Ban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5; Louise Young. 1998.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 195.

[25]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107.

余秋里才同意他保留摩托车。[26]一些说法表明，在这一时期，大庆的领导人比普通工人的生活要好得多，主要表现在食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27]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区别，大庆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没有人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大亨那样生活或积累私人利润。

大庆油田于 1964 年开始被广泛宣传，尽管有着技术专家的指导，但大庆的体力劳动者成为了媒体的焦点。[28]正如学者侯丽和田依雨（音译）所解释的那样，受关注的工人有着三大范畴，揭示了油田中鲜明的性别分工："铁人""铁姑娘"以及家属。[29]"铁人"是指王进喜在内具有长期油田经验的男性工人。[30]"铁姑娘"以山西省大寨生产队的女性农业工人为蓝本，她们被正式登记为工人，与男性工人一样，"挑战高强度体力劳动中人类身体的极限。"[31]家属则是"工业与城市地区的家庭主妇"，她们作为"工人"被国家动员进行生产劳动，但没有官方给定的职位。[32]在大庆，像薛桂芳这样的家属在井场周围的田地里进行耕作。因此，她们不仅维持了整个大庆的运作，还促进了大庆成为工农业一体化与自给自足的典范。[33]随着大庆的发展，家属还承担了其他重要的任务，包括照顾子女、制作衣物以及担任公共机构的职位。当然，大庆的所有居民都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为大庆成为新型城乡结合的石油城市作出各种贡献。但一个人在官方分类中的身份意味着工作保障与报酬上的显著差异。[34]据报道，刘少奇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邓小平一起成为受攻击目标）不

---

[26] Lim, *Oil in China*, 24–25. Wang's motorcycle is on display at the Wang Jinxi Memorial Hall in Daqing. Signage there identifies the motorcycle as made in Hungary.

[27]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111–13.

[28] Lieberthal 与 Oksenberg 指出，大庆的领导人将媒体的注意力引向体力劳动者，并推测他们可能误导了毛泽东，隐瞒了他们在油田决策中的角色。见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61. Mao Huahe 在 1960—1964 年期间为大庆油田撰写工作报告与宣传稿件，后来他被调到北京的石油工业部工作，他也指出了如何突出工人（而非技术专家）对大庆发展的贡献。见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120, 129.

[29] Hou, *Building for Oil*, 137–45; Tian, 'Trapped in Time', 27.

[30]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101.

[31] Tian, 'Trapped in Time', 12; Hou, *Building for Oil*, 137–40. On the Dazhai Production Brigade as a model for agriculture, see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11, 43, 112.

[32] Tian, 'Trapped in Time', 2.

[33] *Taching*, 14, 29; Hou, *Building for Oil*, 140–45.

[34] Hou, *Building for Oil*, 140–45; Tian, 'Trapped in Time', 2.

鼓励油田工人从事农业工作，因为这些劳动“不值得我们每月付 50 元”。[35]正如田依雨所解释的那样，家属对她们不稳定的就业状况感到敏感，尽管她们也对自己为大庆贡献的各种技能而感到自豪。[36]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谁从事怎样的工作，这种工作能得到怎样的社会评价与物质补偿，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文化大革命初期，油田仍然受到全国范围内的赞扬，但大庆和石油帮很快就被塑造成与刘、邓紧密结合的技术专家堡垒。[37]红卫兵与四人帮指责大庆和石油帮领导人（包括余秋里与康世恩）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还抨击王进喜为大庆披上了工人领导的外衣。[38]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明显关照下，这些动乱在大庆只得到了短暂的容忍。长期参与大庆发展的解放军早在 1967 年秋就恢复了油田的生产，“使大庆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早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的地方之一”。[39]被罢免的高级干部很快就恢复职务，1968 年 5 月，王进喜被任命为新的大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保守的工人，也就是所谓的‘保皇派’”，侯丽解释道：“他们在解放军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维持秩序，提高产量……大庆油田在文革期间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40]

大庆的普通工人与根深蒂固的领导层进行斗争时，区域性反共力量的发展似乎证明了解放军保持石油供应的重要性。王进喜写于 1966 年 6 月的诗中，提到北越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65—1966 年印度尼西亚反对苏加诺的政变使亚洲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坚定的反共势力。[41]与此同时，大庆的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中国向北越和朝鲜出口了数量可观的石油，到 1972

---

[35] Hou, *Building for Oil*, 85, 86–88; Tian, ‘Trapped in Time’, 14.

[36] Tian, ‘Trapped in Time’.

[37] Lim, *Oil in China*, 82;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74.

[38] Hou, *Building for Oil*, 154–55.

[39] Ibid., 159;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75.

[40] Hou, *Building for Oil*, 159–60.

[41] Vincent Bevins. 2020. *The Jakarta Method: Washington’s Anticommunist Crusade and the Mass Murder that Shaped our World*.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Taomo Zhou. 2019.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年，中国还象征性地向菲律宾和泰国出口石油。[42]自 1964 年以来，中国一直从西欧（尤其是意大利）和日本进口炼油设备，处理油田产出的原油。[43]更重要的是，1972 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日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日本正值 197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禁运之时，中日两国签订“石油换钢铁”的协议，向日本提供中国的石油。[44]尽管促成这条协议的周恩来提出了一条原则性规定，中国的石油不应惠及美国的子公司以及台湾或韩国，但在实践中很难贯彻。[45]四人帮在 70 年代批评了这些贸易协议，同时在文化生产领域取得了间歇性胜利，例如推迟了一部关于大庆早期先驱者的电影上映，从而反对大庆复苏的技术官僚与生产至上的精神。[46]江青尖锐地指责，通过出口石油，中国将国际能源危机转嫁给了中国人民，从而拯救了第一和第二世界，即美国、日本和西欧。[47]毛泽东去世、1976 年四人帮被捕后，为增加产量并使中国融入全球石油市场，压制油田内部抗争的做法有增无减。

毛泽东时代大庆的经验

1964 年 4 月 20 日，《大庆精神，大庆人》成为《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48]为了保持整个项目开始以来的保密性，文章没有透露大庆的实际位置。当时，大庆的总部被公开标识为“萨尔图农垦总场”，与东北其他地区的工地和监狱没有区别。[49]即使在大庆的成就被公开宣传之后，关于油田的更多细节也被尽可能地保密，直到 1973 年，党的领导层认为宣传中国石油储备的好处大于潜在的安全风险（1973 年末至 1974 年初，OPEC 禁运期间，中国原油的美元价格

---

[42] Lim, *Oil in China*, 117.

[43] Ibid., 117.

[44] 中国在这项交易中获得了用于建设管道的优质钢材，包括用于通往秦皇岛与大连海岸的管道。此外，中国还获得了在渤海湾进行海上勘探的技术。Lim, *Oil in China*, 116–29;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77.

[45] Lim, *Oil in China*, 130n.46.

[46] Ibid., 88, 103.

[47]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86; Lim, *Oil in China*, 107.

[48] Yuan and Fan, ‘Daqing Spirit, Daqing People’.

[49]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103; Lim, *Oil in China*, 14.

上涨了两倍)。[50]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大庆”运动于 1964 年正式启动时,一方面,大庆的经验被概括为自我奉献与极端忍耐的精神。另一方面,大庆的故事提供了如何将工农业结合起来并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51]

1964 年 4 月 20 日,《人民日报》的读者了解到,大庆体现了战时延安根据地的自我奉献与自给自足的精神。他们了解到大庆恶劣的天气,油田的面貌,以及工作人员和工人如何相互支持,共同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读者还了解到王进喜等为石油冒着生命危险的男工人的轶事,以及提供必要专业知识的地质学家和工程师。记者问道:“如果没有高度的革命意识,没有无畏的革命干劲,没有对真正科学精神的尊重,这一切有可能吗?”报纸晚间版面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大庆的“崇高的榜样”,并进一步说明“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52]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他们的工人“又红又专”;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把高度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 1964 年 4 月,“学习大庆”意味着复制这种道德和立场。[53]

大庆也提供了其他的经验。其中很多都是有关于大庆的工人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油田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显著的案例,出现在比利时电影制片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与玛索琳娜·罗尔丹(Marceline Loridan)的纪录片中,他们 70 年代中期访问大庆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大庆油田》中,伊文思与罗尔丹采访了许多大庆工人,包括薛桂芳,她在影片中被称为“薛妈妈”(王进喜于 1970 年因胃癌去世)。在一个场景中,制片人采访了一个车间的女裁缝,她们的任务是制作并修补工人的衣物,以帮助他们抵御东北的严寒。镜头扫过裁缝们将棉絮夹在布料之间制作保暖棉衣的时候,她们讨论了如何解决棉花严重短缺的问题。一个人解释说:

> 根据形而上学,事物都是恒定不变的。但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事物是可以互相转化互相变化的,所以布条也能变成棉花。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

---

[50] Hou, *Building for Oil*, 172;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181.

[51] Mao,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Petroleum*, 104.

[52] “崇高的榜样”,《人民日报》1964 年 4 月 20 日。

[53] 同上。

> 现真理，最开始我们想的是棉花能做成这布，那这布为什么不能做成棉花呢？我们通过实践以后确实发现了可行的办法。当然偶尔也会遇到挫折，但最后，我们成功把布做成了棉花，哎唷那高兴得简直要蹦起来了。

另一位女裁缝继续说道：

> 最初开始试验的时候确实是不好的进展。可是呢后来我们想到，布条既然使用棉花做的，那一定有办法把布条变成棉花。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我们最后试了七遍才成功。1970 年以来，我们已经制造了 30 万双手套，其中有 9 万磅用的是回收的棉花。我们学哲学越学越爱学。因为我们可以用到具体的实践情况里面，非常有用，这也不断地鼓励我们学习哲学。[54]

这些妇女从事着令人自豪的工作——制作衣物，为了油田工人在东北的严寒中能够保持足够的温暖。正如伊文思和罗尔丹的纪录片中女裁缝所证实的那样，这种基层工作的许多成果都得益于将毛泽东思想融入日常实践。[55]

大庆作为一处油田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确切原因仍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大庆的发展使得中国经受住与苏联的决裂，能够继续推动工业化。大庆为中国提供了足够的石油，20 世纪 80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调整了消费需求，大庆为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作出了巨大贡献。[56]60 年代，大庆的石油勘探并未停止。然而，随着新油田的开发，官僚对开采石油本身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不是在开采地周围建立多元化且平等的社区。据了解，包含东北油田的地质构造通向渤海湾、黄海以及东海。早在 1960 年，中国地质学家就注意到这些近海地区的潜力。[57]1965 年，人们开始对渤海湾浅水区进行初步勘探；联合国

---

[54] 大庆女裁缝接受的采访，英语配音尤里斯 · 伊文思（Joris Ivens）与玛索琳娜·罗尔丹（Marceline Loridan）导演：*Autour du Pétrole*（中译《大庆油田》)。第 84、42—45 分。

由于配音盖住了声音，只有几处地方是女工的原话，其他是根据英语（加上可依稀辨认的片段）转译。上同。——译者注。

[55] See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2015.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the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6] Lim, *Oil in China,* 2.

[57] Selig S. Harrison. 1977. *China, Oil, and Asia: Conflict Ahea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主办的 1966 年调查和美国海军在 1968 年进行的另一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产的油藏之一”，中国于 1973 年开始海上钻探。[58] 1966 年，王进喜为越南与钻探的成功大唱赞歌之时，石油工业官员已经开始广泛思考国内需求的意义以及如何满足新的需求。

[58]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62–63, 176.

1964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一方面，从韩国到菲律宾，美国在中国周围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并不断加强对南越政权的援助；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在中国北部边境集结了数十万军队。更糟糕的是，中国仍未建立起自己的核武库。中国领导层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内容时，毛泽东认为，为了备战，应该将国家分为三条战线。第一战线位于海岸线沿岸，第二战线是沿海省份的后方，第三战线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内地要秘密建设一座庞大的军工基地，通常位于隐蔽的山区。本文将探讨参与三线建设的工人状况。

三线建设运动

柯尚哲（Covell F. MEYSKENS）

1964 年 5 月 27 日，毛泽东召见了邓小平和其他几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讨论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在先前几个月中，邓小平和其他高级官员起草了初步方案，重点是发展沿海地区，提高农产品和消费品的产量。[2]毛泽东不赞成这一经济战略，因为它未能应对中国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从韩国到菲律宾，美国在中国周围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而华盛顿不断扩大在东南亚的前沿部署部队。与此同时，中苏决裂之后，苏联从中国的亲密盟友变成了生存威胁，向中国北部边境集结了 20 万军队。更糟糕的是，美苏都有着数以千计的核武器，而中国却没有一颗原子弹，莫斯科已经撤回了之前援助中国建设核武器的承诺。[3]

鉴于中国岌岌可危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4]为了备战，党需要将全国划分为三条军事战线：沿海的一线，沿海省份后方的二线，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在三线，必须秘密建设一座庞大的军工基地，作为后备的国防经济动力，以备美国或苏联入侵，并且得像蒋介石在二战期间那样，必要时放弃既有的工业区，退守内地。[5]一线与二线各省也需建

---

[1] 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载于陈东林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第 7 页。

[2] Barry Naughton. 1988.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no. 115: 352.

[3] 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第 4—5 页；John Garver. 2016. *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 John Wilson Lewis and Litai Xue. 1988.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4.

[4] 毛泽东：“要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建设搞起来”（1964 年），载于陈东林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 43 页。

[5] 同上。

立小型的军工基地。像是中共的革命根据地那样，各线的项目需要分散在隐蔽的山区。凭借这个新的工业战争机器，北京将能更好抵御冷战之中来自敌人的进攻。[6]



图 1：一线、二线与三线的地图。笔者享有该地图的版权。

邓小平与党的其他最高领导人并没有立即支持毛泽东的呼吁，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发展举措加强国家安全。相反，他们建议进行预备性调查，并为一些特定项目制定计划。这一政策的立场是基于他们对发起类似大跃进（1958—1962）那样的工业化运动的担忧，大跃进期间，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命令他们调动当地资源，迅速扩大中国的工业基础。最终，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和行政上的混乱，以及一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7]

---

[6] 同上；毛泽东：“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1964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地方党委要搞军事，要准备打弹不要慌张”，1964 年 7 月 16 日，均载于同上：第 52、53 页。

[7] Andrew G. Walder. 2015.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33.

1964 年 8 月，当美国在北部湾事件后轰炸北越，中共精英才同意建设三线。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或将迫在眉睫，党的领导层批准了在中国内陆地区建设军工基地的计划。[8]为了确保三线建设不会出现大跃进的管理问题，党的领导层将管理权授予中央规划者，不允许地方领导人独立发起项目。[9]1964 年至 1980 年期间，中国将约 40%全国建设预算用于三线建设。大部分投资分两大波进行。第一波投资集中在西南地区。主要项目包括连接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省会的三条铁路、四川的大型钢铁城攀枝花、贵州的焦炭城六盘水，以及重庆周边山区的一座常规武器制造基地。1966 年底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早期三线建设的努力。[10]

为了应对中苏边境冲突，1969 年党的领导层下令进行第二波建设。西南地区的项目继续的同时，中部与西北部地区开始了数百项计划。1972 年，中美关系缓和，显著减轻了北京对于大国之间在中国领土上发生战争的担忧，中共对内地工业化的大力推动也随之消退。然而，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建设预算仍被分配用于完成现有项目，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党的领导层才决定将国家发展的重心重新转向沿海地区。[11]

三线建设离不开一支庞大的劳动队伍。总共约有 1500 万人参与了这项运动，其中约有 100 万劳工来自城市地区，其余是从农村动员起来的。[12]本文的剩余部分将探讨参与第三阵线建设的人员经历以及他们的劳动成果。第一部分将介绍他们如何被招募，第二部分介绍建设工地的生活情况，最后一部分将探讨三线建设的经济遗产。

---

[8] 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353.

[9] 毛泽东："三线建设还要快，经验要总结"，1964 年 10 月 26 日；与"周恩来等批准吕正操关于加速修建成昆等西南铁路的报告"，1964 年 8 月 12 日，均载于陈东林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 118、57、59 页。

[10]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356–58.

[11] Ibid., 362.

[12] Covell Meyskens. 2020.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7–38.

奔赴“前线”

由于三线建设被严格保密，相关计划的确立从未对外宣布，因此人们通常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才被通知，毛泽东已经下令在内陆地区建设军工基地应对美苏的军事压力。一个人被调往三线参与建设之前，需要进行背景调查，确保他们不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或右派，与外国没有任何联系，或者拥有任何反对党的个人理由。政府制定的招募标准，是为了招募可以吃苦耐劳、不会向国内外敌人透露相关存在的建设人员。[13]

在这种框架下，党将参与三线建设视作一种政治特权。一些参与者会因为被党需要而感到兴奋。毛泽东宣称，在三线建设完成之前，他“睡不好觉”，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热情。[14]这种积极的观点在党员中最为普遍，他们的个人经历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紧密相连，还有那些在 1949 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大的青年，他们渴望实现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不过，也有许多新招募人员得知他们被选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要投身边远山区的工业化来巩固国家安全时感到创伤。[15]

城市居民尤为沮丧，因为前往大三线意味着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他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东北或沿海的工业城市，而是得居住在不发达的内陆山区腹地。多数情况下，工人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新工作场所仍停留在纸面上，没有正式开工。工人对这个必须由他们自己建造的工业世界中将要面临的生活状况而焦虑。住房、医疗设施与文化运动会怎么样？孩子有没有学校、学校好

---

[13] 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公交政治部关于做好三线建设的政治工作的通知’的意见”，1965 年 1 月 11 日。四川省图书馆：第 5 页。

[14] 毛泽东：“1964 年 5 月 10 日至 11 日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当议论到铁路，交通，第三个五年计划只能搞那么多事的指示”（1964 年 5 月 10—11 日），载于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攀枝花：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200 年：第 6 页。

[15]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126. For more on longstanding Party members, see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1994.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 more on youth, see Anita Chan.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不好？当地的天气和食物如何，能不能适应？能听懂当地的方言吗？而且，或许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与家人团聚、与朋友重逢？[16]



图 2：三线动员海报。作者个人收集。

负责监督城市工人迁移的行政人员也有自己的担忧。一些省级官员与党中央人员也担忧三线建设可能会像大跃进那样对农村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他们强调，运动必须由中央指导，并且要充分关注农业。一些东北和沿海省份的官员也警告不要因重视内陆地区而忽视其他地区的发展。有一些内陆的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警告，但其他的官员则试图从发达地区获得更多的资源，推动当地的工业化。[17]

农村地区的官员倾向于更积极地看待三线建设，他们可以获得更多资源，例如通过向附近的项目提供临时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雇佣的工人每月可以挣大约 32 元。然而，工人的工资并没有直接进入他们的口袋。他们的农村单位先拿一部分支付食宿费用。工人们得到的余额通常在六块钱左右。这笔钱对于平

[16]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104–10.

[17] Ibid., 97–104.

常以工分计酬，年收入平均为 11 至 15 元的农村居民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物质收益。农村官员从中抽取的金额也比他们通常用于当地工人生活上的要多，这意味着他们也能获得额外资金。[18]

少数被聘为固定工的农村居民拥有更大的特权，可以享受城市国企广泛的福利保障。尽管有着物质优势，但一些农村父母仍然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参加三线建设，因为他们更希望家中拥有更多的劳动力，不忍心与亲人分离，或是担心他们会在事故中致残或丧生。正如上文，人们对大三线招募反应的概述所示，人们对于融入中国隐蔽的冷战工业国防体系的感受，是由他们具体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状况决定的。[19]

日常生活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前往大三线的时候往往充满泪水。领导干部试图通过播放革命歌曲、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来激发他们的热情。这些努力通常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家庭成员与工人因不知何时（如果还有可能）再见而泪流满面。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必须经过数百或数千公里的路程，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与家园的距离感。大多数人想要抵达未来的工作地点，只能通过卡车，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蜿蜒数小时，甚至数天，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进入荒郊野外的感觉。虽然农村居民到新工作地点的距离通常较短，但他们很少有机会享受奢侈的机动交通工具，而是不得不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数十或数百公里。[20]

---

[18] Ibid., 117.

[19] Ibid., 111–14.

[20] Ibid., 118–21.



图 3：修建一条通往大三线工厂的道路。[21]

抵达新的工作地点后，许多新招募人员惊讶地发现，这里并非是一座已建成的工厂，而是完工阶段各有不同的建筑工地。由于缺少机动车辆，他们经常得用手安装重型机械，肩扛、手推拖运数吨的物资。无论他们从事何种工作，都是军事化的配置：他们被当作军事单位组织，管理人员将项目的目标描述为中国对抗美苏的冷战斗争中的战役，军事化的语言与规程充斥在日常生活当中，同事被称作“战友”、严格的早操时间表、长时间的劳作、定期阅读毛主席具有军事思想的作品等等。[22]

工作结束后，他们要是能睡在帐篷中薄薄的垫子就算幸运的了，更多人只能席地而睡，以天为被。即使工人建起住房，通常也是用夯土筑成的茅草屋。供给条件同样简陋，用水来自当地的溪流，米粥和泡菜是主食，偶尔加些新鲜蔬菜当配菜，每月供应一次少量的肉类。[23]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是党节制消费政策的有意为之，为的是将更多资源用在扩大中国经济基础设施与重工业增产的目的。[24]

---

[21] 来源：“‘三线文化’三线建设部分老照片选登”，《每日头条》2017 年 8 月 20 日，在线链接：kknews.cc/zh-cn/news/a8jbqa6.html。

[22] Judith Shapiro. 2001.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0–75. 关于日常生活，见刘庆华：《最后的贵族》，北京：台海出版社，2010 年：第 66 页。

[23]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176–80.

[24] 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北京：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1991 年：第 228 页。

中共建立腹地军工基地的努力在 1966 年底戛然而止，因为这与毛泽东“清除中国知识界和党内‘隐蔽敌人和叛徒’”的运动发生冲突。据魏昂德所述，他们被认为企图“推翻共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25]大三线人员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逻辑用于他们自身，声称他们艰苦的生活条件与被派往三线建设的原因是他们中“走资派”的行动。而党的领导层则断言，此类批评是与美苏合作的国内反动派所为。1969 年，中苏边境发生冲突，人们认为莫斯科很可能会发动入侵或是进行多次核打击，于是党加强了对工人异议的压制。[26]

为了应对中苏的军事紧张局势，党中央支持再次大力推动中国军事工业基地的扩张。与大三线第一波建设一样，工人被要求用自己的肌肉代替机械的力量，争分夺秒地在战争爆发前加快中国的工业国防能力。尽管许多城市新招募人员支持三线快速工业化加强国防的目标，但他们也对简陋的住房、饮食和文化生活感到不满。即使 70 年代末项目完工、生活水平开始改善时，许多工人仍然渴望有一日能够离开腹地，回到更发达的城市与亲朋好友团聚。虽然农村新招募人员也想念他们的家人，但与生活在大三线工厂之外的农村居民相比，他们更能意识到自身作为城市国企员工所拥有的物质利益。[27]

三线建设之后的生活

为了评估运动后三线建设人员的生活，有必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工人自身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情况显然相当复杂。虽然许多三线建设人员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口头访谈中承认，他们多年的辛勤劳动使得中国内陆拥有了比原来更大的工业基础，但他们也经常抱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匮乏以及与亲朋好友分离的心理困境。那些带着孩子的人员担心，工作单位的学校质量不佳会对他们孩子的生活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他们遭受与自己同样的命运——永远地留在中国的大山之中。[28]

---

[25] Andrew G. Walder. 1991. ‘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David Zweig, William A. Joseph, and Christine W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1.

[26]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123–25.

[27] Ibid., 166–67.

[28] Ibid., 199–200.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经济成果的角度评估三线建设，那么，取得的成果也无疑是好坏参半。一方面来看，三线建设对中国内陆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建设地区工业基础设施，三线将内陆地区更多地纳入中国经济体系，加快了地区资源的流通，并加强了制造业、采矿业与水电设施，使得内陆地区碳氢化合物与电力能源的社会成为经济常态。总体而言，这些经济变化有助于缩小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这也建立了许多工业基地，它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才能维持增长，而这种发展将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29]

从另一个角度看，三线建设极为浪费资源。[30]根据 1984 年的一份国务院报告，只有 48%的项目值得进一步发展，其余 52%被放弃了。[31]这一数据令人震惊地证明了大三线有多少项目进入了中国经济史的垃圾堆。然而，在考虑三线的低效率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三线建设中蕴含的安全逻辑。根据党的政策，三线建设项目必须在隐蔽的山区，远离敌方轰炸机的视线。大约四分之一的建设资金投入到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由于担心美苏可能会发动进攻，项目被迫加快建设速度。讽刺的是，加快建设进程的政策反而拖延了项目的完工，因为这导致了豆腐渣工程，必须常年维修，进而提高了建设成本。[32]

鉴于三线建设的许多经济问题，最合适的结论似乎是，尽管在工业基础设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上仍然被视作失败的经济政策。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三线建设是一个以确保国防为首要任务的发展计划。批评者可能仍然会反对，认为尽管一个工业国防项目存在某些低效率是可预测的，但中共领导层面对美苏军事压力时反应过度，在三线建设上投入过多资金，他们本可以通过更为温和的工业运动来保证中国的国防安全。[33]

或许对三线建设太吸引人的目光，但我们若仅停留于此，那会忽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三线建设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冷战期间美苏采取的一系

---

[29] Ibid., 202.

[30]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351.

[31] 祝慈寿:《中国现代工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489 页。

[32] 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 第 226—227 页。

[33] 关于美国国防开支的低下经济效率，见 James Ledbetter. 2011. *Unwarranted Influence: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On the CCP’s overreaction, see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380–81.

列国防举措中的一环，包括生产成千上万枚足以摧毁地球多次的原子弹，以及在越南与阿富汗进行的漫长、血腥且昂贵的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三线建设的过度行为并不是中国的反常现象，而是冷战期间大国竞争中非理性的一部分，是国际上诸多国家感到安全威胁时会作出剧烈反应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1967

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阶段始于 1966 年夏天北京各个大学与中学内的校园学生运动。然而，在工作组的指导下，这场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政治代表权的危机。在一场僵持不下的斗争后，工作组的撤出引发了直接但也暴力的政治行动的新阶段，在 1966 年底时，已经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行政部门陷入瘫痪。1967 年初，上海的工人动员导致了上海市政府被占领，标志着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月风暴”，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夺权浪潮，工人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运动的顶峰是在二月初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然而，几周之后，它便结束了，当时的造反派工人同意重组公社为“革命委员会”，与一些被他们夺权的干部以及地方军事领导人联合起来。因此，“一月风暴”标志着党的历史上一个始终没能解决的困境：文化大革命起源于党在政治代表权问题上的危机，毛泽东等领导人试图通过学生和工人的直接政治行动来克服这一危机，名义上的目标则是实现自治。但是，党对权力的垄断剥夺了造反派工人建立并维持长久联合所需的必要资源。当这一联合迅速瓦解时，党的领导层逐渐恢复了引发最初危机的、有缺陷的，通过授权产生代表的机制。本文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工代表权问题，重点探讨工人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兴衰中扮演的角色。

1967 年一月风暴：从代表到行动再回返

蓝梦琳（Patricia M. THORNTON）

1967 年 1 月，随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主要以为基础的热潮转变为一场工人运动，造反派对党和政府机构的夺权浪潮席卷全国。对许多人来说，“一月风暴”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从北京的高中与大学生的接连造反开始，运动不仅扩大到工人阶级，而且迅速蔓延到首都之外的全国主要城市。上海造反派工人为推翻市政府所做的基层努力，以及随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声明，不仅是工人阶级直接政治行动的实例，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的实例。亚历山德罗 · 鲁索（Alessandro Russo）认为，公社的成立标志着“不再受斯达汉诺夫模式影响的工人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存在”这一过程的顶峰，“因此，无论党和国家是否认同这种行动，他们都能组织起来自己的集体存在。”[1]另一方面，正如阿兰 · 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观察到的，这一胜利的成就“立即显得自相矛盾”：上海人民公社的初衷可能是作为“党和国家的完整对立模型”（a complete countermodel of the party-state），但由于文革的现有政治格局已经过于饱和，新生的公社只能“获得一种脆弱的团结”。[2]因此，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登场”标志着“革命群众基础的惊人扩大”与“民众的政治积极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新铰合（articulation）的短暂轮廓”，但最终没能挑战，而只是复制了现有的权力结构。[3]

还有些人则对上海由造反派接管以及“一月风暴”的基层性质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对官方将该事件描述为工人领导的说法表示怀疑。独立历史学家何

---

[1] Alessandro Russo. 2020.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3.

[2] Alain Badiou. 2005.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3, no. 3: 496–97.

[3] Ibid.

蜀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不仅没有支持，而且还积极压制造反工人推翻上海市委的多次尝试。他认为，尽管张、姚二人原则上不反对夺权，但他们积极阻挠了任何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尝试。[4]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近期将 1967 年的全国性夺权描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扩散过程，党和国家的干部对北京中央领导层的信号作出反应的一种集体行为。”[5]他的分析认为，夺权迅速扩散到没有学生与工人大规模造反的地区，并且有干部参与其中，这表明动员由党和国家的官员推动，从而对关于“某某夺权某某”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

然而，关于“一月风暴”自发性的争论忽略了党和国家历史上一个更为深刻的困境：尚未解决的群众政治代表权问题，以及它与直接政治行动的关系。本文将重点探讨“一月风暴”，以及上海人民公社的短暂存在所揭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未被解决的劳工代表权问题。

“真”党员与“假”党员

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阶段始于 1966 年 5 月，当时北京大学内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谴责校长与党委书记及其他两名市政官员，与近期被清洗的“反党集团”有关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指控在校园内引起轩然大波，教职员工和学生团体内部已经酝酿了至少数月乃至数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这种现象，并导致被指控者遭到公开撤职。[6]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张贴类似的指控，特别是在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原始的大字报后。[7]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和国家的官员试图通过派遣干部工作组前往调查、指导并遏制已经开始组建松散自治团体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后来被称作红卫兵），从而划定校园内不断升级的动荡局势。

---

[4] 何蜀：“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当代中国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2—4 页。

[5] Andrew G. Walder. 2019.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3.

[6] Ping Hao. 1996. 'Reassess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3, no. 1: 66–86.

[7]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2 日，第一版。

学生积极分子与工作组成员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中，政治代表权问题处于最前沿：谁有权代表学生利益发言，谁代表党和国家各个部门，最后，谁代表党中央和革命议程本身？《人民日报》的头版评论将“修正主义集团”的成员描述为“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的代表。并警告读者，任何反对毛泽东或党中央指示的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从而将谁代表“真正的”共产党的问题置于紧张局势下的公众辩论与猜测。[8]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学生，蒯大富，被工作组视作麻烦制造者，于七月初被关进宿舍。在被限制自由的期间，他制作了一张自己的大字报，主张此前由名誉扫地的学校党委（被学生造反派推翻）所垄断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经转移到工作组手中。蒯大富呼吁校园里的所有革命左派问问自己：“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9]

这场更广泛的斗争随着八月工作组撤出北京各个学校而陷入僵局，并开启了一个以直接、有时是暴力的政治行动为标志的新阶段：自我赋权的学生造反派与活动分子遍布城市和全国各地，试图动员支持各种议程，其中有很多针对党和国家的官员与机构。大量的学生活动分子在全国各地流动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截至 1966 年底成功使近三分之一的省会行政机构完全“瘫痪”。[10]

从学生到工人

1966 年的“红八月”，北京的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团抵达上海。他们从火车总站下车后，宣布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运动的代表，为了将文化大革命传播到东方的巴黎而来“点火”。[11]他们对自己看到的情况感到不满。尽管市内的文化广场为他们举办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但代表团还是抱怨他们的接待不真诚，不合格。几天后，红卫兵代表团又提出其他控诉。首先，他们被上海的几所学校拒

---

[8] 同上。

[9] 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著:《清华大学大字报选（蒯大富同志大字报）》，天津：天津市第一面粉厂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队。

[10] Walder, *Agents of Disorder*, 83.

[11]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文化大革命”史话》（送审稿），内部发行，1992 年：第 61—71 页。

之门外，因为没有合适的介绍信；他们还沮丧地发现，乘坐公共交通时必须买票，而他们在其他地方已经习惯了免费乘坐；最后，代表团成员对无法安排他们与当地中共领导人会面而感到失望。收到投诉后，市委表示歉意，但红卫兵代表并没有被安抚。8 月 31 日上午，十几名北京红卫兵走向延安路，要求与市委领导会面。来访的红卫兵愤怒地冲进大楼时，超过一千名的围观者迅速聚集起来。他们发现市长曹荻秋正在与另外两名自称是北京红卫兵的代表会面，后者同样要求得到正式接见。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副市长宋立文被其中一名北京红卫兵代表击中头部，大楼前门的玻璃被打碎。[12]

几天后的 9 月 10 日，由数万名北京红卫兵组成的第二波红卫兵抵达上海，他们被编组为纵队，自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总部”。北京红卫兵代表不顾中共中央 1966 年 9 月关于禁止文化大革命扰乱工业生产的命令，以建立“工人学生联合运动”的名义进入上海的工厂和工作场所。[13]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出的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张春桥于 10 月初抵达，并迅速与附近工厂的造反派工人建立联系，目的是推翻上海市委的统治。[14]

工人的崛起

一个月后的 11 月 6 日，首都红卫兵上海联络站组织了一次会议，吸引了来自 17 个不同工厂的至少 30 名工人参加，会议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由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担任主席。在市文化广场举行的成立大会上，他们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为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市长和市委书记在党中央的支持下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工总司内部矛盾重重，不利于维持工业生产。[15]市长进一步拒绝出席 11 月 9 日的成立典礼，并拒绝“参与、承认或支持”这个新组织时，一千多名愤怒的工人包围了市委大楼并静坐抗议，随后决定将抗议活动带到北京。

次日清晨，超过 1000 名自称是造反派工人的代表前往上海北站（译按：时称上海站），加入开往首都的三列火车（译按：应为两列），寻求中央领导的

---

[12] 李逊:《革命造反的年代》（上本），牛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22—128 页。

[13]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文化大革命”史话》（送审稿）：第 152—153 页。

[14] 同上：第 79—81 页。

[15] 李逊:《革命造反的年代》（上本）：第 289—298 页。

承认。周恩来总理的一项国务院指示要求列车停运，并使得全国的铁路线瘫痪了几个小时。载着工总司领导人王洪文和 2000 名成员的火车被拦在距离上海市中心约 45 公里的安亭站外，导致工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对峙。工总司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三）这次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16]

中央文革小组派遣张春桥调解冲突。几个小时内，他就正式承认这个新的造反派工人组织——这违反了在他被派遣之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指示，并声称自己代表中央行事。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支持张春桥的决定，承认工人的组织权，这是他们根据宪法而拥有的权利。[17]

官方承认造反的工总司是合法的群众组织，这引起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热潮，因为其他利益集团也在寻求官方认可，以获取在新兴的政治阶序体系中的代表权。例如，几日之内，上海的“保皇派”（支持现有的市委并与地方党政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人迅速行动，要求他们的发言权与席位。即将成为国棉三十一厂保皇派“赤卫队”的领导人李建宇，找到他的工作组组长， 请求允许自己协助销毁“黑材料”，并呼吁“各派代表”参与。[18]因为工厂的工作组是一个派系，造反工人是另一个派系，因此工作组组长反驳道，“我们代表组织，你们代表什么？” 李建宇回答道：“那我也建一个组织!”。仅仅两个小时后，工厂的“赤卫队”就成立了，并迅速与全市志同道合的保皇派工人联合起来。虽然时间不长，但赤卫队在十二月的两起备受关注的事件中与造反派对峙，之后随着使全市瘫痪的罢工、停工与怠工的发生，他们的民众支持逐渐减弱。

上海工总司成立的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造反浪潮。工总司得到正式承认后的几天内，一千多名来自四川成都的造反派工人前往北京向中央当局请愿，而中央当局则匆忙集结部队，在武汉将他们赶回。[19]北京的数百名临时

[16]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文化大革命”史话》（送审稿）：第 162—163 页。

[17] 同上：第 168—170 页。

[18] Elizabeth J. Perry and Xun Li.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78, 84.

[19] 李逊：《革命造反的年代》（上本）：第 378 页。

工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俗称“全红总”，并迅速在十几个省份建立分部。在整个十二月和一月初，全红总在北京举行集会与静坐，抗议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劳动部，要求获得官方承认并进行劳动政策改革，同时动员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分部参与类似的抗议活动。[20]

1966 年底，南京的劳工骚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市委派遣高级官员进入工厂，向造反派工人队伍大声宣读他们的自我批评，希望能够安抚他们。广州，造反派工人在十二月中旬成功地进占并关闭了两个主要的党报办公室。较小的石家庄市，十二月初一家纺织厂内的冲突导致三百名造反派工人受伤，并升级为对市政当局的“炮打”，导致 12 月 25 日对市政府办公室的占领。这些事件的效应——从造反派攻占党和政府的办公室再到夺取地方权力，以及造反派工人开始组建广泛的联盟，成功使得从省级的上海等城市到全国各地的县城陷入瘫痪。[21]

一月风暴

1967 年 1 月 6 日，上海发生了第一次省级夺权事件，[22]主要的动机是造反派联盟希望恢复公共秩序，并恢复党政机关已实际瘫痪的城市公共服务。尽管工总司与盟友，一个造反派组织联盟举行了群众大会，“拖出”市委书记、市长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并对他们进行公开批评，但批评地方当局并不是工总司的最初目标。相反，核心是“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骨架，目标是重新启动上海的交通网络。当时的一位工总司领导人回忆道，1 月 7 日晚，新指挥部重点关注重新开放铁路与上海的主要港口，因为城市所陷入的瘫痪显然是“走资派破坏生产、镇压革命的伎俩”。[23]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与姚文元似乎提出了更大的自治目标，他们在与火线指挥部的初期会议上宣布：“这是一个新的事物，一种新的政治权力形式。我们得总结这次经验。”[24]

---

[20] Yiching Wu.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8–9.

[21] Walder, *Agents of Disorder*, ch. 3.

[22] 上海是直辖市，与省同级的行政区划。

[23]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146–48;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文化大革命”史话》(送审稿)：第 247—248 页。

[24] 同上。

与此同时，1 月 8 日，毛泽东赞扬了上海及其造反派联盟；次日，《人民日报》转载《急告上海人民书》，并在社论中称赞他们响应了毛泽东对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强调他们的经验不仅适用于上海，也适用于全国。[25]不到一周后，全国性媒体在一系列文章和广播中对工总司接管城市的行动大加赞赏，敦促全国的造反派以上海为榜样。[26]而 1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声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中，上海的造反派“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27]不到一周后，《人民日报》呼吁全国范围内通过大联合自上而下地夺权，“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28]

到 1 月底，中国 2215 个城市和县城中，有一半以上发生了夺权事件，到 3 月底，75%以上的党政当局被推翻。[29]《急告上海人民书》发表后仅几天，山西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就开展行动，与“革命干部”以及军队成员建立“大联合”，并宣称他们已经在省级范围内“夺权”。[30]山西的不同经验，包括干部、军队与“造反革命派”工人在内的联盟，很快就会在山东与贵州出现。最后，1967 年 1 月 31 日，黑龙江成为第一个由自称的“革命委员会”夺权的省份，名称取自巴黎公社的治理机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官方报纸的评论中广泛提及。一周内，三十二个不同的造反派工人团体组成的联盟宣布建立 “人民公社”，取代市政府的职能。

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一月风暴”已将事件带入一个新的方向。主要是在黑龙江发展出来的“革命委员会”模式，当地的军事指挥官、造反派工人组织代表以及地方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毛泽东青睐这种模式，并于月底前在上海被正式采纳。因此，自发组成的工总司成为夺权运动的助产人和掘墓者，开启

[25]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9 日，第一版。

[26] 例如，见“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12 日，第一版。

[27]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16 日，第一版。

[28]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22 日，第一版。

[29] Walder, *Agents of Disorder*, 294–95.

[30] Jean Christophe Mittelstaedt. 2018. ‘Revolutionizing the State: The 1975 Chinese State Constitu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K, 31–41.

并完成了为期五周的政治序列（political sequence），从政治代表到直接行动再回返政治代表的循环。

风暴过后

一月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头版转载的一篇文章中，《红旗》将夺权的行动统称为“一月革命”，声称“革命的大风暴从上海开始”。[31]尽管上海处于模范地位，但不到三周后，根据毛泽东于 2 月 23 日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符合山西、山东和黑龙江几周前确立的“三结合”。[32]张春桥担任革委会主席，姚文元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当地的造反派王洪文也是革委会的重要成员，但他很快就将被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33]

更重要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改名标志着一个政治序列的结束：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场战役是由学生发起的政治代表权之争，第二场是由工人发起的直接政治行动之争，那么，上海人民公社的改名标志着造反派工人在名义上自治的短暂试验的结束，迫使他们与他们所推翻的当局进行权力分享。1972 年，工总司改名为“上海工代会”；下属造反派单位纷纷效仿。次年，工总司的前领导层被纳入上海市总工会，即全国总工会的地方分会，市总工会在文革开始后便停止运作，但在造反派工人的控制下，于 1970 年恢复运作。市总工会恢复运作后，下属的造反派单位此后被称为“工会”分会，基本上维持至今。[34]

2006 年，李逊在文章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在政治系统中享有的代表权都只是“象征性的”。那些指定的工人代表实际上是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是 1949 年前领导中共地下劳工组织的干部；他们都没有工人阶级背景，与他们被任命所代表的人群仅有有限的接触。1950 年，包括市委书记与党委常委在内的上海市政府的三十三个重要职位中，只有四个是全总的成员。1965 年 12 月，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这个数字下降到一个。[35]

---

[31]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31 日，第一版。

[32]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文化大革命”史话》（送审稿）：第 263 页。

[33]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8–69.

[34]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37; 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2—4 页。

[35] 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尽管 1967 年一月、二月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工人的政治代表结构，但只是暂时性的，只局限于地方层面；在“三结合”的权力共享制度下，进入革命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必须与更有经验的干部成员竞争政治影响力，而且经常被指责为将工会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1969 年与 1970 年，一系列针对造反派的政治运动进一步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上海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十个区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工人造反派中，有 135 人（占 43.5%）在 1971 年时被清洗。[36]

从更深层次来看，新的革命委员会也未能解决政治代表权的危机。关于谁有权代表特定的集体利益发声，谁有权代表党和革命的议程，这些问题实际上被悬置了；新的革命委员会与其说是要“代表”群众，不如说是代表他们自己。1967 年 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新的政治权力机关将确保在“三结合”制度下，作为革命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代表，会是“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37]在 1967 年 3 月《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红旗》社论规定，作为临时的革命政治权力机构，所有革命委员会必须是“有代表性”，又“有无产阶级权威的”。[38]要求群众代表“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重视他们的意见，并警告永远不要将群众“当做陪衬”；除了这些宽泛的口号，中央领导层拒绝在国家层面建立正式的代表问责制度。

这种失败破坏了革命委员会表面上的目标：加强革命造反派工人在体制内的政治代表并使之制度化。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权力被设置为自上而下的流向：通过授权与委派的机制将权力下放于地方政府机关和基层行动者手中。因此，1967 年的夺权运动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引发了基层的拼抢，各地的行动者及其团体为了使各种政治议程合法化而争取中央授权。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委员会“三结合”安排的指示，试图保证在新的治理机构中存在“真正的”群众代表。然而，由于没有指定选拔和罢免的方法，“三结合”制度下的代表机制实际上很大程度由地方干部决定，这实质上扼杀了文化大革命所承诺的为工人带来全新的政治存在的可能性。

---

[36] 同上。

[37]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中发[67]57 号，1967 年 2 月 19 日。

[38] “论革命的三结合”，《人民日报》1967 年 3 月 10 日，第一版。

1967

1967 年反殖民主义暴动所引发的危机，可谓是战后香港殖民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967 年 5 月的一场工业纠纷所引发的暴力、示威以及罢工的浪潮不断冲击着整个殖民地，导致 51 人死亡，约 4500 人被捕。当地经常发生极端形式的对抗，例如炸弹袭击，中英两国军队在边境的军事冲突，许多评论家认为 1967 年的一系列事件是殖民统治的转折点，因为暴动后的香港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尽管事件的起因是殖民地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与沮丧的背景下发生的劳资纠纷，但主要原因是大陆政治激进主义的外溢。这场对抗持续了六个多月，对香港殖民地劳工改革的轨迹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1967 年香港暴动

叶健民（Ray YEP）[1]

战后香港的工厂被许多人视为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典型案例。工人工资低，法律保护与福利有限，政府尚未出台有关工业安全和工作时间的规定。战后人口的迅速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人所忍受的悲惨生活条件。1965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为当地居民的悲惨生活提供了生动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与查尔斯 ·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绝望形成写照：

> 这些建筑多是三层高。一条十分陡峭的木制楼梯连接着相邻的两栋建筑。踏板磨损得很严重，中间部分甚至凹了下去，有时会有一两个踏板完全丢失。由于楼梯无人清洁、维护（更见不到看管人员），多年来的污垢和灰尘堆积在一起。即使在大白天，楼梯也很昏暗，从未安装人工照明，楼道里会有利用黑暗保护自己的吸毒者出没。[2]

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将他们不愿增加社会投资与福利供给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因素”。他们争辩，改善殖民地的生活水平只会鼓励更多的内地人口涌入——鉴于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由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加速涌入，这种说法颇有道理。

20 世纪 60 年代初，香港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明显地反映在犯罪统计的数据中。1965—1966 年，登记的严重犯罪案件有 8166 起，这是 50 年代末以来

---

[1] 本文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研究资助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1611518）的研究成果。

[2]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 (1965): 1–8, 25–28, 33–38, 90–93, quoted in David Faure (ed.). 1997.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56–57.

最高的严重犯罪水平，比 1961—62 年的水平增加了 40%。[3]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的犯罪参与度不断上升。1960 年至 1966 年期间，16 岁以下被告人数平均每年增长 17%，同期， 16—20 岁的青少年犯罪人数平均增长了 13%。[4]由于他们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稀缺，青少年犯罪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工作场所也显示出不安的迹象。1967 年暴动之前，青洲英坭、中央的士公司与南丰纺织公司发生了与工资和工作条件有关的劳资纠纷，并可能升级为重大骚乱。[5]然而，1966 年的九龙暴动最终迫使政府承认普遍存在的社会紧张局势。这场暴动由中区和尖沙咀之间的往返轮渡服务涨价所引发的，从 4 月 4 日持续到 4 月 10 日，以宵禁、大规模逮捕，以及警察与暴徒之间的直接对抗而告终。尽管这场短暂的暴动仅局限于东九龙地区，但仍然证明了香港年轻人的普遍不安。

暴动：文化大革命的延伸

1967 年的暴动始于 5 月 6 日九龙的一家人造花厂，当时一场关于减少奖金与津贴的劳资纠纷逐渐失控。雇主拒绝让步，最终解雇了九十二名工人。警方很快介入，他们对局势的暴力手段致使许多工人受伤，共有十八名工人被逮捕。当地的左翼利用这次纠纷在殖民地发起了他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左翼主导的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立即代表工人进行干预，提出了四项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惩罚作恶者并赔偿受害者，保证工人的人身安全，今后警察不得干涉劳资纠纷。

这场事件迅速被政治化。转折点是 1967 年 5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的干预。中国外交官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递交了一份抗议声明，随后，北京与广州爆发了反英示威，并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同情的社论。[6]对于香港许多本地激进分子而言，这些事件显然是对他们的呼唤。“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当地左翼的全面动员，在整个殖民地领土上开展反殖民主义运动。劳资纠纷很快被示威、罢工、游行和爆炸所取代，原来对劳资关系的关注也被高度政治化的反帝口号所取代。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瘫痪

---

[3] Carol Jones. 2007. *Criminal Justi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Cavendish, 355.

[4] Ibid., 353.

[5]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2003 年。

[6] 同上：第 231—233 页。

了殖民地的正常生活，他们模仿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例如手持毛泽东的《红宝书》，尽管全面且持续的罢工尝试仍然没有成功。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存在于香港（见本书中梁宝霖、陆延的文章）。中共早期，香港是躲避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侵略的避风港，抗战后，是国共内战期间的协调中心，冷战时期也具有战略意义。1949 年后，中共对香港保持务实的政策，遵循“长期打算，充分使用”的指导原则。也就是说，尽管否认香港殖民地地位的合法性，但内地认为接受现状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因此，他们暗中继续巩固党在殖民地的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左翼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一定程度上是港英当局自作自受。他们的简约治理方式与提供服务方面的含糊立场，无意中为左翼创造了广泛的支持群体，后者愿意为当地居民提供温和但十分珍重的支持网络。殖民地政府在提供福利方面的拖拖拉拉，对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贫困问题缄口不言，促使左翼在当地劳工运动中的存在不断扩大。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工会的发展一直是当地左翼的首要关注点。劳工缺乏安全保障以及面对经济周期的脆弱性，促使越来越多无助的工人加入工会，希望能够获得些许支持。香港工联会成立于 1948 年，是当地左翼控制的伞状劳工组织。作为劳工组织，工联会在公共事业公司的工人中建立了稳固的地位，在 1949 年、1950 年与 1954 年组织电车工人的罢工与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7] 工联会还是 1949 年牛奶公司与 1957 年香港海军船坞罢工成功的幕后力量。然而，工联会不仅是一个劳工组织，它还试图填补殖民地政府在福利方面的空白，为会员与同情者提供支持网络。政府还在考虑介入教育问题时，工联会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人子女学校网络，还提供能负担的医疗服务、廉价膳食、文化娱乐，甚至在危机期间提供救济支持，而当时，福利国家的概念对殖民地当局来说仍是一个禁忌。

左翼对媒体、教育和文化部门的参与，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事业。1967 年初，香港有许多左翼直接控制的大报——《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正午报》以及《田丰日报》。这些报纸拥有可观的读者群体：在

---

[7] 香港工会联合会:《光輝歲月薪火相傳》，香港：新华书店，2008 年：第 18—20 页。

1967 年初，它们每天总共发行 24 万份，约占殖民地日报发行量的 16%。[8]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左翼还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机构，长城影业、凤凰影业与新联影业——这三家公司制作本地娱乐的商业电影方面非常成功，在殖民地的电影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50 年至 1966 年期间共制作了 262 部电影。[9]

左翼阵营同样巩固了自己在教育领域的立足点。香港社会的人口结构很大程度上向年轻人口倾斜。根据 1961 年的人口普查，香港共 310 万居住人口中，41%的年龄在十五岁或以下，其中三分之一年龄在五岁以下。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的教育需求，但殖民地政府对此反应迟缓。20 世纪 60 年代初，政府对这一领域的干预仍然有限，私营部门在为当地居民提供教育机会方面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资助名额的短缺在中学教育中尤为严重，因为 70%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然而，许多私立学校的校舍不安全，资源有限，教师不合格。例如，臭名昭著的“天台学校”，即没有正规资格的“教师”在建筑顶层的临时设施中提供教育的学校，这些学校站小学总额的约 20%。[10]左翼同情者在这些非正规教育机构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11]

简而言之，1967 年前夕，香港已经存在着一个跨领域的庞大左翼支持者网络，可以作为领导、动员和协调的有效平台，也是暴力、罢工、示威与宣传的人员稳定来源。殖民地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但对福利与发展的简约政策束缚了它的手脚。直到 1967 年夏天，这个潜在的颠覆性机构的真正影响才会显现。

暴动：当地左翼的“自发行动”

然而，这一网络的存在并不能解释当地左翼为什么在 1967 年发起动员。时任殖民地总督戴麟趾爵士相信九龙最初的劳资纠纷是“自发的”，而非北京事

---

[8]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CO 40/114, Special Branch, Police Headquarters, Hong Kong, ‘Action against Communist Press—Reappraisals as at 9th November 1967’, 9 November 1967. 这与香港的共产党领导人金尧如的评估不同。金尧如认为，共产主义报纸在香港的总发行量约占三分之一。这一差异可能是计算时纳入了免费分发给学校、工会和其他场所的报纸。见金堯如:《香港五十年憶往》，香港：田园书屋，1998 年：第 33 页。

[9] 銀都機構：銀都六十（1950—2010），香港：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16 页。

[1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196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3.

[11] Ibid., 108.

先谋划的行动。他在一份电报中表示，“一切迹象均表明这是一起自发的事件”，最近的激进工会主义浪潮不过是“反映了基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众’要求更多自由的地方宣传”。[12]戴麟趾认为，后来事件的升级主要由于香港左翼领导人求生本能的结果。[13]在他看来，这帮左翼需要在香港为毛泽东思想赢得一场胜利，“否则脑袋就不保了”。[14]换句话说，这场对抗是当地左翼的谋划，是为了证明他们对激进的中国领导人的忠诚。他们面临压力，必须取得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他们在澳门的左翼同志在 1966 年 12 月的对抗中成功使得葡萄牙政府屈服之后。

殖民地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应对这一挑战。[15]对戴麟趾来说，这是当务之急，因为香港激进派的极端行动有可能“推动”北京支持香港左翼。按照这种逻辑，如果香港能在暴动失控之前控制住局势，北京就不会介入。因此，通过大规模逮捕首脑与抗议者、停办左翼报纸、关闭左翼学校、启用紧急权力与驱逐出境，1968 年初，社会秩序逐渐恢复。谈而，如果不是毛泽东忙于调动军队把控地方行政，控制内地的激进主义，这些措施可能无法起到多大作用。

暴动：社会改革的催化剂

暴动过后，劳动条件有所改善。政府出台了关于工作时间、妇女和童工的法规，更大的紧迫感促使社会保险与其他劳动福利的辩论重新开展。由于忽视工人阶级状况的潜在后果被用作加速政策改革的理由，暴动促进了关于劳工改革必要性的论述。然而，1967 年的事件几乎没有改变社会与政治精英的心态。

正如克莱顿（Clayton）所言：

---

[1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CO 40/45, Hong Kong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7/5/1967, Telegram No. 553.

[13]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CO 40/49,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 on ‘Current Communist Disturbances in Hong Kong’, 3/8/1967. See also Yep, Ray. 2008.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 *China Quarterly* 193: 122–39.

[14]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CO 40/45,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of Commonwealth Affairs, 11/5/1967, Telegram No. 947.

[15] Ray Yep. 2012.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Emergency Power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Turbulent Year of 1967.’ *Modern Asian Studies* 46, no. 4: 1007–32.

> 1967 年，激进分子希望劳工和资本之间发生冲突，并试图推翻他们认为的这个偏向资本主义利益的殖民政权。对于仁慈者而言，1967 年是一个警示：政府必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并再次尝试培育强大的、政治中立的、能够使用民主制度与合法手段的工人组织。然而，实用主义者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很快就消退了。他们一定意识到，1967 年未能改变香港普通民众的想法：支持殖民政权，远离激进主义。[16]

然而，暴动对伦敦的英国建制派产生了长期影响，改变了他们对社会改革重要性的看法。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发展愈发关注，已经达到了战略的维度。对伦敦来说，1967 年暴动的一个主要教训是，英国根本无法维持 1997 年以后对香港的统治，中共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香港被外国统治的耻辱，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会很快消散。根据内阁在暴动后对香港的研究，“任何与中共政府‘谈判’延长香港租约的计划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的意图是最迟在 1997 年接管香港”。[17]报告认为，一个稳定繁荣的香港至少可以让英国处于良好的谈判立场上，而社会改革可以促进这一事业。

然而，1967 年的对抗也对殖民地劳工改革的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玷污了左翼工会的形象。参与暴动的左翼工会会员被许多人视作麻烦制造者或中共代理人。他们在社会主流与政策制定过程中被边缘化了。由于最有组织的劳工团体被迫退出政策辩论，殖民地工人阶级相对于资本而言本就劣势的谈判地位进一步恶化。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香港的未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时，他们才恢复了在当地政治中的角色。

---

[16] David Clayton. 2009. ‘The Riots and Labour Laws: The Struggle for an Eight-Hour Day for Women Factory Workers, 1962–71.’ In *May Day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edited by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43.

[17]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Cabinet 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Hong Kong, 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 K(69)1, 26 March 1969, CAB 134/2945.

1968

1968 年 9 月，上海的一家工厂成立了“工人大学”。最初，工厂的六千名工人中只有 45 名学生，但在成立后不久就得到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随后在全国范围内都涌现了类似的举措。本文将探讨工人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何获得政治地位，以及在其中学习的工人如何参与中国道路是走向共产主义亦或仅是复制某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辩论。

第一所工人大学的建立

安德烈娅·皮亚扎罗利·隆戈巴尔迪（Andrea PIAZZAROLI LONGOBARDI）

1968 年 7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决定解散红卫兵学生组织。这一决定之所以能够实施，主要是因为 1967 年初，工人的动员成为“革命”的主要载体。考虑到工人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他们对地方政治施加了重大影响，使得争吵不休的学生相形见绌。

学生的派系之争引出了许多关于如何在教育领域实现文革目标的问题。既然是文化上的革命，教育似乎是其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如何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教育，似乎没有明确的方向。经济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已经大致理论化了，例如集体化生产资料，将生产与分配纳入国家计划，但是教育领域需要有什么变化？这是教育革命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场运动始于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在文化大革命中升级并激进化，工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正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张春桥在 1968 年 7 月 22 日参观上海机床厂时说道：

> 教育革命不仅是学校的问题。只靠学校进行，那我说句冒犯的话，就是做错了。最好是靠党，靠工人，靠贫下中农，靠人民解放军……所以，教育革命不是学校的问题：教育革命学校兴起之后，必须要到工厂与公社去。[1]

上海机床厂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教育试验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 1957 年，毛泽东本人就参观过机床厂，将其打造为全国的典范。机床是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产品，代表着国家独立于苏联的技术与援助。在这类工厂中向工人推广政治与技术教育，意味着支持地方倡议（local initiatives）

---

[1] 张春桥：“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现场会上的讲话”（196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的理论家：张春桥与「文革」》，台湾：西西弗斯出版社，2015 年：第 206—210 页。

没有电子书，由英语转译。——译者注。

层面上的国家技术发展。自 1956 年以来，上海机床厂的一些工人积极参与政治学习小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 1967 年，政治动员的重点从学生转向工人，政治学习小组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1968 年 8 月，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姚文元，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呼吁“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此背景下，上海机床厂的一个工人小组设立了第一所工人大学，纵观大学发展的历史，其形式与内容都有过争论，也有尝试不同的组织形式，其中一些失败了。最重要的是，工人大学的榜样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同的形式被复制，以至于在 1974 年，中共估计全国各省的工厂内设立了约有 330 所正规学校。[2]一年后，这一数字增长到约 500 所。[3]

本文将概述导致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设立了一系列事件，并展示这一举措如何在生产单位中进行政治试验，最后，将讨论这些大学产生的一些理论成果。

政治危机与创造

1967 年“一月风暴”事件（见本书中蓝梦琳的文章）与上海公社的余波揭示了当时使用的一些政治范畴的饱和及其随后的意义丧失，如“阶级”“夺权”乃至“革命”。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网络“过时”或“脱离现实”，而是指，这些概念的复杂性与世纪矛盾被充分展示，特别是在一个被认为是全面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中。党的领导层和基层激进分子都质疑如何参与一场需要从共产党手中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1966 年 12 月，张春桥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内的……这个问题要从实践中解决……”。[4]张春桥指的是对何为“革命”以及共产党接管国家后如何实现革命的不同理解。可能在暗指毛泽东 1937 年的《实践论》，张春桥宣称这些矛盾只能从实践中解决，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政治动员与经验才能清楚地回答如何承载着革命迈向共产主义。

---

[2] “关于召开学习上海机床厂 721 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上海市档案馆 B244-1-386-1。

[3] 王德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前进在‘七二一’道路上：上海机床厂教育革命经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1 页。

[4] 张春桥：“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6 年 12 月 12 日，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01-30/21.htm。

1966 年与 1967 年，红卫兵传播政治辩论，审查了许多干部的历史记录。这不仅导致一些官员被撤职，还有公开批评会上的暴力行为。另一个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结后果是让民众养成了审视党的领导层的言行举止的习惯。[5]毛泽东在 1967 年所称的“红卫兵扫帚”打破了党内外的分隔，为基层监督并参与党和国家的一场铺平了道路，这是前所未有的。[6]

尽管如此，工人还是单位内部开始实现政治创造的同时，努力维持生产产量。[7]在一次又一次的声明中，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强调了巩固造反派积极政治方向的重要性，其中就包括对《七十条》的批判（见本书中平田的文章），这是一份规范工业管理的特殊文件，以便革命烂炒不会被派系主义所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建设“新”的问题，即周恩来所称的“创造”与毛泽东的“新生事物”。[8]

1968 年 7 月 28 日正式解散红卫兵的会议的前七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在上海机床厂开展的一些试验的报告，并附有毛泽东的个人评论，从而

---

[5] See Christian Sorace. 2020. ‘Metrics of Exceptionality, Simulated Intimacy.’ *Critical Inquiry* 46, no. 3: 555–77.

[6] 关于扫帚的形象，见“毛泽东与莫依修和穆希于上海的谈话记录”（Stenographic Note Held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Chairman Mao Zedong and Vangjel Moisiu and Myfit Mushi in Shanghai），1967 年 8 月 16 日，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AQSH, F. 14/AP, M-PKK, V. 1967, Doc. 47, Fl. 1-8. 由 Elidor Mëhilli 翻译成英文，在线链接：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7304。自 1967 年以来，“党内外有别”的问题一直是广泛争议的问题。中共中央的一些成员主张内外有别，而另一些人则主张通过群众批评与政治自我组织来参与党和国家的议程，见 Lowell Dittmer. 1973.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56: 708–29.

[7] 文化大革命期间，如何平衡工人参与政治动员与维持生产水平的问题一致存在着争论与冲突。关于 1966 年与 1967 年此类状况的详细概述，见 Hongsheng Jiang. 2010. ‘Paris Commune in Shanghai: The Masses, the State, and Dynamics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 Ph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8] “新生事物”一词自内战以来就被用来指代基层进行的社会与政治实践。例如，毛泽东的论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线链接：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0227.htm。阿兰 · 巴迪欧曾提过革命的“积极”与“消极”性质，即破坏旧事物、断裂与夺取的运动，与建设新事物的运动。巴迪欧认为，革命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而许多革命运动的失败就是过于偏向/执着于某一性质。因此，从消极到积极，从破坏到建设，或者反过来，都对革命运动至关重要。Alain Badiou. 2015.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London: Verso Books, 23.

将这个例子推广到全国。[9]文中解释道，工厂中有一个在工人中培训技术人员的项目，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第一、工程师愿意与工人分享技术信息，第二、工程师每周会在生产线上工作几个小时，第三、工人加入技术委员会并参与生产管理回忆，第四、成立了工人、干部与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各个部门。报告指出，没有劳动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更容易犯错，而一位看不懂项目或项目背后理论的工人也容易在实践中犯错。此外，将体力劳动者排斥在规划活动之外被认为是对资源的浪费，对技术创新的限制。报告还宣称，接受技术人员培训的工人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与集体主义意识，他们会将生产劳动视作对社会的贡献，而工程师往往可能培养出“个人主义”的性格，为了利润或权力而劳动。

1968 年 7 月，张春桥访问上海机床厂期间，进行了一次讲话，他追溯了一条将 1968 年的这次访问与 1957 年毛泽东的访问联系起来的“历史线”：“我们当时在反右，基于那场辩论，我们清晰意识到，应该培训工人，形成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巩固。”[10]

通过将 1968 年的经历与毛泽东的访问联系起来，张春桥试图将民众的主动性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将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作为一个有权威认可的民主试验。张春桥继续主张，工厂的试验可以成为全球教育革命的原型，因为它将体力劳动、智力劳动、学习与教学相结合，工人、学生和教授被轮流安排在生产劳动、研究与教学岗位上。

通过将上海机床厂的实验纳入教育革命，这次讲话与其他党的著名领导人的其他讲话推动了一个新项目的兴起：工人大学，于 1968 年 9 月机床厂的一群工人正式宣布成立。使用“大学”一词的决定具有特别意义，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变得明显。

---

[9] 关于此次会面的详细分析，见 Alessandro Russo. 2005. ‘The Conclusive Scen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3, no. 3: 535–74. 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地方党代表与红卫兵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对话中，毛泽东提及了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并认为“可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见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 年 6 月 28 日），载于《毛泽东万岁》：第 687—716 页。关于报道，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在线链接：zh.wikisource.org/wiki/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泽东的批示后来被称作“七 · 二一指示”。

[10] 张春桥：“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现场会上的讲话”。

同注释 1。——译者注。

试验与新问题

根据 1969 年 7 月发表的首份报告，上海机床厂的工人大学宣布已经从单位六千名工人中选出了 52 名学员。[11]其中，大多数人仅完成了小学教育，少数完成了高中教育，而有 8 人小学都没毕业。然而，“大学”一词并不意味着教育在一栋独立的建筑或者一间专门的教室进行，机床厂与其他大多数工厂单位一样，课程在工厂内部进行，推动政治学习与扫盲，也教授技术知识。[12]大部分工人大学的教授来自传统教育机构中经验丰富的工人与知识分子。[13]

在生产单位中设立大学的经验引发了许多问题：是否应该采取与其他大学相同的教学方法？如何定义其“无产阶级”或“革命”性质，其学生、教育方法与成果如何？这些问题及其他课题，至少持续到毛泽东去世、中央文革小组剩下的成员入狱的 1976 年，乃至工人大学被改为普通技术学校的 1968 年时仍在讨论。[14]

1971 年，第一届工程专业的学生完成三年课程时，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的部分领导主张，毕业后，工人学生应该回到生产线上，而不是在工厂中担任工程师或管理人员。这个目标是政治性的：终止一种学习特权导致领导职位的制度，证明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可以在生产的各个领域共同劳动。此外，还有一种明确的暗示则是，任何人，无论是不是无产者，如果他们的政治角色再生产了旧社会的结构，那就都有可能犯错，都有可能表现为资本主义者。正如一位机床厂工人所宣称的那样：“工人大学的政治环境是好的，但也不是个‘红

---

[11] 上海机床厂革命委员会：“上海机床厂‘七 · 二一’工人大学首期学员毕业”，《人民日报》1971 年 6 月 23 日。

[12] 上海市机电局革命委员会：“努力办好七 · 二一工人大学”，《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6 期：第 84 页。

[13] “上海机床厂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在成长”，《人民日报》1969 年 6 月 21 日。

[14] 1976 年至 1978 年期间，工人大学经历了彻底的改革。改革始于取消人文课程。1978 年，工人大学中剩余的领导、教师被撤换，大多由不同省市的技术教授与干部替代。见 Jiang, *The Paris Commune in Shanghai*, 14–19. 另见上海市出版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公司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意见”（1979 年），上海市档案馆 B105-4-1305。

色安全箱’，我对毛泽东的政策与党都有着深切的考虑，但简单的‘阶级感情’不能代替路线斗争的意识。”[15]

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欢迎工人学生毕业后回到生产的要求。有些人质疑：“这种新的毕业生，究竟有哪些地方是新的？”[16]还有人说道：“有人问我要当一个什么‘员’？”[17]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理想化的：“我从不忘记自己是个工人……每天下课后，我都会车间，与所有的统治一起劳动……遇到问题，我们一起解决。”[18]工人大学的目标既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能够参与生产与政治动员，“能上能下”“能文能武”。[19]

王德法，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的一位领导者，提及有些人批评大学士“挂着‘大学’牌子、用着中学课本的小学。”[20]既是工人中也流传着类似的批评，作为回应，学院开始撰写报告，列举了毕业工人的技术创新实例，强调他们对提高生产产量的贡献。[21]事实上，这些报告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矛盾。它们试图证明从工人当中培训新技术人员的经济优势，但是产出数字无法展示大学项目的政治与社会优势。工人大学的真正突破载于对生产关系的重新构建，技术与经济的语言无法轻易描述。

来自工厂车间的分析

随着工人大学的设立，推动了其所属的成人教育的起步，从 1968 年开始，许多面向成年人的写作手册出版。识字率的提高也导致了无数的工人文章集锦的出版，其中一些被发表在地方与全国性的期刊。

---

[15] 李爱宝，收录于《前进在‘七二一’道路上：上海机床厂教育革命经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45 页。

找不到原文，根据英语转译。下同。——译者注。

[16] 引用自 Wu Jizhou，上海机床厂的一名工人兼干部，同上：第 19 页。

[17] 引用自 Chi Wenhan，机床厂工人大学首届毕业生，同上：第 33 页。

[18] 同上。

[19] 王德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第 10 页。

[20] 张梅华：“坚定不移地走七 · 二一道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载于《前进在‘七二一’道路上》：第 1—8 页。

[21] “新型的工人技术人员在成长——记上海机床厂‘七 · 二一’工人大学第一批毕业生”，《人民日报》1972 年 7 月 22 日。

关于这种新现象的较好案例可以参考 1975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生产定额制的文章，生产定额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要素，生产产量与质量有政府预先制定并分配给每个工作单位。[22]这篇文章试图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即可以迈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时间，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包装”自己的资本主义政策。[23]文章的引文是一封名为王恭肖的工厂工人写给同事的一封信开始，他问道，生产定额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政策。[24]他一方面断言，生产定额有助于提升落后的技术和产量，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另一方面，他指出，这一制度将不同个体的劳动能力同质化，将劳动消解为抽象的资本，因而是“资产阶级法权”。

文章继续展示另一位名为叶伯乐的工人写给王恭肖的回信。以当时常见的论述开篇，宣称如果资本家在革命中被击败，就没有剥削者可以“拿走”剩余价值并实施阶级剥削，因此社会主义中“定额制的性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如此，叶伯乐还是进一步阐述了王恭肖提出的矛盾，宣称定额制还规定了生产产量的具体时间，实际上是将每个工人的能力作为时间而非劳动进行计算，从而加强了劳动分工。他说：“它（定额制）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各个劳动者，而不管劳动者之间技术熟练程度、体力强弱的差别。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25]

文章继续将这一矛盾置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背景下，即建设一个人人按需分配、各尽所能的社会，文章提出，如果“每个人都能各尽所能”，从而就能加强与之矛盾的共产主义性质，工人就可以抑制生产定额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叶伯乐强调，如果定额制的制定不能由工人直接的政治控制，就可能加强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使用物质激励：“有些人……利用定额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这就是在扩大这一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

[22] “定额制度也有资产阶级法权吗？”，《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9 期：第 46—47 页。

在线链接：bannedthought.net/China/Magazines/StudyAndCriticism/index.htm#1975。——译者注。

[23] 关于这种分析话语的介绍，见上钢五厂革命委员会：“一年来的战斗回顾”，《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1 期：第 3 页。

[24] 写作手册通常采用多种体裁吸引读者的兴趣与关注。辩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文章通常采用对话、书信乃至传记的形式。

[25] “定额制度也有资产阶级法权吗？”。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叶伯乐建议由工人直接管理生产：“生产的发展和提高需要经过公开辩论，制定新的定额，设定新的严格目标。”这一主张与同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讨论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过去二十年的讨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到了 1975 年，中共明确指示所有学习小组分析实际情况，区分地方与全国政策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方向”的矛盾，即可能在政治经济中复辟资本主义或进入共产主义的政策。[26]因此，限制社会主义中资本主义残余结构的方式是加强共产主义政策与“创造”，特别是加强工人对行政与教育领域的直接参与。

填补空白

文革期间开展的动员运动引发了有关社会主义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的重要理论问题。有时，一些政治运动的危机甚至失败引发了新的理论辩论，红卫兵的派系斗争就是如此。

工人大学的简短历史以及定义其形式与目标的辩论是从基层的角度理解文革事件的重要主题。本文重点关注其中的两个方面：确定他们在政治经济中的计划与作用的困难性，以及学员被赋予政治实践试验的意义，这与理论及技术学习是同一层面的要事。在工人大学中学习，实际上涉及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分析。

工人大学以及农村与城市生产单位中设立的学习小组，填补了一处社会性的空白，使得此前被认为不适合残余政治辩论或提出新理论假设的人有了机会。然而，中国社会从未对这些组织的社会与政治经济价值达成任何共识，正如那些一直存在的试图“证明”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有效贡献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然而，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坚持了下来，并提出了许多有趣且复杂的政治分析。

---

[26] 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持久性的讨论过于宽泛且重要，一篇参考根本无法概括。然而，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讲话，见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 246—249 页。Alessandro Russo 在他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 1975 年开启的“无产阶级专政”全国学习运动：Alessandro Russo. 2013.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 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1975.’ *Modern China* 39, no. 3: 239–79.

本文所引用之批评生产定额制的文章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这些大学的同志并不怎么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想法。这与文革时期广泛传播的信念是一致的，即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持续的路线斗争，基于这种观念，社会主义并非一个自动走向共产主义的“安全”社会。因此，真正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机会就是保持开放的空间，一个可以进行政治试验、工人可以直接参与生产管理和教育领域的空间。这将是制定政策，消弭并克服阶级不平等的唯一途径。然而，这些文章充满了疑虑，这也符合它们的试验性质与政治理想。

1969

1969 年 4 月，毛泽东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旨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动荡。与此同时，数十万工人在武汉市中心举行了一系列集会，喊着“反复旧!”的口号。城市的造反派组织了这些集会，他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推翻了当地的党政机构，战胜了支持当局而组织的保皇派工人，控制了城市的工厂与新组织的市工人代表大会。他们曾发生过激烈的派系冲突，但现在他们联合起来挑战中共九大的方向，并反对他们的代表在新设立的负责管理当地工厂与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中被边缘化。本文将研究这场运动，它鲜明地揭示了推动文革的愿景与紧张关系。主要的分析关注点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工人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

“反复旧!”：文革期间武汉造反派工人运动的高潮

安舟（Joel ANDREAS）

中国近代史上充满了极具争议的工人运动，但没有一次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庞大且广泛。1966 年秋天至 1969 年春天，工人组织了大规模集会、游行、占领工厂、围攻和巷战，涉及数千万人。中国工人从未被如此大规模或如此久地动员过，这场运动遍及全国各个城市乡镇，涵盖了各个行业（以及更广泛的范畴），参与者高度政治化且具有阶级意识。全国各地的工人分为造反派与保皇派：造反派受毛泽东的鼓舞去挑战当地的中共当局，而保守派则捍卫后者。

部分观察家对这一段历史不屑一顾，认为工人并非自发行动，而是作为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层之间冲突的一部分而被动员。当然，文革是毛泽东发起的，并且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派系冲突的形成是由于中共领导层与地方官僚之间的争斗。[1]本文将探讨的问题是他们的自主程度：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工人是否在追求他们所认为的切身利益？他们是在自主行动，还只是遵循上级指示？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必须提出细致入微的观点。一方面，造反派受到了毛泽东的启发，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运动就不可能存在，造反派工人通常也会尽力跟随他的领导。另一方面，造反派是自我组织的，他们有效地挑战了工厂与市级党政机构，并有力地提出民众参与的诉求（见本书中蓝梦琳的文章）。造反派阵营由小型、松散联系的“战斗小组”组成。他们与北京之前没有权威的上下关系，尽管他们通常会跟随毛泽东的领导，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并不总是如此。

---

[1] 关于分析党领导层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冲突，见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Andrew G. Walder. 2019.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些学者详细研究了这些特殊时刻。例如，有许多工人试图提高经济诉求，主要发生在工人运动早期的几周，毛泽东谴责“经济主义”之前。许多工人试图争取工作单位中条件与福利的改善，零食共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全国性运动，要求获得终身的职位。[2]此外，还有关于“极左”思想与组织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昏暗的“省无联”理论家，他们提出了对“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批评。[3]

本文研究的是 1969 年春的“反复旧”运动，造反派工人在某些方面最具挑战性的集体协调运动。当时，毛泽东与总共领导层试图控制文革中的大规模派系斗争已有一年多之久。“反复旧”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集会，直接挑战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因为他们最大胆的行动恰逢中共九大，毛泽东打算通过这次大会明确宣告结束文革的大规模动荡。“反复旧”运动清晰展示出推动文革的愿景与紧张关系，并揭示造反派的自主程度及其局限。

本文中我将研究“反复旧”运动在武汉市的情况。武汉市湖北省的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横跨长江。尽管文革最初的小规模冲突发生在学校，但到了 1966 年底，工人逐渐成为争斗各派的主导，1968 年底，学生都下乡了，工人成为“反复旧”运动的主力。我有幸采访了 17 位参与武汉文革动荡的个人，包括“反复旧”运动的几位关键领导人，以及一些大型工厂的造反派与保皇派。我还利用了王绍光与老田等人关于武汉“反复旧”运动方面发表的宝贵信息，以及其他城市中运动如何发展的报告。[4]在研究 1969 年春的事件之前，我将提供必要的北京，简要回顾造反派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武汉发展中的具体轨迹。[5]

---

[2] Elizabeth J. Perry and Xun Li.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Yiching Wu.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rew G. Walder. 1977. *Chang Ch'un 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3] 宋永毅、孫大進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6；Jonathan Unger. 1991.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 1;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4] 老田：“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2014 年），在线链接：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4/317327.html；齐晋华：“‘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昨天》2013 年 5 月 30 日第 17 期，在线链接：difangwenge.org/simple/?t10706.html; Shaoguang Wang. 1995.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尽管总体叙述取自我近期的著作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但本文将更详细地审视反复旧运动。

忠于毛泽东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不寻常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攻击他的地方党员官僚。有很多理论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最好将文革解释为试图寻找有效的“群众监督”的一系列试验的高潮，即动员群众帮助党控制其干部。[6]尽管中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党，能够有效自上而下地控制，可党也担心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控制。毛泽东与其他党的领导层担心，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就无法有效执行党的政策，遏制腐败与职权滥用，特别是遏制“官僚主义”，即干部与群众的隔离。长期以来，管理群众监督运动的关键就是找到一种方法，既能给予工农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地批评地方党领导的错误行为，又不危及中央对这些运动的控制。

早期的群众监督运动中，如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中共通常会派出由外来的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动员工人对工厂领导进行批评。尽管这些运动在遏制腐败与其他恶习方面十分有效，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确信这些运动只允许群众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发出声音，从而加强了官僚主义。因此，他在 1966 年夏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尽管他最初允许党的官员再次向学校和工厂派出工作组，但他随后谴责工作组压制群众，并鼓励学生与（之后的）工人驱赶他们，成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此外，他还允许这些组织攻击工厂的党领导，这些领导都容易被指责为“走资派”。

1966 年秋天，中国工厂的工人已经分为两派：攻击企业的党领导的造反派，捍卫前者的保皇派。造反派由多个小型、自我组织的团体组成，主要由工人领导：其中一些人是心怀不满的普通党员，但大多数人从未入党。保守派通常由基层干部领导，通常规模更大、组织更好。然而，时至年底，造反派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有效瘫痪了工厂的党组织，保守派感到气馁并退缩。然后，1967 年 1 月，毛泽东惊人地呼吁造反派“夺权”。

然而，毛泽东从未打算让造反派单方面控掌控中国的工厂。相反，他要求军方派遣小组军官前往工厂，监督组建有军官、党的老干部与“群众代表”（造

---

[6] Joel Andreas. 2019. ‘Mass Supervision.’ In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edited by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ANU Press and Verso Books, 127–33.

反派领导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正如所料，委员会的成立过程极具争议，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反，军官普遍不倾向于支持造反派。

武汉与其他地方一样，各个造反派组织迅速凝聚成温和与激进两个阵营。温和派自称新派，倾向于和军方合作，激进派被称为钢派，坚持要求造反派完全控制工厂。二、三月，军方扣留了钢派的领导人，并将组织赶入地下。然而，毛泽东于四月谴责军方镇压造反派之后，温和派与激进派的造反派联合起来，重新发动进攻。作为回应，保皇派工人与干部在军队的支持下重新集结，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号称“百万雄师”。七月，保皇派武装分子绑架并殴打了由毛泽东派遣来调解冲突的高级使者。毛泽东严厉谴责“武汉事件”，并调走了支持“百万雄师”的军事部队。保皇派的联盟崩溃，造反派控制了武汉的工厂，暴力清算了他们的对手。

为了巩固他们新获得的权力，造反派恢复了工业生产，同时继续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尽管这些努力经常相互冲突。造反派在工作单位掌握了权力，用工作单位的资金出版报纸，一位造反派领导人告诉我：“如果一个工作单位内不同的造反派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就会出版不同的报纸。”[7]

那年秋天，每个工作单位的工人都被要求选举代表参与市级与省级工人代表大会，而这些代表又与新的农民与学生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一起，选举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一批新的军官被派来主持这一进程。由于保皇派被排挤，钢派与新派各自竞争推选自己的领导人，并“拉拢”老干部加入他们的名单。两个造反派联盟未能就名单达成一致后，军队领导人最终于 1968 年 2 月决定了省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组成。近四分之一的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军官，剩下的席位由造反派领导人和两个造反派联盟各自提名的老干部平分。[8]

省革委会选举之后，又进行了市级与企业，以及工厂内的车间革委会选举。一位造反派领袖如此向我描述：“每个组织都会召开自己的会议，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决定每个组织能有多少名代表。每个人都必须同意。他们进行协商和妥协。相对来说比较民主。”[9]然而，革委会控制权的争夺导致

[7] 采访 W9。关于受访者的背景特征，见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Appendix D.

[8]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192.

[9] 采访 W9。

了新一轮的暴力对抗，这次是在造反派之间。最后，1968 年秋，毛泽东坚持要求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解散，停止出版自己的报纸，并交出武器。

工人们回忆道，在此之前，革委会定期召开会议，造反派在武汉的许多工厂都有影响力。在此之后，军官开始更积极地主张他们的权威。他们开始改组党委，将非党员的造反派领袖排除在外，并在未与更广泛的革命委员会协商的情况下决策。他们不仅排挤造反派领袖，还开始惩罚最不听话的人，以作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部分。[10]一位造反派领袖告诉我，“这是一个大问题”，他向我解释造反派为何会在 1969 年初重新走上街头，“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发挥不了他们应有的作用。这也是叫‘反复旧’的原因。”[11]

反复旧

1968 年 11 月，反复旧运动在山东省发起，很快蔓延到安徽、福建、广西、贵州、甘肃、河南、湖北、江苏、江西、山西、四川等省。[12]由于造反派被禁止跨省组织，因此运动的地理范围之广更加引人注目。

1969 年 1 月，武汉的造反派加入了运动，公开反抗城市的军事领导。由于造反派组织已被并入工人代表大会，这些组织（指工代会）成为关键的组织工具。一份造反派出版物宣称：“尽管我们的组织已经被解散了，但工代会仍在。它是我们的领导核心。你们军代表算老几？你们傀儡革委会算老几？”[13]

钢派与新派仍在竞争，后者在军方那里仍然享有相对宽松的待遇，但到了三月中旬，两派的领导人决定联合，抵抗排挤并压制他们的努力。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危冒险的举动。一位曾是新派领导人并在发起“反复旧”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无线电厂工人告诉我：“我们决定我们都是造反派，我们共进，共生，共死。”[14]

---

[10] 这将被证明是三场全国性镇压运动中的第一场，终结了文革中的大规模派系斗争，镇压了造反派组织，并严厉恢复了党组织的权威。另外两场运动下文有提及，即“一打三反”运动与揪出“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见 Andrew G. Walder. 2014.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8, nos. 3–4: 513–39.

[11] 采访 W2。

[12] 齐晋华：“‘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

[13] 引用自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210–11.

[14] 采访 W11。

3 月 16 日（译按：应为 4 月 10 日），两派领导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十分特色的文化大革命风格——“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呼吁工人再次走上街头，一夜之间，满城被贴满这张大字报，发起了一场与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所强调的“团结”截然相反的运动。

尽管造反派组织被迫关闭了自己的报纸，但他们控制着官方的工人大会报《武汉工人》。在此之前，《武汉工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路线，而现在，他们把其作为谴责当地军方当局的工具。他们开始频繁地出版报纸，用来谴责军队对革委会越来越多的控制、对工人代表的排挤、暂停造反派所控工厂的革委会以及对造反派活动人士的迫害。

造反派希望巩固他们在工厂一级工代会中的权力，并把它们变成更加自主的组织。因此，他们要求工厂的工代会不要单方面服从工厂的革委会，而是要对市工代会负责。在工厂中，他们努力加强所控工代会的权力，接管他们没能控制的工代会，恢复已失去活力的代表大会。在市工代会的鼓励下，一波野猫罢工的浪潮席卷武汉。[15]虽然运动的核心诉求是调整工代会、革委会、党委与军方代表之间的相对权力，但运动也受到了关于工厂规章制度与管理的辩论与争议的启发，这些辩论与争议成为造反派指控恢复旧有权力结构与管理方式的素材。

三月中旬开始，造反派领导人利用市级与厂级工代会组织了一系列群众集会，随着 4 月 1 日至 4 月 24 日北京召开中共九大，集会规模不断扩大。4 月 27 日，他们召开了一次据称 50 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16]五月的头几周，他们继续举行集会，造反派领导人在谴责湖北的军事领导人方面变得更加大胆，要求他们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造反派组织在全市数百家工厂进行重组，据说他们从现有的 180 个工作单位的革委会领导层手中夺权。5 月 11 日，100 辆载有造反派的卡车包围了省、市革委会总部。[17]

五月初，20 多名造反派领导人与军代表从武汉被传唤到北京。造反派前往首都，希望向党的最高领导层陈述他们的立场，就像当年在北京那样。在近两周的时间内，他们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最高领导层多次会面。在会议上，

---

[15]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212.

[16] Ibid., 214.

[17] Ibid., 216–18.

他们因搞派性而被批评，但他们也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新派领导人告诉我，“我们没有放弃”，他们认为他们的抗议是正当的，因为他们遭到排挤与压制。[18]然而，最终，毛泽东批准了一份被称作“五二七指示”的文件，批评造反派攻击军队并将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19]

这项指示为武汉的军事领导开辟了途径，对不再有能力抵抗的造反派进行了一波镇压。新派领导人解释道，“因为中央和毛泽东批评了我们，我们能说什么呢？”[20]在 11 月，一千多名造反派领导人被送往北京接受“学习”，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味着持续六个月的密集审讯与政治压力会议。近万人在自己的工厂中接受这种“学习”。这种镇压与全国范围内的“一打三反”运动与揪出“五一六”分子的行动结合起来，在此期间，武汉有成千上万名造反派被关押，有的甚至一关就是好几年。[21]

1972 年，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批评了军代表，并将他们从工厂和行政部门中除名后，造反派得以重新组织。接下来的四年中，造反派得到了毛泽东的重新支持，发动了一系列新攻势。1973—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重建了工厂的工代会，并再次将其作为群众动员的工具。他们挟持军官，迫使军官在面对他们所管理的工厂里工人的愤怒，成千上万的工人包围了武汉市党部，要求并赢得了留在监狱中造反派领导人的自由。而在 1975 年和 1976 年，他们与全国各地的前造反派领导人一起，动员工人支持一场新的运动，推动激进政策并推翻邓小平。然而，他们的运动在 1976 年 9 月毛泽东去世后被彻底粉碎。

探讨

我们能将一个完全依赖毛泽东的工人运动称为“自主”吗？显然，造反派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限制，因为他们除了遵循毛泽东的议程外没有什么选择。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可以自由地抨击干部的特权、腐败与专断，但他们不能提出经济诉求，虽然他们可以推翻地方党政官员，但不能从根本上挑战党的权威。

---

[18] 采访 W11。

[19] 《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1969 年 5 月 27 日，在线链接：zh.wikisource.org/wiki/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20] 采访 W11。

[21] 老田：“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此外，毛泽东撤回他的支持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完全依赖就暴露无遗了。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他们就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党组织的镇压与报复。毛泽东利用造反派攻击地方党政官员后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然而，造反派遵循毛泽东的议程，不仅是因为实际权力约束——他们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是被毛泽东主义愿景所塑造与限制。当然，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会带上由所处的社会塑造的意识形态眼镜与眼罩。文革时期，造反派的眼镜与眼罩赋予了他们一种十分正义与狂热的阶级意识，其中包括工人应该自己管理工厂的想法。当然，中共一直都在喊工人是“当家作主”的口号。文革期间，毛泽东为这种想法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告诉工人他们应有的角色被党政官僚剥夺了。

尽管他们在实际权力与愿景方面的自主性存在着局限性，但造反派确实是自我组织的，不受任何组织阶序的支配。他们不仅独立于地方党组织，而且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挑战党的权威，尽管他们试图遵循毛泽东的指导，但他们自己必须自行解读毛泽东不可预测，有时甚至含糊不清的讯息。他们只能自己去思考，而在关键时刻，他们的思考与行动偏离了毛泽东的议程。本文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武汉与其他城市的造反派不同意毛泽东所引领的方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希望毛泽东可以跟随。

1970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中苏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外交政策重新定位于和美苏两大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第三世界”斗争。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向其他不结盟的自主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中国的援建团队参与了世界各地数十个“交钥匙”援助项目的建设。通过投入本国劳动力与专业知识，发展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中国领导层试图将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曙日。在这一外交努力中，非洲大陆占据了特殊地位。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叶修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坦赞）铁路，至今仍被中国当局深情地视为中非友谊的象征。本文将探讨修建铁路的中国工人与技术专家的生活经历。

建设自由（Uhuru）：坦赞铁路上的中国工人与劳工外交

马修 · 高尔韦（Matthew GALWAY）



“为世界革命人民服务”，1971 年。IISH Stefan R. Landsberger 收藏。

1968—1969 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作家罗伯特 · F · 威廉姆斯（Robert F．Williams）在《呼唤》（The Call）杂志上回顾了他的坦桑尼亚之行，他骑着摩托车，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卡皮里姆波希进行了长达十天、1470 英里（2366 公里）的往返冒险。他效仿“年轻红卫兵的长征”与“中国青年的越野跋涉”，沿观察到坦赞铁路的初期建设时，目睹中国技术人员与坦赞工人一起劳动时，

他得出结论："非洲的潜力是无限的"。[1]同样，在 1968 年第二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在一次宴会上回忆道，他在 1965 年第一次来访时就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他表示，"希望坦桑尼亚的所有人都能来中国看看，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坚定决心的民族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2]他继续说道：

> 如果我们真的想从民族独立走向人民的真正独立，如果我们真的想确保非洲革命永远向前发展，而不是堕落为新殖民主义，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你们（中国）学习。事实上，根据我在 1965 年对中国的观察，我必须说，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发起文化革命，（以）确保新一代传承你们的革命旗帜，那么我们也得来一场。[3]

尼雷尔想知道他如何将中国的职业道德、纪律与革命的火花传递给他的祖国。回国后，视察中国资助的坦赞铁路施工现场与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资助项目——友谊（Urafiki）纺织厂时，尼雷尔对中国技术工人的职业道德、活力、热情与能力大吃一惊。"纪律严明的工作必不可少，"他指出，"在这里，我们的中国技术人员再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4]

尽管许多坦桑尼亚人前往中国学习、接受培训，但中国共产党也将自己的国民派往坦桑尼亚。欧美企业拒绝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后，中国以"无障碍进

---

[1] Robert F. Williams. 1969, 'An Afro-American in Africa.' *The Call: Journal of the Afro-Asian Writers Bureau* 9, no. 1: 21–22, quoted in Robeson Taj Frazier. 2015. *The East Is Black: Cold War China in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74 n.45.

[2] "尼雷尔总统在告别晚宴的讲话"，《人民日报》1968 年 6 月 22 日。另见 Yinghong Cheng. 2011.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11; and George T. Yu. 1970. *China and Tanzania: A Study i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rkeley, 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5.

[3] 'Julius Nyerere's Banquet Speech.' *Xinhua*, 21–24 June 1968,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s*, Communist China—International Affairs, A6 (FBIS-FRB-68-123).

[4] Quoted in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212. See also 'Union Being Cemented, Says Mwalimu: Union Making Great Progress.' *The Nationalist* [Tanzania], 27 April 1965; William Edgett Smith. 1971. *We Must Run While They Walk: A Portrait of Africa's Julius Nyerere*.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3; 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20—26 页。

入”坦桑尼亚港口为条件，“向坦桑尼亚提供了大量教师、医生、技术支持、货币援助、文化产品以及一系列合作与单边援助”。[5]特别是单边援助，是毛泽东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贡献。仅在 1964 年，中国就向坦桑尼亚提供了超过 4500 万美元的援助，大约是北京每年对非洲承诺援助的一半。[6]这笔金额还包括由四万至五万名技术人员组成的中国铁路专家组的交通费，他们的生活费，以及五万至六万当地劳工的雇佣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承诺向坦桑尼亚与赞比亚提供 9.88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8.68 亿元（约 4 亿美元）为无息贷款，两国将把这笔贷款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并在延期五年后的三十年内偿还。[7]北京有两个目标：第一、通过连接赞比亚的铜矿带（赞比亚每年出口 70 万吨铜）与坦桑尼亚的港口，刺激两国经济发展；第二、通过确保东非与南部非洲的货物运输，使得两国摆脱对种族隔离之南非与白人主导之罗得西亚的依赖，从而促进赞比亚对安哥拉、南罗得西亚与南非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8]正如一位中国铁路专

---

[5] Priya Lal. 2014. 'Maoism in Tanzania: Material Connections and Shared Imaginaries.' In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Alexander Coo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 104. See also 'Chinese Doctors Call on Shaba.' *The Nationalist* [Tanzania], 18 April 1968;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203; and Matthew Galway. 2013. 'Global Maoism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ization in Peru and Tanzania.' *Left History* 17, no. 2: 22.

[6] Lal, 'Maoism in Tanzania', 101. Chinese loans funded Chinese-designed and engineered projects such as the Tanzania–China cotton shipping line, a naval base in Tanzania's then capital of Dar es Salaam, and an airstrip in Ngerengere. Chinese experts also instructed the Tanzanian military.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203.

[7] Tareq Y. Ismael. 197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9, no. 4: 515;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203; 曲拯民：“中国给坦赞尼亚筑铁路”，《翼报月刊》2006 年 6 月 1 日，在线链接：chs.ebaomonthly.com/ebao/printebao.php?a=20060-618; Lal, 'Maoism in Tanzania', 101; and Jamie Monson. 2009. *Freedom Railway: 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d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33. 坦赞铁路的“密集建设”（intensive construction）阶段（1970—1974 年），三万至四万名中国技术人员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约，还有六万名以上的坦赞工人加入其中。2007 年的《人民日报》估计，十一年间有多达五万名中国工人从事测量、施工与管理培训工作。Jamie Monson. 2013. 'Making Men, Making History.' *Clio. Women, Gender, History*, no. 38: 130. 另见石林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61 页。

[8] Donovan Chau. 2014. *Exploiting Africa: The Influence of Maoist China in Algeria, Ghana, and Tanzani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29; and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203.

家组的成员所回忆的那样，坦赞铁路“在这两方面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9]然而，这一庞大承诺的背后还有第三个目标：通过输出模范劳工，作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团结的典范。

非洲发展的一次跃进

坦赞铁路上中国劳工是中坦友谊的物质体现，这种友谊在 1965 年的条约中得到了巩固，这项条约将贯穿下一个十年。杜建（音译）是一名翻译，于 1969 年加入了中国在坦桑尼亚的劳工队伍，他亲眼目睹了铁路的建设，并在随后四十年中追踪铁路的发展。对他来说，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永恒象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动用了全部力量，包括人力、物资和资金。”[10]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圣像破坏运动与政治动荡，但中国共产党坚持承担铁路建设的全部费用。“中国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然运送了超过 150 万吨材料，包括钢轨、水泥、炸药与日用品，”杜回忆道。事实上，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监督了全国的动员”，以确保中国只向坦桑尼亚运送最高等级的物资，包括武汉钢铁厂在内的中国工厂“日夜运转”，以满足铁路的物资生产定额。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致力于这样一个无私但代价高昂的事业？1949 年至 1965 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强调阶级革命转变为广泛的反殖民主义进程，旨在将欧美帝国主义赶出全球南方（见本书中索拉切与 Zhu 的文章）。[11]在 1962 年

---

[9] Rucai Lu. 2016. ‘Du Jian: Witness to the Birth of the TAZARA.’ *China Today* 65, no. 1: 39. On the Tan–Zam Railway’s goals, 见曹德勝：“祖孙两代人共‘筑非洲梦’”,《中国日报》2018 年 9 月 3 日，在线链接：cn.chinadaily.com.cn/2018-09/03/content_36861999.htm。

[10] Lu, ‘Du Jian’, 39–42. PRC representatives often conveyed socialist principles by ‘using the language of brotherhood and friendship’. The latter represented ‘a key phrase in Chinese development propaganda in Tanzania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Jamie Monson. 2006. ‘Defending the People’s Railway in the Era of Liberalization: Tazara in Southern Tanzania.’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76, no. 1: 118.

[11] 关于十七年的参考资料来自张玉玲：“新中国‘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政治功能分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5 号第 2 期：第 115—117 页，引用自 Emily Wilcox. 2018. ‘The Postcolonial Blind Spot: Chinese Dance in the Era of Third Worldism, 1949–1965.’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6, no. 4: 815. On this shift, see John W. Garver. 2015. *China’s Quest:* （见下页）

中苏分裂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口头上承诺要发动第三世界的斗争，对抗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周恩来在 1964 年的非洲之行中宣称非洲大陆“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12]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60 年代的中非关系反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正在加强与新独立国家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经济与外交关系，形成“国际统一战线”。[13]到 1972 年，中国的工作组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了近一百个“交钥匙”援助项目的建设，1973 年，中共已向近 30 个非洲国家承诺提供援助。[14]通过这些成就，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与 70 年代的漫长岁月中，树立了自己作为反帝国主义的中心。[15]

中共向坦桑尼亚派遣了一支由铁路工人、工程师与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必须拥有“强健的体魄、坚定的思想与熟稔的技能”，同时还要具备高度的意识形态忠诚，以协助坦桑尼亚自主发展社会主义。[16]作为中共全球愿景以及北京对坦桑尼亚社会主义发展承诺的现实体现，1970 年至 1975 年期间，这些中国工作组与坦桑尼亚人并肩劳动，共同建设坦赞铁路。正如孟洁梅（Jamie Monson）所述，中国工人的模范劳动“通过自律与辛勤工作传达了现代性与进步的价值观”，展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国际团结与兄弟情谊，（以）培养工人纪律”。[17]在这种新型的“劳工外交”中，中国领导人将中国定位成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曙日，而中国的专家和工人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化身。[18]通过基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31.

[12] Deborah Bräutigam, . 2009.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7. 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的激进外交政策，见康矛召：《外交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

[13] D.J. Muekalia. 2004. 'Africa and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13, no. 1: 5–11.

[14] Bräutigam, *The Dragon's Gift,* 40–41. See also 'Tanzania's Enemies Attack Anti-Imperialis-t Policies.' *African World,* 22 July 1972, 4.

[15] Lal, 'Maoism in Tanzania', 105.

[16]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41. Monson acknowledges on page 7, however,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Tanzanian labourers were more 'hierarchical and highly regulated'.

[17] Ibid., 7; and Monson, 'Defending the People's Railway in the Era of Liberalization', 113.

[18] 本文重新诠释了“劳工外交”，一位学者将其归功于美国国务院的从业人员，参考了全球美国大使馆劳工专员对“美国人权与国际贸易政策背景下的核心劳工标准”（core labor standards within the context of U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Nicholas A. Stigliani. （见下页）

础设施建设，中国的技术人员将播下社会主义的种子，让太阳的光芒滋润它们。中国技术工人的职业道德和活力——均由文革的激进精神塑造——也将被传递给他们的东非同志。正如黛博拉·布罗伊蒂加姆（Deborah Bräutigam）所述：

> 当地一位农民告诉我，他受到了中国人的启发，效法中国人，提着灯笼在稻田里劳作到深夜。“你看那边的中国人（在田里）工作，就跟着学了。”有次，一位参议员来咨询医生时，惊讶地发现他正在擦办公室的地板。世界银行为其综合农业发展项目而招募酋长时，中国人要求只和“农民”合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精神在中国于非洲最大胆的成就——坦赞铁路中达到顶峰。[19]

如果说中国人播下了种子，那么坦桑尼亚人和赞比亚人则要照顾树苗，培育自主社会主义发展的花朵。正如一位中国教员，姚培基（音）所解释的那样：

> 我们完成这条铁路后，他们（坦桑尼亚人与赞比亚人）可能不知道如何管理，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运营……管理必须本地化，也就是说，我们得帮助坦桑尼亚与赞比亚培养自己的人才来管理铁路……我们不仅为他们修建铁路，还要让他们感到自己在管理这条铁路。[20]

1975 年，坦赞铁路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作为中坦友谊的纪念碑与中共国际愿景的永恒遗产，数十年后，已经在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中被重新编码（见本书何宜伦的文章）。尽管铁路的物质难以被消弭，但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市场化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通过无息贷款发展实现世

2003. ‘Labor Diplomacy: A Revitalized Aspect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 no. 2: 177–94. On ideas that inspired this chapter’s recasting, see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210–13; Monson, ‘Making Men, Making History’, 124; Elizabeth Schmidt. 2007. *Cold War and Decolonization in Guinea, 1946–1958.*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and Jay Straker. 2009. *Youth, Nationalism, and the Guinean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 Bräutigam, *The Dragon’s Gift*, 39–40, quoting ‘Tanzania–Zambia Railway Symbolizes Sino-African Friendship’, *Xinhua*, 23 June 2006.

[20] Jamie Monson. 2005. ‘Interview with Yao Peiji’; Monson, ‘Making Men, Making History’, 130.

界社会主义的愿景，转而追求利润为导向的资源获取，从而谋求中国自身的利益。

建设铁路

根据 1967 年 9 月 5 日签署的协议，中共承诺提供近 10 亿元人民币（4.06 亿美元，或通货膨胀调整后的 26.2 亿美元）来建设这条近 2000 公里长的铁路。坦赞铁路最初是由 19 世纪末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塞西尔 · 罗兹（Cecil Rhodes）设想的一条连接南北非洲的铁路，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发展项目与非洲第三大基础设施发展项目”。[21]经过 1968—1970 年的初步调查与设计阶段，中共派遣测量员对地形进行全面评估，于 1970 年开始施工。当时的条件恶劣，急救能力有限，以至于一名中国测量员被毒蜂蜇伤后不幸丧生。[22]

随着中国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到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中国铁路专家组与当地工人一起，忍受着食物的短缺、闷热的天气、与世隔绝的环境、无处不在的疾病风险以及有限的疾病或受伤医疗资源。工时长，条例多。正如孟洁梅所述：

> 项目的工作通过十二个基地营组织的，操作中心设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与曼古拉。工人大队在基地营中划分为更小的分队，由非洲工头与中国现场助理的指导。分队的规模各有不同：1972 年，一处基地营中有 64 个工人队伍，包括约 5500 名工人。工作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行，工作期间，各个分队可能相距两到三英里。在一些关键地段，工作昼夜不停，8 小时轮一次班，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照明。[23]

食物是从中国运来的，但半个月的航程意味着当地的工作人员只能吃脱水的蔬菜。甚至连酱油也成了一种奢侈品。有时，供应品到达时，面粉已经发霉

---

[21] “周恩来推动援建坦赞铁路”，《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3 日，在线链接：zhouenlai.people.cn/n1/2020/0305/c409117-31618455.html。另见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2; and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40.

[22] 海明威：“记者重走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年久失修常晚点”，《瞭望东方周刊》2010 年 8 月 4 日，在线链接：news.sina.com.cn/c/sd/2010-08-04/170620826263.shtml。另见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38.

[23] Monson, ‘Making Men, Making History’, 130.

了。在荒野的帐篷里生活也很危险。在早上穿鞋之前，总要检查鞋子有没有蛇。晚上，他们还能听到外面狮子的吼声。[24]

资深工人在项目中也会遇到困难。CCTV 的一期节目中，采访了一位匿名的坦赞铁路老工人，他讲述了缺水、超负荷工作以及完成施工期限的极端压力。[25]铁路建设期间共有 160 多名工人身亡，其中 64 名是中国人。[26]然而，尽管如此，对许多工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在面对世界超级大国时，通过共同奋斗所建立的友谊与团结的纽带，以及他们对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信念。

坦桑尼亚方面，当地社区也在坦赞铁路建设期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尼雷尔命令国家征用土地来建设铁路。国家为这些土地提供的补偿有限，而追究当局的责任往往极其困难。在工人将最后一根钉子打入坦赞铁路后的多年内，许多农民抱怨，他们因失去农作物与收入的赔偿款长期被忽视。这些损失因尼雷尔的大规模“乌贾马”（相当于公社/合作社）农村化计划而加剧，因为当局强行将 1300 多户家庭搬迁到靠近铁路的地方，以保护铁路结构不受破坏，并为国家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计划作出贡献。[27]

在国家层面，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的投资将意味着坦桑尼亚经济与政治主权的丧失。然而，多多马的政府官员坚持认为，坦赞铁路的建设以及与中国签订的经济条约并没有危及这两方面。尼雷尔热切地宣称，坦赞铁路和其他同类项目一样，“无论由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建设的，都只是一条铁路，并不一定是红色的。”[28]他重申，中国的援助并不意味着坦桑尼亚偏离了自力更生、自主社会主义发展与不结盟的承诺。坦桑尼亚通信、劳工和公共事务部长卢辛德（J.M. Lusinde）赞同尼雷尔的说法：“坦桑尼亚人民决心确保整个非洲都得

---

[24] *Xinhua*, ‘Tanzania–Zambia Railway Symbolizes Sino-African Friendship.’

[25] Bräutigam, *The Dragon’s Gift*, 40–41.

[26] ‘TAZARA Construction Worker Who Died After Being Fiercely Stung by African Bees Remembered in Dar.’ *Tanzania Zambia Railway Authority*/*The Daily News* [Tanzania], 4 March 2016, available online at: tazarasite.com/tazara-construction-worker-who-died-after-being-fiercely-stung-african-bees-remembered-dar.

[27] Monson, ‘Defending the People’s Railway in the Era of Liberalization’, 120–21. On *Ujamaa* villag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ee Galway, ‘Global Maoism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ization in Peru and Tanzania’, 21–29.

[28] ‘Tan–Zam Railway Is Not “Red” Says Nyerere.’ *The Nationalist* [Tanzania], 20 October 1968, quoted in Lal, ‘Maoism in Tanzania’, 107.

到解放。而铁路的建设是对非洲全面解放的贡献。”[29]尼雷尔经常驳斥那些关于中国通过坦赞合作关系操纵坦桑尼亚事务的指控，并强调坦桑尼亚在国际中的自主性。[30]欧美媒体认为他在穿着上的“坦桑尼亚装”（Tanzania suit）——有点像毛泽东的中山装——是在模仿毛泽东的中国，他对此回应：“我想，即使是我穿的衣服也是中国恶性影响的证据。”[31]

当下对铁路工人的纪念

竣工数十年后，坦赞铁路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国致力于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永久纪念碑而具有当代的意义。对当代中国的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是“毛泽东推动的斗争、艰辛与‘光荣成就’的巅峰”。[32]中国对集体牺牲的强调，特别是在纪念老工人与中国铁路专家组成员的时显得尤为明显，更不用说那些同样付出代价的坦赞工人了，与“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农业大队”的故事类似（见本书中克林顿的文章）。[33]中坦两国的官员继续进行广泛宣传的访问，以纪念中国工人在坦赞铁路上的英勇牺牲。最值得一提的是，006 年 6 月 23 日，坦桑尼亚总理爱德华 · 洛瓦萨（Edward Lowasa）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达累斯萨拉姆会面，两位领导人前往郊区的中国铁路专家公墓（Gongo la Mboto）进行悼念，那里埋葬着 64 名在铁路项目中牺牲的中国技术人员。温家宝向

---

[29] ‘Tanzanian, Zambian, Chines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Inspect Survey Work on Tanzanian Section of Tanzania–Zambia Railway.’ *Peking Review* 11, no. 26, 28 June 1968: 27.

[30] May Joseph. 1999. *Nomadic Identities: The 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40; and Martin Bailey. 1975. ‘Tanzania and China.’ *African Affairs* 74, no. 294: 42. See also Paul Bjerk. 2017. *Julius Nyerere*.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80; and Cranford Pratt. 1976. *The Critical Phase in Tanzania 1945–1968: Nyerer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ist Strate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 ‘President Nyerere Speaks Out on Remaining Colonies: Bloodshed? It’s Up to the West.’ *The Nationalist* [Tanzania], 24 June 1965, quoted in Lal, ‘Maoism in Tanzania’, 107. On the ‘Tanzania suit’ and its popularity, see William Edgett Smith. 1973. *Nyerere of Tanzani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3.

[32] Bräutigam, *The Dragon’s Gift*, 40.

[33] Ibid., 40.

"中国援坦专家光荣牺牲同志"纪念碑献上鲜花与花圈，随后，双方官员默哀。[34]

同时，中国将这一年定为"非洲年"，中国官方媒体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坦赞铁路的故事。[35]一位记者回忆道："任何一篇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的演讲或新闻报道不会提及对坦赞铁路项目与建设者英勇事迹的赞美。"[36]在一次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提到他亲自参观这条铁路时的感动：

> 我前几天去坦桑尼亚看到我们援建坦赞铁路牺牲、献身的那些中国人的公墓，我不禁为那些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老百姓共同奋斗、成功修出一条铁路的中国工人掉下眼泪。[37]

尽管坦赞铁路在建设时对其国内具有重要意义，但项目也并非没有批评者，对项目的批评与对当今中国参与海外的讨论出奇地产生共鸣。如上所述，坦桑尼亚的一些人指出，与中国的交易是即将失去主权的信号。尽管中国承诺"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教导，周恩来的八项对外援助原则，以及后来华国锋主席的指示，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发展国家经济，但人们仍对外资项目的规模、成本以及劳动力投入表示严重关切。更令人担忧的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虽然为铁路建设提供了大部分劳动力，但仍然承诺签署对北京有利的贸易协定。[38]活动人士指出了这些不平等的贸易协定，尤其是其中一项协定允许中国无限制地将剩余产品输入东非，有效清除了当地的竞争。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述，中国产品的迅速涌入危及了当地的工业：

> 非洲受援国往往处于一个困境，几乎不得不接受任何可以得到的援助，（因此）达累斯萨拉姆的商店充满了未售出的"附加品"（make-

---

[34] "温家宝凭吊中国援坦专家公墓并视察中国援建工地"，《新华社》2006 年 6 月 23 日。

[35] Bräutigam, *The Dragon's Gift,* 40.

[36]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Fu Ziying, is Addressing the Press.' *China.com.cn,* quoted in Monson, 'Making Men, Making History', 128.

[37] Ibid. See also Ben Blanchard. 2011. 'China Says Foreign Aid About Friendship, Not Resources.' *Reuters,* 26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reuters.com/article/hold-china-aid-idAFL-3E7-FQ0EX20110426.

[38] "坦桑尼亚庆祝坦赞铁路运营壹周年"，《人民日报》，1977 年 7 月 16 日。

> weight）中国商品……低廉工业品的涌入往往会抑制受援国在其境内建立此类工业。[39]

一些居住在坦桑尼亚的非裔美国人也强调了中国铁路专家组对当地工人的不公平待遇，包括在雇佣中的歧视程度以及对工人安全的缺乏保护。[40]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逐步过渡到改革开放，彻底重新定位了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关系。中国将言论、意识形态与物质承诺投入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与自主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为坦桑尼亚摆脱种族隔离之南非而提供的工厂与铁路建设援助计划，让位于以中国利润为优先的单边关系。中国的公司对工人的雇佣属于“资本主义剥削”，并主要依靠容易被剥削的“坦桑尼亚劳动力来从事工业生产、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41]坦桑尼亚的局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争取减免国家的国际债务，1995 年上台的尼雷尔的继任者本杰明 · 姆卡帕（Benjamin Mkapa）摒弃了前任的社会主义政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制定了自由市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对这些新自由主义措施给予了热情支持。[42]

尽管近年来中坦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但对许多中国人与坦桑尼亚人来说，坦赞铁路代表着比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带来的风险要更重要的东西。来自天津的李永增曾于 1970 年在坦桑尼亚担任工程师，参与坦赞铁路项目，他回忆了这座中坦友谊纪念碑的象征意义：“援建坦赞铁路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生命记忆。”[43]他的孙子李上意继承了祖父的足迹，在坦桑尼亚与后来的马拉维担任技术人员，参与了一项为农村家庭接入卫星电视的项目，他认识到继

---

[39] ‘Alternative to Imperialists: Chinese Aid to Africa.’ *African World*, 16 September 1972, 12, 16, quoted in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203–4.

[40] ‘Correspondence, February 1969: Letter from Al Haynes (Muhammad Zaid), February 5, 1969.’ Robert F. Williams Papers,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Box 2, Folder: September–December 1968, cited in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204. See also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37–38.

[41] Lal, ‘Maoism in Tanzania’, 114.

[42] Bruce Heilman and Laurean Ndumbaro. 2002. ‘Corruption, Politics, and Societal Values in Tanzania: An Evaluation of the Mkapa Administration's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no. 1: 1–19.

[43] 曹德勝：“祖孙两代人共‘筑非洲梦’”。

承中非友谊衣钵的重要性。他说，在新的时代，“我们年轻一代也应当为中非传统友谊薪火相传做出自己的贡献。”[44]

[44] 同上。

1972

作为教育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尝试，文化大革命加强了将受教育的城市青年送往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实践。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将城市青年送往农村，让他们与农民并肩劳动，获得宝贵的生活经验。然而，这项政策只有在大跃进的灾难后才真正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需要重新安置那些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减轻城市的就业、食品供应与服务的压力。尽管文革开始后，国家机构瓦解，学生的流动停止，但在 1967 年，一些红卫兵自愿前往农村，深入农民群众，在那里继续革命。这一做法最初只是涓涓细流，一年后，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支持，变成了一股洪流。本文以一位不满的家长在 1972 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为起点，探讨中国“知青”的经历。

知青当农民：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

潘鸣啸（Michel BONNIN）[1]

1972 年，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的一名小学教师。[2]他为他的长子被安排到八十公里之外的平困山村插队入户而感到苦恼，这是 1968 年以来任何一个普通城市家庭都无法逃脱的命运。更为恼火的是，他的长子搬到农村后，一直无法挣到足够的工分养活自己。与当地农民一样，农村的"知青"(即知识青年)每天都要挣工分，以便在收获时用来兑换粮食与金钱，但大多数人挣到的工分都比当地农民少，部分原因是他们被认为不够熟练，体力较差，部分原因是当地干部对上级强加给他们的这种负担感到不满，因为这减少了他们微薄的收入。农村劳动力足够丰富了，但他们被告知，安插知青是毛主席交给他们的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大多数知青不得不向他们的父母寻求帮助以维持生计。例如，李庆霖不得不为已经完成学业的儿子提供食物（在黑市上买的）。他的儿子六个月就吃完了一年的份额，更别提其他必需品了，他赚不到一分钱。此外，即使努力工作四年后，他的长子在村里也没有适当的住所。

他的小儿子也快 16 岁了，即将上山下乡，李庆霖十分担忧。他的工资不足以喂养两个儿子的空腹。他也对地方干部与领导的子女能走后门回到城市的不公现象感到不满，普通人的子女只能在农村生活到不知道多久：理论上可能是一辈子。1968 年 12 遇到 22 日，毛泽东发动这一运动的著名指示中指出，城市

---

[1] 本文主要参考 Michel Bonnin. 2013.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2] 关于李庆霖的资料有很多。主要引用两本，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8—92 页；Elya J. Zhang. 2006. 'To Be Somebody: Li Qinglin, "Run-of-the-Mill Cultural Revolution Showstopper".'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11–39.

青年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转变为新的社会主义农民。[3]当时，许多青年积极响应毛泽东的任何要求，至于其他人，他们没有选择。然而，在农村呆了几个月后，即使是曾经的积极分子也失去了热情。他们失去了宝贵的城市户口，不被允许回到城市，否则他们会成为非法居民，没有购买食物或其他东西所需的票证，也不可能找到工作或住所。直至 70 年代初，才有一些知青在他们的家乡找到工作，或是被人民解放军招募，这一现象在 1972 年变得更加频繁，当时，林彪元帅逃跑失败并身亡后，大多数在文革中受害的前领导人与干部被召回城市并获得新职位。他们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他们的子女进入解放军或刚刚重新开放的大学。自然，这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感，不止是那些没特权的人，还包括被认为是“坏阶级出身”而没希望离开农村的人。

李庆霖除了对不公正的谴责以外，还希望能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因此，他决定采取一件传统上中国有不满的人的最后手段：告御状——也就是给毛主席写信。他先后寄去两封信，但都石沉大海，他并没有灰心；后来，他注意到，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是外交部的一位领导，并与主席本人一同接待外国政要，因此，他决定给她寄第三封信。奇迹发生了：1973 年 4 月 25 日，他在家中收到了一封信，里面附有三张百元钞票（相当于他七个月的工资），还有一封毛泽东的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尽管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给一群红卫兵回过信，但这是他第一次给个人回信。[4]与那一次一样，这封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李庆霖的名字与毛泽东的信的内容很快就被全国人民所得知。毛泽东乐于作为一个仁慈的统治者出现，为人民伸张正义，纠正未能政治贯彻其宏伟的共产主义国家建设计划的官僚行径。在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人中，他的“专长”就是经常利用“群众”对那些不遵循他路线的其他领导人与官僚施加压力——红卫兵就是他曾利用又抛弃的案例之一。毛泽东坚持认为李庆霖应该在地方甚至国家层面上担任官职。于是，李庆霖趁机揭发了一些地方领导，甚至卷入了幸存的最高层领导与通过文革提拔上来的激进领导之间的政治斗争。

---

[3] 关于这项指示，见 Bonnin, *The Lost Generation*, 4.

[4]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后，高层激进派领导人被指为“四人帮”并遭到逮捕，而曾被李庆霖揭发的地方官僚报复了他。李庆霖被认为是“四人帮”在福建省的第二号代表，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为 15 年，于 1994 年获释，十年后在他给毛泽东写信的那个简陋住所中去世。时至今日，李庆霖在前知青中的形象仍然很好，不是因为他后来的政治活动，而只是因为在 1972 年他敢于向毛泽东说出真相。毛泽东抓住机会，给予下乡运动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他的革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教育和培养“革命接班人”。他认为这个过程对于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言至关重要。1970—1971 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占据了最高领导层的注意力，部分原因在于意识到，经历了严峻的政治混乱之后，城市需要新的劳动力，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想要重新发起运动，就必须一定程度上改善知青的物质条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知青与他们的家人对此都无法接受。

重启运动

周恩来察觉到毛泽东致李庆霖的信是对负责国家日常运作的领导人的隐晦指责，于是迅速组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于 1973 年 6 月 22 至 8 月 7 日在北京举行。根据被派往不同地区的七十名干部所收集的信息，了解影响知青及其父母的主要问题，通过了一系列补救措施。由于调查发现，在一些军事农场，军官强奸了几十名女知青，一些强奸犯被逮捕并判处死刑，以减少家长的焦虑。但是，由于法治方面并没有系统性地改善，问题的根源仍然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1976 年有一万件虐待知青的案件（主要是强奸）的报告。[5]

会议的另一个决定就是坚持领导层在制度管理方面的职责，在各级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会议期间及之后所采取措施的目标是改善知青的物质状况，并更好地控制他们。支付给乡镇政府的知青补贴，南方从每人 230 元增至 480 元，北方从每人 250 元增至 500 元。同时，强调“同工同酬”原则，希望能提高知青的工分。关于知青福利的一项重要改进，就是尽可能将他们聚合起来，让他们共同居住并劳动，调配了更多的建筑材料，让知青在集

---

[5] 来自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引用自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 864 页。

体户中不仅更容易合理分配家务，还减少了他们的孤立感，降低了女知青受性骚扰与强奸的风险。在有土地与资金的地方，当地鼓励成立知青农场或种植园，让这帮青年一起劳动，有时还能得到资深农民的帮助。

将知青与农民分开工作与生活，有效减少了农民与知青之间的冲突，但却牺牲了运动的初衷：知青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以及贫中下农对知青的再教育。不过，重新聚合知青确实有利于加强对他们的监督，特别是当局设立了一种新的方法，派遣“陪同干部”轮流住在农村，试图控制知青的活动，避免他们逃避劳动，并在晚上组织政治学习。这些干部的存在也为知青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特别是女知青，让她们免受虐待。但干部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全国大约每 100 个知青才有一名陪同干部，正如我们所见，这种保护远远不足。

自 1974 年开始，湖南省株洲市成为新制度的典范，学校继续指定那些必须下乡的学生，但家长的工作单位接手了动员并组织他们下放到与单位“挂钩”的农村。考虑到工作单位对每个家庭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权力，特别是考虑到知青返乡的最好机会就是被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录用， 他们比以往更难抗拒调动。因此，株洲模式是在运动结束后中国城市地区普遍存在的世袭录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1973 年的会议所带来的变化在各地的实施并不均衡，但确实为大多数知青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善。然而，当时的基本问题是，农村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能真正满足知青或他们的父母。他们心中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心态

1973 年的会议到来之前，这种心态已经深深根植于知青中，并没随着未来几年新一波的下乡知青而改变。仿效苏联，城市青年下乡的政策最早始于 1955 年，但规模很小。大跃进（1958—1962 年）之前，只有不到十万名中国青年下乡，这一政策在大跃进期间停止。当大跃进这段乌托邦式的狂热时期以饥荒与经济崩溃告终时，城市地区的就业、食品供应和教育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于是当局决定将大量城市青年送往农村。1962 年至 1966 年中期，文革前夕，共有 129 万名知青下乡。[6]当时，这项政策主要针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在高

[6]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 863 页。

中、大学以及就业方面受到歧视。他们为了“改造”自己，于是前往“国家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发现农村并不像他们被告知的那样理想，而返乡的前景也很渺茫，因此他们的情绪相当低落，一些人利用文革返乡“闹革命”，要求当局停止“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政策。然而，这项政策的毛泽东主义性质被重申，他们于 1967 年底前被强行送回农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混乱的局势不允许此类有组织的官僚活动，所以没有新的人员下乡。但在 1967 年，一些红卫兵对他们运动的取向感到失望，并受到毛泽东一些讲话的激发，要求到农村去与农民群众结合，在那里继续革命。[7]在 1967 年只有约 2000 名红卫兵以这种方式离开，但在 1968 年中期，由于毛泽东已经考虑结束红卫兵运动并恢复秩序，一些省份开始组织中学生下乡。9 月 5 日和 9 月 13 日，毛泽东本人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分别发表社论与指示后，运动加快了步伐，但仍有些拒绝放弃斗争的红卫兵与担心孩子的家长在抵制，后者担心孩子会被送往偏远的边疆，担心他们在农村的命运以及未定的归乡。于是，毛泽东决定对此采取严厉措施。1968 年 12 月 21 日，晚间广播新闻中宣读了他的一项指示，并于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场大规模动员立即展开，接下来的数月内，大多数城市中学生被宣布毕业，并在兴奋的氛围中被送往农村。1968 年底至 1970 年春，约 500 万名知青前往本省的农村，而那些大城市的知青，多是去了边疆地区。在那里他们往往被编入后来被改造为国营农场的军事农场。这样的农场至少有一个优势，每月的工资与食物足够维持生计，而乡村往往没有这种保障，正如我们所见。然而，据官方统计，只有 15%的知青被编入农场（1967—1979 年期间，共有 1650 万名知青被送往农村，其中约有 250 万人被编入农场）。[8]从 1974 年到 1979 年，

---

[7] 1967 年，毛泽东就已表示对“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并强调他们必须“改造世界观”。见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9 年），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在线链接：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307.htm。

[8]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 863 页。

共 200 万青年被送往不同的知青农场或种植园，但这些都是没有薪水保障的集体单位。[9]

毛泽东致李庆霖的信所引发的系统改革，在当时已经无法获得知青的认可，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结束农村的生活——贿赂官员，或是某些极端行动，如自残、非法返乡，或是逃亡香港、缅甸等境外地区。即使那些在农村表现良好，公开赞扬政策，甚至成为低级干部的知青，也希望能返乡。那些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才华的少数人，如小学教师或赤脚医生，也在寻机离开。

返城风

上山下乡政策也成为党内高层两大主要政治派系之间的争论焦点：毛派激进分子坚持认为必须让知青“扎根”，即成为终身农民，而温和派则支持轮换制度。虽然前者声势更大，但后者对国家的日常管理具有更多的影响，因此，不断地有知青返城。然而，返城的人数总是低于下乡的人数，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乡村知青的人数在 1977 年达到顶峰（近九百万）的原因。[10]此外，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后，继任者华国锋（曾组织过 1973 年的会议）决定继续推行下乡政策——这是 1977 年高峰的另一个因素。但是 1978 年对毛主义政策的质疑在领导层中引起了犹豫。这个问题交由 1978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10 日举行的新工作会议解决，会议决定减少下乡人数，计划在几年后停止流动。与此同时，还计划让农村知青逐步返城。然而，随着当局宣布，在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被视为知青，而是农场的雇员，这项决定在相关知青中引发轩然大波，演变成一场绝望的自发运动，包括上访、罢工、绝食以及派遣代表团。最终导致了普遍的“返城风”，当局对此默认。1978 年至 1980 年底，约有 600 万名知青返城。

利用 1978 年末的改革开放，知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成功改变当局计划并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当然，党的新领导层决定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使得长远视野下的农村知青政策站不住脚。从经济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完全不合理。知青的积极抵抗是在十年的消极抵抗之后发生的，这种消极抵抗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并在腐败现象的滋长上扮演重

---

[9] 同上。

[10] 见图表 Bonnin, *The Lost Generation*, 177.

要角色，导致理想主义与基本伦理的普遍衰退。大部分离开农村的机会是随意的：进入大学不需要通过考试，只需要争取政治支持；被军队与城市工作单位雇佣靠的是关系；因健康问题而返城靠的是医疗证明，金钱可以买到。

运动接近尾声时，当局在内部讨论中承认，国家耗费 70 亿元，只换来了四种不满：知青的不满、知青父母的不满、农民的不满以及政府内部的不满。[11] 考虑到运动的巨大成本，不仅知青与他们的父母付出了代价，国家与农民同样承担了安置与维持一支本不需要的劳动力的财政负担，问题是：为什么这项政策能持续如此之久？

这场运动有多种目的，在 1955 年至 1980 年的漫长历程中，领导层的动机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边疆地区，运动主要目标包括开垦土地、提高汉族人在少数民族与/或人口稀少地区的战略存在。但在某些时期，主要动机无疑是经济上的，即缓解城市失业问题。许多人，包括学者，认为这是运动背后的真正理由，但这种观点是简单化的。的确，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大跃进灾难之后与红卫兵运动结束时，当局难以在多年的动荡之后为青年提供工作。但在这两个时期，就业问题主要是由政治运动导致的。1968 年，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以不愿结束革命的红卫兵为代表的政治威胁。但这是一个偶然的问题。据统计，1968 年至 1977 年期间，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人数大致相当于永久落户农村的知青人数。户口制度本可以避免这种人口交换，但毛泽东曾说过，下乡“很有必要”。

毛泽东在晚年仍在保护并发展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对他来说，这绝不是经济合理性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必要性，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防止中国“变色”。即使在他身体十分虚弱的时候，1976 年 2 月，他还对一封寄给他的信进行批示，要求政治局组织一次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新会议。[12]这种反应让人联想起他之前寄给李庆霖的回信，显示出他对知青运动的关注直至最后时刻都没有减退。

正因如此，这场运动才会持续如此之久——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经济理由。1978 年之后，经济发成为首要任务，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容纳返城的知青与城市粮食短缺、经济放缓的婴儿潮一代。想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放

---

[11] 顾洪章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年：第 158 页。

[12] 同上：第 130—135 页。

弃毛泽东纯粹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而对小型集体企业以及服务与轻工业部门所施加的限制。返城的许多知青都认为，这场运动是“开倒车”。事实上，只有在十年后，中国政府开始接受大量年轻农民前往城市工作的逆向劳动力流动，中国才能大规模地发展工业与服务业，同时缓解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1976

尽管“工人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备受关注，但它们并非最早，也并非唯一试图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来超越传统大学精英主义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试验。1958 年成立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尝试之一。学生通过“半工半读”的课程进行学习，与其他大学不同，共大既是大学，又是生产单位，通过销售农场与工厂的产品来支持其职工和学生。本文将通过 1976 年的电影《决裂》（一部描述共大建校的虚构故事片），探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广泛的智识项目。通过叙述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这部电影将学生的主体性重新置于国家父权制与发展主义结构之内，回应文革期间学生活动所带来的危机。

白卷：文革后期电影《决裂》中学生劳动与行动主义的危机

A·C·贝克尔（A.C. BAECKER）

1976 年李文化导演的电影《决裂》的核心冲突就是学生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参加一场考试。当地生产大队的稻田被一种叫作“夜强盗”的害虫侵袭，一夜之间能把全大队的庄稼都吃掉，学生放下课本，匆忙赶去拯救庄稼。他们熬夜用杀虫剂消灭虫害，成功拯救了大队的水稻，但却错过了次日清晨的考试。[1]

然而，学校的保守派教职人员非但不承认他们的英雄事迹，反而威胁要开除他们。学校的副校长，一位职业教育家，曹仲和（陈颖饰）就曾警告过他们，管好自己的事情，专心考出好成绩。然而，一位理想主义的学生用一段慷慨地言辞说服了大家，“同学们，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她问道，“我们怎么能够不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科学知识去为农业服务？”然而，学校的官僚管理人员不同意，他们表示，缺席考试就是“交白卷儿”。围绕学生被开除的争议表明，其中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关于十五名大学生的学业前途。实际上，整个大学的成功与否都悬而未决。

《决裂》描述了现实中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一处虚构分校的建立，共大试图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摒弃传统大学的精英主义与“资产阶级”价值观。学生通过“半工半读”的课程接受教育，与其他大学不同，共大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处生产单位，通过农场与工厂产品的销售支持教职员工与学生。[2]《决裂》通过对学生参与课堂学习与生产劳动的描述，为那

[1] 李文化：《决裂》（1986 年），VHS, Voyager Press; 春潮与周杰：“决裂”，《人民电影》1976 年第 1 期：第 41—76 页。

[2] See John Cleverly. 2000.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2, 72. 共大主要销售江西各地伐木场的竹木制品，还有猪肉、肥皂、杀虫剂、印刷品、药品，以及共大内部用于促进生产的产品，如工具、炸药以及水泥。分校还会经营机械维修店与养蜂场。

个时期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广泛的智识项目作出贡献，符合将生产经验本身理解为合法的教育场所的理念。

因此，围绕学生交“白卷”的评价，标志着大学的进步派领导与传统派领导之间的冲突。在一次激烈的教职员会议上，曹副校长拿出白卷，把它们丢在桌子上，以此证明学生“不合格”。“我们这里不是农场、不是生产队，我们这里是大学！”他喊道，“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龙国正（郭振清饰）却不这么认为，“在这些白卷里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同学们的汗水，有贫下中农的几万斤粮食”，龙国正的结论是“学生做得好、做得对”，白卷成了一次罗夏墨渍测验，揭示了龙国正与曹仲和关于教育之最终目的上的对立认识。

《决裂》与其核心的白卷一样，是一部广受争议的作品，因为他对当时关于大学与学生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激进的重构。本文中，我认为劳动是晚期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中学生形象转变的关键场所，从五四时期戴着眼镜的城市知识分子转变为嵌于社会主义项目及其生产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主体。作为这一时期关于高等教育及其主体的最广泛的主流叙事之一，《决裂》对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教育与学生反抗的试验进行了改编，这部影片应当被理解为对于文革学生活动所引发的学生主体性危机的回应与调解。

电影中革命的农村大学生

1975 年《决裂》摄制时，一部大型电影的上映与今日的大型电影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准则。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拍摄的电影既不是有远见的大师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也不是消费型的商业娱乐产品。相反，电影是用来塑造并反映国家大众文化、捍卫国家政策，并展示社会主义文化和娱乐。[3]如此，《决裂》是庆祝共大这种新的国家教育文化的成功典范。这种文化是务实的，培养实用的技能，如畜牧业与农业生产，反对理论知识脱离实际应用的阶级政治，比如

---

[3] Laurence Coderre 在她关于 70 年代中期影片《反击》的文章中阐述了“宣传片”的接受背景。Laurence Coderre. 2000. ‘*Counterattack*: (Re)Contextualizing Propaganda.’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4, no. 3: 211–27. See also Tina Mai Chen. 2003. ‘Propagating the Propaganda Film: The Meaning of Film in CCP Writings, 1949–1965.’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 no. 2: 154–93.

只为得高分而考试。这种文化也是平等的，努力为农村学生提供与相对赋予的城市同龄人相同的高等教育机会。

《决裂》展示了中国新的国家教育文化，这源自广泛的对学生在社会再生产劳动中所扮演角色的重新思考。1958 年，人民公社正式成立时，其设计者意识到只有通过建立广泛的社会服务，促进所有潜在的农村劳动者的全面参与，才能实现更高的经济生产力。《红旗》的编辑在 1958 年一篇促进公社发展的文章中写道："农业社必须不但是生产的组织者，而且是生活的组织者。"[4]这将通过各项计划实现，旨在将农村中多有妇女承担的繁重家务劳动集体化，包括建立公社经营的公共食堂、缝纫组、幼儿园以及托儿所。[5]

教育也属于人民公社的职责范围，作为生活的组织者，他们的支持者认为，公社对农村教育的管理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异"的目标。[6]因此，人民公社不仅要负责建立托儿所与幼儿园，还包括小学、中学与技校，最后一类的学校还被期望进行科学研究。[7]因此，在已经配备

---

[4] "社论：欢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红旗》1958 年第 7 期：第 13—15 页。

[5] 关于农村公社的家务劳动，见 Elisabeth J. Croll. 1985.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Xianxian Gao. 1994.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0–97; Gail Hershatter.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y Ann Johnson. 2009.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specially pp. 157–77; and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具体到公共食堂，见 Chunfeng Li. 2016.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Large-Scal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Public Canteens in Hebei Province.' In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 edited by Thomas David DuBois and Li Huaiyin. Leiden: Brill, 115–32. 关于缝纫组与纺织劳动，见本书中艾约博的文章，或 Jacob Eyferth. 2015. 'Liberation from the Loom? Rural Women, Textile Work,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1–53.

[6] "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4 日。

[7] 关于教育和公社的更多信息，见 Joel Andreas.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4–90; Joshua Eisenman. 2018. *Red China's Green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见下页）

教育基础设施的城市地区之外，公社制度的设立有效地将教育融入生产劳动的范畴。

对许多农村社区来说，公社的教育责任意味着建立新学校，并教育那些以前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儿童。因此，大跃进时期（1958—1962）农村教育系统得到了广泛的扩展，尤其是小学与中学阶段。[8]以往，教育被视作城市富裕阶层的特权，而中国教育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农村的迅速扩展，与更广泛的将教育作为社会权利而非特权的重构相符合——这种转变在 20 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发生。[9]

自然，文化想象中对学生的描述也开始转变，从杨沫 1958 年小说《青春之歌》中所描绘的浪漫、戴着眼镜、身穿白袍的五四知识分子，转变为《决裂》理想中全面发展的农民知识分子。影片中的李金凤就是这种新学生的典范，她是一名共大的学生，带头连夜行动，拯救附近大队岌岌可危的水稻，王苏娅饰演的李金凤有着一颗火热的决心。李金凤是一位从贫困山区被招入共大的农民，根据文革时期实施的新的高等教育平权政策录取。这些政策允许大学通过政治推荐，招收工农兵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即使他们不具备传统的资格，如高中文凭等。[10]

与影片中其他农民学生的角色一样，李金凤也并非传统上的大学生。通过公社老代表的证词，观众了解到，李金凤在解放前是地主手底下的童工，整天挨打挨骂，后来又当了童养媳，从没吃过一顿饱饭。解放后，她所处的地区仍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mmun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81–85; Dongping Han. 2000.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Garland Publishing, especially pp. 23–38; Julia Kwong. 1980. *Chinese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relud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and Suzanne Pepper. 1996.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specially pp. 278–301. 关于科学研究与公社，见 Sigrid Schmalzer. 2016.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Se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178–300; Eisenman, *Red China's Green Revolution*, 81–85; and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23–28.

[9] 关于美国人对教育作为权力与商品的态度的历史，见 Alex Molnar. 2005. *School Commercialism: From Democratic Ideal to Market Commod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10]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68–72.

然贫困，当地没有正规学校，在为贫农开办的夜校中学习读写。共大的进步派新校长来她的农村招生时，李金凤用整齐的书法写下“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这句话，给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没有参加入学考试，也没有高中文凭，甚至没有任何文凭，但龙国正认为她的读写能力与劳动记录都堪称模范，当场就录取了她。[11]

李金凤与她在共大的工农兵同学代表了“学生”在多重主体位置上的重新概念化。这种转变通过李金凤、她在共大的同学以及龙国正在中国著名大学考察时遇见的大三男学生之间的对比中得到了清晰展示。与李金凤一样，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男大学生是农村普通家庭出身，但他将上大学视作个体社会流动的机会，而不是为了回家造福乡人。 这位学生的母亲来探望他时，龙国正看着学生一个接着一个拒绝母亲带来的手工礼物。他告诉他的母亲，“我现在是有知识的人!”，镜头向下移动，母亲打量着儿子内外的变化：戴着黑框眼镜的焦躁神情，带着纽扣的衬衫、夹着一支钢笔的口袋、系着皮带的长裤、脚上的黑色牛津鞋。每一件都是贫下中农无法负担的，象征着特权的知识分子身份。

村民儿子的时髦衣服不仅是他精英主义价值观的外在（physical）证据，也是腐化的社会关系的物质（material）体现。尽管这位村民的儿子实现了社会流动，但却不愿再回到家乡，从而是自己脱离了出生时的社会关系。他在大学期间所获得的知识将他转变为“学问=阶序”系统的产物。村民儿子成为大学生的经历说明了只为学习而学习的风险：这是一条在根本上具有毁灭性的道路，不仅阻碍劳动者的再生产，而且阻碍了社会主义新主体性的产生——即受教育劳动者的主体性。

相比之下，李金凤展现了受教育劳动者的美德。她除了农村背景以外，还是一位小女儿的母亲，她在入学时出现过一次，顽皮地扯着妈妈的衣服。对于大学的保守派管理人员来说，她的母亲身份并不适合上大学，她被录取后，教务主任忍不住讽刺了一句，“你打算抱着孩子来上学吗？”[12]尽管她的女儿只在银幕中出现了两次，但李金凤的母亲身份并不是偶然或是背景中的小细节。与传统大学的男大学生不同，李金凤积极扩展并重新定义了学生的社会身份，学

---

[11] 影片中将识字等同于正规教育，这与影片中先前的对话相呼应，角色使用“文化”来表示“识字”或“受过教育”。这种用法延续至今。

[12] 她不会，她会把女儿给婆婆带。

生是红色的，而非专家；是女性，而非男性；是劳动者，而非知识分子；是农村的，而非城市的。李金凤以其女儿的形式完成再生产，女儿的肉身体现了她在她的社区内增衍（generative）的社会关系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以及她的社会再生产能力。

通过描述打破传统模式的大学生，《决裂》展示了一个彻底不同的大学。与充当资产阶级利益的堡垒不同，电影中的共大，不需要富裕的、男性的、接受传统教育的或是来自城市的学生。相反，《决裂》将大学呈现为工人学生社会化的场所，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确保大学能够充分发挥其作为生产力与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培养箱的潜力。李金凤和她的同学表明，学生的身份不再是阶级或身份的标志，而是社会中多样化与多元化的主体位置。

白卷英雄

但是，李金凤通过她的劳动与行动，正如她轻松上了大学一样，重写了学生的身份。文革期间，大型故事片的产生与接受都被嵌入一种辨证法之中，在虚构叙事与近期历史之间进行协商，与今日描绘历史事件的电影类似。需要指出的是，用“白卷”一词形容李金凤及其同学下地除虫而不是参加考试的决定，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选择，试图将虚构的共大学生与现实生活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联系起来。

张铁生是插队在辽宁省白塔公社的知青，1973 年夏，他在县内高考中提交了一份空白试卷而成名。[13]他没有等待后果，而在试卷背面写下了解释：“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此外，张铁生认为考试并不能准确反映出谁更应该接受大学教育。尽管在白塔公社的劳动让他没有时间备考，但那是诚实的劳动，他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14]张铁生的行为引起了省级官员的注意，包括毛泽东的侄子、时任辽宁省委书

[13] 1976 年 10 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其他六名军方高层被逮捕后，张铁生被判处十五年监禁。近年来，他因作为沈阳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见 Chris Buckley．2014．‘Zhang Tiesheng: From Hero Under Mao to “Hero of Wealth”.’ *The New York Times*, 18 August; 李春平：“‘白卷英雄’张铁生大手笔坚持套现可达亿元”，《新京报》2017 年 1 月 4 日。

[14] 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1973 年 8 月 10 日。

记的毛远新。张铁生的言论首先刊登在《辽宁日报》的头版，然后登上全国各大媒体，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名人。

张铁生的空白答卷反映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对高中与大学传统入学标准的深深怀疑。随着他的考试失利被上升为对教育体制的批评，张铁生的异议具体化了体制的内在矛盾：国家的青年投身于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却因此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毫无疑问，李金凤在电影中的“白卷”优于张铁生的真实经历：张铁生没有学习，没有能力通过考试，而李金凤主动选择不参加考试——这种叙述的处理巧妙回避了农村学生是否有能力在考试中表现优异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相当令人担忧的问题。

张铁生并不是唯一“反潮流”的人，[15]他的异议也不是《决裂》的剧本中唯一描述的学生造反行为。文革初期，学生是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的群体，然而随着时间发展，学生出于义愤的造反行为成为媒体报道中频繁出现的亮点。值得注意的是，1974 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钟志民，要求下乡的请求，他是一位长征老兵的儿子。此前，他通过家庭关系被南京大学录取，但他拒绝接受这种“走后门”的方式，要求退学。

钟志民的故事影片中通过曹小妹（反派职业教育家曹仲和的女儿）这一角色得到呈现。她首次登场时，是一位在河边蹦蹦跳跳、哼着歌晒着衣服的活泼小女孩，但随着影片的展开，曹小妹天真无邪逐渐被她对父亲处理大学事务的惊愕所取代。当她的父亲为她“走后门”，安排去一所名牌大学时，她公开否认父亲的行为，并宣布她将留在共大，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农村进行革命。曹小妹的虚构叙事与现实中的钟志民相呼应，她完成了从无知、享有特权、不懂政治的知识分子女儿，转变为一个积极、成熟、开明、在山区中充分社会化的政治主体。曹小妹与李金凤从截然不同的方向“反潮流”，尽管她们的背景截然不同，但最终都走上了同一条红色道路。

---

[15] 江青等人称赞他是“反潮流英雄”——这个称号还适用于其他人，包括著名的学生造反派，还有钟志民与北京小学生黄帅。见杨浦：“反潮流精神赞：‘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1973 年 8 月 16 日；另见 Jonathan Unger.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9.

银幕上的学生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最为大胆的是，《决裂》将文化大革命搬上银幕，将现实生活中的无产阶级教育试验与学生造反的故事改编成叙事电影。但《决裂》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一时期学生运动引发的危机的回应。文革前夕，学生引出了一系列棘手的矛盾与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包括阶级、家庭背景、政治参与以及持续存在的城乡差距。安戈（Jonathan Unger）认为，到了 1966 年，学生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群体，他们之间所能获得的机会也被严格界定：干部子弟、工农子弟、中产阶级子弟以及坏成分子弟。[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后，很明显，教育资格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阶级分化的关键机制。因此，正如安舟（Joel Andreas）所述，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更是关于阶级本身的冲突。[17]

众所周知，学生是最早响应毛泽东关于文革号召的群体，他们的行动确立了一种超越国家组织机构界限的政治。通过与工厂工人、复员兵士以及行政机关人员结成联盟，学生建立了跨越既定社会与组织边界（例如学校和工作单位）的网络。[18]在对学校的叙述中，学生角色反映了学校所产生的不平等的同时，也反映了超越社会主义国家既定秩序的政治。[19]

《决裂》摄于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最后几年，背景设定在 1959 年的大跃进时期，通过人物对那个时期的风气及其政策的提及，以及诸如庆祝大跃进的横幅等场景，这一时间性得到了加强。[20]然而，我认为这部电影更应该理解为文革的电影展演——不仅体现在那个时期学生造反的历史行为，也体现在电影局对剧本的内部审查。在审查时，筹备组明确指出，要将影片的时间设定在教育政策由刘少奇等少数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的大跃进时期，编剧围绕剧本中主要人物的权威与叙事主体产生了连贯性的问题。筹备组认为，文革后不

---

[16]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109.

[17] Joel Andreas. 2002.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1: 463–519.

[18] See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130; also Yiching Wu.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 4.

[19] 蓝泽意（Fabio Lanza）在 2010 年出版的著作后记中阐述了学生行动主义超越国家限制的观点，*Behind the Gate: 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3–16.

[20] 例如，龙国正在影片开头回应唐宁“怎么来的这么快”时，开玩笑说“大跃进的速度嘛”。

再可能出现一人（唐副局长为例）决定社会变革的进程，相反，由于文革的发生才使得《决裂》中所展现的系统性基层革命成为可能，因此电影必须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筹备组总结道："如果不写文化大革命，不要拍电影"。[21]但由于共大成立于 1958 年，影片也不能完全以文革为背景。结果就是影片横跨了不同历史时期，通过 70 年代中期更新的政治话语，塑造 50 年代末的运动。[22]

在影片的最后一幕，李金凤被传唤接受公开批评。大会的核心就是"李金凤是不是个好学生"，曹仲和与钱秘书持否定态度，龙校长持肯定态度。然而，最终使得李金凤在群众面前接受审判的原因并不是她的"白卷"，而是她后来反对腐败的地委副专员及其心腹试图推行的公社私有化政策。由于拒绝遵从新政策，李金凤被指控煽动群众反对工作组，这也呼应了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的运动。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李金凤不是以大学生的身份，而是以公社成员的身份行动。因此，在影片的最后一幕，李金凤已经接受了大学教育、技能培训以及社会化的同时，没有牺牲她在生产性社会关系中的嵌入性。

然而，与历史上文革红卫兵学生挑战并打破定义他们的条件不同，《决裂》的叙事将学生重新带回被国家机构界定的社会主义道德世界。尽管李金凤的批评大会以群众对李金凤及大学的支持而告终，但腐败的副专员及其盟友仍然保持他们的领导职位，并借机关闭学校。当"青天"党委副书记唐宁乘坐轿车，带着毛泽东的一封信到来时，影片的矛盾才得以解决。毛泽东的信是写给共大的左翼学生的，他的支持既洗清了李金凤的罪名，由扭转了学校的关闭，"同志们，我完全同意你们的做法"，唐宁读着信——这段台词摘录自 1961 年 7 月 30 日毛泽东写给真正的共大校领导的信。[23]

《决裂》虽然创造了一个与历史上的文革交互的叙事，但两者在重要方面存在着差异：历史上的文革，国家的反应是排除学生在国家之外表达政治的可能性。影片结尾处毛泽东的来信宛如机械降神，重新将李金凤的意义纳入党的掌控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挽救李金凤的人与大学的好校长都是男性，使得包含李金凤的性别异议在内的结构重新成为一种父权制。通过对教育与生产完全

[21] "对影片《决裂》的意见"（1975 年），载于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下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难免：第 309 页。

[22] 翟狄："决裂纪事与分析"，《电影艺术》1993 年第 2 期：第 78 页。

[23] 1977 年 7 月下旬，这封信的全文在全国媒体上广泛刊登，John Cleverly 认为这是时任党主席华国锋的决定，见 Cleverly, *In the Lap of Tigers*, 117–19.

结合的描述，《决裂》通过学生劳动重新建构了社会主义主体性，将学生带回了一个由历史与政治决定的主体位置，使其致力于国家的发展主义项目。



影片末尾，党委副书记唐宁来到共大，宣读毛泽东的平反信



共大学生通宵灭虫



王苏娅饰李金凤，相虹饰曹小妹



龙校长参观资产阶级大学时遇见的“忘本”的大学生



曹小妹在批斗大会上揭露自己的父亲

1980

百花运动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中失去了残余的影响力，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解散，因为工人开始组建自己的组织。随后几年，全总在地区与行业的分支逐步重建，1978 年 10 月，北京召开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全总在党和国家准备开展宏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之际东山再起。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确定了全总未来几年的发展轨迹。从中国欠发达的假设出发，邓小平强调“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间有很大的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随着全总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工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们的不满被远在波兰所发生事态的回声激发。

波兰团结工会崛起的回声

珍妮·L·威尔逊（Jeanne L. WILSON）

1980 年夏，在工人的抗议中，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在波兰成立，这一事件基本上与中国大规模工人抗议浪潮同时间发生。据北京的外交消息人士透露，1980 年秋爆发了 20—30 次示威与罢工。[1]特别是，国内外媒体均报道了武汉与太原等工业城市爆发的大规模劳工骚乱，工人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建立自由工会的诉求。[2]这些劳工骚乱事件主要是出于经济诉求，反应了工人对生活物质条件的不满。然而，至少在一起案例中，要求建立独立工会的呼声与明确的政治诉求（而非经济诉求）同时出现。据《太原日报》报道，太原钢铁厂的“少数工人”自称是“世上最穷的工人”，要求“打破社会主义生锈的大门”，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结束独裁统治，推翻政治官僚体制。[3]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的领导层对整个共产主义——如今是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运动的传播潜力有着敏锐的洞察。正如毛泽东受到 1956 年匈牙利与波兰政治动荡的影响，发起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见本书中吉浦罗的文章），同样，他的继任者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指导下，试图在国内采取预防性措施应对波兰事件的演变。[4]中国共产党对波兰共产党统治的瓦解深感忧虑，并急于制定适当的战略，以使中国免受“波兰病毒”的影

---

[1] *The New York Times*, 14 April 1981, 3.

[2] 关于武汉罢工的讨论，见 *The Times*, 30 January 1981, 6; *The Guardian*, 30 January 1981, 8; AFP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ystem-China* [简称 *FBIS-CHI*], 20 February 1981, H1; AFP in *FBIS-CHI*, 29 January 1981, P1. 关于太原罢工的讨论，见 AFP in *FBIS-CHI*, 3 March 1981, R1; *The Times*, 5 March 1981, 8;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30 April 1981, A30. *FBIS* 是美国政府的开放资源出版物，主要面向中央情报局（CIA）及其他政府雇员，也供个人用户与图书馆订阅。*FBIS* 的“日报”（Daily Reports）是极其宝贵的信息来源，但 *FBIS* 于 1996 年停止出版。

[3] AFP in *FBIS-CHI*, 3 March 1981, R1; *The Times*, 5 March 1981, 8.

[4] 关于 1956 年匈牙利与波兰对中国政府政策影响的讨论，见 Richard Solomon. 1971. *Mao'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68–329.

响。本文将考察 1980 年至 1990 年中国领导层对波兰事件的反应，重点关注波兰事件对中国劳工政策的影响。从中国领导层的角度来看，波兰的情况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紧张局势加剧后的情况。

中国对团结工会的反应：1980—1981

1980 年波兰爆发劳工骚乱时，中国新闻界对最初的危机进行了详细而又审慎的报道，内容客观，并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进行评判。中国媒体对“团结工会”的出现多秉持同情的态度，将其描述为绝望的工人对严峻的政治与经济现实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然而，1980 年 11 月 25 日的一份内部文件表明，中国领导层认为波兰的情况相当严重。文件由某省省委宣传部发出，题为《背景参考资料第 17 号：再谈波兰事件》，表明这不是第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5]文中指出，导致波兰局势的三个主要原因：经济政策的错误；民众对党领导层腐败的不满；波兰国家受制于苏联而导致的自尊危机。

尽管文件指出，“波兰事件的意义与影响极其深远，远远超出波兰一国的范围”，作者避免了与中国的情况进行明确的类比。尽管如此，文中关于波兰民众对生活水平底下和消费品普遍短缺的讨论，还是暗示了人们将此与中国的情况进行直接比较，1980 年，国企员工的工资仍然低于 1956 年的水平。[6]此外，文件指出了波兰的政治问题——例如，党内的腐败和特权，缺乏民主机制来征求民众意见，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低下——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在文革后众所周知的弊端，并得到党内领导层中改革派的公开认可。言下之意，改革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也是防止“波兰病毒”传入中国的手段。部分中国高级官员的声明中明确指出，改革是防止中国出现波兰式局面的解药。例如，据报道，中共副主席李先念在 1981 年 7 月的一次谈话中将中国与波兰的情况进行比较，指出如果中国不能进行当前的经济调整，就有可能遇到同样的困境。[7]

---

[5] 转载自香港的期刊《七十年代》1981 年 4 月第 135 期：第 35—40 页，载于 *FBIS-CHI,* 16 April 1981, W1–10.

[6] Andrew G. Walder. 1984.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no. 1: 43.

[7] 《争鸣》1981 年 10 月 1 日第 10 期：第 26—29 页。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团结工会带来的挑战在工会政策的制定方面最为突出。1980 年，改革派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建议，旨在拯救工会脱离对党的盲目服从的糟粕。这些措施以最自由的面目出现，旨在重构权力关系，赋予工会的运作独立性，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同时避免陷入“经济主义”或“工团主义”的指责。正如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亲密（也比较自由化的）合作者廖盖隆在 1980 年 10 月提交给高级干部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已经清楚波兰发生的事态。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路线，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工人阶级难道不会反抗吗？因此，我们的工会和群众组织必须进行彻底改革。”[8]

然而，并非所有党的领导层都赞成这种观点。前文提到，1980 年秋爆发的罢工，以及工人建立独立工会的零星努力引起了不安，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有报道称对工会运作的不满情绪不再局限于普通工人，甚至扩展到公会领导层。例如，1980 年 8 月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劳工代表团的成员报告称，中国的劳工领导人对波兰工人的罢工“表示同情与高度关注”。[9]由于担心工会中更多的参与和民主，可能是社会不稳定的先兆，198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更保守的声音遏制了改革派的提案，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10]

波兰的幽灵：1982-1988

随着 1981 年 12 月 13 日波兰实施戒严令并任命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为波兰统一工人党（PUWP）的领导人，波兰的劳工骚乱与团结工会运动似乎被彻底粉碎。然而，中共领导层对波兰事件可能在中国境内引发的潜在波动仍保持高度敏感。

1982 年 1 月的一份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共在 1981 年 12 月底发布了一份供干部学习的内部文件，呼吁党内主要成员汲取波兰局势的“宝贵教训”，并分

---

[8]《七十年代》1981 年 3 月第 123 期，载于 *FBIS-CHI*, 15 March 1981, U11. 关于廖盖隆与邓小平关系的讨论，见 Andrew J. Nathan. 1989. ‘Chinese Democracy in 1989: Continuity and Chan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8.

找不到原文，由英语转译。——译者注。

[9] AFP in *FBIS-CHI*, 22 August 1980, H1.

[10] 尽管如此，李立三与赖若愚这两位 50 年代被清洗下台的工会主席，却在死后被平反，他们的政策至今都被视作正确的。

析具体原因。[11]波兰危机显然也是领导层决定从 1982 年的新宪法中删除保障“罢工自由”的条款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项实际措施，这一措施的意义不大，但中国领导人显然担心，也有理由担心，不满的工人会将宪法中的这一句话作为他们行动的合法性来源。值得一提的是，1980 年的一场运动中忽视了“罢工自由”，最终导致“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同年被废除，而“罢工自由”直到团结工会成立后才被针对。领导层对自治工会的敏感，工人及工会干部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也体现在 1983 年底，当时李先念在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训斥团结工会是“假工会主义”，并谴责中国境内同情莱赫·瓦文萨的人。[12]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试图维持对工会的集中垂直控制，阻止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之外建立横向联系。为此，全总于 1984 年颁布的规定明确指出，“跨国、跨地域、跨行业的群众活动应当尽可能加以制止。”[13]

到了 80 年代中期，中国越来越感受到，1984 年被寄予厚望的工业改革运动并未取得与农村改革相媲美的成绩。物价通胀爆发，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工资涨幅。1986 年 12 月与 1987 年 1 月的学生示威对改革政策提出了明确的挑战，要求加速改革和社会自由化。据报道，邓小平在 1986 年 12 月向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达了处理示威者的指示，指出：“如果情况恶化，我们将像波兰人那样实行军事管制。”[14]然而，胡耀邦对学生的处理方式未能让邓小平满意，于是抛弃了他的亲信。随之而来的是领导职位调整，李鹏取代赵紫阳成为总理，而赵紫阳则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这被证明只是暂时解决了领导层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日益加剧的裂痕。

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反映在劳工政策上。尽管早期的学生示威中，工人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旁观者，但到了 1987 年，中国逐渐出现了罢工和工业停工。此外，1988 年，中国经济改革运动的紧张局势恰逢波兰爆发的罢工，团结工会作为波兰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而重新崛起。尽管保守派的力量

[11] AFP, 11 January 1982, in *FBIS-CHI,* 13 January 1982, H1.

[12] 《中报》1984 年 2 月 20 日，第二版。李先念关于波兰的评论在会议正式记录中被略去。见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重要文件》，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年。

[13] *Xinhua,* 27 December 1984, in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China East Asia,* no. 83-008, 26 January 1985, 123. 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处 （*JPRS*）是美国政府的开源出版物。与 *FBIS* 类似，主要面对 CIA 的情报人员与其他政府官员。于 1995 年停止出版。

[14] 《镜报》1989 年 5 月 10 日第 142 期，载于 *FBIS-CHI,* 15 May 1989, 30.

增强了，但 198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策决定性地表明改革派取得了胜利。大会要求对工会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赋予工会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与更多的权力，目的是按照东欧改革的经验将工会塑造成一种利益集团。[15]胡耀邦的亲信朱厚泽突然被任命为全总的二号人物，全总副主席兼第一书记，这也加强了改革派的力量。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案例背后，中国决策者显然认为，全总内部促进民主化要比在外部尝试建立替代性机构要更为可取。

天安门抗议：1989

中国领导层对 1989 年 4 月 13 日胡耀邦去世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犹豫不决，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派系在适当应对方式上存在着瘫痪性的分歧。命运似乎注定了胡耀邦将在波兰团结工会合法化后的一周内去世——这一事件对中国领导层与中国公民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领导层十分敏感，担心学生与知识分子会寻求与工人建立波兰式的联盟，这一点体现在党内老干部陈云 1989 年 4 月末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得以体现。“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镇压学生运动否则，只会愈演愈烈，如果工人加入进来，后果将不堪设想。”[16]

事实上，随着五月逐渐过去，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示威活动（见本书中张跃然的文章）。试图动员示威者的宣讲者明确提到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后来也成了学生与工会在建立独立组织的典范。[17]最著名的工人组织是 1989 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声称有 3000 名工人会员。[18]随后，这一运动蔓延到中国其他城市。仅在五月末至六月处的几周内，北京、上海、长沙、杭州、合肥、呼和浩特、贵阳、济南、南昌、兰州、南京、西安与郑州等地都成立了自治工会。此外，在一些城市，还出现了多个自治工会。[19]尽管

---

[15] 《工人日報》1988 年 10 月 30 日，第一版。

[1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May 1989, in *FBIS-CHI*, 4 May 1989, 29.

没有原文，由英语转译。——译者注。

[17] 例如，见 AFP, 19 April 1989, in *FBIS-CHI*, 20 April 1989, 14.

[1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May 1989, in *FBIS-CHI*, 4 May 1989, 29.

[19] 可以确定在北京、上海、合肥与西安等城市中能找到多个自治工会的名称。例如合肥的合肥工人自治协会、合肥市工人联合会与合肥独立工人工会 *FBIS-CHI* 与 BBC 出版的《世界广播调查》（*Survey of World Broadcasts*）是关于中国特定自治工会信息的好来源，文中列出了 1989 年 6 月省级（见下页）

这些团体规模较小，缺乏组织性，成员以男性青年为主，但却对党和全总的立场构成了明显的挑战。工自联在《临时章程》中强调了自身意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治组织”，将主要职能之一定义为 "监督中国共产党的表现"。[20]

然而，独立工会的建立只是劳工队伍中不满情绪的一个表现。随着传统控制的不断瓦解，全总内部的干部越来越敢于提出他们反对领导层的立场。《工人日报》的记者是那些表示支持学生要求新闻自由的人之一。据报道，1989 年 4 月，《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赞扬胡耀邦的文章激怒了杨尚昆主席，他要求将文章作者撤职或关闭报纸。[21]即使在《人民日报》4 月 26 日发表社论谴责学生运动非法之后，全总的全国委员会以及湖南与上海的地方工会委员会发表声明，称赞学生运动，并呼吁共产党和国务院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22]全总甚至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赠了 10 万元人民币，用于绝食学生的医疗。[23]

尽管证据并不确凿，但 5 月 20 日，领导层下令戒严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中国工人日益激进的斗志与全总公开反抗的刺激。甚至在 6 月 4 日的天安门事件之前，工人遭受到的镇压比学生更严厉。上海逮捕四名工人时，一位记者注意到：“这些人就像学生说的那样，他们的罪行是因为他们是工人而非知识分子。”[24]在随后的镇压中，工人的监禁条件比学生或知识分子的监禁条件更严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差异似乎是由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优越的关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关系。然而，中国领导层对有组织的工业骚乱的潜在恐惧似乎也是某些对待工人的凶残行为的原因。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将全总的方向调整得更加保守，并清洗了那些被认为过于激进的工

广播禁止自治活动的情况，见 *SWB Far East* [简称 *SWB FE*] transcripts for 13–16 June, 19–21 June, 23–24 June, and 28 June 1989; and *FBIS-CHI*, 12–16 June, 27–28 June, and 31 July 1989.

[20] Asia Watch. 1990. *Punishment Seas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After Martial Law.* New York: Asia Watch, 39–40.

[21] 《镜报》1989 年 6 月 10 日第 143 期，载于 *FBIS-CHI*, 9 June 1989, 25. 根据这份报告，全总主席倪志福——普遍被认为是保守派而非改革派——为这篇文章进行辩护。

[22] *FBIS-CHI*, 22 May 1989, 80; *FBIS-CHI*, 25 May 1989, 55–56; and *FBIS-CHI*, 18 May 1989, 56.

[23] 见 *FBIS-CHI*, 18 May 1989, 76; 与 *FBIS-CHI*, 19 May 1989, 35. AFP 错误报道称全总向绝食抗议者捐款 20 万元的信息。*FBIS-CHI*, 18 May 1989, 36.

[24] *Hong Kong Standard*, 1 June 1989, in *FBIS-CHI*, 1 June 1989, 21. 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见 Andrew G. Walder. 1989.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35, no. 5: 32.

会领导成员（尤其是朱厚泽）。1989 年 7 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主席团第三次会议的主要信息，就是坚决维持中共对全总的领导地位。

波兰的教训

1980 年波兰爆发工人罢工时，中国领导层立即意识到这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重要性。与波兰类似，中国工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不满，并认为全总诗歌无用的机构，无法维护他们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理所当然地担心“波兰病毒”可能蔓延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工问题与波兰的劳工问题如出一辙，只是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的领导层一致认为，波兰的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示，但他们对此的处理政策有着不同的意见。改革派希望让工人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主要通过全总内部的改革来实现，而保守派担心更大的自由化将削弱中共的领导地位。事实上，波兰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局势演变表明了自由化与维持共产党控制之间取得平衡的困难。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运动引发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并因东欧与苏共国家的解体而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推移，保守派压倒了中共内部的改革派。1989 年的政治抗议活动使得中共领导层深感不安，他们经受过文革的创伤，首先担心的是政治不稳在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对波兰事件与波兰共产党领导层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评价。邓小平认为，统一工人党“过于软弱”。[25]此外，他指出，“波兰一退再退，他们让得越多，混乱就越大。”[26]邓小平与其他持相同看法同志从波兰事件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绝不能放弃党的控制。然而，与此同时，这个教训——至今仍然使用——不仅消除了工人独立组织的可能性，而且也使全总注定属于从属地位。

---

[2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April 1989, in *FBIS-CHI*, 28 April 1989, 10.

[2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May 1989, in *FBIS-CHI*, 31 May 1989, 36.

1981

历经三十年的集体耕作之后（见本书中 1962 年安戈的文章），20 世纪 80 年代初家庭耕作的回归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和劳动来说是灾难性的巨变。然而，这场巨变并非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1981 年是落实的农村数量最多的一年，但有些农村更早，有些则更晚。1980 年至 1983 年的四年时间内，中国的各省各县逐渐完成了从集体耕作到家庭耕作的转变。

放弃集体耕作及其对劳动力的影响

安戈（Jonathan UNGER）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许多中国农民感到沮丧。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毛泽东在北京的亲密追随者（如今被称为“四人帮”）推行的一系列失败的激进政策，农村生计改善的早期成果已经渐趋停滞。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许多农民认为拥有土地并与大约 15 至 40 个相邻家庭共同耕种土地，组成“生产队”，是有益的。我在 70 年代的香港采访了来自中国农村的移民，发现他们十分接受并支持生产队模式。大多数村民都喜欢作为生产队队员在生病或受伤时的经济保障。基层的集体所有制与集体劳动也提供了组织农民劳动的手段，他们会在淡季平整田地或改善灌溉系统，从而提高产量。这也使得他们能够以个人家庭无法承担的规模进行农业投资。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情况开始恶化。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激进新领导层的推动下，来自上层的政治命令迫使生产队将原本用于经济作物的田地转变为集中种植低价粮食作物。生产队被要求“自愿”无偿提供一些粮食来支持革命。农民被禁止在业余时间额外养猪养鸡，这使得他们失去了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随着一项又一项来自上级的强制措施颁布，农民为生产队中家庭的共同利益而劳动的意愿正在减弱。[1]

然而，农民并未放弃集体耕作，自行恢复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级的命令敦促他们这么做，可当时的报纸与期刊却描绘了一副不同的画面。正如他们在 50 年代错误地报道报道集体化那样，中国官方媒体似乎将放弃集体耕作描述为是一场自发的基层运动。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英文学术文章也在重复中国官方的说法。然而，中国农村的受访者反复表示，情况并

[1] 本文所引信息主要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初，在香港对来自中国约 40 个农村的农民进行的采访。此书探讨了探讨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一座典型农村中发生的事件，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2009.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 9.

非如此，他们被指示取消集体生产，实行家庭耕作。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对集体生产心灰意冷，乐意如此，但他们并非发起者。

最初的家庭耕作改革始于 1978—1979 年期间，安徽与贵州两个偏远贫困县的农民，那里的农民几乎无法维持温饱。他们的秘密行动得到了当地官员的默许，随后，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公开支持了这一做法。1980 年，万里被提拔到北京担任主管农业的部长。自此，中共中央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与万里，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农业政策的放松。但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倡家庭耕作，事实上，他们的意图也模棱两可。其中一项结果就是，各省领导必须思考该如何跟进政策。20 世纪 60 年代与 70 年代，由于和党的路线不一致，官员们屡遭清洗，他们观望着其他官员的行动。随着农村政策的逐步放松，他们便纷纷加入，下令将集体耕地划分给家庭独立耕种。[2]

随着各省接连采纳家庭耕作，1982—1983 年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增长，证明并巩固了新的耕作方式。因此，1983 年底，中国 97.8%的生产队将土地分配给家庭。[3]总体而言，最高层领导与省级并省级以下领导之间复杂而无计划的相互影响——前者对家庭耕作问题上犹豫不决，默许但不承诺；后者则面临着强大的隐性压力，必须通过接纳新的“改革”政策以表忠——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农业秩序。

根据 1983 年我在香港对来自中国 11 个省份的 28 名移民进行的采访，他们刚从家乡的农村返回，待的时间从一周到几个月不等，这种全国性的情境得到了证实。[4]我的样本中，28 座农村中的 26 座在 1982 年底前已被转变为家庭小农场，其中 24 名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农村中，这个决定完全是由村级以上的官员下达的。只有两座农村的生产队干部与农民采取主动，其中一座农村的干

---

[2] 关于国家与地区领导之间复杂决策的深入探讨，见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2016. *Paradoxes of Post-Mao Rural Reform: Initial Steps Toward a New Chinese Countryside, 1976–1981*. Abingdon, UK: Routledge.

[3]《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央当时出版社，1992 年：第 1390 页。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中国政治体系的一致性。同一组数据现实，截至 1984 年底，中国 99.1%的生产队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新制度。

[4] Jonathan Unger. 1985. ‘The Decollectiv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 Survey of Twenty-Eight Villages.’ *Pacific Affairs* 58, no. 4: 585–606. 28 名受访者来自广东省各地、安徽、福建、湖北、江苏、江西、山东与浙江，以及天津市郊区的一个农业区。

部与农民认为上头很快就会下达指示，于是抢先一步转为家庭小农场。[5]另一座农村位于安徽凤阳，这座贫困的县城在 1979 年成为中国首个农民秘密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土地的地方，并因此而闻名。[6]其余 26 座农村都在被动等待上级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事，而上级领导开始行动时，只有两座农村被告知他们可以自行选择他们喜欢的制度。其余 24 座农村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转变为完全相同的家庭小农制度中，被称作“包干到户”，每个家庭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无需支付租金，土地的数量严格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而定。土地仍是整个生产队的财产，但个体户可以使用分配给他们的大部分土地，种植他们想种的任何作物，并且自行销售这些作物。生产队员事实上已经转变为独立的小农户，尽管他们无权出售土地或是用于非农业用途。这一制度至今仍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中存在。

对生计与劳动力的直接影响

据我采访的 28 位受访者表示，拥有大量家属的家庭对家庭耕作的回归感到担忧，没有近亲的老年人、女性、体弱或患有慢性病的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同样如此。一位对集体耕作持同情态度的受访者表示，“以往他们的身体要是不好，可以做些轻点的活儿，也能领到工分，但现在他们就得负责整个耕作过程，那些繁重的活也得干。”然而，大多数身体健全的家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根据受访者的说法，在调查的农村中，约四分之三的家庭赞成解散集体耕作，其余则反对。

很快，一些反对的家庭也发现自己的状况改善了。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政府在解散集体耕作之前业已实施的政策。特别是政府在 1979—1980 年开始为大多数农产品提供更好的价格。因此，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至 1982 年底，农村人口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67%。[7]

---

[5] Jonathan Unger. 1986. ‘De-Collectivization in a Guangdong Village: An Interview.’ In *Policy Conflicts in Post-Mao China: A Documentary Survey with Analysis*, edited by John Burns and Stanley Rosen. Armonk, NY: M.E. Sharpe, 274–79.

[6] 我的信源就来自这座农村，他透露道：“我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我跟队长说，咱们队的运作不佳，就把地分给各家各户吧。1979 年初，我们自发地秘密这么做了。我留了两份账簿，一份报给上级部门，一份是真的。我做好了受罚的准备，但我觉得吧，村民都在挨饿，这么分配是合理的。”

[7] 这一数据根据通货膨胀因素而进行调整。*Beijing Review*, no. 20 (16 May 1983): 7.

1982 年后，农产品的价格继续上涨。许多家庭利用这一优势，提高劳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在集体耕作的最后几年，劳作的速度变慢，而现在，他们自己的家庭是唯一的受益者，农民有了干劲。有足够劳动力的家庭现在可以在一部分田地上种植快速生长并收获足够的粮食，利用剩余的土地种植劳动密集型的高价经济作物。许多人还抽出时间开始饲养大量生猪、家禽，以供市场销售，或是租赁村内的池塘养鱼，以供城市消费。1983 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了 14.7%——此时，所有的家庭都在从事家庭耕作——1984 年又以完全相同的百分比攀升：也就是说，两年内增长了约 30%。[8]

然而，不利的一面是，许多女性失去了作为独立收入者的地位。在此之前，她们整天与其他生产队员劳动，通常与其他女性一同劳动，并在小组中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赚取工分与应得的收成份额，为家庭贡献了急需的收入。这尤其改善了尚未结婚的女儿的处境。现在，引入家庭耕作后，他们在家长的指导下而非与其他的女性一起劳动，也不能把自己的收入带回家。在这些方面，农村女性的处境和个人地位下降了。

而回归家庭耕作意味着家中的闲暇劳动力从田地中解放出来，其中包括年轻的未婚女性。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是农村工业——仍由农村乡镇与农村公有经营——蓬勃发展的原因是比中国城市国营工厂便宜得多的劳动力。年轻的农村工人每天从家里骑车或步行去上班，从他们的个人工资中带回家中急需的现金，闲暇时间还能在自家的田里帮忙。一些年轻人很快开始在中国各地寻找工作机会。实施集体耕作时，他们没有迁移的许可，但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出行。如今，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已达两亿多人——这对农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将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讨论。

平等主义的遗产

以往集体耕作时期的经验使得农民习惯于一种共同的道德前提——每户家庭有权从土地上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生计。例如，生产队会一块土地分配给每家每户，他们可以种植蔬菜供自己食用。这些菜地的面积（自留地）随着家

---

[8] 1983 年的数据来自《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2 日，第一版；1984 年的官方数据来自 *Beijing Review*, no. 16 (22 April 1985): iv.

庭成员的增减而变化，每一次调整都使得生产队的人均菜地面积相等。此外，无法养活所有孩子的家庭每年能从生产队“借调”一份粮食配给供养他们年幼的孩子；孩子成年并加入生产队后，借给的粮食按成本从家庭的收入中扣除。村民已经习惯生产队为平衡家庭周期的调整，并支持在后集体使其继续进行这种调整，因为这符合他们家庭的长期利益。

他们很高兴，在 80 年代初，当所有的田地都移交给家庭独立耕种时，仍采用了以前适用于家庭小块菜地的人均土地面积相等的原则。中国各地，农民决定保留这一平等主义原则。由于田地仍是生产队内的所有家庭集体持有，他们可以随时调整使用权。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 21 世纪，每隔五年左右，他们会集体会面，重新调整生产队的田地。每次，通过孩子出生或结婚而扩大规模且面临土地短缺的家庭会获得更大的土地，而因死亡或女儿出嫁而缩小规模的家庭则会失去部分土地，从而实现人均土地占有量的平等。国家与政府反对这些土地调整，并于 1993 年和 1998 年通过法规，严厉禁止这种做法。但农民无视这些官方指令，至少会重新分配一次，或经常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他们会悄悄地讨论并投票决定是否要再次调整土地所有权。

2008 年年中，我参与设计的一份调查问卷收集了安徽省 57 个农村县中 476 个生产队（现被政府改称为村民小组）的大量信息。调查由安徽农业大学的学生实施，他们来自乡村。他们在 2008 年暑假回家的时候，从自己村中的，有时还有附近的“村民小组”中获得问卷的答案。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调查的 476 个村民小组中，约有 452 个——即 95%——自 1984 年以来至少重新分配过一次田地，以重新实现人均土地占有量的平等，而且大多数小组进行了多次调整。同年，安徽某县农村的 70 名教师使用同样的问卷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 91 个村民小组中，除一个小组外（98.7%）都重新分配过土地，自 1984 年以来，平均重新分配了 3.8 次土地。[9]

[9] Sherry Kong and Jonathan Unger. 2013. ‘Egalitarian Redistribution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China Through Community Consensus: Findings from Two Surveys.’ *The China Journal*, no. 69: 1–25.

中国农民工与其土地的关系

集体耕作解体后，几乎所有在中国其他地方找工作的年轻村民都是孤身前往，没有家人陪同，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设置了法律障碍，限制人口流动（见本书中海沃德的文章）。中国当局严格执行的户口，与南非政府在种族隔离时期使用的通行证制度类似，家人都不能陪同工人迁移。[10]中国的户口制度是毛泽东时代的遗留，当时政府用以隔离农民与城市居民，禁止他们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最早的户口制度要求农村居民留在自己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增长受到严格控制。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后毛泽东时代，同样的制度被用来利用农村地区庞大的廉价剩余劳动力从事新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同时强迫农民工的家人留在农村。这项政策为城市政府节省了大量资金，因为他们不必为农民工家庭提供城市医疗服务和学校教育。

大多数工厂倾向于雇用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被“更听话”（见本书中 1993 年陈佩华的文章）。她们通常会在 24 岁时被解雇，理由是年龄较大，无法承受快节奏的生产线工作。因此，大多数离开农村到城市找工作的年轻女性最终不得不离开工厂，回到家乡。男性通常在建筑业找到工作，并能继续工作到中年。耕作成了“女人干的活”，年轻的妻子与她们的婆婆以及年长的男性承担了大部分劳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年轻妻子离开农村，甚至是在刚刚分娩后，通常前往丈夫所在的城市，从事低端的血汗工厂或服务行业的工作。由于农作物价格下降，不这样做很难维持生计。她们通常把孩子留给祖父母照顾。随着中国的出口工业继续快速扩张，劳动力需求上升，年轻的未婚农村女性已经不足以填补，2003 年后，这种趋势加速了。工厂开始向年龄超过 20 岁包括男性在内的农民工开放。在农业发展较为贫困的地区，村中由祖父母及年幼儿女居住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年轻一代的成年人每年春节会回家团聚一周。但许多父母不愿意忍受与子女分离，随后几年内，一些人开始将年幼的子女带到他们工作的城市，有时还带上祖母来照顾孩子。

[10] Peter Alexander and Anita Chan. 2004. ‘Does China Have An Apartheid Pass Syste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0, no. 4: 609–29.

大部分的工厂与建筑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农民工发现他们经常要更换工作，或是因为过于疲累而回到农村从事农活。大多数农民工家庭都经历过这种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循环迁移，而他们的孩子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往往不能进入城市学校，这使得情况更加恶化。[11]

然而，其他家庭离开农村的时间太久，以至于似乎不会再回来了。因此，对于那些离开农村、长期没有亲自耕种土地而是将分配到的土地出租的家庭，是否应该在下一次土地重新分配时获得土地，这是一个问题。然而，根据在安徽的调查，76.5%的村民小组继续为已经离乡的家庭提供土地。他们意识到，对于这些农民工家庭而言，家乡有土地是一个十分有必要的安全网，由于中国正在实施的户口制度，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并不稳定。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有成为农民工的近亲，因此，许多农民家庭希望保留土地并作为退路。

值得注意的是，1995 年之后，土地重新分配的频率有所下降，一直持续到 2008 年的调查。我在安徽的调查数据显示，1996 年至 2008 年期间，只有 33% 的村民小组因人口原因重新分配土地。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工作，他们将部分收入汇给村里的亲戚，对耕种的依赖程度降低；另外，由于更多的劳动力在其他地方工作，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也降低了。这两个因素减少了对土地重新调整的需求。

过往十五年内，国家与地方政府逐渐放弃对家庭耕作的支持，在许多地区，将农业企业视作“现代化”的一部分。村民小组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被迫将所有土地租给大户或公司，有时租约长达几十年。[12]尽管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都保留了村民小组的家庭小农场，但在被农业企业接管的农村，许多家庭和农民工都失去了耕作的机会。他们的不稳定性正在继续恶化。

---

[11] Jonathan Unger and Kaxton Siu. 2019.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Across Four Decades: Shifts in Work Conditions, Urbanization, and Family Strategies.’ *Labor History* 60, no. 6: 765–78; Kaxton Siu and Jonathan Unger. 2020. ‘Work and Family Life Among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and Vietna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0, no. 3: 341–60.

[12] Qian F. Zhang and John A. Donaldson. 2008.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Rights.’ *The China Journal*, no. 60: 25–47; Shaohua Zhan. 2017. ‘*Hukou* Reform and Land Politics in China: Rise of a Tripartite Alliance.’ *The China Journal*, no. 78: 25–49.

1983

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决定允许部分外资进入中国，并同时允许私人企业家开办企业。为实现这一目标，1980 年，中国政府批准在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建立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尽管劳动力的流动性直到 80 年代中期仍受限制，但在这几处开办的公司仍然依靠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这些无法享受“铁饭碗”的福利的农民工在缺乏许多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从事临时性的雇佣劳动，希望通过赚取更高的工资，期望着能攒够钱回乡成家或者（可能的话）留在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年轻的农村女性——整整一代的“打工妹”。本文基于 1983 年首批在深圳经济特区办厂的日本三洋电机公司所招募的女工（“三洋妹”）的经验而写成，也是对那一代中国女性的衷心致敬。

打工妹：梦之城中的性别麻烦

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深圳是世界工厂，许多农民工涌入这座城市，希望找一份工作，能赚到足够的钱改善他们的生活与地位。男性被称为“打工仔”，而女性则被称为“打工妹”。在 1980 年建立经济特区时，这些男女都认为，“打工”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工作，为的是填补离家找工作与建立独立家庭之间的岁月，后者通常意味着回乡，但也有可能凭借运气和努力留在特区并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到了 21 世纪 10 年代末，在深圳，“打工者”一词已经指的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临时工，他们在深圳外围地区或惠州、东莞等二线城市生活和工作，除了离家从事毫无体面且难以晋升的低薪工作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生活选择。本文我将利用 1995 年以来的田野调查、对深圳的社会文化研究、城市地方志、报纸与统计报告，以及“打工文学”，来讨论深圳的打工妹在城市的出现与衰退以及在城市的性别道德地理中的作用，追踪诸如妻子与母亲、姐妹与妓女、女朋友和女老板等角色如何通过“小妹”的真实与想象的身体塑造迁移人口以及对深圳的归属感。

三洋妹：规范的迁移

> 我记得有次我在电梯里，一个前同事对我说：“你还是三洋妹吗？”当时，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还在三洋工作。可我会因为在那里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事实上，三洋妹能在特区的任何地方都找到工作。我们接受过最好的培训，是最认真负责的员工。——阿文，前三洋生产线女工 [1]

[1] 作者于 2019 年的采访。

深圳是著名的迁移城市，更是一座机遇之城。1979 年正式建市到 2019 年建市 40 周年，深圳的人口从约 30 万增长到非官方估计的 2000 万人。然而，居民很快就指出，人口数据掩盖了更多的事实，因为曾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来过，并离开这个中国最早且最大的经济特区。多年来，也许有三千万，甚至四千万人在深圳生活与工作——大抵如此罢，当地居民吃着点心、喝着普洱茶时随意地推测，计算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以十亿与万亿为单位的经济预计增长，因为（无论再怎么随意），似乎都不可能夸大深圳繁荣时期的规模和强度。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2 年发起“中国梦”运动之前，2004 年深圳成为中国首个无农村城市之前，1997 年回归加速深港两地社会与经济融合之前，1992 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会脱轨之前，1984 年，袁庚前往上海参与将改革开放政策推广到沿海城市的辩论之前。再之前，1979 年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随后于 1980 年设立经济特区，象征着摆脱毛泽东的收缩政策，转而要求“更多”：更多的家电、房屋、汽车乃至民主；更多的开明思想、工业、J-POP 偶像以及台湾歌曲。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他们确实做到了。

以第一代三洋妹为例，她们仍被视为改革开放成功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典范。从 1983 年到 80 年代末，三洋从广东各地的城镇招募女工。三洋是第一家在蛇口（宝安县的前海关，1979 年被打造成先锋工业区）投资的日本公司。三洋在生产电子元件的同时也生产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当时，整个广东省的城镇失业率都很高，省领导希望通过仅为有省内城市户口的工人提供深圳的正式工作机会以控制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代“三洋妹”面对在国际工厂工作的邀请而感到兴奋，有人甚至放弃了现有的工作，去蛇口碰碰运气。

获得三洋公司的聘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通过蛇口工业区的人力资源部向工人发出招聘，而蛇口的人力资源部则安排城市劳动部门进行数学、科学和语文的现场测试。之后会对身高 1.6 米以上拥有高中学历的女性进行面试。测试旨在选拔最聪明的申请者，而面试则侧重于普通话沟通、礼仪以及自我介绍能力。毕竟，三洋公司的招聘人员认为，这些年轻女性将作为中国的代表在改革开放时代第一批完全由外资经营的工厂之一内工作。

进入招聘程序是第一步，许多女性，尤其是身材较矮的申请者，会靠亲戚“开后门”以确保获得参加工作考试并接受招聘人员面试的机会。考试结束后

会进行评分，次日公布结果的同时公布面试名单。可能有多达 2000 人参加考试，但最终只有十分之一，有时甚至是二十分之一的人入选。被选中的一周后，当地的劳动局会安排大巴将七十至一百名的新员工送到蛇口。虽然新员工对前往工业园区感到兴奋，但大多数人失望地发现自己正穿行在稻田与荔枝园的土路上。她们离开了相对繁荣的城市与县城，却发现蛇口是个落后的农村。因此，大多数新员工没有留下来。一位前三洋公司的员工回忆说，和她一起来的同乡有七十人，但只有四、五个人留了下来。而另一个人回忆说，她的 105 名同乡中只有 5 人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新员工则被聘为合同工。蛇口工业区人力资源部安排将她们的档案从家乡转到蛇口。作为合同工，三洋妹享有住房补贴与医疗福利。相比之下，那些没把档案转到蛇口的公司员工则被当作临时工聘用。合同工与临时工之间存在着差别，只有合同工才有资格把户口转到蛇口，进而让她们有资格把子女送到当地学校读书，并能领到退休金。作为单身女性，三洋打工妹获得蛇口户口的机会很短暂。到了 80 年代末，三洋与深圳的许多制造商一样，开始雇佣临时的生产线工人，而不是为农民工提供包括将户口转到工业区的合同。80 年代接近尾声时，与第一代三洋妹不同，大多数农民工仍持有农村户口，这导致他们很难在深圳获得合法居住权，因为经济特区只承认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户口转移。这意味着农民工必须先将他们的农村户口转到家乡的县城，然后再将户口转到深圳：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可行。[2]此外，1990 年，蛇口被纳入经济特区之后，户口由市政府分配。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优先获得户口，这不仅因为人们认为男性是户主，还因为大多数提供户口迁移的管理职位与工作单位都给了男性。在实际情况中，这意味着妇女和儿童通常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家属获得深圳户口，这模糊了妇女作为工人的身份与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之间的区别。

罗丽莎（Lisa Rofel）对杭州丝绸女工的研究提供了见解，让我们明白三洋妹为什么会从自己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时光中获得自豪感。[3]她描述了家庭角色如何塑造了女工对革命的经验，认为女性劳动受尊重的一个关键因素不是工作

---

[2] Shuangshuang Tang and Pu Hao. 2018. ‘Floaters, Settlers, and Returnees: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Hukou Conversion of China’s Rural Migrants.’ *China Review* 18, no. 1: 11–34.

[3] Lisa Rofel.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1–95.

本身，而是工作的地点。1956 年丝绸业国有化之前，那些家庭中工作的妻子、母亲与女儿保留了她们的尊严。相比之下，在家庭之外从事相同工作的女性，则被视作可以提供性服务的“破鞋”。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被纳入国有化生产，使她们从外部重新定位到内部，肯定了她们的道德地位和尊严。同样，三洋妹从家乡乘坐受赞助的公车前往蛇口，也保护并肯定了她们在国家机器中的道德地位，甚至因为拥有蛇口户口，她们可以合法居住在经济特区。此外，正如杭州第一代工厂女工一样，三洋妹认为她们在蛇口工厂的工作比以前的工作要好。三洋的工厂是现代化的、整洁的，制服比传统工作单位的制服更具国际风格，工资也高得多，使得年轻女性能为她们的家庭作出贡献、还能购买化妆品与衣服、储蓄学费，或者开家小卖部。三洋还为工人提供相对宽敞的宿舍，一辆用于当地交通的自行车，以及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培训，使这些年轻女性获得了身体与职业上的流动性和独立性。

典型的外来者：打工妹的定位

> 在已取得“绿卡”的深圳人看来，我们打工者是很可敬又很可叹的一群。没有常住户口，没有住房，没有资本，没有固定单位，操着的口音南腔北调，散落于建筑工地、车间流水线、柜台和写字楼之间，为生计而流浪，在流浪中谋生。——安子，深圳作家[4]

20 世纪 80 年代，三洋妹与年轻的女性农民工，将工厂劳动想象为改变命运的途径。然而，尽管三洋公司的新员工为蛇口的打工妹开辟了一条规范的道路，但同时出现了第二条更不稳定的道路。

1984 年，年仅 17 岁的安子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一座农村迁移到深圳市区。她的家乡在山区，她写道，“这座建设中的城市弥漫着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给我这个乡下来的客家女孩的心头平添了几多希望”。[5]她于表姐所在的蔡屋围地区的一家私营工厂工作。公司的五层宿舍每层有 10 个 40 平方米的房间，每个房间放着 24 个床位。第一天晚上，安子的表姐给她送来了一桶水，因为淋浴间

---

[4] 安子：《青春一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年：第五章；在线链接：baogao-wenxue.xiusha.com/a/anzi/qcyz/index.html。

[5] 同上。

的排队人数太多了。第二天，安子被分配到一个由同属梅县的年轻男性管理的装配线上。工作时间是 12 个小时，任务是组装小型金属部件。安子没有说明这些部件的用途，但她提到，在几天内她的手便被机器打伤。通过呼吁注意制造业如何伤害打工妹的身体（尤其是手部），她的作品驳斥了一种常见的刻板印象，即年轻女性最适合从事装配工作，因为她们的手指了灵活。事实上，这种宣传与生活条件之间的对比矛盾是 80、90 年代深圳打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6]

作为一名临时工，安子曾写过打工妹在从工厂工作到体面生活的道路上所经历的困难。例如，在《罗湖的女孩》一文中，她介绍了罗玲，一个已经不再年轻到可以被浪漫吸引，只想结婚的人。[7]在工厂工作时，罗玲与潮汕人任洪辉勾搭上了，任洪辉被描述为是个很会做生意的人。两人搬到一起住。罗玲把她的积蓄和空闲时间用于帮助任洪辉在工厂附近开餐馆，预计一旦他赚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他们就会正式确定关系。然而，当餐厅成功后，罗玲意识到任洪辉对爱情并不忠诚。她未能说服任洪辉尊重他们之间的关系，于是罗玲决定止损，从罗湖搬到蛇口，最终在那里开设了属于自己的店铺。她从失败的爱情生意中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商人，她会过得更好，她开始捐款支持一个打工文学俱乐部。

安子于 1991 年发表这篇文章时，辛勤工作可以实现自我转变的观点在深圳已经是个公认的潜规则。[8]然而，文中深圳打工妹与男友同居的暗示，引起了深圳以外许多人的震惊，尽管对于那些在城市“暂居”的，容易受到经济与性剥削伤害的年轻女性而言，同居似乎是个比较体面的选择。深圳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港商在这里包二奶，夜总会设有私人包间，男人在里面与“三陪小姐”（陪吃、陪喝、陪玩）消磨时光，理发店也作为低端妓院经营。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是深圳的普遍观念。这两个“坏”都是指不正当的性关系。事实上，“局级干部打洞（高尔夫/阴道）、

---

[6] 张一文：“中国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以‘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为例”（2017 年），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论文。

[7] 安子：《青春一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第 98—102 页。

[8] Mary Ann O’Donnell. 2006. ‘The Ambiguous Possibilities of Social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Late Socialist Worlds, or, What the Fox Might Have Said About Inhabiting Shenzhen.’ *TDR: The Drama Review* 50, no. 4: 96–119.

处级干部打球（保龄球/乳房）、科级干部自摸（麻将/自慰）”，这三句双关语反映了经济特区不正当性行为的制度化。

经济特区之外，打工妹的道德地位进一步降低。1982 年至 1986 年修建的二线关将经济特区与 1981 年重建的宝安县隔开。在实践中，二线关作为一个内部边界运作。游客必须持有边防证才能进入经济特区，雇主则为合同工办理边防证。任何没有边防证的人进入经济特区都是非法的，并可能会被驱逐出境，这使得工人容易受到政策变化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然而，中国公民不需要边防证就能进入宝安。因此，组成深圳市的经济特区和宝安县作为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运作——一个是正式的城市，另一个是农村，为深圳这个“特区”提供政治、经济与社会上的特殊例外状态。[9]二线关以内，市政机构与指定的企业吞并了集体土地用以建设城市，二线关以外，乡镇企业和村镇企业蓬勃发展。事实上，深圳的第一份城市规划（1982 年与 1986 年）只考虑了经济特区。直到 1996 年，深圳才颁布了全面的综合规划。这种制度地理不仅呼应了罗丽莎在杭州发现的“内”“外”的主体，而且呼应了三洋妹从未婚农民工向体面女工转变的同时，也将“正常”家庭内外伴随的性别道德规范挪用到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

深圳作家吴君特别关注打工妹在二线关内外如何被调动，以标记、区分与分类女性身体。在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二区到六区》中，叙述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在老家拥有城市户口，她很高兴从中国北方来到宝安，在文化站工作，这是深圳市文化管理与生产的基层。到达后，叙述者发现，如果没有边防证，她无法进入经济特区，因为她的工作证仅针对宝安。[10]她感到孤立与寂寞，于是说服老板给她的老乡郭小佳提供一份工作。这两位女性首次重逢时，她们哭了，并一再感叹她们是多么想念对方。她们的情感重聚之后，叙述者注意到郭小佳的男友徐森林也来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因为叙述者的老板与她的朋友都认为她与徐有染。当叙述者与她的朋友断绝关系时，她的声誉已经受到

---

[9] Mary Ann O’Donnell, ,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2017. ‘Experiments, Exceptions, and Extensions.’ In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edited by 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9.

[10] 吴君：《二区到六区》（1995 年），中国作家网，在线链接：www.chinawriter.com.cn/xgzp/20-09/0909/7650.html。

不可挽回的损害。最终，叙述者不想再维持自己的体面，而选择和“小工头”（一个已婚的讲粤语的男人，不清楚是本地人还是香港人）勾搭在一起。他经常到叙述者的宿舍，给她买衣服和小礼物。一天晚上，醉醺醺、喋喋不休的徐路过宿舍，在那里他遇到了小工头。于是尴尬的一幕发生了。徐告诫小工头要对叙述者好一点，因为

> 她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大学毕业，在关外，在她工作的场所，被人当成鸡，没人敢娶她，也没有人把正经工作交给她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打杂的，只因为她是个北方人，说普通话。[11]

世界工厂中的性别麻烦

> 也许我教我的女儿自私一点会更好。——小徐，外来务工的年轻母亲[12]

潘毅观察到打工妹已经意识到辛勤工作并不能保证她们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她指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机器并未能摧毁父权制机器，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也未能做到，相反，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和谐共处，如齿轮般相互啮合。”[13]回顾来看，可以清楚发现，潘毅所观察到的生活次序——家乡到工厂再回到家乡——本身就是一条通往体面的规范路径。就算在深圳不是，至少返乡后是。许多在深圳的打工妹不仅能帮助父母建新房，还能资助兄弟结婚。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广东的客家与潮汕地区，年轻男性必须有套房，并提供彩礼才能结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姐妹们赚了很多钱，使兄弟们成为丈夫和父亲。反过来，偿还了娘家对她们的投资后，这些女儿又嫁出去，成为妻子和母亲，她们的嫁妆由同为打工妹丈夫的姐妹支付。

2018 年，蛇口三洋的前员工庆祝开厂三十五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早将蛇口开发为工业区的中国招商局提供了展览场地，三洋公司的前员工为该项目捐赠了超过 61000 元人民币以及展品，其中包括她们的制服、身份证、照

---

[11] 同上。

[12] 作者于 2019 年的采访。

[13]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84.

片与《蛇口三洋报告》的副本。[14]展览记录了三洋工作的员工如何促成合同工转变为深圳人，她们不仅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而且还成为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员。更重要的是，对于许多蛇口居民来说，三洋妹并不是真正的“打工妹”，尽管正如本文开头的引文所言，她们也是被深圳的性别化劳动制度的棱镜来看待的。蛇口早期的一位经理向我解释，三洋妹是高中毕业生，可以与北方的领导说普通话，并具有城市意识。他坚持认为，这就是她们能在蛇口轻松找到丈夫的原因。言下之意便是，“真正的”打工妹没有受过教育，普通话很差，仍是可悲的农村人，这不仅使得她们难以找到合适的丈夫，还使得他们来到深圳的原因遭到质疑。他的评论背后的潜台词是含蓄的，但很清晰：打工妹（相较于合法员工）更放荡。

三洋妹的规范路径突出了革命前的家庭内外的道德地理，以及国家机器内外的社会主义地理，不仅塑造了年轻女性如何成为打工妹，还决定了他们在深圳的性别道德地理中如何被感知以及与其对立。这种道德地理沿着内部性和外部性两个维度运作。内部性的第一个层面指的是国家机器的“内部”，作为官方企业的员工；第二个层面指的是经济特区的“内部”。经济特区的户口标志着一个年轻女性成功实现了这两种形式的内部性。在这种大背景下，婚姻与体面是一个人户口身份的原因或结果。例如，享有双重身份的三洋妹——既在国家机器内部又在经济特区内部——常出于感情原因而结婚，因为她们已经取得经济特区的户口。与此相反，正如安子所描述的，农村的打工妹身处经济特区之内，但没有深圳户口。她们在试图将经济流动性转变为体面的家庭时面临着制度上的障碍。许多人通过优先考虑其中一方面的融入来解决这个难题。一些人保持单身，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另一些人则为其兄弟的婚姻出资，然后返乡结婚。相比之下，在宝安的经济特区之外，即使是城市户口与政府文化站的工作，也不能保证单身女性的体面，更别说进入经济特区了。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二奶”往往是较为可取的选择，并且/或是避免因户口与工作场所处于经济特区“外部”而被怀疑放荡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今，第一代三洋妹已经成为体面的主妇和祖母。许多进入经济特区的第一代临时打工妹都有了小企业与家庭，另一些人则在自己的家乡组建了家庭。1990 年，宝安县被划分为宝安区与龙岗区，成为深圳最初的“外围区”。持有

---

[14] 罗沛：“说三道四：三洋情怀回顾——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 年）。

宝安或龙岗户口的未婚女工最终能够在 2003 年深圳放宽边防以及 2010 年解取消二线关之后，在经济特区内确立了地位。一些第一代打工妹尽管没有获得本地户口，但仍留在宝安和龙岗，继续找工厂的临时工作，最终在城中村建立了准合法的家庭。2009 年，当深圳的公立学校向“非本地”户口的孩子开放时，甚至有更多的女性留在城市里养家糊口。

今天，这些祖母体现了 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性别矛盾：她们的户口仍在深圳“外部”，但她们不能或不愿回到故乡。她们的孩子在深圳却不属于深圳，因为他们继承了父母的户口身份。然而，问题在于，“进城打工”已经成为年轻人不可避免的旅程，尤其是那些拥有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因此，许多自 2000 年以来移居深圳的未婚农村女工不再称呼自己为“打工妹”，而使用中性的“工友”一词。[15]“工友”强调的是个人作为工人与朋友的公共角色，意味着与打工妹——未婚的姐妹——不同的道德地理。打工妹的道德地理隐含地将年轻女性推回前革命的道德景观中，即在父亲或丈夫的家庭内部或外部工作，如果离开家找工作，则会受到性方面的怀疑。相比之下，同事与朋友的道德环境，即“工友”，为年轻的未婚女性提供了让她们能过上既独立又体面的生活空间。

[15] Chunsen Yu. 2018. ‘*Gongyou*,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in China?’ *Made in China Journal* 3, no. 2: 36–39.

1986

并非所有来自农村地区的妇女都能在中国经济特区新建立的工厂中找到工作。随着中国逐渐引入市场经济和促进消费的政策，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被根除的性工作（即官方用语中的“卖淫”）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心卷土重来。随着夜总会、桑拿房、酒店、发廊和卡拉 OK 等场所开始向顾客提供性服务，中国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规定对介绍他人从事性工作、为性工作提供场所、组织或强迫他人从事性工作者予以严惩。这一系列法规包括 1979 年的《刑法》、1986 年的《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7 年的《关于取缔卖淫和拘留性工作者劳动教养的规定》、1984 年的《刑法》以及 1991 年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本文将深入探讨改革时期中国性工作者的困境，强调中国政府采取的镇压政策不仅助长了暴力、剥削、虐待和健康风险，而且对公众健康造成了更普遍的可怕后果。

中国的性工作者：从定罪、虐待到行动主义

郑田田[1]

1979 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中国带入后毛泽东时代的一年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该法规定对介绍他人从事性工作、为性工作提供场所、组织或强迫他人从事性工作者进行从监禁到死刑的严厉处罚。自 1980 年《刑法》颁布以来，中国的公安部门一直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定期打击性工作，并对娱乐业进行警察突击检查。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隔离在农村，几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等国家政策，自以为成功根除了性工作。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和促进消费的政策放松了这些限制，大众城市的娱乐产业迅猛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农村地区人民的严重贫困和绝望，加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导致了约六百万性工作者的出现。性工作的复苏发生在夜总会、桑拿房、酒店、发廊、迪厅等舞厅、公园、录像厅和卡拉 OK 等场所。[2]在 21 世纪初，性工作者的平均月收入超过 6000 元，是无特殊劳动知识、教育或技能的人平均月收入的三倍。[3]

共产主义国家采取反卖淫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卖淫是对女性人权的侵犯，对她们身体的剥削，对她们地位的贬低。在官方的观点中，性工作使得女性沦为性对象、受辱的玩物以及可交换的商品，而不是一个有脸面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禁止性工作，女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才能提高。因为这种意识形

---

[1] 本文稍作修改的版本为 'The Plight of Sex Workers in China: From Criminalisation and Abuse to Activism' in *Made in China Journal* 4, no. 1: 86–91 (2019).

[2] Tiantian Zheng. 2009.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杰安迪："收容教育制度下, 中国性工作者权利失去保障",《纽约时报》2014 年 1 月 4 日，在线链接：cn.nytimes.com/china/20140104/c04laborcamps/。

态认为没有女性会自愿或心甘情愿地选择性工作，这侵犯了她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性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被迫从事的职业。人们将性工作者视作需要被解救、接受再教育，然后恢复正常生活的对象。

基于这一套理念，改革年代的中国政府延续了毛泽东主义废除性工作的政策，禁止性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拉客、贩卖、购买以及第三方介入性工作。为此，中国政府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 1979 年的第一部《刑法》、1986 年的《严禁买卖淫秽物品的规定》、1987 年的《关于取缔卖淫和拘留性工作者劳动教养的规定》。1984 年的《刑法》、1991 年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 年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92 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简称《妇女法》）、1997 年的《新刑法典》以及 1999 年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文件规定，禁止买卖性服务，介绍他人从事性工作、提供性工作场所、组织或强迫他人从事性工作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者有可能被判处五至十年的监禁，严重者可能被判处死刑。

自 1989 年以来，地方公安局一直通过全面、定期的“严打”行动执行这些法律法规。这些警察突击行动将性工作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抵触的“社会邪恶的东西”或“丑恶的社会现象”。警方的镇压行动通常一次持续三个月左右，而且往往一年发生一次以上。利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完善的技术，突击行动往往出人意料、突然而又没有事先通知。除了这些突击行动，便衣警察还伪装成顾客，以获取逮捕性工作者的证据。[4]

伊莱恩 · 杰弗里斯（Elaine Jeffreys）认为，这种打击行动成功纠正了“不断恶化”的社会秩序，这些突击行动之后，对性工作者的罚款和拘留是“软性”且“仁慈”的，建立了当地警察与资深性工作者的“友好”关系。[5]正如我将在本文中将要解释的那样，我以前的民族志田野调查与近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警察的突击不仅助长了暴力、剥削、虐待以及性工作者的健康风险，还加剧了公共卫生问题，以及艾滋病的传播。

---

[4] Zheng, *Red Lights*.

[5] Elaine Jeffreys. 2004. *China, Sex and Prostitution*. London: Routledge, 151, 157.

暴力、剥削与虐待

由于警察的突击行动以及对性工作的刑事定罪，性工作者一直生活在对逮捕的恐惧中，并且在遭遇暴力时无法寻求警察的保护。这些女性受到警察和男性顾客的摆布，他们认为可以对性工作者施加暴力和虐待而不受惩罚。由于公安机关拥有不经正当程序对性工作者进行罚款、逮捕和拘留的最终权力，警察经常滥用他们的权力，导致性工作者对当局的不信任与对立关系。

性工作者在法律上和社会上处于弱势，她们在工作的城市使用假名、假身份和假的家庭背景，这使得她们很容易成为强奸、暴力、抢劫、敲诈以及谋杀的受害者。2005 年发生的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中，深圳的两名男顾客不仅殴打并强奸两名性工作者，还用打火机烧伤了她们的乳房和阴道。他们将针头蘸上墨水，将“妓女一号”和“骚货”的字样纹在两名女性的额头、乳房和背部。[6] 从 2004 年到 2006 年，仅在北京就发现了六十多具性工作者的尸体，除非她们的家人报告失踪，才能得知她们的身份。[7]自 2007 年以来，每周至少会发生一至两起性工作者被强奸或谋杀的事件。[8]过去的十年中，北京未解决的谋杀案中有 40%的受害者为性工作者。[9]

警方的突击检查与刑事定罪不仅使得性工作者遭受男性顾客的暴力，警察也会对她们施加虐待。2010 年，广州东源的一次警察突击检查中，几名性工作者被赤脚游街并被拍照，公开羞辱她们。[10]在其他地方，性工作者报告称，她们遭到的警察残忍殴打，被迫与男顾客拍摄裸照。[11]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城市，一名记者目睹了警察拿着铁棍冲向街上的性工作者，殴打并辱骂她们。[12]接下来镇压行动的几个晚上，街上不时传来性工作者被警察虐待的刺耳尖叫声。一些警察在她们的头发与脸上喷上黑墨水或油漆，然后吹着口哨开车离开。一名

[6] 徐楠：“底层性工作者生存安全调查”，《南方周末》2012 年 5 月 28 日，在线链接： infzm.com/content/12031。

[7] 李云虹：“迟夙生，一位律师代表的‘法律眼’”，《法律与生活》2007 年第 4 期：第 34—36 页。

[8] 徐楠：“底层性工作者生存安全调查”。

[9] 李云虹：“迟夙生，一位律师代表的‘法律眼’”。

[10] 谢华兴：“东莞卖淫女遭绳牵示众”，《广州日报》2010 年 7 月 27 日，在线链接： news.qq.com/a/20100727/000395.htm.

[11] 杰安迪：“收容教育制度下，中国性工作者权利失去保障”。

[12] 徐楠：“底层性工作者生存安全调查”。

性工作者告诉记者，她的室友为了避免被警察殴打而逃跑，结果被一辆汽车撞倒，当场死亡。警方没有被追究这一事件的责任。[13]

由于警察有任意逮捕、罚款并拘留性工作者的权力，她们也被迫服从警察的性剥削。为了免于逮捕和罚款，一些性工作者成为警察官员的私人情妇并监视其他人。我以前的研究表明，当身着便衣的顾客透露自己是警察时，性工作者会感到恐惧。为了避免被逮捕与罚款，她们会顺从于警察的性要求与性剥削。

缺乏警察保护与法律救济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顾客的暴力，性工作者被迫寻求黑社会的保护，或与常客建立长期关系。为了换取黑帮的保护，性工作者必须提供免费的性服务。一些性工作者能够与常客建立亲密的关系，从而与他们达成某种契约关系。性工作者与常客住在租来的公寓，扮演夫妻生活，她们可以免受警察的突击检查、逮捕以及顾客的暴力。然而，不使用安全套是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因而性工作者无法避免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在内的性传播感染（STI）的风险。[14]

罚款和收容教育中心的滥用职权

警方的突击检查往往以严厉的罚款、逮捕和拘留性工作者而告终。事实上，“严打”运动已经成为警察官员敲诈性工作者与娱乐场所业主的一种手段。[15]在我亲身经历的卡拉 OK 的民族志田野调查中，警察逮捕了许多性工作者。[16]如果性工作者不想被送进收容教育中心被拘留长达两年，就需要缴纳高额的罚款。多年来，罚款一直是肆意规定的，最低达 5000 元（约 800 美元），而在一些特殊的敲诈案件中，可以高达 70000 元（约 10000 美元）。[17]一些娱乐场所的业主发现，有必要定期贿赂警察，可以避免或提前得知警察的突击搜查。

---

[13] 同上。

[14] Tiantian Zheng. 2009. *Ethnographies of Prostit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Relations, HIV/AID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15] Zheng, *Red Lights*; 萧尔：“权益团体促中国取消对性工作者的收容制度”，《BBC 中文网》2013 年 12 月 11 日，在线链接：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3/12/131211_china_justic-e_rights。

[16] Zheng, *Red Lights*.

[17] Lily Kuo：“性工作者仍被强制‘再教育’”，《青年参考》，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线链接：qnck.cyol.com/html/2013-12/18/nw.D110000qnck_20131218_3-27.htm。

每年有超过 28000 名性工作者被警方逮捕或被拘留在大约 200 个收容教育中心。[18]收容教育中心创立于 1991 年，由当地公安机关管理，关押性工作者的时间从六个月到两年不等，并提供“再教育”。被拘留在收容教育中心的性工作者往往被迫从事艰苦的劳动，每日工作多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没有任何报酬。[19]这种劳动包括生产玩具和一次性筷子等商品，其中一些用于出口。女性在晚上不允许使用厕所，工作时间上厕所需要申请许可，与家人交谈时被禁止使用方言。她们经常遭受身体上的虐待，例如严重的殴打。[20]她们还被要求支付收容教育中心为她们提供的所有费用，包括食物、定期 STI 检测、床单枕头、肥皂、毛巾与卫生纸等卫生用品。家属每次探访得支付每人 200 元的费用。平均而言，性工作者在中心拘留六个月的期间，需要花费 2400 元。[21]“收容教育”并没有教会这些女性任何东西，她们放出后通常会继续从事性工作。[22]

公共卫生官员的虐待行为

对性工作的刑事定罪导致了歧视性的公共卫生政策。性工作者被迫接受 HIV 检测，无论检测结果是否公开，都造成了对隐私的侵犯，她们还受到公共卫生官员的虐待。[23]在卫生部的许可下，疾控中心在未经性工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有时在她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艾滋检测。卫生官员与娱乐场所的业主建立关系后，疾控中心还对娱乐场所中的所有性工作者进行 HIV 检测。这种情况下，性工作者想要继续工作就得服从业主的命令。然而，测试结果要么公开，要么对性工作者本人隐瞒。[24]

---

[18] 萧尔：“权益团体促中国取消对性工作者的收容制度”。

[19] 杰安迪：“收容教育制度下，中国性工作者权利失去保障”；Lily Kuo：“性工作者仍被强制‘再教育’”。

[20] 狄雨霏：“中国法律界人士呼吁废除收容教育”，《纽约时报》2014 年 5 月 6 日，在线链接：cn.nytimes.com/china/20140506/c06petition/。

[21] 杰安迪：“收容教育制度下，中国性工作者权利失去保障”。

[22] 同上；Lily Kuo：“性工作者仍被强制‘再教育’”。

[23] Gray, *‘Swept Away’*.

[24] 同上。

性工作者报告称，她们在疾控中心遭到卫生官员的偏见、歧视和虐待。[25]她们害怕去疾控中心的诊所，因为卫生官员对待她们的态度很差，而且卫生官员和警察之间可能存在合作。由于官方公共卫生系统和性工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裂痕，性工作者的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她们还遭到羞辱，被剥夺隐私。

健康风险

警方的突击检查损害了性工作者的健康。除了上文提及的暴力与虐待之外，警方经常会没收安全套作为证据。在我的研究中，性工作者在被捕时会搜查安全套，如果存在就会将此作为足够的证据来进行指控。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两项中国法律：2006 年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安全套不得作为逮捕的证据；2012 年的国务院文件规定，公共场所应提供安全套。[26]警方的这种做法阻碍了性工作者携带或使用安全套，使得她们更容易受到与无保护性行为有关的健康风险，如意外怀孕和疾病传播。

警方的突击检查也迫使性工作者到隐秘或偏僻的地方从事活动。身处陌生的环境使她们感到无助，进而增加了顾客的暴力与拒绝使用避孕套的可能性。一些性工作者被迫躲藏起来，等待持续数月的严打行动结束。她们被迫停止活动并面临经济拮据的数个月后重返工作岗位时，有时为了获得即时的经济救济，性工作者有时会同意与顾客进行无保护性行为。

在我之前的研究中，性工作者采用了各种方法来减轻无保护性行为相关的风险，包括紧急避孕药、效果不佳的液体避孕套、清洁液以及在性爱前注射抗生素。[27]然而，这些手段的过度使用导致了长期的身体痛苦，如腹痛、呕吐、频繁怀孕和流产、感染与不孕。

如上文所述，性工作者通常避免向卫生官员寻求帮助，他们的态度糟糕，并且与警察有联系。[28]她们也倾向于远离大医院，除非需要进行大型手术或紧

---

[25] 同上。

[26] State Council. 2006.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2006 年 2 月 12 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线链接：gov.cn/ziliao/flfg/2006-02/12/content_186324.htm；国务院：《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2012 年 1 月 13 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线链接：gov.cn/zwg-k/2012-02/29/content_2079097.htm。

[27] Zheng, *Ethnographies of Prostit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28] Gray, *'Swept Away'*.

急治疗，她们担心高额的经济费用和潜在的逮捕。因此，她们经常从低质量、无执照、低成本的诊所寻求暂时缓解症状，这些诊所由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无资质医师管理。由于警察的突击检查，性工作者被排除在基本医疗服务之外，并面临着一系列的健康风险。

行动主义

近年来，中国关于性工作合法化与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呼声激增。从 2003 年到 2011 年，每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人大代表迟夙生都会提出性工作非罪化的建议。在她的提案中，迟夙生列举了性工作刑事化带来的问题，包括警察腐败、谋杀、虐待、高额罚款、惊人的艾滋病传播率以及社会歧视。她主张建立红灯区，登记性工作者，通过监管改善公共卫生问题并增加国家税收。然而，她的所有建议都被拒绝了。

2012 年，一些非政府组织（NGO）结成联盟，在网上公开了一份“终止暴力对待性工作者”的联署信。[29]信中列出的十二个联署团体包括北京佐佑中心、深圳夕颜、上海心生与天津信爱文化传播中心。其中一些组织是艾滋病与 LGBTQ 活动团体。信中列举了 218 起针对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暴力事件，包括 8 起谋杀案，信中对性工作者缺乏保护表示遗憾，并呼吁结束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的暴力、羞辱、歧视以及虐待。这些组织在中国较为边缘化，只有少数能够注册为公司。这些草根组织和国家在一种“有条件的共生”关系中运作，即这些组织的生存取决于它们能否使国家受益，这种情况限制了它们的活动。[30]

2006 年，活动家叶海燕创建红尘网，这是第一个为性工作者提供分享经验与交流信息平台的网站。[31]该网站在 2010 年被屏蔽。一年前，叶海燕组织了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激发民间社会的支持，向包括

---

[29] 作者有存档。

[30] Anthony Spires. 2011.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no. 1: 1–45.

[31] 谢菲：“性工作者叶海燕因倡议性工作合法化被捕”，《苦劳网》2010 年 8 月 12 日，在线链接：coolloud.org.tw/node/53745。

性工作者在内的各种边缘化女性提供援助，并提议将 8 月 3 日定为性工作者日。2010 年，她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志愿者在武汉的主要街道上举行活动，呼吁将性工作合法化。几天后，叶海燕被警察带走，进行了几天的“旅行”。[32]她的组织也被迫离开武汉，目前生存在广西省的一座偏远小镇。接下来的几年中，叶海燕多次被逮捕和拘留。

尽管中国政府在 2013 年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但这一改革并没有影响到性工作者。2014 年，100 多名律师、学者与退休的共产党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废除对性工作者的劳教制度。[33]其中宣布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和法治原则，并被送交全国人大。四年后的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也提议废除性工作者劳教体制。[34]这些进展表明，劳教体制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被废除。[35] 随着这一制度的废除，性工作去罪化的目标将可能实现。[36] 尽管这一制度目前在北京等大城市仍然非常活跃，但在某些地区，如安徽省，已经关闭了劳教所。[37]在这些地区，性工作者要么被拘留在警察局，要么接受罚款，但她们不再被送到收容教育中心。[38]

性工作的刑事化不仅导致暴力、虐待、污名化以及警察和顾客对性工作者的剥削，还忽视了导致女性从事这项工作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去罪化将意味着尊重性工作是一种合法的职业，保护工作者免受暴力侵害，确保她们能够获得基本的健康服务和司法正义，并促进公共健康。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由于性工作者与公共卫生官员合作，坚持使用安全套，在性工作去罪化的地区，艾滋

[32] 同上。

[33] 狄雨霏：“中国法律界人士呼吁废除收容教育”。

[34]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有望废除”，《彭湃》2018 年 12 月 25 日，在线链接：www.sohu.com/a/284371594_260616。

[35] 同上。

[36] 2020 年 4 月 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726 号国务院令，废止包括《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内的多个行政法规，标志着这一制度的正式废止。——译者注。

[37]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有望废除”。

[38] 同上。

病毒传播率更低。[39]中国公民社会日益高涨的行动主义体现了国际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精神，为性工作去罪化点燃了希望之灯。

[39] Susan Dewey, Tiantian Zheng, and Orchard Treena. 2016. *Sex Workers and Criminaliza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China: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in Exclusionary Regimes*. Berlin: Springer.

1988

1987 年，台湾结束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开始民主化转型。与此同时，工人也开始为他们的权益与更好的保障而斗争。本文回顾了自这一政治分水岭以来台湾劳工运动的发展轨迹。台湾的工人阶级是在威权工业化*（译按：可与何明修提出的发展型独裁概念相联系）*下形成的，工人在温顺和因袭的外表下采取了一系列隐蔽的抵抗策略。戒严令的结束解除了对罢工和示威的禁止，掀起了与政治反对派结盟的基层斗争的浪潮。20 世纪 90 年代，劳工运动采取了一种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利用反对党控制的国家立法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从而显著改善劳工保护的法律框架。本文最后讨论了自主劳工运动在新世纪面临的多重挑战。

解严与台湾自主劳工运动的崛起

何明修（Ming-sho HO）

1987 年 7 月，台湾结束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次年 2 月，解严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假期见证了台湾工人自发的罢工浪潮，他们要求提高年终奖金。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标志着台湾劳工运动的开始——当时的台湾已经历经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子女离开家乡前往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进程，这可以说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发展。

戒严时期的台湾缺少劳工行动主义的环境。除了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政府还禁止罢工、政党以及未经授权下十人以上的集会。将领负责管理抗议活动，必要时动用军警而非民警。虽然“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排斥”在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也很常见，[1]但台湾的情况特殊，因为执政的国民党在 60 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之前实施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来控制劳工，当时的台湾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成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国民党反思大陆时期的失败，在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中建立了党政机构——即党支部与忠诚的工会。[2]此外，通过采用国家法团主义的安排，国民党培养了一批亲政府的工会领导人，确保工人在决策过程中以政治上安全的方式得到代表。[3]有鉴于此，戒严时期的台湾直到 80 年代中期才出现了劳工抗议活动。然而，表面上冲突的缺乏不应被视作台湾工人阶级固有的温顺或因袭的结果。被剥夺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工人往往通过私人且个人化的策略解决他们的诉求，例如兼职、频繁流动、经营自己的小生意等等。

---

[1] Frederic C. Deyo.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Ming-sho Ho. 2014.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3] Ming-sho Ho. 2006. 'Challenging State Corporatism: The Politics of Taiwan's Labor Federation Movement in Taiwan.' *The China Journal*, no. 56: 107–27.

本文将探讨新生的劳工运动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迅速的崛起与衰落。笔者将从 1988 年春季罢工的一个片段开始，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工人在解严后的情况。

桃园客运罢工

自 1947 年以来，桃园汽车客运公司被授予桃园县（现在的桃园市）中某些线路的独家经营权。与许多地区性垄断企业一样，这家公司属于当地一个强大的国民党政治家族——吴氏家族。吴家在地方上还拥有金融与卫生部门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务都需要政府许可。虽然客运公司利润丰厚，但下属的 700 名公车司机却遭受虐待。他们每小时的加班费仅为 20 元新台币（约 0.7 美元），节假日工作时候每日仅有 100 元新台币（约 3.3 美元）的津贴。1987 年，尽管受到黑帮的人身威胁，公车司机还是组织了一个工会。随着农历新年临近，司机提出了三项要求：每月休息四天；节假日工作的每日津贴为 1000 新台币（33 美元）；公平分配年终奖金，他们知道公司在当年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经过几轮谈判，管理层只同意将假期工作的津贴提高到 300 新台币（10 美元）。公车司机对这一微薄的提议而感到羞辱，于是在 1988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开始，发起了前所未有的为期五天的罢工。

从技术上讲，这是一次野猫罢工，没有遵守官方停工的法律程序。许多公交车司机打卡上班，但没有按路线行驶，或是请病假。虽然最近解除戒严令后恢复了罢工权，但法律要求工会召开会员大会，至少一半的与会者投票赞成才能罢工，这一点几乎无法满足。一个排的武装军警故意在一个汽车站周围巡逻，以恐吓工人。第二天，当地政府援引《国家动员法》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公车司机返回工作岗位。这可不是轻松的威胁：根据战时法规，违反者可以被关入监狱，判处最长可达七年的监禁。

为何一起劳资纠纷会招致军方与政府如此高压的干预？桃园吴家的传人吴伯雄，时任内政部长，而曾任桃园客运公司总经理十多年的郑水枝，是 1987 年成立的最高的劳工问题行政机构——劳工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换句话说，新生劳工运动的行动者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财势网络，这种情况在台湾的大型企业中并不罕见。尽管如此，主要得益于司机曾茂兴的英勇领导，管理层同意

向司机支付额外的年终奖金，并承诺不惩罚参与罢工者。这次成功的罢工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公车司机的行动浪潮。

曾茂兴的生平在许多方面展现了台湾第一代劳工领袖的形象。曾茂兴生于1941 年一户贫穷的客家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不得不放弃学业。成为职业司机之前，他曾在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工作，并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项目中担任志愿者以赚取外快，获得了操作工程机械的经验和技能。1975 年，他第一次遇到了政治麻烦，当时蒋介石逝世，他拒绝佩戴悼念标志，最终导致他离开公司。部分因为这一事件，曾茂兴早在投身劳工运动之前，就是政治反对派的坚定支持者，他激烈批评国民党，同时公开支持台湾独立。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其他领域的政治变化为包括曾茂兴及其工友发起的运动在内的有组织的劳工活动奠定了基础。1984 年，《劳动基准法》颁布，这部法律的出台主要源自美国的压力，美国对台湾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增加贸易顺差的方式越来越感到不安。尽管这是首个关于工时、加班、最低工资与其他劳动保障措施的综合性法律，但《劳基法》并未立即改善基层工人的工作条件，因为政府和企业都不急于落实新规定。然而，法律承诺与工人实际获得的待遇之间的差距，为活动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话语工具，说服工人加入他们的运动。成功结束罢工后，曾茂兴发起了另一场运动，要求公司支付自 1984 年以来所有拖欠的加班费。

公车司机也得到了一些新成立的民间组织的支持。1984 年五一节前夕，《劳动基准法》的立法审查即将完成时，一群人权活动家和律师组成了台湾劳工法律支援协会。这个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组织是政治反对派的一部分，许多早期参与者后来成为了民进党的政治家。罢工期间，曾茂兴不断利用他们的法律咨询，协会成员还利用电影，记录了罢工的发展过程。除了反对派知识分子，曾茂兴还得到了由马赫俊神父（Neil Magill）指导的当地天主教劳工中心的支持。马赫俊来自一个拥有共和运动背景的爱尔兰家庭，最初在韩国工作，后来被政府驱逐出境。1984 年，马赫俊在桃园建立了一个外展中心，援助受困的工人，这为曾茂兴和他的工会同事提供了会议场所。

最后，桃园公车司机的罢工也象征着台湾工人的不满如何逐渐积累。尽管政党禁令仍在执行，但在 1986 年，民进党成立并获得了政府的默许。1992 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之前，一部分席位被保留给工人、农民、教师和其他职业群体。立法机构中功能代表的设计是国民党国家法团主义理想的一部分，正如预期的

那样，这些席位被执政党轻松赢得。1986 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一位国民党工会的现任委员意外败选，他的席位被一个不起眼的民进党候选人获得。由于工人团体的立法委员是由工人选出的，这一事件揭示了普遍存在的工人不满及其潜在的政治影响。

自主劳工运动的崛起

20 世纪 80 年代末，威权统治的结束带来了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作“自主劳工运动”。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党派或政治助理，事实上，正如曾茂兴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许多早期参与者都秉持反国民党的立场。对自主性的强调突出了挑战国民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建立的劳工控制体系的必要性。

第一波争斗是对公司一级工会的控制。通常，在国有企业与大型私营企业中，都有设立工会，但往往由国民党的干部或管理层控制。获得争取工会控制权，他们将持不同意见的工人联合起来参与工会选举，在选举中经常要与国民党支持的候选人竞争。例如，1988 年 3 月，桃园客运罢工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工人就选出了他们第一个非国民党的工会主席。新主席是民进党资深政治家康宁祥的弟弟。也就是说，国民党对现有工会的控制正在迅速瓦解。除了这些发展，那些没有工会代表的工厂也开始了组织运动。

台湾年轻的劳工运动的显著特征是与企业层面问题相关的基层倡议，例如加班、工时、工会代表等等。许多情况下，基层工人发起的抗议活动几乎没有外部援助。在这个时期，野猫罢工与停工是工人表达不满的常用武器。1988 年的五一节，一千多名铁路工人集体请假，导致各地铁路运输瘫痪。很快，新成立的激进工会开始在各个地区和行业建立更广泛的联盟。1988 年底，自主工联成立，曾茂兴当选首任主席。由于这些团体不寻求工会联合会的法律承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自由运作。

随着台湾的政治转型开放了更多的立法席位以供竞争，选举成为台湾自主劳工运动参与的另一个领域。已经参与劳工问题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作为劳工活动家并加入民进党的渠道。但也有一些劳工活动家拒绝民进党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选择成立新的政党，包括 1987 年的工党和 1989 年的劳动党。1989 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中，新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五个工人团体的席位。

最终，国民党获得了三个席位，民进党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次失败后，这两个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新政党变得不那么活跃。

对选举的关注也与执政党修订法律的努力有关。1988 年，政府提出《工会法》与《劳资争议处理法》的修正案，希望能遏制劳工运动的势头——尤其是考虑到企业界威胁要停止对台湾的投资。后来，官僚声称，1984 年的《劳动基准法》过于宽松，因此起草了一份拟议的修正案。鉴于这些举措，立法领域成为自主劳工运动的又一个战场。

简而言之，台湾战后的第一波劳工运动浪潮与其他民主化国家（如巴西、韩国和南非）所谓的社会运动型工会主义有许多共同特点。[4]与其他国家一样，台湾劳工的不满是在长期的威权统治下出现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明显，对劳工的剥削是政治统治的结果，而非相反。工会领导人愿意采取激进的行动来改善会员的工作条件，同时也认为自己视为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早期蓬勃发展的劳工抗议运动变得政治化和党派化是可以预见的。

基层激进主义的衰落

1992 年台湾举行首次全面的立法委员选举行之时，台湾工人阶级的激进精神似乎已经消耗殆尽。劳工运动仍在进行，但重点从工作场所的组织和罢工转向政策游说，后者只需要较少的基层参与。这种转变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国民党政府对基层激进主义采取了日益敌对的态度。1988 年 5 月，远东化纤公司的工人发起罢工，抗议一名工会领导人被解雇。防暴警察被派往打破封锁线，许多参与者后来面临刑事起诉。三个月后，苗栗客运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作为回应，政府通过调动邻近地区的公车与客运工人组织抵制，苗栗客运的工人罢工了三周，最终一无所获。

其次，雇主对劳工活动家的宽容度降低，迅速解雇了许多人。由于企业工会是台湾自主劳工运动的基石，他们的领导被撤职时，整座大厦就会坍塌。一

---

[4] Kim Moody.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Un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don: Verso Books; Seidman, Gay W.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些工会领导决定诉诸法律制度，可他们赢得漫长的诉讼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再欢迎他们或他们的活动的新劳动力群体。

曾茂兴这一阶段的人生轨迹，就是政商合谋打压工运的典型案例。1988 年初，领导桃园客运公司的成功罢工后，曾茂兴被解雇。1991 年，因参与远东化纤公司的罢工而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后，曾茂兴决定不上诉，从而成为解严时代首位被监禁的劳工运动领袖。直至 2007 年去世，曾茂兴都在通过领导自主工联积极参与劳工运动，但他始终无法获得新的全职工作，因而无法回归基层工会领导人的角色。

最后，台湾摆脱戒严与威权的政治转型发生在快速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半熟练的制造业工作被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随之而来的制造业劳动力萎缩使得台湾的劳工运动难以扩大。90 年代初数量上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工人难以组织工会。以男性为主的领导层并没能足够重视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女性服务业工人并不将工会作为解决她们不满的途径。随着台湾向知识型经济转型，高科技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在增加，但他们太不愿意加入工会，因为利润分享计划将他们与管理层紧密联系在一起。[5]

由于上述动态的交汇，解严所刺激的组织运动很快衰落了。根据官方统计，台湾的企业工会（当时被误称为“产业工会”）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增长，于 1989 年达到巅峰，拥有 1354 个工会和 70 万名会员。工会活动在此后的 20 年间持续下降。2000 年台湾最终选出一个非国民党政府时，能有活跃工会保障的工人已经成为少数，通常集中在国企、近期私有化的企业或大型私企。

短暂的觉醒

台湾自主劳工运动的兴起，代表了台湾工人阶级在长期沉寂之后的觉醒时刻。罢工浪潮使得政府和企业措手不及，并且能够确保工人获得更好的薪酬与保障。随着工人对自身的权益和待遇有了更多的认识，雇主再也不能违反劳动法而不承担后果。此外，由于威权主义根深蒂固，工作场所的斗争不仅是阶级

---

[5] Chien-ju Lin. 2014. ‘The Reconstructing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aiwan’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6, no. 2: 294–310.

政治的表现，也是民主化的关键战场。然而，基层的激进主义是短暂的，在解严后的几年之内，劳工活动家就发现自己无法扩大组织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劳工运动在台湾并没有消失。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台湾的渐进式民主化为劳工支持者打开了更多的参与领域，包括立法机构、法院、地方劳工行政机构与三方决策渠道。然而，尽管如此，在 80 年代往后数十年里劳工运动第焦点仍然十分狭隘，因为工会主要依靠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男性全职工。直到现在，性别平等、对移民工人的歧视、劳务派遣工人的困境以及青年贫困等问题都很少出现在台湾主流工会的议程上，而是被放置在工会以外的其他行动者所参与的各式各样具有争议的政治活动中。

1989

尽管改革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中国工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但由于福利制度初步解体，管理部门普遍腐败，加上通货膨胀，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1989 年 4 月，深受民众爱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的去世，催化了空气中弥漫着的不满情绪：为了表达他们的悲痛与不满，学生走出大学，一路游行并占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工人也渴望加入抗议活动，1989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中国的一些城市出现了独立工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过去的十年中，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试图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首先是在“企业民主管理”的框架内，然后通过一系列改革计划，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施，将会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工会奠定基础。现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已经失效。全总的一些部门支持学生，组织游行、请愿以及捐款。宣布戒严后，工人活动家首当其冲地遭到国家镇压，而全总的保守派则发起内部清洗，剥夺了工会中许多改革派干部的权力。为了理解 1989 年的重大事件，本文将探讨工人在抗议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塑造中国此后的政治格局。

天安门广场上的工人

张跃然

1989 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学生主导的印象。按照这种叙事，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希望推动中国共产党加速政治自由化，而这一进程在 80 年代只能间断地展开。这种叙事中如果提及工人，只会将他们作为补充的角色：在北京等大城市中，工人与工人阶级居民动员起来，以示支持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学生。

这种主流叙事掩盖了工人在运动中的能动性，工人不仅进行了大规模动员，还制定了独立的政治议程和战略前景，且与学生的所思所想并不一致。因此，了解工人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对于理解运动的轨迹和内部矛盾，以及运动如何塑造中国此后的政治格局至关重要。本文参考了已发表的学术研究等公开文件，特别是 90 年代初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龚小夏的一篇重要论文，[1] 以及我对运动参与者的访谈，试图从工人的角度探讨 1989 年的事件。

一场工人运动

1989 年 4 月 15 日，深受民众爱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内发起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工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就时事交换意见。4 月 20 日，警察镇压了中南海（中共领导层的居住地）前的学生静坐后，一些愤怒的工人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工自联）。根据魏昂德和龚小夏的说法，工自联的雏形甚至早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的建立。

---

[1] Andrew G. Walder and Xiaoxia Gong.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1–29.

然而，当时的工自联只是一个非正式、松散的网络，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也没有公开活动。成员之间几乎互不相识。四月，学生仍然是运动的前沿与核心。但 5 月 4 日之后，学生运动停滞不前，逐渐衰落。学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也对进一步升级运动犹豫不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到教室。面对这样的僵局，一群激进的学生计划进行绝食，以重新激发运动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绝食者实现了他们的目标。5 月 13 日，绝食的第一天，创纪录的 30 万人参与了示威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

绝食标志着运动的一次转折；尽管学生的热情暂时恢复，但运动不可避免地再次衰落，5 月 13 日之后，参与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人数逐渐减少。然而，学生的绝食抗议也标志着工人集体参与的开始。工人的热情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人数上，还表现在他们开始组织自己的集会与游行，展示自己的旗帜与口号。工人自此成为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许多工人决定参与，既是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同情，也是出于对中共漠视态度的义愤。我采访的一位工人告诉我，他决定参与，是因为“国家对学生太过分了。”[2]随着参与运动的工人数量激增，工自联开始进行公开宣传，并大规模招募成员。

5 月 20 日颁布的戒严令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参与。军队（大部分驻扎在北京周边）从四面八方向北京开进时，大量工人与工人阶级居民自发地走上北京郊区的街头，试图阻止军队行进。工人竖起路障，组成人墙。他们将水和食物带到士兵面前，与他们友好交流，劝说他们放弃武器，停止行进。根据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宣布戒严后的那晚，数百名普通的工人阶级居民走进一条小巷，拦下了大约 30 辆军用卡车。[3]这次行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参与者互不相识。他们紧张到不敢使用手电筒。走在黑暗中，拿着砖头自卫，不知道士兵会如何对待他们。幸运的是，他们发现士兵们没有携带武器，于是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且真挚的交流。

换句话说，是工人而非学生，直接面对国家最强大的镇压机器。工人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军队被阻止进入北京的核心区域长达两周之久。

---

[2] 于北京的采访，2017 年。

[3] 姚佳瓛. 2019. ‘:“从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端传媒》2019 年 6 月 3 日，在线链接：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03-hongkong-6430-hongkong-sun-li-yong/。

正如罗莎·卢森堡的著名论断，工人的激进意识产生于斗争过程本身。[4]而1989 年中国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在阻挠军队的斗争中，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发组织和行动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自我组织的浪潮。工自联的成员成倍增长，其他工人组织，在厂房内外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见本书中威尔逊的文章）。

工人组织的发展导致了行动的激进化。工人开始组织自卫武装的准民兵组织，如“纠察队”和“敢死队”，监视和广播军队的行踪。这些准民兵还负责维持公共秩序，以避免为军事干预提供任何借口。我采访的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军队受阻一周后，有十几支工人纠察队在木樨地以北的月坛和甘家口街道活动，6 月 3 日晚，那里发生了平民与军队之间最血腥的战斗。[5]另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几乎成了一个由工人自我管理的城市。[6]可以说，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可以让人想起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几个月里，彼得格勒的工人自发组织的苏维埃。

同时，北京的工人在街上搭建了更多的街垒与防御工事。在许多工厂，他们组织罢工和怠工。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五月底有传言称首都钢厂约 10 万名工人计划罢工，这让中共高层领导感到不安。[7]首都钢厂是当时北京最重要的工业工厂之一。如果钢厂工人罢工，一场更大的罢工潮势在必行。一些受访者的回忆与魏昂德和龚小夏均提到，一场可能的总罢工也被提上议程。[8]另一个在工人中广泛流传的传言是，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在筹备总罢工，这无疑使一些人更加大胆。[9]为了应对这种可能，许多工人开始在工厂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大多是非正式的，工人在各自的工作场

---

[4] Rosa Luxemburg. 1906.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London: Merlin Press, available online at: 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06/mass-strike.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文马库在线链接：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6.htm。——译者注。

[5] 于北京的采访，2017 年。

[6] 同上。

[7] 李鹏：《李鹏六四日记》，El Monte, CA: West Point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8] Shaoguang Wang. 1992.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the Chinese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test Movement of 1989.’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3: 163–97.

[9] Maurice Meisner.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所中互相交流同事的情绪，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发生过罢工和怠工的工厂。然而，目前还不清楚工人是否采取了任何协调行动，明确制定总罢工计划。

自我武装、自我组织和罢工，与游行、集会和占领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后三者是自我表达的行为，而前三者需要牢固地在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管理方面建立权力。激进主义不在工人所宣扬的话语中，而在他们的行为中。这就是运动在五月末六月初的状况：学生的热情下降、参与减少，在不断的内讧中挣扎，但工人通过自我组织和自我动员，愈发强大且激进。

我们无法确定，中共领导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命令军队进入北京并镇压运动。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中共领导层恐惧的是迅速发展并激进化的工人运动。这与工人在大屠杀期间及之后遭受的镇压比学生要严厉得多的事实是一致的。[10]事实上，在 6 月 3 日晚的最后镇压中，工人与军队进行了一场极其英勇的斗争。历史学家吴仁华提供了以下描述：

> 那一晚，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有一支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学生]协同执行维护秩序的任务。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打响血腥镇压的枪声之后，这些工人纠察队员们随即一批批地奔赴最危险、最前线的西长安街一带。
>
> 大约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点钟左右，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工人纠察队的唯一的生存者，与他同行的工人弟兄们都英勇地牺牲了……。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仅存的两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跟着这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起冲向西长安街一带。
>
> 她们俩那么年轻，又是女性，让她俩去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让人觉得太过残忍，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我和在场的几位特别纠察队队员流着泪苦苦地劝阻她俩，坚决不放她俩前行：“求求你们俩，别去了！千万别去了！我们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她们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同行的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

[10] Maurice Meisner.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着那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11]

何种民主？

是什么样的不满驱使工人参与 1989 年的事件？一些左翼观点指出，80 年代末的价格闯关和猖獗的通货膨胀引起了普遍不满。[12]这些说法并没有错，但并没有说明全部的情况。事实上，支关注经济不满和物质困难，使得这种观点带有稍微居高临下的假设——工人对民主和其他政治诉求不感兴趣。

事实上，运动的过程中，工人确实表达了他们所向往的民主愿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愿景源于工人在车间内缺乏民主的亲身经验。80 年代对城市工人生活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价格闯关，而是国有工厂内管理人员权力的大幅扩张——始于 1978 年某些地方的试点，1984 年以“增强企业自主权”的名义发展成为成熟的全国性改革。管理人员获得了几乎不受反对的权力，可以随意分配生产资料，从而加强了城市工作场所的一长制，事实上形成了私有制。

随着改开初期中国负责确保工作场所民主的机构，职工代表大会被系统性地削弱并取消，工人失去了对工厂有限的决策权，直接经历了生产环节中管理人员的专制。[13]这种专制表现在琐碎之事上，例如对上厕所与病假的规定，以及一些重要之事，例如工作分配与晋升相关的决定。我采访的几个工人回忆道，他们在 80 年代末最令人恼火的是，工作场所的上级并不尊重他们。[14]

工人感到被压迫、虐待、剥夺尊严，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权力不平等，他们渴望在工作场所首先实现民主。根据魏昂德和龚小夏对工自联小册子的分析，工自联的民主愿景与对中国官方工会系统的尖锐批评交织在一起，因为这个系统并没能真正代表工人，他们希望争取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监督管理人员，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

[11]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2007 年。在线链接：bannedbook.org/resources/file/1786。

[12] 相关讨论，例如见 The Chuang Collective. 2019. *Red Dust*. *Chuang Journal* no. 2, available online at: chuangcn.org/journal/two/red-dust/iron-to-rust/.

[13] Joel Andreas.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于北京的采访，2017 和 2018 年。

因此，这并不让人意外，许多工人不满于他们的经济状况而产生了明确的政治理解。同样，正如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所示，工人运动中的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例如，工自联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将价格上涨归因于缺乏民主："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官僚"促成了一批官僚分子，他们把控国内外商品的物价，故意抬高价格，为自己的囤积和牟利留下空间。[15]因此，消除通货膨胀与不平等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推翻官僚体制，将控制商品生产与流通的权力归还工人。在阐述这一民主理想时，一些工人借鉴了文化大革命中颂扬普通群众自我解放潜力的言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运动中某些文革的符号与口号的突出地位。[16]

工人所定义的民主意味着将官僚体系替换为工人的自我管理，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建立民主独立的工作场所组织。这种民主的愿景显然具有阶级性，因为它以工人阶级的能动性为前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所表达的民主理想，包含了一套被认为是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尽管学生们也对腐败和官倒深感不满，但他们的不满指向的是一个抽象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概念，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工人普遍持有的观点——应当先在生产过程的工作场所中建立民主。

学生与工人的脱节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与工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他们有着不同的参与轨迹与民主概念。学生不断地试图将工人排除在外，将运动视为"他们自己的"运动，并试图保持 "纯洁性"。魏昂德和龚小夏指出，直到 5 月末，学生都坚决不允许工人组织进入天安门广场。学生对与工人沟通或协调没有兴趣，尤其是对建筑工人组成的组织，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民。历史学家莫里斯 · 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汉名马思乐）甚至认为，"运动最初的几周，学生游行时常常是手挽手前进，就是为了防止工人与其他市民混入游行

[15] 工自联:《告全市人民书》，1989 年；以及《紧急动员起来，攻克八十年代的巴士底狱》。

[16] Craig Calhoun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1999. 'Legacies of Radicalism: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of 1989.' *Thesis Eleven,* no. 57: 33–52.

中。”[17]一位参与运动的学生还回忆道，学生非常注意确保香港支持者捐赠的后勤物资归他们自己所有，而不是分给工人。

许多工人因为学生的排斥而开始对他们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学生自视甚高，不尊重工人，擅长说大话而不是实际行动。最让工人震惊的是，他们深恶痛绝的官僚精英主义的痕迹开始在学生组织中出现。我的受访者讲述了他们对学生领袖迷恋“总指挥 ”“主席”等官方头衔，以及他们内部为权力、地位和特权的争夺感到十分厌恶。[18]相比之下，正如魏昂德和龚小夏指出的那样，工自联和其他工人组织在结构上更加平等，个人领导的作用要小得多。

与此同时，工人和学生在战略上也存在分歧。从一开始，学生就采取了向党请愿的姿态，试图说服党的领导层作出让步。为了赢得党的信任，学生在游行时甚至打出了“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相比之下，相当一部分具有发言权与有组织的工人更加敌视共产党，主张采取起义的策略。工自联的传单总是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压迫者。

5 月，中共最高领导层对如何处理这场运动出现分歧时，一些学生倾向于和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所领导的“温和派”合作，反对由李鹏和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领导的“强硬派”。对于学生来说，中共领导层的派系之争为运动提供了杠杆，这也是为何他们坚决反对工人的总罢工号召，正如我采访的一位工人所述，他们将这种举措称作“煽动混乱”。[19]

然而，学生的策略对于工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一个典型的独裁官僚，他在 80 年代的改开中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家族赚取了数百万的财富。他们认为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没有区别。工自联认为，如果运动寻求与党内官僚的合作，结果只有一个：运动最终会被党内官僚所利用，用于推动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邓小平那样利用 1976 年的“四五”运动加强他的权力。[20]工自联认为，运动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自我组织和自我武装获得力量，直到推翻党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他们的传单提及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他们呼吁群众“攻克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21]

---

[17]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18] 于北京的采访，2017 和 2018 年。

[19] 于北京的采访， 2018 年。

[20] 工自联:《告全市人民书》，1989 年。

[21] 工自联:《紧急动员起来，攻克八十年代的巴士底狱》。

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1989 年发生的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两场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虽然在时间和地点上有所重叠，也有一定联系，但并没有合为一体。学生和工人之间缺乏信任，沟通不足，几乎没有战略协调，只有非常薄弱的相互团结的意识。

八九之后

运动期间学生与工人的脱节预示着他们之后迥异的命运。1989 年之后，党对学生与工人所采取的不同做法显而易见：学生除了少数领导人之外，都被释放，而工人则遭受了更广泛的暴力起诉。[22]这种分歧在 90 年代仍然明显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改革的迅猛推进为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毕业于顶尖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遇。一些中国观察家指出，通过市场化的高潮，许多参加 1989 年运动的学生转变为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在支持中共政权的方面拥有切身利益。[23]某种意义上，90 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中共吸收拉拢 1989 年参与运动的那代学生的一种方式。我曾与几十位 80 年代末就读于北京顶尖大学的人交谈过，他们几乎都参加了那场运动。如今，作为北京的中产阶级居民，他们认为“政治稳定压倒一切”。回顾自己在 1989 年的经历，都觉得自己太天真、被操纵了。

90 年代的经济改革使得知识分子和学生获利颇多，但却几乎完全摧毁了城市工人阶级。随着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重组、裁员以及私有化，工人失去了工作，或是面临更糟糕的工作条件以及微薄的福利与保障（见本书中赫斯特、李静君的文章）。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波产业结构重组是由于经济因素，但如果我们将 1989 年的情况纳入考量，政治因素似乎也发挥了作用。正如 1989 年所展示的那样，城市工人的力量与激进主义使党的领导层感到震惊，促使他们下定决心瓦解城市工人阶级。

[22]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Sheehan, Jackie.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3] 例如，见黄小雀：“房地产市场化的资本运动与疯癫”，2019 年 4 月 18 日，在线链接：matters.town/@tootopia/5495-风雨云-房地产市场化的资本运动与疯癫-zdpuAquPVZ4kJobhZ9Y4Mh7-Y4AyJXdtvoqNuxn5ZRAV48YJpQ。

自 1989 年以来，蜕变为中国新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城市工人阶级之间截然不同的命运，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征。时至今日，这种基于阶级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作为 1989 年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对维持中共政权仍然至关重要。

1993

1993 年，深圳一家小型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火灾，夺走了 87 名农民工的生命，其中的大部分，是年轻女性。在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早期，对于涌入深圳谋生的农民工所经受的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可怕的生活条件，人们知之甚少。在废墟中发现的几十封遇难者的私人信件为她们的困境提供了证据；例如，这些信件的作者抱怨说，她们经常挨饿。香港的非政府劳工组织（NGO）公布了这一悲惨事件，并发起了一场有效的国际运动，将发达国家的大品牌玩具公司与其在亚洲的供应商工厂内发生的剥削联系起来。这不仅使国际玩具业承认了由香港非政府劳工组织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且也使国际社会在当地和国际层面上对中国工厂的劳动条件进行了更多的审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和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同行在揭露跨国公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向供应商施加压力，以改善工作条件。

致丽火灾中的声音：玩具厂内的悲剧及其所揭露的状况

陈佩华（Anita CHAN）

我现在葵冲（葵涌）丰年制品厂，这个厂比日本伞厂好点，一天上班是12 个小时。要是这厂收人，我给你去（信）。

引自被烧毁的致丽玩具厂的废墟中发现的一封信

1993 年 11 月 19 日，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7 名工人丧生。她们的死亡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公愤，致丽火灾从此被等同于 1911 年 3 月纽约市三角内衣工厂火灾，这场悲剧夺走了 146 名年轻移民工人的生命。那场火灾标志着美国劳动法改革的分水岭，至今仍每年举办纪念活动。[1]尽管致丽火灾对政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揭露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以及使他们陷入奴隶般工作条件的机制。

经济与社会背景

1980 年，中国在深圳设立首个经济特区，当时的深圳只是一个与香港接壤的小城市（见本书中马立安的文章）。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缺乏全球贸易的经验，经济特区引入了一种被称作“三来一补”新型制造模式。外国投资者，主要是全球生产链中西方公司的亚洲供应商，被邀请建立或租赁工厂，生产出口产品。投资者运来原材料和机器，采用他们自己的外国技术和产品设计，而中国负责提供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亟需外汇，因此，外国资本与深圳

---

[1] Patricia Lanier Pence, Paula Phillips Carson, Kerry D. Carson, J. Brooke Hamilton III, and Betty Birkenmeier. 2003. ‘And All Who Jumped Died: The 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 Fire.’ *Management Decision* 41, no. 1: 407–21, available online at: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00251740310468135/full/html.

当地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失衡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投资者被允许将工资压低到温饱线之下的水平。

当时的香港是全球主要的服装与玩具生产中心之一，因此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企业率先涌入深圳经济特区，利用比香港低十倍的工资优势。[2]深圳的中国农村迅速建起不符合标准的厂房，以容纳新的投资浪潮。随着越来越多来自香港以及后来的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工厂迁至经济特区，当地的劳动力供应变得不足。80 年代末，在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作的深圳本地人通过出租房屋以及为投资者提供服务获得了足够的收入，他们不再愿意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恶劣条件下工作。因此，大量来自内陆省份贫困农村的年轻人，急于摆脱农村的贫困，他们来到深圳，以填补劳动力的短缺。[3]由于认为年轻女性更为温顺，包括致丽在内的大多数工厂更愿意雇佣 23 岁或 24 岁以下的女性，而不是年轻的男性。

工人的私人信件

致丽玩具厂使用的是“三合一厂房”，集合车间、仓库与宿舍。这种布置存在火灾隐患而被禁止，尽管违反安全条例，但公司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而免于责罚。楼梯堆满了原材料，窗户用铁条焊死，四个安全出口有三个被锁死或焊死，以防盗窃。1993 年 11 月 19 日发生火灾时，工人被困在火海之中，八十七人丧生。许多幸运逃生的人严重烧伤，留下终身的疤痕，并被遣送回她们的家乡。

这种工厂的生活条件极为简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在参观一处玩具行业的类似工厂时，我记得被领着穿过一处改建过的仓库，里面摆满了成排的双层床，可供一百多名工人使用，地上散落着垃圾。

致丽火灾发生后不久，一位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者访问了现场，从宿舍的废墟中找到了几百封个人信件。信件大多由致丽遇难者的朋友与亲属所写，其

---

[2] Ching Kwan Lee.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xton Siu. 2020.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nd Employer Domination: Comparisons with Hong Kong and Vietnam*. London: Palgrave.

[3] Goolge 学术上只搜索到一篇致丽火灾之前写的文章。见 Yuen-fong Woon. 1993. ‘Circulatory Mobility in Post-Mao China: Temporary Migrants in Kaiping County,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7, no. 3: 578–604.

中许多人自己也是深圳或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几乎所有的信都由女工撰写。研究员友好地将其中七十七封信件转交给我，这构成了本文的基础。在信中，工人交换了工厂条件相关的信息，并揭示了她们内心的恐惧和愿望。信中对于她们的工作状况、生活条件、健康状况以及对工厂的感受的描述是真实且亲密的。[4]

生存与饥饿

工人最关注、最迫切的问题有哪些？关于工资和金钱的问题在信件中频繁出现（107 次），有些写信者抱怨工资太低，无法给家里寄钱，甚至无法正常吃饭。

信中有 15 条提到了食物是否足够的问题。例如，一名工人问她的朋友："你们厂是吃三顿还是两顿？希望妹妹不要过于节约，饿还是得买东西吃。"同样，另一位工人写道："妹，你的病要去看，不要把钱看得很紧，有人，就有一切，不要节约，早餐，晚餐都要吃。"她们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而不是营养或味道，没有一封信提到过。信中暗指一些工人为了省钱而不吃饭，一些工厂的食堂没有提供足够的食物，还有，在农村的家里，她们有时也会挨饿。十年后，当我在 21 世纪初的午休时间参观工厂时，情况大不相同。工人通常可以想吃多少碗米饭就吃多少碗，最大的抱怨是食物的质量和味道，少肉，配菜重复。

一位写信者建议她的朋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仅食物影响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写信者也提及了极长的工时、重复的劳动、恶劣的环境、遭受的虐待、有毒的空气与工伤等问题。有十七封信讨论了与工作有关的疾病：有一封抱怨体重下降得厉害，另外八封提到了疲惫、睡眠不足以及与油漆有关的中毒死亡，死者的尸体被悄悄送回她的家乡。最常见的疾病是头痛、发烧和腿痛。

---

[4] Anita Chan. 2002. 'The Culture of Survival: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Prism of Private Letters.' In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edited by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Pickowicz.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163–88.

见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大学社会评论 · 2002 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15—150 页；大部分信件的译文均引用于此。——译者注。

那是一个职业健康与安全标准及相关知识极为匮乏的时代。1994 年，根据职业健康和安全标准，深圳约有 5000 家工厂被列为危险工厂，其中 4000 家是外资工厂，雇佣了约 25 万名工人。尽管有工人抱怨身体不适，但只有一封信提到工人请了几天假。其他人似乎即使身体不适，也仍留在工作岗位上——要么是太穷，不敢请假，要么正如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那样，害怕工厂会对请病假的人进行罚款。

低工资与超长的工时

为了充分了解这些工人的焦虑，有必要将她们的工资与深圳的法定最低工资进行比较，当时的法定最低工资是每月 280 元，每周工作 44 小时。当时的法定最低工资被设定在温饱线水平之上。有 23 封信提供了写作者的具体收入数额。其中，只有 4 人符合深圳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其他人的收入均低于这一水平。有 3 人写道，工厂扣留了她们每月工资的一部分，11 人写道，她们在领取工资方面面临严重问题。工资的发放十分不稳定，以至于工人在通信中往往互相询问对方是否领到了工资。通常的回答是“还没”，看来无法按时领到工资是一种常态。

此外，有 27 名工人写道，她们的工资支付极不固定，通常会被扣留一部分，每月的工资有时低至 60 元，或者根本没有工资。所有在信中提到工资却没提供具体数额的工人中，有 46 人在这方面遇到了严重问题。到深圳的长途路费或许就能花光他们家里的积蓄，一到深圳就得马上找到一份工作。在这种困境下，她们开始工作，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领到工资，也不知道能领到多少钱。

实际上，工资率（实际工资比法定最低工资）甚至比乍看之下还要低。每月的最低法定工资是按 8 小时工作制设定的。但这些工人的正常工作时间是 11 至 12 小时。这些工人刚从贫困的农村出来，并不熟悉劳动力市场，每天的工作节奏也很灵活，她们不知道有法定最长工作时间或法定最低工资，因此她们几乎不知道自己被骗了。她们在信中没有抱怨工作时间长，只抱怨累。她们害怕的并不是被迫工作到筋疲力尽，而是没有足够的工作时间养活她们，并能给家人寄点钱，这将使得她们离家的主要目的落空。有几个人写道，工厂的工作时间很长，这是她们选择在此工作的一个积极因素。正如本文序言引用的那位年

轻女性所写的那样:“我现在葵冲丰年制品厂，这个厂比日本伞厂好点，一天上班是 12 个小时。要是这厂收人，我给你去（信）。”

身体局限

信中第二多的是工人互相询问其他工厂的条件和工资，希望能摆脱目前的处境，到亲戚或朋友那里去。信中有很多讨论关于工作的比较、更换工作的策略以及辞职的困难。

由于中国的户口制度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很难辞职。来自农村的工人不仅无法在他们工作的城市登记，如果他们没有工作，还会被视为非法的“外来人口”，类似今天的国际非法移民。致丽火灾发生之时，被警察抓捕的没有临时工作证的农民工通常会被关进类似监狱的收容中心。除非有朋友或亲戚支付几百元的保释金，否则工人会被送回乡。由于警察发现他们可以通过逮捕非法农民工轻松赚钱，逮捕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直到 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之后，对农民工的严格控制才有所放宽，孙志刚是一名农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他在警察的收容中心中死亡（见本书中柯蕾的文章）。大规模的公众抗议之后，警察收容农民工的权力被移交给民政局，后者再也不能收容农民工。

对于农民工来说，更糟糕的是，雇主通常会扣留员工的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工人甚至不敢走出工厂大门。此外，雇主通常要求工人在招聘时缴纳保证金，或者扣留头两个月的工资，这样，如果工人逃跑，她将损失一大笔钱。实际上，这些第一代农民工是债务劳工——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甚至更久。我在 21 世纪初采访的一些工厂中，工人最严重的怨言，就是无法负担辞职后没收保证金或丧失工资的后果。

孤立

有 30 封信表达了孤独感与痛苦的情绪，对朋友和亲戚的深切思念，哭泣并渴望收到所爱之人的来信与照片。当时没有手机、网吧，工作场所很难使用公共电话。由于工作时间很长，通话交流的时间窗口有限，而在另一端，往往整个村子里只有一部电话，通常在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通信手段是写信，但邮递服务又慢又不可靠。等待信件的焦虑可想而知，比如有位工人写道：“我前几天给你寄了一封信，不知道你收到没有？我

每天都在盼你的信，但它又总是不来。我很想念你。”一位工人在妹妹或朋友刚抵达深圳后写道：

> 虽然我们靠得这么近，却又只能在信中看到对方。妹妹，你能给我寄一张照片吗？我把我的照片寄到你家去了，你收到了吗？我在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了。希望下次在信中在此见到你。

致丽火灾对劳工运动的影响

尽管北京报道了致丽的悲剧，但遇难者家属却难以获得赔偿。当地政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与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不同，致丽火灾并没有对中国的劳动法产生影响。这场悲剧对立法的主要影响是加强了对三合一厂房建筑的禁令；从那时起，车间、仓库和工人宿舍必须是独立的建筑。

国际层面上，火灾引起了国际媒体与国外工会的关注，他们开始更加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出口产业的工作条件。特别是，这场火灾促使香港劳工非政府组织更加关注邻近深圳的中国农民工的困境。香港非政府劳工组织继续在香港和国际上宣传这一事件，并发起一项运动，要求致丽工厂的港商负责赔偿致丽的遇难者。他们将致丽火灾与 1993 年 5 月 10 日泰国开达玩具厂火灾（188 名工人丧生）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案例作为揭示全球生产链中严重侵犯劳工权益的生动例证。香港玩具生产安全约章联盟（The Hong Kong Toy Coalition）成立，旨在向跨国玩具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为生产商品的工人的福利负责。[5]从致丽大火开始，香港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开始深入参与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并监督中国的劳工权益违规行为。从那时起，这些组织就在广东省的中国劳工和国际劳工运动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6]

---

[5] Dan Katz. 2003. 'China: Santa's Little Executioners.' *Workers' Liberty,* 11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workersliberty.org/story/2017-07-26/china-santas-little-executioners.

[6] Chris King-Chi Chan. 2013.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for Migrant Workers'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Labour NGOs in China.'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8, no. 1: 6–22.

1994

毛泽东时代，权利的概念在党和国家的劳动话语中仅占有相当边缘的地位。虽然国企职工在共产党统下获得了相当多的社会和经济权益（entitlements），但这些权益并非以权利的形式存在，而是被归因于一个工人阶级之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权理应做到的革命社会转型。[1]因此，中国在改开前从未制定任何实质性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劳动关系。至于 1954 年、1975 年、1978 年与 1982 年的中国宪法，只赋予人们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劳动保护和适当工作条件的权利、获得报酬和社会保障的权利、性别平等的权利和休息的权利。然而，正如比达尔夫等人所指出的，中国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利并没有赋予个人在司法上可以让国家强制执行的权益：国家只被施加了名义上的义务，应该创造条件让个人享受这些权利。[2]

中国的劳动法体系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旨在管理新设立的经济特区的劳动关系。十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国家采纳了进一步的法规，用于处理特定行业、特定地点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公司的劳动关系。然而，由于条款不明确且经常相互矛盾，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的劳动法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当局认为这些法律开始成为外国投资的障碍。同时，劳工骚乱使得中共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提高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起草了一系列全国性法律，首次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无论其所有制类型或所属行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1994 年的《劳动法》，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

[1] Feng Chen. 2007.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Labor Predicament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no. 40: 59–79, at p. 62.

[2] Sean Cooney, Sarah Biddulph, and Ying Zhu. 2013.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58.

一法御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劳动法

萨拉·比达尔夫（Sarah BIDDULPH）[1]

经过 30 个草案和十余年的辩论之后，199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劳动法》，并于 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2]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立法。它不仅是正在进行的废除计划经济、建立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统一不同部门（国企、外企、乡镇企业和新兴私企）分散且不一致的工作监管待遇以及旨在打破城市国企核心员工享有终身就业与福利保障的“铁饭碗”的监管框架的一部分。[3]到了 1994 年，经济改革已经发展到需要立法来弥合对外资与国内企业用工情况的监管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之间越来越难以维持与不受欢迎的分界。但是，最终通过这项法律的动力——其他劳工相关的法律同样如此——来自越来越多的劳工骚乱以及 1993 年发生的一系列工作场所的灾难。[4]

《劳动法》为就业关系与后续的立法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劳动法》于 2009 年、2012 年和 2018 年进行了修订，以加强劳动保护并解决现有监管制度的漏洞，但基本要素至今仍未改变。本文将阐述围绕《劳动法》的起草及通过过程中的辩论，并将探讨《劳动法》所确立的基本框架。

---

[1] 这项研究得到了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资助编号 FT130100412）。

[2] Sarah Biddulph and Sean Cooney. 1993. ‘Regul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 253–92, at p. 257.

[3] Mary Gallagher and Baohua Dong. 2011. ‘Legislating Harmony: Labor Law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Gallagh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6–60 (see p. 37).

[4]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50–51.

历史和政策背景

《劳动法》试图整合 80 年代通过的一系列零散、前后不一致的劳动法律。然而它并非是一项从无到有的立法工作，而是有选择地组合民国时期 1929 年《工厂法》中为大型工业企业制定的劳动标准，以及 1978 年之前毛泽东时代的监管条例。[5]后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会在代表与保护工人方面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以及给予城市产业工人特权。[6]《劳动法》并非自然发展而来，而是政策愿景、激烈辩论以及决策的产物，最终赋予了企业自主权，并将个人合同确立为经济改革的基石。辩论中失败的一方主张加强工人角色与产业民主，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进行集体决策。《劳动法》没有规定企业管理中的集体参与，而是通过授权企业管理层在企业责任制下通过个人劳动合同管理劳动关系，从而巩固企业自主权。[7]《劳动法》从制度上巩固了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将经济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

1994 年，劳动相关的法律变得十分复杂、分散且矛盾。“对外开放”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外资，人们认识到，需要制定符合资本主义的法律才能更好吸引外企进入中国。80 年代出现了一个二分式的法律体系，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国内和涉外的经济活动。《经济合同法》管理适合国内计划经济使用的行政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法》则旨在规范涉外合同，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这种法律体系的案例之一。另一个则是经济法与民法的划分，经济法涵盖垂直导向的计划经济中的经济活动领域，而民法则以较小的范围划定了公民与实体之间横向自主的法律关系，1986 年的《民法通则》就是这种相对狭窄范围的代表。

劳动的法律监管也被分为涉外与国内两个部分。广东省设立的经济特区被授权先于全国其他地区通过最早的涉外经济和劳动法规。从 1980 年开始，深

---

[5] 关于 1929 年《工厂法》所规定的核心劳工标准的探讨，见 Ibid., 18–20.

[6] Ibid., 22–32.

[7] Ibid., 39; Mary Gallagher. 2007.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3; Barry Naughton. 1999.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llagher and Dong, ‘Legislating Harmony’, 39.

圳通过了地方性法规，授权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并允许公司管理层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以合同形式雇佣工人，从而更容易管理和解雇工人。[8]

1983 年开始，一些试点地区开始施行劳动合同制度，1986 年，国务院通过了四条规定，劳动合同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合同制同样适用于国企的所有新职工。[9]在此之前，国企的大多数城市工人从属于行政管理，被分配到一个他们不能自由离开的工作场所，但单位还负责提供教育、住房、医疗和退休金等社会福利。1986 年的这些法规标志着从行政分配与管理劳动到劳动力市场与合同制度的决定性转变。1987 年至 1989 年期间，进一步发展的劳动法规涵盖到私企，随后又于 1990 年通过乡镇企业的劳动法规。[10]《劳动法》正是统一现有法规碎片化且矛盾的重要一步。[11]

除了上述外企与内企的区别之外，经济改革初期，还有一条重要的鸿沟横亘于城市和农村的工人之间。改开前的中国采用工业主导的苏式发展模式，造就了一批精英的城市产业工人。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大量的经济生产被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国家福利的提供仅限于少数城市工人。农村人口被排除在城市求职之外，通过户口制度，以及支撑户口制度的强制拘留遣返措施（见本书中海沃德、柯蕾的文章）。尽管户口制度后来进行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但直至今日，这些农村流动人口仍然在法律上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8] Biddulph and Cooney, ‘Regul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55–56.

[9] 关于改开试点，见 Gordon White. 1987.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bour Contract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11: 375–76. The four regulations are the State Council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Contracts of Employment in State-Run Enterprises (12 July 1986),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the Recruitment of Workers in State-Run Enterprises (12 July 1986),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the Dismissal of Workers and Employees Who Have Violated Rules of Labour Discipline in State-Run Enterprises (12 July 1986), and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or Workers and Employees in State-Run Enterprises (12 July 1986). These regulations can be found in Englis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Legislative Series 1986, available online at: ilo.org/public/libdoc/ilo/P/09607/09607(1986).pdf.

[10]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44, 56.

[11] Biddulph and Cooney, ‘Regul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57.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持久的不平等问题。《劳动法》的通过并没有减轻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也没有改变少数城市精英在劳动法律和劳动条件方面的特权。

《劳动法》旨在提供一个规范就业关系的总体框架，但同时，它并没有彻底脱离改革前的劳动法规。《劳动法》仍然反映了以往对于不同范畴的工人所享有的隔离、机会不平等以及差别对待。

劳动法规定的内容

《劳动法》设立了中国就业关系的基本法律框架。官方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将合同作为提高企业管理和生产力灵活性的一种方式。[12]《劳动法》还统一了不同形式的企业与行业的劳动标准，正如库尼（Cooney）等人所指出的，“试图落实与中国政治体制兼容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13]

在这个基本框架中，个人劳动合同被置于监管的核心，并以集体合同作为补充。法律规定了工资、工作条件、工作健康、安全、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险等领域的劳动权利。最后，还规定了具体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以及劳动局和工会的执法职责。然而，由于《劳动法》对基本劳动标准的规定较为宽泛，因此，落实《劳动法》所需的详细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机构（如劳动部，即现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地方当局发布的下级规章和条例。这种监管形式使得法律能够制定明确的标准，而在工时与加班等方面，却也留出了灵活的空间，规定既可以根据需要而补充，也可以根据需要而灵活规避。[14]

个人劳动合同

尽管 1949 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就有先例，使用合同作为规范劳动关系的主要法律形式，但在改革初期，这种做法在意识形态与实践上都遭到了强烈的反

---

[12] 关怀：《劳动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45 页。

[13] 同上：第 145 页；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51; Ann Kent. 1999.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The Limits of Compliance*.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4] Ronald Brown. 2009. *Understanding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 in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25;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61–64.

对。个人劳动合同在法律上的核心地位实际上将劳动关系个人化，牺牲了任何形式的工人集体组织化的声音。[15]这项政策决定并非毫无争议，在起草过程中就经历了广泛的辩论。

这些反对意见反映了当时关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以及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一些重要辩论。关于个人合同形式的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合同本质上是剥削性的，将劳动商品化，分割工人与他们的劳动价值。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创造了稳定的终身就业。主张普遍采用个人劳动合同制度的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反驳这些反对意见，因为后者根植于中国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社会主义话语之上。[16]

这种意识形态问题也演变为现实问题。作为一部框架性法律，《劳动法》未能对合同的一些关键方面进行规范，如合同的订立、效力以及变更。[17]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合同的订立被定性为有别于普通的民事合同的订立过程。即使是 1999 年统合的《合同法》也将劳动合同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这对无法享受《合同法》保护性条款（如禁止不正当影响、虚假陈述以及压迫行为等）而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工人来说是不利的。

另一个问题是，错误地假定缔约双方在形式上平等，坚持认为劳动合同基于《劳动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早在 1986 年，就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除了具有较强议价能力的熟练男性工人之外，许多合同工的境况要差得多，他们面临着恶劣的工作条件、欠薪和工作不稳定。21 世纪初，劳动合同的期限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平均 3—5 年减少到以 1 年的固定期限合同为主。[18]合同工往往受到与临时工一样的恶劣待遇：蔑视、歧视、肆意解雇与惩罚性的纪律制度。[19]《劳动法》将个人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的基石，却没有像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没有有效的保护机制，个人劳动

[15] Eli Friedman and Ching Kwan Lee. 2010. ‘Remaking the World of Chinese Labour: A 30 Year Retro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8, no. 3: 507–33.

[16] Yiwei Jiang. 1987. ‘Jiang Yiwei Discusses the Socialist Enterprise Model.’ *Economic Management*, no. 1; Whit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365–89.

[17]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56–57.

[18] Gallagher and Dong, ‘Legislating Harmony’, 40.

[19] Biddulph and Cooney, ‘Regul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58.

合同这一形式将会巩固新兴劳动力市场中权力不平衡所产生的不公正与不安全现象。

权与益

为了减轻个人劳动合同订立时形式平等的可能后果,《劳动法》规定了一些合同不得剥夺的劳动权利。这些权利为劳工保护提供了总括性（否则无法落实）的具体法律形式，其中包括：获得最低工资的权利；工资保护，如定期获得工资且不得随意扣减、同工同酬和带薪休假；关于工作时间的默认规定，每天 8 小时，每周工作 44 小时；休息和加班费的权利；休假，包括年假和产假；针对女性的性别保护。[20]

除了个人劳动合同之外，集体合同旨在补充劳动合同并规定基本工作条件。然而,《劳动法》中仅有三条规定了集体合同，内容简略，其中规定，集体合同应由代表企业职工的工会与企业管理层订立，并向当地劳动部门报告。[21]集体合同包括报酬、工时、休息、健康与安全保险、福利等内容，一经规定，对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虽然集体合同旨在提供个人劳动不能低于的基准条件，但它无法胜任这项任务。首先，集体合同最初被设想为只在企业层面运作，因为当局从未打算让集体合同成为加强集体劳工的手段。其次，签订这些合同的企业工会表面上代表工人，但自身却缺乏对企业的自主权（工会中往往有管理层代表），并且被迫执行党的政策，包括那些损害工人利益以及强调提高生产率的政策。[22]

在实践中，集体合同是《劳动法》中唯一协商工资与工作条件并索取赔偿的协商机制。已订立的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可以通过与个人劳动合同相同的

---

[20]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67–69.

[21]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2004)》对《劳动法》中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进行了更详细的规定。

[22] Simon 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 2004.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2, no. 2: 235–54, 242;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96; Feng Chen. 2003.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76: 1006–28; Sarah Biddulph. 2012. 'Responding to Industrial Unrest in China: Prospects for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dney Law Review* 34, no. 1: 35–63.

途径执行。自 21 世纪初以来，工会一直试图扩大集体合同的使用，从而实现劳资关系的“协调”与“稳定”。[23]然而，多年来，集体合同实际上是一纸空文。世纪之交的政策重新关注扩大集体合同之前，集体合同所涵盖的企业比例很小。即使企业订立集体合同，对工人的好处也很有限。众所周知，集体合同是自上而下订立的，工人没有实质性参与——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工会规定的指标，并且没有超出重申最低法律标准的范畴。[24]时至今日，尽管有很大的政策压力要求扩大订立集体合同的企业比例，但这些文件仍然流于形式。为了克服这个问题，21 世纪初，一些地方政府试点引入行业层面的协议，但这些试验并没有发展为一种更有效且更广泛的集体谈判形式。实际上，工会的结构性弱势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将集体合同转转变为工业民主工具的前景仍然渺茫。[25]

保护的阶序

保护的阶序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两个相关的问题：谁被纳入《劳动法》的适用范围，谁又被排除在外——《劳动法》适用范围内不同范畴的工人又如何被监管？[26]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动法》的适用范围。第二条规定了该法的适用与执行：用人单位（企业与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第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正如库尼等人指出的那样，这些规定起着重要的作用，界定了谁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谁又被纳入其中。[27]“劳动关系”这一法律概念的确立有效

---

[23] Biddulph, ‘Responding to Industrial Unrest in China’, 49.

[24] Bill Taylor, Kai Chang, and Qi Li. 2003.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0–95; Clarke et al.,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249–50; Ronald Brown. 2006. ‘China’s Collective Contract Provisions: Can Collective Negotiations Embody Collective Bargaining?’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6: 35–77, at pp. 54–56.

[25] Biddulph, ‘Responding to Industrial Unrest in China’, 62; Anita Chan. 1993.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China’s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no. 1: 31–61; Anita Chan.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Armonk, NY: M.E. Sharpe.

[26] See the discussion in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99, 145–47.

地排除了大量中国劳动力的群体，包括农民工、农村劳动者、军人、政府公务员、家政工、实习学生、独立承包商以及退休人员。排除在《劳动法》之外的劳动关系被视为民法商业关系，不在《劳动法》保护体系之内。个人或非法注册企业雇佣的人（例如大量受雇于建筑企业的人）同样不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因为雇主必须是企业。

劳动关系通过劳动合同确立，而非通过劳动合同记录已存在的劳动关系，尽管法律没有明确否定没有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但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证明劳动关系已经确立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28]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使得他们寻求《劳动法》所提供工资保护、工作条件、解决劳动争议、社会保障以及拖欠工资或工伤事故的安全保障方面时，产生了有时甚至不可逾越的障碍。[29]

《劳动法》的另一个缺陷是，由于劳务派遣与其他类型的非正式、不规范或不稳定的就业安排的激增，《劳动法》很快就过时了。例如，《劳动法》没有考虑到区分真实的独立承包商与虚假的独立承包商，因此工人很容易遭到雇主规避责任的手段，如虚假合同。

关于法律范围内不同范畴工人的监管，《劳动法》的监管体系设想的标准或典型工人是在国企或外企等固定工作场所的全职工，因此《劳动法》对于从事短期、兼职、临时或项目性工作的人员，或是劳务派遣等就业安排的工人（即由第三方组织向最终用户提供劳动力）的关注不足，保护不力。由于种种原因，劳务派遣安排成为劳动力使用方避免适用《劳动法》的一种常见方式。直至 2007 年《劳动合同法》的通过，相关制度才受到详细的监管。[30]

---

[27] Ibid., 53–55.

[28] Ibid.

[29] Aaron Halegua. 2008. ‘Getting Paid: Processing the Labor Disputes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6, no. 1: 254–322.

[30]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94–95.

执法与争议解决

和许多法律一样，《劳动法》所施行的是国家主导的执法机制，辅以私人争议解决，主要针对与法律权利相关的争议。执法包括三个部分：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的私人执法，国家行政机构的执法以及工会的执法。[31]由于工人与机构之间存在结构性权力不平衡，也因为这些执法机制没有效力，而执法不力与守法不力往往相互关联。

《劳动法》采用了 80 年代首次用于外企与国企的三段式争议解决制度，即调节、劳动仲裁以及诉讼。根据这一制度，争议首先由职工代表大会、企业工会与企业管理层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企业内部进行调解。这种形式的调解只有在企业拥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在当时主要存在于国企。劳动仲裁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地区工会和企业管理层的代表组成。由于这一过程事实上由地方劳动部门主导，这种争议解决的形式受到政策激励、腐败以及能力问题之间冲突的影响。[32]最后，如果对仲裁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33]

这种争议解决形式被证明是一个耗时费力且昂贵的过程，工人——尤其是他们已被解雇的情况下——往往比企业更难以承受这种成本。除了时间和成本之外，劳动争议制度仅针对劳工权利的违约行为，而不关注涉及工资和待遇的利益索赔。然而，尽管索赔存在着很大的成本与困难，但劳动仲裁委员会与法院审理的索赔案件数量仍在增加，因为劳动争议的解决已从企业内部调解转到仲裁和诉讼。[34]随着 2007 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通过，仲裁和诉讼的障碍和成本有所降低，争议案件的数量进一步激增，显示出被积压的需求有多庞大。[35]

---

[31] Sean Cooney. 2007. 'Making Chinese Labor Law Work: The Prospects for Regulatory Innov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0, no. 4: 1050–97.

[32] Mary Gallagher. 2005. '"Use the Law as Your Weap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Legal Mobilization in China.' In *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edited by Neil Diamant, Stanley Lubman, and Kevin J. O'Bri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4–83.

[33]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64–66.

[34] Gallagher and Dong, 'Legislating Harmony', 42–44.

[35]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111–13.

然而，如今以不稳定就业、零工经济和劳务派遣为主导的经济中，工人对权利的主张首先需要面对“劳动关系”边界的争论。对于工人来说，这一门槛标准往往难以确立，因为他们缺乏能被法院接受的可靠证据，也缺乏用来论证劳动关系订立的资源。那些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也是最无力承受通过官方渠道争取权利所需成本和时间的群体。[36]

《劳动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然而，企业工会往往处于结构性弱势的地位，无法履行解决争议和执法方面的职责，工会需要对上级负责以及履行党的政策，这可能与工人的权利和权益背道而驰，同时企业工会往往包括甚至由管理层代表领导。[37]

私人争议解决机制在解决争议的及时性与公平性方面存在缺陷，加之对违反法定劳工标准的企业缺乏有效的处罚措施，这都加剧了劳工的骚乱。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 00 年代末，拖欠工资、非法克扣工资、惩罚性劳动纪律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十分普遍且严重，尤其是在小型私企和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当中。私人执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集体争议最终由法院进行个体化处理，工会在保护工人权权利方面大多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执法的负担主要落在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劳动监察机构身上，及时设计考虑，也是私人争议解决的局限性。然而，劳动行政部门及其监察机构在执法方面的能力受到一系列体制与法律因素的限制，例如人员长期短缺、预算有限、缺乏地方政府明确的政策支持以及颇高的执法成本和风险。[38]劳动骚乱的增长向劳动行政部门施加了更大

---

[36] Halegua, ‘Getting Paid’; Aaron Halegua. 2016. *Who Will Represent China’s Workers? Lawyers, Legal Aid and the Enforcement of Labor Rights*, October.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US, Asia Law Institute, available online at: 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45977.

[37] Biddulph and Cooney, ‘Regul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67–69; Jude Howell. 2008.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eyond Reform? Slow March of Direct E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 845–63; Simon Clarke and Tim Pringle. 2009. ‘Can Party-Led Trade Unions Represent Their Members?’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1, no. 1: 85–101.

[38] Cooney et al., *Law and Fair Work in China*, 86; Virginia Harper Ho. 2009. ‘From Contracts to Compliance? An Early Look at Implementation Under China’s New Labor Legisl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23: 35–107. In relation to legal costs and risks in enforcement, see Sarah Biddulph. 2019.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Its Impact on Workplace Safety （见下页）

的压力，要求他们执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基于宽泛的维稳责任，要尽量化解并减少冲突。[39]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工人会首先前往地方部门表达不满。[40]

后续

《劳动法》通过时，原本是作为一套劳动相关法规的首部法律。然而，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企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破坏以及大规模的裁员（见本书中李静君、威廉 · 赫斯特的文章），这些配套立法被推迟了。[41]《劳动法》的监管漏洞与模糊之处通过国家或地方规章解决，这往往是根据具体情况而临时制定的，通常是应对不当行为的事后立法。在某些情况下，地方规章超出了《劳动法》本身的范围。

广泛的工人骚乱促使政治意愿去解决其中的一些缺陷。起草新的劳动相关法律的 2004 年至 2007 年期间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系统性问题而开展的三年运动。运动之后，尽管一些雇主团体有组织地反对，但当局还是起草并通过了更多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包括《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7 年）与《就业促进法》（2008 年）（见本书中高敏的文章）。[42]

但是，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这些改革并没有改变《劳动法》的基本结构或规定的范畴。尽管工作与工作场所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2007 年与 2008

Regulation.' In *Good Gover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Sarah Biddulph and Ljiljana Biukovic, 291–322.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39] Sarah Biddulph, Sean Cooney, and Ying Zhu. 2012.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ole of Campaigns in Law-Making.' *Law & Policy* 34, no. 4: 373–401.

[40] Isabelle Thireau and Linshan Hua. 2005. 'One Law, Two Interpretations: Mobilizing the Labor Law in Arbitration Committees and in Letters and Visits Offices.' In *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 edited by Neil Diamant, Stanley Lubman, and Kevin J. O'Bri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4–107.

[41] Proposed complementary legislation included a Labour Contract Law (1995), Employment Promotion Law (1996), Wages Law (1997), and a Labour Disputes Management Law (1999).

[42] Biddulph et al.,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an Cooney, Sarah Biddulph, Kungang Li, and Ying Zhu. 2007.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Responding to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Labour Relations in the PRC.'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30, no. 3: 786–801.

年的立法并没有采用更具创造性的方式规范工作，以应对不稳定就业的挑战，甚至没有从根本上定义劳动者的标准或以往《劳动法》中规定的保护阶序。[43]

[43] Sarah Biddulph. 2017. ‘Structuring China’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Wage Protec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Local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Human Rights*, edited by Potter Pitman and Ljiljana Biukovic. Northampton, UK: Edward Elgar, 236–63 (see pp. 249–50).

1995

改革初期，中国的公民社会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利用相对宽松的政治与法律框架，商业、金融、文化与专业的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蓬勃发展。然而，由于 1989 年及其之后持续的镇压中，这些组织的政治空间收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陷入冻结。直至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中国当局才再度允许公民社会拥有一些空间。首先出现的是致力于性别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其中一些组织重点关注女性农民工。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下一波，劳工非政府组织开始在几个中心城市为农民工提供援助，主要集中在北京与广东某些地方。本文将追溯这些组织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繁荣到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遭受镇压的发展历程。

从绿芽到被压碎的花瓣：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

郝秋笛（Jude HOWELL）

1995 年中国主办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之时，谁又能想到这将成为催化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事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国代表，与参与北京怀柔县影子非政府组织会议的活动家的会晤，释放了一大批相对独立的妇女组织。随着中国公民的组织空间被撬动，这也为关注工人悲惨处境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可以设立独立的团体，提供维权方面的服务与咨询。这一里程碑式事件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既遭受政府的骚扰和压制，也接受与政府在福利服务方面的合作。

本文将梳理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始于 1995 年的曲折发展历程。确定劳工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 1995 年至 2002 年，在这一时期播下了第一批劳工非政府组织的种子；其次是 2002 年至 2012 年的十年，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走出去”的十年；最后是目前在习近平领导下，劳工非政府组织面临严重压制的时期。

绿芽（1995—2002）

尽管非政府组织（通常是半官方的）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但 1995 年中国主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促使了更多独立的妇女组织迅速发展。在此之前，1989 年严格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而那些存在的非政府组织通常是商业、工业和专业的协会。鉴于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的悲剧事件之后面临的国际制裁，中国政府希望恢复国际关系。这次盛大的联合国会议为中国摆脱国际上的被排斥地位提供了一次关键机遇。

1995 年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不仅为女性提供了独立于全国妇联之外的组织机会，也为那些关心劳工问题等其他议题的女性创造了能进行组织化的机会。首

批可以被称作劳工 NGO 的组织就在联合国妇女大会的涟漪之中发展而来。敏锐的活动人士利用这种默许建立 NGO 的契机，成立了与女性农民工有关的组织。记者、律师和学者利用他们的地位和人脉，创立了设计农民工权利与问题的新组织。香港的学者和活动人士也成立创办了为女性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组织。援助机构和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促进性别平等、国际联系、交流和访问以及为组织发展等方面提供建议、建立网络，并为他们的活动提供小额资金。女性活动家、学者以及国际组织积累了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获取知识、组织网络的经验。[1]新的思想、方法、联系以及国际意识开始超越对性别不平等的关注，逐渐涉及其他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只有少数几个主要关注女性农民工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深圳的“女工关怀”，由香港一群热心的活动家和学者建立，另一个比较知名的组织是由一位知名记者发起的北京女工俱乐部。凭借与党和国家的良好关系，尽管在一些时期遭到政府的骚扰和怀疑，但她们还是维持了这些组织的运作。然而，1998 年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进一步修订，限制了非政府组织实质性的增长和发展。事实上，许多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既没有被禁止，也注册登记，因为注册的标准十分严格，而且政府部门也不愿意按规定为它们提供援助。随着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随后中国经济和社会被快速纳入全球化格局，劳工非政府组织开始激增和蓬勃发展。

绽放（2002—2012）

2002 年至 2012 年，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支撑着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激增和蓬勃发展。这些因素包括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领导层的变化，国际组织愈发明显的存在，以及全国总工会的结构性缺陷。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只有少量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主要分布在北京、深圳和广州。到 2012 年，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估计有 40 到 100 个不等——由于大多数没有注册，所以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推动劳工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

[1] Jude Howell. 2003. ‘Women’s Organis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5, no. 2: 191–215.

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使中国向更多的外投和贸易敞开市场，而且也刺激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海外投资。通过这些扩大的经济关系，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的出行机会增多。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方面，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国际行为方式。商人、学者和学生、非政府组织、劳工活动家以及工会之间的建立了个人联系，形成类似伙伴的关系、开始交流与进行联合行动。

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正在兴起的非政府组织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已愈发明显。很快就反映在关注社会问题和边缘群体（如自闭症儿童、农民工或 AIDS/HIV 感染者）的非政府组织的增长上。2008 年的汶川地震标志着国家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转折点，党和国家开始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救灾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能够做到的贡献。然而，通过注册获得法律地位仍然存在困难，许多团体要么依附于其他组织，如研究机构或全国妇联，要么注册为公司，或压根不注册。据报道，到 2012 年，未注册的团体远远多于已注册的团体。

2002 年也标志着领导层的变更，胡锦涛担任党总书记，温家宝担任总理，分别取代了江泽民和朱镕基。他们与所有的领导人一样，试图在任期内留下自己的印记。其中包括关键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等概念（这些概念微妙地承认了中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情况）以及“三农问题”（意味着政府将要采取措施解决农村的不满情绪）。这种言论表明，领导层不仅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而且还在努力改善那些没有从改革中获益的人的状况。这是一个更加开放和试验精神的时代，新形式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包括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得以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外向型发展为国际机构创造了更多的空间，这些机构不仅为政府官员，还为中国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援助、支持以及机遇。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定期与企业、全总和政府讨论劳工问题，并与新兴的劳工非政府组织接触。国际非政府组织、双边发展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对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希望争取权利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香港毗邻广东省，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建立新的劳工非政府组织或与新兴的非政府组织合作。[2]广东省是外国投资的最大集中地，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到出口导向型的工厂工作（见本书中马立安的文章）。9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作条件已经受到各方关注，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劳动法出台来保护工人（见本书中比达尔夫的文章）。随着出口产量的激增，国内外也越来越关注中国血汗工厂的劳动条件。21 世纪初，劳工非政府组织主要集中在广东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组织开始在长江三角洲和其他中国城市，如杭州、成都、上海、北京以及重庆等地出现。劳工非政府组织关注的问题类型因劳工活动的性质和程度、创始人的取向（例如对性别、法律、新闻、职业健康等方面的兴趣）、企业类型（如国有、私营或合资企业）以及某些地区的特定产业而有所不同。随着研究者对劳资关系的分析，中国的劳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而国外的工会和劳工非政府组织则注意到抗议和罢工数量的增加，寻求与中国国内的活动家和研究者建立联系。此外，随着劳工非政府组织提高了工人对《劳动法》的认识，工人越来越多地通过调解委员会和法院寻求赔偿。[3]尽管大多数工人倾向于用脚投票，但越来越多的人准备表达他们的关切，游说劳动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并引导工人采取行动和组织。

官方的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不能维护工人，劳工非政府组织找到了发展的沃土。尽管全总垄断了劳工代表权，但这主要限于国有企业，国企的职工享有更好的工作条件，至少在 90 年代中期国企改革之前如此（见本书中李静君、赫斯特的文章）。全总更多是作为一种中介组织，在工人和政府之间进行调解。[4]实际上，全总是国家的附属品，职能仅限于安排娱乐活动等良性任务，很少站在劳工一边反对资本和地方政府。无论如何，全总都缺乏将农民工纳入自己阵营的技能、意愿和能力。在新的外资工厂里，工会的负责人往往是工厂厂主或

[2] Chris King-Chi Chan. 2013.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for Migrant Workers'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Labour NGOs in China.'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8, no. 1: 6–22; Yi Xu. 2013. 'Lab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China: Mobilis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5, no. 2: 243–59.

[3] Ivan Franceschini and Kevin Lin. 2019. 'Labour NGOs in China: From Legal Mobilisation to Collective Struggle (and Back?).' *China Perspectives*, no. 1/2019: 75.

[4] Paul Harper. 1969.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7: 84–119.

厂主亲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几乎没有动力去寻求全总的支持。正如大多数调查显示的那样，工人们认为全总起不到任何作用。

概述了 21 世纪初推动劳工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些因素后，了解它们的一些基本特征十分重要。各个非政府组织在规模、活动、目标、起源以及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规模较小，很少有带薪工作人员，主要依靠由学生或农民工组成的志愿者。[5]这些组织有些由学者创立，有些由前工人创立，有些由律师创立。他们的活动包括法律咨询、二手服装店、图书室、热线电话等服务，提高对法律和劳工权利的认识、争议解决的建议、帮助工伤工人，以及通过合唱团和文化活动组织工人。[6]还有些从事宣传工作，试图影响政府和工会的政策。无论是提供服务还是进行宣传，劳工非政府组织都用一种与法律官方话语相呼应的权利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活动。通过使用官方关于权利和利益的法律语言，他们可以保护自己而不被指责为试图颠覆政权。

劳工非政府组织与独立工会不同，并不寻求成为会员组织，而是代表工人向工作场所的管理成提出诉求。与全总相比，劳工非政府组织更具创新性和试验性，它们引入了接触并动员工人的新方法，例如在宿舍联系工人或组织流动巴士，在工作场所提供有关劳工问题的咨询和信息。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参与了监督外国品牌行为准则等共同社会责任活动。然而，持有改革议程的非政府组织坚持，只有他们能在工厂内培训的情况下才愿意参与这些活动，这样他们才能够帮助工人提出法律权利相关的问题并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7]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参与支持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特别是在 2010 年本田罢工期间及其之后（见本书中陈敬慈的文章）。[8]

---

[5] Xu, ‘Lab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China’.

[6] Chloé Froissart. 2011. ‘NGOs Defending Migrant Workers’ Rights.’ *China Perspectives,* no. 2: 18–25.

[7] Pun Ngai. 2005. ‘Global Production, Company Codes of Conduct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wo Factories.’ *The China Journal,* no. 54: 101–13.

[8] Mujun Zhou and Guowei Yan. 2020. ‘Advocating Workers’ Collective Rights: The Prospects and Constraints Facing “Collective Bargaining” NGO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11–2015.’ *Development and Change* 51, no. 4: 1044–66.

然而，劳工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学者中也存在争议。李静君与沈原特别批评劳工非政府组织是“反团结的机器”。[9]他们认为，许多劳工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工人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补偿，而不是组织替代性工会或集体行动。这些批评虽然严厉，但也引发了辩论，或许能使人们对劳工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工人不满与形塑劳工运动等方面的贡献有了更审慎的认识。[10]

在胡温时期，政府和劳工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持续的压制、容忍与偶尔合作的混合体。压制涉及一系列的行动，如拘留、人身暴力、骚扰、监视和抽查。[11]劳工非政府组织经常被迫离开他们的办公地点，搬到其他地方，并在几个月后再次面临进一步的驱逐。[12]然而，一些工会与政府官员也会秉持容忍态度，认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了他们所缺乏的能力和技能的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工会甚至向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些资金，以便它们提供法律咨询或帮助农民工子女等服务。然而，持续不断的压制呼声使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变得岌岌可危。事实上，自 2012 年习近平执政以来，大多数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处境愈加恶化。

被压碎的花瓣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非政府组织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然而，负责福利提供和非政府组织注册的民政部门官员越来越意识到非政府组织在解决新的福利需求与填补服务空白方面的好处。然而，监管环境过于严格，使得政府无法利用公民社会的积极性。胡温时期从 2003 年开始启动了一系列将政府服务承包

---

[9] Ching Kwan Lee and Yuan Shen. 2011. '"The Anti-Solidarity Machine?" Lab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China.'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73–87.

[10] Tim Pringle. 2018. 'A Solidarity Machine? Hong Kong Labour NGOs in Guangdong.' *Critical Sociology* 44, nos 4–5: 661–75.

[11] Ivan Franceschini and Elisa Nesossi. 2018. 'State Repression of Chinese Labor NGOs: A Chilling Effect?' *The China Journal*, no. 80: 111–29.

[12] Feng Chen and Mengxiao Tang. 2013. 'Labour Conflicts in China: Typolo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Asian Survey* 53, no. 3: 559–83.

给非政府组织的试点项目。[13]政府官员面临的风险是，如何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下组织基于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与敏感群体发展壮大。

正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福利主义的吸纳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14]如此一来公民社会被分为两股不同的力量：服务型组织与权利型团体。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使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容易注册并申请政府合同，但同时也开始削减权利型团体的外部资金，并对活动人士进行广泛的压制。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可以推进精简公共部门和改革福利的目标，同时减少风险。

即使是有目的地促进服务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可能面对鼓励敏感的权利型团体发展的风险。政府会利用自身的强力机构压制那些被认为是制造麻烦的人。正如政府利用其强制机构来镇压那些它们认为的麻烦制造者。正如弗兰切斯基尼和柯蕾在本书另一篇文章中所述，2015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公安部门对权利型组织与包括维权律师、女权主义者、异见者、批评型学者与劳工活动家在内的活动人士进行了清缴。随后在 2016 年底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严格限制了外国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资助者的活动空间，使得权利型团体难以获得资源维持。

这种福利主义的吸纳战略使劳工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付出了代价。虽然劳工非政府组织一直面临着被镇压的威胁，但在 2015 年的逮捕浪潮中，几位著名的劳工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律师和劳工活动家也被逮捕并遭到拘留，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判刑入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在全国各地被拘留，使得这些组织陷入停滞或完全关闭。有鉴于此，其他活动人士与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停止了他们的活动，低调行事，与外国势力保持距离，并寻求其他收入来源维持生计。

然而，压制并非唯一的情况。地方政府和工会官员继续邀请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申请政府服务合同，例如为农民工子女举办活动。这类非政府组织通常小心翼翼，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最不具有争议的问题上，例如农民工子女的课后辅导等，回避涉及权利与宣传的工作。并非所有劳工非政府组织都选择了这

---

[13] Jie Lei and Chak Kwan Chan (eds). 2018. *China's Social Welfare Revolution: Contracting Out Social Services*. London: Routledge.

[14] Jude Howell. 2015. 'Shall We Dance? Welfarist Incorpo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Labour NGO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3: 702–23.

条道路，有人担心会像其他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一样，接受政府的合同会损害他们的自主权和目标，同时使得政府更能控制他们的组织，随着合同续签的权衡和不确定性变得明显，接受政府服务合同的选择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对大多数劳工非政府组织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压制结束之前低调行事，或将活动调整为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助的服务，或许还可以谨慎地加入一些权利工作。香港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也停止了在大陆的活动，但仍保持联系并尽可能地提供建议。

劳工非政府组织的落幕?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的落幕？习近平时期在扼杀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工作时，也组织了解决劳工诉求的任何创新方法，例如通过劳工代表进行集体谈判等。尽管如此，工人仍然继续罢工和抗议，这表明过往行动主义的遗产并未完全丧失。胡温时代的工人组织与劳工非政府组织的经验留下了重要的记忆、联系和策略的残余，可以在未来加以利用。雇主不断违反《劳动法》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仍然困扰着工人，他们继续罢工、抗议，或是用脚投票（指离职）。劳工非政府组织仍有存在的空间，尽管它们与工会不同，但在改善工人条件与形塑劳工运动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然而，短期内似乎无望。对外国机构资助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加上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严重限制了国际支持的可能性。此外，许多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人士与维权律师仍被拘留或受到监视。如果政治条件变得宽松，劳工支持团体可能会有重新出现的空间，但它们是否会采取类似的形式，或怀有与过去几十年来运作的团体类似的目标，仍有待观察。然而，精灵已从瓶中飞出，便无法轻易放回瓶中。压碎的花瓣也能生发出新的绿芽。

1995

1989 年的民主运动被终结后的镇压中，工人活动人士遭受了不成比例的打击。尽管随后几年被普遍视作中国劳工运动的低谷期——至少直到 1995 年，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打开了一丝缓冲之机（见本书中郝秋笛的文章），然而，还有些活动人士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仍然尝试组织工人。他们怀着 70 年代与 80 年代民主运动中形成的理想，从事一种开放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经常与 1989 年的废墟中死灰复燃的各种反对力量合作。尽管这些团体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但他们与国企工人和农民工联合起来组成准工会的可能性，足以威胁到党和国家的体制，进而招致了严厉的镇压。本文将探讨其中一些组织的意义，以及他们的最终消亡对中国的劳工运动有何意义。

窒碍难行：天安门镇压后的政治性劳工组织

林凯文（Kevin LIN）

1995 年 5 月 21 日，刘念春在向全国人大递交一系列请愿书之后，遭到警察突袭，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被逮捕，从他的亲朋好友身边消失。警察搜查了他的家，没收了信件、报纸、杂志和照片。[1]刘念春的请愿是中国政治异见人士呼吁民主改革以及纠正侵犯人权行为的运动的一部分。其他一百多名持不同政见者也因此而被逮捕，这表明当局坚决禁止任何有组织的异议。

党和国家的镇压对刘念春而言，既不新鲜，也不陌生。作为一名资深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从 70 年代末起就深深扎根于异见人士的圈子中，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后来由于他的政治活动而被学校开除。[2]1978 年，他与著名诗人北岛和芒克一同成为亲民主的文学期刊《今天》的一名编辑。1981 年，由于他积极活动，组织国际社会支持他的兄弟刘青（另一位资深民主活动人士，最终在狱中度过 15 年），而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三年。出狱后，刘念春仍然参与了 1989 年的抗议活动。尽管环境更为恶劣，但他在 90 年代初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包括与其他政治异见人士一起参加《和平宪章》运动，要求恢复 1989 年民主运动的名誉并释放政治犯。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刘念春与在中国各地参加过早期运动并继续从事政治组织的许多异见人士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刘念春与他们在一个方面出现了分歧：他的政治愿景包括中国工人。

1994 年，刘念春开始了其他活动，他和另一位名叫王仲秋的活动人士筹备成立"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劳盟），一个旨在保护工人权利的公民组织。为

---

[1] Human Rights Watch. *Selected Prisoner Cases: China and Tibet*. New York, NY: Human Rights Watch, available online at: hrw.org/legacy/campaigns/china-98/prisoner.htm.

[2] "劉念春在九十年代的抗爭", Hayward, CA: 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 在线链接：cdef.org/Default.aspx?tabid=140&language=en-US。

了符合法律规定并公开活动，刘念春向民政部申请注册。当局对此不怀善意，对他实施了“软禁”，五个月后才将他无罪释放。

刘念春并未停止活动，他很快又被关进监狱——这次是因为 1995 年的请愿运动。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刑事案件文件，他的主要“罪行”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领导层请愿，并试图创立非法组织，即“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被拘留一年多之后，1996 年 6 月，刘念春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被送往黑龙江省的一所设施内，据称他在那里遭受酷刑，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刘念春的姓名与他所创立的劳盟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甚至在今天的劳工活动人士中也鲜有人了解。然而，他的活动——民主反对派与劳工组织的结合——预示着一个新生的政治项目，即承认工人在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中的力量。

新兴的政治性劳工组织

党和国家对 1989 年民主运动的镇压并没有扼杀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希望。数百名支持运动的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被监禁、处决或流放，也未能阻止一些人在 90 年代继续参与反对运动。其中涌现出一批多样化的人群，包括大学毕业生、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以及一些工人，他们像刘念春一样，通常具有 70 年代和 80 年代民主运动的背景，但在 90 年代形成了倾向工人的立场——他们将成为新的面向劳工的团体领导人。

这一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性的劳工组织形式。这些出身反对派的领导人意识到工人在中国市场转型下的困境，也认识到工人的政治力量对挑战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他们的活动代表了一项有意识、有战略的项目，不仅围绕经济利益，而且还围绕着明确的政治诉求组织工人。在许多方面，这是对 1989 年民主运动中短暂存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见本书中张跃然的文章）的延续。[3]

这些不仅仅是孤立的尝试，而是异见团体与网络激增的一部分。1991 年 12 月，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邓小平认为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是“导致东欧

---

[3] Andrew Walder and Gong Xiaoxia.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1–29.

共产主义政权全面解体的关键因素”（见本书中威尔逊的文章）。[4]这段发言的背景是国安部将北京 14 个地下劳工组织列为目标，这些组织的成员人数从 20 人到 300 人不等，其中至少有两个组织以团结工会为模版。[5]

比较分析三个组织

尽管这些组织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面向劳工的团体在政治立场与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差异。因而对其中三个最突出的团体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

中国自由工会是其中较为激进的一个团体，也被认为与政治反对运动最为接近。中国自由工会成立于 1991 年，主要关注市场改革下国企职工福利迅速恶化的境遇，将自己设想为“由中国工人的自觉努力形成的群众组织”，宣称的目标是为工人的经济权利与政治自由而斗争。[6]

刘京生是中国自由工会的主要创始成员之一，他曾是北京郊区一家国营化工厂的工人，尽管有着工人阶级的背景，但他在改开后的十多年来同时是一名民主活动人士。他也参与了 70 年代末的民主运动，并与著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一起，担任运动刊物《探索》的编辑。1979 年，刘京生曾被短暂逮捕，几个月后获释，他已经被当局记录在案。除了中国自由工会，他还在 1991 年初参与组建了一个位于北京的地下反对派团体。中国自由工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胡石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学者，他于 1992 年共同创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因此，中国自由工会与使其产生的政治反对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领导层也有着重叠。

创立中国自由工会后的 1991 年 12 月至 1992 年 2 月，刘京生与其他活动人士确实在努力宣传他们的观念，在北京的工人中分发提倡工人自治工会的小册子。1992 年的一本批评中国经济改革的小册子中，他们认为，虽然经济改革提高了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但大多数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他们现有的权利，如社会保障，被剥夺了。[7]作者指出一些案例，证明国企职工现在不

---

[4] Trini Wing-yue Leung. 1998. ‘The Politics of Labour Rebellions in China: 1989–1994.’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269.

[5] Ibid.

[6] *China Labour Bulletin*, December 1994, 18.

[7] *China Labour Bulletin*, October 1994, 1–5.

得不自掏腰包支付大量的医疗费，而在改革之前，这些费用本应由他们的工作单位支付。他们批评的重点是“铁饭碗”被摔破，国企工人的权利受到侵蚀、生活水平下降。册子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成了“社会的真正主宰”，而工人现在仅仅是“它的仆人”。[8]

同年 6 月，中国自由工会的活动人士因散发有关 1989 年民主运动的传单而被拘留。在这些文件中，他们表示了他们的信条：要争取一个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就必须具有一个民主与健全的立法结构，这样才能改善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工人是促进中国民主的主要力量。虽然这些活动人士被拘留，但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帮助下，他们的报告与 1992 年 6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上被广泛分享。

顺着这个光谱，刘念春的劳盟属于相对温和的团体。章程中仅表示作为一个保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利益的兴趣团体——不是政党，不是独立工会，不以挑战共产党的统治为目的（这一点在章程中已经明确表示）。由于自身的组织定位，刘念春决定在北京向民政部注册为独立的劳工权利团体。北京公安局于 1993 年 3 月逮捕包括刘念春在内的主要活动人士之前，组织自报的全国成员约为 120 人。[9]

劳盟在 1993 年 3 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提案，有助于理解组织的分析与议程。[10]文件首先强调了组织的两项目标：保护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以及根除腐败。第一项提案主张恢复 1982 年中国宪法中删除的罢工权。由于中国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过程中”，作者写道，“面对资本主义所有者与管理人员，工人和雇员只能援引法律赋予他们的公民特定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节制的财富也将恶化为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因此，他们认为罢工权对于防止“财富滥用”至关重要。

文件还包括其他几项建议。其中一项要求政府官员与共产党领导人报告个人财产情况，并主张建立农业工人工会。随后，文件涉及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企职工身上，农民工这一群体往往被忽视。

---

[8] 均由英语转译。下同。——译者注。

[9] *China Labour Bulletin*, April 1994, 12–13.

[10] Ibid., 14–16.

劳盟意识到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他们艰苦的工作条件，呼吁全国人大调查劳动情况，并立法保护他们的权利。最后，作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在中国开设工厂，工会要么缺席要么没有发挥作用。因此，他们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法律，使得工人能在这些新企业中成立工会。虽然这些建议并不像中国自由工会那样要求独立的工会主义，但劳盟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了更接地气的分析与实践方向。

打工者联合会在名称上更为朴实，但可以说是最接近严肃的劳工组织团体。尽管当时提及这个组织，将“打工者”译作“hired-hand workers”（雇工），但中文原文指代的就是我们常称之为“农民工”的群体。这个词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他们对华南农民工的特别关注。

其中一位领导人是李文明。李文明在湖南省的一所技校毕业后，于 1991 年来到深圳，当时他已经 20 多岁。打了几份零工后，李文明在《深圳青年》报社找到了一个记者的职位。他和他的同事，其中一些人参与了 1989 年的民主运动，对农民工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政治教育与建立独立工会。为此，李文明与他的同事为农民工建立了一所夜校，并成立了打工者联合会。他们还出版了一份名为《打工广场》的通讯刊物，向工人分发。起初得到了当地市委领导与市工会的支持，他负责了一个深圳市政府向农民工传播《劳动法》知识的项目。[11]

《打工广场》主要关注深圳的农民工，讨论了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基本问题，例如工作条件、工资、加班以及安全，但也涉及了更敏感的问题，例如工会主义与工人斗争。这是了解农民工及其自我赋权潜力的重要一步。《打工广场》第一期通讯批评了政府允许发生致命火灾之前未达到安全标准的致丽工厂继续运营（见本书中 1993 年陈佩华的文章）。[12]《打工广场》认为，只有通过斗争与团结，工人才能最大程度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安全。

《打工广场》上有一篇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团结？”[13]文中描述了深圳的两个世界：“高大的摩天大楼、发

---

[11] Anita Chan.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London: M.E. Sharpe, 165–72.

[12] *China Labour Bulletin*, July 1994, 6.

[13] Ibid., 14.

达的商业区和忙着赚钱的商人”的世界，与“深圳真正的主人，数百万工人”的世界，他们的“工作条件恶劣，加班加点，工资微薄”。文章以激进的口吻指出，“权利不会被赋予给我们，而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斗争”“如果权利是被赋予的，那也能被轻易夺走。”文章总结道，“只有通过我们的斗争获取（权利），才能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但以往的斗争多是单打独斗，现在我们需要团结。”对于那些担心被镇压的人，作者认为，团结会带来力量，他们不会失去工作，反而会更安全，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最后，为了避免像 1993 年致丽火灾那样可怕的悲剧，作者认为拥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会”至关重要。

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尽管《打工广场》更侧重于工作条件，而非倾向于政治反对派，但他们关于工人斗争与工人阶级团结的语言同样具有威胁性，甚至比政治反对派更具威胁。此外，领导层的关系网络及其与广泛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纠缠使他们无法得到当局的青睐。1994 年，深圳市公安局拘留了试图组建独立工会的李文明和郭宝胜。直到 1997 年，当局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他们三年半的刑期。

窒碍难行

上述讨论的所有团体都可以被视作是团体领导人在先前几十年中参与的民主政治运动的延续。他们的分析和要求反映了他们对民主愿景的关注。有些人甚至与同期试图组建独立政治团体与政党挑战政府的尝试保持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并不奇怪的是，这些组织中有许多是在北京成立、运作——这表明他们的组织具有政治性质，而且他们以其他异见人士为支持者，并将国家作为目标。无论各个团体的意图如何，大多数都保持着地下或半地下的存在，没有公开并合法运作的前景。

这些团体主要由异见的知识分子领导，没有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这与他们建立强大的全国性组织与运动的抱负相悖。在他们短暂的存在中，上文所探讨的三个团体都没有组织或支持过任何实质性的劳工行动，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团体上扎根于工作场所层面的劳工组织。然而，这已经比 1989 年的民主运动更进一步了，当时尽管工人广泛地参与运动，但却被排除在运动的中心和领导层之外。但由于这些组织没有工人阶级成员，他们只是以工人的名义言说，

而不是组建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或者工会。我们很难不料想到他们会将工人阶级工具化并使其服从于他们的政治项目的风险。

然而，这些团体中的少数人确实试图直接解决工人的境遇，并提出工人会赞同的不满。90 年代初开始，工人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受到的侵蚀不断扩大并加速，以及同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为这些团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他们发出了保护劳工权利的信息。虽然在整个 80 年代与 90 年代初，没能看到许多大规模的工人动员，但这是工人组织的一个新时期的黎明，包括 1993 年与 1994 年的一系列工业行动。[14]不幸的是，所有尝试都在进一步发展之前就过早地结束了。这些团体的领导人与核心参与者在一两年内被逮捕，许多人被判处严刑。异见知识分子和早期作为准工会成立的团体与国企职工或农民工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足以招致当局严厉的镇压。

通过回顾这段现在基本被遗忘的事件，我们可以窥见与后来的劳工组织不同的尝试。到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任何明确的政治项目的希望破灭，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互助、法律保护以及与政治愿景无关，单纯基于经济利益的协商等非政治性项目。独立的工会仍是一个绝对的禁忌，但因支持农民工而涌现的基于法律权利的公民社会组织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见本书中郝秋笛的文章）。由于几乎无处不在的压制，早期的政治性劳工组织与后来 21 世纪 00 年代和 10 年代出现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如果给予发展的时间，这些面向劳工的团体是否能够帮助推动更大的劳工与工会组织的形成？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群能够接受他们的支持群体。接下来的二十年，先是国企职工对国旗私有化与下岗潮的抵抗，后是农民工为争取更好的工资与条件而展开的大规模动员。90 年代初面向劳工的团体可以作为这些运动的组织基础和政治纲领，从而发展成为更有组织性的全国性运动。然而，工人也可能不愿意信任这些异见的知识分子，认为与他们的联合风险太大。可以肯定的是，仅仅是这条路径的前景——中国工人组织起独立工会，作为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或与民主运动结盟的政治组织——就对党和国家构成了极大威胁，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即使处于工人抗争

[14] Chris King-Chi Chan. 2013. ‘Contesting Class Org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Strikes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1978–2010.’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83: 112–36.

加剧的趋势下，想要在中国出现一个采取政治或群众组织形式的有组织劳工运动也变得愈加困难。

1997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党和国家决定加快国企改革的步伐。1997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被普遍认为是这一进程的分水岭。大会上，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两个关键口号，为今后的改革定下基调：“减员增效”与“抓大放小”。接下来的几年中，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将出现大规模的下岗潮，在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无产阶级贵族的工人中带来了混乱与苦难。本文将审视 1997 年的十五大，认为虽然十五大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因其得以突显的动力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运作。

下岗：党的十五大与国企大规模裁员

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

在 1997 年 9 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七天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产生了一系列声明和文件，将国企的改革，尤其是国企内部劳动关系的改革，放在了首位。许多观察家得出了一个未经思考的错误结论，认为这标志着硬预算约束被急速注入（国有）企业的逻辑当中，这些企业现在被要求以市场理性行为为准则，减少它们过高的成本——其中最主要的成本，就是计划经济下因官僚主义的劳动分配所导致的庞大工资支出。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国企改革并非预算紧缩的单一因素叙事，而是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曲折而又未完成的历程，涉及协商、试验以及不时的绝望。[1]本文将回顾这一历程，分析十五大所采取措施的具体影响，并根据截至 2021 年初的事件进行一些更新。

十五大之前的二十年

改革开放的故事始于有争议的农业去集体化进程（见本书中 1981 年安戈的文章）。许多国外学者（以及之后的中国政府）将去集体化誉为毫无疑问的成功，但去集体化给中国的不同地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去集体化未能兑现所承诺的好处，并且导致东北的农村收入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明显下降。再加上改革早期所谓的“双轨制”，即允许国有企业在市场上销售满足计划指标后或计划指标范围之外的产品，使得东北的许多重工业企业无所适从，特别是由于它们无法调整生产，以生产主要是轻工业与消费型市场所需要的商品。

[1] William Hurst. 2009.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

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生猪突然比生铁更有价值，东北的重工业巨头如果想从市场中获益或弥补国家计划中减少的援助，就将面临尤为严峻的挑战。[2]地方财政收入的停滞或下降，加上商业环境的恶化以及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使得东北地区的许多国企陷入严重的赤字和欠债之中，迫使它们解雇了大量职工。然而，大多数这样的裁员在官方数据与报告中都被掩盖了，而且几乎都是通过各种非正式安排进行的。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一些东北城市充满了除了名头以外几乎全部破产的国企，也许有数百万职工已经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即使他们不能被正式报告为“下岗”或“失业”。当时，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中还没有“下岗”一词，而“失业”在政治上是极为敏感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所以大多数官员和企业领导都在竭力避免将任何人定为“失业”。[3]

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东北式困境开始跨过长城，波及中国其他工业重心地区。而采掘工业高度集中的地区，如依赖煤矿开采的山西、河南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则是例外。这些地区的国企在 1990—1997 年期间的劳动力大幅增长。然而，在其他地方，例如我所说的长江上游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四川和重庆），许多国企开始裁员，因为与外企、私企及其他国企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些国企难以应对竞争，部分原因是结构上的劣势，例如设备老旧、特定行业或活动的限制，以及在三线建设时期基于国家安全而非商业原则而选择的地点（见本书中柯尚哲的文章）。军工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只有中部沿海地区（天津、山东半岛、江苏和上海）的企业虽然面临巨大压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仍能避免裁员，当地政府丰富的财政储备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4]与此同时，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东北省份的困境仍在加剧，受到汽车等行业的外国竞争以及重要的石油、煤炭矿藏的枯竭等结构性变化而加速恶化。[5]因此，1997 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时，大规模失业已经成为长江上游大部分地区的现实，并在东北地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 Ibid., 43.

[3] Ibid., 44.

[4] Ibid., 45–48.

[5] Ibid., 45.

一个分水岭？

在著名的十五大上，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可能是当时对国企改革最具影响力的讲话，他强调了两个关键口号："减员增效"和"抓大放小"。具体而言：

> 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6]

这大胆地宣示了党对改革国企劳动关系的意愿，并愿意（甚至希望）通过关闭或出售不盈利的小企业，以及刻意通过减少劳动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标志着一项重要的转变，裁员行动不再需要偷偷摸摸进行。相反，企业被明确鼓励将裁员作为扭转盈亏的主要、有效的手段。十五大推开这扇大门的几年后，相关的信息被反复强调。

事实上，几个月后的 1997 年 12 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一份题为《坚定不移地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裁员离岗、减员增效、实现再就业工程的路子》的高调讲话中作出了更加严厉的指示。[7]在 1998 年 5 月，国务院与中共中央联合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强调减员增效，以及一系列旨在缓解职工困境的政策措施。1998 年底，下岗工人的数量已经及时增加到至少 3000 万。[8]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官方正式的"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从未上升到与之相应的高水平。"失业"这一类别仍然受到限制和政治监管，只有那些企业倒闭或具有其他特殊身份的工人才被允许正式登记

---

[6] The speech is included in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Fif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997), 23–24. Translated in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49.

[7]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78—279 页。

[8]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50–51.

为“失业”。这导致了概念与监管的混乱，确定准确的失业人数与失业率变得非常困难。[9]

然而，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十五大与随后的工作会议是否真正调整了中国国企的政治经济格局？或者只是将多年来的临时措施正式化并给予官方认可？换句话说，三千万工人是在两年内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还是他们在此刻才被承认并计入“下岗”人数，此前他们的这种事实状态一直被隐藏？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的地区与行业。

尽管在官方叙事中是一次急转向，但我们已经看到，在此之前东北等地的大规模失业已经存在了至少十年之久。而在内陆地区，如长江上游，许多老旧的三线建设工厂和其他重工业也一直在挣扎，而国际与国内的竞争也正在伤害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轻工业企业。真正的新失业集中在华北与华中等地区的资源采掘行业，以及华东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健康的城市。[10]

在这些地区，失业主要是对政治压力而非经济压力的直接反应。国家领导层与党中央的命令并不是国企硬预算约束的自然变动，而是一种纲领性的命令。企业收到裁员比例的指标，有时不得不仓促满足指标，裁掉他们需要的员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11]这种强制性失业构成了国企裁员的一个重要分支，但通常被人忽视，许多观察家将失业视作“东北的问题”，而忽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 21 世纪 00 年代初，大量的可证实的新裁员发生在上海与南京等地，而非沈阳或鞍山。

另一个愈发重要的机制是“抓大放小”政策。这是围绕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 年）的讨论中出现的，事实上，这一政策在十五大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尽管一些学者错误地坚称，它是在大会之后才出现的。[12]但在 1997 年后，政策的实施范围被扩大，以促使国家能够从数千家中小型国企中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撤资，基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干部广泛的自主权，让他们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重组或关闭这些企业。

---

[9] Dorothy J. Solinger. 2001. ‘Why We Cannot Count the “Unemployed”.’ *The China Quarterly* 167: 671–88.

[10]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51–53.

[11] Ibid., 55–56.

[12] Jin Zeng. 2010. ‘Political Compromises: The Privatiz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ublic Enterprise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5, no. 3: 257–59.

尽管十五大肯定不是导致国企所有或大部分裁员的原因，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加剧了某些地区与企业的现有裁员趋势，并向其他地区施加了新的压力。东北与其他一些地区不断恶化的问题被正式化并摆上台面。经济健康的地区和企业也得根据政治指令进行裁员。鼓励从小型企业撤资的现有机制被扩大并加强，以加快私有化和企业的倒闭，这将导致数以百万人下岗。

抓大放小

尽管很多人都提及了抓大放小政策对裁员的重要影响，但很少有人对微观层面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13]在许多小型国企与城市集体企业中，这项政策被用来为法律以及事实上的私有化，还有几乎波及所有员工的大规模下岗提供理由。工人下岗后，可以申请继续他们的旧工作，但往往工资较低，而且没有任何福利或保障。许多人根本就不被允许返回岗位，还有些则被要求支付金钱或贿赂获得重新工作的特权。[14]

在我之前的著作中，我研究了湖北省 J 县一家机床厂的详细情况。[15]根据企业与县政府的内部文件，我能够拼凑出这个企业的重组故事，时间跨越 1996 年夏至 1997 年年中，发生在一场更广泛的政策变化的过程中。在这段故事中，企业干部和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扭曲了中央指令的执行。不出所料，这使得工厂工人的境况大不如前。最后，工厂被转型为一家私营企业，股份在工人和经理之间分配，但要求工人付钱以保留其股份（即使他们的岗位已经岌

---

[13] 关于相关微观层面的好案例，见 Anita Chan and Jonathan Unger. 2009. 'A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 Under the Reforms: What Model of Capitalism?' *The China Journal* 62: 1–26; Sun Sheng Han and Clifton Pannell. 1999. 'The Geography of Privatization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75, no. 3: 272–96; Samuel P.S. Ho, Paul Bowles, and Xiaoyuan Dong. 2003. '"Letting Go of the Small": An Analysis of the Privatization of Rural Enterprises in Jiangsu and Shando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9, no. 4: 1–26; and several chapters in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1999.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54.

[15] William Hurst. 2015. 'Grasping the Large and Releasing the Small: A Bottom-Up Perspective on Reform in a County-Level Enterprise.' In *Loc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China: Experimentation, Diffusion, and Defiance*, edited by Jessica C. Teets and William Hurst. Abingdon, UK: Routledge, 103–16.

岌可危）。那些无力支付的人看着他们的股份被拍卖给企业干部或其他有钱的工人。截至 2011 年，重组后的企业取得了高水平的经济成功，但员工人数只有 1996 年的 40%。一家长期以来是这座县城（劳动力）重要雇主的公司变得盈利颇丰，但不再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类似的故事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特别是在那些县城与较小的地级市，当地的国企甚至较小的集体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且其他就业机会往往很少）。

2008 及其后：下岗潮顶峰？

十五大之后的十年里，围绕着更普遍的福利救济计划“最低生活保障”（简称为低保）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共识。[16]这与医疗和养老金的全面改革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工人的新型国家福利制度（见本书中苏黛瑞的文章）。[17]社会保护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慷慨和全面，但也不再与工作单位紧密相联。此外，裁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正在迅速演变，并随着 2008 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 2005 年开始，国企的失业率已经放缓，中国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应对几乎完全阻止了国企失业，并扭转了许多趋势。事实上，中央政府注入经济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主要效果是向国企提供信贷与投资，使仍受雇于这些企业的工人成为新的“蓝领贵族”。[18]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明显改善，而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些一直在急剧下降。尽管到了 21 世纪 10 年代，一些行业又开始裁员（尤其是煤矿和其他一些重工业部门），但再也没有接近过

---

[16] 见 William Hurst. 2011. ‘Rebuilding the Urban Chinese Welfare State: Authoritarian Accommod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China Perspectives* 2011/2: 40–41.

[17] 关于这一系列政策改革最全面的著作，见 Jane Duckett. 2012. *The Chinese State’s Retreat from Health: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London: Routledge; Mark W. Frazier. 2010. *Socialist Insecurity: Pens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niel R. Hammond. 2019. *Politics and Policy in China’s Social Assistance Reform: Providing for the Poo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orothy J. Solinger and Yiyang Hu. 2012. ‘Welfare, Wealth, and Poverty in Urban China: The *Dibao* and its Differential Disburs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741–64.

[18] William Hurst and Christian Sorace. 2011. ‘Reces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Production in China.’ *New Political Science* 33, no. 4: 514, 521–23; see also William Hurst. 2015. ‘China’s Labor Divided.’ *Dissent Magazine* (Spring): 127–35.

经济危机之前的速度和严重程度；毕竟，60%以上的国有企业工作岗位已经消失，没有多少工人可以裁了。

余响

对中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化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这种分化可以追溯到 1949 年以前。[19]特别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国企职工与农民工同行之间划分了鲜明的界线。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对旧有的界线造成了长期影响，这种划分已经变得模糊且不可靠。“铁饭碗”保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国企的城市职工精英的安全感已经丧失。

同时，将农民工排除在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之外的不公正的歧视性规定被削弱，削弱的程度比许多人十年前认为的还要大。但是，中国工人阶级被划分为享有特权的国企精英与处境不利的农民工大众，这一情况在其他方面得到了加强。随着低技能和年龄较大的职工如今大多已经离开了国企，剩下的工人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比农民工或他们自己的许多前辈都要高。中国国企劳动力市场持续二十多年的震荡将在未来多年中以这种及其他无数种方式继续产生影响。

[19] 例如，见 Elizabeth J. Perry.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01 年，经过了 15 年的谈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尽管许多人将此视作中国经济转型的里程碑，并为之欢欣鼓舞；也有人担忧中国加入世贸会对国内外工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在国内，人们担忧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将造成大量的失业；在国外，中国相对的政治经济优势可能会导致其他地方工人的工资降低，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工人。文本将追溯中国加入世贸的过程，并探讨这一事件对中国工人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工人的意义

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1]

“对穷人，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世贸没有任何好处。”2001 年 10 月，中国加入世贸前夕，我在武汉街头偶遇的一位失业工人哀叹道。不久前，他被一个临时工作单位毫无预兆地解雇，此前，他曾经有个“铁饭碗”，直到被国企开除。我与他交谈的时候，他正蹬着一辆三轮车以维持生计，据称当时的武汉约有四万人以此为业，他们的时薪大多只有每英里 30 或 40 美分（译按：2001 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约为 1：8.277）。“其他的职业不行”，他补充道。他当时最担忧的事情就是政府禁止三轮车拉客（实际上仅几年后就禁止了），他又以某种权威的口吻宣布：“加入世贸是对富人好，但是干苦工的穷人会变多；犯罪也会多起来。我身边很多人都这么看。他们说很多东西会便宜，不过那都是些高档货，比如小轿车。我们压根买不起。我们虽然都不太懂，但我们都知道这会有坏影响。”

2001 年 10 月 11 日，经过十五年漫长的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贸。中美政府和媒体无不欢欣鼓舞。但只要分析人士开始考虑中国很大一部分城市劳动力会因此失去工作的可能时，这幅美好的图景变得黯淡。例如，所罗门美邦预测，加入世贸后的五年内，中国最多会有四千万人失业。[2]

事实上，事后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加入世贸——从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并不直接导致失业。相反，加入世贸加剧了已有的趋势：竞争更加激烈，国企破产速度更快，对中国培训并雇佣更高质量的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部分现有的中国城市劳动力不适合现有就业岗位的要求。即使有更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员工进入新创造的岗位，加入世贸也会加速他们被机器取代的脚

---

[1] 本文摘自作者的研究 ‘China’s Urban Workers and the WTO’, 首发于 *The China Journal* 49 (January 2003): 61–87.

[2] ‘WTO Cost: 40 Million Job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 October 2000, 10.

步。与此同时，更多农业产品的进口对中国农民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刺激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除此之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乡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逐步下降。[3]农业雇佣劳动力的数量仅在 1998 年一年就下降了一千七百万，在九十年代末期，这个数字约为三千三百万。[4]一位中国评论员对即将到来的就业形势评价为是“雪上加霜”。[5]

然而，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2001 年末，我认识的一位四川自贡新近失业的消息人士感叹道：“许多工厂都倒闭了，因为大家更喜欢外国产的电子产品。”所有这些趋势都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工人被解雇，尽管他们曾被保证可以终身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退休金、安全的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福利。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第一步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小心翼翼地计划逐步开放经济。1980 年，中国恢复了 1949 年前在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im 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席位，任命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世贸前身）的秘书处。这意味着中国有意参与关贸总协定事务。随后，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国；1983 年，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多种纤维协定》（Multifibre Agreement）；下一步是在 1986 年中期，中国当局正式通知关贸总协定，他们决定寻求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1987 年，正式谈判启动。这里的关键点之一在于，支持国家经济改革的政治家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市场化进程，并确保其不可逆转地实现。[6]

---

[3] 谭友林：“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2001 年第 1 期：第 56 页。

[4] 辽宁省乡镇企业的裁员率为 80.5%，吉林省为 70%，黑龙江省为 59%。见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国情报告》1999 年 6 月 9 日第 48 期，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第 2 页。

[5] 莫荣：“加入 WTO 与我国的就业”，《劳动保障通讯》2000 年第 4 期：第 19 页。

[6] 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1990.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51, 83–86, 92–94.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及 90 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变格，例如逐步取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降低数千类商品的关税和/或配额，并取消许可证要求。这些措施的首要目标是加入关贸总协定，其次是为加入世贸（1995 年取代关贸总协定）做准备。[7]从 1994 年到 1997 年，中国平均关税税率从 43% 跌至 17%；这一数字在中国于 2001 年末加入世贸后仅有 15%。[8]在 1999 年初，时任总理朱镕基为了得到加入世贸的许可，同意开放许多受保护产业——与八十年代的改革者一样——试图利用国际化推动国企继续改革。[9]

这一漫长的准备过程——首先是中国领导人的目标，然后是世贸成员国的条件，最后是各方的妥协——最终实现了各方的要求和期望。诚然，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外部压力：1986 年之后，当时的关贸总协定成员国敦促中国在加入之前，对国内经济结构和实践进行调整。但是，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官员对国家进行各种调整的背后，最根本的动力仍是他们想要推动中国加入世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最关键的是中国当局的决策，而非外来的压力。

对国内工人的影响

正如中国政府期望的那样，随着贸易壁垒与投资障碍的消失，外国公司可以更便利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在中国投资。与之相伴的是，大量国企面临严重亏损进而倒闭——部分来自非国企的竞争，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10]

另一个问题是，外国企业倾向于雇佣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工人，因为他们具有技能、健康良好、知识专业以及更有活力；农村流动人口受雇的原因是因

---

[7] Margaret M. Pearson. 1999.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 In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New York,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66, 169, 176.

[8] David M. Lampton. 2001.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1–82; *The Financial Times*, 15 March 2002.

[9] David Zweig. 2002.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6.

[10] State firm losses grew from 34.9 billion yuan in 1990 to 74.4 billion yuan seven years later. See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177.

为他们愿意拿着很低的工资干苦工。[11]而中国雇主认为，雇用年长工人的成本更高，因为他们体力下降、医疗费用更高；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已经过时，而且与工作无关。[12]雇主还考虑到，直接雇佣受过教育的或流动的年轻劳动力要比重新培训自己的工人要更省钱。[13]正如一位世贸中国谈判代表所言："新工作的年龄上限普遍在 35 岁。"[14]

当时，除了东部沿海的几个主要工业基地，中国大部分的纺织技术已经过时，设备年代久远，面料品种过于简单，没有市场；工人受教育程度太低，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的需求。[15]因而，本应在外贸中占优的纺织部门，[16]有 1600 万名工厂工人被解雇，1999 年底，有 900 多万根过时的纺锤被故意销毁。[17]内陆的主要工业城市武汉，在上世纪 80 年代一度拥有超过一百家国有纺织厂，但到了 2001 年一个也没留下。[18]取而代之的是合资企业，而合资企业的新所有者要求解雇大量员工。其他企业在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与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无法生存，结果是要么被其他工厂吞并，要么倒闭。[19]此外，关税及其他壁垒的降低意味着化纤进口的增加，这对国内市场造成了新的压力。

许多行业的工厂解雇了大量工人，例如制药、仪器、汽车、化工、石油、钢铁、造纸和机械制造等行业。[20]正如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大量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其中大部分流向制

---

[11] 张传宏："下岗向失业并轨面临'六难'"，《劳动保障通讯》，2001 年第 5 期：第 32 页。

[12] 莫荣："就业：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抉择"，载于李培林、黄平、陆建华编：《200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222 页。

[13] "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试点情况"，《劳动保障通讯》2001 年第 3 期：第 40 页。

[14] Zhang Xiangchen 张向晨. 2002.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WTO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Lecture given at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3 March.

[15] 唐文琳. 2000. 应对 *WTO*—中国九大行业的危机与对策 [*Facing WTO: The Crisis in Nine Large Chinese Se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Nanning: Guangxi Renmin Chubanshe, 145–64.

[1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October 2002.

[17]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E/3749, p. G/9, 28 January 2000,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25 January 2000.

[18] 采访武汉纺织行业协会，2001 年 10 月 29 日；殷增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武汉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社会科学动态》2000 年第 6 期：第 37 页。

[19] 孙淮滨："入世对我国纺织工业的影响及对策"，《内部参阅》2000 年第 5 号第 499 期（2 月 4 日）：第 5 页。

[20] 王绍光："谁将是加入 WTO 后的赢家和输家"，《改革内参》2001 年第 15 期：第 10、12 页。

造业，但未能阻止中国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的一类产业）就业率的急剧下降。”[21]总之，那些找到了新工作的人——无论是在外资银行、信息技术、金融和保险、电信和高科技行业或装配线工厂，并不会是那些下岗的工人。

至关重要的是，加入世贸前的几年，政府开始执行一项削减老龄劳动力的政策，旨在提高效率、增强全球竞争力，为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做准备。1996 年末，成功从一连串的高通胀中“软着陆”后，当局推进了一项搁置了数年的国企改革计划。[22]一项名为“抓大放小”的新政策，相当于出售小型国有企业，让它们的员工在新的开放市场上自谋生路，没有任何保障（见本书中李静君、赫斯特的文章）。[23]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上，高层官僚支持“减员增效”的口号，这也成了劳资关系的新口号。

早在 2000 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计划财务处在 10 个城市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发现：超过 36%的失业人员已经失业三年以上， 48.5%的人失业一到三年；[24]其中 89%表示他们的收入下降，56%的人月收入不足 300 元，只有 3%的人月薪在 800 元以上——这不是一个大数目。

同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指出，下岗或失业职工家庭平均月收入大约只有 272 元——是全国城市平均工资的 55%。[25]虽然官方统计中 2000 年下岗与失业人数不到 1200 万，[26]但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在 2001 年年中，总数接近 6000 万。[27]

---

[21] Thomas G. Rawski. 2003.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Labour Economy,’ available online at: ssrn.com/abstract=907450 or dx.doi.org/10.2139/ssrn.907450.

[22] H. Lyman Miller. 1999.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Politics: Trends and Prospects.’ In *China’s Future: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Conference Report*, September.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45.

[23] Joseph Fewsmith. 1999. ‘China in 1998: Tacking to Stay the Course.’ *Asian Survey* 39, no. 1: 100.

[24] “10 城市企业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基本状况的抽样调查”,《中国劳动》2000 年第 12 期：第 51—53 页。

[25] 胡鞍钢编著：“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国情报告》第 78 期，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根据官方数据，1999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5888.77 元。

[26] 乔健：“加入 WTO 背景下的中国职工状况”，载于李培林、黄平、陆建华编：《200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 315 页。

[27] 王德培：“‘三民’与‘二次改革’”,《改革内参》2001 年第 7 期：第 25 页。中国 1995 年至 2000 年中，下岗失业人数共 5500 万人，数字引用自胡鞍钢，《华夏文摘》2002 年 7 月 9 日。

全国总工会根据地方劳动部门的统计数据报告称，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98 年，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为 50%；1999 年为 42%；而在 2000 年的前 11 个月，降至 16%。[28]据新华社报道，2002 年上半年，再就业率跌至 9%。[29]

正如一份官方刊物所指出的那样，失业者大多是“低素质劳动力”；他们“将被劳动力市场彻底拒绝，因此形成一个长期不稳定的群体”。[3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同样推测，这些人“只会被排除在外，过得越来越差，几乎没有机会解放自己”。[31]这些话后来被证明相当准确。[32]

即时反应

出于上述的理由——为了成为世贸成员国，政府采取的新市场措施，例如促进竞争、刻意淘汰旧劳动力等——中国国内的失业率飙升，制造了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公安部的一份内部报告称，2000 年的前 9 个月，共发生了 3 万起“群体性事件”。这个数字包括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失业、拖欠工资和养老金的问题。文件得出的结论是，爆发的数量逐年递增，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更加暴力，组织化程度更高，成员更加复杂，管理难度也更大。

总之，随着中国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数以百万计处境较好的公民奋发迎接挑战，获得了更高的职位；但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困境，他们的工作变得不稳定、潜力未得到开发，处境日益绝望，完全没有购买全球市场与商人提供的任何诱人产品的能力。尽管国家确实推出了一个十分不足的社会援助计

[28] 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关于下岗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及社会保障接续问题的调查”，《中国工运》2001 年第 5 期：第 14 页。

[29] Cited in Terence Tan. 2002. ‘China’s Jobless Can’t Get New Work.’ *Straits Times,* 27 September.

[30] 易杳：“加入 WTO 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瞭望新闻周刊》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46 期：第 23 页。

[31] 杨团、葛道顺：“社区公共服务社——消除边缘性的社会政策研究”，论文发表于“华人社会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问题” 研讨会、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32] Dorothy J. Solinger. 2006. ‘The Creation of a New Underclass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18, no. 1: 177–93.

划——最低生活保障，抚平突然失业的创伤，但即使在二十年后，大多数受害者仍没有稳定的工作，生活在贫困与不知所措之中。

2002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中国工人展开持续不断的行动与抗议。一方面，感到被国家背叛并被排除在新的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国企工人进行了“绝望的抗议”。这通常包括占领工厂、大规模示威或封锁道路等破坏性行动。另一方面，农民工参与了“反歧视的抗议”，他们诉诸法律手段，主要为了争取补发拖欠工资、改善恶劣劳动条件等诉求。通过观察 2002 年的辽阳罢工——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劳工抗议活动——本文将探讨千禧年之交中国锈带国企工人的困境。

辽阳罢工与中国锈带的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解体

李静君（Ching Kwan LEE）

2002 年 3 月中旬的一周多时间内，中国东北锈带的老工业城市辽阳，数万名工人走上街头。其中一些人抬着一副巨大的毛泽东肖像，画像被装在四根肩杆上，顶部还有着红丝带结为点缀。一些人热情地唱着《国际歌》，一位老妇人高呼："毛主席不该走得那么早!"地方政府腐败而引起的愤怒，以及国企破厂后经济困难的压力，多达二十家工厂的工人一度在辽阳市政府大楼前示威。他们要求支付拖欠数月甚至数年的工资、养老金以及失业津贴。但是，最令当局震惊的是，他们坚持要求撤换当地立法机构负责人兼前市长的职务，因为他的七年领导期间滋生了猖獗的腐败，给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海外人权组织称这是自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血腥镇压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体反抗行动（见本书中张跃然的文章），但是这一次，工人成为在场的主要社会群体，没有知识分子、学生或私营企业家加入他们的抗议活动，官方媒体在市级与国家级层面都对这场事件进行了管制。

辽阳就像东北辽宁省许多老工业城市那样，曾经是一座自豪、繁华的工业中心，曾拥有十几家主要的军工厂与一家 20 世纪 90 年代凭法国技术援助建设的知名化工厂——如今，却弥漫着灰暗、病态的气氛。许多失业工人聚集在临时的"劳务市场"，手中拿着或脖子挂着标有自己技能的牌子：水工、电工、保姆、裁缝等等，只有他们的脸上才能找到过去辉煌的影子。这座 180 万人口的城市主干道上，有许多玻璃窗破损的废弃砖砌车间，其中一家就是辽阳辽冶铁合金厂（辽铁），抗议的中心。这家国企的三千员工连续四年向当地政府请愿，指控企业管理层存在财务违规，拖欠工资、养老金、失业津贴与医疗报销。大楼正门附近的柱子上贴满了海报和公开信。其中一封致"辽阳市人民各届同胞"的公开信写道：

> 我们工人群众不会容忍这伙腐败分子非法使得我们的厂子破产。我们必须夺回正义和尊严。我们不会放弃，直到拿回所有的福利金、拖欠的工资还有赔偿金……我们尊敬的同胞、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危害人民生命、扰乱社会秩序的流氓。我们的要求都符合宪法和法律……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合法的权利和反对腐败而斗争。辽阳精神万岁！[1]

这些公开信直指当地政府的腐败与相互勾结的企业管理层，控诉声震动人心。中央政府政策规定的各种工人补偿只是一个空洞但诱人的承诺。辽铁工人的不满与中国各地城市，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许多工人一样，他们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参与这次抗议运动的众多工厂中，有一位心灰意冷的前党委书记向我解释，不同的抗议工人群体心中都有自己未解决的账本。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当地政府对他们的困境负责：

> 首先，下岗职工没能拿到每月 180 元的津贴。其次，还有退休工人抱怨没有得到中央前两年承诺的特殊津贴。当时规定，按照工龄，退休工资每月额外支付一块八毛。最后，有的退休干部革命前就入党了，他们抱怨退休人员待遇不平等。原本规定四九年以前参军每月能领 1800 元退休金的政策，但抗战结束后投诚的军人只领到一半。这些人当然不高兴……然后就有“我们要吃饭”“还我工资”的横幅……人们怀念毛主席那时候，人人都活儿干，社会稳定平等……我一辈子都搞政治教育，现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九十年代初开始搞主任负责制了，我这个党委书记就靠边站了，都随他（主任）管理和决定人事了，完全没有约束。

清算时刻

由于跨工厂参与和明确的政治诉求，辽阳的抗议活动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密切关注。尽管工作场所之间的反抗迅速瓦解，但它短暂的存在向当局表明，工人阶级的骚乱很可能升级，超越基于经济与生计问题（对工资、养老金、医疗福利与破产赔偿相关的不满）的局部、单一的工厂动员模式。就社会学意义而

---

[1] 无法找到原文，由英语转译。下同。——译者注。

言，辽阳这种“蜂窝式行动主义”是中国改革时期的典范。警方关于示威活动的统计数据虽然令人吃惊，但只反映了这种现象的一小部分。仅在辽宁省，2000 年至 2002 年，就有超过 83 万人参与 9559 起“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天要爆发 10 起事件，每起涉及 90 人，持续了近三年。[2]全国范围内公安部记录的此类事件，从 1993 年的 8700 起，上升到 1995 年的 11000 起， 1997 年的 15000 起，1999 年的 32000 起。[3]到了 2003 年，全年全国共有 300 万人，包括农民、工人、教师和学生，参与了约 5.8 万起事件。[4]其中，最大的群体是 166 万下岗职工、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占当年参加人数的 46.9%。[5]在 2004 年至 2005 年期间，社会动乱继续激增，公安部宣布，这两年的骚乱与示威事件从 74000 起增至 87000 起。[6]

中国庞大的下岗与退休无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着拖欠工资、养老金违约，以及企业福利体系的崩溃，引发了日益加剧的劳资纠纷。据官方工会统计，国有和集体企业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总数从 1993 年的 260 万人增加到 2000 年的 1400 万人。[7]辽宁省会沈阳，一项调查显示，1996 年至 2000 年，超过四分之一的退休工人被拖欠养老金，四分之一的在职工人被拖欠工资。[8]雪上加霜的是，2002 年，中国政府开始试行一次性离职补偿方案，用 470 元“买断”每年工龄（这是沈阳的金额，小城市还要更少，不同行业也有所区别）。许多工人只是简

---

[2] Murray Scot Tanner. 2004. ‘Protests Now Flourish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 June.

[3] Minxin Pei. 2003. ‘Rights and Resistance: 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the Dissident Movement.’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2nd ed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9.

[4] Josephine Ma. 2004. ‘Three Million Took Part in Surging Protests Last Y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June.

[5] 乔健、姜颖：“市场化过程中的劳动争议和劳工群体性事件分析”，载于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编：《200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300 页。

[6] Howard French. 2005. ‘Land of 74,000 Protests (But Little is Ever Fixed).’ *The New York Times,* 24 August; Joseph Kahn. 2005. ‘Pace and Scope of Protests in China Accelerated in ’05.’ *The 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7]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编：《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1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年：第 67、90 页。

[8] John Giles, Albert Park, and Cai Fang. 2006. ‘How H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ffected China’s Urban Workers?’ *China Quarterly* 185: 61–95.

单地拒绝了“工龄”可以被出售的想法；还有更多人发现，他们的劳动对于社会主义价值而言变得微不足道，国家永久地放弃了对工人的责任。自 1995 年以来，国家和集体部门的工作单位裁减了约有 2700 万至 4000 万工人，而新的福利安全网络存在明显的漏洞，他们深感不安。[9]全国范围内，愤怒与绝望的工人在脑海中与极具挑战性的疑问抗争：国家多年来鼓吹工人拥有企业，那么谁该来为企业的崩溃负责？现在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的终身贡献能卖几个钱？谁来为此买单？每年的工龄能值多少钱？养老金法规与破产法为什么就是不执行？简而言之，工人在广义上争论他们的劳动价值，不仅是对下岗补偿金的数额，还对劳动的意义、政府的合法基础以及公正社会原则提出质疑。20 世纪 90 年代是在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成长的工人对后毛泽东时代改革体制进行清算的时期。

蜂窝式行动

锈带工人骚乱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围绕着局部、有界限的工作单位或其子群体组织起来，边界是由国家政策所界定、划分。蜂窝式行动与波兰团结工会为例的有组织的劳动运功不同（见本书中威尔逊的文章），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场所或威权政治体制中隐蔽、原子化的日常抵抗形式。蜂窝式行动主义不是工人意识狭隘的结果，也不仅仅是跨工厂网络遭到国家压制的妥协，而是与改革时期工人利益的构成方式有关。经济决策权的下放，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以企业自主权为名义的企业管理层，形成了地方化的利益与责任共同体。工人将养老金和工资拖欠的责任归咎于他们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是因为这些机构被赋予了管理国企的权力和责任。权力下放与市场竞争相结合，也导致企业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即使是在同一地区或城市的企业之间。除了这些差异之外，国家政策继续给予不同行业、不同群体或不同形式的失业工人不同的权益和补偿，尽管这些往往都微不足道，。但也导致了工人利益五花八门的变化。

---

[9] 失业人口规模的估计各有不同，失业调查领域的著名社会学家李强认为 2002 年的数字为 2730 万。见 Li Qiang,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Manuscrip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统计，1998—2001 年，累计下岗职工 2500 万，失业人员 1280 万。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02 年中国就业报告》，北京：中国劳工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年：第 25 页。

虽然工人阶级被分割成不同的蜂窝利益团体，并没有使得集体行动瘫痪，但的确在工人之间造成了隔阂，并将他们引向分散的行动单位。

工人的抗议不仅受到生产领域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即工人在参与并依赖工资工作之外如何生存，以及这如何塑造锈带工人的利益与能力。工作单位的住房是推动并限制锈带工人行动的关键因素。国企工人的住宅区是自成一体、包罗万象的社区，工作和非工作生活都在同一地点进行。这种模式在劳动冲突时有利于沟通和利益的聚集。然而，企业破产与大规模失业的同时，城市住房改革允许工人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福利住房的产权，让他们也成了房产业主。工人可以出售、出租或将房产传给他们的后代，即使是工厂倒闭，以及退休之后。住房可能是最持久、最重要的再分配财产。无论工人在工作场所有多绝望，房产都能使得他们免受市场竞争造成的贫困与被剥夺，从而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并忠诚于改革政权，而改革制度同时也使得他们被边缘化。这是锈带工人的反抗所面对的结构性限制。

道德经济抗议？

一些研究中国劳工的学者认为，辽阳工人骚乱是一种道德经济的抗议形式。[10]中国工人怀念失去的生存权利，利用改革前国家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与旧的阶级话语，要求恢复传统的权益。这种道德经济的解释有效但不够充分。尽管工人的反抗是由恢复旧有权益与维持生存的伦理驱动，但我也发现有着其他同时存在的政治与文化逻辑推动着工人的行动。与其将工人视为被禁锢在某种回溯过去的传统政治心态中，更准确的是，工人正在经历一场剧目，通过他们正在经历的制度改革形成多元的工人主体性。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 00 年代的中国司法改革，无论多么局限或是不平衡，都赋予了工人新的权利、利益以及行动的概念，这与当局坚持的毛泽东群众概念一样。公民享有司法正义的权利与群众反抗腐败官员的合法性，都是劳工动员的有力框架。因此，我

[10] Feng Chen. 2003.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 Resistance in China.’ *Modern China* 29, no. 2: 237–62; Elizabeth J. Perry. 1999. ‘Crime, Corruption, and Contention.’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 edited by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08–32; William Hurst and Kevin J. O’Brien. 2002. ‘China’s Contentious Pensioners.’ *China Quarterly* 170: 345–60.

们应该强调，工人阶级、公民与底层的并置是同样重要的，甚至说，这些身份构成一种不断变化的政治主体性，而工人必须通过这些主体身份开展行动。根据戈兰 · 瑟伯恩（Göran Therborn）的论述，中国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或主体，可以将意识形态转化为权力，在那些旨在征服他们的意识形态称谓中找到行动和抵抗的资源。[11]就像阶级的形成一样，我们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但可以解释何时何种意识形态询唤的过程，构成了怎样的集体行动的基础。在进行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也为推动法律和福利改革的新方向作出贡献。

在这场劳工反抗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分化并征服了领导人和普通工人，并将扁平化组织的异议与地方蜂窝式的动员隔离开来。辽阳抗议之后，官方迅速向工人提供了大部分被拖欠的资金。

同时，当地新闻媒体谴责抗议领导人“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指的是外国记者、工人曾与权利团体还有中国民主党派的联系。两名工人领袖被判处 4 至 7 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北京的共产党反贪部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遣人员前往辽阳调查这些投诉。相关官员被逮捕、降职或免职。

地方和中央两级政府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在默许、甚至宽容的领域与禁区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默许的范围内，政府可以有选择地满足工人最紧迫的生计诉求，或是对缴纳社保与破产程序的实施进行具体改进。

然而，一旦工人转向有组织的政治抗议，就会被国家无情镇压，逮捕并监禁主要的鼓动者。因此，国家对民众的不满有所反应，尽管反应缓慢、不稳定，有时甚至以压制回应。劳工反抗并未成为挑战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效催化剂，但在失败中成功产生了对社会政策变革的压力。

---

[11] Göran Therborn. 1980.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Books

2003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收容遣送站就是党和国家控制中国高速增长的流动人口的基石之一。收容站最初设立于 1982 年，据称旨在帮助城市地区的乞讨者与流浪者，到了 90 年代初，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至没有固定住所或工作许可的人。警察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可以任意拘留没有证件的外来人口，致使他们遭受各种虐待。对于这项制度的批评在 2003 年达到顶峰。当年 3 月，一位名叫孙志刚的年轻平面设计师在广州的街头被警察拦下，他在几周前刚刚抵达这里。 孙志刚原籍湖北黄冈，两年前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由于他当时没有携带身份证与暂住证，警察怀疑他是“三无”人员，把他带到了警察局。他的朋友试图为他保释，却遭到警察的阻止。次日，他被转移到一处收容遣送站，两日后身亡，死因据称是“心脏衰竭”。当局拒绝调查他的死因，广州一家进步报纸展开深入调查，并将详情公之于众。记者揭露的真相，加之网络舆论与司法社运的压力，引发公众哗然，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孙志刚事件

柯蕾（Chloé FROISSART）

2003 年 3 月 17 日，湖北黄冈人，时年 27 岁，两年前刚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平面设计师孙志刚，刚来广州不到 20 多天的他，在一家服装行业的私企工作。他在广州的街头被警察拦住，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与暂住证，他被带到派出所，并被怀疑是外来“三无”人员。当晚，孙志刚的室友将他的身份证带到派出所，想用钱把他保释出来，但警方却拒绝了他。次日，孙志刚被转移到收容遣送站，他所在公司的老板想把他保出来，但没能成功。3 月 20 日，收容人员救治站宣布，孙志刚死于心脏衰竭。一个月后，孙父要求的尸检报告显示，孙志刚死于外伤导致的严重内出血。当局拒绝调查儿子死因，孙父决定向广州一家直言不讳的进步报纸《南方都市报》求助。4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经过详尽调查后，刊登了一篇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文章，揭开了事件的真相。[1]这便是人们所知的“孙志刚事件”的开端。

孙志刚案在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收容站可以任意拘留无法向警察出示证件的外来人口，有时还会在被遣返回家之前强迫他们劳动。这一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最激烈的警务变革之一，对警察-国家造成了持久的打击。其次，这一成就得益于一种新型抗议模式的兴起，结合调查性报道、网络舆论的压力以及司法社运。这揭示了一种新的普遍公民意识——外来农民工与城市公民之间相互认同，并为要求法律面前公民平等的新型司法社运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进而引发胡温时代的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最后，此案意味着推动农民进一步融入城市、被视为正式公民方面上的一个里程碑。

[1] 陈峰、王雷：“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遭毒打致死”，《南方都市报》2003 年 4 月 25 日，在线链接：news.sina.com.cn/s/2003-04-25/09501015845.shtml。

导致孙志刚事件的因素

在孙志刚案中，一系列事件与状况的交汇创造了取得积极成果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改变。2002 年 10 月，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温家宝于 2003 年 3 月接替朱镕基成为总理，他们热衷于建立一种更加“对群众负责”新型治理风格。这种手段意在与体制内仍保持着重要影响力的前任领导对抗。[2]胡温政府希望通过强调法治、尊重宪法以及减少社会不平等，从而与前任政府——被视作以巨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推动全面经济改革——区别开来。胡温政府执政后，就受到了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危机的考验，下级官员被指控掩盖了疫情的规模。对疫情的迟缓反应导致中国在国际上遭到批评，这迫使政府更加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媒体也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来进行准确及时的报道。

不同于江泽民时期的“效率至上”，胡温强调建设“和谐社会”，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来帮助边缘群体。农民工是第一批受益者。2003 年 1 月，传统上用于确定当年政治优先事项的《中央一号文件》承认，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与城市化同步进行，并敦促各地政府积极授予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文件还呼吁严惩任何对侵犯农民工尊严或个人权利的行为。在媒体的支持下，官方鼓励地方政府促进社会对农民工的尊重。[3]这份文件标志着管理流动人口与对农民工看法的转变，并为要求公民平等待遇铺平了道路。

《一号文件》还规定，必须停止收容遣送站对农民工的逮捕和不当拘留。2002 年，有影响力的智库和知名社会科学家撰写了大量批评报告，指出这些收容站是如何偏离最初的社会福利目标。1982 年创立收容遣送站的初衷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是乞丐和流浪者，并将他们遣送回户籍地，由理应负责的地方政府进行社会照料。然而，市政当局越来越多地利用收容站控制流动人口并“维持社会秩序”。农民工必须通过暂住证才能在城市合法生活并工作，再加上警方定期开展的打击无证外来人口的“严打”运动，收容遣送中心已经成为将外来人员视同犯罪的警察-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

[2] 例如，江泽民仍是中央军委主席。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003 年 1 月 16 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在此期间，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也发表了农民工的证言，谴责警方肆意妄为的抓捕以及骇人听闻的拘留条件。[4]农民工挤在拥挤的牢房，没有适当的食物，经常受到身体虐待、侮辱、勒索并被迫通过劳动支付食宿与遣返费用。2001 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一项通知，敦促各地取消对外来人员征收的所有税款，但地方政府要求警察加大检查力度，通过收容遣送站的拘留弥补失去的收入。尽管暂住证的费用降低，但总体上发放的暂住证数量增加了，据称这是为了补偿农民工对城市设施的使用，并缓解市政当局将农民工纳入管理的压力。[5]

因此，一切引爆舆论的因素都已具备：局势逐渐失控，中央政府有意遏制市政当局的权力滥用，再加上已经知情的公众。唯一缺少的就是导火索：这就是孙志刚案。

调查性报道的高光时刻

孙志刚案催生了一种新型抗议范式，将调查性报道、互联网论坛的公共辩论与公众施压，以及旨在将国家“法治”意识形态话语落实为法律制度的司法社运结合在一起。[6]

《南方都市报》通过调查制衡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滥用，不仅独立地提供信息，而且从一开始就将该案纳入法律范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之死的详细报道明确指出，参照《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只要孙志刚能出示身份证，证明自己有住所和工作，对他的拘留就是非法的。也就是说，仅仅因为无法出示暂住证 并不足以构成送进收容所的理由。报道还提出了对掩盖真相的担忧。一篇署名为“子曰”的激进社论附在报道后，文中指出，孙志刚很明显是在拘

[4] Chloé Froissart. 2013. *La Chine et ses migrants: La conquête d'une citoyenneté* [*China and Its Migrants: The Conquest of Citizenship*].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s Rennes, 119–28, 323.

[5] Ibid., 321–23；国家计委：《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2001 年，北京：财政部。

[6] 关于这一时期的调查性报道，例如见 Ying Chan. 2010. 'The Journalism Tradi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David Bandurski and Martin Hal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17.

留期间被殴打致死的，文中明确批评了当局对这场事件的处理，并呼吁读者意识到，这类悲剧很可能在所有“普通公民”身上发生。[7]

因此，《南方都市报》先是在揭露悲剧，后是在向当局与公众呼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广东省委宣传部试图阻止当地报纸进一步报道此案，但很快其他媒体争相报道，同一天，另一家广东的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几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其他国有媒体迅速将这场事件推上头条热榜。[8]该案就此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

网络力量

孙案揭示了互联网作为公共辩论场与向当局施压的手段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正如传媒学者萧强（Xiao Qiang）所述：“在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网发布了两个小时后，这条新闻有了四千条读者评论。几乎在第一时间，从官方网站到个人播客再到电子邮件群组，整个中国的网络空间都在讨论该案。”[9]关于孙案的评论，不仅包含对孙志刚之死的愤怒，对惩戒当事人的诉求，还涉及到对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执法人员普遍滥用职权的抱怨。网上的反应混合了道德判断与引述宪法的法律陈述。主要讨论的主题设计尊重人的生命，保护公民免受权力的肆意支配。[10]

然而，这些抱怨并没有质疑政权，而是要求党和国家寻找解决方案，采取措施保障公民权益。这些批评没有超出党的法治话语框架，这也是它们能够有效的前提。但毫无疑问，互联网上表达的抗议规模与内容超出了当局的限制。尽管互联网的审查制度使得我们无法以规范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

[7] 子曰：“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南方都市报》2003 年 4 月 25 日，在线链接：news.sina.com.cn/s/2003-04-25/09531015847.shtml。

[8] Keith J. Hand. 2006. ‘Using the Law for a Righteous Purpose: The Sun Zhigang Incident and Evolving Forms of Citizen A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5, no. 1: 122.

[9] Xiao Qiang. 2004. ‘“Online Uprisings” Are Changing China.’ *Gulf News*, 6 August, available online at: gulfnews.com/uae/online-uprisings-are-changing-china-1.329063.

[10] Isabelle Thireau and Linshan Hua. 2005. ‘De l’épreuve publique à la reconnaissance d’un public: le scandale Sun Zhigang [From Public Event to Public Recognition: The Sun Zhigang Scandal].’ *Politix* 71: 141–44.

但只要党的领导地位不被质疑，互联网仍然可以被视作一个互动的空间，个人可以在其中表达、交换自己的观点并作出批评性的判断。简而言之，通过向当局施加压力并进而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一种“公共”正在变为现实。

既然媒体已经披露了许多流动人员在收容遣送站被虐待致死的事件，为什么孙志刚之死引起了如此规模的公众愤慨呢？答案可以从对孙志刚的广泛认同中找到，这也是推动这场动员的真正力量。[11]媒体强调孙志刚作为大学毕业是与私企技术职员的身份，这是让大量城市读者认同这个农村外来人员的关键。

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艾晓明是最早公开评论此案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她很好地总结道：“这可能发生在我的儿子身上、我的学生身上，甚至任何人身上。”[12]同时，孙案也是农民工意识到自身公民地位的关键一步，推动他们去挑战原本仅仅作为“农民”的身份认同。引用广州一位农民工的话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打死了中国人。”[13]因此，孙案标志着超越城乡身份划分的普遍公民意识的崛起。[14]

法律动员

2003 年 5 月 14 日，三位年轻的法学博士许志永、滕彪和俞江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质疑 1982 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并要求废除。他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提出请求，并以 2000 年的《立法法》为依据，该该法赋予任何法院或中国公民提出废除违宪法律的权利。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许志永解释道，这一过程的最终目标是澄清在中国谁有解释法律的权力。[15]

最终，情愿者的作者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全国人大的宪法法院，前者的常务委员会独立于司法机构之外，有权废除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法规。这种追求

---

[11] Froissart, *China and Its Migrants,* 325–26.

[12] Pierre Haski. 2003. ‘La Chine mate ses matons [China Tames its Guards].’ *Libération,* 14 June.

[13] Siew Ying Leu. 2003. ‘Scrapping of Migrant Laws Prais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 June.

[14] Froissart, *China and Its Migrants,* 324–28.

[15] Erik Eckholm. 2003. ‘Petitioners Urge China to Enforce Legal Rights.’ *The New York Times,* 2 June.

“内部变革”的法律主义策略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许志永将其与 1989 年天安门示威者的策略区别开来：“我尊重过去提出人权问题的人，但现在我们希望在法律体系提供的空间内以建设性的方式工作。”[16]

第一份请愿书提交给全国人大后不到一周，北京大学的五位著名法学家撰写了第二份请愿书，要求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查孙志刚案与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可能性。这份请愿书引发了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历史、目标以及所滋生之滥权行为的讨论。两份请愿书都得到了媒体的支持，并在网上收集了数百个签名，引起了广泛的评论。

如果党没有重申加强法治的意愿，没有提供法律手段以实现这种新型的对法律条文的抗辩与质疑，这种动员就不可能实现。作为一场为“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捍卫并维护全体公民之权利”的斗争，孙案揭示了中国公民在良心和行动上的主张。[17]

不完整的胜利

五月，中央领导层采取措施，处理公众对孙志刚之死的不满。他们下令广东省政府彻查，结果显示，收容人员救治站护工因孙志刚的不服从而恼羞成怒，于强迫八名“被收容人员”殴打孙志刚。法庭判决十二名殴打或煽动殴打孙志刚的被告有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至死刑不等；另有六名公安人员因玩忽职守而被判处二至三年有期徒刑；二十三名官员遭受行政处分。然而，严厉的制裁、迅速的调查和审判并不足以平息公众对掩盖行为的担忧。这些判决也未能结束公众对滥用执法、农民工待遇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合法性的抱怨。[18]

6 月 18 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特别会议，宣布 1982 年确立的收容遣送方法不再适应过去 20 年里发展起来的新流动人员模式的现状并宣布废止该办法。6 月 22 日，国务院公布了新的措施，以救助管理站取代收容遣送站，由民政部及其地方分支机构而非公安部负责。这是一项重大转变，标志着这些收容

[16] Ibid.

[17] Citation from T.H. Marshall. 1981.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einemann, 10.

[18] Hand, ‘Using the Law for a Righteous Purpose’, 126–27.

站不再以维护公共秩序与限制流动人口为目的。新措施的实施日期定为 2003 年 8 月 1 日。[19]

7 月 21 日，民政部公布了一项执行法令，确认新的救助站仅供无力养活自己的乞丐和流浪者，特别是没有住房或资源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根据新规定，必须告知受助人可以获得的援助，并通过“引导”的形式将他们带进救助站，禁止强迫进入或阻止离开（未成年人与某方面无法自理的人除外）。援助是临时的，通常不得超过十天，期限后，救助站必须安排受助人由其亲属、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地方当局照顾，必要时资助其返乡。法令同时禁止救助站工作人员向受助人及其亲属索取费用，还禁止以“任何借口”在救助站内组织生产活动。简而言之，新措施更强调救助站作为一种社会服务形式，并注重受助人的权利。

政府表现出了实施上述措施的真正意愿。自措施颁布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批城市就宣布将收容站改名为救助管理站。[20]然而，通过召开国务院特别会议，总理回避了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也没有理睬三位法学博士的请愿，对这些措施的合法性与合宪性进行裁决。与他们的期望相反，法律的解释权仍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并受到当时总理的决定影响）。因此，改革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改革，而非政治改革，但即使司法领域，改革也相当有限。法学家在请愿书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根据《立法法》，涉及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应通过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解决。如果全国人大依照《立法法》裁决，就会创造一个先例，威胁到其他形式的行政拘留（如劳动教养）的国家规定。此外，若是全国人大接受有关个人自由的论点，公民就可以利用这项先例质疑户口制度和其他行政控制机制。[21]

温家宝对请愿的处理避免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时也及时回应了公众的呼声，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新领导层的合法性。孙志刚案成为中央政府向市政部门重申其权威的一个机会，并结束了越来越被人们视为消极的、威胁社会秩序的政策。然而，广州市政府通过关押《南方都市报》的几位记者，发出了确切的信号：这种事情不能再次发生。《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与他的两名同时遭

---

[19] Froissart, *China and Its Migrants*, 328–31.

[20] Ibid.

[21] Hand, ‘Using the Law for a Righteous Purpose’, 141–42.

到莫须有的贪污指控，关押了五个月。2004 年 10 月，程益中被解除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被禁止从事记者工作。[22]总之，这次改革很好地诠释了政府所定义的“法治”：通过小幅度调整，使得制度更加高效、合法，以便更好地维持制度。

孙案的余波

孙志刚案是农民工进一步融入城市，并得到正式公民待遇的里程碑。孙案所引发的能量以公民平权之名推动暂住证的废除。许多知识分子与学者支持改革，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合法居住在他们选择的地方，或者至少建立一套不以居住地来决定个人利益的登记制度。

接下来几年，中国的城市逐渐废除了限制农民工在城市内合法拘留的许可证，如工作许可证、就业许可证以及对农民工开办企业和获得住房的限制。暂住证被居住证取代。时至今日，农民工仍然需要在抵达城市后的数月内到公安局登记，但登记期限已从三个月延长到六个月，居住证的办理费用降低至数十元，当局也更多地通过激励而非限制的手段推行这一措施。[23]

事实上，尽管北京当局保留着定期“清理”首都外来人员的权利，但却再也没有组织过“严打”行动，而是通过 2008 年奥运会，以及 2017—2018 年之间冬季的一场火灾，给予他们方便的借口对农民工聚集的地区进行“再开发”。最重要的是，孙案是司法社运与宪法主义发展的分水岭，引发了涉及劳工问题等领域的法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24]

---

[22]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04. ‘Editor-in-Chief Dismissed: Crackdown on Guangzhou Press Continues.’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27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ifex.org/editor-in-chief-dismissed-crackdown-on-guangzhou-press-continues.

[23] Froissart, *China and Its Migrants*, 332–34.

[24] Hand, ‘Using the Law for a Righteous Purpose’, 158–92.

2007

2007 年春，一群孩子走丢的父母让中国媒体意识到山西省存在着一片庞大的“黑砖窑”群岛。这些“黑砖窑”的所有者与当地掌权者同谋，利用被暴力绑架或诱骗过来的孩童、青少年以及患有精神问题的成年人，当作顺服的劳动力使用。这些家长自发组队，怀着找到孩子的希望寻遍乡下，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竞相详细报道他们的故事，中国公众震惊地得知 21 世纪的中国还广泛存在着奴隶制，并积极行动起来向当局施压。本文回顾了那几个月的民众动员及其余波。

奴工：2007 年“黑砖窑事件”

伊万 · 弗兰切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1]

5041 个日子，5041 个帖子。日复一日，十多年来，一位微博博主自 2007 年 3 月 28 日就在不停记录着时间。那一天，15 岁的袁学宇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心的一处建筑工地失踪了。[2]每天早上，这位博主（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媒体名人）都会发布同一条消息：

> #寻找袁学宇#今天，第 X 天，@平安郑州 请问袁学宇案进展如何？山西黑窑事件的失踪窑工仍然失踪。网友捐助 40000 元用于奖励相关线索。郑州公安局于 2007 年已对袁学宇失踪立案。

袁学宇在失踪的几周前抵达郑州，给同村村民（装窗框的工人）当学徒。袁学宇和他的许多儿时玩伴一样，无法抵抗大城市回响在东北偏远村镇的呼唤，违背了父亲袁成的意愿，从中学辍学。袁成得知自己的儿子失踪时，立马来到了郑州，在同一处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工作。他四处张贴寻人启事，结果只有陌生人打电话给他，假装自己认识他的儿子，说他儿子出了事故，要他给自己打钱，然后消失不见。直到遇见有类似遭遇的父母之后，袁成才看到些许希望。他听着他们的故事，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被绑架卖到偏僻农村里的砖窑中做苦役。前景仍然渺茫，但他至少大致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了。

2007 年春夏，愤懑的父母组队在中国的乡村中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他们成为了当代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的关于民众动员和抵抗的故事之一——这就是所谓的“黑砖窑事件”。中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这是一连串充满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与前所未有的团结友爱（还有出卖）的故事。

---

[1] 本文是缩减版本，首发于 *Made in China Journal* 2, no. 2: 16–21.

[2] 见钭江明的微博帐号，在线链接：weibo.com/u/1197365250。

一位母亲的决心

导致媒体曝光这一丑闻的一连串事件始于 2007 年 3 月，一位名叫羊爱枝的女性发现，她尚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在郑州离奇失踪。[3]她绝望地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就像几周后袁成所做的那样。她的运气较好，没有被骗，而是有一名家长联系她，告诉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刚从山西一家窑场的奴役中逃脱。羊爱枝相信她的儿子可能就在类似的地方，于是她立刻启程赶赴山西。她跑了不下一百家窑场，几乎每处都有孩子被强迫做苦力，有些还穿着校服。回到河南后，她查阅了当地报纸上发布的失踪人员通告，最终与另外五位有着相同境遇的家长取得联系。他们共同成立了后来被中国媒体称为"寻子联盟"的组织。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成功地从窑场中解救了四十多名孩子。

他们意识到这一任务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于是向媒体寻求帮助。事实证明，由于他们的故事过于离奇，以至于只有一家河南的地方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付振中，同意陪同他们寻找。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2007 年 5 月 19 日晚，付振中用隐藏式摄像机拍摄的山西窑场中穿着破旧衣服从事繁重劳动的年轻男孩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付振中后来回忆，在节目播出后的三天内，大约有 1000 名家长到电视台寻求帮助。[4]看到电视上的这些画面，那些曾对自己孩子的下落毫无线索的父母发现了窑场的存在，并意识到还有很多人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于是，他们很快聚集在一起，组队前往山西的农村搜寻。

6 月 6 日，一名由"寻子联盟"解救的孩子的姑姑，选择在河南的地方门户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表示感激的"含泪"帖子。[5]这篇帖子迅速走红，最终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次日，山西的当地媒体曝光了洪洞县曹生村一家窑场关于奴

[3] 朱红军："少年血泪铺就黑工之路"，《南方周末》2007 年 6 月 14 日，在线链接：infzm.com/content/1422。

[4] 付振中："我亲手揭开山西黑砖窑的内幕"（2007 年），帖号在某些播客上仍然可用，见：sbhhong.blog.sohu.com/70587811.html。

[5] 朱红军："山西黑砖窑风暴被她点燃了"，《南方周末》2007 年 7 月 27 日，在线链接：infzm.com/content/5662。

役与杀害的悲惨故事，进一步激起了公众的愤怒。[6]从此，“黑砖窑”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词汇。

窑场的潜规则

2007 年整个夏季，中国媒体对这起丑闻进行了大量报道。报道揭露了窑场中的奴工构成，其中不仅包括被暴力绑架或以高薪诱骗而来的青少年，还有患有精神问题的成年人和儿童——他们是不会提出要求的顺服劳动力。郝定坡（音译）是经历鲜为人知的幸存者之一。他只有 15 岁，2005 年 3 月在郑州被绑架后，在窑场里待了两年半。根据他母亲的说法，他在 2007 年夏成功逃脱后，头发已经长到腰部，手腕上有一个编号。[7]他告诉我，窑场里从来不用名字，只用数字。[8]他们的日产量指标为一万块砖，如果不能完成，就会遭到残酷的殴打。如果一个逃奴在试图逃跑时被抓住，他们可能会被看守殴打致死，尸体被丢在外面的空地上腐烂，以示对其他人的警告。郝定坡声称自己目睹了六个人以这种方式死去，但他无法准确指出窑场的具体方位，于是无从考证。

这些令人震惊的境遇不仅对被奴役者的身体造成伤害，也摧残了他们的心理健康。2008 年 5 月，当我见到张山林（音译）时，距离他的儿子被解救出来已经过去了一年。他对自己孩子的心理健康表示担忧。曾经活泼开朗的少年现在却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包括成为厨师的梦想。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家，避免与人接触。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羞耻”，几乎每晚都会反复做噩梦，梦见自己在窑场里的日子，尖叫着醒来。

媒体凭借幸存者的证词，毫不留情地揭露并抨击窑场背后的权力运作。很明显，窑场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有很多人从中受益。《南都周刊》一篇关于曹生村臭名昭著的窑场的报道，引用了一位“前奴工”的话，窑场的生活就像“动物的食物链……链上有两个环：窑场主、负责工人的包工头、看守、老工人、新

[6] 2007 年 5 月 27 日，当地警方从这家窑场中救出了 31 名奴工。根据他们的证词，场内还有一名精神病患工人被活活打死。关于曹生村的窑场，见朱红军：“洪洞黑砖窑身世调查”，《南方周末》2007 年 7 月 21 日：A1—A2。

[7] 作者于 2008 年 5 月的采访。

[8] 同上。

工人、智障。”[9]窑场主通常是本地人，包工头通常来自其他地方——通常是找到受害者的地方。警卫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不同的证词，在许多窑场中，似乎都有将奴工提拔为看守的习惯，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奖励。[10]来自贵州省的刘东升是一个典型案例。刘东升十一岁时和母亲一起被卖给了河南某村的未婚男子。他未满 18 岁，就在曹生村的窑场里做奴工。刘东升因自愿揭发同伴的逃跑计划而脱颖而出，很快被提拔为看守，负责监督并殴打其他奴工。[11]2007 年的一次审判中，刘东升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与其他窑场的看守没有差别。[12]

窑场与周围社区的关系也非常重要。虽然许多描述中提到窑场的地理隔离，但它们并非孤立存在。曹生村前党委书记、臭名昭著的窑场主的父亲，王东记坦然承认，当地居民接受窑场的原因正是它们所能提供的经济好处，能够促进当地的发展，创造新的致富机会，最终扩大可耕种的面积。[13]他的儿子利用他的关系，以特别的价格向当地学校和村政府部门的公共工程出售砖块。[14]这种安排在村民中引起了一定的不满，但这位败类官员声称，这就使得整体社区受益。

来自当地社区的支持也是逃出窑场十分困难的原因之一。由于当地工人的价格过高，而且受到家庭与社会网络的保护，无法被剥削，所以奴工只能是“外地人”。有时，当地人甚至帮助窑场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这也是江苏省 38 岁的申海军的遭遇，他的母亲是一位 60 岁的寡妇，被亲戚卖给了山西的一个老光棍。[15]他自己到山西去找母亲，最终成了曹生村窑场的奴隶。申海军告诉记者，他抵达母亲被卖给的老光棍所在的农村后，向一位老妇人寻求帮助。这位老妇人借着帮他找工作的借口，把他卖给了王东记的儿子。

---

[9] 陈江：“黑窑奴工最后一站”，2007 年 7 月 20 日《南都周刊》第 138 期：A16—A28。

[10] 看守在窑场的微观世界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在我采访的父母中，有一位表示希望他的儿子被提拔为看守，这样他就不用吃苦了。

[11] 陈江：“黑窑奴工最后一站”。

[12] “洪洞黑砖窑主犯被判死刑”，《人民日报》2007 年 7 月 18 日，第 5 版。

[13] 朱红军：“洪洞黑砖窑身世调查”。2007 年 7 月，当局解除了王东记的党政职务。

[14] 王东已：“我却有失职之罪”，《新京报》2007 年 11 月 9 日：A66。

[15] 申海军被关了三个月，屡次遭到毒打。他的腿被看守打断了，因伤势不治而残疾。见刘建庄：“我为山西黑砖窑被害人打官司”，载于《法律与生活》2007 年 8 月第 16 期：第 47—48 页。

省政府的高层也卷入其中。中国媒体不仅揭露了山西省的中层官僚机构对窑场的存在心知肚明，还提供了一些官员直接参与的证据，[16]例如河南少年朱广辉令人不安的经历。[17]2007 年 4 月 27 日，朱广辉被警察从一个窑场救出后，随即被当地的劳动监察员卖到另一个窑场，他甚至从男孩被解救时得到的赔偿金中扣除了 300 元的“中介费”。在 5 月底的另一次警方行动中，朱广辉再次获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家当地电视台记录了他与卖掉他的劳动监察员之间的对峙情况。就在那天下午，劳动监察员再次欺骗了他，把他骗到了又一个窑洞。直到 6 月 18 日，朱广辉第三次获救，并最终得以安全地回到家。

当局的反应

早在 2007 年春夏的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公众就已听闻窑洞中奴工的存在。几年前，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张徐波的故事， 2002 年，他从一所农村中学毕业后，去西安找工作，却被一个陌生人欺骗，被卖到山西栲栳镇的一家窑场。[18]三个月来，他要在严寒的天气中每日劳作 16 个小时以上，多次被看守殴打。11 月，他的双腿被冻伤，几乎失去工作能力时，他恳求窑主放他走。窑主接受了他的请求，甚至提出送他一程，结果却把他丢在荒郊野外。由于无法移动，张徐波在一个废弃窑洞中度过了好几日，当时的气温常常处于零下，后来他被当地人救了出来。由于冻伤严重，他的双脚不得不截肢。尽管早在 2003 年，这个故事就已经在中国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温家宝总理也下令要求彻查此事，但并没有针对窑场开展大规模的警察行动，也没有像 2007 年那样引发大规模的民愤。[19]

地方政府对待寻找失踪孩子的受害父母也仍旧是一副冷漠态度。早在 2008 年 5 月，2006 年河南巩义县失踪的男孩的母亲王晓丽（音译）告诉我：“我去警察局报案的时候，他们甚至拒绝立案，说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不值得考虑。”

[16] 马昌博：“风暴眼中的山西官员”,《南方周末》2007 年 7 月 5 日，A2。

[17] 朱红军：“被再次转卖后, 少年朱广辉回家了!”,《南方周末》2007 年 6 月 21 日，A3。

[18] 魏敏、李梅：“长安少年断脚案永济庭审目击”,《西安晚报》2004 年 4 月 8 日, 第 6 版。

[19] 2004 年 4 月，强迫张徐波劳动的窑场主被判刑三年，并被勒令支付 49.5 万元的赔偿金——然而他并没有支付这笔金额。直至 2009 年 8 月底，“黑砖窑”丑闻震惊全国后，张徐波才收到永济市与西安市长安区地方政府支付的 38 万赔偿金。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西安的街头乞讨求生。“断脚少年张徐波案赔偿到位”,《黄河晨报》2009 年 8 月 31 日，第 2 版。

她十七岁的儿子失踪时，正在备战高考。他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很有可能被一流大学录取——这对于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然而，2006 年 10 月 26 日，他失踪了，杳无音讯。他本应在朋友家住几天，却未曾到达目的地。

2007 年，受害父母引发的媒体风暴标志着中国当局态度的重大变化。2007 年 6 月，中央政府对山西窑场展开了一场省级调查。所涉及的数字令人感到震撼，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警方调查了 86395 名窑场主，其中有 36286 名（42%）没有正式许可证；检查了 4861 座砖瓦窑，其中 3186 座（63.3%）没有登记；总共有 81000 名工人在窑场工作，但只有 17 家窑场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20]其中，有 13 家使用童工。总共解救了 359 名工人，其中包括 121 名精神病患成年人与 15 名儿童。与此同时，党的高层发起了一场“扫黑除恶”运动，惩处了 95 名渎职和失职的官员。

同时，中国领导层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丑闻来推行其政治议程。特别是，媒体对窑场的报道有助于加快《劳动合同法》艰难的立法进程。就经济发展仍然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引入新的工人权益保障是否可取，公众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从而导致该法的推进陷入僵局（见本书中高敏的文章）。经过三年多的高层讨论以及十数个法律草案，窑场丑闻成为了使其得以通过的重要催化剂，《劳动合同法》于六月底的媒体风暴中通过。正如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的谢良敏在电视上承认的那样，如果没有发生窑场丑闻，“估计还要争，因为‘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很大的刺激了立法机关，包括众多委员都感到不可理解，感到必须要加以严惩，所以说这就推动了这部法律的通过。”[21]

丑闻后的窑场

随后的数年内，这些窑场可能没有像以前那样猖獗或广泛，但所有迹象表明它们仍然存在。2009 年 5 月，中国的媒体报道，在安徽省界首市，警方解救

[20] 王永霞：“联合工作组通报山西黑砖窑事件查处情况”，《新华网》2007 年 8 月 13 日，在线链接：news.sina.com.cn/c/2007-08-13/164013653720.shtml。

[21] 见电视节目《经济半小时》的实录，2007 年 12 月 27 日，在线链接：wenku.baidu.com/view/9d00c7d549649b6648d7478f.html。

了在两家窑场里受奴役的 32 名精神病患工人。[22]根据可得悉的报道，这些人是被一个人贩子拐骗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每“介绍”一个人到窑场，就能赚到 200—300 元。这些年龄 25—45 岁不等的奴工被关在一处院子里，由几个毫不留情的暴徒严加看管，每天被迫工作 10 个小时，没有工资，只有用于个人开销的几块钱。警察逮捕了十人，包括包工头和窑主。

2010 年 6 月，云南省石林县的警察从当地一家窑场中解救了大约二十名奴工。[23]其中一名来自重庆的奴工向记者描述了看守的暴行：为了让他每天工作 17 个小时，看守会用钢条和皮带打他。同样，2010 年 12 月，四川省渠县一起设计残疾人口贩卖的事件在中国媒体上广为流传。[24]在这起案件中，精神病患在地方政府的公开纵容之下，以残疾人口公共庇护所的幌子奴役他们。在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故事中，2011 年 9 月，郑州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崔松旺冒充残疾人在火车站附近徘徊了两天，直到他被绑架并以 500 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窑场经理。崔松旺说，他被迫工作了三个小时，遭到殴打，被禁止喝水，后来他设法逃脱并向警方报案。[25]近期，媒体报道了一些成功逃出窑场的奴工的故事，如四十三岁的徐树河，他在广州的黑砖窑做了二十四年的奴工；三十三岁的范德宝，被奴役了十一年；三十五岁的杞兆军，在山西省的多家窑场中被剥夺了二十一年的自由。[26]

---

[22] 程士华：“安徽界首警方救出 30 余名在黑砖窑做苦力的智障人员”，《新华》2009 年 5 月 21 日，在线链接：news.hsw.cn/system/2009/05/21/050184724.shtml；程士华：“安徽界首黑砖窑事件调查：智障者遭贩卖成劳力”，《经济参考报》2009 年 6 月 22 日，在线链接： news.sina.com.cn/c/sd/2009-07-22/092818272706.shtml。

[23] “重庆男子在云南当窑奴的 112 天”，《重庆晚报》2010 年 8 月 24 日，第 17 版。

[24] 冉金：“奴工背后的‘善人’：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对调查”，《南方周末》2010 年 12 月 23 日，在线链接：infzm.com/content/53856。

[25] 申子仲、邱延波：“一个记者的四天的智障奴工体验”，《东方今报》2011 年 9 月 6 日，在线链接：roll.sohu.com/20110906/n318501671.shtml。

[26] 邹晓华：“男子被骗入黑砖窑和传销：失散 24 年后凭口音寻亲”，《江西日报》2017 年 4 月 12 日，在线链接：news.sina.com.cn/s/wh/2017-04-11/doc-ifyecezv3173671.shtml；李圣鹏：“‘黑砖窑’往事：被夺去自由的 11 年”，2016 年 9 月 26 日，在线链接：renjian.163.com/16/0926/19/C1TN9CD-K000187OR.html；高大正、张泽东：“男子被骗黑砖窑 21 年，一路乞讨回云南不知家在哪”，《昆明信息港》2015 年 8 月 21 日，在线链接：news.sohu.com/20150821/n419397915.shtml。

袁学宇仍然下落不明——这是被伯格 · 巴肯（Børge Bakken）称之为中国“非公民社会”（uncivil society）的又一位受害者。[27]他的父亲袁成仍在寻找他。在此过程中，他成功救出了一百多名儿童。[28]既然如此，我们能否从2007 年春所发生的事件中吸取一些教训吗？看看习近平时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吧——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中的批判声音被驯服，那些为弱势与无公民权利者发声的人被逮捕或被失踪，质疑中共所信奉之“和谐”口号的人遭到系统地恐吓。人们不禁怀疑，今日是否还能像十多年前那个炎热之夏般团结起来？然而，那位孤独的博主每天的帖子都在提醒我们，并非一切都已失去，也并非所有人都已忘记。最后，正如俗话所说：“纸包不住火”。

---

[27] Børge Bakken. 2017. ‘Snapshots of China’s “Uncivil Society”.’ *Made in China Journal* 2, no. 1: 38–41.

[28] 张倩：“袁成：寻子之路解救百名少年黑窑工”，《北京青年报》2013 年 11 月 29 日，在线链接：news.sina.com.cn/c/2013-11-29/033928841286.shtml。

2008

胡锦涛与温家宝执政期间（2003—2012 年），作为党和国家“和谐社会”愿景的一部分，中国劳动法的编纂持续进行着。2008 年，三项对中国工人来说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法律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尤其具有争议性。经过多年学术界与政界的内部讨论，2006 年 3 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劳动合同法》的初稿，征求公众意见。一个月内，他们就收到了超过 19 万条评论，其中 65%来自工人。尽管草案早已成为两派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激烈争论的热点中心——一派主张加大国家对劳资关系的干预以保护工人权益，另一派则优先考虑实施现有法律而不是引入新的法律——但在 2006 年春天，这一讨论开始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一些国内外的商业组织公开反对这项法律，这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但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惕，《劳动合同法》最终通过之前，法律文本经过了大幅修改。本文回溯了影响《劳动合同法》通过的激烈辩论，并将探讨该法通过后的几年内对中国工作场所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及其不满

高敏（Mary E. GALLAGHER）

2008 年《劳动合同法》是五四宪法以来最受争议的法律。该法揭示了公众对工作场所保护的关注，以及他们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和自由化在减少就业保障与劳动相关的社会福利方面走得太远的忧虑。这也是一场国际辩论，劳资双方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探讨中国工作场所的未来。然而，代表比以往更加多元化和包容，官方的全国总工会、劳工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家与一部分学术界发表了支持劳工的立场，而外国商业协会、中国本土企业家、政府官员与另一部分学者则为资本发声。[1]

《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和立法过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开了一扇窗口展示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分裂以及充满活力但不稳定的经济，此后再也没出现过。这是一次公开立法和公众参与的试验，远远超出胡锦涛政府的目标：强调减少不平等与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的改革。围绕《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和媒体关注也促进了工人、法律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动员。不幸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破坏。2008 年标志着劳资纠纷趋势的显著转变，纠纷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番，并在随后几年继续保持着较高水平。一些纠纷属于法律上的丑闻，源自雇主试图削弱法律的作用，例如华为先发制人的大规模裁员，试图解雇数千名正式工，再用短期合同重新雇佣；另一些是工人受到中央政府同情姿态的鼓舞，而进行的溢出性罢工（spillover

[1] Chelsea C. Chou. 2018. 'China's Bureaucracy in the Open-Door Legislation: The Labor Contract Law in Focu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3, no. 2: 217–34.

strikes）与示威，例如 2010 年的本田罢工（见本书中陈敬慈与许少英的文章）。[2]

但将这些更广泛的趋势归功于立法完善是不准确的。《劳动合同法》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的结果，尤其是城市工人就业保障逐渐而后急剧的丧失，这种丧失自 80 年代的合同制改革开始，随后正式编入 1995 年《劳动法》，并在上世纪末国企改革的大规模裁员而达到顶峰（见本书中比达尔夫、赫斯特、苏黛瑞、李静君的文章）。

除了加强就业保障外，《劳动合同法》的目标还包括加强对非正式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保护力度。然而，自 2007 年通过并于 2012 年修订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化并没有减少。相反，分化转而体现在新的不平等之上：在制造业和建筑行业的旧模式与零工经济的新模式之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分裂。[3]《劳动合同法》加强的就业保障条例改善了正式标准工人的工作条件，而那些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的工人却得不到这些保护。[4]零工与平台经济的扩张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受雇于那些不适用或者干脆可以忽略《劳动合同法》的行业，这是为了实现一些更重要的目标，例如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脱钩以及所谓的创新所需的灵活就业。

《劳动合同法》的试验与磨难应被视为中国劳动立法更广泛演变的一部分。每一部新法都为一些人提供了保护，而另一些人被排除在外。[5]随着北京目前将

---

[2] Chris King-Chi Chan and Elaine Sio-Ieng Hui. 2012. '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onda Workers' Strik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4, no. 5: 653–68.

[3] Ya-Wen Lei. 2021. '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6, no. 2: 279–309; Bin Chen, Tao Liu and Yingqi Wang. 2020. 'Volatile Fragility: New Employment Forms and Disrupted Employment Protection in the New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 no. 5: 1531; Irene Zhou. 2020.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China*. ILO Working Paper 11.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7923.pdf.

[4] Feng Xiaojun. 2019. 'Regulating Labour Dispatch in China: A Cat-and-Mouse Game.' *China Information* 33, no. 1: 88–109.

[5] Virginia Harper Ho and Qiaoyan Huang. 2014. 'The Recursivity of Reform: China's Amended Labor Contract Law.'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7, no. 4: 973–1034.

目光转向零工与平台经济中的工人问题，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完善劳动保障的前夜。然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劳工与司法社运的严厉打压，我们不太可能再次看到《劳动合同法》通过时的社会动员和辩论。

前奏

从 2004 年首次起草《劳动合同法》至 2007 年夏天通过，关于《劳动合同法》的多年辩论源于民众对建国以来首部劳动法日益加强的反感。1995 年的《劳动法》（见本书中萨拉 · 比达尔夫的讨论）是改革时期劳动关系的基础性法律，却无法让任何人满意。从根本上来说，1995 年《劳动法》将 20 世纪 80 年代为构建外商投资的劳动关系而制定的监管和法律框架编入法典，并将其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包括当时中国城市主要雇主的公共部门。[6]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贵族来说，1995 年的法律预示了“铁饭碗的打破”。《劳动法》引入了劳动合同，为短期就业提供了便利，而对雇主提供社会保险的责任则规定较为松散。对中国以亿为单位涌入城市且日益增长的农民工大军来说，1995 年《劳动法》意义寥寥。由于没有正式合同与法定的“劳动关系”，大多数农民工被排除在劳动合同提供的保护之外。

1995 年《劳动法》出台之前，公共部门的城市工人大多与 1978 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市场改革绝缘。国企的改革循序渐进，主要集中在改变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激励机制，而不修改保障城市正式工人终身就业与单位福利的一般性社会契约。劳动合同允许短期就业，并规定了社会化的福利，这两点都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合同首先在外资经济部门实行，然后才逐渐在中国国内公共部门实行，且大多数是由第一次就业的年轻工人签署。[7]

1995 年《劳动法》改变了这一切，该法规定了全面使用劳动合同，并首次允许公司提供短期合同。该法的实施恰好在 1998—2001 年期间公共部门大规模重组之前，这标志着数百万人遭裁员、破产，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及几乎所有

[6] Mary E. Gallagher. 2007.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Gordon White. 1987.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bour Contract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1: 365–89.

集体企业被私有化的世纪之交。对许多城市工人来说，1995 年《劳动法》并没有带来工作场所的保障和法律权利，而是失业与社会不安。

中国不断发展的分层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面，农民工涌入中国的建筑业与制造业，但法律将绝大多数人排除在需要书面劳动合同确认的正式就业之外。户口制度的限制阻止了农民工被纳入，因为参与社保几乎总是需要当地的市民身份（见本书中海沃德、柯蕾、弗里德曼的文章）。1995 年《劳动法》承诺保障，却基本没有兑现——但确实有助于江泽民政府的市场化目标与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劳动力的流动性急剧扩大，灵活就业成为城市工人的常态，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移民的常态。[8]

1995 年《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起草并通过的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转变。公共部门收缩，特别是在就业方面，而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迅速扩大。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整合进入全球供应链的过程，加快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步伐。其中很大一部分繁荣是由大量年轻的农民工推动的。然而由于户口制度对城市居住权的限制，抑制了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2003 年，广东省的制造业中心首次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人们愈发担忧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迅速老龄化正在破坏中国的人口结构优势。

在此期间，劳资纠纷、司法动员以及危险和剥削性的工作环境丑闻也在不断增长。1998 年至 2001 年，退休员工与年长的国企工人通过罢工、街头示威与交通封锁抗议国企改革。[9]同时江苏和广东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出现了新一轮的罢工浪潮，鼓起勇气的年轻农民工发起了这些行动。《劳动法》颁布后设立的社会化保险计划也面临着资金短缺、招致民众反感且不完善等问题。正当人们的关注转向老龄化城市社会与不完全城市化（允许农民工在城市中辛勤工作，却无法长期安身于城市中）的压力之际，中国福利状况的巨大差距也得以

---

[8]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eds). 2011.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Ithaca, NY: ILR Press.

[9] William Hurst. 2012.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g Kwan Lee.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显现。[10]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起草新法，加强就业保障，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参与度，改善解决劳资纠纷的法律途径。在这一时期旨在实现这些目标而通过的若干新法律中，《劳动合同法》是最重要的一部。[11]

辩论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辩论公开且激烈。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对现行法律制度感到不满，认为城市的正式工人所得到的保障不足，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非正式工人没有得到应得的保障。有意愿关注不平等和再分配问题的胡温政府（2003—2013 年）推动了辩论的进程。一批新利益集团和活动家，包括劳工非政府组织、代表外资的商业协会以及担任起草过程顾问的劳工律师和学者的参与也让争论愈演愈烈。立法辩论也加剧了全总、劳动部（后改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主要起草机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的内部官僚角力。[12]

随着人大于 2006 年春向社会征求意见，《劳动合同法》也是最早有公众参与立法过程的法律之一。该法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收到了超过 19 万条评论。全总动员了基层工会组织鼓励提交评论，并得到了对法律草案的强烈反应。资方代表也发表了意见，但往往会招致中国公众、境外非政府组织与学者的愤怒，他们认为反对该法是包藏祸心，意图维持中国低下的劳动标准和廉价劳动力。[13]外国商业协会发表声明，中国政协的成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就该法的不同草案举办了无数次学术研讨会。

---

[10] Xian Huang. 2015. 'Four Worlds of Welfare: Understanding Subnational Variation in Chinese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222: 449–74; Yujeong Yang. 2021.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hinese Dual-Pension Regimes in the Era of Labor Migration and Labor Informalization.' *Politics & Society* 49, no. 2: 147–80.

[11] Kinglun Ngok. 2008. 'The Changes of Chinese Labor Policy and Labor Legi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73, no. 1: 45–64.

[12] Chou, 'China's Bureaucracy in the Open-Door Legislation'; Mary Gallagher and Baohua Dong. 2011. 'Legislating Harmony: Labor Law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Ithaca, NY: ILR Press, 36–60.

[13] David Barboza. 2006. 'China Drafts Law to Empower Unions and End Labor Abuse.' *The New York Times,* 13 October; Chou, 'China's Bureaucracy in the Open-Door Legislation'.

然而,《劳动合同法》的实际起草过程仍然不透明，虽然公众的意见众多，但其中的内容从未向公众公布。《劳动合同法》的每一个草案都有巨大改动，而最终版本的《劳动合同法》缩减了对就业保障与集体劳动权益的一些保护，在法院如何解释法律与地方如何实施的方面留下了漏洞。争议性的重要事件一直持续到实施阶段，因为《劳动合同法》的生效时间正值全球金融系统崩溃的时期。

实施

从 2008 年到 2013 年的修订,《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期间充满了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中国没有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金融危机，而是因为西方经济体的深度收缩而经历出口危机。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沿海制造业中心大量工厂关闭，3000 多万农民工失业。[14]关乎生计的纠纷——特别是工资拖欠与解雇补偿——对地方政府构成了挑战，某些情况下，工厂突然关闭、业主逃离后，地方政府有直接介入为工人提供赔偿的情况。还有些公司会先发制人解雇老员工，试图规避与工龄超过十年的在职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繁重要求。例如，华为在《劳动合同法》通过后解雇了 8000 名员工，以便与他们重新签订短期合同，这些行为遭到了强烈的批评。[15]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第一年，全国的劳资纠纷翻了一番，一些沿海制造业热点地区的纠纷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多。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慷慨的刺激计划以推动国内经济复苏，有关再分配的纠纷也随之增加，例如要求提高工资、社会保险金和加班费。由于工资上涨的压力、制造业日益明显的劳动力短缺以及胡温政府对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公开关注，仍在就业但寻求更好条件的工人变得大胆。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和房地产建设的热潮也促使许多农民工在中国内陆城市寻找离家更近的工作，其中，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例如参与社保的权利，变得更加重要。补充

[14] Kay-Wah Chan. 2012.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Labor Law in China.' *Chinese Economy* 45, no. 3: 24–41.

[15] Zhiming Cheng, Russell Smyth and Fei Guo. 2015. 'The Impact of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on Socioeconomic Outcomes for Migrant and Urban Workers.' *Human Relations* 68, no. 3: 329–52.

《劳动合同法》扩大工人权益的法律，如 2010 年《社会保险法》、2008 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 2008 年《就业促进法》，都成为胡温政府立法遗产的一部分。对工作场所的立法关注使得公民社会感到变革正在发生，社会动员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受中央政府的同情与鼓励。

社会动员与行动

在世纪之交，随着国企改革与中国加入世贸，新生的劳工运动开始形成。全国出现了几十个劳工非政府组织，尽管还只是处于碎片化的状态，被地域和工作重心所分割。[16]学者经常会在大学内设立法律援助中心，为工人提供援助。[17]诉讼律师也纷纷投入这一领域，[18]国际合作与援助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境外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大学和外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社会、法律宣传以及政府官僚机构对工作场所保护、工人声音代表和劳动纠纷解决等问题的制度建设上提供了支持。

起初，许多劳工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法律制度的普及以及《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新保护措施。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关注中国经济中特别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包括女工、农民工以及受工伤或疾病影响的工人（见本书中郝秋笛的文章）。随着社会动员的增加，发生了 2010 年南海本田罢工与 2014 年围绕社保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罢工（见本卷中陈敬慈与许少英、布莱彻的文章），劳工活动家开始将重心转向集体劳工问题，例如结社权利与集体谈判（见本书中柯蕾与弗兰切斯基尼的文章）。[19]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专注于通过集体培训与指导赋

[16] Joseph Y.S. Cheng, Kinglun Ngok and Wenjia Zhuang. 2010.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pace for China's Labor NGOs: Informal Politics and Its Uncertainty.' *Asian Survey* 50, no. 6: 1082–106; Manfred Elfstrom and Sarosh Kuruvilla. 2015. 'The Changing Natur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7, no. 2: 453–80.

[17] Elizabeth J.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eds). 2007.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 Hualing Fu and Richard Cullen. 2008. 'Weiquan Lawyering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 Culture of Public-Interest Lawyering.' *The China Journal* 59: 111–27.

[19] Ivan Franceschini and Kevin Lin. 2019. 'Labour NGOs in China: From Legal Mobilisation to Collective Struggle (and Back?).' *China Perspectives*, no. 1/2019: 75–84.

予个体工人力量，此类工作往往在幕后进行，在遮掩之中让劳工社运的网络生根发芽。[20]

习近平在 2013 年上任后不久，这股蓬勃发展的劳工活动与法律活动遭到了一系列打压。[21]2015 年 7 月，两百多名法律活动家和事业律师被拘留，罪名通常是颠覆国家政权与寻衅滋事。虽然其中许多律师关注的是比劳工权益更敏感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但这也向整个法律界发出了冰冷的信息。[22]这一镇压之后，2015 年底又有数十名劳工活动家遭到镇压，许多拥有外国关系并接受资金援助的劳工非政府组织遭到了特别关注。[23]2016 年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使中国公民社会依赖外部资金开展活动更加困难。2018 年，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协助广东一家公司内部的工会组建工作，这招致了针对学生与劳工活动家之间联系的新一轮镇压（见本书中埃尔夫斯特伦的文章）。许多名牌大学的学生被拘留、审问并被要求放弃他们的主张。[24]

《劳动合同法》及其不满

对劳工与司法行动的镇压扼杀了这股劳工运动的萌芽。[25]尽管罢工与示威并未随着镇压而结束，但有证据表明，2015 年之后，大规模的、协调的工业行动（industrial actions）骤然减少。[26]通过行政和法律系统处理的劳动纠纷也

---

[20] Diana Fu. 2017. 'Disguise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 no. 4: 499–527.

[21] Ivan Franceschini and Elisa Nesossi. 2018. 'State Repression of Chinese Labor NGOs: A Chilling Effect?' *The China Journal* 80: 111–29.

[22] Hualing Fu. 2018. 'The July 9th (709)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Legal Advocac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no. 112: 554–68.

[23] Tom Mitchell and Lucy Hornby. 2015. 'China Lawyer Trial Begins Amid Crackdown on Labour Rights Groups.' *The Financial Times*, 14 Dec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ft.com/intl/cms/s/0/a67e3882-a183-11e5-8d70-42b68cfae6e4.html#axzz48MGabcdu.

[24] Jenny Chan. 2021. 'A Precarious Worker–Student Alliance in Xi's China.' *China Review* 20, no. 1: 165–90.

[25] Patricia Chen and Mary E. Gallagher. 2018. 'Mobilization without Movement: How the Chinese State "Fixed" Labor Insurgency.' *ILR Review*, 20 February, 001979391875906, available online at: doi.org/10.1177/0019793918759066.

[26] Yuequan Guo. n.d. 'Challenge, Signal, or Institution? The Effect of and the Lesson from a Government Crackdown on Labor Activists in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趋于稳定，但与 2008 年之前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劳动合同法》仍对中国工作场所条件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我们很难在其他结构性因素、经济周期性因素同样会带来工人境遇改善的情况下，找出单独属于这条法律带来的变化。[27]例如，人口变化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加强了一些工人的议价能力，而经济刺激计划促进了更多的建筑与基础设施工作，特别是在中国内陆地区。

《劳动合同法》的主旨是强调就业保障，特别是强制要求企业与长期工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另一方面，就业保障将提高社保的参与度。《劳动合同法》在这两个目标上部分成功。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的比例提升了，只不过农民工仍落后于本地工人。[28]参与社保的工人比例有所增加，但流动人员的参与率仍然很低。[29]起草《劳动合同法》的宣传提高了公众对工作场所权利的认识，无疑给雇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此后他们需要面对雇员更多的不满以及更高的违法成本。

然而，与中国的其他劳动立法一样，雇主也找到了规避严格的《劳动合同法》的新漏洞。它同样可能导致失业问题，尤其是老工人可能遭遇裁员而非受到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0]在实施初期，最重要的漏洞是劳务派遣。劳务派遣

---

[27] Xin Meng. 2017. ‘The Labor Contract Law, Macro Conditions, Self-Selectio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for Migrants in China: Labour Contract Laws and Migrant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2, no. 1: 45–65.

[28] Ibid.; Zhiming Cheng, Russel Smyth and Fei Guo. 2015. ‘The Impact of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on Socioeconomic Outcomes for Migrant and Urban Workers.’ *Human Relations* 68, no. 3: 329–52; Mary E. Gallagher, John Giles, Albert Park and Meiyan Wang. 2015. ‘China’s 2008 Labor Contract Law: Implement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Workers.’ *Human Relations* 68, no. 2: 197–235; Fuxi Wang, Bernard Gan, Yanyuan Cheng, Lin Peng, Jiaojiao Feng, Liquian Yang and Yiheng Xi. 2019. ‘China’s Employment Contract Law: Does It Deliver Employment Security?’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30, no. 1: 99–119.

[29] Meng, ‘The Labor Contract Law, Macro Conditions, Self-Selectio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for Migrants in China’; Gallagher et al., ‘China’s 2008 Labor Contract Law’; Yang,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30] Randall Akee, Liqiu Zhao and Zhong Zhao. 2019.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on Unemployment and Welfare Loss of the Workers.’ *China Economic Review* 53: 87–105.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急剧扩大，在国有企业特别严重。[31]劳务派遣允许第三方劳务公司雇佣工人，然后借调给企业担任临时职位。派遣工的就业保障、工资和社会保险都比较低，但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劳务派遣的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可以避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随着大量关于企业扩大使用劳务派遣的报道出现后，特别是有关国企的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法》在 2013 年进行了修订，将劳务派遣限制在全部岗位的 10%，而且只限于临时、辅助或替代职位。这是胡锦涛政府的最后的立法举措之一。

胡温时代的立法成就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赏，尤其是习近平政府的官员，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越来越担忧。“新常态”承认增长放缓是中国经济成熟的一个基本特征，伴随着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台高筑，中产阶级崛起，市民越来越关注民生问题，如空气污染、食品安全、更好的教育资源等等。习近平与 2013 年发起的反腐运动也降低了地方官员单纯对经济增长和投资的追求，因为它减少了内幕交易和贪污的机会，更别提这些活动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危险。财政部长楼继伟于 2015 年公开谴责《劳动合同法》，指责它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陷入停滞，并将其与西方国家赋权工会的危害相提并论。[32]

数字经济的挑战

尽管宣布修订《劳动合同法》，恢复雇主更大灵活性的计划，但习近平政府始终没有实际推进修订工作。事实上，习近平政府在可能激怒工人的重大劳动法改革方面一向进度迟缓，并延迟了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相反，通过鼓励新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允许经济“置于法外”，无视《劳动合同法》的限制范围。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经历了几年的快速扩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来看，中国都可能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就业人

[31] Feng, ‘Regulating Labour Dispatch in China’; Xiliang Feng, Fang Lee Cooke and Chenhui Zhao. 2020. ‘The State as Regulator? The “Dual-Track” System of Employment in the Chinese Public Sector and Barriers to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62, no. 4: 679–702; Xiaojun Feng. 2019. ‘Trapped in Precariousness: Migrant Agency Workers i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hina Quarterly* 238: 396–417

[32] 楼继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经管学院演讲全文”，2015 年 4 月 24 日清华大学，在线链接：sem.tsinghua.edu.cn/info/1319/32803.htm。

数最多的国家。[33]大多数人是作为独立承包商或派遣工而间接被雇佣。2019 年，只有约 623 万工人直接受雇于数字平台经济，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占约 8000 万劳动力总数的 8%。[34]根据另一些统计，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劳动力规模甚至更大，超过 1.8 亿人，占劳动力的近四分之一。[35]

COVID-19 疫情进一步推动了新兴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 2020 年春的长期封锁期间，越来越多的家庭依赖数字购物。平台通过算法锁定工作的强度，从而加快交付速度，这也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力度，而且没有让公司承担正式雇佣责任或社会保险负担。[36]近几个月，随着关于平台剥削的报道以及新形式劳工组织与活动的爆发，中央政府开始更加重视这个问题。2021 年 4 月，习近平在广西省考察时提到保护“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并鼓励为农村流动人口与大学毕业生制定新的就业政策。[37]只不过，跟这些鼓励的辞藻一起出现的，是对这些行业的工人运动更大规模的镇压。2021 年 2 月，劳工活动家和平台工人陈国江（盟主）在北京被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这是常用于民间社会活动家的口袋罪。[38]

除了电子商务中的平台工人的抱怨之外，运营这些平台的科技公司中更年轻、教育水平更高的白领也开始对行业内紧张的“996”工作文化表示反对。“996”工作文化被科技巨头大肆推销，他们将其叙述为工人想要爬到富有老板位置的路途中必须忍耐的一部分，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甚至被美化为技术民族主义的荣誉勋章。这种文化被指责为造成年轻上班族“过劳死”的罪魁祸首，并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中促成了一种“内卷”现象——描述受教育劳动力之间激烈竞争的动态。黄宗智（Philip Huang）曾经援引“内卷”一词来描述中国在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中的停滞，他认定劳动力的过于过剩阻碍了创新。

---

[33] Zhou,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China’.

[34] Ibid.

[35] Chen et al., ‘Volatile Fragility’.

[36] Lei, ‘Delivering Solidarity’.

[37] 习近平：“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在线链接：gxzx.gov.cn/index.php?m=special&c=index&a=show&id=3898。

[38] Emily Feng. 2021. ‘He Tried to Organize Workers in China’s Gig Economy. Now He Faces 5 Years in Jail.’ *NPR*, 13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npr.org/2021/04/13/984994360/he-tried-to-organize-workers-in-chinas-gig-economy-now-he-faces-5-years-in-jail.

[39]最近，从电子商务的送货司机到百无聊赖的白领工人都用这个词来描述充满无休止的竞争和回报不断下降的生活。[40]

如此重复三十年

从 2013 年起，中国一部分劳动力享受到了数字经济的繁荣，但他们基本上被排除在 1995 年《劳动法》和 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围之外。每一次立法框架的收紧都伴随着新的漏洞以及劳动力市场上不受保护的新领域的出现。1995 年《劳动法》当中，农民工基本上被排除在劳动合同的保护之外；2008 年的《劳动合同法》扩大了合同与保险的范围，同时也推动了新型就业形式——劳务派遣；2013 年的修订中，劳务派遣受到限制，但劳务外包与独立承包迅速扩大，在新兴数字经济中尤为如此。

2008 年的《劳动合同法》仍然备受争议。雇主指责它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僵化；劳工活动家和工人指责它做得不够好。随着中国新兴数字经济在法律束缚之外蓬勃发展，近期的反“996”运动与互联网快递工人的组织及动员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保护性立法。但是，随着 2015 年以来对劳工活动与组织的镇压有增无减，社会动员和公众对加大保障力度的愿景遭到限制。对快递员困境与抗议中国科技公司不健康的工作场所文化的关注可能会让位于对创新与技术独立的追求。

[39] Philip C.C. Huang. 1991.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 no. 3: 299–341.

[40] Wang Qianni and Ge Shifan. 2020. ‘How One Obscure Word Captures Urban China’s Unhappiness.’ *Sixth Tone*, 4 Nov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sixthtone.com/news/1006391.

2008

在胡锦涛与温家宝的领导下（2003—2013 年），面对日渐增长的动荡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重点从不惜一切代价促进经济增长转而建立更加公平的发展模式。党开始提倡建设“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在劳动关系领域，这不仅转化为一套新的法律法规——首要的就是前面讨论的《劳动合同法》，同时也是一场重新定义围绕农民工展开的公共话语的宣传运动。中国媒体赞颂着农民工对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崛起所做出的贡献。2008 年深圳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为明日的梦想奉献青春”：深圳劳务工博物馆的成立

埃里克 · 弗洛朗斯（Eric FLORENCE）

钱俊希

> 农民工是勤劳、诚实、谦虚、低调的劳动者……在艰苦的奋斗中，他们更加热爱生活；他们以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辛勤劳动、幸福生活、默默奉献。
>
>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展板，2008 年 [1]

2010 年，全球最大的苹果产品原装设备制造工厂，富士康深圳工厂的十四名员工跳楼自杀（见本书中陈慧玲的文章）。同年，广州一家本田工厂的数百名员工组织了大规模罢工，要求大幅提高工资并拥有选举工会代表的权利（见本书陈敬慈与许少英的文章）。尽管这两件事互不相关，但却给广东省及其他地方的中共官员敲响了警钟。本文所要探讨的案例——深圳劳务工博物馆的建立，比这两起事件早两年，但它同样处于上述工人运动所处的背景：中国农民工日益增长的被异化感与权益意识。

农民工形象的转变

经济改革以来，农民工就是中国快速增长与“劳动力压榨”的经济发展战略核心。[2]他们是“脏、苦、累”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主要劳动力。但是，尽管他们在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可度却远远滞后。诚然，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劳动条件总体

---

[1] 译者未曾实地去过博物馆，相关引用均由英语转译。——译者注。

[2] Eli Friedman and Ching Kwan Lee. 2010. ‘Remaking the World of Chinese Labour: A 30-Year Retro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8, no. 3: 507–33; Pun Ngai. 2016. *Migrant Labour in China: 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上有所改善，但农民工仍然遭受着制度性歧视的重压，生活在城乡夹缝中，过着不稳定的生活。[3]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媒体通常将农民工描述为一种不雅的“游牧”群体形象，没有个体面孔与声音，与脏污、犯罪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混乱联系在一起。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被框定在“法治”的话语中。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具有威胁性的“民工潮”的同质化描述逐渐让位于更复杂且混合的个体叙事。大众媒体、广播以及后来的社交媒体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使得他们有了一个能够叙述城市工作经历以及生活经历的场所。[4]这些描述越来越多地包括视频的形式。这种变化在华南最为明显，因为“打工”一词公开展现了农民工矛盾的多个维度，一方面包含了面对剥削、歧视对待以及不稳定时的屈辱与愤恨，另一方面包含了对社会流动性、靠近城市生活方式与消费的渴望（见本书中马立安的文章）。

2008 年，深圳宝安区政府正式设立了一座博物馆，致力于展现农民工和他们对这座城市——中国首个也是最著名的经济特区——非凡经济发展的贡献。[5]这一举措的背景是，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的转变、通过一系列旨在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劳动立法。（见本书中比达尔夫、高敏的文章）。从 21 世纪初开始，随着“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与推广，以及对所谓弱势群体日益增加的关注，中国开始鼓励市政府为农民工提供服务，而不仅仅是将他们视为公共秩序的威胁，范式逐渐发生转变。

---

[3] Chris King-Chi Chan. 2010.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 Abingdon, UK: Routledge; Pun, *Migrant Labour in China*.

[4] Wanning Sun. 2014. *Subaltern China: Rural Migrants, Media and Cultural Practic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Tamara Jacka. 2006.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NY: M.E. Sharpe; Eric Florence. 2007.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iscourse and Narratives about Work as Sites of Struggle.'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9, no. 1: 120–50; Eric Florence. 2020.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abour in Postsocialist China: The Cas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edited by Kevin Latham. London: Routledge.

[5] Junxi Qian and Junwan'guo Guo. 2019. 'Migrants on Exhibition: The Emergence of Migrant Worker Museums in China as a Neoliberal Experiment on Governanc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41, no. 3: 305–23.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是首座由国家资助的农民工博物馆。[6]本文，我们记录了这个场所如何选择性地呈现那些可见或不可见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以及农民工主体形成的特定方面。通过对物品、图像与人物的展出和布置，博物馆能够将人们纳入国家建立过程之中，从而加强社会秩序，或是与其相反，正如贝丝·洛德（Beth Lord）所述，博物馆会展现社会秩序的偶然性与可逆性。[7]正如我们所见，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属于后者。

接下来，我们首先将简要地探讨深圳的神话，探索城市形态中“社会主义谎言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如何结合。”[8]然后，我们将通过劳务工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重点关注场馆如何通过物体、文件与图像的布局构建工人的身份。最后，我们将通过一些普遍性的观点作为结论，我们希望揭示，农民工在深圳神话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后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与自我企业化的主体精神的形成在过程中的重要性。

深圳的神话

1992 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加快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并终结了关于深圳的发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意识形态辩论。他视察深圳时强调：“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9]他还指出，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10]此后，尽管深圳的特殊地位在过去十多年中有所减弱，但这座城市仍然发挥着至少三个重要作

---

[6] 2010 年的广州与 2012 年的成都均有类似的项目建立，北京郊区也有农民工集体发起的一个草根项目,。若想了解，见 Qian and Guo, ‘Migrants on Exhibition’; Junxi Qian and Eric Florence. 2020. ‘Migrant Worker Museums in China: Public Cultures of Migrant Labour in State and Grassroots Initiativ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online first at: doi.org/10.1080/1369183X.2020.1739373.

[7] Beth Lord. 2006. ‘Foucault’s Museum: Difference, Representation, and Genealogy.’ *Museum and Society* 4, no. 1: 1–14.

[8] 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2017. ‘Introduction: Experiments, Exceptions and Extensions.’ In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edited by 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9] 张高丽：“巨大的光环，伟大的实践”，载于白天编：《走向现代化：深圳 20 年探索》，深圳：海天出版社，200 年：第 1—15 页。

[10] 同上：第 5 页。

用：作为“内地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的模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作为打造党的新角色的试验田。[11]

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几年，深圳及其他地区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劳动力商品化浪潮。[12]1992 年以后，“在深圳办特事”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意味着对工人结社权的限制以及对工人劳动力无限制的调用。[13]随着深圳成为全国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关于中国最著名的经济特区的丰富想象慢慢形成。

“深圳意识形态”根植于一系列的规范和价值观，强调“开发”“创造”与“献身”，由八十年代末的市政官员推广。[14]1990 年，“深圳精神”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认可，并融入包括“自主、自强、竞争、冒风险”等原则，拒绝“错误的道德观念”（例如“忽略老百姓应有的权益”“平等主义”以及“保守主义”）。[15]农民工的“低素质”被培育“理想、文化、道德、纪律”的“四有新人”取代。[16]

---

[11] Bjorn Kjellgren. 2002. *The Shenzhen Experience or the City of the Good Cats: Memories, Dreams, Identiti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Chinese Showcase*.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66. Stockholm University, 147–48.

[12] Barry Naughton. 2012. ‘The 1989 Watershed in China: How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Changed.’ In *Socialism Vanquished, Socialism Challenged*, edited by Nina Bandelj and Dorothy Soling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5–48.

[13] George T. Crane. 1994. ‘Special Things in Special Ways: National Economic Identity and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7: 71–92.

[14] Eric Florence. 2017. ‘How to Be a Shenzhener: Representations of Migrant Labor in Shenzhen’s Second Decade.’ In O’Donnell et al., *Learning from Shenzhen*, 86–103.

[15] 厉有为、邵汉青编：《深圳经济特区的探索之路》，深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6] 同上：第 234 页；白天编：《走向现代化》：第 9 页。1994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采纳了“精神文明”塑造“新人”的理念，全会上还提出“建设并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依赖于提高人口素质、培养人才”的观点。见 Feng Xu. 2000.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34–35, 97. For Bakken, ‘population quality represents hidd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es to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which needs to be constantly fostered. See Børge Bakken. 2000. *The Exemplary Society: Human Improvement, Social Control, and the Dangers of Moder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0.

劳务工博物馆

2008 年，宝安区政府兴建的深圳劳务工博物馆正式开馆，所处位置的前身是上屋怡高电业厂，据称是深圳第一家港资制造业装配工厂。博物馆的主要常设展览分为五个主题部分：历史背景、农民工对深圳发展的贡献、农民工在深圳劳动与生活的经历、政府政策促进农民工融入深圳公共服务以及农民工上升轨迹的模型。[17]

博物馆的介绍展板展示着其中的价值观，并为展览定下了基调。展板写道：

>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劳动者在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他们辛劳劳作，沉默耕耘，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们值得被敬爱。为了记录他们的贡献，突出党对他们的关心，我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劳动博物馆。

尽管博物馆试图让游客穿过流水线、宿舍、电视室和食堂等场所，从而体验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但这些空间都显得十分空洞，与农民工艰辛的日常生活脱节。[18]游客看不到农民工在工厂高墙之外的边缘化，以及规训式的“宿舍劳动制度”对他们的时间所进行的压榨与剥夺。[19]同样，尽管展览展示了许多工人真实的证件，以及居住证、就业证等，但这并不能传达农民工遭受制度性歧视的事实，也忽视了市政官员在日常空间对农民工的身体施加“常规压迫”的影响——留给人的印象只有空洞的物质性。[20]

在常设展览中，深圳的意识形态反复出现——充满活力的竞争环境、吸引着城市的“建设者”、以及对他们劳动力的最佳利用。深圳与“这片热土”联系在一起，赞美这座城市是一个拥有无限机会的空间——一个真正唤醒人们主体性和劳动力的空间。展出的大多数照片都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的能量因城市

---

[17] Qian and Guo, ‘Migrants on Exhibition’.

[18] Ibid.

[19] Pun Ngai and Chris Smith. 2006. ‘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as a Site of Control and Resista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7, no. 8: 1456–70; Pun, *Migrant Labour in China*.

[20]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的繁荣而被动员。珠三角的农民工与城市精英中，深圳乃至整个“南方”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与社会流动机会的观念广为流传。在展览中，对机会的承诺掩盖了华南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嵌套的结构性暴力，委婉地体现出表面之下的冲突和不对称的社会关系。

深圳神话的另一个支柱是：无论面临何种困难，工人都要对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保持信心，并保持理想和抱负。青铜雕塑下的展板提醒着参观者：“美好的生活依靠人们的集体努力；在同一片蓝天下，为了明天的梦想，他们愿意吃苦耐劳。站在高楼上的工人，他们显得高大健壮，体现着奋斗的力量和信心。”

总体而言，博物馆塑造了一种农民工的身份，他们是顺从、沉默、进取且勤奋的社会群体，他们为深圳发展和繁荣的贡献决定了他们在象征意义上属于深圳。尽管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获得永久居住权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根据为深圳“作出贡献”或“奉献青春”的叙述，工人应该因为他们为这座城市令人眩目的物质成就而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感到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与自豪感。[21]

根据这种修辞，他们因遭受的艰辛与屈辱而感到的任何怨恨或幻灭都应该被这种自豪感与归属感、牺牲和贡献淹没。博物馆的评论提供了这种修辞强调的例证：

> 他们是第一个迎接初升太阳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在夜晚陪伴月亮的人。他们用勤劳、壮实的双手，撑起了这座城市的美丽和辉煌。历史可以证明：那些为深圳付出了最大努力和汗水的人，那些为深圳奉献了智慧和力量的人，那些为深圳留下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深圳人。

总体而言，展览通过对物品、文件、文字和图片的精巧布置，构建了一条线性的话语链。艰苦、辛勤、自我牺牲与苦难一方面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加强自我奋斗、个人创业的成熟。在上述段落中，牺牲、辛勤与进取的修辞在模范农民工的形象中汇聚。他们的整个身体和灵魂都在生产，通过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他们终于暂时地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

[21]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奉献青春”就与下乡知青相关。他们必须全心全意“把青春奉献祖国”，尽管他们很难甚至无法回到城市。

最后，展览有一个部分专门讲述国家政策、党和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系统性地传达了国家对农民工的关怀与慈爱。大段的篇幅用于介绍市级和省级政府机构在文化、休闲、教育、劳动保护、福利以及医保等领域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举措。其中一个展板上写着:

> 多年来，国家、省、市、区各级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公共政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表现了对农民工的关爱。工人的权益持续获得保护，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社会也因此更加和谐。

正如先前所述，中国各级政府确实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农民工提供服务，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益，但这些政策并没能根本上改变关于农民工的政治配置、制度配置以及仍然被用来描述农民工境遇的“不稳定且被剥夺权力的状态”。[22]

青春，深圳例外论与党和国家

我们探讨了农民工在后毛泽东时代第一个由国家资助的农民工博物馆中受到的描绘，展示了农民工在深圳（一个指导着整个国家对劳动力进行估值的空间）的叙事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这种政治认可的自我指涉维度在博物馆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将农民工纳入这种想象的过程中，阶级对立，以及农民工遭受的物质与符号暴力，通过提供“无法律意义的可见性和无经济政治实质的辞藻认可”被隐去。[23]博物馆对工人经历的展览掩盖了他们经历的不稳定性背后的政治和制度协调，从而使得他们的行动、对社会正义的主张以及身份政治失去了政治性。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农民工形象的叙事将深圳神话与自我企业化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中，农民工表现出面对逆境时的乐观、勤奋、冒险与自我奋斗等价值观，同时也结合了毛泽东时代的自我牺牲与奉献的价值观。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深圳经济特区构建身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些价值观被大力推广。深圳作为现代文明城市的模范，

---

[22] Jack Linchuan Qiu.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3] Sun, *Subaltern China*, 123.

在文化上被构建为一个数据奇迹（深圳奇迹），充满无限机会的例外地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尝试在中国其他地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24]构建神话的过程中，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在充分利用年轻劳动力的竞争环境中运行着的人才估值理念。因此，党和国家创始之初建立在拒绝资本主义剥削之上的合法性和认同，与经济特区歌颂进步的叙事中对工人身体、时间与空间施加的规训及暴力，成功地完成协调。

[24] Jonathan Bach．2017．‘Shenzhen: From Exception to Rule．’ In O’Donnell et al．, *Learning from Shenzhen,* 23–38; Crane, ‘Special Things in Special Ways’.

2009

2009 年夏天，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张海超的事迹，这位 28 岁的工厂工人自愿接受了完全不必要且危险的开胸手术，只是为了证明他患有尘肺病——一种影响肺部的致命职业病。这是最后的无奈之举，他曾多次尝试获得证明文件，从而获取赔偿与足够的医疗护理，但都遭到了腐败官员和医生的阻挠。“开胸事件”是中国第一起备受瞩目的工人健康维权行动，在提高中国公众认识到中国繁荣经济给劳动力带来的隐性代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回溯了导致张海超做出这项重大决定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开胸验肺揭露的）政府丑闻的后果。

张海超："开胸验肺"

李瑞福（Ralph LITZINGER）

倪燕萍

2009 年 6 月 22 日，一位名叫张海超的前工厂工人走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在那个酷热潮湿的日子里，当他走进手术室接受"开膛"手术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会对中国公众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走进手术室时，他的目标相当简单直接：展示在中国监管不善的粉尘密集行业中，工人和矿工的肺部如何积聚粉尘。

事实上，张海超完全没有必要，尘肺病（俗称"黑肺"）的诊断通常只需要胸部 X 光检查。可他想展示的不仅仅是影像诊断的结果，他想剖开胸腔，取出组织进行活检。[2]他希望与媒体分享检查结果，并引发有关黑肺工人的劳工、日常生活以及迫切的生存问题如何得到承认的辩论。医生的手术在他的胸口上开了一个十厘米的切口，然后用肋骨扩张器将肋骨分开四至五厘米，取一小块组织进行活检。医生警告过张海超，手术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及其他并发症，甚至可能无法活着走下手术台。在绝望的形势下，张海超认为自己别无选择：能试的都试了，身体也已虚弱不堪。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3]他曾多次尝试从公司管理层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对尘肺诊断的承认——这样才能领到赔偿金——却徒劳无功。之后，他自己想了个方法：对自己肺中取出的组织进行深度检查。他认为，任何政府官员，任何矿业老板都无法否认

---

[1] 本文所呈现的叙事基于 2009—2020 年间关于张海超经历的新闻报道片段。他的手术与事后的生活在多篇报道中均有提及，因此我们没有引用我们所参考的每个来源。当我们直接引用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字与采访时，会提供原始来源。

[2] 张海超、梁珂："为了证明自己有尘肺病，我选择了'开胸验肺'"，《故事 FM》2020 年 4 月 13 日，在线链接：mp.weixin.qq.com/s/fOZyNiXRdBXeeRoc4rsUtQ。

[3] "专访开胸验肺农民工: 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CCTV》2009 年 7 月 30 日，在线链接：news.cctv.com/china/20090730/104422.shtml。

组织活检的结果。在手术台上，麻醉剂开始生效时，他对医生说："大夫，帮忙看清楚点!"[4]

张海超后来说他那天"很幸运"。六个小时后，他从这个高风险手术中醒来，他记得医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恭喜你，海超，你就是尘肺病。" 张海超并没有因确诊而感到绝望，他正是为了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确诊后，他终于有资格接受专门针对尘肺病的治疗，并能要求赔偿。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的胜利，也只是他漫长折磨的开始。

激进化的尘肺工人

2004 年，张海超在家乡河南省新密市的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工作，工厂生产的耐火材料会产生大量粉尘。作为一线工人，张海超几乎每天都被灰尘覆盖，仅有的防护措施是一层薄薄的一次性口罩。2007 年，身体出现症状，开始咳嗽、胸闷，于当年年底离开工厂。[5]

他在辞职时，并不知道他的疾病与工作有关。从 2008 年到 2009 年初，他去了多家诊所，包括北京的三家知名医院。令他惊讶的是，所有的医生都认为他患有尘肺病，而不是其他疾病。[6]然而，根据国家规定，尘肺病属于职业病，他不能在这些医院中接受治疗，治疗的责任由雇主承担。北京的医生建议他回新密，向振东寻求治疗和赔偿。

张海超对黑肺并不陌生。他曾目睹这种疾病如何迅速夺走他一位最亲密的朋友的生命。然而，在二十八岁的年纪，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经历这样的噩梦。同样，他也从未想到，尘肺病所引起的身体疼痛只是他在中国赔偿与治疗体系的官僚迷宫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

[4] 陈磊"张海超：以命相搏，开胸验肺"，《南方周末》2009 年 8 月 10 日，在线链接： infzm.com/contents/32651。

[5] 在年初，振东公司为旗下工人于新密市防疫站安排了体检。张海超被告知他的结果显示正常。因此，他最初只认为自己得了感冒。实际上，检查结果显示他可能患有尘肺病。防疫站的医务人员告知公司应该对他进行进一步检查，但振东公司并没有向张海超透露这一点。

[6] 张海超就诊的医院包括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第二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应急总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

回到家乡后，张海超首先接受了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检查, 这是河南省授权诊断职业病的地方机构。[7]就像许多工厂工人与矿工那样，他面临着棘手的困境：为了接受筛查测试，就必须提供自己的就业情况。振东公司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承认，并多次拒绝张海超与管理层会面的要求。意识到公司这里走不通后，他决定从其他途径寻求帮助。张海超了解到，新密市委书记每个月都会亲自接见上访者。他在政府大楼前等了七个小时，才能向书记讲出他的诉求。在听到张海超的困难后，这位官员善意但狡猾地向他保证，不用出具工作证明，也能在职防所鉴定。2009 年 5 月 12 日，张海超在几名官员的陪同下于郑州接受了肺部检查。

两周后，测试结果让张海超感到震惊。报告明确写道："无尘肺 0+期合并肺结核。"他十分愤怒："真的，特别的失望，北京、郑州那么多家大医院，诊断我是'尘肺'，他们竟然说是肺结核!"[8]不同的诊断对他来说差别巨大：就医学角度而言，尘肺病无疑是长期在粉尘密集的环境中吸入大量粉尘导致的。如果他被检查出尘肺病，以前的雇主肯定会被追究责任。[9]相比之下，肺结核的诊断完全将治疗的负担转嫁给病人身上，他要承担所有的相关费用。

张海超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他能对结果提出异议吗？和许多寻求治疗与赔偿的尘肺病工人一样，他被抛给了下一个官僚机构——郑州市卫生局。他可以在市卫生局重新鉴定，却要支付七千元的鉴定费。张海超没有被价格吓退，他取了钱，却发现将他误诊为肺结核的职防所与他将要去检查的郑州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在同一栋楼。于是他认定这两个机构串通一气，顿时对重新检查出他所需诊断的结果失去信心，尤其是一位官员毫不避讳地告诉他："我们这里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人员都在一起，怎么可能自己推翻自己的结论？"[10]

张海超当然明白这名官员想表达的意思。然而，他虽然对重新鉴定失去失望，但却有了底气，去思考他的下一步。认真考虑过后，2009 年 6 月，他拿着为了重新鉴定而凑来的钱去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在将来会反复提到，

---

[7] 只有经过授权的医疗机构才能正式诊断职业病，这对索取赔偿来说至关重要。此类机构大多位于省会，这意味着，张海超这种患者，每次检查都需要漫长的奔波与不必要的交通支出。

[8] 陈磊"张海超：以命相搏，开胸验肺"。

[9] Wing-Chung Ho. 2018.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ocial Estrangement in Chin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4.

[10] 郭健："开胸验肺：'非常'胜利背后",《中国社会保障》2009 年第 9 期：第 48 页。

自己是如何在绝望中走进医院，而一位名叫程哲的医生是如何给了他希望。看了他拍的片子后，程医生确定了是职业病尘肺，可看到职防所的鉴定结论后，她陷入了沉默，然后给了张海超两个选择:“要不就是穿刺，要不就开胸，开胸肯定能确诊。”医生不建议开胸，因为开胸也治不了名，反而还有风险。[11]张海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胸”。他后来回忆起自己的决定时说道:“我坚持打开自己的胸进行肺部活检时，根本就没想过能得到多少赔偿，倒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我当时只是认为，我必须讨回一个说法。”[12]

手术后，尽管医院无权鉴定职业病，但他的医生还是在他的医疗报告上写下“尘肺合并感染”的诊断。[13]不久之后，他得到了两名记者的帮助，他们将张海超的事迹报道出来，引起了轰动，迫使政府回应此事。2009 年 7 月，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就张海超此事发表评论，敦促地方部门解决这一问题。7 月 26 日，张海超终于收到了来自职防所的正确鉴定证明，确认他患有尘肺三期。月底，振东公司发布了一份未披露价值的补偿方案。[14]

然而，这场胜利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资源。他争取赔偿的斗争本不应该如此曲折——充斥着政府的混淆、谎言与欺骗。此外，正如他多次指出的那样，他认为自己远比其他尘肺病工人“幸运”。他所遭遇的站在，过去是，现在仍是，在反对将工人“用后即弃”的剥削逻辑的斗争中相当常见的一部分。正如中国尘肺病运动的历史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患者能够获得补偿，或是哪怕是一丁点的社会正义。太多的人已经死去，更多的人正在等死。

[11] 陈磊“张海超：以命相搏，开胸验肺”。

[12] 于小川：“这个冬天，他不再寒冷：‘开胸验肺’农民工张海超在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成功‘洗肺’”，《当代矿工》2009 年第 12 期：第 7 页。

[13] 河南省卫生厅颁布了一项通知，批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私自为张海超做手术，因为根据国家规定，这家医院没有职业病的诊断资格。特别是，负责张海超的主治医生被停职一年。这些举措在医院官方完整的“投诉”栏目中遭到公众严厉批评，最终“投诉”栏目被关闭。见曹林：“惩罚‘开胸验肺’的医院是自取其辱”，《中国青年报》2009 年 8 月 14 日，在线链接：zqb.cyol.com/content/2009-08/14/content_2804241.htm。

[14] 2009 年，张海超声称从振东公司处获得 61.5 万的赔偿。直到后来他才透露真正的赔偿金，实际上是 120 万，他先前因为地方官员的施压而被迫保持沉默。

走向行动

开胸后的几年里，张海超在中国的几个地方寻求更专业的治疗。2009 年，他在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接受了两次洗肺，还被疗养院聘为“职业卫生安全联络员”。2013 年，为了治疗几乎带走他生命的气胸并发症，在著名肺移植专家陈静瑜的帮助下，他在无锡市人民医院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手术成功，但他终生都得服用抗排斥药物——每天十多片，花费超过两百多元。[15]

与许多工人相比，由于他的开胸手术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张海超得到了相当可观的赔偿，尽管他一开始没能透露具体金额。进行双肺移植手术之前，张海超希望澄清事实，还写了一封信，如果他在手术中死亡，这封信就被公开。信中披露，他获得了惊人的 120 万元赔偿金。信中还提到，政府官员与振东管理层强迫他隐瞒这一数额，并要求他承诺永不起诉新密市防疫站对他过往体检报告的隐瞒，也不得起诉郑州职防所先前的误诊。[16]张海超向媒体公布了这封信，“（公布真实的赔偿）是希望以后全国能以此赔偿标准为起点，给每一位尘肺病人一个重生的机会，也让他们的家庭生活多一点点保障。”[17]

这笔巨额的赔偿金也无法支付张海超高昂的医疗费用，事实上，他陷入了无底的债务漩涡。为了偿还这些债务，他想找份工作，却因病史，一再被拒之门外。2013 年 6 月，肺移植手术几个月后，他又借了一些钱，在老家新密承包了一辆公交车。他的公交车每天会经停城市与农村的二十九个车站，绕城八圈，行程达 248 公里。他每天开车 12 个小时，一个月开车近 30 天。他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 5000 元，勉强够支付肺移植手术的每月术后开销。

当他退隐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后，也偶尔会在公众面前露面。他在 2009 年铤而走险的自我伤害式反抗行为使得他成为全国最知名的患病工人，不仅是在公众中，更重要的是在尘肺病患者中。他给自己买了台电脑，并开始与其他

---

[15] 张海超仍需要服用抗排斥药物来保护他的新肺。他的一位病友于农历新年期间暂停服药（新年期间服药被视作不吉利），他在不久后便去世了。见尹亚飞：“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新京报》2008 年 7 月 24 日，在线链接：bjnews.com.cn/inside/2018/07/24/496452.html。

[16] 相关讨论见 Xuyang Sun. 2013. ‘Pneumoconiosis Activist Zhang Haichao Gets Life-Saving Double-Lung Transplant.’ *China Labour Bulletin*, 15 July，在线链接：clb.org.hk/en/content/pneumoconiosis-activist-zhang-haichao-gets-life-saving-double-lung-transplant.

[17] 同上。

地方的尘肺病工人联系。研读多年中国的各种劳动法规后，他以活动家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为卷入劳资纠纷的尘肺病患者辩护。例如在 2012 年，张海超于浙江一家法院出庭，支持另一名尘肺病患者提起的诉讼。法庭辩论接近尾声时，他愤怒地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说道："难道中国公民对自身健康都没有知情权吗？"[18]

张海超继续在全国各地奔走，支持其他患者的请愿，自 2011 年起，他成为了慈善组织"大爱清尘"的志愿者。多年来，他接到了两千多名病友的电话，帮助数百人打赢了官司。作为"大爱清尘"的河南负责人，他拜访了五百多名患者，发放了两百多台呼吸机。[19]他目睹了四百多人的死亡，其中包括四名在他开胸手术后也从振东公司那里获得赔偿的工人。

这些经历让张海超百感交集。2018 年 6 月 22 日，张海超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朋友圈："开胸验肺事件经历了 9 年，考验了社会，结果是让人失望的。"[20]开胸、媒体的关注没能解决尘肺病患者面临的困难，他宣称："我特别反感'特事特办'，只有法律，才能结构性地解决他们维权时遇到的一系列问题。"[21]或许是因为他得到了巨额赔偿，却不得不与政府和公司达成秘密协议，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将自己获得的赔偿延伸到整个尘肺病患者群体，这使他成为一位知名活动家。他在 2009 年的那场惊险手术，激励了整个 21 世纪 10 年代工人发起的抗议与上访活动。然而，其中只有少数取得成功，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抗议者才能获得免费医疗、每月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待遇。[22]

在张海超看来，"特事特办"是一种政治把戏，实际上是国家的分化政策，是地方官员定期且通常随机地提供微薄的补助和有限的帮助。这种分散且局部的慈善行为是缺乏保护工人权益的国家立法、解决问题根源的意愿时，打消上访者、阻止"社会动荡"。

我们采访的尘肺病上访者中，很少有人想要庆祝成功，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许多尘肺病患者从未得到过赔偿。地方官员抱怨援助金有限，因此只有少数患者，通常是那些身体健康能够积极参与抗议与上访的患者，才能得到福

---

[18] "张海超：从开胸到开庭的过渡"，《财新》2012 年 3 月，在线链接：clb.org.hk/node/14223。

[19] 尹亚飞："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

[20] 同上。

[21] 《财新》，"张海超：从开胸到开庭的过渡"。

[22] 戴春："中国尘肺病群体救助模式分析"，《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 年第 1 期：第 90—96 页。

利。地方政府还会优先照顾那些通过政治或亲属网络与他们有关系的患者：这些都是秘密支付，大多数其他尘肺病患者只听说过。

其次，免费的指定医疗或援助方案通常附带着各种限制，给患者带来无穷无尽的不便。患者可能需要前往指定的医院，通常是省市，离家很远。只有住院期间的费用才能申请报销，门诊的费用很少包括在内。一位患者告诉我们，每次住院后，他只能带少量的药回家，通常只够吃 15 天。由于他住的地方离医院很远，往返既累人又昂贵，还会进一步加重他的健康问题。

最后，正如张海超向我们传达的且在多次采访中表达的那样，成功的工人运动需要与警察的镇压和官方雇佣的暴徒进行顽强的斗争。大多数尘肺病患者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根本无法承受长达数月的抗议与上访。正如许多其他尘肺病矿工与工厂工人一样，张海超曾被警方拘留，关押了数日并遭受威胁。那些没有被警方抓住的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至最终离世，身前没有获得哪怕一天的治疗、一分的补偿。

这便是身心俱疲的尘肺病工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地。要对抗国家、地方政府或老板，要长时间站着抗议与上访，要长途跋涉前往省会医院接受治疗——所有这些都需要精力、体力，恰恰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尤其是对于这些与疾病斗争多年的人而言。让我们回到 2009 年。开胸手术在中国社会引起轰动后，张海超说道："赢的是我，输的还是我，我赢的可能是赢回我那点应有的权利，输的可能耗的是我生命，输的也是我的精神、精力。"[23]

还有人效仿这种自我伤害行为，但没有取得相同的效果，没有媒体报道或造成政治影响。正如张海超本人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些斗争中不存在输赢。有些人，像张海超一样，继续生存，找到工作的动力，偿还债务，努力寻找办法保持呼吸，阻止他们的肺变成黑块；而更多、更多的人，肺中充满致命的灰尘，平静而绝望地度过余生，等待肺衰竭。这些工人被国家遗忘，在政治上被忽视——这一群充满苦难与病痛的身影逐渐模糊不清。

[23] 《CCTV》，"专访开胸验肺农民工: 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

来生

在中国尘肺病与劳工维权团体中，张海超的“开胸案”是中国劳工健康维权史上公认的重大事件。通过与他交谈，阅读关于他的许多新闻文章与报道，收听存档的广播节目，与那些记得他的手术及其影响的工人活动家在线交谈，我们想讲述一个无产阶级英雄的故事，一个为了自己与同病垂死的工友而豁出去的人。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叙事，但太多的事实与之相悖。事实上，2009 年的那个时刻对实际立法的影响，以及与那些每天呼吸灰尘的工人相关的劳动保护法的实施，仍不容乐观。学者何荣宗（Wing-Chung Ho）观察到 2010 年新确诊的尘肺病病例激增（从 18128 例增加到 27240 例）。[24]他还指出，自 2010 年至 2014 年，公众对职业病的关注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我们还开始看到，现行法律落实后，私人矿山迅速关闭。

张海超的手术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在此不禁要问：未来的数十年里，人们将如何记住它？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还有多少工人因监管不力或是出于对不稳定生活的绝望，从而被迫吸入会导致尘肺病的致命灰尘。同时，也将取决于中国工人未来会有怎样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来反对这一灾难般的，永远在增长和发展的梦想世界。在这些死亡地带工作的矿工、工厂工人、宝石抛光工与建筑爆破工，他们是否会有超越黑肺缓慢侵蚀的未来？[25]工人是否可以超越对他们生命“用后即弃”的无尽循环？

---

[24] H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ocial Estrangement in China*, 10.

[25] 我们应该注意到，自 2009 年以来，立法取得了一定进展。2011 年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很可能受到了张海超案的推动。见 H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ocial Estrangement in China*, 18。2019 年《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被一些工人活动家视作一项出色的成就。然而，直至今日，张海超仍保持警惕，对纸面上的胜利秉持谨慎态度。对他而言，新的法律与新的保障承诺是一回事，真正重要的是，正如他在 2011 年所说，“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它修改得多完美，它的条款多流畅，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能执行。”见陈璇：“‘开胸验肺’的第二道伤口”，《中国青年报》2013 年 4 月 3 日，在线链接：zqb.cyol.com/html/2013-04/03/nw.D110000zgqnb_20130403_1-10.htm。

2010

2010 年的春夏之交，中国大陆的媒体广泛报道了国内的“工潮”。国际报纸刊登出夸张的头条，如《经济学人》的“中国工人的崛起”（The Rising Power of China’s Workers）、《彭博社》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The Rise of a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以及《纽约时报》的“中国独立劳工运动的涌动”（An Independent Labor Movement Stirs in China）。对于中国劳工运动的热情由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一家本田工厂爆发的罢工重新点燃。本田工厂的工人主要由中国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组成，他们的罢工诉求是大幅加薪并获得组建代表性工会（representative union）的权利，她们的动员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一波罢工“工潮”。这场罢工引发了政府与工会界关于集体谈判（或用官方的术语“集体协商”）作为改善劳动条件和预防劳工骚乱的途径的辩论。尽管 2010 年春引发的许多期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破灭，但本田罢工仍是 21 世纪中国劳工运动的里程碑事件。

南海本田罢工

陈敬慈（Chris King-Chi CHAN）

许少英（Elaine Sio-Ieng HUI）[1]

2010 年是中国劳资关系动荡的一年。广东佛山本田工人的抗议引发了一波罢工浪潮，得到了中国政策制定者、法律与劳工学者以及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引起了关于进行民主工会改革和实施工作场所集体谈判（中国更愿称作“集体协商”）紧迫性的讨论。这波罢工潮之后，中国政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大了工人集体谈判权利合法化的推广力度。本文将探讨本田罢工对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影响，这场罢工对党-国与全国总工会施加了历史性的压力，促使他们推动基于集体权利的劳资关系框架的建立。然而，由于全球资本的反对以及党-国对独立劳工组织的担忧，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说是已经停滞不前。

本田罢工

2010 年的工潮源自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人罢工，这是一家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专门生产汽车变速箱的公司。自 5 月 17 日开始，这场动员持续了 17 天，涉及约 1800 名工人；这场罢工的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国汽车工业的迅速扩张。由于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2009 年中国的汽车销量比前一年增长了 46%，创下了新纪录。[2]然而大多数汽车工人的基本工资并没有因行业发展而得到相应调整。罢工发生时，约 80%南海本田工人是技校实习生，另外 20%

---

[1] 本文借鉴了作者先前的出版内容，特别是：Chris King-Chi Chan and Elaine Sio-Ieng Hui. 2012. ‘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onda Workers’ Strik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4, no. 4: 653–68; Chris King-Chi Chan. 2014. ‘Constrained Labour Agency and the Changing Regulatory Regime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 no. 4: 685–709.

[2] Patricia Jiayi Ho. 2010. ‘China Passes U.S. as World’s Top Car Mark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2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3652104574651833126548364.

是正式员工。罢工者列出了 108 项要求，但始终将两项作为主要问题：一、所有工人工资加薪八百元；二、推行工会民主改革，现有工会完全无法代表工人权益。在整个罢工期间，工人都没感到公司工会站在他们那一边。

最初，企业拒绝与工人谈判，而是采取萝卜加大棒的策略。5 月 22 日，公司“解雇”了两名已经辞职的罢工积极分子。5 月 26 日，公司提出了一项微薄的加薪方案，但被工人拒绝。201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当地政府代表与实习生所属的职业学校教师的压力下，许多工人恢复了生产。然而，约有 40 名正式工人拒绝返回工作岗位，并聚集在厂区的空地上。下午 2 点左右，工人们注意到，约有 200 名戴着黄帽子、配有“工会会员证”的人员进入厂区，“劝说”罢工者复工，失败后与罢工工人发生了肢体冲突，致使一些工人手上。这引起了当地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家香港报纸以“本田车厂冲突、「工会」打工人”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3]官方消息没有透露这 200 名“工会成员”来自哪里，但据可靠消息表明，他们实际上是其他农村的当地人。[4]

事件发生后，工人向南海本田和工会施加了巨大压力。他们站了出来，支持受伤的工友，全厂范围的罢工持续进行。6 月 1 日，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本田与中国一家国企的合资企业）CEO 曾庆洪，同时也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拜访了罢工者，要求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并承诺三天后与他们进行谈判。同一日下午 5 点，南海区总工会与狮山镇总工会向全体南海本田工人发出了一封致歉信。

6 月 3 日，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并呼吁工人之间加强团结，工人代表团发出了一封致南海本田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重申了他们的基本要求：一、增加 800 元基本工资；二、工龄津贴；三、改善升迁制度；四、公司工会民主改革。这封公开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 “资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我们展开善意的谈判……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

---

[3] “本田車廠衝突「工會」打工人”，《明報》2010 年 6 月 1 日，A2。

[4] 2011 年 6 月，作者通过电话和网络与几位罢工领袖联系时，他们为作者提供了这条信息。

> 本厂 1800 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5]

公开信发布后，工人代表团收到了五百多封来自中国各地的支持短信，其中一段具有代表性的短信写道：“你们不仅代表了南海本田的工人，还代表了中国受压迫的几亿劳动阶级……全国人民都在支持你们，十分关注你们的正义行动。你们光荣的行动将被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部分。”[6]

在当天同曾庆洪的预谈会议上，工人代表团要求尽快举行出负责工人谈判的民主正式选举。当晚，公司在各个部门举行民主选举，最终选出了三十名谈判代表。也在同日，工人在外界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北京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著名教授，常凯，邀请他来担任工人们的顾问。6 月 4 日，正式谈判在严肃的气氛中开始，参与谈判的有新当选的工人谈判代表、资方代表、劳动局代表、地方政府代表、工人的法律顾问、企业工会的主席以及曾庆洪本人。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正式工的工资将提高 32.4%，从 1544 元增加至 2044 元，实习生的工资将提高 70%，从 900 元左右增加至 1500 元左右。然而公司以不能干涉工会事务为借口，拒绝讨论工人要求企业工会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和知识分子：支援性角色？

此次罢工相较于其他类似行动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人获得了本地和国际的公民社会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回顾 6 月 4 日的谈判，一位工人代表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能与常凯教授联系并邀请他担任我们的顾问，十分鼓舞人心；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我们的能力有限，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在谈判中会更加被动。”[7]

除了常教授的支持外，还有七十多名海内外学者签署了一份呼吁信，支持工人的要求：

---

[5] 引文摘自工人代表给作者的公开信副本。

[6] 一位主要的工人代表向作者分享了这些信息。

[7] 工人的播客现已被删除，但作者有保存贴子。

> “拿着微薄的工资，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徘徊，本田工人为了生存、为了有尊严的活下去，才被迫采取了罢工……让我们团结起来，向本田公司施加压力，我们要告诉本田：停止一切对工人的分化和打压，公开的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8]

这份呼吁信在谈判前一天发出，对公司和当地政府施加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工人的士气和信心。一位工人对我们说：“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多教授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研究网，一家由几个大陆年轻知识分子发起并在北京注册，专门报道劳工问题新闻的网站，详细报道了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此外，许多香港劳工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通过在香港抗议本田公司来表示支持。他们向国际社会通报了罢工的消息，香港一个主要关注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负面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化监察”发起了一个全球签名活动，以争取国际支持。罢工结束后不久，政府开始加强对媒体关于罢工的报道和支持本田工人的民间社会组织的控制。例如，2010 年 6 月 8 日，中国工人研究网遭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清算，以“未经许可登载导向不良文章”为由予以关闭。

余波

2010 年 6 月下旬，广东省总工会官员会见了南海本田工人代表。虽然他们允诺工会改革和集体工资谈判，但广东省总工会的代表否决了工人代表要求撤换现任工会主席的呼吁。[9]通过操纵候选人名单并隔离在罢工期间与公民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运动积极工人代表，较高级别的工会组织确保了大部分当选的企业工会官员来自管理层。[10]

除了工会改革外，集体协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期间全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1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工会与南海本田管理层进行了工资谈判。

---

[8] 呼吁信的在线链接：gopetition.com/petitions/声援中国佛山本田工人行动呼吁信.html。

[9] 2010 年 7 月 4 日，对一位罢工代表的采访。

[10] 根据罢工工人的说法（2010 年 7 月 4 日的采访），罢工结束后，管理层与一些罢工代表进行了对话，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施加影响。此外，至少有一名重要的工人领袖被高级工会官员命令不得与公民社会保持任何外部联系。

广东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深入参与本田车间事务，在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双方同意加薪 611 元。

自 2011 年以来，在上级工会的推动下，工作场所的工会和管理层之间每年都会进行集体谈判。2013 年发生了一场纠纷，因为公司提供的加薪幅度远远低于普通工人的预期。虽然官方工会委员会反对，但还是发生了罢工。公司最终同意了高于最初提议的加薪幅度，但工会委员会和管理层都对领导罢工的工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罢工对汽车行业及其他行业引发的连锁反应。2010 年夏，许多汽车公司和供应商的汽车工人效仿本田公司的同行，举行罢工，要求加薪。现代汽车在北京的一家供应商、中山附近的一家本田工厂、天津的两家丰田工厂、阿兹米特汽配（本田的供应商）和欧姆龙（本田、福特和宝马的供应商）都在 2010 年 6 月与 7 月发生罢工。中山本田罢工的一位领导者联系了南海本田的工人代表，寻求他们的建议，足以证明这一连锁反应。可以看出，南海本田与其他汽车工人日益成熟的组织策略和日益增长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能够通过谈判获取更高的工资。在不放松限制工人结社自由的情况下，党-国向工人的强烈要求让步，向全球资本施压以提高工资标准。

政治影响

学者和活动家普遍认为，2010 年本田工人的罢工代表了中国劳工抵抗的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是因为这次罢工的成功结果，还因为这场罢工持续了足足十七天之久，达到了先前罢工从未有过的组织水平。[11]同样重要的是，罢工者超越了加薪的个人利益和要求，而是追求他们的合法权利来呼吁进行民主工会改革。这一波全国性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向政府发出一个警告——劳工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基于个体权利的法规体系不足以处理工人的不满。

---

[11] 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7: 287–303; Feng Chen. 2010. ‘Trade Unions and the Quadripartite Interactions in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201: 104–24; Yang Su and Xin He. 2010. ‘The Street as Courtroom: State Accommodation of Labour Protest in South China.’ *Law and Society Review* 44, no. 1: 157–84.

陈峰将《劳动法》（1994 年）、《工会法》（1992 年）与《仲裁法》（1995 年）制定之前的改革时期所建立的法规体系概念化为一种基于“个体权利”的范式（见本书中比达尔夫的文章）。[12]他将“个体权利”解释为对个人有权享有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加班费等进行法律强调，而工人却不存在集体权利，即组织、罢工和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中国政府尚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第 87 号和第 98 号公约，事实上，结社自由在中国仍然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的工会联合会，根据其章程与《工会法》，它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 1975 年与 1978 年颁布的中国宪法包含了罢工权，但在 1982 年的宪法中却被删除了。值得注意的是，90 年代的立法中包含了工人集体权利有关的条款，但在实践中很少得到执行。这些法律出台后，工人们就将其作为保护自己权益的武器。[13]根据官方数据，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数量自 90 年代开始急剧跃升，从 1993 年的 12368 件上涨至 2000 年的 135206 件，再到 2009 年的 684379 件。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基于个体权利的法规体系不足以防止劳资冲突，特别是自 21 世纪初以来，劳资冲突越来越多地以集体抵抗的形式出现。[14]

南海本田罢工标志着自下而上的工人反抗达到了顶峰，成功地迫使中央与地方政府推进基于集体利益的劳动法规，同时将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改革工会制度并在工作场所建立更好的集体协商制度短暂置于政府和全总议程的首位。

2010 年 6 月 5 日，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一份题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决定》的文件，文中强调了工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

[12] Feng Chen. 2007.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Labor’s Predicament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0, no. 1: 59–79.

[13] Mary Gallagher. 2005.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4] Anita Chan. 2011. ‘Strikes in China’s Export Industr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China Journal* 65: 27–52; Chan and Pun,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Ching Kwan Lee.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k Nang Leung and Pun Ngai. 2009.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 The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 no. 3: 551–65; Su and He, ‘The Street as Courtroom’.

意见表达权，以及职场工会对管理层的监督权。[15]本田罢工后不久，十三个省以中共党委或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了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文件。[16]2010 年 8 月，广东省政府开始讨论《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修改二稿，而《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修订稿）也在征求公众意见。

然而，与先前讨论《劳动合同法》草案的过程中，一些海外商会强烈反对集体谈判的立法如出一辙（见本卷中高敏的文章）。在香港，40 多个商业协会在报纸上发表了请愿书反对大陆的新一轮的集体谈判立法。[17]来自美国的商会也表达了对这些立法的关注。[18]结果，《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和《深圳集体协商条例》都被暂停。

两点教训

从南海本田罢工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珠三角的工人运动通过推动政府立法制定基于个体权利的法律框架以及要求跨国资本提高工资水平，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在这种主要围绕保护个体权利的限制性的法规体系下，2010 年新一波的工人罢工迫使政府认真考虑基于集体权利的法规体系。不过由于国家对工会的操纵以及企业的反对，这种进展很快就无疾而终。

我们可以从南海本田罢工中得出两个教训。第一，中国农民工一直在积极参与到塑造和重塑全球工厂劳工权益的过程中。然而，虽然劳工的社会运动可以挑战全球资本与党-国的劳工法规，但不能低估党-国对工人权力的政治经济限制。在政治上，党-国的威权性质与社会主义工会主义的遗产在结构上阻碍了民主工会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公民社会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党-国有效地扼杀了劳工非政府组织促进独立工作场所组织的能力。在经济上，中国对外资与出口导向型产业的严重依赖，使得全球资本在影响当地劳工政策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个教训是，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平衡

---

[15] 中华全国总工会：《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2010 年），在线链接：baike.baidu.com/item/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决定。

[16] 刘声：“13 省份以党委或政府发文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中国新闻网》2010 年 6 月 9 日在线链接：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10/06-09/2331521.shtml。

[17] 例如，见《星岛日报》2010 年 9 月 27 日。

[18] 2011 年 6 月 7 日，在广州对一位美国商会成员的采访。

劳工和资本的利益和压力，以维持其统治权威。[19]国家监管和国家分别与资方劳方建立的关系，因而就成为了分析甚至预测中国工业劳资关系与劳动标准未来走向的关键。

[19] Linda Weiss.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台湾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是苹果和其他顶尖跨国公司的主要承包商，仅在中国大陆就有超过一百万的员工。2010 年，有报道称富士康的中国工厂中有 18 名工人试图自杀，其中有 14 人死亡，这一事件使得工人过劳与绝望的境遇浮出水面，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其中所有的受害者都来自中国农村，正值青春年华——他们代表了学者刚开始称之为“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这起事件与南海本田工厂的临时工罢工几乎同时发生，媒体对“富士康连环跳楼”的关注再次揭示了国际资本与中国当局的共谋在中国社会中造成的结构性扭曲。

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

陈慧玲（Jenny CHAN）

> 去死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曾经活过的方式。也许对于富士康的员工和像我们这样的员工来说，死亡仅仅只能证明我们曾活着，而我们活着的时候只有绝望。
>
> —— 一位中国工人的博客，2010 年 5 月 27 日 [1]

自从 2010 年 1 月，我与我的学者-活动家小组第一次听说广东深圳富士康电子厂的工人自杀事件以来 [2]，我们密切关注着被媒体称为“死亡列车”的报道。5 月 11 日第九名富士康跳楼者自杀后，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与学生开会讨论如何防止更多的自杀事件。一周后，我们和其他人共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富士康、中国政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采取果断的行动，结束“连环自杀”事件。信中写道：

>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

[1]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翻译均由作者完成。这位工人的帖子原文是汉语，由作者存档。由于没能找到原文，这段引用由英语转译。——译者注。

[2] Jenny Chan, Mark Selden, and Pun Ngai. 2020. *Dying for an iPhone: Apple, Foxconn, and the Lives of China's Workers*. Chicago, IL, and London: Haymarket Books and Pluto Press.

> 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3]

截至 2010 年 12 月，已知有 18 名工人试图在富士康内自杀，其中 14 人死亡，4 人虽伤势过重却活了下来。他们的年龄从 17 岁到 25 岁不等；都是正值青春的农民工，也是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象征。

自杀涉及一种发生在个体身上，既社会又极度个体的斗争。1970 年 11 月，在韩国，23 岁的纺织工人全泰壹（Chun Tae-il）将汽油倒在身上自焚，希望能感召其他工人要求朴正熙独裁政权保护工人权益。他的自杀激发了后来的劳工抗争与民主运动，并帮助转型了韩国的公民社会。[4]正如金孝宗（音译，Kim Hyojoung）所述，全泰壹通过“动员目标受众的‘心灵’激发了集体行动”。[5]在中国，2010 年及之后自杀的富士康员工也发自肺腑地喊出抗议工人恶劣条件的呼声。[6]这些年轻生命的死亡悲剧在整个社会与国际上引起了反响，激发了全世界对保障工人权益并防止更多死亡发生的呼吁。但是，他们的死亡与随之而来的公众反应又是否推动了中国和世界劳动条件的根本变化呢？

富士康及其全球化电子产品生产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公司，由郭台铭于 1974 年 2 月在台湾成立。商标名称“富士康”（Foxconn）暗指公司像狐狸般敏捷，能够快速生产电子连接器（用于计算机应用）。富士康为苹果等国际知名品牌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个人电脑、手机、游戏机与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组装和生产，迅速超越了绝大多数制造商。仅在四十年内，富士康就从一家小型加工厂发展成为高端电

---

[3] 2010 年 5 月 18 日，未删节的中文公开信已由作者存档。

[4] Young-rae Cho (translated by Chun Soon-ok). 2003. *A Single Spark: The Biography of Chun Tae-il*. Paju: Dolbegae Publishers.

[5] Hyojoung Kim. 2008. ‘Micromobilization and Suicide Protest in South Korea, 1970–2004.’ *Social Research* 75, no. 2: 549.

[6] Jamie Fullerton. 2018. ‘Suicide at Chinese iPhone Factory Reignites Concern Over Working Conditions.’ *The Telegraph*, 7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telegraph.co.uk/news/2018/01/07/suicide-chinese-iphone-factory-reignites-concern-working-conditions/.

子制造业的世界领导者，工厂遍布中国与全球各地。如今，公司在亚洲、美洲和欧洲有 200 多家子公司和分部。[7]

随着富士康力求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业与先进技术的主导者，其愿景也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与技术超级大国的目标相一致。中国仍然是富士康全球企业帝国及其盈利能力的核心所在地。2005 年，台湾学者冷则刚（Tse-Kang Leng）估计，鸿海 90%的净利润来自其在中国的业务，此后，公司与中国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8]2018 年，富士康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4.1%，收入高达 1750 亿美元。[9]这一惊人的增长是通过有眼光的商业行为、兼并收购、购买专利以及巧妙地培养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实现的。本文将评估公司的崛起对旗下百万名员工的影响——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农民工。

中国员工自杀事件

2010 年 5 月，富士康的公关负责人刘坤指出，自杀的原因通常多方面的。中国媒体将责任从结构性问题转移到心理问题上，将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描述为面临“心理问题”，存在债务危机或是情感挫折。[10]《卫报》援引公司高管的轻率评论，报道称，“考虑到富士康的规模，其自杀率并不一定就不处于中国自杀平均线上偏高的水平。”[11]但自杀在任何人群中都不是平均分布的。

---

[7]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2019. *2018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6, 12.

[8] Tse-Kang Leng. 2005. ‘State and Busines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Cross-Strait Linkages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53: 70.

[9]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2019. *Group Profile*, available online at: foxconn.com.cn/GroupProfile.html.

[10] Lei Guo, Shih-Hsien Hsu, Avery Holton, and Sun Ho Jeong. 2012. ‘A Case Study of the Foxconn Suicide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o Framing the Sweatshop Issu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4, no. 5: 484–503.

[11] Jonathan Watts. 2010. ‘Foxconn Offers Pay Rises and Suicide Nets as Fears Grow Over Wave of Deaths.’ *The Guardian*, 28 May, available online at: theguardian.com/world/2010/may/28/foxconn-plant-china-deaths-suicides.

研究表明，中国的自杀案例中，老年人占比超过 40%。[12]而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富士康的自杀员工都是年轻人，而且基本都在深圳的工厂里工作。

根据北京的医学专家调查，中国青年的自杀案例有 88%发生在农村，为什么在城市生活的年轻员工的自杀事件会激增呢？[13]自杀案例的集中发生指向了一些全新且关键的事情，而这些需要在公司、行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解释。

本文结合全球供应链分析、农民工研究以及对中国威权主义的理解（包括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的作用），认为工人的抑郁，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自杀，都与他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关。[14]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包括对年轻工人的重度依赖、低成本和及时化装配、“灵活”的工资与工时政策——是对全球企业高压采购行为的回应，订单的波动加上紧迫的交货要求，将生产的压力从苹果等跨国公司转移到富士康与其他跨国制造业的供应商身上。及时化生产的压力，以及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给装配线工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使得他们体验到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塌陷感。

iPhone 工人

苹果的成功与高速生产优质产品密不可分。由于对硬件、软件与设计的主导掌控，苹果公司在为富士康以及为其工人制定条款和条件方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然而，虽然这两家公司保持独立，但它们在产品开发、工程研究、制造流程、物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0 世纪 90 年代末，

[12] C.W. Wang, C.L. Chan, and P.S. Yip. 2014. ‘Suicide Rat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1: An Update.’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9: 929–41.

[13] X.Y. Li, M.R. Phillips, Y.P. Zhang, D. Xu, and G.H. Yang. 2008.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s Youth: A Case-Control Stud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8: 397–406.

[14] 就业条件如何导致自杀一直是学术界与工业界的重要关注问题。相关的参考，见 *The Link Between Employment Conditions and Suicide: A Study of the Electronics Sector in China*, 2018 年的报告，Economic Rights Institute and Electronics Watch 出版，在线链接：electronicswatch.org/the-link-between-employment-conditions-and-suicide-a-study-of-the-electronics-sector-in-china-november-2018_2549396.pdf.

苹果公司已将其在美国的所有制造工作和部分研究设施外包到海外。[15]它只在爱尔兰科克市的 Macintosh（即 Mac）电脑工厂保留了少量的工人和职员。[16]这种外包意味着苹果的成功与苹果的国际供应商及其员工的贡献密不可分，尤其是富士康和它的中国员工。

2009 年至 2010 年期间，iPhone 的销量增长了 93%，从 20731000 部增加到 39989000 部。[17]随着苹果等其他公司突然涌入的大量订单，富士康的工人——包括那些自杀的工人——不得不夜以继日的劳作。图 1 显示了苹果公司从 2010 财年第一季度到 2018 财年第四季度的 iPhone 销量。显然，即使苹果面临来自其他智能手机品牌的激烈竞争，iPhone 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iPhone 的出货量在节假日与临近新年期间经历了极端的激增。作为最大的苹果供应商，富士康需要定期延长工作时间，调整劳动力适应这种繁荣与萧条的趋势。

---

[15] Timothy Sturgeon, John Humphrey, and Gary Gereffi. 2011. 'Making the Global Supply Base.' In *The Market Makers: How Retailers Are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Gary G. Hamilton, Misha Petrovic, and Benjamin Senau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

[16] Apple Inc. 2016. 'A Message to the Apple Community in Europe', 30 August, available online at: www.apple.com/ie/customer-letter.

[17] Apple Inc. 2011. *Annual Repor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September 24, 2011*, 30, available online at: d18rn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0000320193/64c7905f-0468-48d9-8f25-e6ec8f3b5e32.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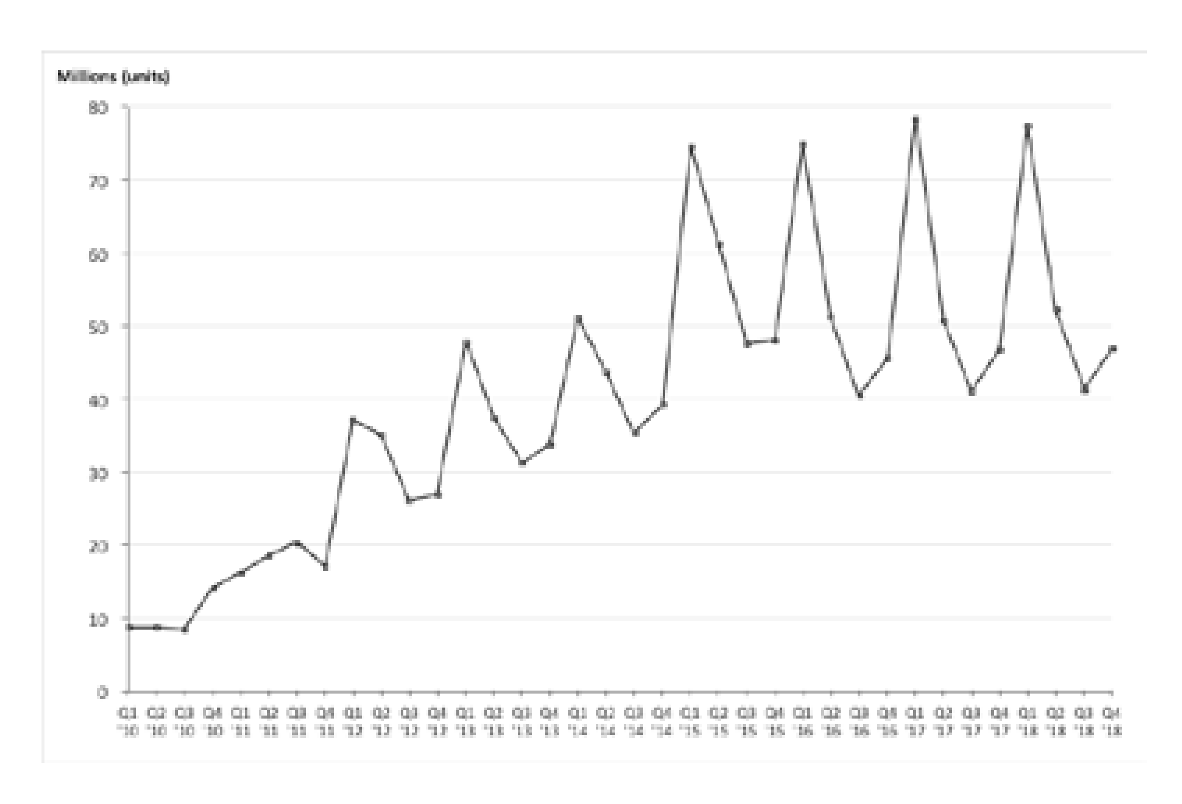


图 1，iPhone 销量，2008—2018。来源：苹果各年度的季度收入报告(Form 10-Q)。[18]

苹果公司从 2019 财年的 9 月 28 日起停止发布 iPhone 产品的销量。

越来越短的生产周期、不断加速的完工时间以及强制性的加班要求，给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新来的工人，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试着跟上“标准工业节奏”，却还是因为在生产线上“工作太慢”而受训斥。[19] 一位女工回忆道：“以前 iPhone 外壳的产量是每天 5120 件；但在 2010 年 7 月，产量增加了 25%，达到了每天 6400 件。我彻底累坏了”。[20]

每台 iPhone 由一百多个零件组成。在组装过程中，完成标准操作程序（SOP）的时间通常是二十五到三十秒。从实际背景来看，三十秒并不长。然而，超薄的新 iPhone 很容易被刮花，所以在组装过程中必须放在保护壳里。保护壳使得工人的精细操作变得更加困难，却没有额外的时间完成每项任务。电子零件和部件不断流过，工人的青春被机器的节奏吞噬殆尽。

---

[18] See ‘Quarterly Earnings Reports (Form 10-Q)’, Q1 FY2010 – Q4 FY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investor.apple.com/investor-relations/sec-filings/default.aspx.

[19] Jenny Chan. 2013. ‘A Suicide Survivor: The Life of a Chinese Worker.’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28, no. 2, 88.

[20] Ibid., 94.

所有这些都表明，像 iPhon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并不是在硅谷的天堂中生产出来的。事实上，尽管设计在硅谷，但它们根本就不是在那里生产的。它们是在富士康这样的地方生产的，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对其员工的工作条件和福利负有直接负责。但富士康也受制于采购商驱动型的商业模式，该模式的作用是确保“在产业链顶端运营的（公司）利润率上升，而较低层次的工人的工作条件越来越不稳定”。[21]例如，在 2018 年，苹果公司创造了高达 595 亿美元的超级利润，是富士康 43 亿美元（1290 亿新台币）利润的 13 倍以上。[22]在买方主导的全球生产链中，供应商有多少回旋余地来使管理更加平等与人性化？尽管富士康通过大规模的社交与娱乐活动来“让工人快乐”，但产量与利润的硬性指标必须完成，富士康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只有 4000 元（不到 600 美元），这个数字其中还包括加班费、夜班补贴和全勤津贴。[23]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康工人的生活不仅是管理层实施的政策的直接产物，而首先是由其生产的产品品牌——即苹果等全球领先的电子产品订单采购商——所决定的。

但苹果公司与工厂车间的绝望和挣扎实际上是隔绝的。面对工人的自杀、罢工和抗议，富士康的工会越来越觉得有必要解决工会与工人之间的沟通障碍。为了预防骚乱，工会官员向面临家庭困境、财务问题以及其他个人问题的工人提供心理咨询和建议。早在 2013 年，富士康就宣称，“为提高工会的代表性，已经实施了工会领导层选举的试点计划，候选人可以自愿参加选举。”[24]但候选人的选择与选举过程仍不透明，选举方法也从未公开。富士康工会的无能角色

---

[21] David Weil. 2014. *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22] See Apple Inc. 2018. *Annual Repor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September 29, 2018*, 21, available online at: d18rn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0000320193/68027c6d-356d-46a4-a524-65d8ec05a1da.pdf;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2018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11.

[23] 作者由记录富士康工人受访者的工资报表。这是 2020 年的数据。

[24]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2015. *2014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8, available online at: ser.foxconn.com/javascript/pdfjs/web/viewer.html?file=/upload/serReport/4793a8c1-8e5b-40f7-ae83-ea943bbe57ef_.pdf&page=1.

反映了全国范围内管理层对员工的控制与工作场所层面缺乏实质性工人代表的大形势。

管理层和政府都保持警惕，防止出现可能会赋权工人的自主工会。习近平主政之后，从 2013 年开始，包括富士康员工在内的抗争工人继续为确保基本权利而斗争——有时是在非政府组织（NGO）、进步学生团体和人权律师的支持下——但他们却要面临国家对抗议活动的强力打压。[25]在富士康的许多工厂中，工人领导的罢工和抗议参与构成了整个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日益增长的劳工骚乱模式。如果富士康工人能成功地自下而上地重建“他们的”工会，就将激励更多人站起来为更好的未来而斗争。

迈向全球反血汗工厂斗争

鉴于富士康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强大的独立工会在中国的缺位，它仍然容易受到寻求保障劳工与环境正义的跨国运动以及压力的影响。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发生后，出现了几起国际声援的案例。在海峡对岸，2010 年 6 月，台湾学者林宗弘（Lin Thung-hong）和杨友仁（Yang You-ren）发表了一份有 300 多人签名的公开声明，并在台北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富士康管理层对大陆工人的粗暴对待。他们与富士康集团负责人郭台铭对峙，因为他曾承诺加薪。他们指出，富士康近期的加薪并没有解决工人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他们总结道：“我们认为，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事件，是用 11 条年轻生命发出的，对非人道的、剥削性的劳动制的痛苦控诉。”[26]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墨西哥，富士康瓜达拉哈拉工厂的工人发起了声援行动，抗议中国的劳工压迫。他们的行动包括建立一个临时墓地，象征性地

---

[25] Ivan Franceschini and Elisa Nesossi. 2018. ‘State Repression of Chinese Labor NGOs: A Chilling Effect?’ *The China Journal* 80: 111–29; Ivan Franceschini and Kevin Lin. 2019. ‘Labour NGOs in China: From Legal Mobilisation to Collective Struggle (and Back?).’ *China Perspectives*, no. 1: 75–84; and Tim Pringle. 2018. ‘A Solidarity Machine? Hong Kong Labour NGOs in Guangdong.’ *Critical Sociology* 44, nos 4–5: 661–75.

[26] Thung-hong Lin and You-ren Yang. 2010. ‘The Foxconn Employees and to Call to the Attention’, 13 June, available online at: sites.google.com/site/laborgogo2010eng.

让在中国自杀的工人得到安息，并吸引全球媒体关注他们的困境。[27]他们还用西班牙语宣读了一份新闻声明，不仅呼吁富士康，还有苹果、戴尔、惠普、索尼、诺基亚等全球品牌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劳工危机承担责任。[28]

同一时间，在美国，大学师生、工会组织者与劳工权益团体在苹果纽约旗舰店外抗议，要求为富士康工人伸张正义。他们用富士康年轻受害者的照片和葬礼上的花束装饰了周围的人行道。[29]在西海岸，旧金山的华人进步会为富士康受害者及其家属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表情严肃的青年举着写有富士康自杀工人名字的牌子。[30]

2010 年 6 月 14 日，“学生反血汗工厂联合会”（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与全美范围内二百五十多所大学与高中分会组成的全国性网络合作，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当时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解决深圳的问题，确保富士康供应商工厂提供生活工资、合法工作时间以及民主的工会选举。[31]这封信被抄送给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旧金山华人进步会与华盛顿特区的劳工权利监督组织“工人权利协会”（Worker Rights Consortium）。他们没有收到苹果公司的回应。显然，运动有必要继续扩大、深化，通过协调行动向企业管理层施压并向相关公民伸出援手。

[27] ‘Protesta contra suicidios en Foxconn [Anti-Suicide Protest at Foxconn]’, Guadalajara, Mexico, 10 June 2010, YouTube video, available online at: youtube.com/watch?v=4ikF9vD3R_A.

[28] ‘Suicides at Foxconn in China: An Appalling Showcase for the Electronics Sector’, *SOMO*, 8 June 2010, available online at: somo.nl/suicides-at-foxconn-in-china-an-appalling-showcase-for-the-electronics-sector/; ‘Mexican Foxconn Workers Support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GoodElectronics*, 14 June 2010, available online at: goodelectronics.org/mexican-foxconn-workers-support-their-chinese-colleagues/.

[29] Worker rights supporters in New York City hel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Foxconn workers outside Apple’s Fifth Avenue store on 7 June 2010.2010 年 6 月 7 日，纽约市的工人权利支持者在第五大道苹果商店外未富士康工人举行了追悼会。

[30] San Francisco 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2010. ‘Apple’s First Ever Store Overwhelmed with “Death Pad” Protesters in San Francisco’, 17 June, available online at: sfcitizen.com/blog/2010/06/18/apples-first-ever-store-overwhelmed-with-deathpad-protesters-in-san-francisco.

[31] 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 2010. ‘Open Letter to Apple CEO Steve Jobs’, 14 June. The letter is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2017 年，有人发起了“#iSlaveat10—No More iSlave”运动。[32]十年前，苹果公司随着 iPhone 的推出进入手机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电子制造业与工人困境之间的联系。[33]例如，在欧洲，一个新兴的消费者市场认识到，Fairphone（公平手机）而不是 iPhone（与其他品牌），是一个更尊重工人权利的可持续生产模式。[34]关注耐克、阿迪达斯与其他服装和鞋类公司的消费者运动之后，苹果公司是否对民间社会活动家发起的抵制活动变得更加敏感?

尽管问题仍未解决，但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科技公司在跨国生产链中的收益完全依赖于富士康等供应商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除了在 2019 年 9 月推出 iPhone 11 更新换代以外，苹果一直在为国内外的高中生与社区大学学生推广其应用程序开发课程。苹果公司的市场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教育产生的，其对道德实践的主张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职员工以及其他消费者。大约 330 个主要位于欧洲的公共部门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大学，已经利用他们的采购权力，要求这些品牌和他们的供应商在合同中保护并加强工人权利。[35]希望这可以开辟一条道路，来给苹果全球市场中各国的工厂进行有力的施压。

---

[32] Jenny Chan. 2018. ‘#iSlaveat10.’ In *Gilded Age: Made in China Yearbook 2017*, edited by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Canberra: ANU Press, 102–5.

[33] Jack Linchuan Qiu.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34] 作者与 Fairphone 社会创新负责人 Remco Kouwenhoven 的在线会谈（2020 年 11 月 12 日）。Fairphone 是一家社会企业，2009 年于荷兰成立。销售超过 220000 部智能手机，Fairphone 3 于 2019 年进入欧洲市场。

[35] Jenny Chan, Greg Distelhorst, Dimitri Kessler, Joonkoo Lee, Olga Martin-Ortega, Peter Pawlicki, Mark Selden, and Benjamin Selwyn. 2021. ‘After the Foxconn Suicides in China: A Roundtable on Labor,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Global Electronics.’ *Critical Sociology*, online first: doi.org/10.1177/08969205211013442.

2011

2011 年夏天，就在新学期开始前的几周，北京关停了 24 所打工子弟学校。这场突发事件表明，随着产业升级与人口管制开始主导城市政策，中国首都为外来人口提供社会服务的态度日益严格。本文回顾了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 10 年代北京非正规学校的起起落落，引起读者关注中国城市政治的一个关键窘境——城市希望吸引农村外来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却又不愿意全面承担他们的社会再生产成本。

中心处的断裂：北京驱逐农民工子弟学校

伊莱・弗里德曼（Eli FRIEDMAN）

2011 年 8 月，北京市政府发起了一波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驱逐潮。在几周内，超过二十所学校被迅速关停，有些甚至被拆除。多达三万学生在新学期开始前无学可上。这次突然袭击打乱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他们被迫考虑是拆散家庭，将子女送回到户口所在地，还是自己放弃大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政府的关停所引起的绝望感导致了时而激烈的抵抗形式，家长会去堵路、上访政府机构，要求将子女重新安置到本地学校。虽然这种集中爆发的破坏场面在随后数年内没有再次出现，但情况却很难改善。几年后，人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一事件吹响了后来持续多年“优化人口”运动的号角，这一运动旨在清除被认为对首都运作不重要的人，孩童在其中同样不能幸免。

根深蒂固的分化

2011 年的拆迁行动揭露了一个深刻的社会矛盾：虽然中国在上一代人的努力下逐渐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但社会公民权仍然以城市为单位。中国公民被赋予了稀薄的自由，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出售劳动力的权利，只要由买家接受他们，可他们离开户口所在地后，就放弃了任何社会再生产的权利，包括医保补贴、住房，以及关键的教育。在资本主义转型时代，地区不平等迅速扩大，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与高度本地化的生活维持设施（life-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之间的断裂，给中国的农民工带来了普遍的社会、情感、乃至生存的危机。

这种社会空间上的断裂并非始终如此。随着工业国有化与工作分配制度的发展，1958 年户口制度的机构化基本上消除了劳动力市场（见本书中海沃德的文章）。户口既意味着生产地位——农业或非农业——也意味着所在地，将相应的公民权利与他们的户口所在地绑定。这种安排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将农民固

定在原地，以便从农村提取盈余农产品，并用于投资城市的大规模工业化。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没有官方许可，很难在户口所在地之外的地方生存。除了少数例外（如军人、季节性工人），国家希望民众或多或少地呆在他们在社会空间矩阵中被指定的位置上。虽然这一制度产生了各种不平等——最可怕的案例就是大跃进期间数百万集中在农村的死亡人口——但它实现了农村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空间和社会再生产空间的整合。

随着私人资本的放开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户口制度开始瓦解。这一过程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90 年代初急开始加速。2011 年，超过 2.5 亿（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户口所在地之外。农村居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城市就业的工资来生存，即使这意味着放弃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随着农村生计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离开乡土，北京等东部大城市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去处。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农民工中年轻人占相当大的比例。典型农民工的生活轨迹就是：完成义务教育与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技术培训后离开家乡。十几至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成为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产业的核心人口。但是，社会与物质因素往往迫使这些农民工在二十多岁时返回农村，结婚生子。之后，父母中的一方（通常是父亲）返回城市继续挣钱，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而社会再生产实践中的核心部分——抚养子女、教育、医疗与养老，通常都会留在农村。

旧制度的缝隙之间

几乎就在这些新的迁移潮出现之际，旧的社会再生产制度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在这个阶段，外地儿童想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非常困难。公立学校没有义务接收外地学生，而且通常只会接受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些学生能提高学校的平均考试成绩，而学生的父母还得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被拒之于公共教育体系之外。农民工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或许把他们带到教育前景十分不明朗的城市。尽管绝大多数人选择前者——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与其他快速扩张的沿海城市的农民工开始建立非正规学校，以满足那些希望或需要把子女带在身边的人。

这些所谓的“打工子弟学校”非常缺乏资源。在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的农民工子女相对较少，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只不过是托儿所式的运作方式，有时

只占一两个公寓房间。大多数学校最初是由农民工自己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区分常规学校（以盈利为目的）和“公益学校”（受基金会或企业资助、能够适当降低学费）。政府对这一事态基本无动于衷：没有提供物质支持，也没有公开反对。农民工子女被挤压在再生产制度的夹缝当中，而这一制度面对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瓦解。城市勉强接受了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学校，因为这减轻了他们扩大教育资源的压力。但这也意味着大多数学校完全依赖学费来维持运作——而当所有的“客户”都是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时，这相当具有挑战性。

然而，在千禧年代城市土地价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相对冷漠很容易变成敌意，一所著名的学校——2008 年成功获得官方的认可与重要的基金会支持——在 2001 年成立后的几年里，被迫搬迁了五次。正如学校校史中所描述的那样：

> Zhifan[1]学校在建立之初就频繁搬迁的背后有种种原因。前两次是因为政府要求关停学校。后来三次是因为要给北京的城市扩张让路，要拆除学校建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学校慢慢地从四环搬到五环，又从五环最终搬到现在的六环。[2]

为了追求经济收益，官员可能会站在开发商一边，而非缺乏正规注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尽管这些学校通常会被容忍，但根据国家的衡量标准，它们并没有为城市增添价值。这种行政上的不稳定与持续的空间边缘化的经历在这一时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农民工社区中十分常见。

随着农村人口向中国东部蓬勃发展的城市大规模迁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央政府采取了措施放宽人口控制。2001 年，国务院发布“两为主”方针政策，建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流动人口儿童教育框架。政策规定，流入地政府（而非户口所在地）应该承担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财政责任，而农民工子女应当首先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的或通常无监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此外，

---

[1] 系假名。

[2] 本文编写于 2011 年。

译者无法通过假名找到所指学校，北京这样的学校太多了。——译者注。

2003 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没有合法居住证的农民工将被遣送会农村）后，似乎农民工可以留在城市并让子女接受教育。

国家层面的政策转变后，北京和其他城市开始建立正式的行政程序，接纳非本地人入读公立学校，并着手规范在制度夹缝中出现的非正规教育系统。2005 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按照“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处理农民工子弟学校。[3]应该乐观的是，公立学校确实变得更加包容。教育部设立了“五证”制度，允许满足行政要求的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取消了外来人口的借读费。据官方估计，2001 年至 2015 年，入读北京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比例从 12.5%增加到 78%。[4]虽然必须高度怀疑这些数字——最不可能被公立学校录取的学生正是最不可能得到政府统计的学生——但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被纳入了公共体系。

被排挤到边缘

正如开头所表明的那样，北京在 21 世纪初至 10 年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个关于彻底融入的美好故事。尽管可以通过正式的程序入读城市公立学校，但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机会仍然是一种可以被撤销的特权，而非一项权利。北京等大型富裕城市中，入读公立学校的评估标准更偏向于那些最不需要国家补贴服务的农民工。通常来说，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财富状况与城市社会关系越好，他们就越有可能被录取。“五证”与随后的“积分入学”计划中，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或居住在非正规住房的农民工从一开始就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与住房合同而被排除在外。缴纳当地社会保险是一项要求，尽管缴费时间要求的长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份而各不相同。我于 10 年代初至中期在北京的田野调查中，农民工父母无一例外地声称，他们必须支付大量贿赂——通常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才能让他们的孩子入读公立学校。这些筛选机制

[3] 《新华》：“北京将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的管理”，2005 年 10 月 10 日，在线链接：edu.zjol.com.cn/system/2005/10/10/006326529.shtml.

[4] 李雅儒、孙文营、阳志平：“北京市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第 112 页；赵晗、魏佳羽：“北京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教育现状”，载于杨东平、秦红宇、魏佳羽编：《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05—120 页。

可以被视为“反向财富测试”。目的就是将名义上的公共资源准确地输送给那些最不需要它们的人，同时将最贫困的人群集中在农民工子弟学校。[5]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没有其他选择的父母来说，非正规学校是一种次优选择。然而，困难在于，就当城市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化外地精英的公立学校入学机会时，城市也开始有条不紊地挤压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上述提及的 2005 年的通知之后，重点显然不是“扶持”“审核”农民工子弟学校，而是淘汰。事实上，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数量在 2006 年达到顶峰，约有 300 所，此后逐年减少。[6]2011 年的大规模拆迁绝不是偶然现象。相反，这是长达多年蓄谋已久的过程中的加剧和凝缩。

事实上，到了 2014 年，学校系统已经成为市政府控制人口的一个关键障碍。同年，中央政府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7]其中特别要求“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是中国精英城市为优化人口而进行的广泛努力之一，从而推动转型基于高附加值、知识型、服务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的低端人口在这一想象中没有位置。除了将仓库、批发市场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非首都功能”迁出北京，剥夺农民工子女的上学机会也是驱逐“低端人口”的有力手段。尽管没有出现 2011 年那样的拆迁规模与强度，但学校还是被逐个拆除、断水断电，或是被吊销营业执照。

学校缓慢遭到关闭的同时，入读公立学校的条件也急剧加重，其中包括要求家长缴纳社保以及一系列繁琐的文件证明。在许多地区，一个特别令人头疼的要求是，父母必须在他们试图送孩子入学的同一地区居住并缴纳社保。无数沮丧的家长表示，新规定太过武断，如果自己能够满足教育部规定的所有要求的话，那么还会有更多的要求与规定，直到他们彻底放弃。因此，许多原本能够进入正规小学或中学的农民工子女发现自己被赶出了公立教育体系，而此时，政府也在关停非正规的教育选择。意图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外来人员不受欢迎。

---

[5] 这段话取自 Eli Friedman. 2018. ‘Just-in-Time Urbanization? Managing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Schooling in the Chinese City.’ *Critical Sociology* 44, no. 3: 503–18.

[6] 刘杰、赵颖：“北京昌平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停办调查”，《京华时报》2007 年 9 月 12 日，在线链接：news.cctv.com/education/20070912/100191_2.shtml。

[7] 《新华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国政府网，2014 年 3 月 16 日，在线链接：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

政府的手段残酷，也很有效。除了限制教育机会和产业迁移，2017 年 11 月，当局以确保建筑安全为借口，夷平了整个农民工社区。事实上，这些拆除行动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处外来人口社区发生火灾后进行的，火灾导致 19 人丧生。但那些被赶出家门的人并没有得到重新安置。政府毫不留情地对工人阶级农民工的学校、工作场所和住房发动接连不断的打击。北京人口经过几年的增长放缓，到 2017 年开始出现收缩。[8]

政治压力和物质压力的合流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 2011 年拆除学校的直接原因，也不会确定随后几年对北京外地儿童采取不太引人注目的驱逐形式的原因。然而，在这一时期，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压力和物质压力，这些压力的合流导致了工人阶级外地人口的驱逐。在政治上，市政府面临人口“过多”的压力。北京在几年前就迅速超过中央规定的人口限制，2014 年后，城市面临着 2300 万居民的“红线”。从经济角度来看，减少人口可能并不合乎逻辑，人口降低的情况下，资本扩张面临着真正的组里，但这又源自根深蒂固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将人口过剩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关停学校背后冷酷的物质计算更为直接。如前所述，在 21 世纪初至 10 年代，即使是城市的边缘地区，建设高层公寓或其他商业地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地产主与地方官员越来越希望将土地用于更有利的用途。尽管很难分清这些压力中哪个是主导因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重要。它们都在推动着拆除学校、驱逐一个被视作可有可无的人口群体。

尽管中国一再声称户口制度已经终结，教育也越来越具有包容性，但中国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其高度地方化的社会服务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减少，即使其空间特征已经发生变化。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政策似乎已经实现了其目标：数十万最弱势的人被迫离开城市。

但尽管有着这样的愿景，北京也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孤岛。北京的财富与壮丽正是由国家如此鄙视的农村人口创造的。将学龄儿童遣送到农村并不能消除他们的苦难，只是将社会危机转移到视线之外。尽管党中央发出越来

[8] iyi Tang. 2019. ‘Beijing’s Population Falls Further.’ *Caixin,* 23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caixinglobal.com/2019-01-23/beijings-population-falls-further-101373464.html.

越尖锐的族裔民族主义口号，但国家仍然根据既定的特征，将占主导地位的某些汉族成员视为可牺牲的对象。因此，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不局限于种族化的边缘地区。这是一道深刻的断裂，一种困扰核心地区的社会空间性质而非种族性质的断裂。

2013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项庞大的对外政策，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发展与区域连通性。虽然 2015 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行动”为中国及其合作伙伴确定了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通过文化、学术、媒体等交流实现民心相通，而倡议的核心就在于北京方面通过建设铁路、港口、管道、矿井、水坝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将中国和其邻国乃至更远的国家连接起来。本文将探讨这一切对中国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带一路中的中国工人

何宜伦（Aaron HALEGUA）

2013 年 9 月，圣彼得堡的 G20 峰会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这是全球最大的内陆国家。哈萨克斯坦的旗舰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习近平主席堂在一间坐满官员、记者与学生的讲堂发表了一次讲话。习近平描述了中国与其中亚邻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历史，提及 2100 年前汉朝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他表示，恢复中国与中亚的联系将是最重要的外交优先事项，并呼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改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以及促进理解信任。

一个月后的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议会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史，尽管二者隔海相望。他呼吁建设了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之间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次讲话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标志性的外交政策——“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后来改称“一带一路”倡议，降低外国受众所感到的威胁。[1]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亚、非、欧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和区域连通。早期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投资总额可能达到 1 万亿美元。2015 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行动”为中国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确定了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通过文化、学术、媒体等交流实现民心相通。[2]2017 年，中国共产党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表明中国对此的政治重视。

[1] 刘德伟：“‘一带一路’到底是倡议还是战略？”，新浪网，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线链接：cj.sina.com.cn/article/detail/3860416827/135959。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 年 3 月 28 日，在线链接：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就是中国通过建设铁路、港口、管道、矿井、水坝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将中国和其邻国乃至更远的国家连接起来。通常是由中国银行向东道国政府提供贷款，然后由东道国政府将项目承包给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再进口中国的建筑材料，通常还会带来中国工人。一位评论家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就好像是把其整个国内项目开发生态系统“空投”到另一个国家。[3]为了进一步展示中国对此的财政承诺，还成立了“丝路基金”与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部分资金就用于资助这些基础设施项目。

“一带一路”启动以来，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公司在海外项目中越来越活跃。2015 年，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签署了 3987 份的新合同，价值 920 亿美元，“一带一路”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140 亿美元。[4]在 2019 年，这些数字已经增长到 6944 份新合同，价值 1540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约为 150 亿美元。[5]截至 2020 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已在“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中投资了 2000 多亿美元，[6]而签署了解备忘录正式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数量从 2016 年的几十个增加到 2021 年 1 月的 140 个，其中包括拉丁美洲等新区域的国家，涵盖全球 46 亿。[7]中国已经与国

[3] Nyshka Chandran. 2018. ‘China Can Make Its Belt and Road Project More Successful if it Taps Locals, Experts Say.’ *CNBC*, 14 Sept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cnbc.com/2018/09/14/china-must-do-more-to-tap-locals-in-belt-and-road-initiativepanel.html.

[4] 中国商务部：“2015 年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合作情况”，2016 年 1 月 21 日，北京：商务部，在线链接：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601/20160101239881.shtml。

[5] 中国商务部：“2019 年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合作情况”，2020 年 1 月 22 日，北京：商务部，在线链接：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2001/20200102932445.shtml。

[6] Andrew Chatzky and James McBride. 2020. *China’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ckgrounder, 28 Januar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vailable online at: 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assive-belt-and-road-initiative.

[7] CSIS China Power Team. 2020. ‘How Wil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dvance China’s Interests?’ *China Power Project*, 26 Augus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vailable online at: chinapower.csis.org/china-belt-and-road-initiative (statistics for 2021); James Kynge. 2018. ‘A Tale of Two Harbours Tells Best and Wors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Financial Times*, 25 Sept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ft.com/content/7699d13a-806a-11e8-af48-190d103e32a4 (statistics for 2016).

际组织签署了 31 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其中至少有两项是与国际劳工组织签署的协议。[8]

在“一带一路”的旗帜下，中国还开展了扩大文化影响力的项目。“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的学生可以获得“一带一路奖学金”，去中国学习或参加考察访问。中国还努力将旅游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民心”相通的一环。中国还推出“数字丝绸之路”，通过卫星网络与光纤电缆网络连接各国。[9]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作为“健康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媒体夸耀“一带一路”的运输通道使中国能够向欧洲“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运输 7.6 万吨的个人防护设备，并表扬中国向 13 个发展中国家捐赠疫苗的行为。[10]

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真正”动机，存在着许多争议。概括地说，关于如何理解这一庞大的项目与举措，有两种相反的解释框架。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北京方面协调推动的一项连贯条理的总体计划（coherent master plan），旨在推动中国军事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安全规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扩大外国石油输入中国的路线，建设可供中国海军在冲突中使用的港口，或在全球各地派驻中国人员。[11]“一带一路”还被解读为试图解决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例如，通过加强与中亚的联系，促进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发展，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来源，解决中国钢铁和水泥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亦或者是通过进入新的

[8] Jeremy Youde, Melanie Hart, Dan Baer, Courtney Fung, Sophie Richardson, Aaron Halegua, Michael Beckley, Maria Adele Carrai, and Daojiong Zha. 2020. ‘How Will China Shape Global Governance?’ *ChinaFile Conversation*, 9 May, available online at: chinafile.com/conversation/how-will-china-shape-global-governance. 另见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2022 年 8 月 25 日，在线链接：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9] Kynge, ‘A Tale of Two Harbours Tells Best and Wors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10] Yeping Yin. 2021. ‘BRI Delivers Growth and Protection Amid Pandemic.’ *Global Times*, 8 Febr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globaltimes.cn/page/202102/1215314.shtml.

[11] Devin Thorne and Ben Spevack. 2017. *Harbored Ambitions: How China’s Port Investments Are Strategically Reshaping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4ADS, available online at: 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6ef8b4d8af107232d5358a/t/5ad5e20ef950b777a94b55c3/1523966489456/Harbored+Ambitions.pdf.

消费市场，出售中国制造的商品。[12]至于文化交流，则被示威中国在东道国建立软实力与影响力的尝试，以便推动实现地缘战略及其他目标。

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一带一路”并非北京方面“连贯条理”的战略，而仅仅是一句“口号”，是众多没有一致性的行动者（actors）附加在各种不相干的政策与项目上。[13]一位分析者将“一带一路”描述为“愿景而非计划”，认为这项倡议落在下级官员与其他各方（包括私营企业）身上，由他们去寻找落实习近平愿景的方案。[14]在这种框架下，“一带一路”与中国现代史上过去的政治“运动”（如大跃进或改革开放）一致。在这一解释框架下，“一带一路”的范围似乎可以无限扩大，这并非表明中国有征服世界的计划，而是表明中国实际上缺乏明确的战略或计划。事实上，有些人认为，中国官员、公司与其他行动者某种程度上是随意地将“一带一路”的标签贴在他们所追求的任何项目或举措上，希望这能帮助他们赢得政治支持。[15]

然而，无论中国的真实意图或动机如何，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东道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16]这些大型“一带一路”合同的谈判与条款很少透明化，这为腐败创造了大量机会。东道国政府为支付这些项目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往往远远超过了该国实际可以偿还的范围——有人指责这是中国有意为之的一种“债务陷阱外交”。[17]在实施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当地居民抱怨土地被非法征用，

---

[12] Daniel R. Russel and Blake Berger. 2019. *Naviga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port, June. New York, NY: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online at: 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6/Navigating%20the%20Belt%20and%20Road%20Initiative_0.p-df. See also Duncan Freeman. 202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Overcapacity Connec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lobal Governance*, edited by Maria Adele Carrai and Jan Wouter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20–38.

[13] Lee Jones and Jinghan Zeng. 2019.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yond "Grand Strategy" to 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40, no. 8: 1415–39.

[14] Yuen Yuen Ang. 2018.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Campaign, Not a Conspiracy.' *Bloomberg*, 27 Sept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09-27/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is-a-campaign-not-a-conspiracy.

[15] Baogang He. 2019.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no. 116: 18–95.

[16] 有关特别具有争议的项目的讨论，见“全球中国人民地图”，在线链接：thepeoplesmap.net。

[17] 关于“债务陷阱”的说法，例如见 Kynge, 'A Tale of Two Harbours Tells Best and Wors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根据文中的说法，中国有意使得东道国负债累累，无力偿还，以（见下页）

对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东道国的企业往往对中国公司从中国购买材料和用品感到不满。当地人还将被派去建设项目的中国工人妖魔化为“入侵者”，认为他们“偷走”了当地人的工作。[18]

而本文只关注“一带一路”的一个方面：这对中国工人意味着什么？具体而言，本文将关注那些到国外建设基础设施、建筑或类似项目的中国劳工。这些人的工作条件是怎样的？“一带一路”是否导致更多中国人选择在海外工作？“一带一路”的政治敏感性与中国塑造良好形象的希望是否转化为项目中更好的工作条件？

本文将探讨以上问题，首先需要指出，早在“一带一路”之前，就在开展海外项目并向海外派遣工人，本文还将探讨海外劳工常常面临的恶劣劳动条件。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出乎意料地并没有显著增加官方统计的中国海外劳工，尽管有着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正在通过非正式渠道在海外工作。此外，尽管政府多次强调要让中国企业尊重工人的权利，但劳工虐待现象仍然存在。

“走出去”时期的中国海外劳工

中国劳工被派遣出国并非一种新趋势。[19]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有企业被指示参与政府资助的外国发展项目，他们通常会带上自己的中国员工（见本书中索拉切和 Zhu、高尔韦的文章）。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在七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一千多个这样的项目。1986 年中国的改革后，获得护照变得更加容易，外出旅行的限制也得到放宽，个人前往海外寻找高薪工作变得

便接管抵押贷款的保卫资产，或是获取其他政治让步。最常被引用的案例便是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偿还用于修建汉班托塔港的中国贷款，于是将该港租给中国 99 年。另一个案例便是老挝政府为修建铁路从中国借款 60 亿美元，相当于老挝年度 GDP 的近三分之一。然而，也有许多人质疑对这两起事件的叙述，认为“债务陷阱外交”理论不过是一场神话。见 Deborah Bräutigam and Meg Rithmire. 2021. ‘The Chinese “Debt Trap” Is a Myth: The Narrative Wrongfully Portrays Both Beijing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Deals With.’ *The Atlantic*, 6 Febr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1/02/china-debt-trap-diplomacy/617953.

[18] Mech Dara. 2019. ‘Hun Sen: Claim that China is “Invading” Kingdom is Crazy.’ *The Phnom Penh Post*, 25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phnompenhpost.com/national/hun-sen-claim-china-invading-kingdom-crazy.

[19] Pál Nyíri. 2020.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sation of Chinese Capital.’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3: 42–47.

越来越普遍。1985 年，有 5.5 万名中国工人驻留海外，1995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26.43 万，2000 年增长到 42.409 万。[20]

1999 年，中国推出“走出去”政策，鼓励中国企业获取海外的项目合同。这一政策的明确目的之一是增加中国劳动力的输出。[21]截至 2006 年底，超过 5000 家中国投资实体在 172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近 1 万家企业，对外投资总额达 906.3 亿美元。[22]此外，中国驻外工人的数量持续增长，从 2000 年的 42.49 万人增至 2010 年的 84.66 万人。[23]官方统计显示，这些工人中约有 43%被派遣到海外，为中国公司承包的外国项目提供劳动力。[24]

“走出去”时期的政策文件规定，中国的对外投资项目应该实现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赢”，既要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也要保障外派中国劳工的权益。[25]然而，关于实施这些目标的细节少之又少。例如，这些项目必须雇用多少当地工人，或者必须在东道国购买哪些建筑材料，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即使在早期阶段，对中国物资与中国工人的依赖就已引起当地人的紧张。2012 年的一次格外具有煽动性的事件中，1200 名赞比亚矿工停工抗议劳动条件不安全时，中国矿主用外派的中国工人替代他们，这引起了赞比亚抗议者的激烈反应，导致一名中国经理死亡。[26]

---

[20] 张祖杰、石美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现状与问题研究”，*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435 (2020)，在线链接：atlantis-press.com/article/125939332.pdf.

[21] 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2001 年 3 月 5 日，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线链接：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693.htm。

[22]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s Abroad Top $92b by 2007.’ *China Daily,* 17 April 2007, available online at: 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8-04/17/content_6624488.htm.

[23]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年，在线链接：yearbookchina.com/downsoft-n3020031901.html。

[2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编：《70 年中国特色商务发展之路（1949—2019）》，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9 年：第 330 页。

[25] 例如，见“国务院常务会通过鼓励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意见”，《中国新闻网》2006 年 10 月 25 日，在线链接：chinanews.com/other/news/2006/10-25/809947.shtml。

[26] Alexis Okeowo. 2013. ‘China, Zambia, and a Clash in a Coal Mine.’ *The New Yorker,* 9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china-zambia-and-a-cla-sh-in-a-coal-mine; Young Jonn Lim. 2012.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Zambia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 Comparative Coverage of the Phenomenon by Zambian, Chinese, and South African Newspap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见下页）

中国政府在一个领域发布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外派中国劳工的权益——例如，规定他们必须签订带有特别条款的书面合同，限制收取招聘费或保证金，并要求劳务派遣公司将资金存入中国的相关政府机构，以防工人最后一分钱也拿不到。[27]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法律规定并不能面面俱到。中央政府在 2005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涉及中国海外工人的纠纷越来越多，包括大规模抗议、在中国大使馆静坐以及与东道国警察发生冲突，这促使中国出台更严格的规定，限制只有某些实体才可以派遣劳工出国，限制分包，要求购买工伤保险，并规定了其他旨在遏制违规与剥削的措施。[28]

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同样证实，中国的海外劳工普遍面临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Chris Smith 和 Yu ZHENG 在回顾中国某十年的海外投资时发现，中国建筑公司经常招募中国农民工，违反当地关于工时与安全的规定，并利用扣留工资等胁迫手段控制劳动力。[29]他们指出，中国工人对公司规定的服从，无法组织或是寻求当地政府的帮助，使得在公司的严重他们比当地人更具吸引力。同样，李静君对在非中国企业的研究中，描述了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无论是受雇于国企还是私企，都“糟糕透顶”，“贫困的工资率”、拖欠工资、安全措施不完善与其他形式的剥削。[30]此外，这些虐待性条件的案例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等地同样存在。[31]然而，必须指出，正如一些学者

Research 2, no. 7: 548–57.

[27] 例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2007 年 5 月 14 日，在线链接：gov.cn/zhengce/2021-06/28/content_5723586.htm。

[28] 商务部：“关于印发《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05 年 12 月，北京：商务部，在线链接：mofcom.gov.cn/aarticle/b/bf/200602/20060201553432.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2008 年 5 月 7 日，北京：商务部，在线链接：mofcom.gov.cn/article/swfg/swfgbi/201101/20110107352097.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 年 6 月 4 日，北京：国务院，在线链接：gov.cn/zwgk/2012-06/11/content_21-57905.htm。

[29] Chris Smith and Yu Zheng. 2016. ‘The Management of Labour in Chinese MNCs Operating Outside of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In *China At Work: A Labour Process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edited by Mingwei Liu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361–88.

[30] Ching Kwan Lee. 2014.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New Left Review* 89: 29–66.

[31] Aaron Halegua and Jerome A. Cohen. 2019. ‘The Forgotten Victim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19/04/23/forgotten-victims-chinas-belt-road-initiative.

所认为的，尽管这些中国企业的劳动行为并不值得称道，但有时并不比东道国运营的其他外国企业的劳动条件更糟糕。[32]

简而言之，尽管中国的政策要求企业落实保护中国外派劳工的“双赢”项目，但往往公司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下一节将探讨 2013 年“一带一路”启动后，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

中国海外劳工与“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启，对中国海外劳工的数量或海外项目的劳动条件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有更多的中国人在海外工作？中国企业更加重视雇佣当地工人从而避免过去遭遇的麻烦？鉴于“一带一路”的政治意义以及对负面报道的担忧，中国企业是否正在实施更好的劳工措施，从而避免工人抗议或工伤带来的尴尬延误？本节将探讨这些问题。

然而，一个初步的问题就是，由于“一带一路”的模糊性质，我们很难对其的影响进行严格分析。尽管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某些项目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全面的项目清单，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确定一个项目是否是“一带一路”。尽管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与利用中国银行的融资建设基础设施的国企紧密相关，但如上所述，“一带一路”的标签同样被私企使用，贴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制造业、旅游业甚至艺术展览上。[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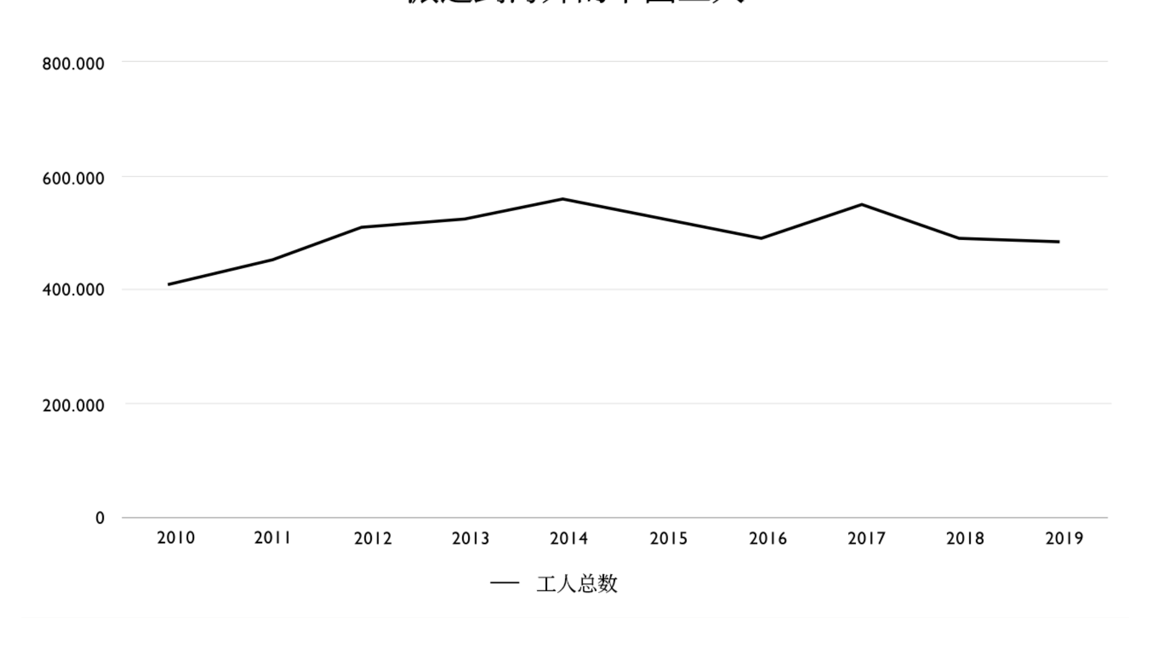
然而，尽管“走出去”政策明确将劳务输出作为目标，但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将其视作明确的目标。相反，中国甚至设立了一些项目，减少外派中国劳工的需求——例如，其中一个项目旨在培训 3600 名马来西亚工程学生从事铁路设计和建设。[34]事实上，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并没有表明中国海外劳工因“一带一路”的启动而明显增加。尽管派遣到海外的工人数量从 2013 年的 52.7 万增至 2014 年的 56.2 万，但随后的 2015 年出现了下降，此

[32] See Lee,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33] Yang Li. 2017. ‘B&R by the Numbers: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ng Enterprises Most Influential in B&R Construction.’ *Belt and Road Portal,* 28 Nov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eng.yidaiyilu.gov.cn/jcsj/dsjkydyl/37115.htm; Yu Liang. 2019. ‘2nd Belt and Road Afro-Sino Art Exhibition Opens in Zimbabwe.’ *Xinhua,* 30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4/30/c_138022992.htm.

[34] Russel and Berger, *Naviga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后每年都处于波动。[35]2018 年，中国报告称有 55.2 万名海外工人，99.68 万名驻外工人，但在第二年，这些数字分别降至 48.7 万与 99.2 万。[36]（这些数字在 2020 年急剧下降，可能是由于 COVID-19 的影响。）[37]尽管派遣工人的总数停滞不前，然而，自“一带一路”启动以来，某些国家的中国工人数量出现了大规模增长，例如马来西亚、老挝和巴基斯坦。[38]



派遣到海外的中国工人 [39]

[35] 商务部：“商务部数据统计中心”，2020 年 3 月 3 日，在线链接：data.mofcom.gov.cn/tzhz/forlaborcoop.shtml。

[36]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9》（2018 年的数据）；商务部：“2019 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简明统计”（2019 年的数据），2020 年 1 月 22 日，北京：商务部，在线链接：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2001/20200102932444.shtml（2019 年的数据）。

[37] 商务部：“2020 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简明统计”，2021 年 1 月 22 日，北京：商务部，在线链接：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2101/20210103033291.shtml。

[38]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年（2012 年的数据）；张祖杰、石美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现状与问题研究”（2018 年的数据）。

[39] 商务部：“商务部数据统计中心”，2020 年 3 月 3 日，在线链接：data.mofcom.gov.cn/tzhz/forlaborcoop.shtml。

还得指出，大量中国人通过非正规渠道在海外寻找工作，例如使用未注册的招聘机构以及持旅游签证出国，因此并不计入官方数据。[40]例如，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塞班岛上的一个建筑项目中有 2000 名中国工人，其中包括几百名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岛的工人，他们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41]中国媒体报道了一名劳工中介通过欺骗 837 名工人赚取了超过 550 万美元。[42]虽然不知道非正规工人的确切规模，但似乎相当庞大。而也有可能是由于某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旅行限制的放宽或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导致了非正规工人的数量增加。事实上，在 2017 年，中国商务部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并承诺采取行动杜绝未注册的招聘机构。[43]非正规工人的普遍存在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官方数据上中国海外工作人员的减少，并没阻止许多“一带一路”东道国关于中国“入侵”的看法，或是反华情绪（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增长。[44]

“一带一路”的启动是否改善了海外工人的劳动条件？自 2013 年以来，中国颁布了许多政策，要求企业遵守国际标准和东道国的法律，甚至要“保障劳工权益”。[45]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的“行为准则”指导他们如何与当地工会合作，教育外派工人了解当地法律，并制定安全计划减少工作场所事故。

---

[40] Guofu Liu. 2018. *Assessment of the Migrant Worker Complaint Mechanism in China*. Report, 4 Apri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41] Aaron Halegua. 2020. ‘Where is China’s Belt and Road Leading International Labour Rights? An Examination of Worker Abuse by Chinese Construction Firms in Saipa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lobal Governance*, 225–57.

[42] “想出国劳务却遭遇黑中介 837 人被骗了 3526 万元”，新华网，2017 年 2 月 18 日，在线链接：xinhuanet.com/world/2017-02/18/c_129484582.htm。

[43] 商务部：“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规范外派劳务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中国新闻网 2017 年 7 月 6 日，在线链接：chinanews.com/cj/2017/07-06/8270518.shtml。

[44] Alvin Camba. 2020. *Illicit Capital & Labor Inflows: Chinese Online Gambling in the Philippines*. 16 March. London: 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available online at: business-humanrights.org/en/blog/illicit-capital-labor-inflows-chinese-online-gambling-in-the-philippines（文中指出，官方统计菲律宾有 11 万中国工人，但还有人指出实际人数可能高达 40 万）。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北京：国务院，2017 年 8 月 4 日，在线链接：gov.cn/zhengce/content/2017-08/18/content_5218665.htm；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北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18 年 12 月 26 日，在线链接：ndrc.gov.cn/xxgk/zcfb/tz/201812/W020190905514236483349.pdf。

[46]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在 2017 年推出了一套准则，要求企业确保工作场所安全，预防歧视、童工以及强迫劳动，甚至要为工人建立表达诉求的渠道。[47]

也有很多中国海外工人的状况相当不错，在国企工作，工资是在中国的十倍。国企会购买社会保险，严格遵守用餐休息时间，晚上不会安排工作。[48]然而，仅仅从政府关于劳工权益的大量声明中就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使“一带一路”启动之后，海外中国劳工中仍然存在严重的虐待问题。包括国企在内的此类虐待行为的案例有：越南的一个铁路项目中未能提供适当的安全培训，埃塞俄比亚的公路项目中拖延工资、缺乏充足的防护设备。[49]

针对一家在厄瓜多尔建设大坝的中国公司的投诉有 26 项，其中包括恶劣的安全和工作条件，以及项目期间发生的隧道坍塌，造成十多名工人死亡。[50] 2019 年，一名中国建筑工人在以色列的一次作业中死亡。[51]在俄罗斯，数百名中国工人在建设纸板厂时“像奴隶一样工作”，住在狭窄的宿舍，三个月没有得到任何工资。[52]此外，即使国企提供了体面的工作条件，但他们通常会把工作

---

[46]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等关于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的通知”，北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17 年 6 月 12 日，在线链接：ndrc.gov.cn/xxgk/zcfb/tz/201712/t20171218_962621.html。

[47]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指引》，北京：商务部，在线链接：chinca.org/cica/info/17111313415011。

[48] See Cheryl Mei-Ting Schmitz. 2020. ‘Doing Time, Making Money at a Chinese State Firm in Angola.’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3: 52–57 (describing Chinese workers at a construction firm in Angola).

[49] ‘China’s Projects in Vietnam Earn Reputation for Poor Quality, Delays.’ *Nikkei Asia Review*, 20 September 2017, available online at: asia.nikkei.com/Economy/China-s-projects-in-Vietnam-earn-reputation-for-poor-quality-delays; Miriam Driessen. 2019. *Tales of Hope, Tastes of Bitterness: Chinese Road Builders in Ethiopi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50] Daniel Kliman, Rush Doshi, Kristine Lee, and Zack Cooper. 2019.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Report, 8 April.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vailable online at: 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eltandroad.

[51] Lee Yaron. 2019. ‘Israel Police Launches First-Ever Investigation into Construction-Site Deaths.’ *Haaretz*, 8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israel-police-launches-first-ever-investigation-into-construction-site-deaths-1.7092728.

[52] Claire Bigg. 2015. ‘“Crushed Like Ants”: Chinese Workers Meet Harsh Reality in Belarus.’ *Radio Free Europe*, 21 July, available online at: rferl.org/a/chinese-workers-belarus/27141591.html.

分包给更加忽视劳工保护的小型私营企业。[53]在塞班岛的一个赌场项目中，三家中国建筑公司及其分包商向工人收取招聘费，没收他们的护照，把他们塞进拥挤的宿舍，少付了 2400 名工人至少 1400 万美元的工资。[54]事实上，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组织的调查发现，在多个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无论是国企还是其分包商都存在大量类似的强迫劳动现象。[55]

毫不奇怪，海外遭遇虐待的中国工人往往无法获得补偿。这些工人面临着离职的重重障碍：许多人在向中国的劳务中介支付招聘费或其他费用后债台高筑；雇主经常没收工人的护照；工人缺乏交通工具；他们的工作签证（如果有的话）很可能限制他们只能为某个雇主工作。[56]中国工人通常不知道可以求助东道国政府，即使知道也往往面临语言障碍。一些工人会求助于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偶尔会进行调解，但通常不愿意得罪雇主。如果雇主声称自己没钱，大使馆也不会强迫雇主支付工资。[57]抗议虐待的工人会遭到雇主的殴打，或是被东道国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58]中国商务部建立了投诉机制，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能为工人带来实质性的影响。[59]

尽管如此，有些情况喜爱，媒体的报道与劳工提倡者及当地政府部门的合作相结合，会帮助遭到虐待的中国工人获得补偿（例如在塞班岛），但这些案件更多是例外，而不是惯例。[60]还有工人在返回中国后，因工伤或拖欠工资而寻求补偿。虽然有人成功通过中国法院获得赔偿，但更多的诉讼人缺乏充足证据，

---

[53] Driessen, *Tales of Hope, Tastes of Bitterness*, 15, 45–64, 114.

[54] Sophia Yan. 2018. ‘Chinese Workers Tricked into Illegal Work on Saipan.’ *Associated Press*, 14 March, available online at: apnews.com/article/4ceaac6873414bdf80d40e40b68ba6f7.

[55] Lily Kuo and Alicia Chen. 2021. ‘Chinese Workers Allege Forced Labor, Abuses in Xi’s “Belt and Road” Program.’ *The Washington Post*, 30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labor-belt-road-covid/2021/04/30/f110e8de-9cd4-11eb-b2f5-7d2f0182750d_story.html.

[56] Ivan Franceschini. 2020. ‘Building the New Macau: A Portrait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Sihanoukville.’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3: 65–73 (describing workers in Cambodia).

[57] Aaron Halegua and Xiaohui Ban. 2020. ‘Legal Remedies for China’s Overseas Workers.’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3: 86–91.

[58] Halegua and Cohen, ‘The Forgotten Victim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59] Liu, *Assessment of the Migrant Worker Complaint Mechanism in China*.

[60] Halegua, ‘Where is China’s Belt and Road Leading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进入法庭。[61]总而言之，海外中国工人仍然难以行使他们被承诺的任何劳动权益。

未来的方向

“一带一路”无疑标志着建国以来的一次重大发展，但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意义却不那么明显。至少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一带一路”并没有导致更多中国人到海外工作。这种情况在将来可能也不会发生改变，因为一些分析者预测，中国将减少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关注，转向争议较少、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举措，如扩大“数字丝绸之路 ”与“健康丝绸之路”。然而，即使如此，海外驻扎工人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此外，相当多一部分人继续通过非正规渠道到海外工作。“一带一路”启动之前，海外工人遭受的劳工虐待问题就长期存在于许多备受关注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被分包商雇佣的工人。好消息是，中国政府机关已经颁布政策与指导，要求企业保护劳工权益，一些中国法院已将这些规定作为对受剥削工人进行补偿的依据。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加大力度促使企业遵守这些政策。劳工虐待不仅可能导致“一带一路”项目的时间延误与成本增加，还可能干扰中国更广大的促进“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经济增长并建立软实力的目标。因此，中国应该设立机构监督并执行这些劳工规定，包括对违反规定的公司进行处罚，对遵守规定的公司进行奖励。实施这样的措施可以将“一带一路”从劳工剥削的源头转变为促进提高全球劳工标准的力量。

[61] Aaron Halegua and Xiaohui Ban. 2020. ‘Labour Protec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Workers: Legal Framework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8, no: 2: 304–30.

2014

2014 年 9 月 30 日，24 岁的许立志从深圳的一座办公楼跳下，当场死亡。他不仅是当时提前结束生命的富士康雇工中的一员，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死后被追认为“打工诗歌”文化的领军人物。本文将探讨什么是打工诗人，并分析他们作品中的政治及社会意义。

历史的见证者：80 年代至今的打工诗歌

孙万宁（Wanning SUN）

2014 年 9 月 30 日下午 2 点 30 分，一名瘦削的青年走进深圳龙华区工业园某所办公楼的电梯。电梯上升至十七楼，他走出电梯，在一扇窗户前驻足，他静静注视着窗外的世界，五分钟后，爬上窗台，一跃而出，当场死亡。跳楼前，他为世界写下了最后一篇播客，设定在凌晨 12 点自动发布，那一天是 10 月 1 日，国庆节，标题是《新的一天》。

这名青年就是 24 岁的许立志，广东省本地人，与我在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于深圳进行田野工作时遇到的年轻富士康农民工一样，看上去很平凡。许立志与这些普工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就在富士康为世界各地的苹果手机、平板组装部件。

然而，周围的同事或许并不清楚，他其实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创作过多篇极具力量、悲伤而又敏感的诗歌。只要阅读他的诗句，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主义的焦虑，以及通过离开世界而结束这种焦虑的诱惑，这两种念头根深在他的脑海中。在《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中，他写道：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1]

---

[1] 文中的诗歌均由作者翻译。

许立志：《新的一天》，秦晓宇编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年，第 214 页。——译者注。

许立志的自杀既是中国农民工文学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最黑暗的时刻。许立志在去世前已是有所成就的出版诗人，但中国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他，也不知道什么“打工诗歌”。实际上，许立志是唯一一名被收录进权威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的“九零后”诗人，该诗集收录了 20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的五十名打工诗人。编辑秦晓宇收录了许立志的两首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与《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都是他在富士康流水线上打工时写下的。他同其他在业余时间写诗的工人一样，被称作“打工诗人”。但什么是打工诗人，这种文化现象的政治社会意义又是什么？

农村—城市迁徙与打工诗歌的出现

正如本书中其他作者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末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村—城市迁徙，产生了一种被泛称为“农民工”的新社会身份。过去四十年间，这个标签用于指代任何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或郊区工作的农村户口。这些迁徙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取得跃升，大多数仍是“受雇于人”，“打工”源自粤语[2]，是一个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词。与社会主义时期描述工人与农民受到尊敬的“劳动”不同，“打工”意味着在工作场所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集体经验，无论是在建筑、制造、服务或是家政等行业。

制造业的打工生活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在流水线上机械般的重复动作。流水线上枯燥乏味的劳作是对身心的双重摧残，这似乎很难成为诗人的灵感来源。然而，尽管被轮班工作搞得筋疲力尽、营养不良，仍有一批工人选择写诗以应对工业的异化。知乎上有一条哀悼许立志的回答说道：“天涯上有人说他不写诗可以活得更久。我觉得不写诗，他可能一刻也没活。”[3]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口流动带来的孤独感、在被敌视的陌生城市中生存的艰辛，以及流水线上的沉重压迫，都刺激着部分具有文学思想的青年工人产生创作的欲望，促使他们将自己的苦难写成文字。二者的逻辑关系并非“虽然”工作环境中缺乏智识刺激“但是……”，而恰恰是“因为……所以……”。

[2]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3] 相关内容见 zhihu.com/question/25812488。

第一代工人诗人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在 80 年代初第一次目睹城市时开始创作。第一代的几位诗人告诉我，工业制度如何摧残人体，以及当地警察如何粗暴地对待当时的农民工（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早期十分普遍），如果没有这些工人诗人亲身经历并记录在案，那么这些事情很可能就会被淡忘。从他们的诗中，以及我与这些诗人的交谈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打工诗人是将写诗视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所遭受苦痛的一种证言。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捕获了那个时代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身心苦痛——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了解的经历，官方叙事中“令人振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更不会承认或记录这些经历。

不少工人会在轮班与业余时间偶尔写几首诗，但在一些著名诗人的集体推动下，打工诗歌成为了一个小型文学运动，由许强、罗德远等人领导的编辑团体负责了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多个打工诗歌期刊、网络论坛与诗歌选集，以及打工诗歌节。这些有文学思想的农村青年大多来自四川与湖南，他们在八十年代来到中国南方——在十年间，见证了城市与官方对农村迁徙人口不信任与歧视的最高峰。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得到一些中产阶级市民（深圳文学界、文化界中担任要职的人）作为中介的支持，打工文学的兴起很难吸引到市民与中产阶级文学界的关注和想象。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又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杨宏海，就是最早一批意识到打工诗歌重要性的人。当时的珠三角当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提高流动人口对新城市的归属感，作为一名深圳的文学评论家、文化官僚、文学评委，以及兼职的学者，他在 80 年代中期利用政策以及自身职务的便利出版了许多打工诗人的作品，众所周知，杨宏海创造了“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的表述。商业需求同样在打工文学的出现中发挥了作用，同一时期，为了在商业出版界开辟自己的一席之地，深圳的文化界通过出版关于打工经历的“打工文学”来吸引读者，这些作品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华南城市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小部分。[4]

[4] Wanning Sun. 2014. *Subaltern China: Rural Migrants, Media, and Cultural Practic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工业机器、故乡与存在主义的焦虑

早期的打工诗歌，有很多生动记录了因失业、露宿、不断地迁徙，所带来的城市的敌视，饥饿与疲惫。除了在城市中经历的歧视之外，流水线上长时间工作的异化以及管理人员的非人对待也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打工诗人通过听觉或视觉表述他们遭受工业机器侵袭的感官体验。有些诗人通过触觉描述工具的金属表面，这种细节不仅提供了打工者日常生活当中反复出现的情景元素（mise en scène），还可以解读为某种隐喻，身陷跨国资本主义初始积累阶段中异化灵魂的外在化。这一点在郑小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为数不多的女性打工诗人之一。郑小琼生于 1980 年，四川人，是横跨了第一代和后两代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即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生人，后者包括许立志。郑小琼在东莞的一家冶金厂工作了六年，她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写诗。她的早期作品以金属为主要特征，其中铁是最为重要且反复出现的主题，极富想象而又生动地描绘出人体（字面或隐喻意味上）接触金属的感受——被轧掉的手指、被碾过的肢体、淤青的皮肤、刺穿耳膜的金属声。工人的身体不再能控制自己的运动，成为“重复的运动和局部的疼痛，一个被校准为机器脉动的神经系统”。[5]郑小琼因《人行天桥》一诗而被誉为中国的艾伦·金斯伯格，郑小琼也十分欣赏他的诗歌。这首叙事的史诗讲述了一个人被工业机器压垮变形后站在人行天桥上对着世界发出的嘶吼。[6]

郑小琼与众多打工诗人的诗中，都能清晰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共鸣——对工业化进程的疏离感，前者很可能会夺走工人的个体身份，将他们变成机器。在《生活》（2007 年）这首诗中，郑小琼写道：

> ……
> 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5] Christian Sorace. 2020. ‘Poetry After the Future.’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1: 130–35.

[6] 何言宏，2007 年，《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与郑小琼的访谈：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15635011.nh&dbcode=CMFD&dbname=CMFDREF。

链接指向的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若想在线阅读访谈原文，见：wenku.baidu.com/view/1e8213ed9b89680203d82520.html?rec_flag=default&_wkts_=1681188869595。——译者注。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
……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
照亮的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
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尘世间的浮躁如何
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
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

郑小琼的诗歌除了工业劳动中的异化，也表达了远行后对农村的集体怀旧以及对家乡的思念。在众多打工诗歌的标题中，“乡愁”是一个关键词，用以描述作品中忧郁的色彩。

工业制度当中日常的苦役、异化的现实以及社会经济的边缘地位，加剧了这种思乡之情，这种情绪又会影响他们在工厂中的经历。在多首诗歌中，“故乡”承载了更重的情感。尽管这些诗人是因为故乡的贫穷与落后才会前往城市，可如今故乡却成了他们在城市中忍受身体、情感与精神困境上的情感资源。[7]

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将自己视作城市的暂居者不同，新一代流动人口对农村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留恋。他们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早期打工诗歌记录了生活与工作上的艰辛，而新生代诗人的诗歌则偏好叙述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具有一种未知的绝望与深深的幻灭，有时还有着宽泛意味上的“失范”（Anomie）。据涂尔干所述，后一种状态会引发个体的自毁行为，包括自杀。[8]从这点来看，许立志的自杀可以被视作是这个群体中集体失范感的最后的诗性表达。

---

[7] Wanning Sun. 2010. ‘Narrating Translocality: *Dagong* Poetry and the Subaltern Imagination.’ *Mobilities* 5, no. 3: 291–309.

[8] Wanning Sun. 2012. ‘Poetry of Labour and (Dis)articulation of Class: China’s Worker-Poets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no. 78: 993–1010; Emile Durkheim. 1997 [1897].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读者群体与社会影响

很少有农民工阅读打工诗歌，尽管他们的生活正是诗歌的主题。大多数工人似乎并不想将宝贵的休息时间花费在阅读有关工厂生活中枯燥艰辛的内容——这就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对于未曾经历过的人而言，底层（subalterns）生存的磨难与日常的现实可能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对于底层而言，现实并不新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打工诗歌与自己的生活太接近了，令人不适。我与富士康工人的交谈中，他们都给我留下了这种缺乏兴趣的印象。同时，像郑小琼这样的打工诗人十分希望其他工人可以读到自己的诗歌。我与一些劳工维权的非政府组织（NGO）有过合作，他们也会分发工人的诗歌，以提高工人的权益意识，促进工人之间的团结。

同时，打工诗歌已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却也并非毫无争议。就像农民工艺术家会面临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诘问，工人诗人（worker-poets）对“打工诗人”这一标签也有分歧，有些人拒绝这个标签，认为这种表述暗示着诗人在社会地位与美学质量上的低下。[9]另一些人则担心，如果他们仅被称作“诗人”，将会失去“工人”的独特社会身份，从而失去他们作品中社会与政治的意义。在文学/学术界中，一部分人认为，打工诗歌通过记录底层的社会生活，为文学精英的陈旧氛围带来新鲜的真实性，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诗歌只有好坏之分，判断应该只基于审美的角度。[10]

因此，我们很难评估有多少工人自称“打工诗人”，同样也很难确定“打工诗歌”的读者规模与组成。近期传统的图书出版渠道出版了不少打工诗歌选集，购买对象主要是文化机构中受教育的市民读者，如大学、媒体以及对农民工生活感兴趣的文学组织。同样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打工诗歌都是在官方出版社之外出版的。一些私自出版的诗集没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而劳工 NGO 会在自己的邮件通讯（newsletters）中刊登工人的诗歌。此外，网络论坛也使得工人诗人可以在线上发表诗歌，一些诗人告诉我，通过正规出版社会受到审查的限制，而在网络上发表诗歌，特别是那些批评政治与社会的诗歌，可以绕过

---

[9] Paola Voci. 2020. ‘Can the Creative Subaltern Speak? Dafen Village Painters, Van Gogh, and the Politics of “True Art”.’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1: 104–11.

[10] Sun, *Subaltern China*.

审查。受欢迎的诗歌或几行诗句可以通过博客、社交媒体订阅，或是论坛等方式轻松出现在人们的手机上。

除了一些中产阶级市民的读者，许多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也会借助打工诗歌发掘有价值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并不“冷静”或“客观”。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劳动条件的学者引用打工诗歌作为农民工糟糕生活与劳动条件的一手资料。中国内外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论文中，这些工人诗歌的诗句被视作他们自己经验的现实文化表述。[11]这种在学术著作中引用工人诗歌的做法，隐含着对这些自我表达的经验意义的认可。

最后，打工诗歌以及引起了海外文学与艺术家的关注。有些诗歌被翻译成外语，一些有所成就的打工诗人也被邀请参加国际上的作家节与其他文学文化活动，向观众分享他们的创作。这些诗歌让中国以外的读者有机会窥见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并在隐约中察觉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革对个体的影响。例如，郑小琼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日语、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韩语，她受邀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与亚洲各国谈论她的作品。2015 年，德国戏剧导演 K. Baumbecker 带着他根据郑小琼诗歌改变的戏剧在北京上演，2018 年，郑小琼的诗歌《铁钉》（An Iron Nail）在辛辛那提演出，既有两位打击乐手的声音，也有诗人自己的声音。德国作曲家弗雷德里克 · 布斯（Frederik Bous）为周阳春在半夜的“尖叫”写了一首交响乐曲，周阳春是《女工记》[12]中的 100 名女性之一。美国的一些翻译家，如埃莉诺古德曼（Eleanor Goodman）与周筱静（Zhou Xiaojing），致力于将郑小琼的诗作翻译成英文。中国境外的学者也致力于研究这一具有社会与政治意义的文化现象。[13]

秦晓宇在总结打工诗歌的社会意义时说道：

---

[11] 例如，见 Jenny Chan, Mark Selden, and Pun Ngai. 2017. '"Growth, Thy Name Is Suffering": The Workers of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In *World Factory: The Game*, edited by Zoë Svendsen and Simon Daw. London: Nick Hern Books, 318–23; Pun Ngai and Huilin Lu.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 no. 5: 493–519.

[12] 郑小琼：《女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年，第 173 页。

[13] Maghiel Van Crevel. 2019. 'Debts: Coming to Terms with Migrant Worker Poetry.'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8, no. 1: 127–45; Xiaojing Zhou. 2020. *Migrant Ecologies: Zheng Xiaoqiong's Women Migrant Worker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工人的写作，哪怕仅仅书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这两亿多工人群体、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活作证。[14]

正因如此，许立志在自杀后仍被铭记。他的诗歌与众多工人诗人的诗歌一同，继续见证中国社会的转型、农村向城市的迁徙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以及这其中对中国工人的异化。

[14] 高四维:《许立志：选择了“死亡”主题的打工诗人许立志》，中国青年报，2014 年 11 月 24 日，在线链接：zqb.cyol.com/html/2014-11/24/nw.D110000zgqnb_20141124_1-08.htm。

2014

2014 年 4 月，东莞裕元鞋厂的四万多名工人发起了一次罢工。这不仅是中国劳工史上针对单一企业最大的集体行动之一，更是成为了头条新闻。这场事件突显了中国在农民工人口结构与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并成为中国农民工早期集体抗议公司在养老金与社保缴纳问题上的显著案例。

裕元罢工

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

2014 年 4 月 14 日至 4 月 29 日，东莞高埗裕元鞋厂的 6 万名工人中有 4.3 万人举行了中国史上对单一企业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1]他们的罢工缘于全球价值链中政治经济的显著变化，尤其是寡头垄断企业的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加剧，对工资与利润施加了下行压力；外包生产商对品牌的话语权增长，也为工人创造了机会。这将以中年的第一代农民工为主（他们在结构性改革中积累了长期的民营企业的工作经验）的新工人阶层推到台前，他们开始关注对于农民工而言迫切的新问题，特别是晚年的养老金问题（此前主要是国企的市民工人在关注）。罢工者揭露了其中的政治问题，使得资本和地方发展型国家之间的利益勾结成为焦点，同时强调了后者的相对自主性以及为了获利而向个别企业施压的能力。最后，这次罢工证实且再现了国家与资本对中国工人阶级持续不断的霸权。

罢工背景

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69 年，总部位于台湾，是全球最大的鞋类生产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20%。[2]1988 年，裕元在中国开设了第一家工厂。2013 年，裕元的 41.3 万名员工生产了 3.134 亿双鞋，公司报告的营业

---

[1] Ashok Kumar. 2019.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Labour Contestation in South China at an Ascendant Global Footwear Firm.' *Global Networks* 19, no. 3: 394–422, at p. 416.

[2] Ibid., 404.

额为 76 亿美元，毛利润为 16 亿美元。[3]公司的客户包括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彪马、亚瑟士、安德玛、新百伦与天伯伦等知名品牌。[4]

然而，面对中国与全球竞争加剧以及东莞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高埗产业集群的经济已从 21 世纪初的辉煌年代开始下滑：就业人数从高峰期的 10 万缩减至 2014 年的 6 万，裕元从“企业社会责任”与提供福利的模范公司变成薪资不到东莞平均水平一半的黑厂。[5]因此，裕元鞋厂自 2011 年以来经历了多次小规模罢工。[6]

尽管裕元在 2007 年就为所有工人缴纳了国家养老金，但又通过多种非法手段减少缴纳额度，例如以当地最低工资为标准而非工人实际工资计算养老金，将正式雇佣改为临时工，从工资中扣除缴纳份额，不为工人缴纳住房公积金。具体欠款总额约为 1～2 亿元人民币（折合为 1600～3200 万美元）。这些非法行为都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7]

罢工

2014 年初，生产线主管与办公室白领开始讨论包括集体辞职在内的应对措施，他们发现，一位拥有二十多年工龄的管理人员申请退休时养老金只有 600 元。[8]4 月 5 日，一厂的工人（该厂的工人历来是裕元集群中最懦弱的）发动罢

---

[3] 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第 2、15、52 页，在线链接：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4/0424/ltn20140424281.pdf。

[4]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5] Stefan Schmalz, Brandon Sommer, and Hui Xu. 2017. ‘The Yue Yuen Strik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ur Unres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lobalizations* 14, no. 2: 285–97, at p. 290.

[6] Defeat Will Only Make Us Stronger: Workers Look Back at the Yue Yuen Shoe Factory Strike.’ *China Labour Bulletin*, 22 May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clb.org.hk/content/defeat-will-only-make-us-stronger-workers-look-back-yue-yuen-shoe-factory-strike.

这篇中国劳工通讯文章翻译自工评社的访谈，原文链接如下：gps51.blogspot.com/2015/11/2014-4-27.html。标题可能参考了另一篇工评社的文章，《不只是失败 更将是愈挫愈勇的开端》。——译者注。

[7]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405; Chris King-Chi Chan and Elaine Sio-Ieng Hui. 2017. ‘Bringing Class Struggles Back: A Marxian Analysis of the Stat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hina.’ *Globalizations* 14, no. 2: 238.

[8]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406.

工，封锁了通往工厂的桥梁。警方殴打一名工人后使得罢工人数激增至数千人。裕元集团承诺将在 4 月 14 日解决问题，设法平息局势。然而，4 月 15 日清晨，工人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此时已有多个工厂高达 4.3 万工人参与罢工。裕元集团被迫坐在谈判桌前，4 月 17 日，资方提出可以补缴未来的养老金缴款，但同时声称当地政府不允许公司解决欠款问题，这种回应进一步激化了罢工。而当地政府在官方工会的帮助下，几天之内就逮捕了大量工人，被拘留者的妻子儿女发出了悲壮的抗议。政府依惯例进行了新闻封锁，但社交网络与口口相传很快就将信息传到江西的一家裕元工厂，导致那里也爆发了罢工。国际支持者在全球的阿迪达斯商店举行了抗议。4 月 21 日，裕元向香港证券交易所宣布了自己的调解方案，试图安抚投资者的不安情绪（罢工最终导致裕元损失了 2700 万美元）。公司同意支付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但没有说明工资基数），提高生活津贴，并支付拖欠的养老金，但前提是工人也得一次性支付个人缴纳部分的差额。最后一点进一步激怒了罢工者，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这笔款项。工人反而要求“签订新的合同、改善生产条件、补缴住房公积金、有权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确保雇主不会报复，以及一个透明、负责任的政府来执行和管理上述内容”。[9]罢工者的诉求已不局限于经济层面，还包括重要的政治诉求，这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

然而，一周后，罢工逐渐平息。从表面上来看，有几个老生常谈的原因，首先，资方作出了足够的让步，获得足够多工人的妥协，毕竟，罢工会使得他们失去收入。此外，资方巧妙地通过员工奖金的“让步”设置了工人无法负担的门槛，让后者对罢工失去信心。镇压同样达到了预期效果。而在“单一事件”的表象下，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不仅说明是什么导致罢工最终失败，也表明这一事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劳工动员之一的非凡性质，以及它所具有的更广泛的影响和意义。

政治经济学分析

如上所述，时至 2014 年，裕元工厂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衰退，受东莞薪资水平上涨与中国内外工资更低的生产商（包括其他裕元工厂）的夹击，21

---

[9] Ibid.

世纪 00 年代末，公司提供了一系列社会服务，包括日托、医疗、教育和娱乐设施，并禁止强迫无偿加班等剥削行为。[10]到了 10 年代初，与东莞的其他雇主相比，裕元在工资和奖金的差距越来越大，开始影响之前取得的成果。人们普遍认为裕元罢工的核心问题是养老金与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却忽视了低工资的影响，以下引用的是一位青年活动家与老工人的交谈：

> 小邱：我开始时听说你们争取社保发生大罢工，有点吃惊，因为我也在广东打工的，我一点都不关心社保。真正关心的工友也不多。我就觉得肯定还有很多隐情。
> 裕友：呵呵，你真聪明。是这样的，社保只是一个最有理由罢工的话题而已。因为社保是公司违法在先，说到天边公司都没理嘛。[11]

对养老金的关注催化了罢工，却也可能会破坏工人的团结与罢工：

> 小邱：我也是打工的嘛。加薪 30%可能是最能团结所有人的诉求，可惜后面都没怎么提了，后面的焦点都集中在要么补齐社保，要么买断工龄。
> 老工人：是的。最开始，大家只是想出口气，被资方压得太久了，怨气太重，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些诉求，然后逐渐补充丰富。开始只是想将一下裕元厂的军，可是资方态度非常强硬，并且台干说"大陆人就是贱"，搞的大家都想把裕元搞垮，赔钱走人了。最初的目的应该说只是想增加待遇吧。[12]

这其中也有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新世纪到来，生产商与作为其客户的跨国品牌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以前，品牌对无数小型生产商施加了相当大的寡头权力，而现在，垄断性大型工业公司开始成为他们签约品牌的强力竞争对手。

---

[10] 正如一位工人所说："大厂嘛，自己有裕元医院和幼儿园。比较稳定。大部分都是中年人，从一、二十岁一直做到现在的，有感情了舍不得离开，或者离职了又再进裕元的。年轻人都不进来了。"访谈链接见注释 6。

[11] 同上。

[12] 同上。

这形成了一张矛盾力量的网络。一方面，裕元有足够的规模和资源将自己打造成“模范雇主”，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同时主导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以保持低工资。另外，2008 年的《劳动合同法》引入了强制性养老金计划，加剧了工人对离职的担忧（因为养老金不能转移），增加了雇主对工人的权力。这一切都提高了裕元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影响力。

可另一方面，裕元的这种权力也使其更容易受到工人和企业客户的要求与压力，他们都看到了这种深厚的根基。正如阿肖克 · 库马尔（Ashok Kumar）所指出的那样：“罢工的工人直观地感觉到裕元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实力以及大规模罢工的有效性。”[13]的确，在回顾罢工时，有工人认为：“裕元在东莞撑不了几年了。裕元这次名声已经臭了，客户肯定会减少订单。”[14]裕元凭借先进的物流与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中断供应链或是激怒品牌商的零售客户，尤其是后者越来越关注厂商的劳动行为准则。正如我们所见，裕元的规模同样使其依赖投资者。最后，裕元在鞋类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也使得它成为行业的风向标，竞争对手不得不复制前者承诺的福利来招聘工人。

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裕元罢工中，一个不常参与劳工行动的群体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另一个常被忽视参与群体也表现突出。前者是生于农村，20 世纪 90 年代来到中国城市留居的中老年农民工。以往这类工人的数量并不多，因为最初的第一代农民工中大部分是年轻人。然而，到了 2014 年，正如其中的一位工人所述：

> “所有裕元厂都有很多老工人，五年以上的很多，大约占 70%；十年以上的约占 10-15%。老工人多，彼此熟悉信任，当然团结了。很多人都是十八九岁一二十岁进裕元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一家人也在裕元工作的情况很多。”[15]

---

[13]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413.

[14] ‘Defeat Will Only Make Us Stronger’, *China Labour Bulletin*.

[15]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403 and *passim*.

基于工人群体性别（裕元工人中女性约占 70—75%）、年龄与多年在工厂工作生活的现实经历推测他们不比其他年轻工人积极是错误的：

> “我认识的很多三十多岁四十岁的女工，他们罢工的劲头和坚韧让我很钦佩。我在这次罢工中还认识了老三厂的两名女工，都是三十多岁，一个做了一年多，另外一个刚进厂不久，她们都很积极地参与罢工。虽然她们文化普遍不高，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她们就是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不能欺负人，我们只是要求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16]

促使她们下定决心的原因可能是女工必须在 50 岁退休，比男工要早 10 年，因此她们更感到养老金的压力。此外，老工人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团结，这种团结也从他们身上延伸到年轻工人之间。

> 裕友：老工人多，彼此熟悉信任，当然团结了。……亲戚关系的情况很多，大部分人都是老乡或者亲戚介绍进厂的，以前裕元在高埗还算不错的厂。
>
> 小邱：在这次罢工中，我听说年轻工人经常责备“大妈工人”。有这回事吗？
>
> 裕友：你谈到的那种指责，其实并不客观。[17]

另一群参与罢工却不被关注的群体是生产线主管：

> 裕友：在裕元，经常出现台湾佬想整某个单位主管，然后该主管就联合老乡主管带领手下员工罢工，让台湾佬下不了台，还得求他收拾残局。
>
> 小邱：经常出现这种主管带动的罢工？！
>
> 裕友：是的。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
>
> 小邱：这么说，裕元这次罢工，至少有一部分是主管带动的罢工？
>
> 裕友：主管没有明着带头，暗中支持的嘛，毕竟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18]

---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这表明，台湾与大陆人的分裂有助于在基层干部与工人之间营造团结，但前者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他们也能控制住罢工。

> 裕友：　裕元厂这次如果没有干部带头复工，估计能坚持到五一。你在群里也看到了，有人说干部收厂里多少多少钱了，才出面要求员工复工。但是我没证据，不敢确定。[19]

基层干部在促进劳工抗议集会中的作用并非裕元一例。[20]这也反映出老工人的重要作用，对此需要进一步研究。[21]

最后，另一组行动者，劳工非政府组织（NGO），在罢工动员中并不是特别重要，这与部分学者、观察家最初的看法相反。的确，有几个 NGO 试图参与其中，甚至有两位负责人，林东和张治儒（春风劳动服务部）都被拘押。但在总体上，裕元罢工是工人自己推动的。

政治分析

就工人自身的政治立场而言，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无论是否出于谋划，裕元工人都在利用当时政府反腐行动所创造的政治机会。[22]罢工者的口号经常指向政府的腐败与共谋，他们抱怨“工厂骗了我们十多年……当地政府、劳动局和社保局以及公司合伙欺骗我们。”[23]

其次，工人在罢工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水平：

---

[19] Ibid.

[20] Alexandra Harney and John Ruwitch. 2014. ‘In China, Managers Are the New Labor Activists.’ *Reuters*, 31 May, available online at: reuters.com/article/china-labor-strikes/in-china-managers-are-the-new-labor-activists-idUSL3N0O929U20140601.

[21] Ibid.

[22] Schmalz et al., ‘The Yue Yuen Strike’, 291. On political opportunity, see Sidney Tarrow. 1994.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405.

> 小邱：我搜索到 2011 年裕元也发生过罢工，好像历史上发生过不少小规模的罢工？
> 裕友：那次是黄江裕元。黄江裕成鞋厂也属于裕元（宝成）。小规模的罢工很多啊，不计其数。一般都是单个分厂因为某些政策引发员工罢工，但从未有过像这次这样全体裕元各分厂联合罢工的，这是个里程碑，标志着裕元人已经从单独的一个分厂为某项制度不满罢工而上升到集体维权的高度了。而且，以前都在自发的，这次打出横幅上街喊出诉求，也是一个很大进步。[24]

第三，这场罢工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激发了中国、越南的其他裕元工厂、裕元竞争对手的工厂、甚至其他行业的类似罢工。[25]这些罢工都被迅速解决，工人从中获得了一定收益。

国家层面的政治则反映出自身的惯性特征。首先，国家将积累作为关键目标，这驱使当地政府与企业勾结，通过操纵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加强积累，进而导致了罢工的发生。[26]其次，政府通过屡试不爽的萝卜加大棒策略，并动用各机关部门镇压罢工。官方的“总工会”现实提出调节争端的建议，工人也对此表示欢迎，但工会又与警方转过来对付工人，后者殴打工人，并将一部分工人封锁起来。国家同样进行了新闻封锁，但当地政府更倾向于和平解决，李静君（Ching Kwan Lee）和张永宏（Yonghong Zhang）将此称作“议价的威权主义”。[27]因此，政府也迫使裕元作出让步，并加强在社保上的执法力度。[28]

---

[24] ‘Defeat Will Only Make Us Stronger’, *China Labour Bulletin*.

[25]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408, 410; Schmalz et al., ‘The Yue Yuen Strike’, 295.

[26] Kumar, ‘Oligopolistic Suppliers,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405.

[27]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1475–508.

[28] Chan and Hui, ‘Bringing Class Struggles Back’, 239.

最后，裕元罢工也表现出国家与市场霸权的所有特征，中国的工人阶级处于被剥削的从属地位。陈敬慈（Chris King-Chi Chan）与许少英（Elaine Sio-Ieng Hui）在这点上说得很好：

>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基石就是无组织的工人阶级。因此，当工人设法将自己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追求自己的诉求时，中国政府就会想方设法平息这些行动并作出让步。”[29]

工人试图通过国营的“总工会”组织自己却再次受挫，这表明中国的劳资关系仍陷于“一元化”，甚至不是“国家法团主义”的体制[30]。也就是说，国家拒绝接纳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工人个体明显缺乏自信，跟别说作为阶级的自豪感。从以下交谈中可以看出：

> 小邱：你觉得裕元人通过这次罢工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吗？
> 裕友：不一定。虽然裕元人现在的身份算“工人”，其实因为他们身上固有的小农意识，很难形成一个坚强的工会集体。这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不是被逼到无路可退，他们宁肯做一个温顺的、、、、、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可你见到过几只咬人的兔子了呢？兔子肉相信你倒是吃过。
> 裕友：高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裕元厂就像我的家，对很多工人来说，这是一种很真诚朴素的感情，曾经我们身为裕元人而倍感自豪。我们只想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热爱党，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希望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31]

上述分析借鉴了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关于国家相对自治（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的理论：国家必须有能力缓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并且更好地代表资本建立自己的霸权。[32]如果罢工的裕元工人赢

---

[29] Ibid., 241.

[30] Philippe Schmitter and Marc Blecher. 2020. *Politics As a Science: A Prolegomen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31] ‘Defeat Will Only Make Us Stronger’, *China Labour Bulletin*.

[32] Chan and Hui, ‘Bringing Class Struggles Back’, 241; Nicos Poulantza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Review and Sheed & Ward; Nicos Poulantzas. 1978.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Nicos Poulantzas. 2000.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得了半块馒头——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放弃了另一半，而是像中国其他陷入困境的无产阶级一样，不得不继续屈从于中国国家及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盟友的霸权统治。

2015

尽管有一种神话宣称，中国的农村低成本劳动力取之不尽。但自 21 世纪初开始，中国部分地区的雇主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周期性的劳动力短缺——这一现象常被称作“民工荒”。造成这种短缺的原因包括：一胎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更高，可市场对非熟练劳动的需求仍然很大；欠发达地区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失；以及，流动人口生活在持续的不稳定中。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劳工行动也推高了工资。为解决上述提到的部分问题，一些公司开始采取技术升级的策略。到 2013 年，中国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两年后的 2015 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计划，这是一个三步走战略：2025 年，将提升中国在价值链的地位，2035 年，将成为领先的制造大国。本文将探讨这种技术升级对中国工人造成了什么影响。

机器换人

黄瑜

2015 年，东莞开设的“无人工厂”登上了中国各大报纸的头条。[1]在这家手机构件生产商的车间内，传送带旁边不再挤满无精打采、汗流浃背的工人，而是由预选编程的机器人执行不断重复的操作。这幅“未来主义”的场景使得工厂拿到了当地政府关于“机器换人”政策的津贴。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对农民工短缺与劳资纠纷的担忧日益增长，中国多个工业城市的政府都出台了类似东莞的激励政策，推动厂商升级技术。[2]中国在 2013 年成为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但在中央政府推出《中国制造 2025》计划后，机器人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计划旨在推动自动化制造，将中国工业推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到了 2019 年，全国共售出 14 万 500 台新机器人，是五年前的两倍。[3]

然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工人”这一问题仍有争议，数十年来关于自动化技术究竟是替代劳动还是辅助劳动的争论证实了这一点。[4]中国的情况引起了全球关注，不仅是因为如此庞大的劳动力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还因为伴随着机器

---

[1] 《“机器换人”的喜与忧——广东东莞首家“无人工厂”蹲点调查》，中国政府网，2005 年 7 月 13 日，在线链接：gov.cn/xinwen/2015-07/13/content_2896088.htm。

[2] 聂洪辉,朱源.“机器换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与社会稳定的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17(04):148-153.

[3]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2020. ‘IFR Presents World Robotics Report 2020.’ Press release, 24 September. Frankfurt am Mai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ifr.org/ifr-press-releases/news/record-2.7-million-robots-work-in-factories-around-the-globe.

[4] Aaron Benanav. 2019.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I.’ *New Left Review* 119 (September–October): 5–38; Yu Huang. 2018. ‘Robot Threat or Robot Dividend? A Struggle Between Two Lines’. *Made in China Journal* 3, no. 2: 50–55; Roger Penn and Hilda Scattergood. 1985. ‘Deskilling or Enskill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ecent Theories of the Labour Proc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no. 4: 611–30.

人化进程而出现的劳工维权的汹涌浪潮。[5]中国工人会争取“机器人红利”的份额吗？中国的技术升级轨迹与全球北方的有什么不同？基于我的田野调查与近期的一些研究综述，本文意图分析工业自动化对中国工人的影响，分为两部分进行讨论：其一，评估工业自动化对就业和劳动技能的影响；其二，评估工人对于新技术的反应。

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

尽管中国厂商的技术升级只开始了几年，但替代劳动力的成效已经相当令人担忧。我在东莞四家工厂进行的调查表明，劳动力大幅度减少，每条生产线减少了 67%～85%。[6]东莞的官方数据表显示，截至 2017 年初，2698 个技术升级项目导致约 20 万名工人失业，平均每个项目的替代率为每条生产线 74%。[7]近期对广东省采用技术升级的 299 家制造业厂商的研究表明，每家厂商平均解雇了 96%的员工，占劳动力总人口的 9.58%。[8]在车间，大约 80%的岗位可以由机器轻松胜任。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看到有大量因技术升级而失业的工人流落街头。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厂商的技术升级是逐步进行而非一蹴而就，这一过程使得厂商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工人岗位，并限制招新。[9]其次，利用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特殊的工资结构，多数雇主并不需要主动解雇工人，而是采取其他策略迫使工人自愿离职。例如，东莞的加班工资通常占工人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

---

[5] Sarosh Kuruvilla and Hao Zhang. 2016. ‘Labor Unrest and Incipient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2, no. 1: 159–87.

[6] Yu Huang and Naubahar Sharif. 2017. ‘From “Labour Dividend” to “Robot Divide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orkers’ Power in South Chin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 no. 1: 53–78.

[7] 《珠三角制造业革新样本》，21 世纪经济报道，2017 年 10 月 13 日，在线链接：m.21jingji.com/article/20171013/8a964700e695230f3db2bd85a48da149.html。

[8] 孙中伟,邓韵雪.“世界工厂”的“凤凰涅槃”——中国制造业“机器换人”的经济社会意义[J].学术论坛,2020,43(03):1-8. 范长煜,唐斌斌.半数岗位易替代:警惕“机器换人”的技术性失业风险——基于 2018 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J].学术论坛,2020,43(03):9-17.

[9] Tao Yang and Siqi Luo. 2019. *Machines Replace Humans? Automation and Upgrading at Car Suppliers in China*. FES China Report. Beiji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available online at: fes-china.org/en/publications/detail/2019-automation-car-suppliers-en.html.

二左右，想要裁员的工厂只需要减少加班就能迫使工人辞职，这样还不用付工人的强制性遣散费。最后，少数厂商可以借机扩大生产规模吸收剩余劳动力；然而，这需要根据厂商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而定，也与厂商更广泛的市场地位有关。例如，在汽车行业，占最大份额的汽车生产商更有能力扩大生产规模，而更低层次的供应商就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自 2017 年以来，面对增长的巨大下滑以及不断积累的过剩产能，即使是中国的汽车行业，劳动者的就业安全也在逐步受到威胁。

自动化对工人技能的影响

自动化对工人技能的影响同样有争议。哈里·布雷弗曼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命题后，他的追随者论证了自动化技术的引进使得“设计”与“执行”分离，机械工被迫从技术工人转变为不再具有规划责任的操作工人。[10]于此相反，“高技能”（high skills）假说认为计算机化将强化工人的知识技能，例如责任感、协同心、应对快速变化的反应能力等。[11]这两种说法都因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而遭后世批判。[12]威廉 · 福姆提出，技能的变化取决于“技术种类、产业组织、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工会实力、业务能力

---

[10] Harry Braverman.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For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s, see David F. Noble. 1984.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ley Shaiken, Stephen Herzenberg, and Sarah Kuhn. 1986. 'The Work Process Under More Flexible Product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25, no. 2: 167–83.

[11] Paul Alder. 1988. 'Automation, Skill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1–36;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Shoshana Zuboff.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2] Fabiane S. Previtali and Cilson C. Fagiani. 2015. 'Deskilling and Degradation of Labou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Braverman.' *Work Organiz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9, no. 1: 76–91; Martin Krzywdzinski. 2017. 'Automation, Skill Requirements and Labour-Use Strategies: High-Wage and Low-Wage Approaches to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2, no. 3: 247–67.

以及其他多种因素”。[13]因此，仅仅引入先进设备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劳动技能，相关的培训仍然不可或缺。[14]

在中国的情况中，研究者发现经营者试图提高工人劳动技能所要面临的困难。传统观点认为，自动化机器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有助于女工的技能提升（upskilling）和赋权，但邓韵雪与许怡认为并非如此，由于大多数雇主秉持性别刻板印象的意识形态，认为女工“害怕机器”或“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女工实际上比男工获得的内部培训机会更少。[15]雍昕的调查表明，在推行自动化的工厂中，管理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接受培训的机会比操作人员多得多，前两者的培训时间分别是 32 天与 26 天，而工人平均只有 9 天的培训时间。[16]

与布雷弗曼的观察相同，“去技能化”在中国的熟练技术工人群体中十分明显。奥托、利维和穆兰证明了自动化可以严格遵循清晰流程完成常规任务，并辅助工人解决非常规问题。[17]我的调查发现，熟练的技工往往是被替代的主要人群，因为他们的工资更高，议价能力更强。例如，在东莞，一位资深的木匠月收入可达 6000—8000 元，而一位熟练的头盔外壳切割工人月收入为 5000 元，远超 2015 年当地的平均工资 3489 元。在汽车行业，多能工制度与岗位轮换法帮助工人全方面发展技能，这也使得他们难以被替代。然而，随着技术升级后，尽管多技能工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岗位，但随着自动化大大简化了工作，他们对于雇主来说远没有那么重要了。[18]

---

[13] William Form. 1987. ‘On the Degradation of Skill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no. 1: 29–47, at p. 44.

[14] Kenneth I. Spenner. 1985. ‘The Upgrading and Downgrading of Occupations: Issue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5, no. 2: 125–54; Michael Wiedemeyer. 1989. ‘New Technology in West Germany: The Employment Debate.’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4, no. 1: 54–65.

[15] 邓韵雪,许怡.“技术赋权”还是“技术父权”——对智能制造背景下劳动者技能提升机会的性别差异考察[J].科学与社会,2019,9(03):87-109.

[16] 雍昕.技术升级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性影响:来自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的证据[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37(10):64-74.

[17] David H. Autor, Frank Levy, and Richard J. Murane.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4: 1279–1333.

[18] Yang and Luo, *Machines Replace Humans?*.

“中国制造 2025”计划给出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自主创新的中国制造”转变的路径：加强建设“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这种转变不仅要求研发工程师的广泛参与，更重要的是，要有工厂加工经验的熟练工人的参与。物质世界的复杂性拒绝任何简单化的编码，而需要具有高度能动性的熟练工人的参与。[19]

然而，考虑到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和低技能的手工劳动，多数生产商要么响应缓慢，要么不愿意提供劳工再培训计划。我在东莞调查的八家生产商中，只有一家会培训工人，因为这家厂商从事高精度的金属加工，工艺流程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周先生，一家为光纤通信设备生产高端零部件的公司老板，他选择自动化以提高质量，而不仅仅扩大产量。他以自己在国企工作的经验为基础，设立了一项内部的学徒计划，培训熟练工人，这些工人经过培训后，能够处理诸如更换夹具和钻模、调整计算机数控机床等任务，并最终参与工艺流程的设计。[20]他知道技术的重要性，但只有将技术与属于人类的合适技能结合起来，机器的真正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他说：“机器是每个人都能买到的东西，但是一个好的工艺流程需要精心设计，一个是硬件，另一个是软件。”周先生的公司是一家中小型公司，他的案例只能作为个例看待。由于地区劳动力流动率较高，东莞的雇主很少愿意投资工人的技能培训。

工人对技术升级的反应

前文的讨论展示了工业自动化对劳动力的替代以及去技能化的过程。那么工人对此过程有何反应？近期的研究表明，一线的操作工人对自动化漠不关心，甚至是持欢迎态度。杨和罗（均音译）在 2017 年对珠江三角洲汽车供应商的研究表明，大约 75%的一线生产工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应该推行自动化，只有 20%的工人反对。[21]另一项在广东省十九座城市的制造业工人中进行的调查显示，

---

[19] Harley Shaiken. 1984. *Work Transformed: Automation and Labour in the Computer Ag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Steven P. Vallas. 1993. *Power in the Workplace: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at AT&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 Naubahar Sharif and Yu Huang. 2019.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 China’s “Workshop of the World”.’ *The China Journal* 81: 1–22.

[21] Yang and Luo, *Machines Replace Humans?*.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将在五到十年内被自动化替代。[22]然而，只有约 28%的受访者担心失业，62%的受访者认为可以轻松找到新工作。

我采访的大多数工人都内化了自动化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主流论调，因此将技术升级视作必然的进步。刚先生（音译）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受雇于东莞的一家电子厂，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了自动化的优势：

> “我以前是个农民，都是人下到田地里干活的。100 名农民种植的粮食养不活 100 人，现在（有了机器）2 个农民就能养活 100 人。随着自动化的发展，随着人均生产率的提高，需要的工人也会越来越少。”

2010 年，富士康连续发生了多起自杀事件，郭台铭（富士康创始人）随后声称，他将雇用 100 万台机器人替代工人（见本书中陈慧玲的文章）。[23]我与我的同事在 2018 年采访了一些仍受雇于富士康的工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仍对这些技术升级漠不关心，以下是其中一段交流：

> 问：你是否担心会被机器人替代？
> 答：不怎么担心。说实话，没人会对工厂有很强的归属感，我们不觉得这里是家。（如果被解雇了）我可以去其他地方。

与之相比，熟练工人受自动化影响更大，也更难找到工作，他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焦虑。例如，某家生产自行车头盔的工厂中的一名高级工人担心自己会被替代，因为机器人化技术将切割通气孔的学习周期从半年缩短至短短三天。随着工作节奏对劳动者技能与积极性的依赖度越来越低，更多取决于机器中预设的操作循环时间，部分厂商将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我采访的一位电子厂工人哀叹道：“以前是人类控制机器，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干活。现在，机器控制了我们。”这意味着，工人不仅无法通过计件工资制中麦克·布洛维（Michael

---

[22] Sun and Deng, ‘The Rebirth of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23] Robin Kwong. 2012. ‘Terry Gou: Managing “1m Animals”.’ *Financial Times*, 20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ft.com/content/be3d2550-f9e6-34c0-91fb-afd639d3e750.

Burawoy）称作“赶工”的竞争游戏彰显自己的能动，甚至难以被动地放缓工作节奏。[24]

尽管相当多熟练工人表达了对自动化的不满，但很少有人真正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行动。本文将讨论熟练工人对技术升级采取集体行动的两个案例，这些案例揭示了工人在进行技术决策中遇到的障碍。

案例一

东莞一家名为 D 厂的家具生产商，部分熟练工人组织了一场针对自动化的停工斗争。2008 年之前，该工厂生产传统门，然而，由于当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国内房地产市场，老板决定转向生产高端防火门。由于这种特殊门需要一种致癌物质——石棉，进行层压，因此厂商不得不加快自动化进程。

2011 年，工厂老板引进了一种半自动贴木皮压机，可以完成从涂胶到压合石棉的一系列工作。在自动化前，木皮车间的熟练工人按件计算工资，月薪约 6000 元。自动化后的第一个月，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工人的工资达到 8000 元以上。老板很快开始招募年轻工人，他们的月薪只有 3000 元。车间主任很生气，因为他的车间里基本都是工龄超过四年，甚至还有 2002 年工厂创立时就入职的老工人。与同事短暂讨论过后，主任决定在清晨提出罢工，他成功地利用自己的权威，不仅获得老工人的支持，还包括新招聘的年轻工人。他们停产约两个小时和，老板赶来对他们大喊：“你们还想不想干了？！如果你们想今天走，那马上来结算工资。”老工人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工厂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技能也不再能给予他们强大的议价能力。年过 40 的他们担心如果被解雇，很难找到另一份工作，因此很快就回到了岗位上。每名罢工工人被罚款 100 元作为惩罚。罢工后，老板加快了涂漆、切割等操作的自动化进程，后来，在两个月一次的集会上，老板训斥工人：“你们屁都不是，没有你们工厂也不会停。”

中国的《工会法》规定，必须允许 25 名或 25 名以上的职工成立企业工会，并将其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支机构。然而，作为一家国内私营企业，D 厂并没有工会。因此，工人们不得不采取自发罢工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要求。相

---

[24] Michael Burawoy.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比之下，在案例二的研究中，日本投资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T 厂，工人们能够凭借工会与雇主谈判。

案例二

位于广州的 T 厂负责为日本汽车品牌生产汽车座椅的金属框架。由于焊工工资上涨，2011—2012 年间，工厂开始引进焊接机器人。由于公司存在企业工会，每年代表工人为加薪进行集体协商，一个有十年工作经验的焊工收入将是新手工人的两倍。

机器人化后，管理层开始要求将焊工降级为操作员，这意味着 350 元的焊接技术补贴将被取消。由于这项补贴包含在基本收入中，加班费与其他福利也将相应减少。然而，由于该公司有集体协商制度，所有重要政策都必须得到工人的同意，许多焊工拒绝在新政策上签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谈判，管理层妥协了：手工焊工将完成机器人无法完成的任务，获得 250—300 元的略低补贴，焊工转行的操作员仍将获得 120 元的低补贴。

工人很难将这个结果视作他们的“胜利”，因为在过去几年，工厂的工人数量已从 1000 人减少至 700 人。此外，新招聘的工人大多数任期不稳定，包括代理工人、临时工与学生实习生。公司已经要求一些资深员工辞职，并承诺支付“n+1”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n 指工龄）。然而，大多数工人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中，他们有资格获得“n*2”个月的工资。

掌控机器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在强大的工会活动与福利国家劳工保护的推动下，美国和日本的产业升级带来了工资上涨的“有益”影响，尽管我们并不应该忽视工人去技能化与工会疲弱造成的负面后果。[25]相比之下，2008 年金融危机后，当机器人革命在中国兴起时，过往数十年间为国家经济贡献了“劳动力红利”的农民工突然意识到，他们注定要被机器人取代。

---

[25]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essa Morris-Suzuki. 2011 [1988]. *Beyond Computopia: Information, Automation and Democracy in Japan*. New York, NY: Routledge.

大多数一线操作员将工业自动化视作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一些老工人开始质疑机器将劳动力替代或降低的合法性。然而，尽管自 21 世纪 10 年代初以来，罢工事件激增（见本书中陈敬慈与许少英的文章），我们并没有在报道中看到共享“机器人红利”为目的的罢工。本文给出的两个工人集体行动的案例表明，这些行动更多是“防守”的，而非“主动”的，因为工人只要求维持当前的福利水平，而非要求合理分配自动化的剩余价值。[26]近期的研究证实，一些采用机器人的公司，其工资的增长水平远远低于生产率的增长，而在其他公司中，工资也没有增长，甚至有被削减。[27]

东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在回答为什么政府只补贴升级的企业而不补贴下岗工人的问题时，他告诉我：“现在人们去国家信访局申诉欠薪和老板跑路的情况很普遍，但我没听说过有因为被机器替代的信访案例。”他的话语表明，争取“机器人红利”很少进入工人的议程。在大多数公司中，工人无法以任何形式参与自动化的决策过程。[28]即使是那些拥有集体协商制度的公司，自动化也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话题。

一家知名汽车供应商的工会主席甚至声称：“如果我们的公司只有 1500 名员工而不是 2000 名，但盈利率仍保持在 10%，每个员工都能获得更多的工资与福利。”[29]工会关注的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非工人长期的权力，这正是布雷弗曼所批评的经济主义的典型代表。

尽管工业自动化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很新鲜，但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的技术升级意味着固着在机器中的“死劳动”对人类劳动者的剥削。然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中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中国工人难以意识到“机器换人”背后所代表的含义。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死劳动”的本质时，才能真正成为机器的掌控者。

---

[26] Chris King-Chi Chan. 2014. ‘Constrained Labour Agency and the Changing Regulatory Regime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 no. 4: 685–709.

[27] 余玲铮,魏下海,吴春秀.机器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来自企业调查的微观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19(04):114-125. 王永钦,董雯.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10):159-174. 许怡,叶欣.技术升级劳动降级?——基于三家“机器换人”工厂的社会学考察[J].社会学研究,2020,35(03):23-46.

[28] Xu and Y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Labour Degrading?’.

[29] Yang and Luo, *Machines Replace Humans?*, 6.

2015

在 2010 年代初，少数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NGO）开始超越此前大多数组织采取的狭隘的法律援助方式，开始教导工人如何组织起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随着这些组织取得接连的成功，他们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不断提高，党和国家开始出面对他们进行约束。而这一切始于 2015 年底的一系列逮捕行动。

受打压的劳工非政府组织

柯蕾（Chloé FROISSART）

伊万·弗兰切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

如果你想谈劳工运动，那么，那个通过劳工运动确立自己地位的党，就会十分警觉，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他们夺取权力的途径。

——深圳一位劳工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2015 年 9 月

形势很明显已经无法挽回，只要你致力于劳工问题，那么无论在国内的哪个地方，情况都会是一样的。

——深圳一位劳工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2016 年 8 月

2015 年 12 月，警方在广东拘留了几十名劳工维权人士，最终向其中的五人提起诉讼。[1]为了表明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行动，而非单单一次局部行动，中国官方媒体决定拿曾飞洋当靶子，对他的组织——番禺农民工中心（90 年代末于广州成立的著名劳工非政府组织）展开全方位的抨击。没过多久，党媒就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指责曾飞洋贪污境外势力的非法资金。这些报道还攻击他的个人品格与行为动机，声称他是冒充成“工运之星”，损害工人利益，牟取个人利益。[2]最终，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决曾飞洋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1] Sui Lee Wee. 2016. ‘China Arrests Four Labor Activists Amid Crackdown: Lawyers.’ Reuters, 10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reuters.com/article/uk-china-rights-idUKKCN0UO05P2016-0110.

[2] 张璁：《起底“工运之星”真面目》，《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23 日。
文章链接：politics.people.com.cn/n1/2015/1223/c1001-27963407.html。——译者注。

四年；两名同事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此外还有一名农民工中心的保安人员孟晗，被判有期徒刑 21 个月。

与珠三角的几位劳工非政府组织（NGO）活动人士类似，曾飞洋与他的同事一直处于 NGO 与劳工运动接触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最前沿。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这些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成立以来，这些 NGO 就一直倾向于教导工人如何在权益受损时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但在 21 世纪 10 年代初，这些活动人士开始告诉工人，他们应当组织起来选出代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在党-国掌控的单一工会垄断劳工代表权的情况下，这种转变造成的影响十分巨大。随着这些非政府组织取得接连的胜利，在国内外愈发显眼时，当局开始出面干预并终止他们的活动。本文将回顾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的集体谈判实验，以及它的形成、意义和余波。

广东：维权非政府组织的温床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劳工非政府组织通常被归为两大类：福利型组织与维权型组织（见本书中豪厄尔的文章）。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广东省的非政府组织在整体上以维权型为主。这主要因为广东是中国工业化最高的省份之一，且靠近香港，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常常会培育或与内地非政府组织合作，使得他们可以接触到国际社会的价值观以及资金援助。此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广东的非政府组织更多是由工人自己创立的，而非与工人诉求脱节的家长式城市精英。[3]自 2003 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来，中国的维权活动逐渐展开。该文件强调在劳动法面前农民工与城市工人是平等的，并表明中央政府意图利用劳动法作为平息社会不满情绪的手段。随后开展的教育运动，教导农民工依法维权，而非采取罢工、示威等破坏性的手段，这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机会，可以普及劳工权益信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并鼓励他们通过仲裁委员会与法院寻求赔偿。随着 2007 年一系列新劳动法的通过（见本书中加拉格尔的文章），投诉数量大幅增加，却未能更好地保护劳工

[3] Chloé Froissart. 2010. 'Is There an NGO Model? Comparing NGOs Supporting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ia Centre Conference Series, The 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June.

权益，因为劳工局基本上无法满足工人的需求。这反过来加剧了工人的不信任感，促使他们继续上街表达诉求。[4]

起初，一些活动人士认为可以依靠法律规范与制度渠道的维权策略向法律体系施加压力，进而导致当局进行系统性改革。正如一位非政府组织领导者接受采访中所引用的那句马克思的话："量变可以引起质变。"[5]然而，这种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地方当局只强调调解而非严格执法。[6]此外，部分学者与活动人士都在批评这种策略，认为这是在维持政府对"权利"狭隘的法律定义，从而使得冲突个体化，进而导致工人之间的分裂而非团结。[7]事实上，劳工非政府组织通过对当局施压，缩小了承诺的权利和实际的权利之间的差距，这种关注法律动员的做法实际上弥补了体制的缺陷，反而使得当局不必进行系统性改革。[8]

从法律动员到集体谈判

在 21 世纪 10 年代初，有几个潜在因素导致了从法律动员向集体谈判的转变。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低效的法律途径所导致的费用与延误，使得农民工沮丧并产生去动员化的效果。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寻求赔偿的工人不得不花费比他们应得赔偿数额还要多的费用，更别提在此过程中漫长的等待。[9]

---

[4] Chloé Froissart. 2013. *La Chine et ses migrants: La conquête d'une citoyenneté* [*China and Its Migrants: The Conquest of Citizenship*]. Rennes: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338–61.

[5] Interview, Shenzhen, December 2004.

[6] Wenjia Zhuang and Feng Chen. 2015. '"Mediate First": The Revival of Mediation in Labour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22: 380–402.

[7] Ching Kwan Lee and Yuan Shen. 2011. 'The Anti-Solidarity Machine? Lab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73–87;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1475–508.

[8] 在这种意义上，劳工非政府组织为政权的稳定作出了贡献。See Chloé Froissart. 2011. 'NGOs Defending Migrant Workers' Rights: Semi-Union Organiz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Regime's Dynamic Stability.' *China Perspectives*, no. 2/2011: 18–25.

[9] Ibid., 22; Froissart, *China and Its Migrants*, 347–48.

此外，正如 2010 年本田罢工中的生动表现，工人已经开始要求法律未规定的东西，例如加薪（见本书中陈敬慈与许少英的文章）。这种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通常是通过工作场所的集体谈判来解决，但中国的法律制度只允许一种被淡化的、非对抗性质的“集体协商”（collective negotiation）——基于公司与工人之间的实质利益相等的假设，主要由官方工会主导，通常他们发挥的作用都是形式主义的摆设。[10]有鉴于此，时至今日，中国的大多数集体协商都只是重申法律规定上的最低标准。

面对工人的绝望，广东省只有五个民间组织（包括曾飞洋的番禺农民工中心）决定改变策略，以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体制产生影响并促成政治变革。[11]这些组织在威权的体制下能够做出这种具有开创性的举措。首先，各个组织都由长期参与维权事业、致力于维护工人同胞权利的工人创立且担任主要成员。其次，他们与香港一家经验丰富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后者可以为他们的活动提供必要的财务援助与指导。[12]

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允许，这种集体谈判的实验就不可能实现。2007 年党的十七大期间，胡锦涛主席强调通过人民群众参与来解决社会矛盾。2007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 月，雄心勃勃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地方推行这种参与式的意识形态，试图利用该省的改革主义传统来推动“社会管理”模式的改变，将民众参与和社会对话视作社会稳定的支柱，从而寻求自己政治生涯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口状况也十分有利，自 2004 年来不时影响广东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即“民工荒”）在 10 年代初开始得到解决，使得工人拥有了更大的谈判能力。

---

[10] Ronald Brown. 2006. ‘China’s Collective Contracts Provisions: Can Collective Negotiations Embody Collective Bargaining?’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16, no. 1: 35–78; Mingwei Liu and Sarosh Kuruvilla. 2017. ‘The State, the Union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38, no. 2: 187–210.

[11] Ivan Franceschini and Kevin Lin. 2019. ‘Labour NGOs in China: From Legal Mobilization to Collective Struggle (and Back?).’ *China Perspectives*, no. 1/2019: 75–84; Ivan Franceschini and Christian Sorace. 2019. ‘In the Name of the Working Class: Narratives of Labour Activ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Affairs* 92, no. 4: 650.

[12] Chlé Froissart. 2018. ‘Negotiat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Worker-Le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Information* 32, no. 1: 23–45.

教导工人如何谈判

正如一位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在 2014 年告诉记者："我们希望将集体罢工转变为集体谈判，帮助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去代表他们真正的利益。"[13]这些非政府组织并不寻求代表工人，而是试图通过培训，直接让工人与雇主、必要时还要与官方工会和当地政府打交道。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咨询项目旨在从四个方面指导工人：（一）如何确定争论的框架与要求的优先次序；（二）如何将"临时集会变成目标一致的稳定团体"；[14]（三）如何选举出代表；（四）谈判的策略。

通过对超过 40 个案例的研究，柯蕾阐述了一种以非政府组织主导的集体谈判的理想类型。[15]这种类型符合西方理论家对集体谈判的社会学定义，即一种基于工人志愿与自治组织的社会政治实践，旨在重新平衡雇工与雇主之间固有的冲突与不平衡关系，以改善劳动条件。[16]在她分析的案例中，谈判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发起，并与雇主进行的。在中国的法律与制度背景下，劳资关系严重倾向雇主，尤其是不承认罢工与自主组织的权利，非政府组织试图教导工人如何重新平衡这种关系，同时限制他们的诉求与行动方式，以免遭到打压。[17]当其他手段（如拖工、占领工厂、威胁或发起罢工）不足以使得雇主让步时，工人们学会了如何向工会与地方当局施压，要求他们将雇主带到谈判桌前并充当真正的集体谈判的担保人。

在谈判过程中，由雇主、工会与当局经常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保持工人之间的统一与团结是谈判成功的关键。在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谈判的最终结果通常是由工人代表与管理层签署集体协议，然后交由全体雇工批准。部分案例中，谈判可以迫使雇主完全遵守劳动法，包括偿还拖欠的工资与缴纳社保—

---

[13] Mimi Lau. 2014. 'Fertile Ground for Labour Activis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May, available online at: scmp.com/news/china/article/1502010/fertile-ground-labour-activism.

[14] Interview, Shenzhen, April 2014.

[15] Froissart, 'Negotiat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16] See, for example, Sydney Webb and Martha Beatrice Webb. 1897. *Industrial Democrac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llan Flanders. 1964. *The Fawley Productivity Agreements: A Case Study of Management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London: Faber.

[17] These strategies of 'boundary-making and boundary-breaking' are analysed by Froissart in 'Negotiat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一这是个人法律案件无法实现的效果，尤其是官员通常会向工人施压，迫使他们在合法权益上妥协，以减轻雇主的经济负担。在其他情况下，集体谈判使得工人能够就法律中未规定的内容进行谈判，例如加薪与抵制裁员等。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工人通过谈判获得了数千亿元的工资、遣散费、社保与住房公积金缴纳以及其他福利。[18]

非政府组织还致力于推进一项长期的政治议程。他们与工人代表、律师活动人士以及香港的合作伙伴一起，起草了一项行为守则（2013 年 10 月发布），将过去的集体谈判实验正式化，作为未来案例的模板，并为广东劳动法提供参考。[19]他们还思考如何使得工人独立代表持久化，尽管集体谈判在工作场所并未系统化，但他们仍在鼓励工人通过实践改革基层工会与工人委员会。[20]

集体谈判的意义

劳工非政府组织推动了真正的“由工人主导的集体谈判”，这与党-国主导、高级官员临时介入的集体谈判，以及工人自发的“闹事的集体谈判”有着很大的不同。[21]10 年代前半期，在广东省出现的集体谈判都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且非暴力的。在某些案例中，包括了历经数月的多轮谈判，以工人、雇主、工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为基础。广东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在提高工人认识自身集体权利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会指导他们促进自身团结、加强组织能力以便更好地行使这些权利。通过行使他们的权利来自主组织、民主选举代表并进行集体谈判，尽管这些权利并不由法律赋予——工人已经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能够在工作场所改变游戏规则，与雇主、工会与当地政府进行长期接触，并改变后者处理劳资纠纷的方式。事实上，通过挫败当地政府将劳资冲突

[18] Han Dongfang. 2016. ‘A Letter to the *People’s Daily* on *China Labour Bulletin*’s Work with Labour Activists in China.’ *China Labour Bulletin*, 12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clb.org.h-k/node/3078.

[19] On file with the authors.

[20] Froissart, ‘Negotiat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21] Chris King-Chi Chan and Elaine Sio-Ieng Hui.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From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 to “Party-State Led Wage Bargaining”.’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221–42.

非政治化的策略，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工人证明他们有能力与威权体制进行谈判。[22]

广东支持集体谈判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在社会学意义上（由工人组成），而且在更广泛的政治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成熟的工人组织。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对“劳工运动”一词持怀疑态度——或是担心这个词的敏感性，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在工作场所和广东省之外实现更强大和更广泛的工人团结，但非政府组织确实是这场运动的大脑，为前者提供了短期的战略和长期的议程，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也许就有可能挑战中国威权政府的根基。[23]

实验的终结

2015 年的打压不仅使得那些处于集体谈判前沿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寒蝉效应 [24]，甚至也对那些从事传统维权的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影响。许多组织选择屈从于当局，专注于不太敏感的活动，例如与企业社会责任和福利规定有关的活动，或是放弃正式组织的形式，转入地下，以个体活动者的身份继续运作。

仍有些组织没有立即放弃集体谈判，但也大都调整了做法，更加谨慎地筛选案件，提醒工人潜在的风险，并避免任何会引起骚乱的情况。[25]即使是这种弱化后的集体谈判，对党-国来说也太过火了。2019 年 1 月，中国当局联合抓捕并起诉了另外五名劳工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他们在过去都曾对促进集体谈判方面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这次行动是在另一起针对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镇压之后发生的，佳士科技是一家专门生产焊割设备的公司（见本书中埃尔夫斯特伦的文章）。2018 年夏，受地下毛派活动人士推动，佳士工人动员起来，要求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建立工会的权利，这一要求遭到了雇主和当地政府严厉的合作镇压，进而引发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的声援。[2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劳工非政府组织没有直接参与到佳士工

---

[22] Froissart, ‘Negotiat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23] Franceschini and Lin, ‘Labour NGOs in China’.

[24] Ivan Franceschini and Elisa Nesossi. 2018. ‘State Repression of Chinese Labor NGOs: A Chilling Effect?’ *The China Journal* 80: 111–29.

[25] Froissart, ‘Negotiat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26] Yueran Zhang. 2020. ‘Leninists in a Chinese Fa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Jasic Labour Organising Strategy.’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2: 82–88.

人的动员，可党-国却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一家与香港民间社会有关联的深圳劳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轮逮捕后，先前在打压中幸存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也被消灭殆尽。

中国当局通过新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手段对中国公民社会中最激进的部分进行了约束，2015 年和 2019 年发生的对劳工活动家的镇压，至少暂时结束了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的集体谈判实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基层活动的镇压力度加剧，政治空间缩小，这一切都令人悲观，但绝不意味着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的终结，也不意味着，这些活动人士播下的种子会被彻底根除。

2018

2018 年夏天，佳士（一家专门生产焊割设备的上市民营企业）一些工人的一系列抗议成为全世界的新闻头条。在中国的劳工活动因打压加剧而处于低潮时，这些工人动员起来，不仅要求更好的劳动条件，还要求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企业工会，从而挑战全国总工会自上而下的控制。这次动员与过去曾提出类似要求的其他抗议（如 2010 年的南海本田罢工）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中有着许多中国名牌大学的毛派学生团体参与。这些学生不仅在掀起抗议的地下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中的许多同志也涌向深圳，公开声援被国家机器镇压的工人。对工人和学生来说，抗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恐吓，被逮捕，被迫录取认罪口供，镇压浪潮波及到包括北京在内多座城市的大学。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人士勉强躲过了前一波的打压，他们与佳士的动员没有任何关系，但也被卷入了这次打压中，有些人被拘留了 15 个月之久。这为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以来少数学生的劳工组织尝试画上了句点：在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其最初理想的最终背叛。

佳士抗争

曼弗雷德·埃尔夫斯特伦（Manfred ELFSTROM）

2018 年 7 月 22 日，经过深圳坪山区燕子岭警察局的人们会看到一场不同寻常的工人抗议集会。参与者没有在街上游荡，寻求抱团的安全感，也没有采取过去二十年来的工业冲突中形成的常见对抗策略，如打横幅、堵路或威胁自杀等。相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发表长篇的激昂演讲，用着嘶哑的声音谴责他们压抑的劳动条件，当地工会的不负责任以及先前动员时警方的暴力行径。[1]旁观者了解到，抗议的地点是有选择的，就在前几天，燕子岭警察局就拘留了几名抗议者，然而，即使这些人已经被释放了，却仍然回到关押他们的地方进行示威。

两周后的 8 月 6 日下午，令观察者更惊讶的是，不仅有同样的工人在相同的地方发表演讲（当时工人已经这样做了好几次），还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退休的国企员工以及共产党老干部，大多数人穿着白色 T 恤，上面印有前几次抗议中工人的黑白素描与鲜红的六个字“团结就是力量”。有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抗议者还举出了横幅：“工人无罪！组建工会无罪!”。[2]示威者再次向驻足倾听的人们轮流发言，这一次涉及到了更广泛的主题：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团结，“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工人”，以及在“这样的一套制度下”受欺压

---

[1] 见 2018 年的纪录片《深圳佳士供热抗争实录： 纪录片 我和我们 ’（上）》，在线链接：youtube.com/watch?v=JWMu_MIDqNI。

[2] Mimi Lau. 2018. ‘Chinese Maoists Join Students in Fight for Workers’ Righ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0 August, available online at: 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58991/chinese-maoists-join-students-fight-workers-rights.

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3]自天安门的抗议以来三十年间无数次的劳工冲突中，都很少表达过这样的情绪。

这些引人注目的场面是“佳士运动”的一部分。本文将解释这场运动如何开始，在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以往的联盟，以及当局采取的镇压反应，并将初步思考这场运动对于未来可能的意义。

运动如何开始

佳士运动始于 2017 年初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场纠纷，该公司是一家焊割设备生产商，当地的员工人数约 1000 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员工面对管理层的殴打和辱骂、不断更改的调休日、违反各种工作规定的罚款、社保与住房公积金长期欠缴等问题已经忍无可忍。2017 年年中，部分员工向当地劳动局投诉，成功将一些最苛刻的条例取消。但这并不足以平息怒火。他们在 2018 年 3 月与 4 月继续投诉，特别是针对罚款问题。劳动局再次向佳士施压，管理层同意，但工厂不会归还先前已被扣除的金额。[4]

几名佳士员工开始尝试组建工会，向坪山区总工会的几名官员咨询并按照他们的建议进行流程。深圳在前几年试图重振区级的工会机构并卓有成效，从这里入手并无不可。[5]然而，这却遭到了管理层的阻扰，他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建立工会，但却不提供必要的文件。佳士的管理层反而组建了“职工代表大会”并举行选举，将要求组建工会的工人的候选人排除在外，这个机构通常与企业工会平行存在。筹建者以一封得到 89 名员工签名支持组建工会的《意愿表》作为回应。[6]

---

[3] ‘Student Speaks Out in Support of the Jasic Technology Workers Establishing a Union.’ *China Labor Watch*, 7 August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www.facebook.com/watch/?v=1015102-3648089946.

[4] Shannon Lee. 2018.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Shenzhen Jasic Events.’ *Shannon Lee’s China Blog*, 17 Sept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wolfsmoke.wordpress.com/2018/09/17/jasic.

[5]黄进：《广东省将推广社区工会联合会》，《南方日报》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线链接：gov.cn/xin-wen/2016-11/30/content_5140286.htm。

[6] ‘Shenzhen Worker Activists Determined to Unionise Despite Dismissal.’ *China Labour Bulletin*, 24 July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clb.org.hk/content/shenzhen-worker-activists-determined-unionise-despite-dismissal.

此后，冲突不断加剧。几位筹建者被管理层临时调岗到没有摄像头的地方，然后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殴打，最终，被粗暴地赶出工厂。7 月 20 日，他们到工厂继续抗议，却与保安发生冲突，随后被警察传唤带走，遭受多人殴打与拘留。被拘留者于次日被释放。但 7 月 21 日、22 日，工人聚集在扣押他们同伴的燕子岭派出所外，重申他们的诉求，并要求严惩打人的警察。

如果说，起初似乎还能在国家的既定渠道内有一些（受限的）空间推动佳士工人的目标，那么现在，国家及其下属工会与当地强大的雇主（深圳工厂只是该公司旗下的三家工厂之一，该公司还拥有数个研究与设计部门，并获得过各种省级和国家级奖项）已经达成共识。坪山区总工会不仅没有向佳士进一步施压，甚至公开称赞管理层的配合，并指责工人是在非法活动。[7]而在 7 月 27 日，一场夜间抗议集会的第二天，警察拘留了三十多名抗议者——即使以习近平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次不寻常的镇压。抗议者再次聚集要求释放同伴时，警察又拘留了十几人。[8]当局正在将这场事件视作一次政治挑战。

工人几乎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尽管佳士公司成立了企业工会，但完全处于管理层的监督之下。根据中国政府回应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自由权利的申诉文件，佳士公司新成立的工会将关注“假期福利、组织文化和体育运动、改善福利待遇、调整工资制度以及组织探访生活困难的职工”。[9]笔者尚不清楚（如果有的话）关于罚款、虐待工人以及其他棘手问题的投诉事是否会得到处理；无论如何，佳士运动将继续扩大范围，逐渐成为一次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现象。

---

[7] 写这篇文章时，区总工会关于佳士的言论仍在网上可见。见微信公众号坪山群团：《区、街道两级总工会与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企业建会再次深入交流》，2018 年 7 月 23 日，在线链接：mp.weixin.qq.com/s?__biz=MzIyODc1MTgzNg==&mid=2247485889&idx=1&sn=74f1bbadffa04f1e9bae039220807ca8&chksm=e84c6972df3be064e3d4dcc33c1c9c401cdde1df1cbeec2b0310ce7527f162e4081d7fa04c60#rd。

[8] ‘Shenzhen Jasic Workers Who Established a Union Have Been Arrested for “Disorderly Behavior”.’ *China Labor Watch,* 30 July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chinalaborwatch.org/newscast/664.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2019. ‘389th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Reports of the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22 June. Geneva: ILO, available online at: 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1394.pdf.

支持佳士工人

自伊始，佳士工人就得到了大量外部的支持。自 7 月 20 日的事件以来，支持工人的信件就在中国互联网的左翼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像是沈梦雨这样具有社会正义感的大学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积极参与劳工组织，很早的时候就参加了抗议集会，并帮忙组建佳士工人声援团。其他人，如北京大学的学生岳昕，曾在中国的#MeToo 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声援信，引起人们关注工人的情况，并前往深圳提供帮助。全国各地的校园，都有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小组举行宣传活动，这些团体一直在为农民工与校园职工组织活动，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个可以作出更多贡献的机会。最终，声援团的几十名学生搬进了惠州惠阳的出租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相较于工人，这些学生最终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公众形象。[10]

不仅学生参与了这场抗争，还有其他外界人士表示支持，特别是内地的前国企员工和党员干部，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本世纪 00 年代，他们曾抗议过国企重组（见本书中威廉·赫斯特、李静君的文章）。当中的许多人和那些学生一样，都是通过乌有之乡等网站联系起来的网络左派。其中有些人自称“马列毛左派”，将自己的政治倾向与那些更民族主义且更亲建制的毛派区分开来，后者曾因在线上线下对自由派与外国人的激烈批评而声名狼藉（但也有些马列毛派在事后对学生的幼稚表示担忧）。[11]有报道称，佳士工厂的工人活动人士也来自这些圈子，而他们加入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这样一场高调的对抗。[12]有趣的是，声援者并未与当地的劳工非政府组织进行接触，这些组织对抗争表示同情，却仍保持谨慎态度。然而，声援者也并非仅限于激进左派，例如，他们也

[10] For a good profile of the students, see Yuan Yang. 2019. 'Inside China's Crackdown on Young Marxists.' *Financial Times*, 13 Febr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ft.com/content/fd087484-2f23-11e9-8744-e7016697f225.

[11] Ben-li Qian. 2019. 'Jasic Struggle: Debate Among Chinese Maoists.' *Against the Current*, no. 200 (May–June), available online at: solidarity-us.org/atc/200/chinese-maoists-debate.

[12] 'Seeing Through Muddied Waters, Part 2: An Interview on Jasic & Maoist Labor Activism.' *Chuang*, 2 July 2019, available online at: chuangcn.org/2019/07/jasic-2-reignite-interview; Yueran Zhang. 2020. 'Leninists in a Chinese Fa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Jasic Labour Organising Strategy.'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2: 82–88.

曾寻求过自由派人权活动家胡佳提供在专业知识上的帮助，胡佳过去曾因对艾滋病的观点和倡导公民自由而被监禁。[13]

更远之外的人们也在动员起来。在香港，独立的香港工会联合会与一些民间团体一路游行到中联办，声援佳士抗争。[14]欧美各地也有抗议活动。国际工会联合会就该案与中国其他侵犯劳工权益的事件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申诉。[15]当征服开始严厉打压学生时，康奈尔大学劳工关系学院切断了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联系，因为人大校园中也有“被失踪”的人员。[16]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到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等左派学者承诺抵制在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大会。[17]佳士运动从一场小范围的工厂纠纷，演变为了一次重要的摊牌。因此，政府对参与者的严厉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家的镇压

佳士运动在最初就受到国家的打压。首先是对抗议工人的逮捕，李展、米久平和余浚聪三人被正式逮捕，并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政府组织“深圳打工者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和法人代表随后被拘留，没有任何报道声称他们与佳士运动有过直接联系；被捕的负责人付常国最终与三名佳士工人一

---

[13] Gerry Shih. 2019. '"If I Disappear": Chinese Students Make Farewell Messages Amid Crackdowns Over Labor Activism.' *The Washington Post*, 25 March, available online at: 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f-i-disappear-chinese-students-make-farewell-messages-amid-crackdowns-over-labor-activism-/2019/05/25/6fc949c0-727d-11e9-9331-30bc5836f48e_story.html.

[14]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HKCTU). 2018. 'The Hong Kong Civil Society Marches On in Support of the JASIC Workers.' *Labour News*, 29 August.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vailable online at: en.hkctu.org.hk/content/hong-kong-civil-society-marches-support-jasic-workers.

原文链接似乎无法打开，另见：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717。——译者注。

[15] ILO, '389th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16] Javier C. Hernández. 2018. 'Cornell Cuts Ties with Chinese School After Crackdown on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29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nytimes.com/2018/10/29/world/asia/cornell-university-renmin.html.

[17] See Scholars Supporting Jasic Activists. Undated. 'A Call to Ac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supportingjasicworkers.wordpress.com/statements-of-support/。作者也参与了。

起面临正式指控。[18]学生沈梦雨于 8 月 11 日晚失踪。新华社在 8 月 24 日的一篇报道中将这场骚乱定性为当地民间团体与境外势力勾结，这表明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19] 8 月 26 日，防暴警察突袭了惠州学生声援者的出租屋，拘留了约 40 人，包括岳昕。[20]

秋季，情况再次升级。11 月初，当局逮捕了南京、上海、武汉与广州等地的学生活动者，有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当众被绑走。[21]12 月，两名在最初为工人提供建议的工会工作人员以及一位劳工律师被捕。[22]同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与同学前往湖南韶山参加毛泽东诞辰的纪念活动时，被人强行带走。[23]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透露，他们在警方的监视下被迫留在家中。[24]警方海传唤了其他的活动人士，给他们看了之前被拘留者（如岳昕）的“认罪”视频。[25]

---

[18] 'Fu Changguo.'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ebsite, 18 July 2019, available online at: www.nchrd.org/2019/07/fu-changguo; Tim Pringle and Anita Chan. 2018. 'China's Labour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Dangerous New Phase, As Shown by Attacks on Jasic Workers and Activis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Sept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64817/chinas-labour-relations-have-entered-dangerous-new-phase.

[19] 《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新华社，2018 年 8 月 24 日，在线链接：web.archive.org/web/20180824170118/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8-08/24/c_1123326003.htm。

[20] Yang, 'Inside China's Crackdown on Young Marxists'.

作者的日期有误，实际日期是 8 月 24 日，即使是上述的引用，写的也是 24 日。——译者注。

[21] Sue-Lin Wong. 2018. 'Labor Activists Missing in China After Suspected Coordinated Raids.' *Reuters*, 12 Nov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labour-activists-idUSKCN1NH0IZ.

[22] 'Jasic Crackdown Extends to Trade Union Officials and Lawyers.' *China Labour Bulletin*, 4 December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clb.org.hk/content/jasic-crackdown-extends-trade-union-officials-and-lawyers.

[23] Javier C. Hernández. 2018. 'Students Defiant as Chinese University Cracks Down on Young Communists.' *The New York Times*, 28 Dec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nytimes.com/2018/12/28/world/asia/chinese-university-crackdown-students.html.

[24] Hernández, 'Cornell Cuts Ties with Chinese School After Crackdown on Students'.

[25] James Griffiths and Yong Xiong. 2019. 'Chinese Marxist Students Appear in "Confession" Video as Crackdown Continues.' *CNN*, 22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cnn.com/2019/01/22/asia/china-student-marxists-intl/index.html.

最后，北大校方介入此事，将马克思主义学会改组为一个全部由党员领导的社团，他们在开幕式上专门阅读了一本新儒家的著作选集；结束后，每人还领到了一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26]2019 年初，这场不寻常的抗议浪潮已经被平息了。

佳士的意义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于佳士运动的意义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例如，劳动社会学家潘毅在社论与公开评论中，将这场运动描述为历史性的事件，她特别强调工人对工会权利的重视，认为这标志着一次重要的转变，劳动运功摆脱了以往大多数动员中狭隘的经济诉求，转而对工人的社会角色进行政治概念化。[27]左派公共知识分子区龙宇反驳这种观点，指出在佳士之前，中国已经发生过几次与工会有关的大规模纷争，例如友利电、澳利威和盐田集装箱码头的罢工，这仅仅只是过去十五年间的几个工人动员的例子，他也怀疑几十名工人的行动是否能代表中国工人的普遍变化；[28]他认为佳士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打破了国内陈旧的“社会主义”（新左翼和新毛派）与“自由主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对立。社会学家陈慧玲（Jenny Chan）则强调学生对运动的参与是如何让人联想到 20 世纪早期的组织运动。[29]社会学家张跃然认为这场运动就规模上而言是一次“非凡壮举”，但他也批判了佳士活动者的先锋队倾向，认为他们更像“革命专家”而非“劳工组织者”，他们没准备好通过组织工人来在车间

[26] Eduardo Baptista. 2019. '"Deers" vs. "Horses": Old and New Marxist Groups Wage Ideological Battle at Peking University.' *SupChina*, 9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supchina.com/2019/01/09/old-and-new-marxist-groups-wage-ideological-battle-at-peking-university.

[27] 例如，潘毅：《观点： 深圳佳士工人维权的两大意义》，*BBC News Chinese*，2018 年 8 月 17 日，在线链接：www.bbc.com/zhongwen/simp/45217517。

[28] Au Loong-Yu. 2018. 'The Jasic Mobilisation: A High Tide for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Made in China Journal* 3, no. 4: 12–16.

[29] Jenny Chan. 2020. 'A Precarious Worker–Student Alliance in Xi's China.' *The China Review* 20, no. 1: 165–90.

建立实质的权力。[30]破土杂志的编辑丘琦欣（Brian Hioe）认为，除非未来会出现更激进的运动，否则佳士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31]

这些评估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我们还能从其他视角理解这场运动的独特性，并认识到它的局限性。首先，如同我们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佳士运动意味着天安门事件之后少有的成熟案例。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与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将“社会运动”定义为“基于组织、网络、传统以及维持活动的团结，通过重复的展演宣称诉求的持续性运动”。[32]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大多数劳资纠纷是短暂的，普遍缺乏跨工厂的组织，更别说跨省的组织了。[33]相比之下，佳士运动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具体取决于如何计算），如前所述，运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有些人在他们的校园或家乡组织起来，而一些人则赶到深圳参与斗争，他们公开地展露出自己的主张。此外，运动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展演——除了上述在街头的公开演讲，从抗议工人的形象到参与者的 T 恤（还有网站与推特帐号）上激昂的团结口号，可以看出，他们有着自己的象征标志。可以说，在中国为数不多能表现出如此有水平的“运动”，只有某些环保运动、女权主义组织与维权律师。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国治理战略的角度来看待这场运动，可以发现佳士运动试图在原本被故意隔离的社群之间建立联系。中共治下的中国常被描述为“蜂窝式”的政治制度。[34]在毛泽东时代，正如本书中的其他作者所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常被鼓励参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但除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时期，这种动员通常被牢牢限制在蜂窝的墙壁之内。[35]同样有学者将改革

---

[30] Zhang, ‘Leninists in a Chinese Factory’.

[31] Brian Hioe. 2018. ‘Is the Jasic Struggle Primarily Symbolic or Does it Have the Potential to Spread?’ *New Bloom Magazine*, 9 Sept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newbloommag.net/2018/09/09/shenzhen-jasic-symbolic-or-spread.

[32] 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2007.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111.

[33] For instance, see Eli Friedman and Ching Kwan Lee. 2010. ‘Remaking the World of Chinese Labour: A 30-Year Retro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8, no. 3: 507–33.

[34] Vivienne Shue. 1990.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5] Elizabeth J. Perry. 2007. ‘Permanent Rebellion?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nese Protest.’ 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edited by Kevin J. O’Bri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5–15.

开放时代的中共统治描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农民工与国企工人的对立、专家（技术精英和企业管理层）与前两者的对立。[36]例如 1989 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大批民众，就被当局和组织者共同维持的对立所削弱。特别是天安门的学生领袖，他们担心事业的纯洁性会被污染并引发当局镇压，一直到运动的最后几天，都将工人活动者排除在外（见本书中张跃然的文章）。[37]佳士运动在 21 世纪就有些许先例：2009 年与 2010 年，有学生隐藏身份成为富士康与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并揭露了工厂中的虐待行为，2014 年，有学生参与了支持广州环保工人的运动。[38]但这些事件未能像佳士那样，近乎于挑战中国社会潜在的牢固对立。

最后，从中国劳资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即可以将这场运动理解成先前运动的集大成者，也可以理解为一次反常的运动。我们可以如此调和潘毅与区龙宇的分析：尽管与工会相关的诉求肯定是过去二十年间一些重要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像佳士运动那样成为核心诉求。如果说先前的大多数关于工会的集体谈判是上层在回应那些已经开始的自下而上的运动，那么现在，关于工会的诉求已经成为了引发运动的呼声之一。[39]然而，在其他方面，佳士运动并未能在先前的运动上更进一步。特别是，与政府声称的相反，劳工非政府组织在这场抗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此，这场运动并

---

[36] Teresa Wright. 2010.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7] Jackie Sheehan.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Elizabeth J. Perry. 2002.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Andrew G. Walder and Xiaoxia Gong.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1–29.

[38] 'Chinese Students Go Undercover to Investigate Coca Cola.' *China Labor News Translations*, 2009, available online at: clntranslations.org/article/41/chinese-students-go-undercover-to-investigate-coca-cola; Pun Ngai, Yuan Shen, Yuhua Guo, Huilin Lu, Jenny Chan, and Mark Selden. 2014. 'Worker–Intellectual Unity: Trans-Border 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Foxconn.' *Current Sociology* 20, no. 10: 1–14.

关于可口可乐的那篇报道似乎无法打开，国内相关的报道见：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3/04006609797.shtml。——译者注。

[39] Chris King-Chi Chan and Elaine Sio-Ieng Hui. 2013.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From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 to "Party-State–Led Wage Bargaining".'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221–42.

未能利用到当时可以称作最为发达（尽管仍不完善）的工人组织结构。运动者也并未将先前的抗争中常采用的罢工策略作为武器，因此，佳士运动只能算是一场抗议运动。此外，与同时期的其他纠纷（例如沃尔玛员工、卡车司机与起重机操作员）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工人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不同，佳士的运动主体主要由一群工人和他们的各种支持者组成。[40]当然，这不应该成为对组织者的谴责，但这同样提醒我们，这场运动在某些方面是不同寻常的，既有创新和鼓舞人心的一面，但也因此使其成为一种异数，甚至也许是一条死路。

抗争的遗产

最后，佳士运动很可能激发出了当时中国的任何运动都难以承载的希望。即使出现相似规模的运动，也很可能遭到习近平政府的强硬敌意。事实上，佳士运动后的一年内，政府就扩大了打压范围，逮捕了许多与工会无关的劳工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以及劳工记者。香港的社会动荡与 COVID-19 的传播，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加强控制。然而，参与佳士运动的每个人都保留着对于这一事件的记忆，还有他们的同事、同学，以及关注这场事件的中国人。这些记忆十分宝贵，也许在某个合适的时刻就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

[40] 'Tower Crane Operators Across China Organise Labour Day Strike Over Low Pay.' *China Labour Bulletin*, 2 May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clb.org.hk/content/tower-crane-operators-across-china-organise-labour-day-strike-over-low-pay; 'China's Truck Drivers Strike Over Stagnant Pay, High Fuel Costs and Arbitrary Fines.' *China Labour Bulletin*, 11 June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clb.org.hk/en/content/china's-truck-drivers-strike-over-stagnant-pay-high-fuel-costs-and-arbitrary-fines; Anita Chan. 2016. 'The Resistance of Walmart Workers in China: A Breakthrough in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Made in China Journal* 1, no. 2: 11–15.

2018

2017 年以来，中国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建立了许多“再教育营”，自称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当地穆斯林人口（尤其是维吾尔人）中的扩散。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有数十万人被武断地关押在这些再教育营中。工厂迅速涌入该地区，利用再教育营系统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补贴。正如本文所述，这些新建工厂的目标是将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改造为顺从且具有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与得到正式承认的工人相比，这些无产阶级没有相应的社会福利。

突厥语族穆斯林的拘留工厂

达伦 · 拜勒（Darren BYLER）[1]

2018 年 10 月 3 日，一位名叫叶尔占 · 库尔班（Yerzhan Kurman）的中年哈萨克男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五十公里开外一座小农村的拘留营中关押了九个月才被释放。他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自由，能够回到移民后的哈萨克斯坦过老日子。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被送到伊宁县一处产业园中的手套厂工作。他将在一个旨在“提高少数民族工人素质”的拘留工厂中度过接下来的五十三天。

2018 年初，叶尔占回国是为了给女儿求医，并照顾生病的母亲，他回国后不久就被拘留了。在 2019 年接受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采访时，他说道：

> 2018 年 2 月 8 日的晚上，他们用一辆小巴接走了我，还有村里的五个年轻人。当时天已经黑了，他们给我们套上了黑色塑料袋，用手铐把我们铐住。接下来的九个月里，我被关在三层的一间 5*5 米的房间里，房间上的牌子写着“12 号”。仅我们这一层就住了 260 人。我在的房间里关了 12 人。后来我听说，在我们的拘留营里有一万多人。[2]

叶尔占并不确定拘留营的具体位置，它可能建在城市的郊区，距离他后来被迫在里头工作的产业园只有 7 公里。

所有的被拘留者都会指出，再教育营里的条件令人发指。叶尔占描述他被拘留的情况时说道：

---

[1] 本文基于 2019 年 9 月发表于 *SupChina* 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企业如何从新疆的强迫劳动中牟利》，在线链接：supchina.com/2019/09/04/how-companies-profit-from-forced-labor-in-xinjiang.

[2] ‘Ihr seid keine Menschen [You Are Not Human]’, *Die Zeit*, 31 July 2019, available online at: zeit.de/2019/32/zwangslager-xinjiang-muslime-china-zeugen-menschenrechte/seite-2.

> 厕所就是窗户旁边的一个马桶，没有自来水。白天我们一排排地坐在塑料凳子上，食物是通过门上的一个开口递进来的。早上 7 点，我们必须唱国歌，然后有 3 分钟的时间吃早餐。之后，我们要学中文直到晚上 9 点，老师是哈萨克人或维吾尔人。我们的房间里有四个摄像头监视，确保我们不会相互交谈。随意开口的人会被铐上手铐，只能在墙边站着。看守会说“你们没有权利说话，因为你们不是人；如果你们是人，就不会在这里了”。[3]

叶尔占至今都不知道他被拘留的原因。与其他被拘留在伊宁的人一样，他可能是因为持有护照并前往过哈萨克斯坦——中国政府监控名单上二十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一。[4]随着时间推移，艰苦的日常开始改变他的心态，他说道：“头两个月，我心里想得是我的妻子 Maynur 和三个孩子。后来，我只想着食物。”[5]

叶尔占为生存而挣扎时，2018 年 5 月，江苏援伊前指总指挥、党委书记潘道津视察了伊宁县另一侧新建的产业园。[6]他率领了一支向新疆提供工业“援助”的代表团。2016 年 12 月潘道津被任命这一职位时，也是再教育系统刚开始进行大规模拘留的时候。在视察新产业园时，他“充分肯定了”江苏南通市的商界领袖出资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代表团参观了江苏三润服装集团的新工厂，这家公司与 Forever 21 等国际品牌合作。代表团还参观了叶尔占被分配到的那家高产的手套厂，这家工厂由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制造商，绿叶硕子岛商贸有限公司的员工管理。

根据 2018 年 12 月伊犁电视台的一份采访，手套厂的王兴华总经理表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已经招工 600 多人。”[7]这 600 多人中就有叶尔占，

---

[3] Ibid.

[4] Human Rights Watch. 2019.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Reverse Engineering a Xinjiang Police Mass Surveillance App*. Report, 1 May.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available online at: hrw.org/report/2019/05/01/chinas-algorithms-repression/reverse-engineering-xinjiang-police-mass.

[5] 'You Are Not Human', *Die Zeit*.

[6] 《江苏援伊前方指挥部领导调研南通市对口援疆工作》，南通援疆进行时，2018 年 5 月 31 日，在线链接：archive.md/f490v。

[7] 《州直纺织服装产业敞开群众“就业门”》，伊犁电视台，2018 年 12 月 4 日，在线链接：archive.md/KSe5r。

他在不到一个月前从拘留营到工厂劳动。王总经理继续说："（自从 2017 年成立以来）我们已经产生销售 600 多万美元，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工人达到 1000 人，明年把内地的订单全部拿过来生产，计划在 2019 年年底，解决 1500 人就业。"事实上，伊宁手套厂的产能已经超过总公司，河北总部的工厂雇员只有不到 200 人。[8]将公司的制造业务转移到新疆具有经济意义，因为该公司 96%的皮手套都将跨境销往俄罗斯和东欧。

指数增长迅速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2018 年以来，国家为新疆的工厂建设与物流运输提供了补贴。工厂建设通常由华东的地方政府资助，作为"配对与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新工厂可以获得产品销售额 4%的运输补贴，以支付从新疆发货的物流费。[9]最重要的是，在新疆每个县市的附近，都设有拘留营，其中关押着数万名像叶尔占这样的受迫害者，充当常设的劳动后备（standing labour reserve）。

经济的载体

自 2017 年以来，工厂纷纷涌入新疆，充分利用与再教育营系统相关的新建产业园以及随之而来的廉价劳动力和补贴。事实上，2018 年末，新疆地区的主要发展部门，新疆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公告，声称再教育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已经成为经济的"载体"，因此，"吸引了大量沿海内地企业来疆投资建厂"。[10]由于中国 80%以上的棉花来自新疆，因此纺织服装相关产业被着重强调。[11]中国政府预计在 2023 年前将一百多万个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新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东海岸汉族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上

[8] 见帐号"Lixian Huawei Gloves Factory"，在线链接：huaweiglove.en.alibaba.com/company_profile.html。（译按：已失效。）

[9] 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 年 4 月 6 日，在线链接：archive.fo/ZBsk8。

[10] 《自治区经济结构稳中有活 发展良好》，2018 年 12 月 5 日，在线链接：web.archive.org/web/20190520143306/http:/www.xjdrc.gov.cn/info/9923/23516.htm。

[11] 'Provincial Data Shows China's Shifting Agricultural Trends', Gro Intelligence website, 6 March 2019, available online at: gro-intelligence.com/insights/provincial-data-shows-chinas-shifting-agricultural-trends.

升所引发的后果。[12]如果计划顺利，这将意味着中国每 11 个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作岗位中就有 1 个在新疆。[13]伊宁手套厂的 1500 个工作岗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致来讲，作为“再教育劳动制度”的一部分，维吾尔与其他突厥语族穆斯林将被强制分配到新建的工厂中，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第一，在教育营中的许多被拘留者将被安置在营中或是邻近的工厂，夜里他们会被关押在同一处地方工作。第二，在地区中心的一些新建工厂园区中，雇佣曾进过再教育营的“学员”与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来源于自我雇佣的农民，以及城市周围从事传统手艺、服务行业的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临时工。这种新式的监狱制度，类似于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与潘毅口中用于监视与剥削华东农民工的“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ur regime），那些城市产业园的“剩余劳动力”在夜间会被关在宿舍里，就像叶尔占那样。[14]一些“过剩劳动力”，可以像华东的农民工那样，晚上被允许回到自家的住宅，或是在地区中心附近选择的住宿。第三，在农村地区建设县级或小规模的“卫星工厂”，收纳附近的维吾尔族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是有孩子的妇女，由当地的村镇级政府指派工作，孩子留在托儿所受照顾；她们的丈夫大多在城市工作或被关进再教育营。尽管上述三种途径中胁迫的程度不同，但都导致了家庭的离散，并附属于国家和私人企业代理进行的汉语培训以及纪律训练。

上述的任何情况中，突厥语族穆斯林被拘留者都会被强制分配到这些岗位。正如“社区”与“大队”的工作人员的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拒绝参与“扶贫”计划（一种把人分配到工厂工作与其他形式的“强制援助”的委婉表述）将被

---

[12] Dominique Patton. 2016. ‘Xinjiang Cotton at Crossroads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Reuters*, 12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cotton-insight-idUSKCN0UQ00320160112.

[1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2014.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in the Textiles, Clothing,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ies*. Issues Paper GDFTCLI/2014.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00463.pdf.

[14] Chris Smith and Ngai Pun. 2006. ‘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China as a Site for Control and Resista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7, no. 8: 1456–70.

视作可疑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15]与警察、私营和国营企业共谋的基层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从管辖范围内的人口中选出工人，他们通常会陪同工人进入工厂，有时会充当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中介。他们还会在工厂车间，甚至是在宿舍中执行纪律。这种措施与市场化合同法中赋予的所谓“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国家当局认为，穆斯林工人不愿意与家人分离、汉族管理的工厂中低薪工作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厌恶与非穆斯林接触。国家基层与雇主迫使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在汉语的语言环境下工作，并认为这是在将他们从旧有生活方式与传统中解放出来。这种说法忽视了国家与市场对剥削自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的“生产资料”的依赖，也忽视了在陌生环境中因强迫劳动而导致的严重缺乏自由。[16]

叶尔占被送去的手套厂中，似乎既有被拘留者，也有强制分配的“剩余劳动力”。很多人像叶尔占那样，从再教育营释放后又被运送到工厂。然而，根据一份国家报告，早在第一批被拘留者从再教育营中被转移出来之前，就有超过 1800 人在 2017 年年中被送往产业园工作。[17]根据叶尔占与另一名我采访的工人古孜拉 · 阿瓦尔汗（Gulzira Auelkhan）所述，这些人属于“第二类”就业不足的农村工人，他们被认为是“正常”人口的一部分，直接分配工作，而不是先关进再教育营。

非自由劳动

叶尔占到达手套厂的几个月前，一位哈萨克族的被拘留者也从附近的再教育营中转移到了那里。古孜拉是一位 39 岁的母亲，她将年幼的女儿留在哈萨克斯坦的丈夫身边。他在拥挤的囚室中度过了 15 个月的可怕折磨，与 18 至 60

[15] Jennifer Pan. 2020. *Welfare for Autocrats: How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Cares for Its Ruler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Çin’in Yeni Planlarinin Yazili Emri İfşa Oldu [Written Order of China’s New Plans Revealed]’, *Turkistan Press*, 23 July 2018, available online at: turkistanpress.com/page/cin-39-in-yeni-planlarinin-yazi-li-emri-ifsa-oldu/247.

[16] Karl Marx (edited by Robert Tucker).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mpany.

[17] 《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产业工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伊宁县零距离，在线链接：archive.ph/Cv6w5。

名其他被拘留者关在一起，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18]她所处囚室的被拘留者如果使用厕所超过两分钟，就会被电棍反复击打头部。他们的头发被剃得很短，掩盖了一些淤青，上级官员视察前，他们会拿到染料，染黑他们的头发和头皮。[19]他们还被告知，受检查时要微笑。

由于她的“被预防的罪行”（pre-criminal offences）相对较少（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给联合国的文件，再教育营中的许多被拘留者实际上并没有犯罪），古孜拉被安置在安保水平最低的再教育营中。[20]她被列入“可疑”名单的原因是，她曾移居过哈萨克斯坦，看过土耳其的电视节目，里面的妇女都戴着头巾。她所处的在教育营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再教育，相反，被拘留者每天都得学习汉语，禁止讲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

与叶尔占一样，古孜拉被释放后，以为自己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但没过几天，当地的干部就找到了她，拿着一份文件，要求她必须去手套厂报到。她到达工厂后，认出了她的新老板——王总经理。她在再教育营时，曾看到他与几名官员一同参观过几次，她推测，当时她就已经被选定了。她被告知，作为一名实习生，前三个月的每月工资是 600 元人民币（约合 100 美元），这是当地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1800 元人民币的三分之一。根据她的“效率”，每缝制一双手套，她大约可以得到 2 毛钱的报酬。她说道：“最熟练的工人每天可以缝 60 双。我尽力也只能缝 13 双。”[21]由于视力不好，她无法提到自己的产量。她告诉驻柏林记者本 · 毛克（Ben Mauk）：“最后，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半月。工

---

[18] ‘Gulzira Aeulkhan’, *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 2019, available online at: shahit.biz/eng/viewentry.php?entryno=1723.

[19] Erkin Azat. 2019. ‘Gulzira Auelkhan’s Records in a Chinese Concentration Camp: “I Worry About the Lives of Those Eight Who Have Not Signed a Contract in the Factory.”’ *Medium*, 4 March, available online at: erkinazat2018.medium.com/gulzira-auelkhan-s-records-in-a-chinese-concentration-camp-i-worry-about-the-lives-of-those-c18a2038a5a2.

[20]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on Follow-Up to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available online at: undocs.org/CERD/C/CHN/FCO/14-17.

[21] Nathan Vanderklippe. 2018. ‘“I Felt like a Slave”: Inside China’s Complex System of Incarceration and Control of Minorities.’ *The Globe and Mail*, 31 March, available online at: 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i-felt-like-a-slave-inside-chinas-complex-system-of-incarceration.

资是计件的，每缝一只手套能赚 1 角钱。我总共做了两千多只手套，赚了 220 元。你看，这就像是奴隶制度。”[22]

尽管工厂的安保水平比再教育营要低，但被拘留者仍然无法走动。越境逃亡哈萨克斯坦的几个月后，她在 2020 年 1 月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宿舍与工厂入口处的检查站，必须要扫描身份证与脸部。

> 我们到工厂与中午的时候，都会被检查身体与手机。一天结束返回宿舍时，还会再次检查，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偷（缝纫）针。当我们认识（保安）后，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要监视我们？”

尽管他们从未回答，但古孜拉告诉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保安会监督他们的表现是否像顺从的、成功“再教育”的产业工人。她提到，她与她认识的所有穆斯林，护照都被没收了，不允许离开指定区域（无论是在产业园中还是相对自由的农村）。此外，就像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她也没有足够的钱让人把她偷偷送出去。工厂里的生活比再教育营的生活要好，但她明白，在这个新的空间中，她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受到“再教育”的产业工人。

除了工厂与产业园的纪律之外，墙内的设施仍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下班后，巴士会将她与其他被拘留者带到约三公里外的一处临时宿舍。被拘留者可以在宿舍区内走动，但不能离开。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工人们“上班前在工厂接受阅读训练，下班后在宿舍要上 45 分钟的汉语课，晚上会有一名官员看管。”[23]

叶尔占与古孜拉都被允许在周末的一天探望家人几个小时。公司的大巴会将他们从宿舍送到他们的家乡，再把他们接回来。然但是，在接受一个月的“培训”后，他们发现来回的费用相当高昂。工厂的老板，例如王总经理，告诉他们由于大巴路费与伙食费，他们只能拿到一半（300 元）的工资。叶尔占后来回忆道：“我在生产线上工作了 53 天，总共赚了 300 元。”

---

[22] ‘Gulzira Aeulkhan’, *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

[23] Vanderklippe, ‘“I Felt like a Slave”’.

政府文件显示，2018 年，喀什地区计划有 10 万名被拘留者搬入新建的产业园和卫星工厂工作。[24]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目标。在喀什，每有一名被拘留者工作，工厂主就会得到 5000 元，分三年发放。这些补贴可能是为了防止叶尔占与古孜拉那样被扣发工资的经历而设立的。然而，这些工厂是再教育营系统的延伸，在公民权利与人权之外的法律灰色地带运作，防止工人受到虐待的责任就落到了王总经理之类高层的道德准则上。作为一名代表监狱国家的实业家，他与叶尔占、古孜拉一样清楚，任何抱怨或是放缓生产，都会导致工人被其他被拘留者替代，因此，他可以肆意对待他们。

再教育产业园的社会影响

中国西北地区新建的产业园占据了一个介于再教育营、私营产业、无产阶级化与强迫劳动之间的边缘地带。国家文件一再指出，建设新的产业园是为了培养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拘留者以及其他穆斯林剩余劳动力的某种没有定义的“基础素质”。在这些官方文件中不怎么提及的是，这些工厂空间作为中国社会契约（一种隐性协议，国家保护其公民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外围的群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对于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的中国公民来说，这种社会契约已被打破，因为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监狱群岛被纳入了殖民-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再教育系统已经破坏了当地社会再生产的能力。[25]新疆的这些工厂中，工人的证件被没收，或是将他们的身份证作废，使得他们处于一种普遍的非自由状态。这些强迫劳动由国家补贴与指导，并在复杂的监控措施与物流系统中运作，而这些措施与系统将内地的工厂带往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的家乡。数百个威胁着周遭穆斯林的拘留营授权了物质的发展，而拘留营的存在象征着国家对突厥语族穆斯林生活的控制力。

重要的是，这个系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西北地区，甚至不局限于中国本身。几乎所有由绿叶硕子岛商贸有限公司的新疆卫星工厂生产的手套，都会销往海

---

[24] 喀什地区行署办公室：《喀什地区困难群体就业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 年 8 月 10 日，在线链接：web.archive.org/web/20181204024839/http:/kashi.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2963。

[25] Michel Foucault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London: Penguin.

外。在该公司的阿里巴巴分销网站上，他们的手套价格从每双 1.5 美元到 24 美元不等，取决于购买的款式和数量。有些手套则由香港的高档精品店 Bread n Butter 经销，该精品店在全球各地的商场都有分店，它们的价格可能会更高。毫无疑问，每双手套的售价都比工人从手套中能赚到的钱要高得多。这种剥削系统无疑是一种国家授权的盗窃行为——以慈善的“援疆”话语为借口，通过汉语知识提供的文化资本作为一种馈赠，或者描述成汉族工厂老板的帮助，在被拘留者身上培养“素质”，使得他们成为一名拥有良好纪律的产业工人。[26]

在一篇赞美拘留营工厂制度的文章中，一名伊宁县的官员写道，这些突厥语族穆斯林农牧民来到工厂，“脱下草鞋换上皮鞋，成为现代产业工人”。[27]穿着原始“草鞋”的“落后”少民通过被拘留而获得“工厂纪律”的礼物，这种违背现实的想恰好抓住了国家工作人员与承包商眼中获取“素质”过程的精神。在一段宣传强制就业计划的地方官媒视频中，记者多次提到，突厥语族穆斯林工人在拍摄过程中甚至没有抬头看摄像机的镜头 [28]。记者将此解释为他们优秀职业道德的标志，他们已经通过新培训成为“高素质”工人。管理层也在灌输这种论述，叶尔占与古孜拉都提到，他们的经理会强调这些手套将出口，他们的缝制质量必须要高。。他们接受的“人的素质”培训将反映在他们批量生产的手套的质量上。

引入由国家指导、汉族独占的公司权力，对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的生活施加影响，这加速了工厂劳动跨越种族与阶级差异的异化效应。异化剥夺了工人个体对于自身劳动的所有权，而在这里，则是剥夺穆斯林个人的自主权，这便是再教育工厂的主要特征。再教育产业园的目的就是将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变成一支被牢牢掌控的无产阶级，温顺且具有生产力的新贫民阶级——他们无法得到拥有权利的工人阶级所应得的社会福利。通过将这些被视作不值得法律保护的人口群体转变为永久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国家当局与私营实业家希望让他们为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扩张尽力。这群人正在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积累的殖民边疆——这一过程既是一种新型的种族化资本主义，也是当代定居者

---

[26] 关于西藏的比较研究，见 Emily T. Yeh. 2013. *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7] 《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产业工人: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8] 《州直纺织服装产业敲开群众“就业门”》。

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29]这种受控制的劳动系统由大规模的再教育系统作为载体，这也是一种基础性的国家权力机制，确保这个被拘留的新劳动者阶级无法作为一个阶级而崛起。事实上，由于这种系统身处法外之地，唯一能保护突厥语族穆斯林工人不被剥削或暴力对待的只有他们汉族经理的善意。正如手套厂的工资支付方式，对工人的保护往往被视为对突厥语族工人素质的“投资”，而工人的福利与本土社会关系往往被视为分文不值。

身处全球资本主义之极点

由于这些工厂的功能是再教育营系统的延伸，在法治之外、处于社会契约的边缘地带，工厂经理可以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视作一次性消耗品。2018 年 12 月，工厂管理层威胁古孜拉，如果不签署为期一年的工作合同，就会被送回再教育营。[30]只因为她在哈萨克斯坦的丈夫为她发起了一场争取释放的运动（她成功将工厂照片发送给丈夫，并且丈夫还在国家宣传产业园区的视频中发现了她），地方当局才勉强统一让她回到边境另一侧的家人身旁。他们还试图遏制对“援疆”叙事的挑战。[31]然而，当这些努力失败后，他们才决定止损，放她离开。

在中国之外，几乎没有人为这些被拘留者发声，他们似乎被视为无限动员的“常设后备”。再教育劳动制度的群岛似乎隐于人群的视线之外，如同幽灵般

---

[29] Alyosha Goldstein. 2017. ‘On the Reproduction of Race, Capitalism,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In *Race and Capitalism: Global Territories, Transnational Histories*, Los Angeles, CA: Institute on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at UCLA Luskin, available online at: challengeinequality.luskin.ucla.edu/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18/04/Race-and-Capitalism-digital-volume.pdf; Darren Byler. 2018. ‘Spirit Breaking: Uyghur Dispossession, Culture Work and Terror Capitalism in a Chinese Global Ci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available online at: digital.lib.washington.edu\researchworks\bitstream\handle\1773\42946\Byler_washington_0250E_19242.pdf.

[30] Gene Bunin. 2019. ‘Detainees Are Trickling Out of the Camps.’ *Foreign Policy*, 18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foreignpolicy.com/2019/01/18/detainees-are-trickling-out-of-xinjiangs-camps.

[31] Gene Bunin. 2019. ‘Making the Xinjiang Authorities Dance: 40 Examples of Publicized Cases.’ *Art of Lif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7 May, available online at: livingotherwise.com/2019/05/17/making-xinjiang-authorities-dance-40-examples-generally-positive-outco-mes-publicized-cases.

存于全球供应链的末端。在追求最小成本换取最大生产力的竞争中，伊宁的再教育工厂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之极点。

2019

虽然后殖民时期的香港工会文化相当孱弱，但在 2019 年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修例）运动中，行动者开始要求获得工会代表权并重组了数十个小型工会。在几个月内，这些新工会就成功发动了一次重要的罢工行动，抗议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政府在封锁港陆边境上的无所作为。自从 2020 年 7 月北京当局通过《国安法》以来，局势急转直下。

香港新工会运动的诞生

陈佩华（Anita CHAN）[1]

2019 年中至 2020 年中的一年时间内，国际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了香港动荡的大规模示威和街头暴力事件，在示威活动的高峰期，香港 700 万人口中有 200 万人参加抗议行动，反对一项引渡条例，如果修订草案通过，将意味着香港人可以被引渡到中国受审与监禁。抗议者之间的团结一致令人大感意外，因为在 2014 年的雨伞运动中，失败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政治活动家之间在策略上的分歧。从那时起，民主运动分裂成了数个小团体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其中一个明显的分裂就是激进的年轻一代与温和的老一代泛民人士。

求同存异的运动

2019 年的运动能够超越这些分歧可说是显著的成就。面对一个从特首林郑月娥到亲北京阵营与亲建制精英的共同对立面，，分歧被搁置起来。泛民主运动围绕着三项共识凝聚起来。第一项是无处不在的口号“五项诉求，缺一不可”。这是一套泛化的政治诉求，足以容纳所有政治倾向。

第二项则是基于平等主义原则的共识，体现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口号中。不同的抗议者可以采取他们认为最合适策略以实现运动的广泛目标，同时不批评或干涉他人的行动与策略。我们“齐上齐落”“不分化、不篤灰、不割席”，成功地将抗议运动中的两个关键集团聚集在一起：“勇武派”与“合理非派”。前者主要由学生等青少年人群组成，他们整装待发，愿意与警察正面对抗。后者则是那些不愿或不能参与可能导致直接对抗的人群，他们在后方提供

---

[1] 本文最初以标题 ‘From Unorganised Street Protests to Organising Unions: The Birth of a New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发表于 *Made in China Journal* 5, no. 2 (2020)，后又修订并扩展内容发表于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18, no. 24 (2020).

辅助——物质资源，组织和参与集会，例如“和你 Luch”，筹集资金，加入抗议人链与其他别出心裁的行动。

第三项共识是“无大台”——运动不由一小撮领导者坐在一张桌子旁商定未来的方向。任何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社交平台提出任何的建议与行动。这场运动就在于“be water”（如水聚散）——无计划、不可预测、流动且自发的运动，这是一种城市游击战的战术。同时，由泛民派等成熟组织精心策划的大型集会也受到持续的广泛关注。

香港的工会

长达数月的街头抗争未能使得当局作出任何让步，部分抗议运动转向了更为正式、更有组织的新方向，成立小型独立工会。

2020 年 1 月，笔者在香港花了三周时间来研究这些新的工会。笔者利用午休、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在地铁站外、繁忙的街道路口和医院入口处志愿者设立的几处招聘摊位上进行了采访。笔者还见到了一些工会执行（或筹备）委员会的新委员，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劳动法培训课程，并与专门研究劳工问题的香港学者会面，笔者还采访了香港职工会联盟（HKCTU）——泛民派伞形工会的工作人员。回到澳大利亚后，笔者通过视频通话、社交媒体与香港的媒体了解运动的最新动向。

香港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全球商业中心，工会文化孱弱。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是香港工会联合会（HKFTU），截至 2019 年，共有 191 个分支机构和 426000 名会员。该组织实力雄厚，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大陆政府控制，如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这也是大陆地区唯一合法允许存在的工会。香港工联会的职能与全国总工会相同，更像一个福利组织，为亲北京的会员提供资金和援助。港九工团联合总会（HKTUC）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竞争工会组织，在历史上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有着政治联系，现在已经大幅衰落。

如今，在组织工人、协助他们处理劳资纠纷和争取集体谈判权上最积极的联合会是香港职工会联盟（译按：2021 年 10 月 3 日解散），成立于 1990 年，在撰写本文时，拥有 14.5 万名会员和 93 个附属工会。由于它与任何政党没有直接的联系，得到了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的独立工会认可。它在政治上属

于泛民派阵营。许多新兴工会向香港职工会联盟寻求帮助和建议，但相关领导层拒绝在其中起到领导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被视作干预新兴的自发工运。

从一盘散沙到统一战线

这些新兴工会并非传统工会的产物，而是起源于一场呼吁民主，抵抗大陆对港全面控制的政治运动。起初，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诉求，例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廉价住房或集体谈判权。最早的志愿组织者来自金融、会计、保健、社会工作和教育等行业，其中一些人是护士、医生、医护人员和记者，他们在街头抗争的前线提供服务，多次目睹抗议者遭警察殴打而受伤，他们自己有时也会因为试图帮助伤者而遭到催泪弹、胡椒喷雾的袭击与警察的殴打。

最初有两股动力推动了这些新工会的形成。一是希望举行总罢工，二是希望参与选举政治。罢工的呼吁来自学生，他们对“be water”式的街头抗争没能使得香港政府作出让步而感到失望，2019 年 8 月初，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全香港进行“三罢”，即“罢工、罢课、罢市”。8 月 5 日，选定的罢工日当天，约有 60 万人在香港不同地区参加集会。支持者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为期一天的罢工，要么不上班，要么请病假。在集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首次按职业或行业自我组织起来。

9 月宣布第二次“三罢”后，只有 4 万人参与集会。对雇主报复的担忧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同时，参与者开始以“界别”组织自己，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提出要成立新工会。不过，与会者讨论建立一种保护自己免受管理层骚扰与报复的手段。“跨界别斗争预备组” 由此成立，并初步讨论了组建工会的问题。

10 月底，一名大学生在一栋多层停车场中坠落身亡（译按：周梓乐堕楼事件），死因存疑，愤怒的行动者要求再次举行总罢工。香港各地区都张贴起海报，其中一张引人注目的海报写着：“我可以为你上前线挡子弹，你愿意罢工表达诉求吗？” 第三次“三罢”斗争最终于 11 月 11 日在香港多个地区举行，以道路堵塞和暴力结束。

当时，一个名为“二百万三罢联合阵线”的新伞形组织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组建工会的新闻，并分享可用的策略。他们认为，必须要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更好的罢工。该组织迅速发展成香港新兴劳工运动的伞形组织，首要的

任务就是招募更多成员。为了吸引公众关注，工会活动者设立了“联合跨站”，让每个站点都升起自己工会的旗帜。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的大规模集会上，一面印有“工会抗暴政”的横幅后，几十面工会旗帜冉冉升起。

由于大多数新工会的创始成员对工作场所权利、工会主义或劳动法等概念了解甚少，他们邀请了劳工律师和香港职工会联盟的工作人员举办研讨会和培训课程，并开始向政府申请登记成立工会。渐渐地，成立工会的动机变得多样化，而不是一味地支持政治罢工。工会的传单很快就包括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奖金合理分配以及集体谈判权。

第二股动力是激励香港的选举政治。2019 年 11 月底，泛民派在区议会选举中意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香港 18 个区议会中 17 个区议会的多数席位。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并暗示了泛民派候选人有可能在未来两次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可能性。香港立法会选举定于 2020 年 9 月举行，此次选举中，一半的立法会席位由政府控制，而另一半（35 个席位）则由选民通过“功能界别”投票决定。第二次选举，预计将于 2021 年 6 月举行，以选出选举特首的选举委员会。

在立法会选举中，工会“功能界别”被分配了三十五个“地区直选”席位中的三个。根据“赢家通吃”原则，每个注册工会将被授予一张选票。这意味着抗议运动所能召集的工会数量越多，赢得这三个席位的机会就越大。2019 年之前，亲北京的工联会主导着这个界别。泛民派的香港职工会联盟没有资源去竞争注册这么多的工会，他们更愿意优先考虑工作场所的劳工权利问题。对于新兴工会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增加注册工会数量与扩大工会会员数量是紧迫的任务。幸运的是，在香港注册新工会的程序很简单。最低要求是有七个人到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按行业、部门或职业注册一个新工会。这七个创始组织人必须填写表格，说明新工会的任务。官方批准通常需要一到两个月，一旦获得批准，创始人必须召开大会，选举出一个执行委员会。然后新工会就正式注册在案了。这种注册的便利性解释了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内会涌现出无数支持抗议的新工会。事实上，有些行动者发起了一个名为“7UP”的团体，呼吁那些能够召集 7 个人的人申请成立工会。香港与中国政府过于自信，认为亲北京阵营将继续垄断注册工会的局面，因为香港人从没有表现过对加入工会的兴趣。在注册工会的竞赛中，建制派也试图成立更多的新工会。

对工会团结的考验

2020 年 1 月底，新的问题摆上台面：抗议活动中涌现的新工会能否经受住政治和管理的压力。当时，COVID-19 在大陆境内迅速蔓延，并通过边境上许多漏洞百出的入境点迅速渗透到香港。香港没有抵御疫情准备，医院缺乏床位、个人防护设备与医务人员。新成立的医管局员工阵线（译按：2022 年 6 月 30 日解散）一直在积极招募新会员。当时，香港 8 万名医疗卫生人员中已有 1.8 万名工会会员。出于对自身和公共安全的考虑，医管局员工阵线呼吁政府封锁边界——这是一项针对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合法要求，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2020 年 1 月 31 日，林郑月娥拒绝关闭边境，认为这意味着歧视大陆公民。医管局员工阵线执行委员会的年轻主席余慧明提议进行两阶段的罢工——她曾公开承认，六个月前的自己只关心如何享受美好的生活，对工会一无所知。2 月 2 日，罢工提议在 3164 张投票中获得 3123 张赞成票，成功通过。约 7000 名成员（占香港医疗部门的 17%）参加了第二天的罢工，超过 50 个工会宣布支持罢工。同一天，林郑月娥宣布，除三个边境口岸外，其他口岸将被关闭。但她拒绝进一步退让。

当第一阶段的罢工在五天后结束时，医管局员工阵线要求进行第二次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罢工。对于医务人员来说、罢工必然会引起强烈的道德难题。在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后，60%的参与者投了反对票。罢工在第一阶段的成功后被取消了。工会领导人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能力，他们能够在疫情前夕的关键时刻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全市泛民阵营工运。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由新一代的工会领导人带领，他们必须挑战一个顽固的政府。

关闭大部分边境口岸后，香港得以控制新冠疫情。由于社交距离规定的确立，且警察的镇压有增无减，城市的街头抗争持续减少。在这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新工会优先考虑三项紧迫的任务。第一项是继续建立街头站点，冒着被警察和建制派骚扰的风险招募会员。第二项，工作场所的打压加剧，工会需要为被建制派经理与主管厌恶的行动者提供建议与帮助。第三项，制定选举战略，准备在 2020 年 9 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与工联会抗衡。

新兴工会与泛民派的“初选”

七十个立法会席位中，泛民派候选人希望在功能界别的席位上获得合理的份额，这取决于运动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倾向是否能够协调，以便他们的候选人不会在同一选区内相互竞争，从而减少他们击败建制派候选人的机会。这就需要在阵营内部进行初选，大家同意基于抗议运动来组织。各团体达成协议，五个选区中每个选区获得最高票数的前五名候选人将成为 9 月选举的泛民派候选人。在初选中落败的人将承诺接受失败并撤回他们的候选人资格。

香港当局警告，他们的初选将被视为非法行为，后果严重。余慧明与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儿分别作为工会部门的候选人参与初选。警察在全市范围内对投票站工作人员进行骚扰。但组织者没有理会威胁，并按计划于 7 月 11 日和 7 月 12 日举行初选。60 万人无视政府的警告，在炎炎夏日中耐心排队投票。结果是勇武派的年轻运动者赢得了一场一场大胜，他们在五个选区中获得了最高的票数。

这不仅是对泛民阵营大规模支持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对勇武派的信任。余慧明在 2856 张选票中获得了 2165 张，而现任卫生服务界议员只有 186 张。她在二月罢工中表现出的勇敢与领导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吴敏儿在其选区中排名第七，这反映了香港泛民派工会运动的新发展——捍卫者成为了更年轻、经验不足、却有决心守然诺的一代人。初选的高投票率是对亲北京阵营的一个警告，它很可能在 9 月的选举中失败。

就在几天内，16 名获选的年轻候选人组成了一个名为“抗争派”的选举团体，其中就有余慧明。但不久之后，他们的候选人资格和四名现任议员的选举资格被政府接连取消，因为他们反对《国家安全法》。甚至就在一天后，政府宣布将 9 月的立法会选举推迟至 2021 年，理由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措施。抗议者强烈怀疑推迟选举的真正原因是政府认为他们会输掉选举。

清算

2020 年春末，就在工会准备举行初选的时候，北京计划通过《国家安全法》以镇压香港的反对派，这一点已为公众所知。2020 年 6 月，随着草案几乎准备就绪，新工会不得不制定战略，应对迫在眉睫的镇压。工会没有被威胁吓退，

他们决定在 6 月 20 日组织大罢工，反对《国安法》立法。这次罢工与前三次不同，几乎完全由工会组织。三十个工会将征求会员同意，在工会内就是否参与罢工进行了一次公投，罢工的口号是：“光复香港，加入工会；工会革命，对抗暴政”。然而，罢工并没有实现。因为只有 9000 名工会会员投票，尽管其中 95%的人投票支持罢工。

2020 年 7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国家安全法》。该法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定为犯罪。香港《国安法》通过的那一刻，对工会的清算开始了。在工作场所，报复包括黑名单、降职、处罚、孤立与解雇。在公务员系统或政府资助、补贴行业中的工人更容易被伤害。新入职的公务员必须要宣誓维护《基本法》，宣誓效忠于香港政府。拒绝签署的人将不被聘用，甚至会被认为是颠覆分子。已受雇的公务员也必须宣誓。

在卫生部门，医院管理局于 10 月向在 2 月罢工期间离岗的人员发出信件，要求他们解释原因。余慧明急忙通知会员在工会征求法律意见之前不要回复。同时，工会组织了一份由 5000 名会员签署的请愿书，主张医疗罢工合法合规。并要求政府部门与工会会面。请愿书被亲自提交给局长，以强调行动的合法性。

笔者与香港的消息人士沟通，并阅读了抗议者在网络媒体上的讯息。很多证据显示，各个行业中有相当数量的工会会员感到害怕，孤立无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跨过了红线，不清楚该如何在紧缩的工作场所文化中采取行动，或是如何昧着良心对香港与中国政府宣誓效忠。

目前，建制派的统治精英正忙于推出打压泛民运动的措施。新工会的前景并不乐观。虽然注销或打压泛民派工会的行动还没开始，但他们通过机构渠道发出的声音已经被压制。2020 年 11 月，通过操纵劳工顾问委员会[2]的选举，所有五个席位都被亲建制的工会垄断。2021 年 3 月，47 名泛民派初选候选人被捕，其中一些人已因其他指控而入狱，被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中包括余慧明和吴敏儿。“二百万三罢联合阵线”继续提供着在线平台，维持运动的凝聚。很明显，一些新兴工会成员确实士气低落。仍有人决心继续前进，但是，就目前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泛民主阵营应该低调行事，待时而发。

[2] 原文为 Labour Consultative Committee，与劳顾委的 Labour Advisory Board 不符，尽管未能查到相关新闻，但根据时间、人数等数据判断，至少在段落中应是如此。——译者注。

未来

本书的结尾正如其开头，是对中国科幻小说家所设想之未来劳动的一瞥。如果说 20 世纪以乌托邦式的希望开场——机械人会解放工人，让他们得以享有普遍的闲暇。那么，今日的气氛则要黯淡得多。随着社会主义试验在中国等全球各地的推进，曾经的愿景已经破灭，技术进步并不能解放工人，反而为雇主提供了新的方式监管并鞭策工人努力工作，人们对一个似乎要走向反乌托邦的未来感到恐惧。如今，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分解为原子化的单位，要么是在办公隔间、要么是在各自的空间中工作，要么开着车在路上四处奔波完成最新的订单，他们的阶级身份与人性都岌岌可危。成立已有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声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断吹嘘着自身的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但今日之中国工人与其他地方的工人并无二致，面临着相同乃至更糟的挑战。党和国家垄断着中国工人的代表权，并对任何试图像一个世纪前早期共产主义积极分子那样——引导工人意识，提高工人自豪感、团结感的组织或个人，发动严厉打击，这确实令人绝望。然而，如果说我们从这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劳工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无论境况多么严峻、政治形势如何绝望，中国的工人与行动者仍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尽管中国的无产阶级形象可能已被掩盖，但其未来的形式才刚开始显现。

折叠时间：对当代中国阶级分化的未来主义思考

罗鹏（Carlos Rojas）

2011 年，电视连续剧《宫》火爆荧屏，该剧讲述了一名当代女性穿越时间回到过去，与两位清朝皇子陷入三角恋的故事。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之后发布指示，认为像《宫》这样的穿越（时间旅行类）作品“随意编纂神话故事，情节怪异离奇，手法荒诞，甚至渲染封建迷信、宿命论和轮回转世”，“希望端正创作思想”。[1]许多西方媒体兴致冲冲地报道称，中国直接禁止了时间旅行类作品，但实际上，广电总局的指示只是针对时间旅行作品中一个具体子类型的“建议”——“穿越”。[2]这类作品通常是现代人穿越到中国过去的朝代；这一“建议”反映出某种担忧，即这类作品可能会引起对中国“架空”历史的思考，而这是党和国家所不容的。[3]

可以发现，与西方科幻小说中的现代人穿越到未来的作品不同，中国的时间旅行作品往往是现代人穿越到过去。然而，中国也存在着畅想未来的推想小说（SF）的重要传统（见本书中的克雷格 · A · 史密斯的文章）。例如，1902 年，政治改革家梁启超开始连载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故事发生在 1962 年，中国已经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刚被公认为全球超级大国中重要的一极。[4]

---

[1] 《广电总局关于 2011 年 3 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式的通知》，2011 年 3 月 31 日，在线链接：gov.cn/gzdt/2011-03/31/content_1835644.htm。

[2] Erica Ho. 2011. ‘China Decides to Ban Time Travel.’ *TIME*, 13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techland.time.com/2011/04/13/china-decides-to-ban-time-travel; Richard Hartley-Parkinson. 2011. ‘Great Scott! China Bans Films and TV Shows Featuring Time Travel (Just in Case Anyone Wants to Rewrite History).’ *Daily Mail*, 15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376771/Great-Scott-China-bans-time-travel-cinema-TV.html.

[3] Jin Feng offer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is literary subgenre in *Romancing the Internet: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Chinese Web Romance.* Leiden: Brill (2013).

[4] 小说中自称的时间点是“孔子降生后 2513 年，即西历 2062 年”，假设小说中根据孔子的生辰描述的时间准确，那应该是 1962 年。可在维基中阅读原文：zh.wikisource.org/wiki/新中國未來記。

梁启超的小说没有写完，前几回与其说是关注 1962 年中国的状况，不如说是关注自 1912 年改革运动以来 50 年间国家的发展。巧合的是，1912 年恰恰是中国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第一年，而共和后的第五十年算不上一个值得庆贺的年份，1962 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这是由大跃进（1958—1962 年）所导致的饥荒灾难，而“大跃进”曾试图推动国家经济，迅速赶超英美等世界大国。

北京折叠

与此同时，就在 2012 年 12 月——梁启超开始连载《新中国未来记》的九十年后，广电总局于发出 2011 年拍摄指示的几个月后，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生郝景芳在三天的奋笔疾书中写了一部名为《北京折叠》的未来主义中篇小说。[5]虽然这并不是一部传统的时间旅行小说，但这本书具有一种创新的设想，在根本上重新构想了中国城市社会的时空结构。[6]

尤其是，郝景芳的中篇小说设定在一个比今天还要繁荣的未来中国，它描述了在小说未来主义背景的五十年前，北京被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空间”，每个空间分配给不同的居民阶层。小说解释道：

> 折叠城市分三层空间。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
>
> 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

---

[5] Hao Jingfang (translated by Ken Liu). 2015. ‘Folding Beijing.’ *Uncanny Magazine*, available online at: uncannymagazine.com/article/folding-beijing-2/.

关于《北京折叠》的原文，可以自行在网络上搜索，某些盗版小说网站有收录，或是在 Z-Library 中搜索，还有中英对照版。微信读书、豆瓣阅读等在线阅读软件均有收录。——译者注。

[6] 2013 年 12 月，郝景芳写完这部中篇小说后，发布于一处学生网站（即水木社区）。两年后的 2014 年，小说在一家中文刊物上正式发表。刘宇昆的英译本于 2015 年首次发表于 *Uncanny: A Magazine of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再版于 2016 年刘宇昆主编的 *Invisible Planet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ranslation*. London: Head of Zeus.

> 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

每一组人被允许进入城市的期间，另外两组人藏于地下，进入休眠状态。如此划分的结果是，北京的少数人能够控制着城市的绝大多数财富和资源，乃至城市的时间-空间结构。

《北京折叠》的情节围绕着北京第三空间的居民老刀展开，老刀是个单身父亲，在第三空间当垃圾收集工，在小说的开头，他接受了一项任务，（非法地）向第一空间的收件人送一样东西，然后将回信带回第三空间。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老刀试图通过城市结构转换时出现的裂隙，完成任务后利用同样的方式回到第三空间。[7]

在抵达第一空间并递交东西后，老刀被几个巡逻的机器人扣住，并确认在第一空间的居民数据库中没有相关记录。老刀被带走接受审问，但最终移交给了一位叫老葛的年长者。原来，老葛也来自第三空间，但在折叠城市系统建立后不久，他得到机会转业到第一空间，最终“能管点事儿”。老葛把老刀当作朋友，并向他解释了这座城市经济体系所依据的逻辑。他指出，技术发展使得许多经济部门的自动化成为可能，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进而导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以前规模化的低工资劳动力。老葛接着解释，欧洲与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欧洲“强行减少每人工作时间，增加就业机会”，而中国“彻底减少一些人的生活时间，再给他们找到活儿干”。结果就是“折叠北京”，在北京的八千万居民中，五千万人每四十八小时只有十个小时“活着”，其中有五分之三的人是垃圾工——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琐碎工作，但这是让他们（底层居民）“有活儿干”的必要手段。[8]

---

[7] 作者在这里的讲述有两处错误，第一、老刀是垃圾处理工而非收集工（collector）；第二、回信是被带往第二空间。前者应该是作者的理解错误，刘宇昆译文中对老刀职业的称呼是“waste worker”，工作地点在“waste processing station”；后者可能是对“壹”中某一段的误解。——译者注。

[8] 十个小时应为八个小时，即夜晚十点至清晨六点；五分之三应为五分之二，即两千万垃圾工。——译者注。

对当代社会的批判

郝景芳通过她的小说，来评论中国经济爆炸式增长与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当代现象。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生产力与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国家的基尼系数也相应提高，因为大部分新创收的财富流向了相对较少的人口群体。[9]与当代的其他中国大城市类似，北京涌入了大量底层流动人口，他们被城市中所能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所吸引。例如，根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报告，郝景芳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北京有近 900 万的流动人口，几乎占城市约两千万总人口的一半。[10]由于毛泽东时代的户口制度仍然存在，大多数流动人口被迫生活在缺乏保障的条件下，几乎处于中国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同时，北京（以及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严重依赖于廉价的流动人口，但城市又将他们系统性地定义为非法的入侵者。

郝景芳写下她的小说以来，北京当局一直在努力限制城市的总人口增长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相对比例。例如，2013 年底，北京宣布将于 2014 年开始“坚决”遏制人口增长，2015 年，北京将 2020 年的人口目标从 1800 万提高至 2300 万。[11]2017 年底，北京以改善公共安全为名（当年 11 月，北京城南的流动人口居住区发生火灾，导致 19 人死亡），发起了一项行动，摧毁了许多流动人口居住的棚户区。[12]

---

[9] 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不到 0.3，上升到 2012 年的略低于 0.5，高于世界上除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外的所有国家。See Terry Sicula. 2013. ‘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 *Inequality in Focus* 2, no. 2 (August). Washington, DC: Poverty Reduction and Equity Department, The World Bank, available online at: 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Poverty%20documents/Inequality-In-Focus-0813.pdf; Gabriel Wildau and Tom Mitchell. 2016.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World’s Worst.’ *Financial Times*, 14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www.ft.com/content/3c521faa-baa6-11e5-a7cc-280dfe875e28.

[10] Zai Liang, Zhen Li and Zhongdong Ma. 2014.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0–201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 no. 4: 695–716.

[11] Jiang Jie. 2013. ‘Beijing to Curb Population in 2014.’ *Global Times*, 24 Dec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www.globaltimes.cn/content/833787.shtml; Shaoyuan Chen, Ziyi Huang and Rongde Li. 2016. ‘Beijing’s Push to Curb Population Growth Hits Snag.’ *Caixin*, 24 Nov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caixinglobal.com/2016-11-24/beijings-push-to-curb-population-growth-hits-snag-101018871.html.

[12] Jiani Song, Shuchi Zhang and Qiaochu Li. 2018. ‘Beijing Evictions, a Winter’s Tale.’ *Made in China Journal* 3, no. 1: 28–33.

这些系统性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所造成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根据联合国附属机构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农民工平均幸福指数不仅低于城市出生的居民，还低于留在农村的农村居民。[13]为什么中国城市农民工的幸福度比城市户口与农村的同龄人都要低？报告作者考虑了多种可能的解释，并得出结论，三种最有可能的解释“都涉及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错误预期：潜在的农民工对城市条件可能对城市的生活条件、自我对城市的愿景以及自身状况抱有错误的期望”。简而言之，作者的结论是，农民工可能“对城市生活过于乐观”。[14]

这里描述的情况类似于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所说的“残酷的乐观主义”，即“你欲望的东西实际上是你成功的障碍”。[15]正因农民工对未来可能的期望过高，所以他们在尝试改善当前状况（尤其是提高总体幸福感）时受到了阻碍。

认清现实

而在郝景芳的这篇小说中，老刀与第三空间中的居民严格来讲不是农民工，但在结构上却像当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农民工那样，被限制在琐碎的低薪工作。然而，一处关键的区别在于，老刀似乎没有特别不满，而是顺从于他的命运：

> 他是个垃圾工，做了二十八年垃圾工，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一直做下去。他还没找到可以独自生存的意义和最后的怀疑主义。他仍然在卑微生活的间隙占据一席。

事实上，即使老刀多次前往第一空间，似乎也并未激发他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处境的欲望，而只是接受些任务赚取外快，以供养女的幼儿园费用。

这里指的是 2017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大兴区的火灾，以及自 11 月 20 日起，北京市开展的安全隐患排查行动。——译者注。

[13] John Knight and Ramani Gunatilaka. 2018.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Happiness in China.’ In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 edited by John F. Helliwell, Richard Layard and Jeffrey D. Sachs. New York, N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66–88.

[14] Ibid., 83.

[15] Lauren Berlant.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

在《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提名后的一次采访中，郝景芳表示她没有选择描述一个由愤怒与反叛驱动的社群，理由是“政治性反叛是 SF（科幻小说）中老套的主题”。[16]相反，她想写的故事中，经济不平等只是生活的诸种现实之一：

> 在我的故事中，社会的不公只是背景之一，而非某个群体的特征。故事世界就是不公正的，但没有个体是不公正的源头，每个人只是扮演着一个角色。就像一群演员在一个倾斜的舞台上表演几幕戏剧，他们痛苦、庆贺、愤怒、欢呼，但并不对抗舞台的倾斜本质，这只有观众才会感知到。读者独立于故事之外存在，世界的不公是为读者揭示的，而不是为了人物。人物更关心他们周遭触手可及的日常事件：家庭、爱情、权力与财富，而读者可以看到他们所处世界根本上的不公正。
>
> 我选择这种写作方式，是因为我想反思我们的现实。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充满跌宕起伏的故事，但很少有人会追问他们的故事如何揭示世界的结构。大多数人只关心他们个人生活的细节：家庭、爱情、权力与财富，很少有人审视整个世界的框架。当然，现实世界的结构同样不公正且不公平，就像故事中的世界那样，真实的社会金字塔可能比我在故事中所描绘的更加极端。只有能够以读者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人，站在个体情感体验之外的人，才能察觉到这种结构性的框架。而我，想揭示这个角度。[17]

尽管郝景芳暗示“真实的社会金字塔可能比我在故事中所描绘的更加极端”，但她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我们所见到的当代中国社会更为黑暗——因为故事中的人们更乐观，鲜少受愤怒驱动。

正如上文引用的幸福感研究中一处奇怪的结果是，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低于城市居民，也明显低于留在农村的农村居民。后一组人的人均收入比前两组人要低，为什么他们却最幸福？答案的一部分在于，幸福感往往与环境相关，农村居民与城市农民工在物理上相隔甚远，因此更容易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

---

[16] Deborah Stanish (translated by Ken Liu). 2015. ‘Interview: Hao Jingfang.’ *Uncanny Magazine*, available online at: uncannymagazine.com/article/interview-hao-jingfang.

译者没找到中译文，文中引用均由译者翻译。——译者注。

[17] Ibid.

到满足，即使他们拥有的比城市农民工的要少。而在《北京折叠》中，郝景芳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底层劳动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与富裕的居民几乎是隔绝的，如同他们身处农村般。如此，城市不断变化的物理形态使得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这对毛泽东主义拒绝屈服于旧社会“听天由命”的意识形态机制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颠覆。

梦想折叠

巧合的是，就在郝景芳创作《北京折叠》的几周前，刚刚就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将被任命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 29 日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中国梦”概念。作为对“美国梦”概念的挪用，习近平的“中国梦”概念将个人抱负与国家目标联系在一起，暗示年轻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同时也能帮助建设国家。而《北京折叠》中某种黑暗的暗示是，北京“折叠的”城市结构将重新校准个人抱负与国家愿景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降低了贝兰特所描述的“残酷的乐观主义”的可能性，也削弱了可能挑战社会高度分层结构的各种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或郝景芳所称的“反叛”）的可能性。

情感谬误

陈楸帆

陈楸帆生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他在距离被称作“世界电子垃圾之都”的贵屿镇不远的地方长大。贵屿镇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地，而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自身就已是国际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地，贵屿每周都会接受数百辆卡车的电子垃圾——大部分由人工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分类与分解，到了 10 年代初，城镇的空气、土壤和水源都已受到危险的污染，很多居民患上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2013 年，陈楸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荒潮》，他将作品设定在未来主义的贵屿镇——小说将镇名的第一个字改成了同音字“硅”，在字义上从“贵岛”成了“硅岛”。[1]作为对“硅谷”的双关和讽刺，陈楸帆虚构的“硅屿”是一处反乌托邦未来主义场所，电子产品不再凭其计算能力（就像硅谷那样），而是凭其所蕴含的矿产资源来创造利润。

2006 年，陈楸帆大学毕业后不久在深圳工作，写下了他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丽江的鱼儿们》。[2]故事的标题指向了云南的一座乡间小镇，并假定主人公这样的工人会去那里疗养——但事实证明，这更是为了对他们调拨生物钟，人为对其放慢或加快（借用故事的术语，是“凝缩”或“延宕”），来帮助实现工人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此外，整座小镇被揭示为一个精心设计的拟像——一座真实村镇的精确复现，旨在引起城市游客的积极情感反应。

---

[1] Chen Qiufan (translated by Ken Liu). 2019. *The Waste Tide*. New York, NY: Tor Books. 巧合的是，也是在 2013 年，广东省政府批准了一项计划，将贵屿所有的电子垃圾回收服务转移到教区一个郊区一个专门设计的产业园，以便更有效地规范提炼和回收过程。

[2] Chen Qiufan (translated by Ken Liu). 2011. ‘The Fish of Lijiang.’ *Clarkesworld Magazine* 59, available online at: clarkesworldmagazine.com/chen_08_11.

中文版链接：https://www.douban.com/note/332344173。——译者注。

2017 年，陈楸帆辞去了他在科技行业的工作（此前他受雇于几家公司，包括中国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与一家初创的虚拟现实公司），专心从事写作，而他的短篇小说《情感谬误》正是建立在他最近对人工智能产生的兴趣之上。[3]小说标题借用了 20 世纪中期颇具影响力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运动，新批评派的一个术语，这个词曾用来批评那种根据读者的情感反应来评价文学作品的做法，但在小说中，这个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未来主义的黑客攻击，试图通过破坏人们的情感来降低人们的工作效率。

《情感谬误》的未来主义背景是一个由人工智能系统和虚拟环境主导的世界，然而作品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不同形式的“非物质劳动”，尤其是情感劳动。女主角被选中担任“情绪标注员”，因为“在中国，女性普遍被认为比男性更细腻、更敏感、更能够捕捉他人的情绪变化并加以辨识，这代表着高度进化的同理心”。后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女主角的情绪标注工作开始过时，她被赋予了一项新任务，这个任务不再关注于识别情绪，而是让他人产生情绪。因此，她的新工作成为信息经济中情感劳动日益重要的典型例证。

事实上，迈克尔 · 哈特（Michael Hardt）就曾认为，“作为非物质劳动的组成部分，情感劳动在当代信息经济中取得了最高价值的支配地位。”[4]哈特指出，在我们社会中的情感劳动往往与女性气质紧密相连，这有着进一步强化性别本质化观点的风险。然而，他还指出，情感劳动在本质上具有生产性：“它生产主体性，生产社会，生产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情感劳动是本体论的——它揭示了构成一种生命形式的‘活劳动’，从而再次展演了生命政治的生产性潜力。”[5]而在《情感谬误》中，陈楸帆所要探讨的正是情感劳动的这种深度性别化以及本质上的生产性的一面。

罗鹏（Carlos Rojas）

[3] 这篇短篇小说写于 2019 年，中文版即将出版。陈楸帆近期关于人工智能的作品，见 Kai-fu Lee and Chen Qiufan. 2021. *AI 2041: Ten Visions for Our Future*. London: Ebury Publishing.

[4] Michael Hardt. 1999.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26, no. 2: 90–100.

[5] Ibid., 99.

关于文山苗寨的历史，一直以来有两个传说。

一则说这里的苗人与先祖蚩尤血缘最接近最纯正；二则说这里曾通往旧时法属殖民地——越南，也是丝绸之路、鸦片战争、抗法战争的交通要道，如今居住此地的苗人，实乃越战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资助的老挝苗族游击队后裔，老挝秘密战争失败后为躲避杀戮，一路逃亡流落至此。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传说，无论哪个更不可信，只要能够带来游客，便值得被以各种形式反复传颂，无论是从导游之口、苗绣纪念品手袋、定时歌舞表演还是游客中心的动画短片。

无论哪个传说都无法改变游客日益稀少的状况。尽管文山上的树依然那么绿，山花开得依然那么鲜艳，踩堂舞依然那么震慑人心，过去几年间，旅游业已经丧失了文山的支柱产业地位。本地女性不得不摘下头上的银饰，脱掉绣着各色图腾和祖先形象的苗服盛装，寻找另一份工作机会。

在中国，女性普遍被认为比男性更细腻、更敏感、更能够捕捉他人的情绪变化并加以辨识，这代表着高度进化的同理心。心心科技接受了这一假设，选择全部雇佣女性员工来作为情绪标注员。她们经过培训之后上岗，作为 AI 情感计算系统的人类助手。系统需要大量的数据包来训练它的算法模型，但不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人类大脑处理加工过的标注数据，它能帮助机器穿透不同年龄、性别、种族、面貌等外在差异，更好地理解人类情绪的本质特征。

类似的标注车间在全国有成千上万个，它们服务于不同的 AI 系统，处理的数据涵盖方方面面，从文本、语音、视频到更为复杂的交互游戏。依靠这样的车间解决就业问题，支撑经济收入的村子被称为“AI 村”，尽管字面意义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每个女工每小时能从中获得十几到几十元不等的收入，取决

于她们操作的熟练程度，这种水平和城市白领相比也许不算什么，但比起在农田里劳作或是找不到工作还是要好上太多了。

像其他小姐妹一样，杨笑笑从绿色山丘般的家，走进“心心科技”的情感标注车间，成为一名标注女工。

车间里宽敞明亮，每个人面前竖着一块超薄曲面屏幕，正好围挡住标注员的整个视角。她们戴着耳机以避免周围干扰，系统自动分配的媒体数据不断流出，红色方框跃动在画面中的人脸上。

尽管这里的一切也是由太阳能驱动的，可不知道为什么，笑笑总是觉得在这里待久了会有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在苗族人的理论中，来自太阳的能量是最干净的，也是对人的健康最有益的，其次是风电和水电，然后才是火电和核能。妈妈让笑笑把绿色盆栽带进车间，说这样能促进能量的流动，可是公司不让这么做。

笑笑双手在快捷键盘上飞快地操作着，左手选择情绪类别，右手标注 1-10 的情绪强度，快乐 3、悲伤 5、愤怒 7……有时候，她的脸上会闪现出与标注对象脸上相同的表情。这也是为什么心心公司选择女孩而不是男孩作为情绪标注员的原因。

杨笑笑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眼前不断闪现幽灵般的各种人脸，屏幕上方的工作量数字飞速跳动，但她关心的却是系统时钟。

她有一个约会，就在今晚。

“心心”是一个在线约会软件。和其他约会软件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调用云端 AI 的情感计算 API 接口，更好地帮助用户理解约会对象的情绪变化，以提高成功率。

这年头，线上约会变成一件微妙的事情。一方面，似乎网络可以跨越所有的界限，将不同地域、文化、语言、阶层的个体连接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个体之间似乎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情绪处理与反应模式，让人心变得更加难懂，隔阂重重。

笑笑就是在“心心”上认识的 Simon Zhu，一个住在上海的城市男孩。

在她的想象中，上海是一座未来之城，五光十色的电子屏幕漂浮在街道两边，打扮入时的行人像机器一样面无表情，孤魂野鬼般游荡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间，植物和动物都只能在规定好的缝隙里生长，像是被切断了与太阳的能量脐带。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一个上海男孩进行线上约会，他们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可没想到是 Simon 先关注的笑笑，他说因为她的少数民族名字和增强现实头饰让人觉得很特别，不像那些千篇一律的网红脸。Simon 的话经常让人听不懂，笑笑只能通过情绪识别功能大概猜测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感觉。

笑笑在“心心”上用的名字是“夸叶笑笑”。“夸叶”是她的苗族姓氏，所以其实这才是她的真名，可在现实里却没什么机会用。包括她的增强现实苗族头饰，也是自己制作上传的，虚拟道具提供商似乎完全忽略了少数民族的需求。

今晚是两人在“心心”上相识一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大部分的在线约会都撑不过一个星期。而在相识满月时，许多人会选择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庆祝，那就是一起关闭通过算法对人像加以美化处理的增强现实滤镜，将真实面目暴露在对方面前。“摘滤镜”的仪式代表着双方关系进入下一个阶段，当然也可能意味着关系的结束。

蚩尤在上，笑笑对自己的相貌还是有一定信心的，这让她更加渴盼今晚。

约定好的上线时间就快到了，可新的任务还在不断地涌进来。笑笑加快了标注速度，几乎达到了人类的极限，当然准确率难免有所下降，可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系统还会派发给其他女工进行交叉审核。

工作量显示来到了最后一组数据，一个男孩站在一座寺庙前，红色方框叠加在他略微低下的脸上，笑笑几乎是同时按下了“快乐”和“4”，屏幕回归到蓝色的初始界面。忙碌的一天又过去了。

以电力驱动的高速列车行驶在绿色的山峦间，笑笑的脸倒映在车窗上，露出了放松的笑容。

这些“山”其实一细看，许多都是临近的农村建筑，只不过在外立面、天台等原本被浪费的表面，全都种上了绿色的植被。这源于意大利的垂直森林设

计理念，不仅能够吸附空气中的灰尘，制造氧气，还能降低城镇的平均气温，隔绝噪音，增加生物多样性，为鸟类、昆虫和各种小动物创造生活空间。

这可比 Simon 待着的上海强太多了。笑笑心想。大城市那么挤，那么脏，还都是灰蒙蒙的，我可不愿意去那样的地方。

高速列车带着一颗雀跃的心来到了大神庙站。

在苗神庙前，笑笑打开了面罩上的“心心”应用。

这里供奉着枫木雕成的蚩尤神像，牛首人身，四目六手，每只手里拿着不同的冷兵器，在夜色中分外威武慑人。

传说中，蚩尤是与炎帝、黄帝并列的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五六千年前，炎帝与黄帝联合战败了蚩尤，蚩尤的九黎集团战败后大部分向南流徙，后来发展为西南的少数民族，其中最兴盛的一支便是苗族。

笑笑有时会想，那两则传说之间还是有共同点的，无论选择相信哪一种，我们都是失败者的后代。

Simon 在这之前已经呼叫过笑笑好几次，笑笑赶紧回拨，信号通了，手机屏幕在空中投出缩小版的全息半身像，增强现实滤镜下的 Simon 依然帅气时尚。

“对不起，我迟到了，活儿太多了干不完。”

“没关系，我也刚到，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笑笑看到 Simon 脸上飘着“期待 5”的标注，心里泛起一丝甜蜜。她微笑着点点头，Simon 却像没看见一样，甚至皱起眉头。

“如果你还没准备好，那我们也可以不这么做，毕竟你知道，这有一定的风险……”

“我准备好了啊，随时可以开始。”

“可是……”

“可是什么？”

“你的表情显示犹豫 4，不安 3……”

“怎么可能，肯定是搞错了，我超开心的。”笑笑努力把自己的笑脸咧得更明显。

“现在又变了，变成了害怕 6。笑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我真的没有，Simon，肯定是系统出了问题，要不然我现在就把滤镜摘下来给你看？”

“不，别，让我想想……”

笑笑看见 Simon 的脸上出现了“怀疑 4”和“不快 3”的表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Simon，你在怀疑我？”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机器不会撒谎。”

气氛一下子凝滞了。笑笑不用看也知道，自己脸上肯定挂着“失望 10”的表情。她尝试再解释点什么，却发现信息发送失败。Simon 拉黑了她。这时“失望”变成了“愤怒”，笑笑的增强现实化身变成了战神蚩尤的形象，头戴牛角，挥舞着长矛和利剑，浑身散发着血红的火光。

你有这么多强大的武器，可你还是输了……

笑笑心里默念道，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怒火渐渐散去，只是觉得心碎。

她突然想起了“慧师”，负责管理标注女工的 AI 程序，平常有什么疑惑都可以从她那里得到解答，她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或许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人正在向慧师同时提问，但笑笑还是一下子就接通了慧师的频道。

一身白色职业装的慧师飘浮在空气中，像是苗族传说中的蝴蝶妈妈。她坐在巨大环形屏幕前，身后有无数不同颜色的光线在流动，编织成美丽而复杂的地图。

“笑笑，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不好……慧师，是不是因为我工作不认真，系统惩罚了我？”

“嗯？出了什么事情？”

“Simon……‘心心’……机器老是读错我的情绪。”

慧师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她的虚拟表情无法被标注，这需要很高的权限。慧师迅速调取了几组数据，在屏幕上放大出来。有笑笑的脸，也有 Simon 的脸，还有两张脸之间相连的彩色光线。她滑动时间标签，两张脸上的表情迅速流动。

“笑笑，你别生气，也别沮丧。这不是你的错。”

“我不开心……”

“我知道，你的脸上写着呢，小傻瓜。”

“所以你能看到我正确的情绪？可是车间主任说，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AI 系统就会给我们惩罚，比如调低你在社交网络上的信用值之类的，可不像这样子……”

“我说了不是你的错，是 Simon。”

“Simon？他骗了我？所以他其实能看到我正确的情绪，可为什么要骗我？他不想摘下滤镜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不是那种欺骗。”

“那是什么？”

“Simon 根本不存在。”

“什么！”笑笑脸上的“震惊”突破了能够被衡量的极限值。

“或者应该说，他不是人类。只是 AI 制造出来的虚拟化身，用来引导你购买虚拟道具和服务的鱼饵。”

“可是，他看上去那么……”

“真实。我知道。网络上到处都是 Simon 这样的 AI 傀儡，你也不是唯一上当受骗的人。”

“可如果是由 AI 生成的，他怎么会出错呢？”

慧师飘浮了起来，张开双臂，像只真正的蝴蝶，她背后的屏幕开始闪烁令人不安的红光。

“最近出现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机器，而是人。因为人的大脑比机器更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情绪感知与计算的部分。只要外部

环境施加情绪性的压力，便会极大地影响个体的判断。我们称之为‘情感谬误’，这也是那个黑客组织的名字。”

“那些黑客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宣称，机器剥夺了人类对于情绪的自由解释权，人类被规训为依赖算法才能沟通情感的动物，没有了真实情感，也就远离了真正的快乐。他们把我们叫作‘快乐独裁者’。”

“……我不懂，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标注工人，为什么是我……”

“如果单单针对你个人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可像这样的虚拟化身病毒完全没有成本，自我复制起来毫不费力，而且会根据攻击对象进行变形，实现精准打击。你看看我后面的地图上那些红色线条。”

慧师的身后，有许多红色线条像导弹轨道一般跨过大陆或海洋，然后在着陆点如烟花般爆炸，不断分裂，辐射到更小的半径范围。画面放大，那些被攻击的区域，许多都标注着“心心”的 logo。

“这些线条是？”

“攻击性情绪流。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性，大众的许多决策与判断是在情绪驱使下做出的，只要掌控了情绪的流动，就能够影响世界。”

“所以，打击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的，笑笑，事情往往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慧师脸上快速闪烁过一组数据，像是她无法被人类辨识的细微表情，“我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笑笑心头一紧。

“坏的吧。”

慧师终于笑了，不需要标注也能看出来。她调出数据，是笑笑今天上班标注的最后那幅画面，寺庙前伫立的少年。

“你给他标注了‘快乐 4’，对吧？”

笑笑仔细辨认那幅画面，跟她仓促之间留下的温暖印象完全不同，失焦的远处显示，这是一座专为苦行僧所修建的寺庙。少年低垂的睫毛上还带着泪珠。

他正要被剃去头发，与繁华世界隔绝，这是一场少年向俗世告别的仪式，这绝对不可能是“快乐 4”。笑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我要被开除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你这份工作干不长了，但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机器已经足够聪明，它们从人类的经验里学会了如何自我进化，甚至比人类还要更加了解自己的情绪。所以，情感标注这门职业将很快会不复存在。”

笑笑脸一沉，这是今天得到的第二个坏消息。她条件反射地给自己想象中的脸标注上“沮丧 7”和“焦虑 8”。

慧师伸出了双臂，像是提供给笑笑一个虚拟的拥抱，用布满半透明发光鳞片的白色翅膀包裹住消沉的女孩。

“好消息是，你会有一份新的工作。你被训练出来的技能不会白费，而且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机器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比如说？”笑笑抬起头，充满不解。

“黑客攻击导致了大范围的情感谬误，许多人甚至被诱发出各种情绪障碍，抑郁、狂躁、谵妄甚至自杀倾向。你们对于情绪的准确判断和同理心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新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是 AI 所做不到的。当然，你们仍然需要 AI 的协助，创造出让人感受到快乐的虚拟化身。”

“那意味着……”

“是的，笑笑，你要去上海了，那里会有更大、更新、更先进的车间等着你。”

笑笑看着慧师背后巨大的屏幕，上面投射出自己的脸，叠加在一座巨大恢宏的城市上，脸上的表情似乎在发生一些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她努力想标识自己的情绪，可是发现这变得很困难，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

也许只有机器才能做到对人类情绪的准确标注吧。

我真的能够让人快乐吗？如果我自己都不快乐的话，会不会又是一次失败的逃离，从家乡到我讨厌的大城市？蚩尤在上，请你赐给我一些勇气和力量好吗……

不同情绪和数字的标注在笑笑脸上出现，又迅速消失，就像肥皂泡一样，在爆裂瞬间闪现出七彩的光芒。

一年之后，上海。

一阵清脆婉转的鸟鸣响起，长满了绿色植被的豆荚发出啪嗒一声，缓缓打开，里面躺着一个熟睡的少女。

“醒醒，小美，该上班了。”笑笑抚摸着毛茸茸的豆荚表面，对里面的女孩轻声说道。

“笑笑姐，自从有了豆荚之后，我晚上也不做噩梦了，第二天精神好多了。”

“你呀，就是想家了。”笑笑点了点小美的鼻尖，两人都笑了起来。

小美也是从文山苗寨搬到上海的情绪优化师，可刚到大城市的时候，她浑身上下各种不舒服，上班头昏脑涨没精神，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噩梦连连。自己情绪不好，怎么能给用户进行优化呢?

幸好她认识了笑笑，加入了笑笑组织的“豆荚社区”，生活才有了好转。

笑笑刚到上海时也有着一样的苦恼，告诉慧师后，慧师用算法分析了苗族人的生活方式，设计出了可 3D 打印的“豆荚”结构，应用了无土种植的高分子材料，可以容蓄水分和养料，同时允许氧气的通透。植物种子发芽之后，根系与原材料无缝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巧舒适的绿色空间，可供人类休憩放松。

“妈妈说的是对的，只有能量的流动才能让人的情绪好起来。”笑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激动。

“也许这对用户的情绪优化体验也有帮助……”慧师若有所思，她身后巨大的处理器阵列发出规律的蓝光，像是一块由星空铸成的立方体。

“豆荚社区”的成员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苗族同胞，许多从边远地区搬到上海的算法工人们都加入了组织，打印出属于自己的豆荚，享受着来自自然的绿色能量。笑笑甚至听说，有一些上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怀着强烈的好奇想要体验。

笑笑拉开窗帘，阳光洒进房间，像是铺了一地的金箔。她看到高楼林立的上海街头，在灰色的钢筋混凝土和黑色的液晶显示屏之间，有一些绿色在摩天大楼的外立面上悄悄地生长，蔓延，努力爬向能够获取更多阳光的高处。

她默默地在心里给这座城市打上标注：

乐观。4。

致谢

本书致力于展现劳工，自身也是一项集体劳动的纪念物。因此，需要感谢的人比这仅仅一页之中能列出来的还要多。我们感谢每一位投稿者抽出时间向我们以及全世界分享他们的作品。特别感谢尼古拉斯·卢贝尔（Nicholas Loubere）与林凯文（Kevin Lin）在构思上协助我们完成这个项目，并对书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编辑意见。本书由 *Made in China Journal* 出版，感谢隆德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CIW）的支持，以及隆德图书馆的慷慨资助，使得我们能将本书开放获取。我们还得感谢 Tommaso Facchin 的出色设计，以及 Roberto La Forgia 的封面图，以及 Jan Borrie 的细致校对。最后，我们一如既往地感谢 Verso 出版团队，特别是 Sebastian Budgen，支持我们的设想，将中国的经历融入进有关左翼在过去、未来以及现在的讨论。

贡献者

安舟（Joel ANDREAS）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变革。他的第一本著作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2009)分析了 1949 年革命后新旧精英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本著作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2019)追溯了过去七十年间使得劳资关系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目前他正在研究不断变化的劳资关系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持续中的转型。

贝安吉（A.C. BAECKER）是香港大学艺术学系的讲师，她的研究重点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劳工文化形态的变迁以及后社会主义遗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她拥有清华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与密歇根大学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博士学位。她的手稿项目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工农兵的业余艺术实践。她的作品曾发表于 *Artforum*、*ArtAsiaPacific*、*Frieze*、*The New Statesman* 和 *Vulture* 等刊物。

萨拉·比达尔夫（Sarah BIDDULPH）墨尔本大学国际（中国）事物助理副校长，也是墨尔本法学院的法学系教授与亚洲法律中心的主任。她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法律政策、立法与执行对中国司法行政的影响。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行政法、刑事诉讼、劳工、比较法以及规范社会经济权利的法律法规。

马克 · 布莱彻（Marc BLECHER）是欧柏林学院政治系与东亚研究的 James Monroe 讲席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与菲利普 · 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合著出版于 2020 年的 *Politics as a Science: A Prolegomenon*。他正在撰写 *A World to Lose*，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诞生到现在的纵向历史的著作，以及与戴维 · 古德曼（David Goodman）、郭英杰（Guo Yingjie）、让-路易 · 罗卡（Jean-Louis Rocca）和汤蓓蓓（Tang Beibei）合著的 *Clas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Social History of Change*。

潘鸣啸（Michel BONNIN）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名誉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兼职教授，讲授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是香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与研究期刊 *China Perspectives* 的创始人。2013 年，出版了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该书拥有法语版与简繁两版中文版。中译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

达伦 · 拜勒（Darren BYLER）是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西蒙菲莎大学国际研究的助理教授。他是民族志著作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2021)的作者，以及叙事类书籍 *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2021)的作者。目前他的研究聚焦于新疆与马来西亚角度下的基础设施开发与全球中国。

科里·伯恩斯（Corey BYRNES）是西北大学中国文化、比较文学与环境人文学专业的副教授。著有 *Fixing Landscape: A Techno-Poetic History of China's Three Gorges* (2019)，曾获 2018 年美国魏德海东亚研究所首部著作奖，以及 2020 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杰出首部著作的荣誉提名。他的项目正在研究中国与一个全球环境想象之间的关系，在后者内中国越来越被视作一个存在威胁的对象。

陈佩华（Anita CHAN）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访问学者，也是 *The China Journal* 的联合编辑。此前，她是悉尼科技大学的研究教授。她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工人状况、中国工会、劳工权利与劳工问题比较的文章。她的十本著作包括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1985)，*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2001)，*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2009)，*Labour in Vietnam* (2011)的主编，*Walmart in China* (2011)与 *Chinese Work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15)。

陈敬慈（Chris King-Chi Chan）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与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拥有华威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劳工、民间社会与社会发展。他著有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 (2010)并在 *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Globalizations*，*Development and Change* 与 *Third World Quarterly* 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陈慧玲（Jenny CHAN）是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曾与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潘毅合著出版 *Dying for an iPhone: Apple, Foxconn, and the Lives of China's Workers* (2020)。她还是国际社会学协会劳工运动研究委员会的理事。她的研究方向是全球中国劳工的非正式化，并得到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2015—2018）初级研究奖学金与香港研究资助局（2018—2021）早期职业生涯计划的资助。

陈峰（CHEN Feng）是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复旦讲座教授，也是香港浸会大学名誉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劳工政治与劳工运动、意识形态与地方治理。他在这些领域中发表过多篇论文。

陈柏谦（Po-chien CHEN）自 200 年以来就在台湾不同的工会（如电信工会、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等）与劳工组织中担任组织者与研究员。台湾劳动历史与文化学会的秘书长。

陈楸帆（CHEN Qiufan）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中国推想小说作家、翻译家、创意制作人与策展人。他是世界华人科幻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在 Xprize 基金会科幻顾问委员会占有一席。他的作品包括小说《荒潮》以及与李开复合著的《AI 2041：预见 10 个未来世界》。他目前居住在上海，创立了 Thema Mundi Studio。

玛吉·克林顿（Maggie CLINTON）是米德尔伯里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著有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7–1937* (2017)。她在 2021 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学位，正在考取心理治疗师的执业资格。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在 20 世纪参与区域和全球石油市场的著作。

罗伯特·克利弗（Robert CLIVER）是加州洪堡理工州立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在马萨诸塞州长大，并在塔夫茨大学获得历史系文学士学位。在北京担任翻译一段时间后，继续在夏威夷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北京外交学院与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著有 *Red Silk: Class, Gender, and Revolution in China's Yangzi Delta Silk Industry* (2020)。

亚历山大·F·戴（Alexander F. DAY）是洛杉矶西方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与东亚研究系主任。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民、食物与农业变革的知识、社会与文化史。他的第一本著作 *The Peasan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Capitalism* (2013)探讨了为什么中国农民与农村在中国历史上会不断作为危机的形象出现。他的第二本著作试图追溯贵州省一座茶园与茶厂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到现在的劳动与环境史。

江旷（Brian DEMARE）在杜兰大学教授现代中国历史。作为一名文化史学家，他主要兴趣是探究中国公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日常生活。他的第一本著作 *Mao's Cultural Army* (2015)描绘了乡村戏曲剧团的世界，如何将共产革命作为深刻的戏剧上演。第二本著作 *Land Wars* (2019)将档案与资料与回忆叙述结合，调查了毛主义农村革命的关键时刻。他目前正在根据江西省一个村县的档案资料撰写一本真实犯罪研究集。

董一格（Yige DONG）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与全球性别与性研究系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政治经济学、劳工、性别、争议性政治与比较历史。她有关中国劳工政治与女性运动的研究曾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Critical Asian Studies* 与 *Modern China* 等刊物。她正在撰写一本研究中国工业社会主义兴衰期间护理工作政治的书籍。自 2018 年起，她一直担任 *Made in China Journal* 的编辑委员。

曼弗雷德 · 埃尔夫斯特伦（Manfred ELFSTROM）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奥卡纳干分校经济、哲学、政治科学系的助理教授。著有 *Workers and Change in China: Resistance, Repression, Responsiveness* (2021)，论文曾发表在 *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与 *China Information* 等刊物。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进入学术界之前，曾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支持中国工人权益与改善基层治理。

艾约博（Jacob EYFERTH）是一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学家，关注于非精英人物的生活。他的第一本著作 *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2009) 讲述了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民族志史。他正在撰写的第二本著作，暂定名为 *Cotton, Gender,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埃里克 · 弗洛朗斯（Eric FLORENCE）是列日大学种族与移民研究中心与 PragmApolis 研究小组的副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劳工文化政治、劳动制度转型以及当代中国工人经验的文化与政治调解。过去二十年间，他在华南地区开展劳工文化政治研究，并在种族与移民研究中心协调国际移民研究项目。

伊万 · 弗兰切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他已经研究了十多年的中国劳工运动，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对柬埔寨社会的影响。他与托马索 · 法金（Tommaso Facchin）共同导演了纪录片 *Dreamwork China* (2011)与 *Boramey: Ghosts in the Factory* (2021)。他创办了 *China Journal* 并担任共同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2019)。

马克 · W · 弗雷泽（Mark W. FRAZIER）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政治系教授与印度中国机构的联席主任。他的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劳动力与社会政策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城市化、移民与公民权政治。著有 *The Power of Pla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and Bombay* (2019)，还出版过 *Socialist Insecurity: Pens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2010)与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2002)。

伊莱 · 弗里德曼（Eli FRIEDMAN）是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学院国际与比较劳动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著有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2014)，正在撰写的著作名为 *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Development, Labor Markets, and Schooling in the Chinese City*。

柯蕾（Chloé FROISSART）巴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研究系历史与政治学的教授。她曾担任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的主任、香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以及雷恩第二大学的副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关注集体行动、公民权利、劳工与环境政治以及中国政权的转型。

高敏（Mary E. GALLAGHER）是密歇根大学民主、民主化与人权方面的 Amy-Alan Lowenstein 教授，也是密歇根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2008 年至 2020 年期间就任李侃如-罗睿弛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在 2001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尤其是劳工政治与劳动法律。她近期的著作是 *Authoritarian Legality in China: Law, Workers and the State* (2017)。

马修·高尔韦（Matthew GALWAY）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的讲师。他曾在墨尔本大学担任亚洲历史的 Hansen Trust 讲师。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思想史与全球毛主义，这两者构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Maoism: China and the Cambodian Communist Movement, 1949–1979* (2022)。

何宜伦（Aaron HALEGUA）是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他最近协助超过 2400 名被贩运到塞班岛的中国建筑工人获得 1400 万美元的拖欠工资。何宜伦曾为苹果公司、亚洲协会、福特基金会与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有关中国、缅甸、马来西亚、泰国与墨西哥的劳工问题上提供咨询。他曾撰写过多篇关于劳工问题的著作章节、文章与专栏，包括 *Who Will Represent China's Workers: Lawyers, Legal Aid, and the Enforcement of Labor Rights* (2016)。

简·海沃德（Jane HAYWARD）是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全球事物专业的讲师。她的研究关注中国政府如何日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重点关注中国的土地问题以及相关的城市化问题。

贺萧（Gail HERSHATTER）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的杰出教授，也是亚洲研究协会的前主席。她的著作包括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86, 中译版《天津工人》)、*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1988，与韩起澜合著)、*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1997，中译版《危险的愉悦》)、*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2004)、*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2011，中译版《记忆的性别》)与 *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 (2019)。

平田康治（Koji HIRATA）是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研究员，莫纳什大学现代史的新任讲师。他的研究方向是现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与社会史，以及中日俄之间的关系。

韩起澜（Emily HONIG）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的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现代中国史中的性别、性向、与种族问题，比较劳动史，奇卡诺史，第三世界的国族主义与性别问题，以及口述史。她的著作包括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1986)、*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1988，与贺萧合著)、*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1992)、*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1995，与贺萧合著)以及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The Sent-Down Youth Movement in Mao's China* (2019，与赵小建合著)。

何明修（Ming-sho HO）是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社会运动、劳工与环境问题，著有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from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2019)与 *Taiwan'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 (2014)。

何稼书（Joshua HOWARD）是密西西比大学历史系与国际学院的 Croft 教授，自 1999 年以来一直在该校任教。他于 1999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包括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2004)与 *Composing for the Revolution: Nie Er and China's Sonic Nationalism* (2020)。

黄瑜（HUANG Yu）是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的副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科学-技术研究、机器人技术与工业自动化、劳动研究、环境人类学与农业变革。自 2015 年以来，她长期从事一项研究项目，探讨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如何改变华南地区的劳资矛盾。她的文章发表在 *The China Journal*、*Globalization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Agrarian South*、*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与 *Modern China* 等刊物。

郝秋笛（Jude HOWELL）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发展系的教授。她是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中国非政府组织服务合约政治"的主要研究员。她曾是 ESRC 非政府公共行动项目的主任与 LSE 公民社会中心的前主任。她在中国劳动力、公民社会、性别与治理方面有着广泛的研究经验。

许少英（Elaine Sio-Ieng Hui）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劳动与就业关系学院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发表在许多同行批准的刊物，如 *Theory and Society*、*Human Relations*、*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她的研究方向是国家与法律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工人集体行动及其对制度安排的影响，劳动相关的民间社会活动者与社会劳动体系。著有 *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The State, Laws,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2017)。

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中国发展研究的 Chong Hua 教授，兼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发表过五十多篇文章、论文与著作章节，著有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2009)与 *Ruling before the Law: The Politics of Legal Regimes in China and Indonesia* (2018)，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四本著作。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大陆、台湾、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发展与权力斗争相关的政治。

本杰明·金德勒（Benjamin KINDLER）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Writing to the Rhythm of Labour: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Labour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2–1976'，探讨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生产、政治经济学与写作主体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与 *Made in China Journal* 等刊物上。目前他正在准备一项新的研究项目，探讨后社会主义时期人文科学的重塑与人道主义问题。

蓝泽意（Fabio LANZA）是亚利桑那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现代中国史的教授。著有 *Behind the Gate: 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2010)与 *The End of Concern: Maoist China, Activism, and Asian Studies* (2017)。目前他正在研究大跃进时期北京的公社运动。

李静君（Ching Kwan Lee）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教授。她撰写过三部关于当代中国转向资本主义获奖的著作：*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1998)、*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2007)与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2017)。她的合著作品包括 *Take Back Our Future: An Eventful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2019)与 *The Social Ques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View* (2019)。

李承俊（Seung-Joon LEE）是一位历史学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著有 *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Rice in Modern Canton* (2011)。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暂定题为 *Revolutions at the Canteens* 的著作，将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的劳动与管理、工人饮食与食品福利政治等问题。

梁宝霖（Apo LEONG）于 1967 年从澳门来到香港，最初在一家美国电子公司担任机器操作员，后来成为一家中文报纸的劳工记者。之后，他加入了劳工非政府组织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担任工运组织者。1984 年，他与几个人共同创立香港工会教育中心，后来成为香港职工会联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任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目前他是香港社会保障学会的会长，兼任香港与中国内地多个劳工非政府组织的顾问。

林春（LIN Chun）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的教授，著有 *The British New Left* (199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2006)、《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2008）、*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2013) 以及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2021)；合编的著作有《女性：漫长的革命》（1997）与 *Is Mao Really a Monster?* (2009)等。

林凯文（Kevin LIN）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学者，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国企工人的雇佣关系、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他是 *Made in China Journal* 的编辑委员之一。

李瑞福（Ralph LITZINGER）是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教授，著有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2000)，与罗鹏（Carlos Rojas）合著 *Ghost Protocol: Development and Displacement in Global China* (2016)。近期他的研究关注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主义、人类与后人类的技术想象以及种族环境主义。他与杨帆（Fan Yang）合著的论文‘Eco-Media Events in China: From Yellow Eco-Peril to Media Materialism’曾发表在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May 2020)。

刘羿宏（Yi-hung LIU）拥有夏威夷大学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她的论文 ‘Cold War in the Heartland: Transpacific Exchange and the Iowa Literary Programs’ (2019)探讨了冷战与中国内战背景下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及其国际写作计划的情况。她的研究旨在反思并重塑“冷战自由”的观念，及其如何影响我们的阅读与文学写作，以及想象政治未来的方式。目前她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博士后研究员。

陆延（LU Yan）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东亚跨国关系与中国劳工活动。著有 *Re-Understanding Japan: Chinese Perspectives, 1895–1945* (2004)与 *Crossed Paths: Labor Activism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38–1958* (2019)，中译版《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1938—1958）》。

柯尚哲（Covell F. MEYSKENS）是加州蒙特雷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系的助理教授，拥有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是现代中国的安全与发展，著有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2020)。他目前正在撰写第二本著作 *The Three Gorges Dam: Building a Hydraulic Engine for China*。他的作品发表于 *Nonproliferation Review*、*Cold War History*、*Twentieth Century China* 以及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等刊物。

倪燕萍（Yanping NI）是杜克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生，研究方向集中在当代中国的医疗问题，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及社会不平等有关的问题。她曾在杜克大学民族志学实验室担任 Graduate Fellow 并在“Revaluing Care in the Global Economy”网络中担任研究助理。她于 2021 年 9 月加入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是一位独立艺术家兼民族志学者，也是深圳“握手 302”艺术空间的联合创始人。自 2005 年以来，她一直在播客 *Shenzhen Noted* （shenzhennoted.com）上发表文章。她曾与黄韵然（Winnie Wong）、乔纳森·巴赫（Jonathan Bach）合编了著作 *Learning from Shenzhen* (2017)，中译版《向深圳学习》（2020）。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 Henry Rosovsky 教授，兼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她撰写或参与编辑过二十多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与政治的著作。她研究中国劳工的著作包括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1993)，中译版《上海罢工》（2001）；与李逊合著的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97)；与吕晓波合著的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7)；*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2006)以及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2012)，中译版《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2014）。

安德烈娅·皮亚扎罗利·隆戈巴尔迪（Andrea PIAZZAROLI LONGOBARDI）拥有圣保罗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探讨了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大学的历史。在她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她探讨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中国与伊比利亚的关系。

钱俊希（Junxi QIAN）是香港大学地理系的助理教授。他是一位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家，致力于地理学、城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目前他的研究方向是云南与西藏的土著发展、深圳技术创新的文化经济与中国企业家的宗教景观。

罗鹏（Carlos ROJAS）是杜克大学现代中国文化研究，性别、性向、女性主义研究以及电影艺术的教授。他是多本著作的作者、编辑与译者，例如 *Homesickness: Culture, Contagion, 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2015)。

托尼·赛奇（Tony SAICH）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事务系的 Daewoo 教授，兼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的主任。他近期出版了 *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21)。

阿米达・史密斯（Aminda SMITH）是 PRC 历史小组的联席主任，兼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她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与文化史，尤其关注政治思想的基层史。

史峻（Craig A. SMITH）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翻译研究学系的讲师，著有 *Chinese Asianism: 1894–1945* (2021)，担任 *Translating the Occupatio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1931–45* (2021)的合编。他于 2010 年获得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的硕士学位，并于 2014 年获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史学的博士学位。

史蒂夫・安东尼・史密斯（Steve (S.A.) SMITH）是牛津大学万灵书院的荣誉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现代中国、现代俄国与比较共产主义。近期著有 *Russia in Revolution: An Empire in Crisis, 1890 to 1928* (2017)。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毛泽东时期民间宗教的著作以及一本关于比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迷信与魔法的论文集。他还是 *Past and Present* 的董事会成员与前任编辑。

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科学系的名誉教授。她出版过七本著作，包括 *Poverty and Pacification* (2021)；*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1999)，中译版《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2009）；以及 *States' Gains, Labor's Losses* (2009)。她曾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客座讲师，香港中文大学的杰出访问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研究教授，并受邀在斯坦福大学与密歇根大学任教。

克里斯蒂安・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是科罗拉多学院政治科学系的助理教授。著有或合编的作品有 *Shaken Authority: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2017)与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2019)。他的写作处于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的交汇点。目前他的研究方向是蒙古的民主危机、空气污染与城市化。

博·埃伦伦·瑟伦森（Bo Ærenlund SØRENSEN）是哥本哈根大学中国研究系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当代中国社会、现代中国历史、劳工研究、比较文学、媒体与传播研究、数字人文与认知哲学。

孙万宁（Wanning SUN）是悉尼科技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媒体传播系的研究教授。她已经研究二十余年中国不平等的文化政治及其潜在的效果，并且可能是第一名用英语发表打工诗歌研究的学者，著有 *Subaltern China: Rural Migrants, Media and Cultural Practices* (2014)。

马尔科姆・汤普森（Malcolm THOMPSON）是一名中国史学家，常驻加拿大温哥华。他拥有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那里与多伦多大学任教。他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

蓝梦琳（Patricia M．THORNTON）是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副教授与墨顿学院的研究员。她在多个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近期参与编辑了一期 *The China Quarterly*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她出版的著作包括 *To Govern China: Evolving Practices of Power* (2017，与许慧文合著); *Red Shadows: Memories and Legac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2017，与裴开瑞、孙沛东合著)；以及 *Disciplining the State: Virtue, Violence and State-Making in Modern China* (2007)。

安戈（Jonathan UNGER）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 *The China Journal* 的联合编辑。他的研究方向包括中国社会阶层，中国农村的社会、政治与政治变化，扶贫与发展，城市化，工人与工厂生活，中国民族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史。他出版过十五本著作，包括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82)、*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2002)与合编著作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2009).

王侃（WANG Kan）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兼工会与劳动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劳工运动、劳动与就业关系以及工会。他拥有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的博士学位，曾在乐施会北京代表处担任中国项目主管。

文哲凯（Jake WERNER）是一位现代中国史学家，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作为 20 世纪社会生活形式的上海中群众崛起的著作，并开始研究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美之间大国冲突的出现。

约翰 · 威廉（John WILLIAMS）是科罗拉多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他发表过有关晚清科举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民间宗教与共产主义动员之间关系的文章。目前他的研究方向是 20 世纪中国农业害虫控制方法的演变。

珍妮 · L · 威尔逊（Jeanne L. WILSON）是美国马萨诸塞州韦顿学院政治学系的名誉教授，并在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在学术生涯早期，她专注于中国劳工问题，后来转向中俄内外政策的比较研究，特别关注后共产主义地区思想的传播效应，以及国家认同对于内外政策的影响。

韦立德（Tim WRIGHT）是西澳大利亚大学人文学院的荣誉研究员、谢菲尔德大学中国研究系的荣誉教授，以及《牛津中国研究书目》的主编。他的研究集中在现代中国经济史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他的最新著作是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 Black Gold and Blood-Stained Coal* (2012)，还有一篇论述中国煤炭行业安全方面最新进展的论文将发表在 *The China Quarterly*。

徐国琦（XU Guoqi）是香港大学历史系的 Kerry Group 教授，获得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在中英文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他著有多本著作，包括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2017)；*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2014)；*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2014)；*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2008)以及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2005)。近期刚完成了一本题为 *The Idea of China?* 的著作，已经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约。

叶健民（Ray YEP）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教授，曾获牛津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学位，发表过大量关于香港政治与殖民史、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近期的出版著作包括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porary Hong Kong* (2019)与 *Handbook on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2019)。

张跃然（Yueran ZHANG）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的博士候选人。他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研究通过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政治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晚期到改革开放早期的转型。他之前的获奖研究以征收私人房产税的案例解释了“重庆模式”。

郑田田（Tiantian ZHENG）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人类学系的杰出教授。她已经出版过十余本著作，担任五篇刊物的编辑，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她的著作 *Red Lights* (2009)获得了 2010 年美国全国女性研究协会（NWSA）的 Sara A. Whaley 图书奖；*Ethnographies of Prostitution* (2009)获得了 2011 年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ACPSS）研究出版物奖；*Tongzhi Living* (2015)获得了 2016 年 Choice 杰出学术著作奖，并获得其他三个奖项的提名。她的第四本民族志 *Violent Intimacy: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将通过 Bloomsbury 出版。

ZHOU Ruixue 是一位后殖民主义研究者、作家以及社区组织者。她拥有科罗拉多学院亚洲研究系的学士学位。

Ruiyi ZHU 是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她在蒙古国的中国企业完成了博士研究，主要关注于中蒙工业交往中的劳工关系。她还从事有关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蒙古国的个人档案与口述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她作为 Thomas J. Watson 研究员探索了后社会主义的地貌与记忆。

为什么要翻译？

翻译《普罗中国》的过程中，译者不断自我质疑：翻译这本书的意义何在，最终在麦克·布洛维的《生产的政治》中，找到了表述这一意义的合适语言。

把工人阶级带回来

麦克·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的引言中写到，本书的目的是“把工人阶级带回来”，即重新确立工人阶级与阶级概念在生产与政治分析中的基础地位，而这也正是这本《普罗中国》的旨趣，不过，相比于布洛维的著作，在本书中“把工人阶级带回来”有一个明确的宾语，即“中国”，“把工人阶级带回中国来”。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后社会主义历史，在整合旧有社会主义遗产上成功建立了独属于自身的资本主义机器，我们可以看到曾经以整全面貌出现于文字、舞台与荧幕中的工人阶级，现在已经被拆解为繁多的个体，在阶级话语已经隐匿的当下，其一切的政治性形象已被彻底抹杀，只余下通名为“现代化”过程下的“奉献”，纳入了当代上层建筑的宣传机器之中。而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批评论说在官方适应资本主义格局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中并无立足之地，强大的反组织化治理更是进一步消解了工人阶级形成阶级认同与政治性的阶级表达的空间。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农民“土豆般松散”与“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述”的描述一语成谶地道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一句话，中国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翻译本书的第一项目的，便在于使工人阶级重新以阶级的面目出现。

这并不代表着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彻底失去了行动的可能，事实上，行动的空间既是被结构的，但同时也是需要主体去占据的，七十年代末的工厂民主化尝试、八十年代末的社会自救运动、九十年代至〇〇年代的反改制运动与从〇

〇年代至一〇年代中期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分别代表了后社会主义中国不同阶段的劳工抗议浪潮，正如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先在的事情，中国工人阶级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仍然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斗争的进程。但问题在于，对于被地域、民族、城乡、性别等不同社会身份所分割的工人阶级，如何能让不同的声音被听到、不同的身影被看到、使得不同生产场所与政治空间的不同方式的反抗可以被识别为“共同的事业”，从而在前三十年所建立起的整全性的工人阶级形象已然失落并不再成为有效政治身体的今天，重新形塑起“内在于我们的他者”新的政治行动主体，却是仍有待于继续推进的努力。翻译本书的第二个目的，便在于指出当下的工人阶级并非传统的或某些人设想中的男性工厂工人的形象，而是由多重不同的身影所共同/不同构成的形象。

这就涉及到“把工人阶级带回来”的另一个方面，即重新建立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批评框架，麦克 · 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中将“工厂政体”作为分析生产过程的核心，某种意义上也揭示出构成工人阶级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即生产与政治，生产的政治在他那里论述颇详，而政治的生产则更多有赖于对当代运动的分析。某种意义上，2015 年之后劳工非政府组织的衰落与 2018 年佳士运动失败后毛主义工运网络的瓦解标志着“左派”（通常是左派知识分子，或是更加狗哨式的“网左”）与工人阶级之间联系的脱节（这并不代表着工人运动的消隐，但确实使工人运动更难以被看见），直接导致了 2020 年以来左翼话语在互联网场域中的重新配置，拉黑齐式精神分析等带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哲学思潮与苏联/文革史等非-运动的左翼智识受到热捧，一度寄托着当代青年左派的乌托邦冲动。但其无力把握现实这一唯物主义的危机最终导致乌托邦冲动或转化为完全没有工人阶级的左翼智识秩序而缺乏生产议题的能力，或导向人道主义的对工人的同情却缺乏真正的运动经验与知识，导致了青年左翼对待当下的中国工人普遍的“失语”。我们希望当代左翼能够掌握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批评方法，将生产与政治纳入到思考的范围以内，以期培养介于第一线与第二线之间的运动型知识分子与增强他们的社会学干预能力，从而更好的参与到可能的运动之中。翻译本书的第三个目的，便在于恢复阶级分析在左派知识分析中的地位，重新建立起知识与运动、左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桥梁，使得左派能够在工人阶级之中，成为“同志”与“我们”。

翻译的政治

翻译是一种政治。翻译的过程也正是译者提出自己议程的过程。近代中国文化政治的最大成就之一是白话文的创生，而这一议程正依赖于从清末严复等人开始到民国新知识分子不断的翻译事业。瞿秋白在《论翻译——致鲁迅的信》中写道："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几乎是对这一文化政治事业——通过引入异质性的因素来创制现代中国语言，从而构建起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最为清晰的表述。鲁迅在回信中所提出的"硬译"，其用意也正在于异质性因素的引入。当下中国颇为庞大的翻译产业不仅彰显着中国资本主义的成功，同样也是中国民族国家已然稳固的象征。有关翻译的故事似乎已经讲完，但这种对起源的回顾却忽略了那些不容于民族国家叙事的诸多裂隙。

让我们再次回到瞿秋白与鲁迅，在他们那里，这种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是否仅仅指向文言一致的民族主义事业，或者说，在白话被收纳进民族国家的叙事之外，是否还有着被压抑着的故事。在瞿秋白与鲁迅三十年代有关白话、大众语与普通话的论说中，译者发现了零余的要素。瞿秋白在《鬼门关外的战争》中指出，作为民族国家语言的"国语"实际上是一种压迫机制，而真正的普通话，恰恰产生于"现代化的工厂中"，是大工业带来的各地无产阶级在现代工厂中互相交流、互相认同的产物，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语言。我们不难在这里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痕迹，不过也正因如此，我们也看到了在上文瞿秋白对翻译的论说当中，翻译事业的结果——"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所指向的并非是作为压迫机制的国语，而是属于无产阶级语言的"普通话"。今天的中国官方语言虽然仍旧保留着普通话的称谓，但实际上早已与国语并无二致，瞿秋白的事业已经被背叛，所希冀的无产阶级语言只能作为"绝对的白话"供今天的语言学家们聊以讥讽，而并不了解其中承载过有关无产阶级之间水平关系的理想。

正因如此，今天中国的翻译事业不再具有中国革命时期的张力——在构建民族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保持审慎的平衡与过渡，而仅仅屈服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诘屈聱牙的学术语言与价格高昂的翻译书籍是跨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国家筑起的新高墙，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学术民族主义与新的等级制，翻译为大众-无产阶级创制新语言的文化志业在此已经消散殆尽。

我们并非是专业的翻译从业者，但正是这一非-身份给予我们更多的可能，去继承瞿秋白与鲁迅未尽的理想，由《中国制造》期刊（*Made in China*）编辑的《普罗中国》寄托着诸多国外左派对中国的希冀、失望与反抗绝望的期待，也因此成为在这个阶级话语消隐的“无声的中国”内，可以援以为异质性要素的存在。译者必须承认的是，本书中的理论语言与外国观察者对于中国的某种“误认”使得本书难以圆融地直接呈现为当下中国无产阶级的语言，但编者与译者们所秉持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原则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打破学术民族主义制造的智力壁垒，使得以阶级为核心的中国观察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置身于学院之外的人们所了解，甚至进一步参与到即将到来的对抗帝国及其文化镇压机器的运动当中，惟其如此，本书方可参与到当下真正的无产阶级语言的创制之中。尽管如此，译者也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多方面的因素，在 Word 转换 PDF 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排版上的疏漏，此外，如果发现疏漏（错字、误译等）可以联系译者补正。

译者之所以将本书的译名定名为《普罗中国》而非原本且直接的《无产阶级中国》，某种意义上正是拒绝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画上一个句点，而“普罗”一词本身也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论争中的重要内容，尽管它在今天仅仅作为“大众”的一个代称被人们渐渐遗忘，但音译所具有的异质性因素与普罗作为汉语词的音义的相反（音调上的）与背离（普罗指向全有，而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言，是“一无所有”的阶级）却时刻提醒着我们，“普罗”与“无产”之间的歧义开启了一个敞开的过程，在其中我们似乎仍能听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幽灵在历史中的徘徊与在当下的即将出场，正如国际歌中的那一句：“我们一无所有，让我们成为全部！”（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本书翻译的正当性也因此与即将到来的反抗运动联系在一起——“什么都不是，而将是一切。”

余论：关于本书

正如本书开篇两位编者所指出的那样，本书并非一部有关中国无产阶级的通史，而是由不同的写作者截取中国无产阶级这百余年发展历程的不同侧面构建的多声部合唱与对话，这一点在本书末尾的贡献者名单中也清晰地显示出来，

因此本书的阅读方式也是多样的：同一时期的文章可能会涉及诸多领域，而不同时序的文章在这些领域中又形成了复调的对话关系。

从林春有关党的成立的文章到本书最后几篇文章中作为强大的镇压机器的中国共产党的流变无疑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党-国”（Party-State）这一译词的含义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扮演角色的复杂特性，既指党和国家两个政治行为主体，又指从中国革命开始中共重塑中国民族国家的纠结，以及一党治国、以党驭国的具有稳定态特征的党-国体制，无不彰显出其间的紧张特性。

而从董一格《中国工厂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到改开之后几篇性别秩序重新配置的文章则标明了本书的性别视角与女性主义谱系，展示出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与党-国体制之间的对抗，以及中国工人运动中潜在的不稳定的分裂。我们也不难从邓中夏、张跃然以及埃尔夫斯特伦的文章中看到与之相像的主题，即学生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调试这些既被国家机器所分化与塑造，又容易凸显运动者之间裂隙的主题，仍是当前留给我们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书所收七十九篇文章，堪称复杂多样，如何在文章所构筑的地形之间建立起独特的联系，读者尽可自行体认，在这里，作为译者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并不赞同所收文章的全部观点，且一些文章在译者看来并不上佳，例如所收徐国琦教授有关一战华工的文章，与本书其后关于中国与蒙古、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劳工外交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外交的成就与局限的思考、或基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工人对当下中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批判相比，未免太过油滑，其所称道的一战华工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与“官史”契合之处颇多，而于本书则实属一般，竟连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思都丝毫不愿提及，只是所谓纪念碑的历史而已。同样，对于本书诸多贡献者对中国现状的思考与未来之愿景，译者也只是如实翻译而非全体接纳，有关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期待等等问题，也希望读者读后能有自己对其兴亡成败的体认。

感谢《中国制造》期刊，没有他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关注，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现，希望本书能够带着他们的愿景被更多中国读者阅读与接受，参与到中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之中。

也感谢那些曾经开启并参与斗争的工人与运动者们，是你们的努力形塑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也造就了这本书的出场。尽管如今抗争政治的前途仍旧昏黄，正在继续着抗争志业的人们的名字又难以被后世所知晓，但正因

如此，在历史的既写与未写之间，我们与过去一同存在，对过去的体认拒斥了当下事业必然胜利的无用乐观，正是这种面向过去的态度重新激活了持续作用于当下的失败主义，从而以彻底的列宁式的虚无姿态为革命政治开启了可能。革命政治的无担保性召唤着非-历史的书写机制，对于未来我们可能仅剩下无所乐观的希望，正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的结尾所写到的那样："但你们，当那时／凡人皆是帮助者的时候／请宽容地／记住我们"。

是为记。

译者
BrechtBenjamin@proton.me